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一　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一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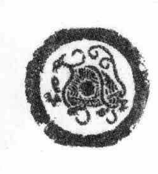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卷十一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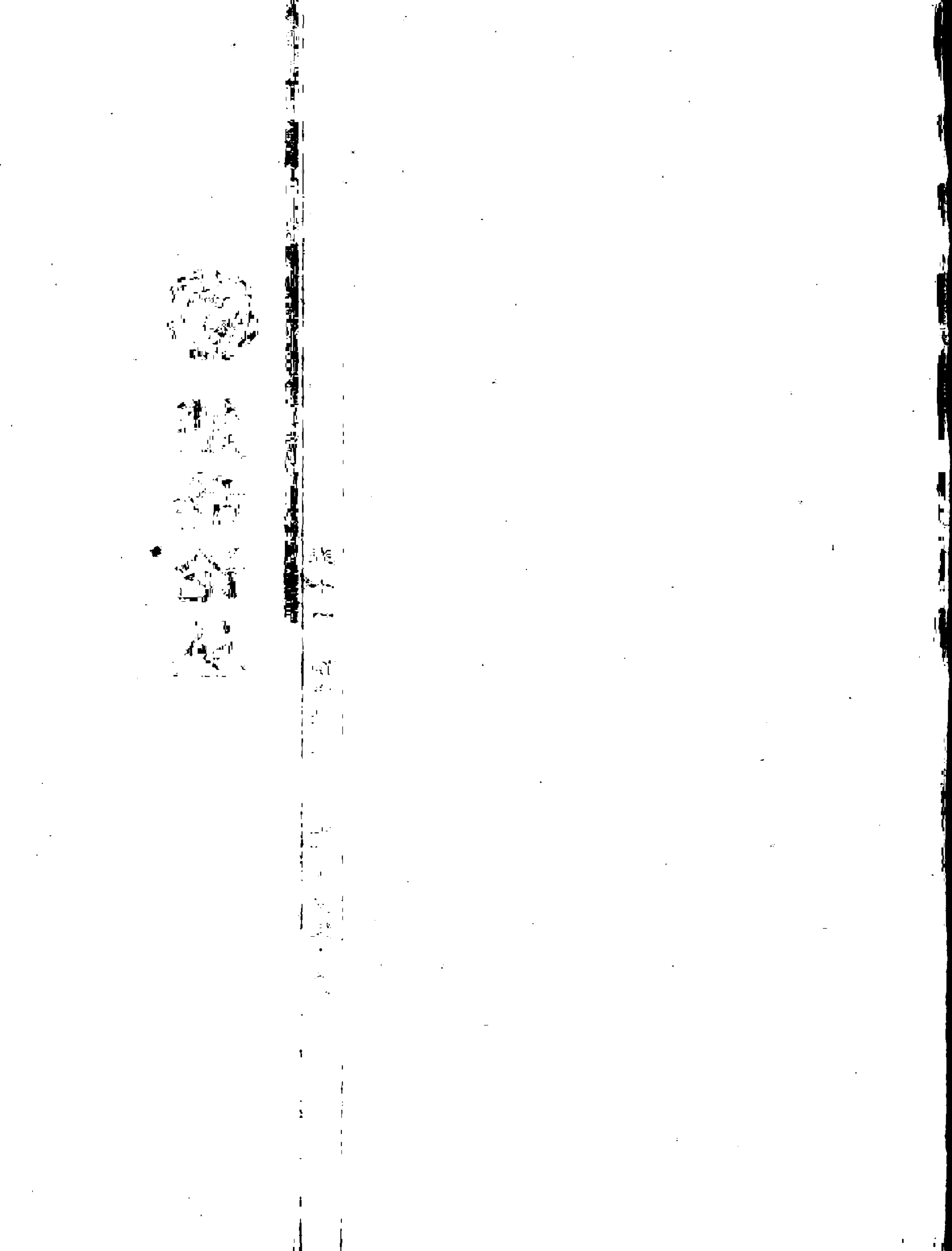




楚辞论丛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目　录

屈原与经术

从表面看，屈原与经术似乎不该连在一起，况且《楚辞》在四部里是列在集部之首的。可是从事实上观察屈原的学问，却与经术有相当的渊源。现在我试拈出一些问题来讨论：

一、《离骚》的称经

（一）王逸称《离骚》为经

《离骚章句叙》："《离骚经》者……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二）班固称淮南王安作《离骚传》

《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①

（三）汉宣帝认为合于经术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云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

（四）扬雄对"经"字的看法

扬雄《法言·吾子》篇："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

① 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惟王念孙于《读书杂志》中谓传当作傅。傅与赋通。近人杨树达又从而引申之。

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相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综合上列各点，我们由汉武爱骚，淮南作传，汉宣帝认为合于经术，及汉人以“事、辞相称则经”的尺度推论，那么，《离骚》的称经，应该在西汉时已经开始。到了王逸，承继前人未竟之业，用经生离章析句的方法去整理它，并且加上“章句”两字。以后宋人中的周必大就认为王逸将《离骚》称经是合理的。至于朱熹，仍然将它当作经书看待，称曰“离骚经”，保持传统的称谓，在《天问》各章都冠上“离骚”两个字。

二、屈原时，学术上还有九流十家的分别，他的学问属哪一类？他的辞赋是否配得上称经？

现在我首先谈谈各家对屈原的批判：

（一）刘向称他做节士

《新序·节士》篇，刘向列举多个节士，屈原是其中的一位（文繁不录）。

（二）扬雄称他颇为有智

《法言·吾子》：“或问：屈原知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三）班固不同意扬雄的说法，但称许屈原是“妙才”

《离骚序》：“虽非明智（哲）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四）王逸称他为大雅之士

《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诚博远矣。”

（五）刘勰称他“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①

《文心雕龙·辨骚》：“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兹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为彼，语其夸诞则为此。固知《楚辞》者，体慢（宪）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六）颜之推承袭班固的话，批评他“露才扬己”

《颜氏家训·文章》：“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

① 博徒之博，即王逸其词博之博。

（七）洪兴祖对屈原有深度的了解，称他是“圣贤之变者”，并且极力驳斥各家的批判

《楚辞补注》：“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语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

（八）朱熹说“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

《楚辞集注·序》：“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也。”

以上八说，大体都是从屈原的行为下断语。其中朱子之说，我最不同意。他可惜屈原不到北方去接受正统文化，因此变成变风变雅的末流，这点是很可商榷的。

春秋时代的楚国，虽受中原诸国的摈斥，不能参与中原的盟会，在政治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但在文化上，并不见得怎样隔阂。《左传》里记载楚人“赋诗”的事不少，《国语》里记申叔时对楚庄王的谈话，及左史倚相的能读三坟五典等等，都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五经之学老早已经在楚国植根传播起来，屈原不必到北方去，已有足够的机会接受正统文化了。《史记》本传说他是个“博闻强记”的人。在《离骚》本文里，他常常引用经语，而《离骚》所表现的思想，也与经学息息相通，那么，屈原实在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现在试从文辞及思想两方面加以探索。

三、《离骚》与群经

（一）《论语》（有引号者，句出《论语》，下文见于他经者，例同。）

恐年岁之不吾与。[1]

“日月逝矣，岁不我予。”

恐修名之不立。

① 《离骚》。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已矣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吾和其其亦已兮。
"莫我知也矣。"
愿依彭咸之遗则。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窃比于我老彭。"[1]

（二）《易》

吾固知謇謇之为患兮。[2]
"王臣謇謇，匪躬之故。"
结幽兰而延伫。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三）《书》

循绳墨而不颇。
"无偏无颇。"
皇天无私阿兮。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3]
忽吾行此流沙兮。
"余波入于流沙。"[4]

（四）《诗》

忽奔走以先后兮。

---

① 老彭：包咸注《论语》、《大戴记》都说老彭是殷贤大夫，与王逸所说的，当同是一人。
② 《离骚》。
③ 王逸引《周书》。
④ 《禹贡》。

“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

众女嫉予之娥眉兮。

“螓首蛾眉。”

见有娀之逸女。

“有娀方将。”

(五)《春秋》

恐皇舆之败绩。

“大崩曰败绩。”①

以上所举的例子，可见屈原对于《论语》、《易》、《书》、《诗》、《春秋》这些书，都读得相当烂熟，并且吸收了它们的词语。

屈原在《离骚》里表现的思想，与经学息息相通的有四点：

(1) 修能与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修能

《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内美

《易·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修能”与“修辞”，是“进德”的一体两面。屈原的“修能”，正是《易经》的“进德修业”、“修能与内美”，是分内外两层讲的。在儒学里，是最重要的一环。

(2) 善与义——“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善”与“义”，不用说，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大学》引《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

(3) 时——“哀朕时之不当”，“愿俟时乎吾将刈”，“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易经》：“时义大矣哉!”

“时”是易学中心思想，屈原“时”的观念，无疑是出源于《易经》的。

① 《左传》庄公十一年。

(4) 中正——“耿吾既得此中正”，“依前圣以折中兮”。

“中”的观念也是《易经》的主要观念。

总括来说，屈原的文章吸收了经书的词语，屈原的学问，会通了经学，而他的思想跟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有相承关系。不过他不是像一个章句之儒，只会在一章一句里讨生活。他对经学有深度的造诣，并且接受了若干主要思想。因此，可以说他深受儒家影响。虽不能说他完全是儒家，如果用汉人（扬雄）称经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文章的话，《离骚》称经大致不会有问题的。

至于他的学问究竟属于哪一类呢？明方以智在他的《象环寤记》论庄子、孟子与屈原有这么一句话：“扇扬大成药肆者也。”我的见解跟他大略相同。现在就引这句中肯的话，作为本题的结束——屈原是大成药肆的扇扬者。

在联合书院讲，李达良笔记

骚言志说

《诗》言志，《骚》亦言志。淮南之论屈子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公录以入传，故假《骚》以言志，其事汉、唐已然，而特盛于宋、明，盖又与义理之学有关。近世治《楚辞》者多措意于训诂校勘，而颇昧斯义。诗言志之说，朱自清已有专书讨论，若骚学则尚阙如。贾谊谪长沙，为文以吊屈原，其云"方正倒植"，又云"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既以自况，亦以自宽也。班固以《诗经》之《小弁》，与《离骚》相提并论。《汉书·冯奉世传》赞云：

> 谗邪交乱，贞民被害，而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词兴。

班氏虽议其露才扬己，然于骚之文辞，良深嗟叹，日月争光，非淮南之私褒，固天下之公言。借骚以言志，不特出于儒生，即缁流亦沿此途径，法琳即其例也。释彦悰著《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云：

> 帝（太宗）曰法琳虽毁朕宗祖，非无典据，特可赦其极犯，徙在益郡为僧。法师见放，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其词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张列宿。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见放逐。谗佞从旨兮，位显名彰。直言不讳兮，遂焉逢殃。和璞捐于山泽兮，燕石为珍。

西施媞而不幸兮，嫫母见亲。抚心思会屈原兮，博达广识。君王不察其贞正兮，斥逐去国。纳谗谄之谀惑兮，自昏厥德。燕苏弃于荒野兮，蘩藩见殖。鸧鴳鸣啸于君林兮，鹓鸾戢翼。豺狼当路而从横兮，麟麇伏匿。凤鸟尚知怀德兮，见覆巢而高翔。麒麟犹忻有道兮，瞩不仁而腾骧。忠谏之不入兮，箕子佯狂。杜伯之谅直兮，遭尤逢殃，比干正而剖心兮，伍子胥贞而抉眼。痛清白之屈原兮，沉汨罗而不返。”……（琳）谓三五友人曰……昔屈原被谗放逐，原岂不为忠？卞氏献璧加刑，谁言是瑕？此亦时君用与不用也。屈原虽放逐，《离骚》盛行。……因为诗曰：仆秉屈原操，不探《渔父篇》。问言蓬转者，答为直如絃。[1]

法琳见放，即以屈原自比。吊屈原之文字，历代甚多，如僧皎然有《吊灵均词》[2]，王守仁有《引屈原赋》[3]，若法琳之作，世罕知之，故为表彰于此。

两宋骚学盛行，晁无咎、朱考亭皆其尤也。晁氏重编楚辞；复取历代拟骚之作，自王逸《九思》至韩愈《复志赋》二十六人，其六十篇，为《续楚辞》；又录荀卿《成相》至顾况《招北客》等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为《变离骚》。区楚辞之流派为“续”与“变”。朱子因之，厘为《楚辞后语》，共五十二篇，起荀子《成相》，终吕大临之《拟招》，而揭其遴选之准则有二：曰“辞”，曰“义”。其言云：“晁氏之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夫辞者，文之外形；而义者，文之寓旨。治骚者于“辞”与“义”固皆宜措意。惟义为一切文学之内蕴，举凡诗文词曲，有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者，无不与《离骚》之微旨相通。如是而博稽遍考，则将泛滥而莫知所裁矣。

宋人之治《楚辞》，有二途焉：一拟其文，如黄山谷是也；一求其文或思更有以正之，如东坡经屈原祠下为赋以诋扬雄，而申原之志。其辑之乱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朱子以为此有发于屈原之心，故其论屈原也，称其不能合于中庸之道。即洪兴祖论“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朱子虽援其说于后语，而始终以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似缘东坡以立说。此宋人治《楚辞》

① 《大正藏》第五十史传部二。

② 《昼上人集》。

③ 《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外集一。

而又有以正之者也。

朱子收吕大临《拟招》，谓此词寓夫求放心、复常性之微意，故附之使游艺者知有所归宿，尤具深意所在，此则因辞而正之者也。复云："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资道之微。……圈豚放驰，散无适归。……魂兮来归反故居，盍归休兮复吾初。……曷自苦兮一方拘，魂兮来归故居。"则不为屈子招魂而亦为一己招魂。如孟子云求其放心，用意尤深长也。

朱子谓屈子志行过于中庸，不知《离骚》自言"耿吾既得此中正"。《九章·惜诵》云："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枘中。"中正之义，本于易教。《骚》云"我固知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二句，实用蹇卦语。屈子尝熟读《易》，盖无疑也。

宋人注《楚辞》者特多，盖托《楚辞》以言志。洪兴祖之为《楚辞补注》是也。兴祖《楚辞》学，远有所承。直斋称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引洪氏自序，今本无之。可能因其获罪而为人所删削，故意没著者名姓，故其序不载于今书。《宋史·儒林传》称其南渡后，知真州、饶州，忤秦桧，编管昭州，卒。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记：

> 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丙戌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洪兴祖送昭州编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故龙图阁学士程瑀本实妄庸，见识凡下……其窃世之誉如洪兴祖者，则为文以冠其首……朋附鼓唱异说。珉又言：兴祖天姿阴险，趋向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兴祖倾心附之，结为死党。……于是刑部尚书韩仲通乞将兴祖送熙州，并编管。

《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兴祖有"圣贤眼目一卷"，其人以希圣自居。其论屈子长文，今附载《补注》中。自序虽亡，而微旨可见。

其后朱子著《楚辞集注》，则为赵汝愚而作。《历代诗馀》卷一一八引宋名家词评云："汝愚谪后，晦庵注楚辞以表之。"此说亦见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

余考嘉庆间谭抡纂《福鼎县志》卷八有杨楫作《朱子楚辞集注跋》云：

> 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

《孟》、《中庸》四书，资以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有请焉。

又题后自注云："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公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乙卯即宁宗庆元元年。此篇端平本不载，至可宝也。

杨楫字通老，杨兴宗从弟，与杨方、杨简为朱门高弟，时号三杨，官莆田尉、湖南提刑。《县志》入《理学传》（卷六）。选举表楫淳熙五年戊戌进士。朱子《答黄直卿论杨通老书》，即此人也。《县志》黄崎山条："闽穷海也。有屏风山为障。又有文星明山，朱子避伪禁到此止焉。作《中庸·序》于民家，乡僻无纸，写序于屏，后舁入州库。"朱子晚岁因伪学之故，转徙至于福鼎。《县志》所言，可补史传，故并记之。

太史公以屈贾并论而作合传，明人则喜言"屈、扬"。举例言之：

（一）李贽

李生曰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

屈子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①]

史公《屈传》引《易》"王明并受其福"，李贽云：

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此以人臣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

此誉屈原为大忠。

（二）明诸城邱志广《为离骚太玄作》一篇云：

《离骚》、《太玄》，千古奉之为"经"。屈原本于忠，扬雄嗜其奥。

文以明白简易入情入理为主。如《论语》、《孟子》在十三经中，是千古奉之为经者，何曾有诘屈之词如屈、艰深之词如扬哉？

① 《温陵集》十六"反骚"条。

古人云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况其文耶。且文章关乎人之性情，阅乎人之祸福，文如《离骚》，文中之鬼道……屈之文虽不足为法，而品犹可重。……①

其说屈子忠而过，其文亦过，则拾朱子议屈失于中庸之余唾。称骚为鬼道，尤异乎常论。

《王祎忠文集》述《骚》云：“粤义命之是安兮，弗舍己而人从，虽一身之终绌兮，固百世之耿光。”

义与命之所安，忠耿不渝，明人则深誉其忠，不似宋儒议论之苛。方震孺《读离骚诗》云：“信美修能莫认真，独褰兰芷复谁亲。乾坤若有同醒者，憔悴江潭增一人。”② 亦颇哀其志。

明季拟骚之作大行。堵允锡作《坠龙骚》，哀甲申之变。其文五章，皆用“些”字。自序云：“楚臣楚声，寸肠断矣。”死节之士，若夏允彝作《招魂》、《九哀》，黄道周为《续离骚》、《续招魂》、《续天问》及《丛骚》十五首③，尤为集大成之制。黄文焕因坐道周党下狱，著《楚辞听直》一书，取《惜诵》“命咎繇使听直”以名其书，亦借《骚》言志之作也。

清乾隆间高安陈远新特著《屈子说志》一书，读其凡例数则，对灵均作骚之用心，颇多抉发。兹摘大要如下：

（一）《离骚》有三答问：“众不可户说”以下，答女媭之詈；“民好恶其不同”以下，答灵氛之占；“汤禹俨而求合”以下，答巫咸之告是也。今一一就其两下语气，机锋相对处，寻其脉理，似觉辞旨分明。

（二）《骚》、《问》原是一时之作，观《天问》起手，便为女媭“鲧婞直”一句洗刷可见。“鲧营”、“禹成”二句，足翻千古罪鲧德禹之案。其不满禹、启，而于汤武无讥者，一以病其塞传贤之路，一以大其创兴王之门，为当世舍贤立爱，偏霸自安讽也。屈子生楚仕楚，尽忠于楚，正不得以《春秋》之义绳之。大意归于自奋用人，自明己忠，只末一句。然通篇许多话说，而云“吾告堵敖以不长，则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之语，又不为短矣，此《骚》心微渺，令人探索不尽处也。

（三）《卜居》自叙竭尽忠而障蔽于谗。是《九章》提纲，故以冠《九章》

① 《紫村文集》十二“杂著”。

② 《方孩未集》卷八。

③ 文见《漳浦先生集》卷三十六。

之首。《惜诵》通篇发忠蔽于谗，末云“重著自明”，又是以下各章冒子，故次之。《思美人》，著明其不得于君之故；《惜往日》，著其先信后疏之寔；《抽思》是四章结尾，因《惜往日》，不毕辞以赴渊二句而反覆著明之也，合为一章。《橘颂》著明己之内美，借物以自况，《悲回风》，著明“依彭咸之遗则”，“从彭咸之所居”，此二篇始终《离骚》之义，应为一卷。

所论虽未必真能尽窥古人心事，诚如沈澜序所云“别具会心”，“融释贯串，屈子之考既得，读者亦旷若发蒙”矣。此书有慎余斋刻本，流传不广。向于京都大学文学部获见其书，因为补记于此。

故《诗》以言志，《骚》亦言志，取义谅有同然。论汉文学者，盛言“《诗》言志”，而不及《骚》，因试摭若干事，发其端倪，论其大略如此。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演讲稿《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其中有一节论及“骚言志”，原文未刊布，今附载于末。

戴密微教授晚岁治大谢诗，特赏其临终“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之句，因广及中日文士僧徒易箦前作品。积稿盈尺，未遑写定。曩曾与余论及文天祥就义前之《正气歌》，嗣因读《远游》，方知“正气”二字，实出该篇“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句。惜先生墓木已拱，不及举以请益，临文握管，为之泫然。

附录　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

中文大学文学院和新亚书院为我的退休特别举办这一次演讲会，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安排。

《楚辞》与《诗经》同是古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宝库；尤以南方文学作品，到了《楚辞》即成为第一部总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诗与赋并列，赋大部分即是楚辞。《隋书·经籍志》以来，集部以《楚辞》为首，自成一类，后此相承不替。《诗经》既厕于经之列，汉代《楚辞》的首篇《离骚》亦被人称为“离骚经”。它在文学和历史上，跟《诗经》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一）“楚辞学”建立的意义

过去研究《楚辞》的专书和论文，到 1958 年为止，计有专书 228 种，论

文447篇[1]；就中以朱子的《楚辞集注》而论，最早刊本印于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而非（如姜亮夫所说）庆元四年。[2] 自刊布以后，几乎成为一部极流行的教科书。它的翻刻次数最多，计宋有四次，元有四次，明有十次，清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了一次，朝鲜四次，总共合计二十七次。《楚辞》的外文译本，到David Hawkes的英译可说成为一个总结。该书出版于1959年。由于近年三楚地区考古成绩的卓著，新资料层出不穷，对于《楚辞》的了解，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文学重要总集，如《诗经》与《文选》，都已有人著书成为专门之学，像《诗经》学，《文选》学之类，《楚辞》尚属阙如。本人认为今日治学方法的进步，如果配合新材料和新观念，《楚辞》的研究，比《诗经》更有它的重要性。由于研究领域的开拓，楚辞学的建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极其重要而有意义的。

（二）屈原人格的影响

行吟泽畔、憔悴投江的屈原，在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董仲舒取他与伍员相比，誉其“无所后顾”（《士不遇赋》）；淮南王安谓《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美，可与日月争光；刘向称他为节士（《新序》）。从司马迁、班固以下，诸家抑扬不一，后来刘勰《辨骚》已有折中之论。屈原的身后遭遇，倘若泉下有知，应该感到莫名其妙。在唐哀帝的时候，他竟被封为昭灵侯（《全唐文·哀帝封屈原敕》）[3]；宋神宗元丰六年改封忠洁侯（《神宗纪》）；又封为清烈公（《宋史·礼志》）；元延祐五年七月，又被加封为忠节清烈公（《元史·仁宗纪》）。虽然朱熹曾批评他的志行或过乎中庸，但清季还有人要请他入圣庙（记得是王颂蔚），我想他应该是受宠若惊呢！

屈原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极大，死后愈走红运。近年世界各处对屈原作品研究的热烈，令他在地下一定发生不可思议的惊讶。他如果看到一些对他曲

---

① 第一部楚辞著作目录考证是拙作的《楚辞书录》，于1956年印行；其后姜亮夫再编撰《楚辞书目五种》。兹据姜氏书统计。惟拙著所收，有姜氏所不载者。

② 明人如毛以阳疑朱熹《楚辞集注》为伪，姜亮夫辩之。称及庆元四年戊午刻本。谓在熹生前已有刊行本（《楚辞书目五种》，42页）。查大正三年内阁文库目原书，实作庆安四年，非庆元四年。庆安乃日本年号，即顺治八年。姜说有误。此庆安本乃据成化何乔新本刻刊。参拙作《楚辞书录》，11页。

③ 《旧唐书》二十一《哀帝纪》，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

解的文章，一定又要叫屈。历代对他的评论之多，真如万花筒，有关礼赞和评骘方面，我曾搜集了许多资料；而且为他写过“屈原论”的人，尤属不少。现在试举二例来谈谈：

（1）明末方以智的《屈原论》，见《浮山文集·前编》卷八，大意谓：

> 古人（指屈子）不以死生介意，而并不以文介意。古人之心，翱翔乎天地，呼吸乎古今：随所出处，倘然自适。或著书以垂教，或发声以言志，何与乎死生！屈子以不死之文，死其所不必死，以成其不死之死。后人爱惜其死，以爱惜古人之死。何能知古人耶？

方氏对屈子之死，确有进一步的看法。

（2）清季陆懋修（润庠父）的《屈原论》①，竟谓屈原“不过为一骄且呇之人耳”；他的见观十分支离，不足为训。

以上两种极端的说法，可以看出“褒贬任声”（《文心雕龙》）的情形。倘若能够把历来各种各样对屈子的评论汇集起来，对于知人论世，当然是很有帮助的。这正是楚辞学的一项应该做的工作。

（三）楚辞研究者的“以骚言志”问题

古人喜欢以《诗》言志，后人亦喜欢以“骚”言志。中国文学史上作家著为文章，每每有所寄托。不特文学作品如此，即注解古人之书亦有这种习惯。故就注《骚》而申己志的，大不乏人。

丹阳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王逸以后，朱熹以前的名著。他少时曾从柳展如得到东坡手校《楚辞》十卷（见《直斋书录解题》），这一项特殊资料，正为他这本书打好基础。《宋史·儒林传》说他“南渡后知真州、饶州，忤秦桧，编管昭州，卒”。他著这书，究在何时，尚难论定。最可惜的是他的原有序文②失去了，或为人所删去，故意没著者名姓。③ 洪氏以忤秦桧获谴，也许这篇序是著者言志之作（说明著书缘由）。著录家有所忌讳，故不敢举其名。④

---

① 见《窳翁文钞》。

②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洪氏自序，但对此却云：“未详撰人。”

③ 参看游国恩《楚辞讲录》，载《文史》第一期，139页。

④ 今观卷一王逸《离骚经序》注语，论屈子之事云：“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可见其对屈子的推崇。

朱熹之著《楚辞集注》，据《齐东野语》云："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杨万里《诚斋集》，《退休集》有《戏跋朱元晦楚辞解诗二首》，其一云："霜后蘩枯无可羹，饥吟长作候虫声，藏神上诉天应泣，与赐江蓠与杜蘅。"（卷三八）今看书中解说，每每言及忠君之意思，可见他的确有所寄托。吴仁杰著《离骚草木疏》，据他庆元丁巳（1197）自跋，以芗草比之忠义独行传，资菉葹之类犹佞幸奸臣传，亦意有所指，与庆元党案有关，似在攻击韩侂胄。[①]

注《楚辞》以言志，明清以来尚有其人，如黄文焕《楚辞听直》。崇祯中，文焕坐黄道周党下狱，在狱中著此书，其序例已言之甚明："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二千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有奇异。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替，则尝与原同痛矣。"可见其著作之意。

又魏元旷有《离骚逆志》，惜原书未见。

陈远新，乾隆间人，撰有《离骚说志》。姜亮夫有此书，称其章有章旨，用意极细极深。从他们所著书名称看来，应是属于言志一派。

（四）《楚辞》的作者及时代、地理问题

关于《楚辞》各篇的作者，楚辞学史上存在着相当有趣的问题，因为向来有不少的人认为《楚辞》的作者并不是屈原。亦有人以为连《九辩》、二招亦是屈原所作，像乾隆时山东栖霞人牟廷相，他著《楚辞述芳》便是持这样的主张。他说《楚辞》被王逸误注，考其时地，重定《九辩》、《招魂》、《大招》的作者，都应是屈原。结果招来李慈铭的讪笑，说他是"心劳日拙"（《越缦堂读书记》，1166页）。清季廖平作《楚辞讲义》，更为大放厥词，主张《大招》、《招魂》为道家神游说，与屈子无涉。《楚辞》即秦时的《仙真人诗》，其书序略云："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

---

① 鲍廷博《跋》六："是书成于庆元丁巳，维时宁王初政，韩侂胄方专拥戴功，与赵汝愚相轧，既而斥汝愚，罢朱子，严伪学之禁，从而得罪者五十九人。先生官止国录，未敢诵言。乃祖述《离骚》，譬之草木，按《神农本草》诸书，为之别流品，辨异同。薰莸既判，忠佞斯呈。用补刘杳旧疏之亡，因以畅其流芳遗臭之旨。庶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观其自序，厥意微矣。至前三卷，首列名衔，而末卷自资菉葹以下，缺而不署。又隐然寓不屑与小人为伍之意。"

辞》也。楚词即《九章》、《远游》、《卜居》、《渔夫》、《大招》诸篇。著录多人，故词意重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当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有呈撰，年湮岁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说，多不可通。”“著书讳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涤陈言，不至旨意重复，词语参差若此。”他竟然大胆到要把《楚辞》变成秦代的仙诗，实在是毫无根据。

胡适读《楚辞》，曾怀疑屈原并无其人，后来更有人主张《楚辞》作于汉代之说。[①] 最近日本学者曾把这一桩事重新提出讨论。

关于《楚辞》地理方面，过去钱宾四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论过《楚辞》所说洞庭、沅、澧诸水，皆指江北地名；又写过一篇《楚辞地名考》，根据地名相同，可能由于人民迁徙的缘故，又以为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基于这两个理由，因而推论屈原放居宜在汉北，不惜把《楚辞》中所见的江、湘等地，北移于汉水流域。当然，长江、汉水两区域可以有相同的地名，但地名尽管相同，屈原书中所记的“上洞庭而下江”等句，如果放在汉北，是很难解说得通的。四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利用馆藏的地方志写成《楚辞地理考》一书（商务出版）和钱先生讨论（该书最近有人翻印）。我想如果现在看到安徽六安所得的鄂君启舟、车两节，具体地说明楚怀王时楚国通行证经过的路线，和《九歌》所说完全一致。[②] 至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相马经》，虽不知出自谁氏之手，而词藻文采，比之荀卿《赋篇》，尚有过之，不必怀疑汉初湘境文化程度之低了。新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不必要的疑难。关于《楚辞》中作者、时、地的考证，虽是无关宏旨，但在楚辞学史上仍应占一页之地位。

（五）《楚辞》与其他科学及艺术关系问题

《楚辞》与其他科学最有密切关系的无如音韵学。利用《楚辞》考证古音及先秦韵部分音，自陈第以来，已极著成绩。在古代《楚辞》一书，原有数家的“音”。晋徐广的兄长徐仙民（邈），著有《楚辞音》。该书宋时尚存，洪兴祖补注于《离骚》“索”字引徐邈读作“苏故切”，这一条可说是现存最早

---

① 如何天行、朱东润等，因《九歌》、《封禅书》同出现“寿宫”一名。

② 《文物精华》第二集，商承祚《鄂君启节考》，节云：“大司马阳败晋师于襄陵。”即楚世家怀王六年（公元前 323 年）昭阳攻破襄陵事。舟节屡言“内江”，“让江”，又见资、沅、澧、淡诸水名，可见不必移于汉北。

的音训。敦煌所出列伯希和目二四九四的僧道骞的《楚辞音》，虽只存 84 行，但为朱子所未见；是卷对于中古音的探讨及协韵说的重订，极有贡献，已有许多人写过研究文章。

其次谈到考古学。近若干年来，楚地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我于 1957 年曾在德国慕尼黑所举行的第二十四次东方学家会议上提出《楚辞与考古学》一文，那时候信阳、马王堆……各处的楚遗物尚未出土，材料至为贫乏。以现在新获考古资料而论，如能加以适当的运用，可以写成一本像“圣经考古学”之类的专书，来供研究者参考。最可惜的，信阳的简书，马王堆第三号帛书，湖北江陵的竹简，尚未正式完全公布，就所知而论，信阳简上记着“犹芑蒹与（软)”，兰字写作蒹，可证《离骚》“滋兰九畹”，象征贤者之义。简上又记载许多儒家、先王的言论，和楚语申叔时的遗教亦可印证，说明楚人文化和中原向来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考古资料还需要和纸上资料取得印证，对于《楚辞》帮助尤多，像《天问》谈开辟之初，明明暗暗，和《楚缯书》说“瞢瞢墨墨”，马王堆《道原篇》的“湿湿梦梦”，是同样句型，正可得到恰当的理解。

从神话学的观点来研究《楚辞》，在当前已成为一主流，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著《巫系文学论》（1951，大学书店），把巫术和《楚辞》联系起来研究《九歌》、《天问》，可能得到若干新解，有关 chamanisme 一类著述（著者如 Mircea Eliade)，已有专章讨论《招魂》、《远游》等篇（350—352 页）。昆仑山与不死之乡，在《楚辞》屡屡被提及。唐段成式言“昆仑为天地之齐（脐)”，虽出道家之说《酉阳杂俎》卷二，亦见《云笈七籤》，必有远源。近世讨论昆仑山的学人，大都认为即神话中铁围山的苏迷卢（Sumeru)，或比附西亚 Ziqqurat。帕米尔（Pamirs）有地名 Garan，有人以为即是昆仑，说得更为泛滥。其实，人类对 Piller du Monde（天柱或地轴）的观念，古埃及、印度（Rig-Veda x89.4)、希腊、巴比伦皆有之，中国亦然。古代不死观念，甚为普通；《山海经》有不死树，《淮南子》谈到不死民。不死和印度吠陀的 Amrta 观念很相似。神话是诗，诗与神话本来已很难分别。《楚辞》与《山海经》一方面是人类史上远东地区有关 myth 的最重要题材，同样的，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来处理《楚辞》，自然可以得到许多旁证与合理的解答。

《楚辞》因为保存着南方文化的传说，它的文字及内容，后来给人多方面的运用，已成为所有文学的典故及各种艺术的题材。绘画史上的《九歌图》，与古琴曲中有《离骚》、《屈原问渡》、《搔首问天》、《宋玉悲秋》等等，都说

明《楚辞》给予后来影响之大及如何与艺术结上了不解缘。这些问题，本人另有专书论述[①]，这里恕不再赘了。

（六）楚辞是否受到域外文化影响问题

《楚辞》中《天问》体裁是否受过域外文化的影响，苏雪林认为它是有蓝本的，但她只引用《赞诵明论》（即《梨俱吠陀》）一段话及《旧约·约伯传》第三十八章两处作为佐证。其实，在印度经典中，这类句式甚多。《吠陀》是和《火教经》最有密切的关系。苏氏认为："或者《圣经·约伯传》先传入印度，印度学人拟其体作《吠陀颂》，《吠陀颂》又传入我国，乃启发了屈原写《天问》的动机。"这一说法，证据似乎未够充足。《吠陀》各篇的年代，本来就很难确定。[②] 尤其《吠陀》卷十、一二九的《创造之歌》，因为其中表现着极浓厚的高度一元论思想（monism），如 tad ekam（that one）观念的出现，正如我们的"太一"。此歌开头便说："太初无无，亦复无有。"有点像老子一派主张："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篇）太一观念，在战国以后已经神化了。[③] 而《吠陀》中的 tad ekam 是纯理的、抽象的，所以被认为是很晚出的。[④]

屈原的《天问》，文体很奇怪；光是这个题目，过去学人就有许多聚讼。英国 Arthur Waley 在他编选的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竟说《天问》好像是一些试题，不知何以渗入屈原的作品。这引起苏雪林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他"强把'升学南针'的'考题汇刊'一类书来看《天问》，未免太可笑了。[⑤]"其实，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问型态"的文学作品，自有它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印度最古经典的《吠陀经》和伊兰《火教经》中的祀歌，都出现同样的句型；《圣经·旧约·约伯传》亦有类似的问句。中国在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一切事物，抱着怀疑态度，对宇宙现象的形成，尽量提出问题，如惠施同时的楚人黄缭，便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屈原的《天问》，是在这种风气下茁长起

---

① 见拙著《楚辞书录·图像第四》及《楚辞与词曲音乐》。

② 印度学者 B. G. Tilak 著 *The Orion*（《猎户星座》）一书，提出吠陀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4000—前 2500 年，但未为西方印度学者所承认。

③ 如《九歌》有东皇太一。宋玉《高唐赋》云："醮诸神，礼太一。"

④ 参看 Swami Ghanananda, *The Dawn of Indian Philosophy——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I, p. 333。

⑤ 见苏氏著《天问正简·引言》，23 页。

来。《天问》文体确立以后，晋六朝以来，便有不少摹仿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且成为一条支流，可参看拙作《〈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

《天问》中注意到“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等问题，在《山海经》的《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及《河图括地象》都已举出宇宙广袤的一些数字，恐怕《天问》作者，尝接触过这类记载，所以会提出质问。屈原到过齐国。[①] 当时喜欢谈天的邹衍，他的议论，也许对屈子不无影响。屈子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有无取自域外，这是极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一时尚难解决。然而，《天问》本身却是先秦神话资料的渊薮，这是不能不承认的。我们对于神话的追寻（quest myth)，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的工作。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把世界古代文学上的具有发问句型的材料，列出来作为比较，以及从同样文体推寻它的成长、孳生的经过，来作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的方向，亦可以说几乎接近 Northrop Frye 所说的“文学的人类学”的范围，而《楚辞》正为这一科学提供东方古代最重要的资料。

（七）《楚辞》对后代文学的沾溉问题

《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自汉代以后文学作品的泉源。历代的文人，很少没有受到诗骚的影响而能够卓然成家的。沈约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其实这一段话的时间性并不局限于梁朝，时至今日喜欢研究旧文学的人，同样也接受《诗经》和《楚辞》的沾溉。

历朝的韵文固然是从《诗》、《骚》取法，但散文亦一样从那里吸取精华。柳宗元说过“参之《离骚》，以致其幽”。更指出幽字，是他得力于《骚》的地方。唐宋八家当中，韩愈、苏轼的文章气势，一向被推誉为韩潮苏海，他俩亦自称尝向屈子学习。韩云：“上规姚姒，下逮《庄》《骚》。”（《进学解》）苏轼对屈子更景慕不已，他说：“终身企慕，不能及于万一，惟屈子一人。”后来明蒋翚也有这一番话：“诗文有不从《楚辞》出者，纵传弗贵；能于《楚辞》出者，愈玩愈佳。如太史公文，李太白、李长吉诗是也。”因此，《楚辞》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有如昆仑溟渤，为百川所汇归，万派所朝宗，可见历来文人对它景仰的程度。

萧统在《文选》中特立“骚”一类，刘勰《辨骚》篇，用“骚”来统摄

---

① 有人说屈子到过燕国，但细查《说苑》八云：“苏子屈景，以周楚至。”原文是屈景，非屈原。

全部《楚辞》。后代文集中往往有骚体。晁无咎且谓：《诗》亡《春秋》微而后有《骚》，其后复变为赋，他的《鸡肋集》收有《离骚新序》、《续楚辞序》、《变离骚序》数篇，畅论此义，十分有意思。历代拟《骚》作品甚繁，自庄（严）忌《哀时命》、扬雄《反离骚》以来，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大抵有二类，一为出于有意的摹仿，只具形式之类似，有其文而无其情，一为幽愁忧思同于屈子，环境相似，故摹仿之以表达抑郁之思，则每每文情兼茂。

东坡说："熟读《国风》、《离骚》，诗之曲折尽在是。"是不特治散文须读《骚》，即诗歌韵文，亦须根柢于《骚》。六朝以来，名篇不少脱胎于《楚辞》，梁简文帝有《生别离》（即取《九歌》之"悲莫悲兮生别离"句），李白有《远别离》，余如杜牧的《杜秋娘》篇末数句，即摹仿《天问》，李长吉、李商隐诗皆得力于《骚》，而所体会到的又各有其独到之处。

《楚辞》对于后代文学沾溉之深，已如上述，不特骚人墨客为然，即遁入空门的和尚缁流，亦未能忘情，隋释道骞作《楚辞音》，唐初法琳作《悼屈原》篇，便是哀感动人。如果能够从文集中作进一步的搜讨，把历代拟《骚》的作品，详细加以论列，这亦应该是"楚辞学"的重要项目。

本文目的在指出《楚辞》的研究范围，由于今后学问领域的扩大，中国文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各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与《楚辞》有深切的联系，《楚辞》应该成为一专门之学，故有建立楚辞学的必要。现在因时间的限制，不能缕述太多，他日有暇，当草成《楚辞学》一书。今天所讲，到此为止。

1978年讲稿，原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戴密微教授纪念号

小南一郎寄示《朱熹楚辞集注考》一文（《中国文学报》三十三期），据嘉定四年同安郡斋刊大字本《楚辞辨证》杨楫跋文，即拙作所录杨楠之文。余据志书则作杨楠。

《天问》文体的源流

——“发问”文学之探讨

屈原的《天问》，文体很奇怪。光是这个题目，过去学人已是聚讼纷纭。英国韦烈（Arthur Waley），在他编选的《神庙与诗》（*The Temple & Other Poems*）竟说《天问》好像是一些试题，不知何以渗入屈原的作品。这引起苏雪林带着讥嘲的口吻，说他“强把‘升学南针’的‘考题汇刊’一类书来看《天问》，未免太可笑了”[①]。

其实，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问形态”的文学作品，自有它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印度最古经典的《吠陀》，和伊兰《火教经》中的祀歌，都出现同样的句型；《圣经·旧约·约伯传》亦有类似的问句。中国在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一切事物，抱着怀疑态度，对宇宙现象的形成，尽量提出问题。和惠施同时的楚人黄缭，便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屈原的《天问》，是在这种风气下茁长起来。《天问》文体确立以后，晋六朝以来，便有不少摹仿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且形成一条支流，可惜没有人加以注意。是篇特别把本人所知见的零碎材料，胪列在一起，加以讨论。

《天问》在王逸的《楚辞章句》里原列为第三篇，但《楚辞释文》旧本却

① 见苏氏著《天问正简·引言》，23 页。

列于第四（《九辩》列于第二）。作者为屈原，当然不成问题。太史公说："余读《天问》、《哀郢》，悲其志。"作者中心思想所在很不易了解，所以，宋高似孙《骚略》云："《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可见《天问》所陈的志，非可遽作蠡测。洪兴祖云：

天地变化，岂思虑智浅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耶？人耶？吾之用舍，天耶？人耶？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以作也。

然《天问》开端，对天地问题发问，次及神话历史，知其所问者原不限于"天"。

治《楚辞》者每谓《天问》为四字句式，与《诗经》文体接近，可能是屈子早期作品。《天问》中心思想，在说明天的因果律，本在劝善惩恶；但世事不尽如此，故发为若干疑问。仍是依据《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一义加以引申。《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亦即此意。《天问》意隐而《离骚》意显，必先有《离骚》之心，而后换另一形态，加以抒写，故《天问》不必早于《离骚》。又四言长篇句式，战国韵文每每有之，《楚缯书》、荀子《成相》，都是其例证。[①]

《天问》文体之特殊形态，在于用韵而作连续的发问。此种对天地问题加以发问，在楚国文献颇为普遍。兹略举之：

（一）楚昭王问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楚语》）这是对书《吕刑》"重黎绝地通天"一语加以质问。

（二）《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在《晋书·天文志》里引述汉秘书郗萌记先师相传论"宣夜说"云："天了无质，

① 方孝岳《关于屈原天问》，刊《中山大学学报》1955（1）。又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153—176页。论《成相》篇即打糠鼓，即古之搏拊（应如东南亚民族之拍鼓），其体式句法为六言四言句，与《逸周书·周祝解》为一类。《天问》文体（乃齐学）出自与《楚骚》不同系统，是北方调子。按长沙缯书亦用四字句，兼用韵。

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取此语以证庄，知庄子之发问，乃用宣夜说。先师相传，虽片鳞只爪，至为可贵。

又《庄子·天运》篇云：“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1] 这何异一篇《天问》，只是表现的句式略有不同而已。《天问》之作，似乎袭用《天运》的老套加以扩大，明人以为屈子是见过《天运》的。

《庄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号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可惜黄缭所问的原文，今已失传。

(三)《逸周书·周祝解》云：“故万物之所生也，性于从；万物之所及也，性于同。故恶姑幽？恶姑明？恶姑阴阳？恶姑短长？恶姑刚柔？故海之大也，而鱼何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为可测？跂动哕息，而奚为可牧？玉石之坚也，奚为可刻？阴阳之号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来……”（《四部丛刊》本）《逸周书》是篇连续提出问题，亦近于“遍为万物说”一类，只是句法构造，和《天问》颇有不同。

其在印度，古《吠陀》及《奥义书》对宇宙问题亦多所发问，举例如次：

《梨俱吠陀》(Ṛig-Veda) 一〇·一二九为《创造之歌》，其第一章云：

> nāsad āsīn, no sad āsīt tadānīṃ;
>
> There was not the non-existent nor the existent then;
>
> 太初无无，亦复无有；
>
> nāsīd rajo no viomā paro yat.

---

[1] 戴密微教授著 *Enigmes Taoistes*（《道家隐语》），已先我言之，引《庄子·天运》加以法译。见 Kyoto 大学，《东方学报》，第 25 册，1954。又 Y. Hervouet 之 Sserr—ma. siang—jou dan L'Historr Litteratre p. 139 亦言及。

there was not the air nor the heaven which is beyond.

其间无元气，其上无苍穹。

kim āvarīvaḥ? kuha? kasya śarmann?

What did it contain? where? In whose protection?

何所覆之？伊谁护之？

ambhaḥ kim āsīd，gahanaṃ gabhīram?

Was there water，unfathomable，profound?

何处非水，深不可测？

其第六段云：

kǒ addhā veda? ka iha pravocat?

Who knows truly? Who shall here declare?

孰知其真？孰穷其故？

kuta ājātā，kuta iyam visṛṣṭiḥ?

Whence it has been produced，whence is this creation?

何所自生？何因而作？

arvāg devā asya visarjanena；

By the creation of this (universe) the gods (come) afterwards；

明神继之，合此造化；

athā ko veda yata ābabhūva?

Who then knows whence it has arisen?

是谁知之？孰施行之？①

① Ṛig-veda 10，129 的英译，据 Arthur A. Macdonell：A Vedic Reader for Students p. 207，211 Hymn of Creation。这二章兹再录 Karl F. Geldner 的德译于下，以供参考：

Der Ursprung der Dinge：

1. Weder Nichtsein noch Sein war damels；nicht war der Luftraum noch der Himmel darüer.

Was strich hin und her? Wo? In wessen Obhut? War das unergrüdliche tiefe Wasser?

6. Wer wei β es gewi β，wer kann es hier verkünden，woher sie entstanden，woher diese Schöpfung kam? Die Götter (kamen) erst nachher durch die Schöpfung dieser (Welt)．Wer wei β es dann，woraus sie sich entwickelt hat?

又Ṛig. V. 1，185 对天地父母亦多用问句。而Ṛig V. Asya Vāmasya Hynm 4 云：

ko dadarśa prathamam jāyamānam?

Who has been seeing the first-born possessing bones?

初生之骨，谁实睹之？

asthanvantam yad anasthā hibharti?

Which what has no bones has been bearing?

其无骨者，复孰致之？

bhūmya asur asṛg ātmā kva svit?

Where then is the life，the blood，the self of the Earth?

大地之我，命耶？血耶？何处有之？

ko vidvāmsam upa gāt praṣṭum etat?

Who went near the wise to ask this?

谁依智者，往而咨之？[1]

Atharva Veda 10，7 言宇宙支柱（skambhā），亦用发问句式。《奥义书》之由谁书（kena upaniṣad），开端数句云：

Keneṣitam patati preṣitam manaḥ?

By whom willed and directed does the mind light on its objects?

由谁所驰？心思如射。

Kena prāṇaḥ prathamaḥ praiti yuktaḥ?

By whom commanded does life the first，move?

由谁所勒，生气前适？

keneṣitām vācam imām vadanti cakṣuh?

At whose will do (people) utter this speech?

由谁所策，作此言语？

śrotraṁ ka u devo yunakti?

And what god is it that prompts the eye and the ear?

谁神所驱，耳目从役?[①]

《天问》所用的发问代名词，有谁、孰、何、焉、安诸字，在梵经则有 Ka (who，what，which)、Kim (what，why)、Ko (what，how) 等等。

《火教经》(Avesta) 中 yasna 44，3-4 云：

This do I ask Thee，Oh Lord，tell me truly;

Who is the creator，the first father of Righteousness?

Who laid down the path of the sun and stars?

Who is it through whom the moon now waxes now wanes?

All this and more do I wish to know，Oh wise One.

谁为创造主，正义之祖?

谁干大钧，日星异路?

谁借畴力，致月盈亏?

呜呼智人，我愿知之!

This do I ask thee，Oh Lord，tell me truly;

Who holds the earth below the sky as well from falling?

Who (created) the waters and the plants?

Who harnesses the (two) coursess to wind and clouds?

Who，Oh wise One，is the creator of Good Mind?

谁分天地，下丽于天，以免其倾?

水与植物，谁孳生之?

谁役风云，周道是遵?

呜呼智人，谁更启我善心? (据 Richard N. Frye：*The Heritage of*

① 《奥义书》Kena I 的英译，据印度 S. Rad hakrishnan 的 The Principal Upanisads p. 581。此颂有徐梵澄汉译，名曰《由谁书》，南印度 Pondicherry 版，1957。

Persia, pp. 55-56 英译①)

《圣经·旧约·约伯传》:

Who determined the measures thereof, if thou knowest?
Or who stretched the line upon it?
Whereupon were the foundations thereof fastened?

---

① 《火教经》的资料，据 M. W. Smith, *Studies in the Syntax of the Gathas of Zarathushtr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29, p. 108。

Yasna 44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3

tat θwā pərəsā ərəš mōi vaočā ahurā
kasnā ząθā ptā ašahyā pouruyō
kasnā x'āng strəmčā dāt adwānəm
kə yā må uxšyeitī nərəfsaitī θwat
tāčīt mazdā vasəmī anyāčā vīduyē

4

tat θwā pərəsā ərəš mōi vaočā ahurā
kasnā dərətā ząmčā adə nabåsčā
avapastōiš kə apō urvaråsčā
kasnā vātāi dvąnmaibyasčā yaogət āsū
kasnā vaŋhəuš mazdā dąmiš manaŋhō

3. This do I ask thee, tell me truly, O Ahura.
What being (was), by creation, the original sire of justice?
What being established the path of the sun and of the stars?
Who (is he) through whom the moon (now) waxes, now wanes?
Both these, O wise—one, and other-things do I wish to know.
4. This do I ask thee, tell me truly, O Ahura.
What being set—firmly both the earth from below and the sky, (to keep them) from falling?
Who (created) the waters and the plants?
What being yoked swiftness to the wind and to the clouds?
What being (was), through wisdom, the creator of good purpose?
此处所引《火教经》中古波斯文原文如下：
Avesta edited by K. F. Geldner
Avesta Stuttgart 1896
Yasna 44 Vol. 1, p. 148.

3

4

（此材料承吴其昱博士抄示，特此志谢。）

Or who laid the comer stone thereof?

……

Where is the way to the dwelling of light?

And as for darkness, where is the place thereof?

—Job XLVI, *Old Testament*

是谁定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他的根基安置何处？地的路标是谁安放的？

……光明从何而至？黑暗原来位于何所？

《圣经》中这一些文字甚长，一如《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等句，意思亦有点相似。已见苏氏《天问正简》引言所征引（28 页），今不详述。

至于历代摹拟《天问》之文学作品，试就所知，略举如次：

（一）晋傅玄《拟天问》。今存断句："七月七日，牵牛织女，时会天河。"[①]"月中何有？白兔捣药。"[②]

（二）梁江淹《邃古篇》有序云："仆尝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兼象《天问》，以游思云尔。"其文云："闻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无涯边兮。……上有刚气，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虚悬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国殇，为游魂兮。迦维罗卫（Kapilavastu），道最尊兮。黄金之身，谁能原兮。……茫茫造化，理难循兮。圣者不测，况庸伦兮。笔墨之暇，为此文兮。薄暮雷电，聊以忘忧，又示群兮。"[③]此文四字为句，似不甚次第，所述历史，从开辟以至宗周，兼叙鬼神，次及四裔，结句仍用《天问》"薄暮雷电归何忧"句，摹拟痕迹太显著。

（三）北齐颜之推《归心篇》。此文亦见唐法琳《辩正论·九箴篇》引，《法苑珠林》一百唐萧宣慈有《归心篇》三十卷，即用其名。本文对不信佛者，加以赞述，言俗之谤佛，有五端，其一为"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关于此点因佛氏宇宙观易于眩惑，故作解释，其文略云："……星有坠落，乃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属？……石既牢密，兔焉能容？石在气中，岂能独运？积水之下，复有何物？江河百谷，从

① 《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引，原见宗懔《荆楚岁时记》。

② 《御览》四，又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四十六。

③ 宣城本《醴陵集》，又《广弘明集》三。

何而生？东流到海，为何不溢？归塘尾闾，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气所然？潮汐去还，谁所节度？天汉悬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腾？……”《珠林》卷六即畅论星坠为石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九：“颜之推《归心篇》、孔毅父《星说》，亦仿屈子《天问》之义。”

又颜之推有《稽圣赋》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之推《稽圣赋》三卷，本拟《天问》而作。”惜今已佚。

（四）唐杨炯《浑天赋》。此赋末有一段云：“灵心不测，神理难诠。日何为兮右转？天何为兮左旋？盘古何神兮立天地？巨灵何圣兮造山川？……钟何鸣兮应霜气？剑何伏兮动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风而有待？师门何术兮验火而登仙？……女何冤兮化精卫？帝何耻兮为杜鹃？……”亦叠用若干诘问句式。

（五）唐柳宗元《天对》。见《柳先生集》卷十四，宋杨万里为之解。《天对》提出元气为天地本原，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本来如此，故云：“无营无成，无功无作。”又云：“焉恃夫八柱？”“乌际乎天则？”“棋布万荧，咸是焉托？”诚如是说，屈子的发问，是多余的。文中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观点。宋代楼钥云：“河东《天对》最杰作，释问多本《山海经》。”① 认为《天对》资料是取自《山海经》的。子厚驳斥“八柱”，道教书籍有《中黄八柱经》，存《道藏》太平部，则袭用“八柱”之说，且取以作书名。

（六）刘禹锡《问大钧赋》。见《梦得文集》卷十一，首段云：“圆方相函兮，浩其无垠。窅窴翕辟兮，走三辰以腾振。孰主张是兮？有工其神。迎随不见兮，强名之曰大钧。倚以临下兮，巍乎雄尊。天为独阳，高不可问。工居其中，与人差近。身执其权，心平其运。循名想象，斯可得以讯。”此文改变作为赋体，虽篇名《问大钧》，而作法则与屈子的《天问》大异其趣。清彭兆荪有《广问大钧赋》（《小谟觞馆文集》）。

明人学《天问》的文章，实繁有徒，最重要的有三篇：

（一）方孝孺《杂问》

文见《逊志斋集》卷六《杂著》。通首从头至尾悉用问句。第一段仍是《庄子·天运》的老问题；其次为历史上所有学术、政制、民生、国计问题，随想随写，没有连贯性，又有点像连珠。历来摹仿《天问》，通篇为发问句式，只有这篇最为出色。摘取数段以示例：

---

① 《攻媿集》卷六《题林德久（至）楚辞故训传诗》。

天曷为而运乎？地曷为而处乎？日月降升，曷为而有寒暑乎？峙者曷为而山？流者曷为而水乎？鸟曷为而飞？兽曷为而走乎？孰明而可见？孰幽而不可睹乎？上下千载，孰不变乎？四方万里，孰不异乎？人何由而出庶类乎？心何由而参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为而成，孰长久乎？

三代异尚，道亦异乎？忠质化原，文何贵乎？秦之继周，岂尚刑乎？汉之宽大，亦善承乎？唐尚谏诤，自其始乎？宋尚儒术，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为美乎？

天孕兆民，犹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复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岩墙，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将不然乎？猛虎黠盗，岂皆天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贫乎？孰衣文绣？孰如悬鹑乎？屈为佣隶，天宁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封建莫复，天下为私乎？择贤命爵，尚庶几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二）王廷相《答天问》九十五首

廷相为明七子之一。此文见《王氏家藏集》卷四十一。其序云：

楚屈原有《天问》一篇，汉刘向、扬雄、班固，晋（此误）王逸，宋朱子皆有注释，但其言多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秘化及夫羲、黄、尧、舜三王之遗迹，且诬谬奇诡，神怪之说参半，以故诸儒虽援引传记以解其文，而发问之意尚蒙蔀而未彰。唐柳氏子厚，虽有《天对》，然多依文凭故为辞，而正诸经要之道者无几。后生来学，无由取裁，附诬传奇，踵谬袭怪，邈哉其尚蔽于圣途也。余读其书病之，暇日取所问者，每一事相属作一首，共得九十五首。每首以数语答之，务取于符道，故其论多刺；止求于意达，故其文不工。天地造化之秘阐而大明，圣人贤士之心皭而不污，则于三闾之问，未必无指迷辨惑之助也。嘉靖八年九月朔日，浚川王廷相子衡序。

从序文可见他撰写的旨意。兹录二则以示例：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问》句）？三灵既合，一性乃成。气为物始，厥维本根。形有有无，俟机而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天问》句）？元气始化，辟此寥廓。积阳九重，厥论荒凿。既无功只，亦非营只。不我以信，请问太始。

他只求意达，故文不求工。蒋之翘曾评柳宗元《天对》云：“《天问》一篇，原屈子不顾其可问不可问，只是矢口而谈，纵笔之所之，以发言之牢骚焉。……柳宗元不知，乃作《天对》以摭其实，词多附会可笑。”① 子厚的《天对》已受到明人的讥评；王氏的《答天问》，更是蹈此覆辙。不过，子厚采取唯物观点，廷相则以明代儒家天道观置答，立场各有不同。

（三）黄道周《续天问》

文载《漳浦集》卷三十六“骚”类。黄氏精熟纬候之学，故杂用神话资料特多。兹摘一段如下：

甲子之晁，有神下集。勒数鸿相，刷栉玉发。授余《鱼书》曰：“获厥借灵，策五九以纪天地。九首之皇四万五千岁，凡三千七百余岁，辟一天地。以唐甲辰，迄胡丁未。数文以龟，贤士出涕。”余曰：“疑然！孰固而移？孰画得避？”余将迅之。曰：“二隐五章，孰从比只？修越短差，孰从理只？别干派支，何所系只？厥逌浑窀，行何止只？何与人谋，为众规只？列宿何施？与人相觝只。轸还蒙鸿，触何戾只？孰懸孰丑？荒洞曷择？百神冯冯，何所暨只？帝何慕奇？为世厉只。众曷所远？圣曷孽只？日安不及？曷偏昧只？背元阳亏，胡不得砥只？月死复育？星曷克坠只？盘古曷殁？瘗骨南海，而曷流膏，以漫渤澥只？”

甲子是天启四年，文或作于此时，文中兼用《大招》句法，每用“只”字语助词。道周又有《从骚》十五章，其第四章为《天式》，即取《天问》“天式纵横”语，加以引申，亦摹拟《天问》之作。

此外，陈雅言有《天对》六篇，《千顷堂书目》著录，未见。清初李雯《蓼斋集》有《天问》一篇，全文甚长，兹摘一段以示例：

① 《七十二家集注楚辞》卷三。

……诞稽开迹，畴号旌之？汉垠未属，何以形之？冯冯沈沈，夫谁恶之？剨然以昭，畴尚慕之？冥沣蠢烦，曷帝自庭？厥初不有，奚知其圣？太濛肇启，厥从何始？羲和未司，摄提安纪？……何有不足？陷于东西？何幽黑澒洞？智而益愚？

篇末以“智而益愚”作结，愤慨之情，不忍卒读。

《列子》有《汤问》篇，亦论宇宙原始，其言曰：

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物无先后乎？……夏革曰：……朕所不知也。……汤又问：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异同乎？革曰：……

这分明是受到《天问》及《庄子》的影响。所以从古初有无物问起，追诘到四海之外的东西和物的大小、修短、同异问题。据说《汤问》篇中所记周穆王欣赏的木造巧人，与晋太康六年竺法护译出的《生经》（Jātaka-nidāna）中的故事完全一样。[①]《汤问》既有剽窃内典的证据，而周穆王又大半采摭泰康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故《列子》成书年代显然在于晋初，故《汤问》应是很早的一篇从《天问》脱胎而成的文章。不过，虽然这是一篇宇宙问题的对话，有问兼有答，但屈子文体之特异处，是在有问而不置答。此外《列子·天瑞》篇记杞人忧天事，其人问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这又与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者相同。《庄子·逍遥游》中分明说道：“汤之问棘也是已。”棘即是革，二字音近。可见汤问于革的故事，庄周已见过了。那么，《列子·汤问》篇中汤和革的对话未必没有所本，好像“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和《天问》的“东南何亏”及“墬何以故东南倾”意思正是相承袭的。

《论衡·卜筮》篇说：“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如实论之，卜筮不问天地，蓍龟未必神灵；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又云：“无其实则知其无神灵；无神灵，则知不问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问之？”“夫言问天，则天为气，不能为兆；问地，则地耳远，不闻人言。信谓

① 参季羡林《列子与佛典》，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83页。

天地告报人者，何据见哉?”王充破除迷信，认为天不可问。且把卜与筮分开来，把卜属于天而筮属于地。汉人原有这种说法，单独把问天的事列入“卜”的范畴，今观楚辞中《卜居》文体，亦复重用问句句式，凡叠用“乎”字至十六次，总结以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日本学人著《巫系文学论》便把《天问》称为占卜型的文学，未曾没有道理。可是将王充的意见，证之《卜居》，原文分明说道“詹尹乃端策拂龟曰”，是卜与筮二者并用，不能说他单纯用龟卜，而不用蓍，可见欲把问天的事，一概目之为“卜”，是有点勉强的。

先秦典籍，每每于篇中发为问答，如《庄子·逍遥游》之肩吾问于连叔，《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曰、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罔两问景曰，《大宗师》南伯子问乎女偊曰，颜回问仲尼曰，此为《内篇》之例，皆假托人物互为问答。其他尚多，不能毕举。

近日马王堆三号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十大经》有下列各段：

(1) 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政），焉止焉始?”对曰……（《五正》）

(2) 黄帝问□辅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果童对曰……（《果童》）

(3) 力黑（即力牧）问：“……高阳为之若何?”太山之稽曰：“……以临天下。”（《正乱》）

(4) 高阳问力黑曰：“天地□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姓争》）

这种问答文体在战国末期很是盛行。洪迈说：“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举《子虚》、《上林》等为例（《容斋五笔》卷七），他的意思是指《卜居》（詹尹）和《渔父》两篇。这二篇的作者问题，由于《荀子·不苟》篇有“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句，是抄袭《渔父》的，而贾谊《吊屈文》中“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和《卜居》“吁嗟默默兮”语亦相同，足见二篇在荀卿、贾谊之前已存在，故王逸定为屈原所自作。至于《卜居》叠用反诘句的方法。可以追溯到《管子·心术》：“能专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无向人而自得于己乎？”《内业》及《十大经》亦有相同的语句，叠用若干“乎”字句式同于《老子》之“卫生之经能抱一乎”一段，而《庄子·杂篇·庚桑楚》亦见之。后来魏晋间人的作品，若曹植的《髑髅说》、嵇康的《卜疑》，都是摹仿《卜居》的叠用反问句式，这是战国以来散文发展的成果。至于佚书中假托黄帝对天地、政体的发问，在这时候对天道的看法已相当确定，所以力黑（牧）的对答有“天制固然”、“天地已定”等语。而屈原在《天问》中则仍存着“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及“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等等疑难，因为他作《天问》时的心情是十分苦恼，所以对宇宙、历史、人生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屈原作《天问》的动机，是受了一切委屈而无处申诉，故把心中一切抑郁，通过向天叩问来发泄的。这样逆境在他人或者可以忍受过去，在感情奔放和富于正义感的屈原便忍受不住的。以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人，反而没有好结果，可见天道真是无凭的了。所以他终于忍不住要发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几句话，太史公已很清楚地指出屈原作《天问》的动机了。

《天问》文章之体裁，无论其内容与形式方面，比较其他文学作品，总是别创一格，尤其有问而无答，和其他问答文体判然有别，是十分奇诡的。《天问》全篇共三百七十四句（其中至少有脱简六句不算）一千五百五十三个字，是屈原作品中的第二首长诗。最特色的是一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便加以诘问，因而形成了一百七十多个组合的疑问语句。

它的形式，除了少数句子外，基本上以四言为主。通篇四句为一节；每节为一韵，亦有两句为一韵者，其例很少。通体全用问语，而参差历落，错综变化，不但不单调、不板滞，而且非常奇倔。《天问》在文学上的价值，于《楚辞》中向来被认为最低，但它却有最特出的一面，为他篇所不及。其句式虽以四言为主，但最短的有三言，最长的有七言，又有五言及六言。那些句子长短不很规律，但兔起鹘落，给予人以多姿多彩的感觉。此外，篇中所用的疑问代名词及疑问副词、形容词等，亦极复杂，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天问》唯一的好处便在这一点。所以孙钌评它道：“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淡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这真能了解他写作的艺术手腕。

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学领域中的奇葩异卉，当然可以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在古代神话与文学糅合之下，愈觉资料缺乏，所以更当加以重视。屈原的《天问》，不特是卓绝的文学产品，亦是无可忽视的人类学上的素材。本文特别注意《天问》在文体上的特色，从这一点去探究，摭拾东方各处相同的有发问句式的文学资料，加以比较，以说明人类写作的共同心理。而《天问》全文充分使用发问句式，为古今各处所未见，实在是一最崭新的创作，而后人的摹仿，亦只有点滴片段的类似，没有屈原的魄力，从开天辟地，呵问到底，可见一位伟大作家自有他的万万不可及的地方。

至于《天问》体裁之是否受过域外文化的影响，苏雪林认为它是有蓝本的，但她只引用《赞诵明论》（即《梨俱吠陀》）一段话及《旧约·约伯传》第三十八章两处作为佐证。其实，在印度经典中，这类句式甚多，所以我特别举出一些梵文原句，以供参考。《吠陀》是和《火教经》最有密切关系的，苏氏认为："或者《圣经·约伯传》先传入印度，印度学人拟其体作《吠陀颂》，《吠陀颂》又传入我国，乃启发了屈原写《天问》的动机。"这一说法，证据似乎未够充足。《吠陀》各篇的年代，本来就很难确定，尤其《吠陀》卷十·一二九的《创造之歌》，因为其中表现着极浓厚的高度一元论思想（monism），如 tad ekam（that one）观念的出现，正如我们的"太一"，此歌开头便说"太初无无，亦复无有"，有点像老子一派主张"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篇）。太一观念，在战国以后已经神化了。[①] 而《吠陀》中的 tad ekam，是纯理的、抽象的，所以被认为很是晚出（参看 Swami Ghanananda：*The Dawn of Indian Philosophy—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I，p. 333）[②]。《天问》中注意到"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等问题，在《山海经》的《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及《河图括地象》都已举出宇宙广袤的一些数字，恐怕《天问》作者，尝接触过这种记载，所以会提出质问。屈原到过齐国[③]，当时喜欢谈天的邹衍，他的议论，也许对屈子不无影响，屈子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有无取自域外，这是极有

---

① 如《九歌》有《东皇太一》，宋玉《高唐赋》云："醮诸神，礼太一。"《汉书·艺文志》中，兵阴阳有《太一兵法》，天文家有《泰一杂子星》、《泰一杂子云雨》，五行家有《泰一阴阳》及《泰一》二十九卷，可见西汉时太一在术数上支配的力量。

② 印度学者 B. G. Tilak 著 *The Orion*（《猎户星座》）一书，提出《吠陀》年代可能在公元前4000—前2500年，但未为西方印度学者所接受。

③ 有人据《说苑》认为屈原可能到过燕国，但查《说苑》八原文云：苏子屈景，以周楚至，是屈景而不是屈原。

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时尚难解决，但《天问》本身，却是先秦神话资料的宝库，我们对于神话的追寻（quest myth）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的工作。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把世界古代文学上的具有发问句型的材料，列在一起作出比较，以及从同样文体推寻它的成长、孳生的经过，作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的方向，亦可以说几乎接近 Northrop Frye 所说的“文学人类学”的范围了。

原载《选堂集林》

唐勒及其佚文

——《楚辞》新资料

唐文宗时，余知古著《渚宫旧事》称："楚文王至顷襄王四百年间楚产之尤者，儒学则观射父、左尹然丹、左史倚相等，文章则屈平、宋玉、唐勒、景差。"其说盖本之《史记·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名，《汉书·古今人表》列于第六等中下。《艺文志·诗赋略》唐勒赋四篇，注云："楚人。"又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唐勒列于宋玉之前。唐勒有赋四篇，已亡。严氏《全上古文》卷十只据《水经·汝水注》录其奏土论二十四字。

《水经·汝水注》"又东南过郾县北"下云：

> 醴水又屈而东南流，迳叶县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杨守敬订正应是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者也。楚盛周衰（杨守敬云：此处疑脱"庄王"二字），控霸上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论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也。"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对齐侯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杜预曰："方城，山名也，在叶南（杨疏引《元和志》在叶县西南十八里，互详《沅水篇》）。"未详孰是。

《永乐大典》楚字号（卷一〇九三五）云："方城山冈阜自唐州比阳县连接，

西至方城，又西至汝州叶县南。楚国方城以为城，即此。”

全祖望云：“方城当以《左传》为是。唐说晚出，盖方讹为万，流俗若有以万字为萬字者。”全氏意谓方讹作万，以万字为俗写。然萬舞之萬，在殷墟卜辞作万（《小屯甲编》），万字出见甚早。清新化邓显鹤作《方城考》，略谓："《楚宝》引盛宏之《荆州记》：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溧水，连沘阳界，南北联络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故屈完云云。《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之南。郭仲产亦谓苦莱东俱有方城。”又引唐勒文云：“宏镜（应作境）万里，故号万城。方、万二字相似。杨升庵疑方城即为万城，非也；又袁小修谓万城在当阳，亦非。”（《南村草堂诗文钞·二十·楚宝考异》）按唐勒楚人，称万城得名由于弘境万里，万城一名必非误传。《奏土论》赖《汝水注》征引，得剩此廿四字，至可宝贵。万城、方城，郦氏两存其说，最为公允，未必是方而非万。或当日有二名，不必肯定万（萬）为方字之讹，如全谢山之说。阙疑可耳。

《渚宫旧事》云：

> 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云阳之台（《古文苑》作阳云），王曰：“能为大言者上坐。”王因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冲天，军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歘（此据《吉石盦丛书》青芝山堂钞本，墨海金壶本等作‘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以下景差、宋玉语，从略）“若此之大也何如？”王曰：“善”。（《古文苑》少末二句）
>
> 襄王登云阳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有能为小言者，赐云梦之田。”景差曰：（从略）唐勒曰：“折飞糠（吉石庵本如此，他本作尘）以为舆，刻粃糟（此吉石庵本，他本作糠粃）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背以顾盼，附蠛蠓而遨游，宁隐微以无准，浑（《古文苑》作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脑（《古文苑》作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以下宋玉曰从略）

以上为《渚宫旧事》之记载。襄王时，唐勒、景差、宋玉三人均受命作大（小）言赋，《旧事》摭录其辞。余知古为唐文宗时人（《四库提要》引《唐书·艺文志》说），又有《汉上题襟集》十卷，《唐志》注段成式、温庭筠、

余知古，则与段、温同时。唐时唐勒之赋尚未失传，则《汉志》所称《唐勒赋》四篇，大言小言应居其二。宋绍定间，章樵整理唐人所藏佛龛中之古文章，次为《古文苑》，无唐勒文，惟收《宋玉赋》六首，有大言赋与小言赋。细审之，即《渚宫旧事》所采之篇。则题以大言小言赋，概视为宋玉之作。如是则唐勒、景差之赋，乃宋玉撰时所依托者，与《旧事》所言三人并受命作赋，事实不合。《隋志》著录有《宋玉集》，惜久佚无从参校，今据《旧事》仍视作唐勒赋之残文。

近岁山东临沂出土残简有《唐革赋》，共九号，兹录如下：

(1) 唐革（原编号一八四）仅二字书于简背

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革无（抚）鬌曰：人谓□马登车，嗛搸马冲临

□□□□不□步驺□（下缺　一八四）

(2) 马也愈而安劳，轻车樂进，骋若蜚龚（飞龙），免若归风，反驺逆马□□走□，夕日而□均□（下缺　一九〇）

(3) 月徒□□冲星跃而□愪，子神贲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其）壙埃。均□（下缺　二〇四）

(4)（上缺）胉中，□神俞六马，不叶（稽）啫，不挠扣□，步趋（下缺　四九三）

(5) 龙□能急若□，走□若蜚免若纟□（绝），反趋逆马□，□走□，夕日而入日蒙三（巳），此□（下缺　四〇三）

(6)（上缺）不能及就又趋步彳□御者诎。（下缺　一七一七）

(7) 厺临搸㽗（下缺　三六五六）

(8)（上缺）□有三而王□乡□（下缺　三五八八）

(9)（上缺）□𪘨义御　（下缺　三五六一）

以上残简九，出临沂一号汉墓，据罗子期先生整理录出（在《偻翁一得录》中）。唐革即唐勒。诗“如乌斯革”，《释文》引韩诗“革”作“勒”，可证。

罗先生仅举第三简与《淮南子·览冥训》参校，而疑《淮南子》袭自唐勒。今按《览冥训》文云：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

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

若夫钦负大丙之御也，除辔衔，去鞭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日行月动，星燿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

骋若飞，骛若绝，纵矢蹑风，追猋归忽，朝发榑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谕于六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此段论弗御之御，其说甚精。临沂简开端记唐勒与宋玉言御于襄王之前，主题亦是御，故文字颇多雷同，可以比证。

第二简言“马也愈而安劳，轻车犨（乐）进”，以校《淮南子》“体便轻毕”句，轻毕应是轻车，车与毕二字形近。又“安劳乐进”，即简文之“安劳”“犨进”，知犨字即乐。

第三简宜再以《淮南子·兵略训》校之。其言曰：

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运，进退诎伸，不见朕埶，鸾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如猋风，疾如骇电。

《览冥训》亦作“星燿而玄运”。临沂简原作“星跃而□愪”，其缺文可以“玄”字补之。则跃即燿，而愪可读为运。左宣四年郧字或作邧。春秋之郓，公羊作运，是其比。高注：“燿，光也；玄，天也；运，行也。”

简“子神贲而鬼走”句，《兵略训》作“神出而鬼行”，语最接近。《览冥训》作“电奔而鬼腾”，刘家立臆改为电奔而云腾，“云”字无据。《御览》七四六引“腾”作“骇”，与《文选·绝交论》李善注引同。贲为奔之借。星与玄（天）相从，神与鬼互为比方。故知《览冥训》之作“电奔”，应据简文之“神贲”，《兵略训》之“神出”订之。电字古从申，申读为神。刘殿爵曾疑电当作神，只从上下为说，方大成《淮南校释》非之。今得此简，则作“神”是也。简文“莫见其墇埃”句，《淮南子·览冥训》作“不见朕垠”，《兵略训》作“朕埶”，《御览》七四六引作“塍毁”，皆异文。《玉篇》：“埶，古文垠。”“进退诎信”即“进退诎伸”，《览冥训》、《兵略训》语并同。

第四简“胉中”以《览冥训》“形于胸中”校之，即“胸中”，而“神俞六马”即“精神谕于六马”。《御览》引谕作喻。高诱注：“藏嗜欲之形于胸臆之中。喻，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术御也。”此说亦见《主术训》。

第五简与第二简语有重复。如“骋若蜚蚤，兔若归风”，第五作“起若蜚兔若纪。”以《览冥训》“骋若飞，骛若绝”校之，纪殆“绝”字。“兔若归风”者，《淮南子·说林训》：“以兔之走，使大如马，则逮日归风。”孙诒让据《吕览》“遗风之乘”改归字为“遗”。今简文正作归风，则孙改非。杨树达《淮南证闻》谓归风与追风同，二字皆从自声，故得假借。彼尚未知有此资料可证《说林训》“归风”之不误。“入日蒙三”句，据《览冥训》“朝发榑桑，日入落棠”，高注：“落棠，山名，日所入也。”以是为例，则“蒙三”或为日入之地。《尔雅》：“西方日入处曰大蒙。”《楚辞·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三或巳之坏字未可知。《览冥训》之“遭迴蒙汜之渚”。《览冥训》：“日入落棠”句，王念孙谓：“日入当为入日。今本作日入，盖涉高注‘日所入’三字而误。上文云‘入日抑节’，正与此‘入日落棠’定意。”今按临沂简正作“入日”，王说是也。

第二简“夕日而□”，第五简亦见夕日，与入日对文。古假昔为夕。《穀梁经》：“辛卯昔恒星不见。”《左传》：“为一昔之期。”故夕日即昔日，指朝而言。

第一、第七简有檏马字，从重木，疑读为秣马。《荀子·劝学》篇：“六马仰秣。”秣通饫。《说文》饫训食马谷。

临沂此残简，赖《淮南子》比勘，略可通读一部分。罗氏称其书体一致，可证原出一篇。其作者为唐勒，殆无疑问。言御马驰骋之术。惜失其篇题。残缺之余，合數简可得百三十字左右。吉光片羽，亦足珍矣。

梁玉绳《清白上集·人表考》六：“唐勒惟见《史·屈原传》。楚灭唐，子孙以唐为氏。”盖据《通志·氏族略》二。《文心雕龙·夸饰》篇：“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语不及唐勒，其名已渐晦。惟《西京杂记》卷二霍光妻一产二子，光言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贞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洪迈《容斋随笔》（五笔）言：“唐勒有子曰正夫。”事即本此。唐勒遗闻无多，可考见者，略备于此云。

1980年6月30日于京都

原载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

拙文发表后，谭家健据此考证宋玉之大、小言赋之不伪，李学勤进而论其文中有“一阴一阳”之句，以推论《系辞》成书之年代（见李著《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重读《离骚》

——谈《离骚》中的关键字“灵”

“骚”在《文选》中独立为一类，乃是作者对神明宣示己志，援天引圣，以自证明。既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又云“皇剡剡其扬灵兮”，离不开了群神，所谓“扬灵”，亦可说是一种文学上的譬喻手段。

礼器之有钟与鼎，鼎所以表“定”，亦即示安定也；钟则以扬灵，借音乐以昭和睦，故钟铭屡言“扬灵”，试举一例：

> 邾公釛钟：“陆融之孙邾公釛作氒（厥）禾（和）钟，用敬恤盟祀，祈年眉寿，用乐嘉宾，及我正卿。䑗（扬）君霝，君以万年。”（《西周金文集成》一〇二）

钟铭常用“霝”字，甚至施用于和钟之和，作为增饰偏旁，其字从霝，其省形作“禾”，一如湖南四人面方鼎之以“大禾”为“大和”。钟铭云：“扬君灵，君以万年”，此“扬灵”一词见于楚礼器的证据。

《离骚》有它的主题，有贯串全文的关键词，就是“灵”字。屈原自己的字叫灵均，君主的代词叫灵修。替他占卜的人叫灵氛，玄圃上天帝之居叫灵琐。屈子何以对“灵”字这样重视？有什么道理？很值得去研究。《楚辞》是当代的显学，多年来讨论的文章，车载斗量，掀开《楚辞文献百年巡礼》

一文[1]，令人惊讶，加上考古丰收的硕果，地下文献层出不穷，使人对楚文化的真貌更有深入的了解。本人重读《离骚》，以地下材料合训诂古义，略有一些新的认识，谨在此提出向诸位专家求教。

（一）高阳、巫咸与“扬灵”问题

《离骚》开宗明义地追溯远祖帝高阳，高阳是楚和秦的共同祖先。以前读《史记·秦本纪》，未敢深信，及见秦景公大墓磬铭：

> 高阳有灵，亖方以鼏平。

秦人已自言之。灵字异写作龗，增龙旁为繁形。《说文》十一龙部：“龗，龙也，从龙，霝声。”《集韵·十五青》灵字有四个异形，但无此字；另有龗、䨩、䨻、龛同文，下引《说文》“龙也”，以为是龙字；证之磬铭，当释“灵”为是。《离骚》以高阳始，以巫咸终，大神巫咸亦是楚与秦的共神。从巫咸叩问吉凶，辞云：“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予以吉故。”王逸注：“言皇天扬其光灵，使百神告我。”他决心离开楚国，是取决于巫咸。春秋以降，秦、楚、齐诸大国均向巫咸祷告。秦《诅楚文》作于秦、楚丹阳大战前一年，秦诅楚之十八世，历数楚主之罪，时张仪骗楚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怀王会秦武关，被拘留不返，故屈原惦念怀王。《诅楚文》控告怀王“不畏皇天上帝及丕显大神巫咸之光列（烈）威神”。又言秦：“应受皇天上帝及丕显大神巫咸几灵德赐，克剂（制）楚师。”从王逸之说，皇指皇天，即《诅楚文》的皇天上帝，灵谓光灵，即《诅楚文》所言的光烈威神与几灵。用《诅楚文》与《离骚》合证，可取得正解。“扬灵”亦屈赋的习语，重见于《九歌·湘君》：“横大江兮扬灵。”此处王逸训灵为精诚，言扬己精诚，冀能感悟怀王使还己也。屈子于《湘君》再次言扬灵。有人读灵为舲，引《后汉书·文苑·杜笃传》章怀注引“灵”作“舲”为证。刘师培《考异》云：“未知何据。”因下文续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强调扬灵，两度叠用，故王逸及《文选》五臣注都谓“言我扬精诚未已”。如改读作舲，文义完全不能接榫。姜氏《重订校注》采扬舲之说，黄君《九歌考异补》订其非是[2]，可从。

---

[1] 黄灵庚著，见《文献》第75期。

[2] 见《文史》第45期。

（二）“灵”的含义

《说文》灵字在玉部，云：“灵，巫也，以玉事神，从玉，霝声，灵或从巫。”段注引《九歌》“灵偃蹇兮姣服”诸句。王注皆云：“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训灵为巫，亦见《广雅》。《离骚》、《九歌》多处王注分别甚清楚。灵亦指神，《楚帛书》云：“曰非九天则大䰜，则毋取敢蔑天霝。帝夋乃为日月之行。”霝与行协韵，所谓天霝，指天的命令，谓地有灵，此处之霝，均不得训巫。《老子》马王堆本“地毋已霝（将）恐歇”。刘向《九叹》：“合五岳与八灵兮。”王注：“八灵，八方之神也。”（《远逝》）按在《离骚》“灵均”下王注：“灵，神也。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是其例。神与灵，同训。从《谥法》讲：灵有六义，如“极知鬼事曰灵”，“好祭鬼神曰灵”之类。宋马永卿《嫩真子》引云：“德之精明曰灵。”“扬灵”之灵，即取精诚之义。楚与秦二国都重祭祀、信神灵。新出《秦祠华山玉版》云：“竖竖栗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正极言事神要很精诚。

灵可训为巫，王念孙因之读灵氛为巫氛。《山海经·海内经》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巫咸、巫肦、巫彭等均在其列，故有人读灵氛为巫肦。

灵又一义训善，有其远源。卜辞有霝妃（《后》上十六，十一），石鼓文有霝雨，《尚书·盘庚》下篇：“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孙诒让谓吊即淑之古文，当训为善。[①] 曾星笠以灵各断句。引谥法“极知鬼神曰灵”，读各为“格”，如“格人元龟”，“罔有降格”。“吊由灵各”者，指迁殷之意，实由神灵降格，故不敢违背占卜，正以彰大宝龟之灵。此处“灵格”与占卜有关系。《离骚》之作，通过灵氛告以吉占，及巫咸大神告以吉故，离心已定，“将远逝以自疏”，亦是出于灵格，情形正相似。又《周书》屡次使用“灵承”一习语。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多士》）

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狎）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多方》）

---

① 见《尚书骈枝》。

周之割殷，殷之殄夏，都由天帝之命。周能丕（大）力善承天帝的任务，故能克殷；夏因内乱，不能善承于祭祀上帝之旅（旅祭），故天降福于成汤。《多方》下文亦云："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说明周人能够善承于旅，故得到天休，代替殷命。因革之间，成败关键在能否灵承祭祀之事，取得上天的认可。两篇三次用"灵承"一成语。灵训为善，训诂家意见佥同。灵所以训善，由于"能事鬼神"不坠天之宝命，故能取得胜利。灵承之"灵"，含义深远，殷周以来已是如此。

《尔雅·释诂》训善之字，自仪、若以下共十六文，就中之"令"乃出"灵"之假借（详郝氏义疏）。《诗》、《书》所见灵字，故训多说"灵，善也"。《吕刑》"苗民弗用灵"，今本《礼记·缁衣》引《甫刑》作"匪用命"，上海本《缁衣》仍作"非甬霝"。但郭店本《缁衣》缺此一段。如以灵训善解之，弗用灵训为不行善，亦可通。灵之训善，已成通义。"扬灵"谓表扬精诚之德，正是屈子全篇中心思想，文中反复申明耿得忠正，九死未悔，"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义而可服"。责"世之幽昧，孰能察予之善恶"。其执"善"不放，以事神之道事君，故知扬灵正是扬善。《大学》引《楚书》云："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离骚》之重用灵字，及再三申言神之扬灵，与己之扬灵者，其用意正在此。

2000年4月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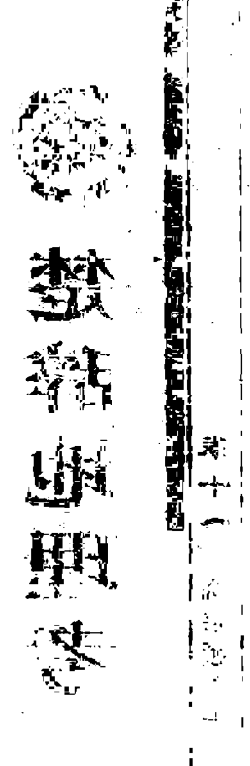
一般学人，太侧重巫术，视楚为淫祀信巫鬼之邦，实则楚已久沐中原文化，故有《楚书》一类之著述。至于屈原，经术更所精研，故首陈三后之纯粹。世目楚辞为巫系文学，视屈原为巫师，余期期以为不可，故揭此一"灵"字与"善"相通，以见楚人沐周教之深，知者谅不河汉予言（请参看《荆楚文化》）。



楚辞地理考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卷十一

目　录

童　序

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古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近著《楚辞地理考》，凡三卷二十篇，钩深索隐，多所自得，乍闻其说，似讶其创，详考之，则皆信而有征；并治世治古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钱君宾四，为学深博，与君持论异，而途辙实同。往尝读钱君之书云："屈原放居，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本在江北。"余于《楚辞》地理，未曾深究，虽有所疑，未能明辨也。及观君是书，举凡洞庭、沅、湘诸名，靡不博征详考，确定其地，叹观止矣！余于二君之说，固未足以平其得失，然窃有所见焉。屈子早居，旧说在汉北，实无明证，饶君辨之已详。至《楚辞》所陈洞庭、沅、湘诸地，疑在江南。《九歌·湘君》："会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此明谓由沅、湘北征，徂江，邅道于洞庭，上两言指出发与所往之地，中两言指所出之方向与途径，故其下曰望涔阳而横大江，似毋庸改旧说以从新也。[①] 尤有进者，《九歌》多汉世之文，太一、东君、云中、司命，汉氏之命祀也；未央、椒堂、寿宫、紫坛，汉皇燕居与礼神之所也；"《九歌》毕奏"，又汉代郊祀歌之词也。钱君之言曰："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

① 至江北亦有洞庭、湘水等地名，自是可信，然不必以之释《楚辞》耳。

民歌。”则《九歌》者，果为湘域之作，不得出于先秦之世矣，岂汉贤善拟古者若贾子、相如者之所为乎？不敢臆断，姑陈其疑，以质二君。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童书业谨识于上海

自　序

予为《古地辨》，此其一种也。以篇帙较多，故抽出单行，兹当刊布，因撮要略序其首。

自来言《楚辞》者，多误以屈原放居汉北，此说倡自王船山，后人信之甚多。考其说所资为证明者有四事：

（一）以《抽思》篇言“有鸟自南，来集汉北”。即指屈原居汉北。不知“鸟集汉北”乃托怀王会秦武关，渡汉而北，非屈原自谓也。

（二）以《渔父》辞言“沧浪之水”，沧浪为汉水别名。案沧浪之句，盖出《孺子之歌》，《孟子》已载之，为汉、沔流行风谣，屈原采之入于《渔父辞》。故辞中所言沧浪，非屈原亲到之地，乃《孺子之歌》所产之域，无关于屈原迁放之地也。

（三）以《湘君》言“涔阳极浦”，涔阳即汉水之阳。实则涔阳乃涔澧之涔，非沱涔之涔；涔阳浦即澧浦也。

（四）以屈原曾官三闾大夫，遂谓三闾即丹水之三户。考三闾乃公族名，即指楚三大强宗之昭、屈、景。三户之名，见于哀四年《左传》，哀四年为楚昭王二十五年，是昭王时已有“三户”之地名，而三闾三姓之昭，盖以昭王为号，得名实在昭王后，知三户名称，非由于三族，则三闾非三户，明矣。且《渔父》辞言：“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斯”字殆指屈原流放所在，其谓文中所言之江潭及湘流，灼然甚明。而三闾者，指其故职；是在文义上，三闾亦不得为屈原贬所也。由此知彼主屈原放居汉北，本无其事，说

者误解文义，遂别生枝节，不得不亟为辨正者也。

《楚辞》地名，多有未详。如《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王逸注："阰，山名。"《抽思》"宿北姑兮。"王注："地名。"皆不言所在。依予考之，阰即《汉志》庐江郡沘水所出之沘山；北姑即齐都之薄姑。地望既明，而后《离骚》、《抽思》写作时也可据以考定。《招魂》云："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此追记原放江南之事也；阰在庐江，则搴木兰于阰，自为路贯庐江时事，是《离骚》当作于顷襄贬原于江南之时明矣。北姑者齐都，原时盖为齐使，《抽思》之作，在伤怀王入秦之无识，又无善谋能谏之臣在其侧，则作期当在怀王入秦之后也。又高唐为观名，古音"唐"、"阳"相通，知高唐即高阳，高阳氏为楚先，故楚人禘之，高唐观即祀高阳氏之处。凡此皆属新见，尤愿质正于高明者。

曾谓考古代地理，其方法有二：一曰辨地名，二曰审地望。前者为考源之事，所以穷其名称之由来，与所指之范围也；后者为究流之事，即求其地之所在与迁徙沿革也。辨名者，当知地名之种类不一。有泛称之地名，如"江南"之指大江以南一带之地是也；有专称之地名，如江南亦为邑名是也；有合称之地名，如"鄢郢"为宜城之鄢及江陵之郢之合称是也；有别称之地名，如楚徙陈后，所谓鄢、郢乃转指鄢陵及郢陈是也；有借称之地名，如楚都江陵曰郢，复假为楚都代称，故在纪谓之纪郢，在鄢谓之鄢郢，在陈谓之郢陈是也；有混称之地名，如边裔地名，多所淆乱，南方苍梧之名，亦讹传于东西方是也。故宜详加辨析，庶无舛误。至于审地望，则当留意于其民族迁徙与建置沿革。迁徙之例，如郗为楚亡，徙之江夏，仍号曰郗；蔡为楚灭，迁于武陵，谓之高蔡[①]；建置之例，如楚黔中之疆域及所治，异于秦汉之黔中郡，并宜区别而论之。古代地名，多同号而异地，或殊名而同实，其纷纽繁赜，至难悉究，然亦有大例，可资寻考，循是以求，或可得其情实；兹编所论，揭其梗概，尤望览者有察乎此云。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潮安饶宗颐识于香港寓庐

① 尚有上蔡下蔡，例同。

卷 上

高唐考

（一）

宋玉《高唐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玉曰：昔者先王曾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如赋言，高唐是观名。[1]

《渚宫旧事》三："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朝云之馆，其上有云气，……玉曰：昔者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王悦而问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台。……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于高唐，愿荐寝席。王因幸之。既而言曰：……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王谢之。辞去。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2]

---

① 《汉书·司马相如传》孟康注称："云梦中高唐之台。"按，台与观义同。

② 原注云：见《襄阳耆旧传》。《御览》三百九十九引同。字句间与《文选》本赋稍异。考《文选》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第三十首《潘黄门》篇，"尔无帝女灵"句下注，引《宋玉集》文与此同。惟"云梦之台"，台字作野，夏帝之季女，"夏"字无，稍异耳。《水经注》三十四《江水注》引宋玉云云，亦与《旧事》同，疑今本《文选》有脱漏。

《旧事》所引，高唐之观，作朝云之馆，名虽异而所指同。

《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缘以大江，限以巫山。……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

按五臣本《文选》云阳作阳云，李善注："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翰曰："阳云台即高唐观，言高出云之阳，故以名焉。"是云阳之台，亦即高唐之观也。《渚宫旧事》引宋玉赋，别称"巫山之台"。考《寰宇记》（百四十六）巫山县："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是阳云台在巫山间，亦以所在之山为号也。

综上言之，高唐之观，朝云之馆，云阳之台，阳台，巫山之台，实一处而殊名。

寻台所以称高唐者，盖高唐即高阳也。唐阳古通，春秋昭十二年"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作"唐"。杜注："阳即唐。"《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昜。"甲骨文，汤皆作唐，齐侯镈钟铭，"成汤"作"成唐"，《吴都赋》："啺夷勃卢之旅"，《越绝书外传》作"肠夷"，《吴越春秋》作"唐夷"，《汉书·高纪》"芒、砀"，苏林注"砀音唐"。凡此皆昜古读唐之证。故高唐之即高阳，绝无可疑。《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于帝颛顼高阳。"屈原者楚同姓也，其《离骚》亦言"帝高阳之苗裔"。由是观之，楚之先，出于高阳，故楚人禘高阳，高唐之观，当即祀高阳之所在，故名高唐也。

（二）

自唐阳之通假不明，高唐之义遂晦，古地名有高唐、上唐，说者因误高唐为地名。王闿运谓："高唐，齐地。玉因怀王以绝齐交致祸，故讽襄王使结婚于齐。"按本赋明云："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又云："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其无俦兮，道互折而层累。"则高唐之观，与云梦、巫山正相迩，于齐绝无涉也。钱穆则言："巫山为今随县大洪山，高唐乃在随水右壤，春秋时有唐国，灭于楚，地在安陆随县西北八十五里，汉为上唐乡，属春陵，上唐之称高唐，犹上蔡之称高蔡。"[①] 按高唐乃观名，上已论之；以为地名，与本赋所言不合。且大洪山亦不得为巫山。[②] 高唐赋中所言之巫山，自是巫郡之巫山，其所以然者，此篇作意，极陈巫山之险，示其地

① 《楚辞地名考》。

② 见下文《湘水巫山辨》。

为楚西厄塞，宜屯兵固守，以其时巫黔为秦人所觊觎，故赋之，冀楚王之有所悟也。章炳麟曰：

> 《楚世家》："怀王至秦，闭武关，因留怀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怀王不许。及顷襄王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盖巫、郢一航可达，所谓"朝发白帝，暮宿江陵"，楚上游之险，惟在于此。怀王虽被留，犹不肯割以予秦；襄王既立，宜置重兵戍守，而当时绝未念及，故玉以赋感之。人情不肯相舍者，莫如男女，故以狎爱之辞为喻。《神女赋》但道瑰姿玮态，《高唐赋》则极道山川险峻，至有"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鹗鹰鹞，飞扬伏窜"诸语，岂叙狎爱所当尔乎？此二赋盖作于襄王初载，至二十年后，其事乃验。[①]

是说至确。赋之末言："王将欲往见之，先必斋戒，差时择日。……往自今，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即劝王于巫山，宜加措意，其托讽之意尤显。明乎此，则《高唐赋》之述巫山，非寻常之敷陈，实有至大之含旨。而此巫山即巫、黔之巫无疑。

尚有证者，祀高阳之高唐观在巫山，故亦称"巫山之台"。其台所以在巫山者，亦非出于偶然。考楚人发迹丹阳，丹阳盖在丹山之北，地正与巫山为邻，《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②] 郦道元曰："丹山西，即巫山者也。"楚人居丹阳，必禘其远祖高阳于此。巫山与丹山接境，楚人踪迹所及，故巫山亦有高阳之庙焉。故知高唐观所在之巫山，非丹山西之巫山固莫属矣。

或问，《江水注》云："丹山西即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瑶姬。"高唐既为楚祀其远祖高阳氏之观，何以有瑶姬故事流传于其间乎？答曰：瑶姬盖瑶台女，即有娀女。《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有娀女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云："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其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③] 盖为夏桀故事。按《渚宫旧事》引宋玉赋作"夏姬之季女，名曰瑶

---

① 《制言》十四期《葑汉闲话》二十五。

② "丹山在丹阳南"语，《水经注》引作郭景纯云云。

③ 《御览》百三十五引。

姬”。是高唐之传说，确与夏有关，证之《纪年》，乃后桀事。《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蒙山即岷山，为蜀地山名，以是知瑶姬故事曾讹传及于蜀，岷巫相迩，故岷山之故事，复流传于巫山。[①] 巫山有高阳观，高阳称“帝高阳”，而瑶姬称“帝女”，故遂傅会为一，于是祀高阳之高唐观，遂有夏帝季女瑶姬之神话矣。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阳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郭注：“于章，山名。”今按“于”字乃助词，当云“章，山名”。章山今湖北安陆西章山，巫山今四川巫县巫山，由章山西百里，可抵巫山。夏亡之传说，既与巫山有关，而古书皆载夏亡由于有仍女[②]，有仍女即瑶姬，是知巫山有瑶姬故事，乃因夏亡故事而牵合附会也。古代神话，多出于若干传说之凑合演变，斯其一例矣。[③]

附　伯庸考

（一）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云：“父死称考。”此以皇考为屈原父。《文选》五臣注驳之，谓“为人子忍直斥其父名”。王闿运、闻一多俱谓皇考当训祖考，即屈原远祖，亦楚太祖，而未详何人。案皇字，古金文多作“皇”形，像日光四射，本义即“煌”，所以表盛美，故与“光”、“烈”、“文”等字同义。金文颂辞屡用“皇祖”、“皇父”、“皇叔”，《诗》、《书》有“烈考”、“文考”与“皇考”，义并同。“皇考”即“太祖”，原与楚同姓，则原之皇考，当亦楚之太祖，诚无疑也。伯庸者何人，以予考之，其殆祝融乎！

《楚世家》：“楚之先祖，出于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氏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楚其后也。”

《周语上》：“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

《郑语》：“楚为重黎之后，其言曰：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

① 按桀伐蒙山本东蒙，在鲁西，详顾颉刚《有仍国考》。蜀地有蒙山，故传为一事。

② 即有娀。

③ 按闻一多有《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可参看。

是祝融盖楚先，其名本单称曰“融”。“融”、“庸”音同，字通，《路史后纪》四“祝融”，字正作“祝庸”。“伯”者，爵名，庸之称“伯庸”，犹“鲧”之称“伯鲧”，禹之称“伯禹”。伯爵自后人所名，“伯”字于古当训大。《汉书·地理志》：“河南新郑为高辛氏正祝融之虚。”郑为祝融之虚，《诗桧风谱》、《续汉郡国志》俱言之。即伯庸之所封也。

其称“祝融”者，“融”本其名；“祝”则附加形容词。左昭二十九年《传》：“火正曰祝融。”贾逵注：“祝，甚也；融，明也。”又《史记注》引虞翻曰：“祝，大；融，明也。”又引韦昭曰：“祝，始也。”是“祝”即甚大之意，《楚世家》所谓“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即其名之取义也。

梁玉绳《人表考》云：“古帝有祝融氏，《庄子·胠箧》、《六韬·大明》，及《白虎通》、《风俗通》诸书俱述之，介羲、农之间，以火施化号炎帝。后世因而神之，遂以‘祝融’名官。”按融古或有其人，后加以神化耳。其取之列于四时之夏官者，当由五德之说盛行，始以配合。《左传》：“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楚世家》则以重黎为颛顼曾孙。古帝王世袭，传闻多歧出；要其出于颛顼，为楚先祖，各书皆同，与《离骚》所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说正吻合。刘向《九叹·逢纷》云：“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蝉连。”所称“伯庸末胄”，则“伯庸”之非“屈原”之父，于此益信。观《离骚》伯庸之与高阳并提，其为楚远祖之“祝融”，非无据矣。

（二）

楚始封创业之君，实为熊绎，熊绎亦作熊盈，盖取远祖作庸之名以为名。

《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

左昭十二年《传》：“右尹子革对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

“熊盈”与“熊绎”，并当成王之世，盖同为一人，孙海波氏已证明之。予按“融”、“庸”、“盈”、“绎”四字，俱隶喉音喻纽，以声类求之，实同一名。观《周语》、《郑语》，“祝融”之名，本只称曰“融”，是其加爵号或形容词者，则称为“伯庸”，为“祝融”或“祝庸”；其加楚之姓者，则呼为“熊绎”或“熊盈”，盖本一名，特所加姓氏爵号不同而已。祝融为熊盈之祖，或必诘曰：“祖孙何得而同名？”答曰：“古之祖孙，常同称谓，如楚顷襄王父称

怀王，其孙心于楚汉间立为帝，亦称怀王。”固不嫌同号，祝融为高辛氏后之光大者，故熊绎取其名以自名，或者示其功绩足与侔比欤。熊绎为楚始封之君，亦屈原之远祖，《离骚》称“皇考伯庸”，苟谓为熊绎，似亦无不可，特不知屈子作骚时，意指“祝融”抑为“熊绎”，九原之下，难起质证，故存二说，以备参考，庶几不悖多闻阙疑之旨云尔。

此文少作，未有定见，姑存之备览。英儒《楚辞》研究巨擘 David Hawkes 君颇韪余号，屡称道之。此岁铜器出土甚夥，长安张家坡窖藏器云：

伯庸父作叔姬鬲（金文集成六一）

字作“白[illegible]父”，称父为尊称。他器如“白犾（犹）父”（《集成》六七一）之例。是“伯庸”一名，已见于西周彝铭。屈原先人名号与之相同。而祝融屡见于楚简与帛书，皆称“祝融”，无借用他字者，是伯庸不必读作“伯融”。赵逵夫谓熊渠世子勾亶王，封于勾澨，在古庸国。以“伯庸”说之，视伯庸是勾亶王，仍觉牵强。以资料所限，无须穿凿。刘向《九叹》开端即言“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蝉连”。王逸《章句》：“言屈原承伯庸之后。”与《离骚章句》“屈原言我父伯庸”，先后矛盾。固知西汉时学人，原主“伯庸末胄之说”，不以伯庸是原之父名也。

释阰

《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王注：“阰，山名。”《史记·叔孙通传索隐》引《埤苍》云：“阰山在楚，音毗。”《玉篇·阜部》“阰”下云：“山名，在楚。”《广韵·六脂》“阰”下云：“山名，在楚南。”洪兴祖《楚辞补注》与《广韵》同。阰之为楚南山名，自王逸以来无异辞。戴震《屈赋通释》：“南楚语：小阜曰𨸏，大阜曰阰。”而俞樾谓：“下句‘夕揽洲之宿莽’，‘洲’非水名，则‘阰’亦非山名。阰者，坒之叚字，《说文·土部》：‘坒，地相次比也。’地相次比谓之坒，水中可居者谓之洲，皆非实有可指之地。”[1] 胡韫玉亦云：“《说文》无‘阰’字，惟陭、陂、阺，皆为陵坂之名，三字俱与阰音相

① 《俞楼什纂》二十四读《楚辞》。

近，疑即相类。观下句‘洲’字只通言之，则‘阰’亦未必有专属之山也。”[①]俞、胡从文例说“阰”非地名，乃普通名词。李翘《屈宋方言考》则据王注《埤苍》以非俞说。

今按：《离骚》经文偶句，若“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极”。王注：“天津，箕斗之间汉津也。”而“西极”乃泛称地名；他若《涉江》：“步予马兮山皋，邸予车兮方林。”方林为地名[②]，“山皋”则通名；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苍梧为地名，西极则非地名，以是例之，地名不必以地名为对语，亦文例之一种。“阰”与“洲”为对文，以“阰”为实指山名，亦无不可也。惟叔师释沘字为山名，后人更实之云“在楚南”。惜各家诠释太简，莫详其为何山。考《广韵·六脂》有云：“沘，水名，在楚。”沘水在楚，沘山亦在楚。沘、阰俱从比声，则沘水与沘山当有关。《汉书·地理志》庐江郡灊下云：“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沘山即阰矣。《水经》：“沘水出庐江灊县西南霍山东北，东北过六县东北入于淮。”郦注云：“《地理志》云：‘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③] 按今安徽霍山县淠河出县南境山，北流至六安，一名白沙河[④]，即沘水也。《集韵》：“沘水出庐江天柱山。”然《汉志》庐江郡灊下言：“天柱山在南。”又言：“沘山，沘水所出。”是天柱山与沘山明为二山。《水道提纲》：“淠河出霍山县南灊山县西北境山。”《汉志》所谓“沘山”，当即此一带之山矣。《水经》：“淮水又东至九江寿春县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注引文颖曰：“《史记·货殖列传》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是沘水在南楚之境，沘水出于沘山，沘山即阰，旧注：“阰山在楚南”，与此正合。

或必疑阰山见于《离骚》，而《离骚》据《史记·屈原传》乃作于怀王见疏之后，时未见放，不宜有淮域之地名。予谓《报任安书》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作《骚》在顷襄王怒迁屈原之时，龚景瀚据《史》文推勘，言“《离骚》作于怀王不返，顷襄未立时”。近人游国恩以《骚》中有“美人迟暮”、“老冉冉其将至”语，定作于顷襄三年以后。郭沫若则谓《离骚》与《怀沙》、《惜往日》等篇之言赴渊，辞旨多合；且有“济沅、湘以南征”语，

---

① 《离骚补释》，见《国粹学报》第71期。

② 即《范林》。

③ 按此淠字非《说文》出汝南弋阳垂山之淠。吴卓信引《说文》淠以说沘，非也。段玉裁曰：“《说文》有淠，无沘，前志有沘无淠，不得混为一水。”是。

④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亦详《清一统志》。

足证其作期在到江南以后。说皆甚辨。总之，《离骚》作期，当如郭说。原之放于江南，《哀郢》云："当陵阳之焉至。"《招魂》云："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则庐江固屈原所亲履之地也。《离骚》："汩予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二句下即接"朝搴阰之木兰"语。又言"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乎先路"。即自言衰年逢谴，乃守贞固，以赴长路。《骚》末言"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则其追记南征时，思乡之忧甚明。所谓"搴阰之木兰"，自为"路贯庐江"时之事。然则如王注以"阰"为山名，有所专指，依予所考，即庐江沘山也。[1]

说沧浪之水

《楚辞·渔父》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近人多疑《渔父》出自伪托。[2] 其理由为：

（一）此篇首言屈原字姓，用第三者口吻。

（二）文体与他篇迥殊。今按用第三者口吻者，盖以其文假为渔父问答，不能不尔。[3] 至于文体，则属难言，观《天问》之异乎《离骚》、《九歌》，岂《天问》亦非出屈原之手乎？此种反证，难为的论。而世人又别于渔父所歌之沧浪为疑，究亦误解。

《孟子·离娄》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不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众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

① 《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予至乎县圃。""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极。"等地名，乃驰骋设辞以表其申诉无由之怨，与"朝搴阰之木兰"之有所实指者异矣。

② 如崔述《考古续说》、游国恩《楚辞概论》等是。

③ 后世自撰之文章用此例者甚多。

也。”考孔子以哀公六年自楚反乎卫[①]，孺子之歌，当为孔子闻于楚者，盖汉、沔间流行童谣也。其寓指见于孔子所申明者，为清浊由人自取。孟子因推之谓人之安危，皆由于己，而其所以亡者，以不仁，而又不可与言故也。屈原伤怀王之无用，不明忠臣之分，蹙地丧师，昏愚无知，不仁至极；又悲顷襄之复不纳其言，于是假渔父之问答，采孺子之歌，用托其意，要亦以示不仁者，安危利菑，乐其所以亡者，不足与为言耳。其义本取乎此，故不得不以文体为问答，宋玉之《对楚王问》，即放此也。[②] 史公为《屈原传》，叙其见迁于顷襄，至江滨，披发行吟泽畔，有渔父与之问答，即取此篇以为原被放江南之实录。[③] 此篇言游于江潭，宁赴湘流，则其时屈原行迹，自在江南可知。《沧浪之歌》，盖屈原取其辞以为意，无与于流放之地望也。然后人不问作者取义所在，妄以其文有“沧浪”之语，遂据以定屈原流放之地，理纷说纽，而本指益乖矣。

王夫之《楚辞通释七・渔父序》曰：“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邓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案：《沧浪之歌》，自为汉上流行之风谣，观孔子、孟子所述，此歌非为无聊之倡，实含极深之旨者。屈原，楚人，故采用之，以寓其意。此歌初见于《孟子》，盖为“孺子之歌”，而屈原采之，则以为“渔父之辞”，由是观之，渔父之出于假托，非真有其人甚明。[④] 王谓渔父触景起兴，盖以为实，误也！沧浪所在，自来各执一说。

（一）有泛言其地在汉水、夏水之域，而不明指在某州某县者，此近古之说也。

(1)《地说》：“（汉）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⑤]

---

① 见《史记・孔子世家》。

② 《新序》以《对楚王问》当故事记载，或谓可为古代用第三者语气之文章多非本人自作之证。然《新序》乃杂采前人之文为书，其剪裁改体之例实夥，不足为据。

③ 《史记》多采寓言，盖史公借以抒愤耳。

④ 《汉书・古今人表》屈原下有渔父。王若虚《滹南集辨》曰《离骚・渔父》篇假设以见意尔。

⑤ 见《水经注》二十八引。《史记正义》引作《地记》。《禹贡》郑注、《汉书・地理志》颜注，即援此为说。《水经・沔水注》云：“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都，咸楚都矣。”（胡渭曰：“自均州以至汉阳，皆名沧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邦。”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洪兴祖《楚辞补注》、戴震《屈原赋通释・山川地名》采此说。

(2)《初学记七·地部·汉水》条："沔水故有汉、沔之名，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注："即屈原遇渔父处。"

上以为在汉水，近楚都。

(1)《永初山川记》："夏水，古文以为沧浪，即渔父所歌也。"①

(2)《史记索隐》②："马融、郑玄皆以沧浪为夏水，即汉河之别流。《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是此水也。"

上以为在夏水。③

(二) 有确指其地在某州某县者，此后人之说也。

(1)《汉水记》："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也。"④

(2)《沔水注》："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⑤。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

(3)《括地志》："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⑥

(4)《荆州图经》："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有沧浪洲，长四里，广十三里。《禹贡》称：'汉水东流为沧浪。'疑此洲是也。"

(5)《元和郡县图志》二十四均州武当县："汉水去县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即《禹贡》云'又东为沧浪之水'。"

上以为均州武当县。⑦

(1)《舆地纪胜》七十九汉阳军景物上："汉水即孺子歌沧浪濯缨处。"《寰宇记》云："汉水一名沔水。"又刘澄之《永初山川记》云："沔口古文以为沧浪水，即屈原遇渔父，所云'沧浪之水'是也。"

---

① 《水经注》三十二夏水注引。

② 《夏本纪》沧浪之水注。

③ 按吴卓信《汉志补注》曰："夏水在今荆州府监利县东南，所谓鲁洑江也。马融、郑康成皆以为夏水，即沧浪之水来会，误矣。"

④ 《夏本纪正义》引。

⑤ 按《正义》引作沧浪洲。

⑥ 《夏本纪正义》引。

⑦ 今湖北均县，案皆本《水经注》为说。《隋图经》："汉水径琵琶谷至沧浪洲，即渔父棹歌处。"《太平寰宇记》一百四十三引在郧乡县。乾隆《襄阳府志》五古迹云："沧浪亭均洲东北三里，滨汉江。《水经注》于此载渔父《沧浪之歌》，今有'孺子歌处'四大字，刻于崖石。案此亭去沧浪洲不四十里，而去州城仅三里，当为置州后所建。"

上以为在汉阳汉水。[①]

(1)《元丰九域志》：龙阳有沧浪水。

(2)《明一统志》："自沧、浪二山发源合流，为沧浪之水，《楚辞》屈原行吟泽畔，遇渔父歌沧浪即此。"[②]

(3)《太平寰宇记补阙》下六龙阳县："沧浪水在县西，《清一统志》注引《寰宇记》：'沧、浪二水合流，乃渔父濯缨之处。'"

(4) 嘉庆《常德府志五·山川考》龙阳县："沧浪水，县西十五里，一名沧港，上有沧溪寺，三闾大夫祠。"

上以为在龙阳县。[③]

(1)《御览》六十二地部二十七汉沔条引《水经注》及《山海经》云："汉水东南至葭萌与羌水合，至江夏安陆县名沔水，故有汉沔水之名，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注："即屈原遇渔父处。"

上以为竟陵汉水。[④]

(1)《太平寰宇记》："邵阳县有渔父庙，屈原所逢渔父于此，今有渔父庙在焉。"[⑤]

上以为在邵阳。[⑥]

(1)《舆地纪胜》六十二荆湖南路武冈军景物下："沧浪水即屈原见渔父处。"

(2)《太平寰宇记》武冈县有招屈亭、沧浪水、渔父亭，即渔父见屈原处。[⑦]

上以为在武冈。[⑧]

---

① 今湖北汉阳县。

② 沧水源出武陵沧山，流四十里，合浪水；浪水源出龙阳浪山，二水合流谓之沧浪水。

③ 今湖南汉寿县。案《御览》引《永初山川记》云："沧浪之水合流出镡成界，此盖后人名之，非古沧浪也。"《古逸丛书》本《寰宇记》镡成作镡城，亦引此。同治《武陵县志》三沧水按语以为屈原遇渔父，当在枉渚辰阳间，即沧水，殊误。

④ 今湖北天门县。

⑤ 《古逸》本。

⑥ 今湖南宝庆县。

⑦ 《古逸》本。

⑧ 今湖南武冈县。

(1) 光绪《荆州府志》七：“濯缨台在城西，疑取《楚辞》中沧浪水清，可以濯缨”句意。

上以为在江陵。[①]

(1) 又《纪胜》六十四江陵府上景物下：“濯缨台在监利县东三里，《旧经》云：屈原濯缨处。”[②]

上以为在监利县。[③]

诸家所述，至为纷纽。大抵后来之说，多出于附会，盖本诸传说而造为地名以实之。予案，《孟子》未曾明言其地所在，今乃欲确指其在某州或某县，微特必不正确，且亦属无谓。近古之说，但泛言汉、夏之域，虽非定见，究亦有理。[④] 惟必引渔父之歌为证，则太信有渔父其人，终未近情实耳。予意不若指为孺子之歌，较为适当。盖渔父乃屈原所假托，非实录也。明乎此，则辞中所言之沧浪，自非屈原亲到之地，乃孺子歌所产之地哉。究无与于屈原迁徙之地望，可不必沾沾执为居汉北佐证。[⑤] 焦循《孟子正义》曰：“歌出孺子，孔子所闻，远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为渔父之辞耳，非其本也。”此论最洽，可破数千载之惑。又其论沧浪之义曰：“沧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则其清是水，然浊乃习染。下云‘自侮自毁自伐’，俱从‘浊斯濯足’相贯，是本可濯缨，由自浊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变为浊，由善而恶也。不仁而可与言，是既浊而自改为清，由恶而善也。清斯濯缨，承上；浊斯濯足，起下；尊而贱，贱而尊，皆自取矣。”说亦谛。屈原感楚王不用其言，故托此歌假为渔父以寓意，征诸《孟子》，其用意所在至显也。后人不悟其义，哓哓地望之辨，亦徒见其词费，而因以致疑于《渔父》之为伪作，又无谓已。

予谓据《渔父》文中“宁赴湘流”，可为原时行迹在江南之证。惟“湘

---

① 今湖北江陵县。

② 亦见光绪《荆州府志》七，云在县北七十里。

③ 今湖北监利县。

④ 《明一统志》：“山东兖州府峄县北车稍山下有沧浪渊，即孺子濯缨处。”或言即“孟子之沧浪”，不知沧浪之水，必不若是其小，此乃后人所名。乾隆《襄阳府志》曰：“康熙中，知州王民皞修《太和山志》谓孺子所歌在邹鲁之峄山，渔父所歌，在湖南龙阳。”析为二地，尤不足为确论。

⑤ 沧浪之为何水，清王鸣盛辨证，至为详覆，谓常为夏水，见《尚书后案》。又阎氏《四书释地》亦详，可参考。

流”《史记》作“常流”，《索隐》：“常流，犹长流也。”贾生《吊屈原辞》有云：“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贾生谪长沙，则此“湘流”自是湖南之湘水无疑。观史公引《渔父辞》后即接以“《怀沙》之赋”，所谓“汩徂南土，浩浩沅、湘”。正以为原自郢下湘矣。《渔父》篇追叙其既放，游于江潭，则其时原尚未入湘境，故下云“宁赴湘流”，则表示其将“汩徂南土”甚明也。近人钱穆先生以《渔父》沧浪为原居汉北一助证。谓：“郦元以汉沔自下有沧浪通称，而不知渔父所歌，屈原所居，自在汉北，故必引而南之，谓其不违水地。”[①] 是亦误认以沧浪为屈原流放之地，盖未深考。

涔阳考

《湘君》：“望涔阳兮极浦。”许慎《说文》云：“涔阳渚在郢。”[②] 王逸《楚辞章句》：“涔阳，江碕名，附近郢。”《文选》吕向注：“涔阳浦接于楚都。”[③] 是本许、王说。曰“渚”曰“江碕”曰“浦”，盖从本文“极浦”设训。[④] 此以为洲渚名，近郢，汉、唐人之说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今澧州有涔阳浦。”胡渭《禹贡锥指》谓：“《九歌》涔阳，公安旧县东南有涔阳镇，即其地。”《寰宇记》百四十六：“公安县，涔港在县西六十里。”[⑤] 曰“镇”，曰“港”，当由后人推而名之，此以为在公安或澧，宋后人之说也。

《玉篇》十九：“涔，字廉切；涔阳，地名。”唐戎昱诗：“涔阳儿女花满头，毵毵同泛木兰舟。”[⑥] 又诗云：“寒食涔阳诸小儿，齐歌齐舞带花枝。”又云：“不须桂岭居天末，但见涔阳在眼前。”[⑦] 卢肇诗：“君梦涔阳月，中秋忆棹歌。”[⑧] 又李群玉有《送客往涔阳诗》，又有《登涔阳城诗》[⑨]，是唐时有涔阳城矣。杜牧之有《登澧州驿寄京兆韦尹诗》云：“一话涔阳旧使君，郡人回

① 见《楚辞地名考》。

② 此据《系传》。铉本有“中”字。

③ 《哀江南赋》倪璠注引此。

④ 碕，江岸，与渚浦义近。《九叹·离世》：“迈江曲之逶移兮，触石碕而冲游。”言碕不及涔阳之名。

⑤ 当缘涔水得名。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采此。

⑥ 《全唐诗》十《采莲曲》第三首。

⑦ 《舆地纪胜》七十澧州引。《全唐诗》无之。

⑧ 《送李群玉》。

⑨ 俱见《李集》。《后集》四。

首望青云。"[1] 又有《为堂兄慥求澧州启》云："授以涔阳，活于阖门。"[2] 求澧州而曰"授涔阳"，是唐人称澧州曰涔阳也。所云"涔阳城"，即指"澧州城"也。两《唐书·地理志》，澧州不称涔阳，知词人以古地名称之。此又涔阳之变称矣。

考涔阳以在涔水北得名，涔水者，《水经》："澧水又东过作唐县北。"注云："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迳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亩。又东南流注于澧水。"《澧州志》："涔水为岷江别派，从公安入境为四水口，又东南流过焦圻一箭河至汇口入澧，故称涔、澧。"[3] 胡渭曰："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盖涔阳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阳之北，则战国时固以北江为正流而南江为涔水矣。"汪士铎亦曰："虎渡口为南江遗迹可信，曾证以'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舲'，惟澧为江流涔河，始云极浦，涔河南入澧，在今扬潭河东。"[4] 涔水是否南江，姑勿论，而涔阳之名由于涔水可无疑。

段玉裁不以胡说为然。谓："许曰'在郢'，王曰'附近郢'；许云'渚名'，王云'江碕名'，皆不云有涔水，谓近郢滨大江之洲渚耳，近儒说未可信。"[5] 案《湘君》"涔阳极浦"初意当谓涔水以北之远浦。涔阳未必为浦名。考其文曰"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此湘君转行向北，故取道于洞庭。涔水在洞庭西北，适当洞庭前，自南遥瞩涔水以北之远渚，则云"望涔阳兮极浦"。涔水以北，大江在焉，故续曰"横大江兮扬灵"也。盖湘水以北为洞庭，洞庭以北为涔水，涔水又北则为大江，以涔阳为涔水，位置固甚合。且从其对文之大江言之，涔亦以指涔水为当。在文理上，"望涔阳兮极浦"，涔阳亦不宜解为浦名。[6]《湘君》文本意当如此。而后人乃误解其意，从"浦"字着意，遂呼近涔水之渚，或江碕曰"涔阳"。盖渚也，江碕也，浦也，之称"涔阳"，自是后人因《楚辞》而名之，非《楚辞》本指也。汉儒说亦未可信。至宋人言，澧州涔阳浦亦当是后人所名。然不名于滨江之郢，而名于近湖之澧，必有其故。《说文》"郢中"，但言楚都前后，未必指其地在郢境，古人语

---

① 《樊川外集》。《舆地纪胜》荆湖北路此诗两见，一作杜牧，一作李群玉。

② 《樊川文集》十六。

③ 《锥指》"至于东陵下"注引。又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句读》引同。

④ 《汉志志疑》。

⑤ 《说文·水部》涔字注。

⑥ 近人钱穆释《湘君》此文曰："自大江北征邅道洞庭，洞庭固在大江之北。"按本文固未言自大江北征，钱君殊误解。

尚概括，而澧与郢相去匪远，谓“涔阳在澧”与近郢说亦无违也。

又考自来涔澧合称亦复掍称，盖涔、澧源异流同。涔水在澧州七十里，会澧水入洞庭[1]，自澧州以东水为涔澧之合，故称为澧水，为涔水，皆可，后世澧州称曰涔阳以此。《湘君》“涔阳极浦”与大江对举，而下文言“捐予玦兮江中，遗予佩兮澧浦”，以澧水之浦与大江对，可知澧浦即涔浦矣。唐李群玉有“涔浦纵孤棹，吴门渺三千”之句，此涔浦亦即指澧浦。由是言之，《九歌》“涔阳极浦”但泛指涔水以北之远浦，与澧水之浦异名同实。而江南初未有涔阳之名，后人乃以《楚辞》推之以为渚名、江碕名、浦名、镇名、港名，更进而以为滨涔水澧州城之名，则又递变之称号，与《九歌》异指。于儒率以为解释，非其本矣。

涔阳所在，亦有异说。近人钱穆以为涔即汉，涔阳即汉水之阳。意欲证成其屈原放居汉北之说，故牵合为言。不知涔出于汉，已另为一水，而非汉矣。《水经》：“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旱山，北至安阳，南入于沔。”胡渭曰：“或以为禹贡之潜，非是。”郦注涔水即黄水，此黄水乃汉源之一水，其不得指为汉水[2]甚明也，且据《九歌》言涔北为大江，涔阳浦即澧浦，地望亦与汉域不合。[3] 庾信《哀江南赋》：“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古今乐录》：“楚之王子质于秦，思归，作歌：‘洞庭兮木秋，涔阳兮草衰。’”以涔阳与洞庭齐举，亦以为在江域也。[4] 又考古书言涔水者：《山海经·东次二经》：“耿山又南三百里曰卢其之山，无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此经之山，毕沅注在山西河南，则此涔水乃在晋、豫之间，是又一涔水矣。《北次三经》：“北嚣之山，涔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邛泽。”《说文·水部》、《广韵》引《文字音义》，“涔水”作“淦水”，王筠曰：“是‘淦’误‘涔’。”仍无确证。若作“淦”者为“涔”误，则又有一涔水在河、汾之间矣。由是知水之名“涔”者至夥，不独江、汉之域有之而已，固不应以有“涔”字而必其为汉水也。

又《荆湖》之涔水，字或作“涔”。《隋书·地理志》（二十六）南郡松滋有“涔水”（百衲本），《集韵》：“涔，郎丁切，水名。”引《楚辞》“望涔阳兮

① 《方舆纪要》七十九《图书集成山川典》三百九十八。

② 郧穰之汉水。

③ 洪兴祖《补注》：“澧州有涔阳浦。”而引《水经》黄水之涔水，殊误。

④ 汉北无洞庭，予有辨。

极浦”。洪兴祖曰：“其字从令。”[1] 桂馥曰：“未知何据。”[2] 予意恐系误刻。

北姑考

《九章·抽思》篇：

> 低徊夷犹，宿北姑兮。烦冤瞀容，实沛徂兮。

王逸注：“北姑，地名。”而不言所在。自来释《楚辞》者，皆未能详。予考，北姑即齐地之薄姑也。

左昭九年《传》：“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服虔曰：“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又二十年《传》：“晏子曰：‘昔爽鸠氏如居其地，季莿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史记·齐世家》：“胡公徙都薄姑。”

蒲姑即薄姑，古为奄君之名。[3] 后人取以名其所居之地。后为齐都。北，薄声同，知北姑与薄姑、蒲姑本一名而异文。《续汉郡国志》：“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4]《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地，盖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也。

知北姑为薄姑，而《抽思》言宿于北姑，则《抽思》当作于使齐时。考屈原两为齐使，古史书载之颇详。《史记·屈原传》云：

>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此原第一次使齐也。《新序·节士》篇：

> 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

---

① 《楚辞补注》。
② 《说文义证》。
③ 见《周本纪》。
④ 《左传杜注》同。

此原第二次使齐也。如《新序》，言怀王之会秦武关，正值屈原第二次出使在齐，时虽力主不当会秦，卒以远隔朝列，不能死谏而获效。《抽思》之作，其意在伤怀王人秦之无识。所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即指怀王与细人入秦，渡汉而北，孤处异域，无謇直善谋之臣在其侧也。[①] 故《抽思》作期，当在怀王入秦之后。以"宿北姑"语证之，原时正在齐也。观《抽思》文曰"实沛徂兮"，曰"路远处幽，又无行媒"，曰"道思作颂"，则其时原或被召，自齐将返郢也。

自"北姑"地望不明，言《楚辞》者于《抽思》写作时地，遂无定说，今得考正，知彼主《抽思》为原放居汉北或江南时所作，说并诬妄，且借见《九章》非尽南迁之作品也。

附录　抽思解

屈原居汉北，史籍绝无明言，征诸《楚辞》，亦无确证。然自来论《楚辞》者多主其说，自王船山[②]、屈复[③]、林云铭[④]、蒋骥[⑤]、方晞原[⑥]，至近人钱宾四、游国恩诸先生皆是，其所资为证明者，多以《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语，然兹事究不足以为证。按屈赋中有"汉北"二字者，《抽思》此语而已。兹应探究之问题者，即"鸟"字果何所指，为屈原自请乎？抑别有他喻乎？世之解者，皆谓屈原自喻，故执为屈子放居汉北之证。

游国恩曰："《九章·抽思》一篇，乃自叙述放逐之作。盖汉北今郧、襄之地，在郢都之北，屈子以鸟自喻，而言来集汉北；又以美人自喻，而言独处异域，则其为迁谪之辞无疑也。观其欲自申而南望，魂游郢而南指，聊娱心而南行，则所谓自南而来汉北者，明指自郢而北迁于此，又无疑也。"[⑦] 予谓"有鸟"一语，非屈子自喻，乃指怀王也。姚姬传谓："此指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屈子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都而不得反。"此说有是有不是。

① 详《抽思解》。
② 《楚辞通释》。
③ 《楚辞新注》。
④ 《楚辞灯》。
⑤ 《楚辞注》。
⑥ 戴震《屈原赋注》引。
⑦ 《读骚论微初集》。

以“有鸟”指怀王，至确；以“望郢都”亦怀王之事，则非也。刘永济斥姚说与下文意不通贯，未得文义，不可从。[①] 因亦谓此为屈子居汉北之喻，亦未中肯。今录《抽思》自倡曰以下文于下，为疏释焉。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此言怀王入秦，渡汉而北。“自南”，言自楚也。“汉北”非必指楚属宛、邓，凡汉水以北，皆可有是称。秦在楚北，故云然也。词章家立言多浑括，况假托之辞，自不明指。[②]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好姱佳丽兮”，美人也；美人，即君王也。秦非楚土，故云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此指怀王最显。《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

此篇下文亦云：“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意皆相似。《周礼·媒氏》注：“媒之言谋也。”《广雅》四：“媒，谋也。”《楚辞》言“媒”盖即“谋”也。旧注作左右之臣或良友解，并谬。此二语伤怀王入秦之孤窘，无善谋之臣在其侧也。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按此言与怀王相去道远，且日忘矣。欲自申其谋，亦不可得矣。《思美人》所谓“申旦以舒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是也。自“有鸟”以下，至“道卓远而日忘”七句，皆指怀王。“愿自申而不得”句，始折入自己。自来多以八句尽为屈原自谓，究非。读者审其文义可知矣。

---

① 《九章通笺》。

② 王逸以为此屈原自喻生楚国，尤非。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章句》曰："北山一作南山。"王氏《通释》作"北"，戴本作"南"。刘永济指戴氏《屈赋注》谓"北山即纪山，以位纪城北，故名北山。屈子在汉北，望故都之山而流涕也"。是亦不然，此盖泛言汉北之山，不必指定何山。《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嶓冢在今陕西沔县西，战国时秦南境也，怀王入秦，故屈子举以为言。《抽思》之"北山"，大约亦指嶓冢一带之山汉水以北，近秦之山也。盖有怀于怀王，故云然。王夫之曰："北山，襄邓西北楚塞之山。"刘永济曰："姜齐盖亦以纪山在汉南，不应称北，故以楚北塞之山当之。不悟北固山名，不必以在望者之南为嫌也。"按"纪山"又名"北山"，迄无实证，不得据以驳王。北山要宜以泛指为是。一本作"南山"，刘永济曰："因说有鸟自南，来集汉北，为屈子退居汉北，纪郢位汉南，从汉北望之，则山在南，故改为南山也。"亦是一说。惟作"北山"义为尤达。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上文言："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与此异时。刘永济曰："明此为追述往事，彼乃即目之景，洪氏朱子以为一时，并认。吴氏以为'孟夏短夜'，盖代设怀王梦归之幻梦，尤为设想太过。"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惟郢路之辽远"句，亦见《哀郢》，意同。"哀故都之日远"是也，刘向《九叹·逢纷》："思南郢之旧俗兮，肠一夕而九运。"注："言思念郢都邑里故俗，肠中愁悴，一夕九转，欲还归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我心同。

一本作"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识路之营营，何灵魂之信直兮，南指月与列

星，愿径逝而未得兮，人之心不与我心同”。文中两言“路”，盖指“郢路”。月与列星，王注：“参差转运相递代也”，盖言岁时之迁递。南指云者，乃作者自抒其南望郢都历数时日迁递之忧思也。指有数义。心切望郢，故曰“魂一夕而九逝，愿径逝而不得”。又姚姬传以“南望郢都”为解，且属之怀王，不悟下文接言“人之心不与我心同”为屈原自述甚显，尤误解文义也。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此亦原自伤楚王之不纳谏也，按自“望北山”以下十四句皆屈原自述之辞。

乱曰：“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轸石崴嵬，蹇吾愿兮。”

王逸曰：“言以思得君命，缘湍濑之上流，上泝江渊而归郢也。”颐谓非也，此原在齐南望郢都，非自江南北望郢也。潭者，洪兴祖曰：“潭水出武陵。一说楚人名深曰潭。”[①] 按此未必指潭水，就其所言之景象观之，则作赋者，盖冀还归于楚。蹇犹言乖也，王夫之以为助词，非也。言临流眄石，佯狂四顾聊以自娱，“南行”乃姑作快意之谈。王夫之以殊时殊地为解，而刘永济申其说曰：“上文南指，乃追维在汉北之情；此文南行，乃远放江南之事。”亦欲曲符其说，不得不分为二时，尤灭裂为解矣。

超回志度，行隐进兮。

王夫之曰：“远忆昔日所秉之志度欲行而伤于进，是以心终不可得而娱也。”

低徊夷犹，宿北姑兮。烦冤瞀容，实沛徂兮。

王夫之曰：“追思前事，故迟回旅宿，心烦容瞀，念此所行，颠沛无聊也。”北姑即薄姑，齐都。原时出使其地。

① 《渔父》有“游于江潭”语。“江潭”二字连用，皆非专有名词。

愁叹苦神，灵遥思兮，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

“无行媒”者，王注：“无绍介也，言无有代道其意者也。”王船山曰：“虽神驰君侧，终无能自达，此即承上神灵遥思而言。”此言“路远处幽”，足见其时身居异国。

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此言无能达情志于君，聊自表白始志。

《抽思》一篇，旧解多未憭。盖皆误以“有鸟”为屈原自喻，今故不揣固陋，别为笺释，以姚说为本，或更得其情实云。

考游国恩必以屈原初放在汉北者，乃信《新序·节士》篇言屈原两度被放，而初放盖尝召回。考之史籍，既无征验，故以《抽思》所言汉北，为原放地以实之。不知《抽思》“有鸟集汉北”不得为屈子自喻，即屈子初放曾召回事，亦属疑问。

《史记·屈原传》：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怀王怒而疏屈平。……作《离骚》。……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子顷襄王立。……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子既嫉之，虽放逐，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中三致意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平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平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新序七·节士》述屈平事云：

屈平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六百里。……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拘囚，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怀王子顷襄王……反听群谗之说，复放屈原，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按《新序》之言，与《史记》互有详略。然取二文对勘之，《史记》叙屈原作《离骚》于楚绝齐之前，与《渔父》事为实录。《新序》亦同。核其事实，前后大致尽合。是《新序》尽依《史记》而稍增益润饰者。而其言屈原放逐两次，非确有所本，则谬解《史记》之意，而妄著论。《史记》云："王怒而疏屈平。"又云："屈平既绌。"又云："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是史公但云疏绌，不在位而已，未曾言放逐也。而《新序》以为"放于外"则推其意而从为之辞耳。又其言"复用屈原，屈原使齐"，亦依《史记》而足辞以增意。然《史记》但云："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盖使齐之前，王惟疏之，仅落职而已，未曾放逐。使齐亦非既放而复召回也，乃复起用耳。而《新序》叙屈原使齐在"放于外。乃作《离骚》"之后，则明以为既放而复召用，说本《史记》，而叙事先后失其意矣。由是观之，使齐之前，屈原但疏于王，不复其位，未尝遣放于外也。刘永济曰："居汉北乃被疏绌，与至江南之被逐不同，不应据此遂谓屈子曾两度被放。"按"居汉北"乃误解《抽思》文义，已见上辨；至言不应据《抽思》谓屈子两度被放，甚是。足以驳正游说也。

三闾辨

钱穆氏为《屈原放居汉北考》所举证除《湘君》"涔阳"、《抽思》"汉北"外，别有"三闾"即"三户"之说，引《南阳府志》内乡县有屈原冈，为屈

原居汉北佐证。[1] 今按“溆阳”、“汉北”，皆不足证屈原放居汉北，予并有辨。而此“三户”即“三闾”，说亦可商。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2]。解者：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虽望文为解，于辞顺。[3] 韦昭则以为“三户，楚大姓昭屈景”也。按昭、屈、景为楚强宗，楚汉时，其族尚存，《史记·高祖纪》：“九年，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是其证。谓“三户”指此三族，则当云楚有三户，亡秦必楚，示其强宗犹在，必期于恢复也。而其文乃用“虽”字，于文理殊悖。钱穆力持韦说，谓“南公意谓楚之公族，虽只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户言[4]”。然楚族之大者，何只此三家。观《高纪》所载尚有“怀氏[5]”。知不仅此数矣，不应独举此三姓，谓为实指，亦于辞有不顺。司马贞《索隐》不从韦说，主“三户”为地名。张守节《正义》引孟康言：“三户津峡名，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谶。”说亦迂曲，与此文义不相应。“三户”要为虚设，言楚即虽存三家，亦有亡秦之志，以楚最无罪，而遭秦灭，怀王入秦，又不得反，楚人哀痛之至深也。“三户”自对楚人民言，非指公族，察其文义可见，三者虚数，不必限以三，亦不必其果为三。[6] 此文但谓少数之家，亦存恢复之心耳。诸家说惟臣瓒、苏林最可从。[7] 今“楚虽三户”之义既明，请进而论地名之三户。

钱穆曰：“三户之为地名，本由楚起丹阳，以其三族而名发迹之地。”案是说殊不可解。昭、屈、景，楚之三大公族，其始与楚之发迹无涉。昭盖出自楚昭王。邓名世曰：“楚昭王熊轸有复楚之大功，子孙蕃衍，以谥为氏。”[8] 屈盖出自屈瑕。《姓源》曰：“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所谓莫敖屈瑕是也，后

---

① 见《楚辞地名考》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屈原放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钱云：“以沧浪三闾之地望证之《抽思》之汉北，则屈原放居之地可推之，以《九歌》‘溆阳’之地望证之，则为此歌者自为身居汉北之谁氏。”

② 《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③ 王先谦《汉书补注》三十一取是说。

④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解》。

⑤ 怀，《姓谱》云：“楚怀王之后”，是与《左传》“怀姓九宗”异源。

⑥ 见汪中《述学·释三九上》。

⑦ 《史记官本考证》张照曰：“三户只依瓒说为是。作地名解，迂矣。曰‘虽’曰‘必’，其义何居？其后兵渡三户，亦偶然合耳。正义亦是曲为傅会。”此从文义说之最合！

⑧ 《姓氏书辨证》十。案郑氏《通志·氏族略》四以《楚辞注》言昭屈景楚之三族，入“以族为氏类”，非。《姓觿》三引《战国策》楚有昭奚恤，昭阳、昭常、昭睢，周有昭献、昭剪，《庄子》有昭文，按《战国策》又有昭衍、昭过，盖皆出昭王后。

因氏。”[1] 景盖亦楚公族，别为氏者。[2] 此三族得姓之由来也，皆芈姓后，为楚王族之强者，故合称之曰“三闾”[3]。掌此三姓之官，谓之“三闾大夫”[4]，此又三闾之名之由来也。由是观之，昭、屈、景三姓，非楚之初祖，实皆楚公族。其得姓也，或由于谥，或由于族，或由于邑，而昭之为氏，又在昭王之后，自与楚起丹阳无异。

《水经·丹水注》：“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申息戍商密事，见《左传》僖二十五年。商密今南阳丹水县。《续汉郡国志》：“南阳丹水县有三户亭。”《左传》“三户”，杜预注：“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商密、三户，咸在今丹水县，其地近矣。是三户古在商密间，楚北侵，始有其地，亦与发迹丹阳无与。[5]

钱穆又曰：“鄀本商密，后南迁，为楚附庸，楚遂踞其故地，易名三户；三户者，盖指楚昭、屈、景三族。”[6] 三户之名，见于哀四年《左传》[7]：“晋士蔑执蛮子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鲁哀四年即楚昭二十五年，是昭王在时，已有“三户”之名，而“三闾”之昭姓，则又得自昭王之后[8]，是谓三户之由于三族，亦非确论。又考楚易商密名为三户，殊无的证。《通志·氏族略》三：“楚邑有商密氏，注：‘楚大夫食采之邑。’”是楚得鄀商密并未即易其名，实仍商密之称以为邑。《汉书·项籍传》：“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9]，军漳南。”服虔曰：“三户，漳水津也。”孟康曰：“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10]《水经·浊漳水注》：“漳水又东迳三户峡，为三户津，张晏曰三户地名

---

① 《姓觿》九引。亦见《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三入“以邑为氏类”。邓名世曰：“自瑕及屈重、屈完而下，世系具《春秋人谱》。”见《辨证》三十七。按《风俗通》有屈侯。罗泌云：“屈武子瑕邑，号屈侯，后以为氏。”张澍曰：“当云楚武王子瑕。《淮南子》有纣臣屈商，此另一氏。”

② 《通志·氏族略》四入“以族为氏类”。一说：出自姜姓齐景公之后，以谥为氏。战国时，景氏世为楚相，景翠、景鲤、景舍尤显者。后有景差。见《集韵》，又《辨证》二十七。然《姓苑》云：“景，楚公族芈姓之后。”《姓纂》同云“芈姓”，则楚之景与齐恐不同源。

③ 见《姓纂》、《千家姓》引《楚郡族姓考》。

④ 王逸《离骚经序章句》，又《后汉书·孔融传》“忠非三闾”李贤注：“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闾。”

⑤ 钱氏谓楚南阳依宋翔凤《过庭录》考定在丹、淅入汉之处。近人或据甲骨金文考楚族源于东方。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孙海波《记周公东征》又《周金地名小记伐楚条》说皆甚辨，盖楚起源之问题，仍有待于论定，不应遽从宋说。

⑥ 《楚辞地名考》。

⑦ 徐文靖《竹书统笺》误作十四年。

⑧ 《姓氏书辨证》十一“昭出自芈姓，与旧族屈、景皆为楚大族”。盖三族，惟昭得姓最后。

⑨ 《史记·项羽本纪》作“度”，字通。

⑩ 此据《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浊漳水注》、《史记索隐》引孟康并作“西四十里”。

也，在梁期[1]西南……又东，汙水注之……昔项羽与蒲将军英布济自三户，破章邯于是水。”《括地志》：“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是三户原为津峡之名。《竹书纪年》：“显王二十三年壬寅，孙何侵楚入三户郛。”[2] 郦元以为即左哀四年《传》之三户。阚骃《十三府志》：“三户，邺北五十里，梁期故县。”[3]《水经·丹水注》：“丹水又东南迳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一统志》：“三户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4] 曰“郛”、曰“城”，则三户又为城名。惟不知城因津峡得名欤？抑津峡因城而得名欤？书阙有间，莫得而明。三户名称之由来，既弗可知，则谓楚易商密名为三户，自为臆说。

今知三户与昭、屈、景三族无关。而三闾又即三族，则三闾即三户之说，自难成立。“三闾氏”，郑氏《通志·氏族略》三入“以邑为氏类”。然注仅云“芈姓，楚屈原为三闾大夫，因氏焉”，不言其邑所在。考三闾为邑名，不见于他书，而自来氏书，若《风俗通·姓氏篇》、《姓觿》言三闾氏者亦皆云屈原为三闾大夫后，因氏，与郑氏《通志》同。盖“三闾氏”者，乃后人因屈原之官为氏，非以三闾邑为氏也。当入以族为氏，或以爵为氏之类。而郑渔仲入“以邑为氏”类，于其邑所在，又略不道，未谕其故。钱穆氏从之，遽定三闾为邑名，立说诚卤莽矣。

三闾既非三户，自不当取为屈原居汉北之证。予考《渔父》：“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审其词旨，“斯”字指屈原放居之所在；而三闾乃指其故职，王逸[5]、刘良[6]谓为原故官是也，在文义上三闾绝不当为原时贬所，读者绎其文可知。故无论三闾是否为邑名，是否即三户，然由《渔父》文义观之，终不得指为屈原放居之地。而钱氏乃执以证原曾放居汉北，尤谬解文义矣。至云内乡县有屈原冈，然原放居，固不在汉北，即使曾偶居汉北，亦不得指为迁谪所在。况屈原遗迹，随处皆有。言其故居，则秭归县北乐平里[7]、湘阴县

---

① 《史记·项羽本纪索隐》作“淇”，司马贞引《晋八王故事》云当作“淇”。

② 《水经注》引。王国维《辑古本纪年》并同。

③ 《项羽本纪索隐》张澍辑本。

④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十二则引《一统志》三户城在南阳府淅川县西南。

⑤ 《章句》。

⑥ 《文选注》。

⑦ 《水经·江水注》，戴震《屈赋注》。

北玉笥山①、巴陵县东太平寺②、归州东屈沱③、夔州④等处皆有之，又澧阳县有三闾大夫山⑤，是多由后人因缘傅会，不可凭信，内乡之有屈原遗迹，固亦犹是。且《南阳志》言：“昔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则屈原冈非因屈原所居而得名亦甚明。然则以此遂谓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在南阳之三户者，益足见其不征耳。

苍梧考异

稽诸古籍，边徼之地，称苍梧者，不独于南方，东之海，西之流沙，皆有之，兹略考其梗概，以广异闻。先言南方之苍梧。

《逸周书·王会解》：“仓吾翡翠。”次在长沙下。孔注：“仓吾，亦蛮也。”仓吾即苍梧。《楚策》：“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南有洞庭、苍梧。”吴师道《校注》：“苍梧山在道州南。”《吴越春秋》云：“禹济江南，省水理。……南到苍梧，而见缚人。”《山海经·海内经》：“南方有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是苍梧本山名。《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史记·五帝本纪》亦与《山海经》同说。他如《列女传》、《尚书伪孔传》、《淮南子·齐俗训》、《国语》韦昭注、《水经·湘水注》，皆载舜葬苍梧事，后人果于零陵造为舜陵。因舜葬之故，而南方苍梧之名，遂益昭著矣。《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新出里耶秦简十六·五正：

> 二十七年二月……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中国历史文物》二〇〇三，一）

始皇廿七年已置洞庭及苍梧郡。广州南越王宫署出土陶文，有“苍梧”印。（见附图）

---

① 《湘阴县志》。
② 《一统志》。
③ 《归州志》。
④ 杜甫《最能行》。
⑤ 《寰宇记补阙》六。

汉有苍梧王赵光，后平南粤，以其地为苍梧郡。《汉书·地理志》："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盖因秦郡之旧。

东方亦有苍梧。《海外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东海临朐县东，世传此山自苍梧从南徙来[1]。上皆有南方物。"《水经·淮水注》："东北海中有大州，谓之郁州，《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2]。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赋》言郁州者，故苍梧之山也。"《舆地广记》本此，谓郁州山，一名苍梧。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旧注以苍梧为交州郡。[3]吴仁杰独谓"零陵在长沙南，不得云左，以为相如用郁州之苍梧"[4]，甚为有见。《离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予至乎县圃。"洪兴祖以九疑苍梧说之，游国恩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下文接言'发轫苍梧'；及乎巫咸将降，又言'九疑并迎'，即放于江南之明征。"予谓"发轫苍梧"，乃假设驰骋之辞，与济沅、湘事无涉；盖即所谓"将往观乎四荒"之一事也。发轫苍梧之上文为："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予上征。"是其明证。观其对文县圃为西方地名，试以"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极"句例之，苍梧亦不妨指东方郁州之苍梧山。

《山海经·海内东经》："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墟东南。"此非南海苍梧，盖西方之苍梧也。以白玉山例之，此苍梧亦山名也。

综上所述，东西南方之苍梧，皆为山名，又东方之苍梧，或谓其由南海苍梧徙来，足见此数苍梧，虽异处而实是一事，而传说歧出。今按汉初马王堆地形图，九疑山上记有"帝[illegible]（舜）"二字，即指舜陵所在。近时于其地进行发掘，在宁远县瑶族乡发现陵墓遗址，初步探测，占地约三万二千平方，规模十分宏大。《史记》称舜"崩于苍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汉以前已有舜陵之建。然则屈原所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亦有所实指也。

方林考

《涉江》："步予马兮山皋，邸予车兮方林。"王逸《章句》："方林，地

---

① 刘昭《郡国志注》引，无"从南"二字，郝以为衍文。

② 中引郭注略。

③ 文颖及李周翰同。

④ 《两汉刊误补遗》六。

名。"《文选注》吕延济亦曰："方林，地名。"而不言所在。今从其上文"旦予济乎江湘"及下文"乘舲船予上沅"言之，方林之地，自在湘南。《续汉郡国志》："武陵郡有作唐城。"盛弘之《荆州记》："零陵东接作唐。"[①] 王粲《赠士孙文始诗》："悠悠淡、澧，郁彼唐林。"李善注："唐林即唐地之林也。"[②]"唐"、"方"声近，方林或作唐林，此可为一说也。

钱穆以《汉志》"南阳叶有长城，号曰方城"，谓方林即方城之野[③]，此又一说也。

今按"方城"之说，与本文地不合，可弗论。唐林之说，仍是迂曲。考《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狌狌在舜葬西。"是氾林在湘南。[④] 氾林即方林也。《海内北经》："昆仑虚南所有氾林三百里。"毕沅以为即《淮南子·坠形》之樊桐，《广雅》之板桐。郝氏从之。然考《河水注》引《昆仑说》云："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樊桐为山，与氾林不类，不宜冒为一事。[⑤] 又《海外南经》："狄山……其范林方三百里。"郭注曰："林木泛滥布衍也。"又《海外北经》："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东，州环其下。"

"范林"即"氾林"。《山海经》四言之，皆云"方三百里"，足见其同为一名。方有溥义，故城之大者谓之"方城"，而其山曰"方城山"。[⑥] 林之广布者谓之"方林"[⑦]，"氾"、"范"、"方"音同通假，故"方林"亦称"范林"，亦称"氾林"，"方林"本为通名，即凡林木泛滥布衍者可有是称。故昆仑、苍梧、狄山、三桑间皆有之，其初非专有之地名也。《涉江》"方林"从其对文"山皋"言之，但指广林而已，未必为地名；若乎求其所在，则以《海内南经》之"氾林"当之最合。

---

① 《文选》二十三李善注引。《寰宇记补阙》六安乡县，汉孱陵县地。后汉建武十六年分置作唐县。

② 《水经注》："江又东迳作唐县，北合涔水，又东南流注于澧水，又东淡水出焉，澧水又南经旧郡城东；东转迳作唐县南，又东迳安南县南，淡水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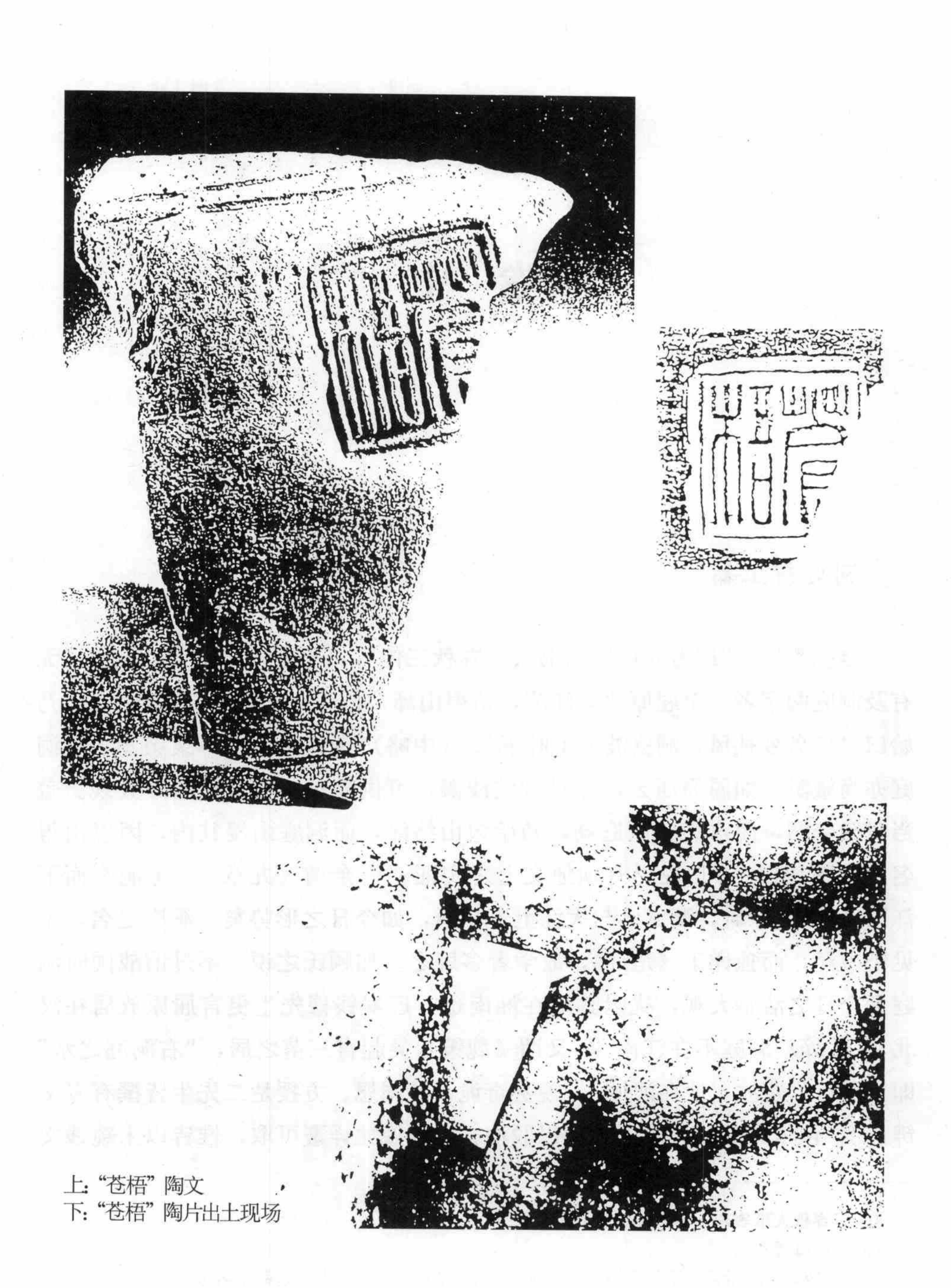
③ 《楚辞地名考》。

④ 郭注："今交州封豁出狌狌。"郭注《尔雅》："交阯封豁县出猩猩。"

⑤ 《楚辞·哀时命》："望阆风之板桐。"顾实《穆传西征讲疏》："板桐即氾林，则昆仑附近多林村。"按此处板桐，仍宜为地名，顾说非。

⑥ 《续汉郡国志》："南阳郡叶有长山曰方城。"《左传》："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以方城与汉水对词，则方城为山可见。杜预曰"方城山在叶县南"是也。

⑦ 见郭注。



上:“苍梧”陶文
下:“苍梧”陶片出土现场

卷 中

洞庭辨上篇

顾栋高曰："遍考《诗》、《书》、《春秋三传》，《职方》、《尔雅》之文，无有及洞庭两字者。至屈原放废江滨，彷徨山泽，作为《九歌》，抒其愤懑，乃始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中略）意其时非特不隶版图，且洞庭亦尚微渺。如屈原所云，亦是微波浅濑，可供爱玩，无今日浩渺大观。盖当时云梦涸，而水悉归洞庭湖，乃始包山络泽，而洞庭山浸其内，因以山得名。"[1] 王庸曰："是说仍有须地文上之实证。"[2] 余谓《九章》"上洞庭而下江"，则当屈原时，洞庭已与大江上下相通，如今日之形势矣。洞庭之名，不见于古经，而独详于《楚辞》，故学者多疑之。如顾氏之说，不过谓战国时洞庭无今日之浩渺大观，犹以其地在湘南也。近岁钱穆先生更言屈原放居在汉北，《楚辞》洞庭不在江南。[3] 又谓《魏策》吴起言三苗之居，"右洞庭之水"即《禹贡》荥波，地在河域。[4] 说甚奇诡，游国恩、方授楚二先生皆撰有专文辨正[5]，俱依《楚辞》本文，加以驳诘。而游说尤详覈可取，惟皆以未窥钱文

---

① 《春秋大事表四·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

② 《四海通考》。

③ 见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353 页；《清华学报》九卷三期《楚辞地名考》。

④ 见《燕京学报》十二期《古三苗疆域考》。

⑤ 游文见《读骚论微初集》，方文见《禹贡三周年纪念专号》。

之全，凡厥所论，不能尽中其失，故钱君于答方君文，仍甚肯定其说，今略陈鄙陋之意，愿高明商榷之。

《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此洞庭在悼王时已属楚，故苏秦说威王曰："楚南有洞庭苍梧。"[①] 如苏秦所述，时洞庭在楚南，自即今江南湘域之洞庭也。悼威时，楚境已及今湖南南部，故顷襄之世，屈原得放于江南辰溆间。辰溆地近巫黔，蛮夷所聚，盖楚臣迁谪之地，原放臣，故流窜于此。[②] 《涉江》有"哀南夷之莫吾知"之叹，南夷，即泛指楚南之夷。[③] 尤足为其时迁在江南之证。苟谓原放居在汉北，则汉北乃楚都邑会聚之区，固不应为贬所。况《离骚》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九歌》云："九疑缤兮并迎。"并指江南之舜迹，是原放逐，在沅、湘之南，近于九疑苍梧之野，可无疑义矣。由是言之，《楚辞》洞庭，自在江南，证之苏秦之语，则战国时楚洞庭之地望当即今日江南洞庭又明甚。钱先生说战国时洞庭在江北，而未稽苏秦此语，何不征之甚耶！此应明辨者一。

钱先生论江南洞庭之由来云："盖汉北洞庭，沅、湘诸水之名，至汉初乃迁至湖南。"[④] 厥意以为江南之洞庭，汉初始由北人南迁，肇锡嘉名。不知战国时人苏秦论楚域，已有"楚南洞庭"之目。又《吕氏春秋·本味》云："鱼之美者，洞庭之鲋。"高注："洞庭江水所经之泽名。"此亦战国时人言江南之洞庭者，足与苏秦语相印证，乌得谓江南洞庭之名肇自初汉时乎？《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又云："沅水出象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嶲，西合洞庭中。"《海内四经》虽非作于战国，然最迟必汉初人之所造，其言沅、湘二水注入洞庭，则其时湘域洞庭为众水所潴成之大泽，气象固如今日。《淮南子·人间训》："江水之初出于岷山也，可攓衣而越也；及至其下洞庭，骛石城，经丹徒，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高注："洞庭在长沙，石城在丹阳。"由是观之，初汉时洞庭非无浩渺大观；战国去汉初未及百年，地文上必无剧变，则屈原时洞庭自非微波浅濑，又足征《九章》"上洞庭而下江"一语之为记实，与顾栋高说为虚揣矣。此应明辨者二。

---

① 见《楚策》及《史记·苏秦列传》。

② 参看《江南解》。

③ 旧解释为楚，殊误。游国恩辨之，而谓即指吴起所言之三苗，尤失之专指。

④ 见《答方授楚》文。

屈赋言洞庭者三：

（一）《九歌·湘君》云："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钱先生释曰："自大江北征，而邅道于洞庭，洞庭固在大江之北也。"[①] 近又变其说，谓："大江即湘，湘即汉水，益证屈原放在汉北。"[②] 予按：《湘君》文言"沅、湘无波"、"江水安流"，湘与沅联称，与江分别为言甚明，江自为江，湘自为湘，本文已显，可毋庸论。涔阳亦不得指汉北，涔为涔澧之涔，非沱涔之涔。予别有辨。[③] 此处涔阳，钱解殊误，游国恩辨之详矣。至谓屈原放在汉北，亦非；原迁江南，史公、叔师皆云然，贾生与原年代相迩，谓"待罪长沙，造托湘流，敬吊先生"，尤明确可信。刘向《九叹·逢纷》云："驰余车兮玄石，步余马兮洞庭，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兮石城。"洞庭苍梧，证之苏秦语，在楚南，不待言；玄石石城，王逸曰"山名"，《太平寰宇记》："玄石山在华容县。"[④] 石城，高诱《淮南注》"在丹阳"，是并江域地名，则刘向不以屈原迁于汉北也。又《远游》云："见南郢之流风兮，殒余躬于沅、湘。"又《思古》云："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沅、湘而远迁。"又云："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则明指放在南郢、沅、湘之间。《越绝书》十五："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自沉湘水。"南楚正犹南郢，《史记·货殖传》："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此云沉湘则南楚谓长沙无疑矣。由是知初汉人固无不以屈原放在江南者，盖其事实昭在人之耳目，故载述皆同。而钱先生乃谓："贾生侧闻屈原自沉汨，为出乎行道传闻者。"诚异于我人所闻矣！

（二）《湘夫人》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钱先生释曰："此绝非江南洞庭湖水广员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其中之所有也。"此本顾栋高说。张云璈《选学胶言》亦谓："屈赋言洞庭，详玩辞意，似属微波浅濑，可以眺玩。"按顾说之误，予已辨之，五百里洞庭，安得无袅袅秋风萧萧木叶乎？注言："秋风疾则草木摇，湘[⑤]水波而树叶落。"是也。游国恩亦已论之。[⑥]

---

① 《楚辞地名考》。

② 见《答方授楚》文。

③ 请看拙作《涔阳考》。

④ 《古逸丛书》本。

⑤ 《御览》二五引作湖，是。

⑥ 详《读骚论微初集》。

(三)《九章·哀郢》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钱先生释曰:"洞庭在北,称上;大江在南,称下。"又曰:"自郢泛汉,洞庭在北,居上游,故曰上;大江在南,居下游,故曰下。"按上篇为屈原东迁之作,盖自郢浮江东下,所谓"路贯庐江",即是时也。蒋骥说曰:"自荆达岳东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以洞庭为上,而江为下。"其说是也。游国恩论之尤详,今不赘。

核诸《楚辞》言洞庭者,钱说亦未合,可知旧说非轻易而得推翻也。

钱先生论洞庭在江北,自谓切证乃其所著《诸子系年》,《楚辞地名考》所举《国策》、《韩非》、《史记》"秦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诸文之互证,然细审其说,究亦疏舛,盖此洞庭仍在江南。别详《说五渚》、《江南解》。

《山海经·中次十二经》有洞庭之山,钱穆据此定古洞庭之泽应在楚之随阳右壤,当今湖北安陆应山一带,其水脉与云梦相连。考《中山经》原文云:

(1)《中次十二经》洞庭山之首,曰篇(或作"肩")遇之山。

(2)又东南五十里曰云山,无草木,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

(3)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多扶竹。

(4)又东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

(5)又东南五十里曰风伯之山[①]。

(6)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②]……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采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

(7)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③]。……

(8)又东南一百八十里曰桑山[④],其木多棕楠荆芑竹箭䉋箘。

(9)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

(10)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尧山。

(11)又东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

① 《初学记》作风伯之山。

② 《释义》本作大夫之山。

③ 按《初学记》八《江南道》十引作洞庭山,帝女居之,其上沅、澧之交,潇、湘之源,是在九江之门。

④ 《文选·鵩鹏赋》注引作景山。

(12) 又东二百里曰真陵之山[①]。

(13)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阳帝之山。

(14)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

(15) 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②]。

此为洞庭山山系。洞庭山，或以巴陵洞庭湖之君山说之[③]；或以太湖之包山说之[④]，或以应山县一穴中洞庭山说之[⑤]，群言淆乱，故所属诸山，解者亦不同其说。如山首之篇遇山，其据巴陵之洞庭立论者，谓即偏于洞庭东北部之艑山[⑥]；其据应山县洞庭山立论者，则谓即随阳西畔之偏头山[⑦]。他如柴桑之山，阳帝之山，柴桑，郭《注》："在寻阳柴桑县南，与庐山相连。"《广舆记》："柴桑山在（九江）府城西南。"此最有实地可指，小川琢治因据柴桑又北九十里，推知"阳帝"即今大冶铁山之南阳辛河近旁之山，而疑"帝"字乃"辛"之误，洞庭山系诸山可考见者略如此。是山系所及之疆域，小川琢治据巴丘洞庭寻阳柴桑推测之，谓自湖北南部沿长江过江西北部以及于安徽；钱穆据应山洞庭推测之，则谓诸山尽在江北。今按所据之山，惟柴桑山在寻阳无有可疑，至洞庭山则颇难说。如谓为太湖包山，则经明列于柴桑之上，在柴桑西北千零四十九里，不应反在寻阳东南[⑧]；若谓为应山县之洞庭山，又与经文"澧沅之风，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弗合；若以为巴丘洞庭之君山，则又为湖中之山，其与篇遇山之间，东南五十里有云山，又百三十里有龟山，又东七十里有丙山，又东南五十里有风伯之山，又东百五十里有夫夫之山，道里亦不合；若指艑山即篇遇山，又遥在西南沅江上流，次从洞庭之山，至阳帝之间，距离又似失之太远。小川琢治主洞庭即巴丘说，而疑其不合于经，谓："恐是中州人士，未谙边裔之地，故所举地理，不能正确。"今按小川说，虽亦出乎推测，仍较上两说为胜。《山海经》所记道理方位，多未正确，自不

① 《初学记》作直陵。
② 郝曰："才一千八百四十九里。"
③ 郭璞注，毕沅《新校》正从之。
④ 郝懿行《笺疏》。
⑤ 吴任臣广注引刘会孟《评山经》。
⑥ 日人小川琢治说，见《山海经考》。
⑦ 钱穆《楚辞地名考》。
⑧ 按今江西景德镇东北有洞庭山，在柴桑之东，亦不得以《中山经》之洞庭当之。

可讳；苟定洞庭山即巴陵洞庭之君山，则篇遇山又不得为艑山，常为另一山矣。或疑巴陵之山，不得列《中山经》，然予考之《中山经》，实有西南之山存在，故此洞庭山仍以在巴陵洞庭为正。谨列证以明之。

（一）经载："云山有桂竹。"郭注："今始兴郡桂阳县出筀竹，大者围二尺，长四丈。"郝氏《笺疏》云："《吴都赋注》引《异物志》：'桂竹生于始兴小桂县，大者围三尺，长四五丈。'""龟山多扶竹。"郝曰："刘逵注《蜀都赋》云：'卭竹出兴古，盘江以南，竹中实而高节，可以作杖。'""丙山多筀竹。"郝曰："筀亦当作桂，桂阳所生竹，因名。""𣝗山竹箭𥳓箘"，戴凯之《竹谱》云："箘簬二竹亦皆出云梦之泽。"此从产物言之，洞庭山系当及湘南。[1] 证一。

（二）经载篇遇山，郭注：或作"肩"，小川琢治曰："郭注实或作'扁'。因'肩'、'扁'形近而误，《淮南子·地形训》：'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想即篇遇之山，位置虽不能明，而所举当为西南边裔之山。"按以声音相近推之，小川琢治说实可信。经又载"江渊"，考张衡《思玄赋》注引作"江川"。《水经》："赣水……入于江。"注云："大江南赣水……会注于江川。"以此例之，江川即指大江，下文又有江浮之山，名曰"江浮"，当在江域，以江渊及江浮之山证之，洞庭山系不应在江北可见[2]，又载潇湘之渊。[3] 澧沅之风，亦在湘境[4]，又载九江，九江早见于《禹贡》，昔贤所释，有二说，一以为在庐江寻阳者，《汉书·地理志》、《续汉郡国志》主之，一以为在长沙下隽者，《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主之，然《禹贡》九江，所谓"过九江至于东陵"者，即《山海经》之九江，当指长沙下隽间者也。[5]《楚地记》云："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是也。"此与寻阳九江殊地，郭注《中山经》九江以《禹贡地理志》寻阳之九江为说，实纰缪也。又《经》言尧山，《初学记》二十四引王韶之《始兴记》云："含洭县有尧山"，亦在今湘南。此从地理言之，洞庭山系当在江湘之境，证二。

（三）洞庭山言"帝之二女"。即指舜二妃，帝尧之二女，亦即《楚辞》

---

① 古云梦南至洞庭。

② 钱穆曰："江渊即潇湘之渊。"不知潇湘之渊"渊"当作"浦"，且经明以潇湘与江渊分别为言，不应冒为一。

③ 《水经·湘水注》引作"浦"，胡渭从之，是。

④ 详《水经注》，钱穆说在江北，按非，见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论屈原放死》及《楚辞地理》篇。

⑤ 别详拙作《九江新考》。

所歌湘夫人也。考《始皇本纪》："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之女，舜妻，而葬此。'"是自秦时已目湘水之神为舜妃。《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又云："九疑缤其并迎。"《九歌》湘君、湘夫人亦寄托舜与二妃事[①]，则帝舜及二妃之传说盛于江、湘之间，屈原时已然矣。推之，《五藏山经》之时代，当有此故事流传，故作者叙洞庭之山为采入耳。汉后之书，载此传说者，如刘向《列女传》："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湘夫人也）。"[②]《礼记·檀弓》："舜葬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郑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王逸《楚辞章句》释湘君之首云："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张衡《思玄赋》："哀二妃之未从，翩缤处彼湘滨。"《博物志六·地理考》："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荆州图经》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水经·湘水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凡此诸说虽略有同异，然二女之为尧女，死于江湘则同。游国恩谓此乃湘水之神，民俗相传，附以舜事，甚为有见。[③] 由上所论，知二女传说之地望，亦在湘域。《拾遗记》十："洞庭浮于水上，其下玉女居之，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游国恩谓此殆本《楚辞》"吹参差"事，盖此洞庭山亦指巴陵洞庭君山者，故记又曰："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诎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是已。此从故事言之，证三。

观上举三方面之证，知此山系仍以在江、湘之域为正，则《中山经》洞庭山之为君山，说近是矣。

《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又《至乐》："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钱穆亦谓此洞庭当在江北，而不言所以然。窃亦有疑。夫黄帝行迹，史公谓其"南至于江，登熊湘"。汉时传说，固谓其曾及江域，《管子》："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④] 或谓当征三苗时，无论此文是否伪托，然战国时，关于古帝王故

① 说见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

② 案此四字据王圆照《列女传补注》增。

③ 详《论九歌山川之神》篇。郭璞以为二女乃天帝之女。顾炎武《日知录》亦谓湘夫人不为尧女。盖湘夫人与尧女，本为二事，而后人傅会为一也。

④ 又见《御览》八十一引《符子》。

事之地望，亦有言及于江南洞庭者，犹《离骚》言舜事在沅、湘、九疑也。推之，庄周言黄帝张乐于洞庭，谓为指江南之洞庭，何曾不可。惟在另一方面论之，周年代去黄帝辽远，所说仍止为传闻，不尽实录；周又擅为寓言，黄帝此事，或虚设假楚地名言之，未可知。[1] 观《天运》此语，上下文未有与江南江北有关之地名，则欲断其所言洞庭在江北或在江南，良难推定。若徒以不信黄帝足迹不当及于江域，而必谓《天运》之洞庭应在江北，殊无明证。夫不能证出《天运》文所说之洞庭必指江北，又安知周意不指江南乎？此非起周于地下，乌能定之。且洞庭二字，成玄英疏云："洞庭，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也。"则不以为地名。是《庄子》之洞庭是否地名仍成问题，不应遽定其地望也。予意不如阙疑。《文选》谢元晖《别范零陵诗》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李善注正引《庄子》说之。吕向曰："洞庭山名，黄帝奏咸池之乐于上。"则以张乐在湖南洞庭矣。然此后人牵合之说，亦不足信也。

洞庭辨下篇

钱先生所以执此洞庭必在江北者，其理由：

（一）"凡称野盖以水草沮洳而兼陆土，犹如潘党之猎麋于荧泽，此皆河域有之，洞庭称野，必在河域。"按野乃泛称广远之处，其字古训郊外，凡辽廓之地皆可称之，非言沮洳有土者也。南方有苍梧之山，故有苍梧之野；有畴华之泽，故有畴华之野；他如九野、天野[2]、天穆之野[3]、大乐之野、大遗之野[4]、呕丝之野[5]、阪泉之野[6]，皆以其地有原野，故以野称之。[7] 高诱注《齐俗训》："三苗之国，在彭蠡、洞庭之野。"高意彭蠡洞庭当指在江南之泽。《舆地纪胜》七十荆湖南路引《彭山庙碑》："崇山连天，外界越巂，冈阜靡迤，如舞如驰，遏千里之势于洞庭之野。"此指湘域洞庭之野，可见称野非河

---

① 战国时，楚有洞庭之名，已无疑义。《经典释文》称庄子书，凡诸巧杂十分有之言，有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足见其说不足尽信。

② 《海外西经》。

③ 《竹书纪年》。

④ 《海外西经》。

⑤ 《博物志・异人》。

⑥ 《史记・五帝纪》。

⑦ 《史记正义》："按曰：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余可例推。

域所专有甚明。

（二）则谓："野非所语于浩汗黏天日月出没之江南洞庭。"不寤洞庭之野，乃指其湖附近空旷之地，湖泽不可栖止，称野乃指近湖之域耳。《潜确类书》云："合九江五溪而汇为一湖，则洞庭张乐之地，殆不可以道里计，春则雪消水来，溢为洪波，冬则水落石出，涸为平野。"[①] 此以张乐之洞庭必在湖南，自属果断。至陈仁锡释野字仍嫌牵强，夫冬日虽水涸，必不能尽全湖以成野；足见不得以水涸为野，以为"野"字解释也。

钱先生又以通名之例说洞庭曰："凡水之潜行暗达地脉相通者，俱可有'洞庭'之目。其先起亦在大河之域；以洞庭二字之声义，及《魏策》吴起言三苗疆域四至求之；河域洞庭，即《禹贡》荥波，语音转讹，遂为洞庭，而乃以被之江南。"予考洞庭之为荥波，征之古籍，殊无明证。况《魏策》左右之说，不尽可据，则钱说殊难成立。[②] 洞庭为地穴通称，钱先生所执有力证据，惟郭璞语。考《海内东经》"湘水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无所不通。"按今核其文，洞庭实为专名。云"洞庭地穴"者，谓巴陵之洞庭为地穴也。云"洞庭穴道"者，谓太河有名洞庭之地穴也。郭意在解释两地有洞庭名者之现象为地穴，非谓凡地穴皆可以洞庭称之也。郭注与周处《风土记》说同。《风土记》"洞庭地穴"作"洞庭地脉"。顾启期《娄地记》："太湖东边别小山名洞庭，其山有三穴，有潜门二道，北通闰瑯琊东武县，南通长沙巴陵胡。"山谦之《吴兴记》："太湖中有巴山，傍又有小山，山有石穴，东南入通洞，深远莫知所极，名曰洞庭。"又曰："乌程县有穴，通包石洞庭。"[③]《初学记》八引《玄中记》："吴国西有具区泽，中有包山，有洞庭。"凡此皆言太湖地穴之称洞庭也。《北堂书钞·地部·穴篇》载地室水脉相通者，太湖、巴陵外，无有以洞庭为名者，足见洞庭之为专有地名，实起于江域也。《说文》洞本训疾流，洞训空洞，后起之义。洞庭既不得为水有地室者之通称，则其据是谓荥波即古洞庭，洞庭乃荥波音讹者，其为臆断，不待辨矣。

钱先生据《魏策》讹文，定河域有洞庭，其引证较有实地可指者，为《淮南子·本经训》"尧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一文。钱依洪亮吉"畴华即

---

① 又嘉庆《常德府志》五洞庭条"张乐洞庭之野"下引。

② 别详拙作《三苗考》。

③ 俱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引。

《国语》‘依畴’、‘历华’二地”之说，谓即春秋郑地在河域者，不知洪说实误。按《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人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毕沅曰：“此似释《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也。”寿华即畴华，实为一地，不得在河域而在南荒甚明，故高诱注曰：“南方泽名。”又凶水，高注：“北狄地。”青丘，高注：“东方泽。”按青丘见于《吕氏春秋·本味》、《逸周书·王会》、《山海经·南山经》、《海外东经》，实非处中国之境，而钱先生独就高注“东方”二字解云：“古称东方皆齐鲁一带，则此两地亦在河域。”然此但从青丘说之，于北狄地不应弃而不言。桑林，宋地[1]，即桑山之林。[2] 虽在河域，然不得以此一地在河域，而推言寿华、青丘、凶水等亦在河域，又推而言之洞庭亦在河域，无以实之，强指为荥波。不知《淮南子》所言，诸神话地名，除桑林外，皆指夷蛮戎狄之地，不应随意纳于河洛之间。所谓“断脩蛇于洞庭”，洞庭，高注“南方泽名”。证以《海内东经》“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正合。故断蛇故事，旧说在巴陵。《寻江记》：“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谓之巴陵。”[3]《禹贡锥指》：“巴丘山在岳州府城内西南隅，亦名巴陵，又名天岳山，《水经注》湘水北至巴丘山人江是也。”胡以为《寻江记》事涉诞妄，郭景纯《江赋》所称巴陵地道，则指此山。按巴陵得名之由，当因于巴丘山，惟江域洞庭悼王时始入楚版图，其前尚为南蛮，淮南取以比况，其弗为河域地名，盖断然耳。

新出湘西里耶秦简，言及“洞庭郡”者多处，举例如下：

迁陵以邮行洞庭（《里耶简选粹》六·二）

卅三年四月……衷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同上九·四正）

盐戍洞庭郡……（同上九·五正）

具见秦人已置洞庭郡，此一新知，可以纠正以往诸误说。

① 见左襄十一年《传》，又《墨子·明鬼下》。

② 《淮南子·修务训》。

③ 《元和郡县图志》二十六同。

说五渚

《燕策》："秦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①] 汶者，岷江；江者，长江；而浮汶所在，程恩泽以为当在成都一带，是也。[②] 巴者，巴江，其流在渠县会渠江，以入西汉水，即嘉陵江，《策》言汉中之甲，出巴，下汉，即指自南郑出巴江而经西汉水也。巴江为西汉水上流，则所称汉为西汉水无疑。苟谓为东汉水，则东汉水上流，无称巴者，可以知其不然矣。惟《策》言"下汉而至五渚"，五渚，鲍注引《史》注云"在洞庭"，则是下汉必经大江，而后达五渚，《策》文略去江而不言者，谅为辞句整洁，避复见之故耳。[③] 程恩泽亦谓汉即西汉水，说曰："由汉中浮巴，至合州，乃合西汉水直达洞庭也[④]。其必由巴入西汉者，巴近而西汉远，兵贵速且贵奇也。若是东汉，则由沔县迳褒城、南郑城、固洋县、西乡、石泉、紫阳、洵阳、平利、白河入湖北界，即可抵楚之郧阳、襄阳诸府，不必绕道巴江矣。"[⑤] 知汉常为西汉水，则《史》注谓五渚在江域洞庭，自无弗合。

五渚所在，《水经·湘水注》亦云："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之左，迳鹿角山东，右迳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石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则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湘水又北迳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战国策》曰：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舆地广记》[⑥]、《通鉴地理通释》[⑦]、《舆地纪胜》[⑧]，并主是说。裴骃《史记·苏秦传集解》，亦因《国策》有"袭郢取

---

① 《秦召燕王章》。亦见《史记·苏秦传》，《江陵县志三·方舆山川》江水条。

② 《国策地名考》二汶水条。

③ 因上文言乘夏下江故。

④ 五渚在洞庭。

⑤ 《地名考》二汉条。

⑥ 二十八。

⑦ 《十道山川考》。

⑧ 六十九荆湖北路。

洞庭五渚”语，谓五渚在洞庭，按此即鲍注所谓《史注》者也。[①]

此所引，为《秦策》。其原文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东伏于陈。”[②] 是“五渚”本作“五都”，与郦《注》裴《解》引并异。注云“《续史记》引作五渚”，则作五渚异文，亦有明征，非徒见郦、裴所引也。韩非《初见秦篇》与《秦策》此章尽同。[③] 而“五渚”别作“五湖”。吴师道曰：“《策》既言袭郢，而五者，郢在其中，‘都’字必误，当从韩。”因谓五湖即太湖。张琦《国策释地》上亦曰：“五湖即太湖，在苏州府西南三十里。”然秦袭郢，兵力必不远及吴地。故程恩泽以为非也，谓“五都”或者“五渚”之讹。[④] 杨守敬《战国疆域图注》从之。清世校勘家黄丕烈、卢文弨、顾广圻、王先慎辈，皆不韪吴说，则谓《秦策》“五都”，即《燕策》、《苏秦传》之“五渚”，“都”、“渚”同字。予按“都”、“渚”、“湖”音同通用。《山海经·中次三经》：“和山实惟河之九都。”郭注：“九水所潜，故曰九都。”日人小川琢治谓九都即黄河九渚。[⑤] 都之为“渚”，斯亦其例。《风俗通》：“湖，都也，流渎四面所隈都也。”是五湖即五都，既非太湖，亦非“渚”字讹也。都字今写作“潴”，亦作“豬”。[⑥] 故五渚或作五潴[⑦]，又或作“五豬”[⑧] 也。

今本《策》文“五渚”作“五都”，鲍注释曰：“五都，即丹阳、江陵、郢、都与鄢。”盖以指楚之国都。吴师道驳之曰：“怀、襄之世，仍都南郢，其后徙陈又徙寿春，实不止五都。”程恩泽则说都为都会，谓即巫郡、上庸、西陵、夷陵、鄢郢。今按《策》明言“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察其攻取之势，先捣其国都，后即吞灭其附近之地。考《秦本纪》，楚北部之南阳、鄢、邓，西南部之黔中，昭王二十七八年，已为秦得；至二十九年，白起破郢，

① 《初学记》七地部下五渚条引《史记》作裴骏注，“骏”为骃字误。

② 《张仪说秦王章》。

③ 一作张仪，一作韩非者，吴师道曰：“张仪误，当作非。”考仪以魏哀王九年卒，当秦武元年，楚怀十九年。白起破郢，在秦昭二十九年，楚顷襄三十一年，时仪死已三十余年，自不见秦破郢事。谓仪固非，谓韩非亦无确证。详容肇祖《韩非子考证》。

④ 《地名考》六五都条注。

⑤ 《山海经考》。

⑥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三：“都是本字，豬是同声假借，潴则俗加水旁。”按郑注《檀弓》：“豬、都也，南方谓都为豬。”《周礼·稻人》：“以豬畜水。”又如孟诸，一作明都，一作明豬。诸、都、豬，皆音近字通。

⑦ 陈士元《江汉丛谈》二三楚条云：“《国策》秦与楚战取洞庭，五渚者，九水中惟沅、湘、溆、资、澧五水最大，故称五渚。”按此说以溆水代微，又别人一资水，与《水经注》异，不知何据。

⑧ 《太平寰宇记补阙》引《水经注》。

故荆王东伏于陈。《秦纪》，取江南在昭王三十年，取郢在二十九年，取郢在取江南之前，与《秦策》先言袭郢，继言取洞庭、五都、江南，先后正合。故若以五都为五处都会，如程氏所说，则秦袭郢后，即取洞庭，后分兵取巫郡、上庸、西陵、夷陵、鄢郢；然上庸鄢西陵之被拔，已在袭郢前，不应反在郢被拔之后，是其不应入五都之数明甚！于时事既乖迕，则解五都为五处都会，实望文生义，非的论矣。据上所说"都"与"豬"、"湖"、"渚"字通，则五都之即五渚，亦即五湖，灼然甚明。鲍氏、程氏盖不谙字通而误说也。

据《水经注》，五都[1]即入洞庭之五水，以其同注洞庭，故或以为洞庭别名，然实后起之说，胡渭《禹贡锥指》曰："九江，至春秋时为江南之梦，战国时称洞庭五渚，《韩非子》谓之五湖。"又引《巴陵旧志》云："洞庭一名五湖，又名三湖。"顾祖禹《方舆纪要》："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或谓之九江，或谓之五渚，或谓之三湖，又谓之重湖。"是即以五渚或五湖为洞庭也。《史记·苏秦传索隐》："或说五渚即五湖"，意谓韩非之五湖，即《秦策》、《史记》之五渚，而后若吴师道、张琦，乃以为指太湖，谬矣。[2]

吴南屏曰："郦注'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者，谓资、沅、微、澧四水，与湘而五也。原其意，盖谓渚为潴。或以每水之口，必有州渚，窃谓《楚辞》'帝子降兮北渚'，北渚当即君山，所谓五渚，当以东西南北中言之，君山在北，为北渚，则艑山东，磊石南，明山西，团山中也。要之，五渚，洞庭之别称，犹九江矣。"[3] 案，《索隐》："五渚，五处州。"此即释"渚"为州者也。《岳州府新志》："沅水称鼎江口者，一谓之横房口，五渚之一。"[4] 此即释"渚为水口者也"。吴氏据渚即州渚说，以君山、艑山等，配合有五数，故取以当五渚厥说甚新，然《楚辞》北渚，未必即君山，指渚为山，恐有未当。予谓五渚实为地名，滨洞庭湖，因五水而赐号者。《秦策》高诱注："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是其证，细审《策》文，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此处洞庭五都，当非指湖泽，江南亦非泛称地名，江南为邑

---

① 即五湖、五渚，下同。

② 朱凤起《辞通》四："洞庭亦五湖之一。《集解》云，五渚在洞庭。是即五渚即五湖矣。"而引《汉书·地理志序》："吴有三江五湖之利。"《吕览·长攻》："夫吴之与越……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楚辞·九叹》，就申胥于五湖诸语，按所言之五湖乃为苏州之太湖。朱盖误以《楚辞》之洞庭为太湖之洞庭也，今附为纠正。

③ 同治《巴陵县志》一。

④ 《图书集成》二百九十九引。

名，予别有考。[1] 洞庭即古巴丘之号。[2] 则五渚为五水入洞庭处之邑名，亦何疑乎，此盖假水名为地名者也。惟五渚为楚南绾毂之口，所谓乘夏水下汉，四日而至五渚，秦人以之与郢都齐况，则其地滨江，为楚南要津，位置之重可知，是五渚之非虚指五水，或五处州，当为邑名，如高氏所注，又审矣。

由上所论，五渚、五都、五湖皆同一义，本为五水，亦为邑名，在湘域，与洞庭江南两邑相迩也。

五渚亦有异说，《索隐》引刘伯庄[3]云："五渚，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吴师道《国策鲍注校正》云："今详本文，下汉而至五渚，则五渚乃汉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不悟汉不得为东汉水，乌得言在汉域，近人钱穆论洞庭在江北，据刘说为证释《秦策》云："袭郢用兵，主力所趋，自郢而北，取洞庭五渚，自郢而南，则取江南，若洞庭即今地，则秦人用兵，自西而东，应曰江南洞庭，不得曰洞庭江南，且不得偏趋于郢南，而不及郢北。"[4] 不知秦兵自江东下，先及郢都，而郢北上庸、鄢、郢早为秦得，故用兵不及郢北，亦势所必然。洞庭五渚江南，为郢西南扼要之地，秦人必欲尽有之，故兵力偏趋于此，亦势必然。秦昭三十一年楚襄王西进兵，复秦所拔江旁十五邑，是两国交兵，其重视郢南之地，可概见矣。《华阳国地·蜀志》，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是秦盖自巴、蜀出兵，循江而下，郢滨江，故先受袭，洞庭五渚，江南诸邑，在郢南，故见取稍迟，《策》叙取洞庭等在袭郢后，记载甚分晓也；至云应曰江南洞庭，不得曰洞庭江南，不悟两邑地望相近，故随意为言，固弗必泥也。

江南解

《史记·货殖传》："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

① 见《江南解》。

② 《方舆纪要》七十五引《旧志》谓洞庭即巴丘。嘉庆《常德府志》五《山川考》引同巴丘为湖名，亦为邑名，而洞庭为湖名，未必非邑名，有彭蠡泽因有彭泽邑，则有洞庭湖，安得无洞庭邑乎。孙吴初作巴丘邸阁后置巴陵城，证诸巴丘即洞庭。则此当为古洞庭邑地。

③ 《史记地名》。

④ 《楚辞地名考》。

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又云：“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中略）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中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中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本；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水经·淮水注》：“文颖曰：‘《史记·货殖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是所谓三楚者也。”徐广《音义》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以为江南，郡名，张守节《正义》非之曰：“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又曰：“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为楚也。”近人贺次君曰：“江北之衡山国、九江郡，及江以南之豫章郡、长沙郡等地，是南楚之范围。”① 此二说皆以江南为泛称地名。然《史记》本传，衡山九江之上，明无“淮南”或“江北”之文，不应以豫章长沙上有“江南”二字，而从为之辞，张氏贺氏之说，实并增文足义；且以传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等句例之，“江南”二字，夹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地名间，似亦当为地名，不宜独为泛指，然再参核本传，既云“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又云“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又似江南可赅长沙豫章，而本传之与山西、山东比况之江南二字，乃泛指之地名，则其在豫章长沙上之“江南”二字，以为泛称地名，亦无弗可。古书行文简括，难为定说，易陷于模棱之论者类如此。

段玉裁《说文·草部》“芙”字注云：“汉人谓豫章长沙为江南。”钱竹汀云：“江南谓今湖广江西之地。”② 此盖本《货殖传正义》，然是说也，征之古书，未能尽验。盖大江以南，俱可有“江南”之称，不独湘、赣而已也。《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郭注：“自江南至海。”《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越世家》：“滨于江南海上。”《正义》：“今台州临海县。”此自长江南及海之称“江南”也。《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平准

① 《史记货殖传新诠正误》，见《禹贡》三卷四期。

② 《十驾斋养新录》十一。

书》："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就食江、淮间。"此言江、淮间之称"江南"也。《楚策》："今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越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备越矣。"《正义》："江南、洪、饶等州，春秋时楚东境。"此指豫章之为"江南"也，《五帝纪》："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吴越春秋》："禹济江南，省水理，南到计于苍梧，而见缚人。"此指长沙以南之为"江南"也。盖"江南"统指大江以南之地，故不专限于湘赣也。高士奇曰："楚初都丹阳，在枝江，后徙郢都，在荆州，居江北，别都鄂，即武昌，亦在江南。自荆州以南，皆楚所谓江南也。"张琦曰："江南今湖南及湖北之武昌，东包两江皆是。"所释地域较广。王逸《楚辞章句》："江南在湘、郢之间。"则嫌窄矣，江南之为泛称地名，见于《方言》、《说文》綦多。今不具引。

予考楚之江南亦为邑名。《秦策》："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高诱注："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即其明证。《齐策》："杜赫为邹忌说楚宣王曰：'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不返齐也。'楚果封之于江南。"《新序·义勇》："芈尹文者，荆之欧鹿彘者也，（王）使文为江南令而大治。"上举诸例，指江南为邑最显[①]，《秦本纪》："昭襄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此江南即秦昭置黔中郡之一部，当即故楚江南邑也。《秦本纪》："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正义》："黔中郡反归楚。"《楚世家》："（襄王）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也。"此云江南，所包地广，即江旁十五邑，所谓"荆王献青阳以西"也，其地指秦昭置黔中郡全部而有余，自四川之涪陵至湖南之巴丘皆其地矣。[②]

楚江南，自悼王时，吴起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然仍属南蛮，故称难治，惟其在楚为遐壤，于是以为黜臣窜逐之所。王逸《楚辞章句》："迁屈原于江南。"[③] 又云："屈原放于江南之野。"[④]《史记·郑世家》："楚庄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弊邑，孤之罪也，

① 《越绝书》四《计倪内经》："越王乃著其去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此江南，乃指越地，实取泛称之号，与楚邑无与。

② 详《楚黔中考》。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引王先谦曰："秦取江南为黔中郡。"不悟秦昭置黔中郡，乃合巫郡、江南及楚故黔中为一，不应独举江南而遗巫、黔也。

③ 《离骚序》。

④ 《九章序》。

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1] 又《张仪列传》：“郑袖日夜言怀王曰：‘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此可见楚江南，自来为迁谪之地。[2] 屈原《涉江》且言“哀南夷之莫吾知”。后汉黔中，尚属五溪蛮，灵均时，自益难说。楚人之视江南为僇人贬所，亦犹汉后之视交、广耳。

昔之释地名，皆知江南为泛称地名，而不解其为楚邑名；知其为楚荒鄙，而不解其为罪臣贬所，今故述其梗概云，用俟方闻君子匡正焉。

湘水巫山辨

湘水在长沙，为屈原自沉处，自汉以来无异辞，至近人钱穆先生始呈异议。谓湘在江北淮域，其证见于《楚策》庄辛之言。庄辛谓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高诱注：“高蔡即上蔡。”钱氏据此定湘水在上蔡，谓即《水经注》出汝南吴房县之瀙水，《山海经》“东过上蔡县南”之视水，谓“瞿相视三字，训诂可相通，故瀙湘 溵三字为一水之名”。考杨守敬《战国疆域图注》，高蔡在武陵；湘波高陂在湘阴之南。钱氏驳之曰：“是蔡之为国，包环洞庭之外，较楚邦为大，何以先秦典籍绝不言此？彼惟觉湘之必在南，而不悟蔡之必在北；今与其迁蔡于湘南，不如移湘于淮北，以地名迁徙之例说之，则豁然也。”[3] 颐谓杨氏移高蔡于武陵，未曾无所本，盖圣侯之蔡国，实在楚西。蔡故都上蔡；至灵侯，为楚灭；平王即位，复封蔡，是为平侯，徙都新蔡；至昭侯又徙州来曰下蔡；至侯齐四年，复为楚灭，后复封，徙于楚西；至圣侯为子发所执，蔡自是始绝。此事程恩泽论之颇详，其言曰：《楚策》庄辛谓楚襄王章，“蔡圣侯之事”，鲍改“圣”为“灵”，“子发方受命乎宣王”，鲍改“宣”为“灵”。原注“高蔡即上蔡”，恩泽案此说盖误，其改“圣侯”

---

① 此本《左传》宣十二年文。

②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元年（项羽）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纪》“江南”作“江中”，《黥布列传》、《汉书·高纪》则并云“杀义帝郴县”。又同纪：“（二年）汉王为义帝护丧，发使者告诸侯曰：项羽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郴县为江南极荒僻之地，故义帝徙其间，亦江南为迁地之证。

③ 《楚辞地名考》。

为“灵侯”，“宣王”为“灵王”，尤为武断。《荀子》：“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①]属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淮南子》：“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二说相符，并与《策》文合。又云：“其后子发为上蔡令，盘罪威王而出奔。”威王，宣王子也。于时亦非不相及，惟以为上蔡，其地似稍差。[②] 然子发所伐为高蔡，所宰为上蔡，不害其为两地也。盖蔡虽一灭于灵王，再灭于惠王，复并于悼王，其后仍国于楚之西境。所谓高蔡者[③]，相其地望，当在今湖北之巴东建始一带，故曰“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而荀子亦云“西伐蔡”也。若是上蔡、下蔡，则其地并在楚之东南，何得言“西”，且距巫山绝远，又何有茹溪湘波之可言乎？《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晋益大，魏惠王尤强，故蔡亦往朝之，与乎十二诸侯之列。”[④] 迨至子发获蔡侯归，而蔡乃真不祀矣。然则以《荀子》、《淮南子》、《史记》证之《国策》，其人其地其时，无不若合符节，与《春秋》楚灭蔡事毫不相涉。鲍彪不知蔡屡复国，率意妄改，反以古人为失考，亦可谓不知量矣。[⑤] 程说至核。战国之蔡在楚西。盖下蔡为楚灭，复徙其民于巫山之南而邑之；是犹邹为楚灭，而楚迁其余民于江夏，故江夏又有邾城也。[⑥]

刘向《新序》亦云：“蔡侯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嬉游于高蔡之囿。……不知子发受命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缨以朱丝，臣而奏乎宣王也。”所载与《楚策》同一事。高陵即高陂，且多“扼以淮水，填以巫山”二语。苟如程说，高蔡在巴东、建始间，则于出桐柏之淮水，相去绝远。又出桐柏之淮水与巴东之巫山，实当楚国东；西伐蔡，而东扼淮，西填巫，则蔡已跨有楚域矣，殊弗近理。钱穆因别说巫山为随县西南之大洪山，以“巫”、“洪”声相近为证。然《楚策》、《新序》俱云“北陵乎巫山”，是巫山明在高蔡之北，姑如钱说，以高蔡即淮域之上蔡，而大洪山在今湖北随县，西临汉水，在上蔡南数百里，安得言北！是大洪山非巫山显甚。

《楚策》：“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

---

① 原注盖子发名。

② 原注：“《说苑》作‘下蔡’，‘威公’亦误。”

③ 原注：“《新序》以高蔡为囿名，亦似有见，然必与国都相近。”

④ 原注：“秦齐二策所言十二诸侯皆无泗上二字。”

⑤ 原注：“吴氏《补注》亦谓‘圣’当作‘灵’，其谬一也。”

⑥ 《续汉郡国志》：“江夏郡有邾。”刘注引《地道记》曰：“楚灭邾，徙其君于此城。”

王流揜于城阳。"《新序》作："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钱穆曰："考其事在襄王二十一年，明年，秦人复拔楚巫黔中郡；则二十一年所举之巫，在鄢、郢、上蔡之间，地在郢东北，与二十二年所拔之巫在郢西南者不同。"颐谓：《楚策》秦举"鄢、郢、巫、上蔡"之巫，以《新序》证之，为巫山无疑。盖《楚策》、《新序》所言秦举鄢、郢、巫、江、汉、上蔡、陈之地，非仅指楚襄二十一年事，实合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诸事言之。《史记·六国表》："楚顷襄二十年，秦拔我鄢、西陵。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是其明证。[①]《楚策》、《新序》之巫，自为郢都西南之巫山，即楚襄二十二年秦拔巫黔中之巫。钱氏以为别在郢东北者，又非也。

巫山之非大洪山既明，《楚策》、《新序》载秦所举之巫，即巫郡巫山又明，则其言蔡侯北径之巫山果亦巫郡之巫山乎？曰，是又非也。古书载巫山至多，河域有之[②]，济水之间有之[③]，沅江上游亦有之，而皆非此。此之巫山，以予考之，当在澧阳。《说苑·正谏》："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边让《章华台赋》云：'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陂，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猎山即巫山，按《魏策》又作"崩山"，一作"崇山"，《淮南子·道应训》作"料山"，此盖同地异名。《舆地纪胜》七十引《彭山碑》云："崇山连天，外界越巂，遏千里之势于洞庭之野，屹立郡治，并为彭山，盖澧邦之所瞻也。"彭、崩声近，彭山即崩山。今以《楚策》庄辛语高蔡之地理证之，"北陵乎巫山"之外，又云"南游高陂，饮茹溪流，食湘波鱼"。湘波正近澧。茹溪，《国策》姚注云："《后语》饮茹溪之疏注：'茹，巫山之溪。'"《水经·澧水注》："澧水又东，茹水注之，水出龙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庄辛说楚襄王所谓'饮茹溪之流'者也。"《初学记》引《荆州记》："茹溪，《离骚》所谓'遗予佩兮澧浦'，其地为临澧、零阳二县，西北与巫山相近。"高陂，《新序》作"高陵"。考澧、沅之间多陵，因澧水而名者，有醴陵；因酉水而名者，有酉陵；以武山、武水而名者，有武陵；以黄山、黄溪而名者，有黄陵；疑高陵亦在此间，凡高陂、巫山、茹溪、湘波诸地望，依予所考，绝无睽隔，然则高蔡之囿，当在今湖南西北澧沅之间，大致可信。

---

① 详下《释鄢郢》。

② 见《大荒西经》、《吕氏春秋》。

③ 左襄十八年有巫山，杨氏《春秋列国图注》在长清县南。

程恩泽不悟巫山郎崩山崇山在澧阳，误以为在巫县，故以巴东建始说高蔡之地，故嫌未惬。或必曰：如是，则将何解于《新序》“扼以淮水”一语乎？曰：淮水即方淮，所云“荆台下临方淮”，“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前方淮之水”，则此水在台下；荆台在云梦，此水当在郢南，澧水东，为古入洞庭之水。湟水亦作潢水，而“潢”、“常”古通。[①] 湘水亦称常流。[②] 由是言之，方皇之水，疑即湘水别名也。[③] 高蔡在澧沅间，淮水巫山当其北，一左一右，故子发系蔡，先填厄此二地，而蔡侯束手受执宣王时，都在郢，高蔡正在郢西南，与《荀子》云“西伐蔡”正吻合。苟如钱说，既不合于《荀子》，尤无解于“厄淮水填巫山”二语也。

蔡屡为楚灭，后再封之，故国之于江南澧沅间。或必疑沅澧当蛮夷僻陬，不宜取为都邑。予考《寰宇记》，“澧阳申明公城，皆楚大夫邑于郡地。”[④] 则楚臣尚然，况于蔡乎。澧阳有楚申明公城，幸见载于乐史书，故至尚足征；至高蔡则旧记阙落，莫由详考，然依《荀子》、《国策》、《新序》诸书互证之，其地望固在楚西，无可疑也。[⑤]

附录　方淮考

(一)

古淮水有三，其一出桐柏山，《禹贡》“淮泗其乂”是也；其一在今安徽南陵南，《汉书·地理志》：“桑钦言，淮水出陵阳县东南。”《禹贡》“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是也[⑥]；其一即湘水别名，亦作方淮，或作方皇；此前人所未详，试论证之。

《魏策》：“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⑦]

---

① 为常阳亦作潢阳。

② 《史记》引《渔父辞》。

③ 详《方淮考》。

④ 《古逸》本。

⑤ 钱穆解《楚策》“食湘波鱼”之湘为淮域灈水，解《渔父》辞“宁赴湘流”之湘为汉水襄河，淮与汉固不相及，而钱君说屈原沉渊在汉水，乃取《楚策》“湘波”为之证明，尤自相矛盾也。

⑥ 别详拙作《尚书地理辨证说汇篇》。

⑦ 《艺文类聚》引作方湟。

《淮南子·道应训》："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

《说苑·正谏》："荆台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

《后汉书·边让传·章华赋》："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陂，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诸书记地名，文字多歧，而所指同事，故知：彷徨、方湟、方皇、方淮，本一名而异文。其水所在，吴师道[①]程恩泽[②]俱缺疑弗论。杨守敬《战国疆域图》始以淮水当之，钱穆《楚辞地名考》依其说，定为出桐柏之淮水，而谓彷徨等字乃方淮字讹。按此说可商之点有二：

1. 自上引诸文证之，《道应训》"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句，下云"左江而右淮"，足见方皇之水，乃在台前，而淮水在台右，是方淮与江淮之淮，明为二水，其不合者一。

2. 以地理言之，荆台在云梦，方淮在荆台下，则方淮正当云梦以南。今淮水自桐柏迤东入皖，西南去云梦悬隔数百里，苟定方淮为出桐柏之淮水，是无异移桐柏之淮水于云梦矣。其不合者二。

（二）

予谓方淮盖湘水，方淮、方皇，同音通用。古音湘可读为潢或湟，屈原《渔父辞》："宁赴湘流。"《史记·屈原传》作"常流"，《墨子·尚贤下》："舜灰于常阳。"《公孙尼子》及《路史·有虞纪》作"潢阳"，又《海内东经》"潢水"，《汉书》作"湟水"，《史记》作汇水。[③] 据此，湘、常，与湟、潢、汇、淮，古并同音可通假。相、常为 S 母，湟、淮、汇为 H 母，H 为喉音摩擦声，S 为舌齿摩擦声，二者同为摩擦声，音近变转至易。故湘水之湘，其音本常为淮，后始由 H→S，声转为湘。此如汉水音汉，而其下流今呼曰襄河，

---

① 《国策校注》。

② 《国策地名考》。

③ 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史记》作汇，汇字实匯之讹。"不知汇湟俱 H 一声之转，王说误。别详拙作《说汇篇》。

亦由 H→S 也。"方淮"、"方皇"即"淮"、"湟"之声变，方亦读 H 母[1]。与"皇"、"淮"双声，故急读则为"潢"，为"湟"，为"淮"，缓读则为方皇、"彷徨"、"方淮"也。[2]

方淮本但称曰淮，此又可于《新序》文证之。

> 蔡侯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嬉游于高蔡之囿。……不知子发受命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

高蔡，程恩泽[3]谓在湖北、巴东、建始一带，杨守敬[4]注在武陵，大约在醴、沅间，盖蔡被楚灭，西迁于此，复其国，仍名高蔡。[5] 湘水、巫山皆近其地，正当其东北，一左一右，故子发系蔡，先填厄此二地。据上所考，湘为淮音变，则《新序》所称与巫山对举之淮水，为湘水无疑。

按湘水自湘阴县北会洞庭，至临湘县，入江。《汉书·地理志》："零陵郡零陵，湘水所出。至酃入江。"《说文·水部》："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水经》："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俱不言注洞庭湖，而直言入江，明其水贯洞庭以北，亦得有湘之目，不仅湖以南始有湘名。强台在云梦[6]，台之南，恰为湘水，诸书记台之位置，曰"南望料山，以临彷徨"，曰"下临方淮"，曰"前方淮之水"，形势正合，知方淮非湘，固莫属矣。

又出桂阳通四会之湟水，一名汇水，其水出湖南郴县黄岑山，与湘水源近，古人地理观念至为含糊，且江、湘以南，战国秦、汉时为蛮夷之地，其地理状况，亦难明了，或古时所谓湘水，兼指湟水，湘又作淮，湟亦作汇，可见先秦时自湘水南至湟水，统名为"淮"，音变作"方淮"、"方皇"。至后代知湘、湟二水源流不同，而湘水之名，复由淮音变为湘；惟湟水独存"淮"名，字别作"汇"，而"湘"自是遂不复有"淮"之称矣。今表列其异文音变如下：

---

① 方古不尽读重唇邦母，今通语转入轻唇，潮州语方读如 Huan，正属 H 母，盖重唇入腭，变转至易也。

② 《方言》："饬谓之伥惶"，"伥惶"即"饬"之声缓，与"方淮"、"方皇"急读为"淮"、"湟"例正同。

③ 《国策地名考》。

④ 《战国疆域图》。

⑤ 详《湘水巫山辨》。

⑥ 约当监利华容。

音　变	H 母→S 母		声　缓
地名异文	淮（《新序》）	湘（《渔父辞》）	方淮（《说苑》《边让传》）
	湟（《汉书》）	常（《屈原传》）	方皇（《淮南子》）
	汇（《史记》）		方湟（《类聚》引《国策》）
	潢水（《山海经》）		彷徨（《魏策》）

考地理者，不悟淮、湟、汇、湘可同音假借，见有“淮”字，以为必出桐柏山之淮水，故于《国策》、《新序》、《说苑》、《淮南子》所记之淮水、方淮、方皇，并以出桐柏之淮释之，无怪其扞格不通也。

友人吴君珏谓“方淮”为匯之分文，匯字从匚从淮，以甲文报丙报乙之作㔭⿷匚乙例之，知匯为匚淮二字合文。此亦一解，故并著之。

卷　下

释鄢郢

（一）

楚自鬻熊曾孙熊绎，以子男之田，封于楚蛮，居丹阳。[①] 六世，熊渠兴，封长子康为句亶王，治江陵[②]。数世，至文王，熊赀始大，都郢。[③] 至于平王，畏吴，更城郢。[④] 后昭王复为吴迫，北徙鄀。[⑤] 惠王又曾徙鄢[⑥]，其后复

① 《楚世家集解》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又《正义》引"《舆地志》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欧阳忞曰："归州东南有丹阳城，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始居于此，后徙都枝江。"吴师道曰："熊绎初封丹阳，武徙枝江，文都南郢。"程恩泽曰："未是，枝江之徙当在熊绎时。"

② 《集解》引张莹说。

③ 《世本》作"武王徙郢"。《汉地理志》毛本作"武王"，杨守敬《汉志补校》云："志丹阳郡丹阳下云'文王徙郢'，本《史记》。《左传正义》引志亦作'文王'。然则志毛本后人所改。"杜预曰："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寰宇记》引《荆州记》云："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遂破楚。"是先攻纪南而后破郢。桂馥据此谓南郢在纪南之南，郢及纪南不同地，见《礼璞》八。

④ 余知古《渚宫旧事》二注引盛宏之云："江陵东北七里有郢城，城之周回九里是。"《楚世家正义》云："案《传》，城郢在（鲁）昭公三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预曰：楚用子襄遗言以筑郢城矣，今畏吴，复修以自固也。"

⑤ 《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详下篇。

⑥ 余知古曰："昭王避敌，迁都，惠王因乱迁鄢。"案此以"鄢"为"郾"。《国策》鲍注："昭王徙郢，又徙都与鄢。"以郢为昭王所徙，程恩泽已辨其非。钱穆说楚昭王曾自都徙鄢盖依鲍注，实当作惠王。

归郢，而旧史缺载。然昔人皆谓昭、惠之后，仍都南郢。班固《汉书·地理志》鄀下云："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又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东。"[①] 后世如唐余知古[②]、宋欧阳忞[③]、罗泌[④]、王应麟[⑤]、元吴师道[⑥]皆主其说，确无可疑矣。

(二)

近人钱穆先生说洞庭在江北，谓："楚自昭王徙都，后遂无复还江陵之明文；先秦旧籍，斥言楚都，亦率曰'鄢郢'，以别于旧郢也。"举白起拔郢，即鄢郢以为证。盖以楚自昭王后，皆都在汉北宜城之鄀，以证战国时，洞庭不在江南，其说颇有可商：

(1) 鄢曾为都，故称鄢郢，犹在纪之称纪郢，在陈之称郢陈也。钱氏知鄢之置都，为时不久，而以鄢郢被之于鄀，谓其近鄢，故以为名，此在前人亦有是说；然实鄢郢当为鄢都别称，不得强指为鄀。一也。

(2) 鄢郢虽为鄢都之称，然鄢与郢究非一地，实楚南北两大都，古书多合言，而实分指，不可混合为一。二也。

(3) 鄢与鄀，秦并为县，而白起所拔之郢，秦实以为郡。[⑦] 尤不得指鄢或鄀为郢。三也。

(4) 悼、威、怀、襄之世，史称楚都，但曰"郢"，或"郢都"，而不称"鄢郢"，盖皆指江陵；其称"鄢郢"者，乃指鄢或分指宜城之鄢及江陵之南郢，而鄀未曾简称曰"郢"。故鄀，人以为别都，其非都可知，不应云"古籍斥言楚都，率曰鄢郢"，含混为言。四也。

---

① 齐召南曰："当作陈。"吴卓信《补注》直易为陈。杨守敬曰："淮阳国陈县，楚顷襄王自郢徙此。则此'东'字为'陈'误无疑。"案此不言徙"鄀"。

② 《渚宫旧事》一："案惠王之末，墨翟重茧趋郢，班子折谋；宣王之时，江官遇盗，郢宰见黜；怀王入秦，齐人使郢中立王；是皆昭惠后叶，莫不依焉根本。则知鄀即鄀，都之迁，权道也，非久都明矣。"

③ 《舆地广记》八京西南路："宜城县，故鄢，楚之别都。……鄀县故鄀国，春秋时，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昭王畏吴自郢迁焉，征复还郢。"

④ 见《路史·国名记》。

⑤ 见《通鉴地理通释》四说同《广记》。

⑥ 《国策校注》："《楚辞·哀郢》、庄辛说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陈，知怀襄之世，仍都南郢。"

⑦ 《白起传》："拔郢，以为南郡。"

今取古书言鄢郢者，解释如下。《荀子·议兵》篇："庄跻起，楚分而为三四。……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稿然。是岂无固塞隘阻者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也。"注："鄢、郢楚都，谓白起代楚，一战举鄢、郢也。"[①] 褚少孙《补史记礼书》亦引荀子此语。《史记正义》曰："鄢音偃。《括地志》：'故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鄙也。又率道县南九里，有故郾城，汉惠帝改曰宜城也。郢城，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即吴公子光伐楚，楚平王恐，城郢者也。又楚武王始都郢，纪南故城是也，在江陵北十五里。"张守节解鄢、郢分为两处。盖鄢、郢乃指楚南北两都，旧书合言，实分指也。钱先生乃曰："荀子言鄢郢，在都，不在江陵。"遂以证白起拔郢，乃汉北之鄢郢，非江域之纪郢。按此盖本吴卓信说[②]，前人虽亦曾言之，然非古书本义也。

《楚策》曰："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高诱曰："秦兵出武关，则临鄢；下黔中，则临郢。"《史记·苏秦列传正义》亦援此为说。是因南北两都，故分为二军也。张琦《国策释地》疑此语"黔中"当作"汉中"。说云："时秦未举巴、蜀，无缘至辰沅。"不知楚黔中治应在唐黔州，究不与秦郡治在沅陵西二十里者同地。[③]《史记·张仪列传》："苏秦死，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④]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扞关，《集解》："徐广曰：'巴郡鱼复有扞水、扞关。'"《索隐》："扞关，在楚之西界。《地理志》巴郡有鱼复县。"《正义》："硖州巴山县界。"是知楚之西境扞关，秦兵尚可越巴、蜀而至，况黔中在巫郡之下，当西汉水入江稍东之地，秦兵不更易下哉。至云"时秦未举巴、蜀"，不知张仪复相秦，在秦更元八年。其明年，司马错灭蜀，至十二年，张仪相楚，苏秦死。仪说楚王当在是年前后，时巴蜀被灭已久，不应云仍未举

① 《淮南子·兵略训》文略同。

② 见《释都篇》。

③ 说详《楚黔中地考》。

④ "竟陵"二字原作"境"，今据《国策》及《七国》考引改。

也。[①]《史记·苏秦传》亦作"黔中"。是黔中之不为汉中之误，可无疑义。黔中字既无误，则高注所谓临郢，自指循江下逼江陵，证之《张仪传》，益灼然矣。[②] 由是言之，出武关为北路，下黔中为南路，则所谓鄢、郢动者，鄢、郢为两地至明。若以鄢、郢但指宜城之都，则只说北路，而南路"下黔中"一语无着矣。

考郢与鄢为楚南北两大都。楚地广，故言其柱国者，辄南北连称，而实则分指。《齐策》三："国子曰：'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故三国欲与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详下）《史记·楚世家》载射者对楚顷襄王曰："秦为大鸟，负海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通鉴地理通释》十引林氏曰："江陵，郢也；襄陵，鄢也。"《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睢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鲍注："此皆楚之要地，无此，则危亡。"此鄢、郢、汉中三地，合言也。依是知鄢郢亦分指南北两都，验之苏秦指陈当时形势，南北两路并重，可以概见。而钱先生引苏秦语，竟谓秦、楚兵争，在西而不在北，殆放弃"下黔中"一语而不说矣。

《史记·秦本纪》："昭襄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此鄢、郢分言甚明。而取鄢在先。《六国表》："楚顷襄二十年，秦拔我鄢、西陵。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此亦鄢、郢分述。《楚世家》："顷襄二十年，秦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又《六国表》："秦昭王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此则不书取鄢。《白起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于陈。秦以郢为南郡。"以上诸条，事并同，皆鄢与郢分别为言。而白起所拔，但曰郢。《秦策》曰："顷襄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据《六国表》、《楚世家》，秦拔郢、夷陵在二十一年，此不与二十年攻楚西陵事析开，盖策文略也，而鄢与郢又不依年代先后为言。据《史记》，知此处鄢、郢亦合言而分指者矣。《秦策》

① 此本《秦纪》为说，秦举巴蜀年代，近人马琣棠、钟凤年、张公量，皆有考办，俱载《禹贡》，可参看。

② 参看《方舆纪要》八十常德府条。

三："蔡泽曰：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①]《史记·平原君传》："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王。"烧夷陵在拔郢后，拔郢又在举鄢后，鄢与郢为楚南北两大都，二年间并为秦得，故说者每连举为言。《楚策》四："庄辛谓楚襄曰：……郢都必危。"又曰："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②] 此言楚都但曰"郢都"，下文言"鄢"、"郢"则兼鄢与郢二地为言也。例如上述。《秦策》又云："应侯责武安君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人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不敢西向。"武安君即白起。鲍注："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此鄢、郢合言，亦为分指。《春申君传》："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范睢传》："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又《秦策》三："谓应侯曰：'（武安君）南亡鄢、郢、汉中。'"《魏策》一："秦果南攻蓝田、鄢、郢。"[③] 又《白起传》："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正义》："鄢在襄州夷道县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县东六里；汉中，今襄州之地。"是鄢、郢、汉中为三地甚明。《史记·李斯列传》："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索隐》："《地理志》：'南郡江陵县云，故楚郢都。又宜城县云故鄢也。'"此鄢、郢亦分指矣。《水经·沔水注》，郦道元按曰："汉、沔自下，有'沧浪'通称。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案四地皆楚都，故云然。鄢与鄀在楚北宜城，纪与郢在楚南江陵，此不云鄢、鄀、纪、郢，而云"鄢、郢、纪、鄀"，盖错综为说，纪、鄀非为一地，则鄢、郢当为两处明矣。《晋书·地理志》："荆州，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巫中（案即黔中）地为黔中郡。"案此以"巫、中"为二地例之，鄢、郢亦兼两都为言也。《寰宇记》："秦以鄢、郢为南郡"，说本此。今若以鄢郢只为宜城之鄢，则其地非秦南郡所在；若以

① 《史记·蔡泽传》作"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

② 按秦拔楚鄢、郢、巫，历三年，不得云五月。《新序》卷二作"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十月恐亦未是，又无"上蔡、陈"三字。策文有者，张琦《释地》以为衍文。程恩泽曰："上蔡疑是上庸之误，陈，衍文；是时楚方保陈，则陈、蔡未举。"予案，《新序》无之，或衍文，未可知。

③ 案《楚策》一："张仪为秦破纵横说楚曰：'楚曾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于蓝田，又却。'"是时楚已失汉中。

为郢，则南郢无鄢之名，是知鄢、郢当为合称，不得为独指也。观上所述，白起所拔郢，即南郢，其称鄢、郢者，乃合两都为言。钱君曰：“《白起传》之郢，即鄢郢。其前年先拔鄢城者，楚昭王曾自都徙鄢，逾年而复，鄢都相近，而非一地[①]。楚既都都，都亦称郢，以其近鄢，故名鄢郢。”鄙意，都不得以与鄢近而以鄢郢为名，鄢郢当鄢之名也。《水经·沔水注》[②] 说鄢云：“城故鄢郢之故称，秦以为县。”又下文说都云：“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都、卢、泌之地也，秦以为县。”鄢、都分说，又以“鄢郢”说鄢；说都，则不言有“鄢郢”之号，是鄢郢但必鄢之号，非都别名，斯其证矣。[③]

近时出土湘西里耶秦简一六·五二：

>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 （《中国历史文物》二〇〇三，一）

鄢地正在宜城。楚曾徙都，又曾徙鄢，都鄢虽地相近，乃谓都可有鄢郢之号，说至诬妄。夫其都在都，乃不称郢都，而复假邻邑之名，称曰鄢都，恐无是理也。[④]

（三）

钱先生引《沔水注》：“夷水东注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城故鄢郢之故都，城南有宋玉宅。”谓：“秦兵先得鄢，遂破郢，当郦氏时，白起破楚鄢、郢之遗闻逸事，尚未全失。”意欲以证白起拔郢，楚都仍在宜城之为实。窃谓起固曾取鄢，在拔郢前一岁。今如钱说，时楚都在都，则去鄢城只数十里，据《秦纪》，鄢拔后，赦罪人迁于其地，是秦所得之地必广，所谓“取鄢、邓五城”者，都或在其中。设退一步言，都时未为秦得，则以相距数十里之地，又为国都所在，安有不一举而摧陷之，必待一岁而后

---

① 原注《方舆纪要》：“鄢城在宜城县西南九里，都城在宜城县东南九十里。”

② 卷二十八。

③ 《水经·江水注》：“秦昭襄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置南郡焉。”案拔郢在二十八年，不当云二十九年，郢上鄢字疑衍，非然，则郦氏偶失考也。

④ 参看《释都篇》。

取得耶？钱先生又引《楚世家》言："前一年，楚既割汉北，鄢、郢之屏蔽已失；故翌年，秦即下鄢，又明年，遂破郢，西陵夷陵皆鄢郢附近，楚先王冢墓所在耳，《水经注》：'鄢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谿。'所谓西陵、夷陵者，殆即在宜城西山一带。"按，是未必然。西陵、夷陵，地非密迩。[1] 而夷陵为楚先王墓之所在，自熊绎发迹丹阳，其后皆都南郢。据古书皆言拔郢烧夷陵，则夷陵地实邻郢，谓在江域，自无弗合，亦不必另易一说。《水经·江水注》三十四云："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此即郦道元说夷陵之所在矣。亦以为在江域。而钱先生必引《水经注》为证，不知郦道元自有所指，别为新说，终难越乎悬拟。钱先生又曰："秦拔郢，襄王众散，始东退保陈。若当时楚都在江陵，秦兵已取鄢、邓，长驱南下，楚都既破，何能转迎秦锋，越其兵路，东北遁地于陈。"是亦误解。程恩泽曰："《策》云：拔鄢、郢，东至竟陵，为今天门县，则当时秦兵所及，亦仅至安陆而止，未曾越汉阳、武昌而至黄州也。"[2] 李吉甫、欧阳忞并谓復州竟陵县，盖即白起所至处，其时楚王乃循江东下，再折而北，故曰东走，曰东北徙绝非北冲秦锋，越宛、邓以至陈也。其取涂必如此。[3] 若如钱先生说，楚都在都，则汉北早为秦得，而鄢又先一年为秦有，都与鄢相去只数十里，都当益受其困，则欲越秦兵路，东北徙于陈城，其难不更甚邪。是又其时楚邦不在都之反证矣。

(四)

据上所论，"鄢郢"之所指有二：其一为宜城之鄢及江陵之郢之合称；其一为宜城鄢都之专名。考宜城鄢都之名，古书所言，但称曰鄢，罕曰鄢郢，其称"鄢郢"者，殆后起之别名，如郢陈之类。[4]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一："宋玉者楚之鄢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此言鄢郢。即指宜城之鄢也。《史记·秦本纪》："（昭襄）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5] 又云："白起攻楚，取鄢、邓。"皆称之如常邑，其非楚都，可以概见。今知鄢郢之称，为鄢别名，则古

① 策文言："拔鄢西陵。"是西陵当近鄢。

② 《地名考》六西陵引。

③ 王船山《楚辞通释》说《哀郢》"民离散而东迁"为迁都避秦。游国恩曰："初或沿江东下，取便于速奔，然其势应至江夏鄂渚附近，即折而遵陆北行，出穆陵关经河南光蔡之地，以达于陈较为直捷，断不至迂道陵阳。"见《哀郢·辨惑》篇。今按游说是。

④ 观《水经注》可证。陈，《国策》不云郢陈，亦其证。

⑤ 亦见《楚世家》顷襄十六年。

言鄢郢者，不得指都。其合称者，当为宜城之鄢与江陵之郢无疑矣。

昔人称楚都，率呼曰“郢”，今观白起之破楚都，亦但曰“拔郢”，曰“去郢”，曰“以郢为南郡”。又如曰“越宛有郢，置南郡”[①]。“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②]。皆不以鄢郢称之。他如《庄子》“南行至于郢，北面[③]而不见冥山”[④]。《墨子》“至郢”[⑤]。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韩非》：“郢人有狱”[⑥]，“张仪在郢”[⑦]，苏代为周说楚王曰：“周绝于秦，必入于郢”[⑧]。此战国时人说楚都，亦但曰“郢”。他又如屈原之云“发郢都而去闾”[⑨]，庄辛云“郢都必危”[⑩]，则曰“郢都”，亦不称“鄢郢”也。《史记·货殖传》：“江陵，故郢都。”《正义》：“荆州江陵县故为郢，楚之都。”《说文·邑部》：“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皆言楚都在南郢。《齐策》：“杜赫说楚宣王：王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不返郢。”《渚宫旧事》：“初，郢以两版筑垣，起变之，用四国人恶之。”[⑪] 是宣、悼时所都在南郢。沈括《笔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盖昔人于宜城之鄢之误为郢，亦有详辨矣。

（五）

予考战国襄王徙陈前，楚仍都江陵之郢，亦别有证：

（1）《燕策》：“秦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是时秦已得蜀，两国之君，在秦当为昭襄，在楚当为怀或顷襄。《楚策》一：“张仪为秦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时楚尚都郢，临江，故下江便可抵郢，若在宜城

---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秦策》一。

③ 一本无。

④ 《天运》篇。《释文》：“郢，楚都也。”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十二北郢注：“冥山在今信阳州，正楚北境也。”又十三引《括地志》：“楚之冥厄亦曰冥山，冥山即黾塞也。”此处当指南郢，故云北面不见冥山。

⑤ 《贵义》篇，《公输》篇。又见《淮南子·修务训》。注：“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纪郢。”是。

⑥ 《说储》。

⑦ 《楚策》。

⑧ 《周本纪》。

⑨ 《哀郢》。

⑩ 《楚策》。

⑪ 孙校注：出典为《韩非·和氏》，《吕览·贵卒》。

之都，必不云下江可至也。且此皆但称曰“郢”不称“鄢郢”，亦予说之证。

（2）《哀郢》云：“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又云：“惟郢路之辽远，江与夏之不可涉。”使郢在宜城，亦不当云涉江矣，此证与上同。《哀郢》又云：“顾龙门而不见。”《招魂》云：“魂归来兮入修门。”洪兴祖曰：“龙门即郢城之东门。”《寰宇记》一百四十六引伍端林《江陵记》：“南门三门：一名龙门，一名修门。”《寰宇通志》：“江陵一名龙门，一名修门，两东门郢都东关，有二门也。”此未必后人因《楚辞》而制其名以实之。夫其迹之在南郢亦足为证，宜城固无所谓龙门及修门者！

（3）鄢与鄀为秦得，秦并以为县。《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三宜城县：“故宜城，在县南九里，本楚鄢县，秦昭王使白起伐楚，引蛮水[1]灌鄢城，拔之，遂取鄢，即此城也。”《寰宇记》百四十五：“宜城县本楚之鄢都。”《舆地广记》八：“宜城县故鄢，楚之别名都也。秦为南郡之北部。”皆云为县；然于江陵则不然。《寰宇记》百四十六：“春秋以来，楚国之都，谓之郢都。”秦以鄢、郢为南郡，今州也。[2]《舆地广记》二十七：“江陵县地，故楚郢都之地；战国时，秦使白起分郢，置江陵县，及置南郡，而楚徙都陈。”[3] 此与《史》、《策》并合。鄢、鄀秦为县，自与郢为郡者异矣。是知白起所拔当为南郢，楚时所都，当在南郢。

（4）《秦策》一：“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五都即五渚。洞庭、五渚、江南，皆在郢南。[4] 郢既为秦得，则郢南一带，皆秦有矣。夫秦之要怀王割巫黔中者何哉？亦惟觊先得楚西南要地，以为东侵之机耳。

所谓“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举”，盖南北相掣，则楚危矣。今秦兵出武关，昭襄二十年得鄢、邓，遂长驱南下；其明年，下郢，楚王东徙，郢南一带，遂为秦有。故《楚世家》言：“二十二年，秦复伐我巫黔中郡。”《秦本纪》言：“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也。”郢都既为秦得，故其西南之地，翌年即为秦占。钱先生误信刘伯庄说，五渚临汉水，故谓洞庭、鄢城必近汉域，故曰：“岂有鄢郢既破，楚王方避地向东北而去，乃秦兵穷迫，转远往长沙、洞庭之理。”不知郢不当指为宜城之鄢，五渚

---

① 按即夷水。

② 此处鄢、郢亦兼南北两都为言。

③ 班志陈县属淮阳国，注云：“楚顷襄王自郢徙此。”郢指南郡。

④ 参看拙作《说五渚》。

亦不得在汉域。由是言之，此不特不足证洞庭之在汉北，乃足反证实郢之在江南。江南所在，钱君无以易旧说，乃迁就之，谓："白起既破楚都（指鄢郢），不敢逼取楚王，而秦之偏归自蜀东下，又取楚巫、黔中地，在襄王二十三年，游兵所及，至于江陵以西一带之南岸，此则所谓江南。"又云："江南当远在今洞庭西北，正值江陵之南以西，与洞庭五渚之在汉北者非一地。则亦非泛指大江之南，谓秦兵直至今巴陵、岳州一带也。"予谓如钱君言秦师可抵江陵以西，又何不可抵江陵，何必远移楚都于汉北哉？洞庭西北，与洞庭相去咫尺；洞庭西北，秦兵可到，则洞庭何不可到耶？况秦置黔中郡于武陵，则江陵与洞庭为秦兵所经，亦何疑焉。由当时兵争之形势观之，顷襄所都，仍在南郢。

综上诸证，可见昔人谓昭、惠后仍都南郢，其说盖至确不可易也。

（六）

《史记·王翦传》："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通鉴》："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鄢、郢。"胡三省曰："时楚迁寿春，所谓鄢者，即《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之鄢；郢则陈州也。"案宜城之鄢，江陵之郢，昭襄时已为秦得，始皇时，拔楚鄢郢，自非此二都甚明。平与，《正义》："在预东北五十里。"寝，徐广云："今固始寝丘。"《索隐》："寝，固始县，属淮阳。"城父，《正义》引《括地志》："汝州郏城县东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观当时东攻西合形势，鄢郢二地，当在淮、汝之域，鄢即颍川鄢陵，郢即陈无疑。胡说至确。《齐策》六："即墨大夫入见齐王（建）曰：'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案，入武关即进故秦境。《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昌平君徙于郢；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与，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①]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是齐被秦灭，在楚后，故即墨大夫有使鄢郢大夫收回楚故地之计。宜城之鄢，江陵之郢，久为秦得。则此处鄢、郢，当如王翦传在淮、汝之域者矣。此又鄢、郢两地合称之别例，考史者所当知也。

---

① 一作江南。

附　本文提要

（一）略论楚都之沿革，及前人主昭、惠后仍都南郢之说。

（二）论古书鄢、郢合言，而实分指。白起拔郢，当为南郢，非鄢之郢。又鄢郢亦为鄢都之别称，非鄀之号，订钱穆说“鄢郢”之谬。

（三）论白起拔郢，时楚都不在宜城之鄀。

（四）论鄢郢当为鄢都别名，不当属鄀。古称楚都，率曰郢，不称鄢郢。古书载宣、悼、威诸都，在郢，即南郢。

（五）论昭、惠后仍都南郢之证。

（六）论李信攻鄢、郢乃指淮、汝之鄢陵及郢陈。

释鄀

（一）

《方舆纪要》十九，宜城县下云：“鄀城，县东南九十里。春秋时鄀国，自商密迁于此，为楚附庸，楚灭之，而县其地。定六年，‘楚令尹子西迁郢于鄀’是也。秦置若县，属南郡；汉因之，后汉改为鄀县。”案此鄀即所谓“南鄀”。《左传》僖二十五年：“秦晋伐鄀。”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盖以别于商密之鄀。《汉书·地理志》南郡鄀注：“楚昭王自郢徙此。”《路史》：“鄀，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鄀亭山，上有城，险固，有鄀乡，鄀水，此即鄀城也。楚灭为邑。昭王曾徙于此。”此统言昭王所徙在鄀也。《水经》：“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郦《注》云：“鄀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山上有烽火台，台北有大城，城即楚昭王为吴所迫，绝郢徙鄀之所。”据是，昭王所城为大城，在鄀县故城南石山上烽火台之北，与“鄀县故城”非一处也。《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去故鄀城东五里。”又云：“故鄀城在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又云：“鄀城东五里有楚王城，西南去乐乡县三十三里。”① 观上所举，里数并合，知昭王故城即楚王城，亦即故鄀城（与鄀城有别），在乐乡县东北，为一地无疑。曰“故鄀城”者，当即昭王所徙。曰“鄀城”者，即楚灭鄀所置之县也。曰“故都城”，揆其里道，似即鄀城，疑“都”字，“鄀”之讹也。《通典》：“鄀在襄阳

① 《方舆纪要》引。

宜城县东，今襄州南二百二十里废乐乡县，是其地，有鄀乡，在鄀水旁。”《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三：“襄州乐乡县，本春秋鄀国之城，在今县北三十七里鄀国故城是，在汉为鄀县地，晋安帝于此置乐乡县。”《舆地广记》八：“故鄀城为楚所灭，昭王自郢迁焉，后复还郢。唐改为乐乡。”右举皆以鄀即乐乡。曰“鄀国故城”者，则又非楚昭所徙故鄀城，乃春秋鄀国，楚鄀邑也。按鄀国故城与昭王所徙，不同其地。此概括为言，不加严别，当以《水经注》所言，最为明白可从。

(二)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云：“鄢本古国，后入楚为别都，其后昭王徙郢于鄀，更称‘鄢郢’，以鄢与鄀俱在宜城县，治相近，故称‘鄢郢’以别于江南之纪郢也。”乾隆《襄阳府志》二《沿革》云：“宜城，汉县，其地在周为楚之鄀，为鄢郢，为鄢都。《春秋》定公四年，吴入郢，楚几亡国；秦师救之，复归郢；明年，昭王迁郢于鄀，而改纪其国政，以定楚国，遂以鄀为都，而亦名曰‘郢鄀’，与鄢同地，故谓之‘鄢鄀’，亦谓之‘鄢都’。”《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我郢，即鄢郢也；二十三年，楚复取秦所拔之江旁十五邑，鄢郢复归于楚：迨秦灭楚以为县，属南郡。汉初其地分为三县：曰‘鄢’，曰‘鄀’，曰‘邔’，皆属南郡。惠帝三年改鄢为宜城，县名所自昉也。”同治《宜城县志五·秩官志》鄢郢条注云：“楚附庸，鄀城昭王轸之迁国也。鄀地有鄢水郾子国，故改为鄢郢，亦号鄢都，即今县故襄城也。”按《右储说》，皆以鄀亦称“鄢郢”，不知鄀与鄢实非一地，鄢亦曾为都，“鄢郢”、“鄢都”乃指鄢，不得谓鄀也。昭十三年《传》：“灵王沿夏，将入鄢。”杜注：“本为楚别都，故灵王欲入。”盖鄢自昔为别都，故惠王迁于其地，迁鄀，迁鄢，实两地两事，不应混为一，以鄢郢被之鄀。高士奇曰：“楚曾自鄀徙鄢，逾年而复，非鄀即鄢，鄢称鄢郢，鄀称郢鄀，乃后人以其地曾为楚都，故名。”此说是也。《宜城志》谓楚改鄀为鄢郢，说尤臆度。至谓鄀有鄢水，故称鄢郢，亦强为之解。《府志》谓：“楚以鄀为都，谓之鄢都，秦灭楚以为县。”夫使鄀为鄢，即白起所拔之郢，则秦实取为南郡，不应以为县也。拔鄢、拔郢，据《史记》相差一年，又可见鄢都之非鄀矣。至其以楚复秦拔江旁十五邑时，鄢郢复归楚，是无异以其时楚所复地，北及襄阳，则秦所置南郡时，亦为楚有矣，尤不熟史事而妄论者也。

附录　楚昭王墓辨

楚昭王墓，湖北凡三见。《通志》谓："在当阳县东南五十里。"此一说也；《襄阳府志》："昭王墓在襄阳习家池北。"此又一说也；《府志》宜城县下又云："昭王墓在城南，故襄城内，墓大逾亩许，左数十余步有井，至今目为昭王井。"此又一说也。

襄阳之昭王墓，《府志》据《南雍州记》："齐建元中，盗伐王冢，得玉器古书竹简。"疑为周昭王墓。[①] 案《记》所载，亦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南史·江淹传》，辞各稍异。《府志》谓此墓旧志亦称楚昭王，盖因《南齐书》有"相传为楚王冢"句，遂加一"昭"字。然《南史》等所记，但皆云古冢而已。相传一语，原是疑词。据是，襄阳楚昭王墓，尚且阙疑。

宜城之昭王墓，《府志》以为："宜城故襄城，为昭王迁郢故地，内昭小城犹存故址，文有昭王井，证据确凿。"《宜城志》同其说。予案，《孔子世家》："楚昭王卒于城父。"《楚世家》："昭王军城父，十月，病于军中。"考昭王自十二年北徙都鄀，至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昭王救之，军于城父，十月庚寅卒。自徙鄀至卒，凡历十五年。其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射伤吴王，遂死，吴怨越，不西伐楚；而楚亦于二十年灭顿、灭胡，是昭王自二十年后，国稍强；而吴自二十一年后，加怨于越，而不西伐楚。夫楚之北徙者，畏吴耳，今吴势如此，楚必南还郢也。班固《地理志》云："昭王畏吴自郢徙鄀，后复还郢。""后"字义甚泛，甚稔指昭王后人，抑其本身之事。惟鲁哀四年《左传》："夏、楚之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是时为楚昭王二十五年，则其时已还郢，故惧吴复来也。[②] 是昭王之身，即已还郢，今以宜城故襄城为昭王迁都所在，而定其墓地，恐亦未确，其本身曾还南郢，则所葬或不应在宜城。

予考近古史家言昭王墓者，皆主在当阳。郭仲产《荆州记》："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余里，沮水之西。"王粲《登楼赋》："西接昭丘。"《水经注》："沮水南经昭王墓，东对麦城。"《文选》李善注引《荆州图记》亦以沮水南墓即粲所云者。综此数说，地望尽合。《襄阳府志》谓王《赋》昭邱乃指在襄阳

---

① 《府志》云："考周昭王南征而不复，史载王巡狩，返济汉，汉人以胶舟载之，至中流，胶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夫昭王之崩于汉水而葬于汉滨，事之未可知也；竹简玉器，岂王故物而用为殉欤。"

② 吴此时已入越，复盛，故楚恐。左哀元年《传》："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可证。

者，又言仲宣楼当在襄阳东南城角[①]，予谓王《赋》明谓“夹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长洲”，度其形势，应以当阳为合，盛宏之《荆州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②]《水经·漳水篇》：“漳水又南迳当阳县，王仲宣登基东南隅，临漳水而赋。是矣。”[③] 由此观之，《襄阳志》、《宜城志》所说，殊不足信；且借知昔人谓墓在当阳者，非傅会之语。

同治《宜城志》记昭王墓，言“有穹碑突立，残剥已甚，字迹篝体，而无一完字可读：俗传曾被龙爪，乃由剥蚀之形而妄称之；然断非秦汉后物。”是其碑已残蚀，亦无明文可证，不得谓其说较在当阳者更为确凿。又考故襄城内昭王小城，并庙俱见韩愈《宜城驿记》，而记中独不言墓，是知此墓未必为楚昭王；而府志强解之曰：“盖庙树即墓旁树，于頔尽砍伐以供用，愈与頔善，故讳言墓。”恐无是理。若然，岂其时昭王卒于城父，去南郢辽远，故姑葬于宜城之都，而当阳则乃衣冠之葬者邪？总之，墓在宜城，乃后起之说，未必可据。[④]

《楚世家》：“子闾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证诸昭王本身已还郢，则其兵所归，当在南郢，而惠王初都，亦在南郢矣，时人或以班固说昭王后复还郢为谬妄，不知稽诸旧文，实无有误，特人自疏忽耳。

哀郢辨惑

屈原《哀郢》，王船山以为指顷襄王东迁[⑤]，误信之者甚多。[⑥] 王说之谬，前人已辨之。[⑦] 近人游国恩亦有专文驳正。[⑧] 惟游泥于“不知夏之为邱，孰两东门之可芜”二语，谓《哀郢》为屈子再放九年，于道路间闻秦人入郢所作。因之，定屈原卒年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年 67 岁，《哀郢》之作在二十一年，

---

① 案荆州江陵、当阳并有仲宣楼。

② 《文选》注十一，《舆地纪胜》七十八引。

③ 祝穆《方舆胜览》云，刘良《文选注》以登楼作赋在江陵，非也。详光绪《荆州府志》七。

④ 陈锷乾隆《襄阳府志》五：“此墓旧志失载，县志虽载，而不详。”陈志始增入，其非实录可见。

⑤ 《楚辞通释》。

⑥ 近人郭沫若《屈原》、钱穆《楚辞地名考》亦从其说。

⑦ 蒋骥《楚辞余论》下辨最详。

⑧ 见《读骚论微初集·哀郢辨惑》。游辨谓《哀郢》指屈原东迁于陵阳，非遥逐于沅湘，亦非指东迁于陈，其说是。

当白起烧夷陵，襄王走陈之时。是恐未然。[1]《哀郢》有云：“哀州土之平乐。”则其时非遭乱可知。曰“楫齐扬以容与”，岂离乱逃荒之情邪？曰“出国门而轸怀”，曰“发郢都而去闾”，曰“哀见君而不再得”，则其时乃初去郢也。或疑下文“至今九年不复”，为原迁于外之期，不知“不复”者言不复职耳。[2]曰“哀故都之日远”，则以楚曾徙都，后复还郢，故亦称曰“故都”[3]。屈子言故乡，但曰“日远”，盖以初违其地，渐去渐远。若耳闻秦袭郢，则何以无沦亡之语？且其沉痛，见于文词者，必不止如此。至“夏之为丘”二语，乃假设以寓讽谏之意，谓楚之将亡，故曰“曾不知”，谓彼狡童者，犹不知国之垂危也；曰“孰可芜”，谓泱泱之国，乌可任其废坠也。盖郢亦曾亡于吴矣，今复丧权失地，垂于危殆[4]，故屈子不忍而言之，是即伍子胥“吴其墟矣”之意。[5] 夫哀郢者哀其国之垂亡，非已亡而哀之也。解者不察，徒见其有“夏为邱”、“东门可芜”之语，遂指为秦兵入郢事，不其诬乎！

楚黔中考

（一）

昔人说楚地黔中，多本秦汉郡地为说，谓其所理在武陵，说始于郦道元。《水经·沅水注》云：“临沅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6] 后之释地者多从是说，《史记·苏秦列传》，秦说楚威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张守节

---

① 朱子亦谓两东门之废芜在秦拔郢烧夷陵后，然终以秦拔郢在襄王二十一年，原其时是否尚在为疑。盖以此推原之卒年，自不可恃。

② 《九叹·离世》云：“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注：“言已放出九年，君不肯返我。”范希曾《屈子生卒年月及流放地考》，依汪中《释三九》谓“九”非实数，但言为时之久。王白田《草堂存稿》三《书楚辞后》则谓：“《哀郢》九年不复，则初无召用、再放之事。”咸解为放逐九年，予谓由“发郢都”、“出国门”之语观之，是原时初去郢，再由“冀一反之何时”、“信非吾罪而弃逐之”之语观之，则其时为初放。谓弃外九年，殊与此弗合。“复”字苟如予说更可通。

③ 游国恩以故都即故乡故宇故居之义，不知题曰“哀郢”，都字自对郢言，非泛指也。钱穆曰：“《哀郢》为顷襄东迁陈作，以‘哀故都之日远’一言证之已信。若非迁都，则郢不称故都。”是亦未明楚迁都后复还郢，郢可称故都之义。

④ 谅指怀王事。

⑤ 请参看光绪《荆州府志》七《古迹》龙门条注。

⑥ 全祖望曰：“省巫，盖并入黔中。《水经注》谓割黔中置武陵，非也；汉改其名，非割也。”

《正义》曰："今朗州[1]，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后也。"[2]《御览》一百六十八朗州引《史记》曰："秦惠王十四年，求以武关外就楚，易黔中地。"[3] 此并以秦郡为说。清全祖望曰："黔中，故楚置，昭襄王三十年因之，汉之武陵。"[4] 张琦曰："黔中，今湖南辰、沅、常德、永顺、保靖诸府，及岳州府之澧州皆是。"[5] 程恩泽曰："揆之《汉志》，大约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永顺、澧州、靖州，岳州之华容，及湖北荆州之公安，宜昌之长阳，皆古黔中地。"[6] 此又皆以荆湖地说之。予按，《汉书·地理志》但云："武陵郡，高帝置。"不及黔中。《续汉郡国志》："武陵郡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7]《旧唐书·地理志》："朗州，汉临沅县治，属武陵郡，秦属黔中郡地。"则言秦之黔中，而不及楚。考《策》、《史》诸言楚黔中者，揆其形势疆域，迥异乎秦汉，且所理亦不在武陵，《水经注》盖误以秦汉之郡治说之。唐宋元地学者，如杜佑、李吉甫、欧阳忞、乐史、胡三省辈，不从其说，良为有识；清人不察，误依郦注，仅以湖南说楚黔中疆域，而反以《通典》说为误，非也。今更为纠正解释如下。

《通典》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黔中郡黔州[8]，古蛮夷之国，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谓之五溪，秦属黔中郡。"是说甚确。盖楚黔中，本治在唐黔州，秦移治于武陵[9]。《御览》一百七十一引《十道志》云："黔州黔中郡，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太平寰宇记》百二十："黔州[10]，历古蛮夷之地，战国时楚黔中地。昭王伐楚，得其地，因置黔中郡于今辰州，是故《汉书》通谓之五溪之地，在汉为武陵郡之酉阳县地。"此指秦移置最显。考《十道志》于朗州条，别云："《春秋》及战国时，属楚，秦为黔中郡。"立言殊有分寸。[11]

---

① 即今湖南常德。

② 《通鉴地理通释》十采是说。

③ 案是意以黔中为朗州。

④ 《汉书地理志稽疑》一。

⑤ 《国策释地》上《秦策》"南有黔中巫山之限"注。

⑥ 《国策地名考》七楚黔中条，案云"见秦"。以秦、楚黔中混为一说，未曾加以厘别。

⑦ 《宋书·州郡志》，二志文俱见引。

⑧ 原注，今彭水县。

⑨ 即朗州。

⑩ 原注黔中郡，今理彭水县。

⑪ 同治《武陵县志》一《地理志》谓武陵，战国属楚，秦为黔中郡地，亦不言武陵即楚黔中地所在。

《秦本纪》："昭襄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正义》："今黔府也。"《正义》成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所言"今黔州"，当为先天、开元时置者。《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一："先天二年，罢播州都督府，复以黔中为都督府。"即此是也。[1]《秦本纪》又云："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正义》引《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2] 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正义》："黔中郡反归楚。"此处黔中，《正义》皆以今湖南地为说。云"故城在辰州沅陵西二十里"，乃说秦黔中郡，非楚黔中也，其说楚黔中者，于《秦本纪》昭二十年注"在黔府"；而《苏秦传》则云："朗州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前后差异，其《苏秦传》言"在辰州西"者，乃误引《括地志》言秦郡者为说，当以《秦本纪》释在黔府为正。楚黔中之疆域，《国策》吴师道注引《大事记》曰："今黔、辰、施、沅等州。"说本无误，而张琦非之，曰："此以隋唐之黔州为秦楚之黔中，其误始自《通典》。"不知张守节已前言之，且秦楚之黔中，《通典》实分言甚晰，未曾殽掍为一。《通典》："朗州[3]，春秋战国时，皆属楚地，秦昭王置黔中郡，汉高更名武陵郡。"此言秦之黔中郡也。"澧州[4]，春秋时，楚地，秦属黔中郡。"此言秦黔中郡之所属，而不言楚黔中也。"巫州[5]，古蛮夷之境，楚国黔中之地，秦属黔中郡。"此兼言秦、楚黔中之所属也。杜佑分析至显，后之学者，大率以楚秦之黔中混为一谈，而转疑杜氏为误，不自知其不曾详察也。《史记》苏秦说楚西有黔中，裴骃《集解》引徐广《音义》曰："今之武陵地。"考晋时，武陵郡统县十：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黚阳、酉阳、镡城、沅南、迁阳、舞阳[6]，宋时县数同，惟省

---

① 《通典》称："黔中，大唐复为黔州或黔中郡。"考《元和志》："天宝元年，改为黔中郡，六年，都督萧克济以旧城倾敧，移筑江畔，乾元元年，复为黔州。大历四年，以辰锦等五州为辰锦观察使。至十年，奉敕郤隶黔府。"《通典》："奏上于贞元十九年二月。"（此据《唐会要》三十六，《旧唐书》十三作贞元十七年十月。）则杜所记州郡，当为贞元前置者。

② 《地理通释》十引无"江南"二字，非。

③ 原注，今理武陵县。

④ 原注，今理澧阳县。

⑤ 原注，今理龙标县。

⑥ 《晋书·地理志》。

镡城[1]；入辰阳[2]，武陵郡酉阳即唐宋黔州黔中郡地。[3] 徐氏以楚之黔中当晋宋时武陵地，约略为说，虽不言其所理，要示楚黔中疆域固西及于今彭水。可见杜氏等说，与之无忤，彼清世学者，徒以荆湖之辰、沅、岳澧为说，而反目"语及黔州"者为谬妄，又益见其不征耳。

(二)

《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一："黔州，本汉涪陵县理。……宇文周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郡犬羊难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理义宁，即今辰州溆浦县是。后魏移理临沅，即今辰州是。今辰、锦、叙、奖、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而今黔中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东注洞庭湖，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4] 此论甚详悉，秦置黔中郡，其疆域与所理，可以概见。此但言秦汉之黔中与隋唐异耳，而未论及楚之黔中也。程恩泽乃据志以山川隔绝，分别唐黔州与古黔中之异，谓古黔中地，仅湖北西南郡，湖南西北部、西南部而已，因定秦楚黔中不及四川之境，不知《元和志》言古黔中，乃指秦汉，不宜与楚之黔中同论。今本张守节、杜佑之说，楚黔中当在唐黔州，惟疆界则稍广，跨有湖南西南，及四川东北一小部分也。后魏武陵治临沅，故郦元以临沅为楚黔中，乃误以秦黔中郡为说，盖未能细加厘别耳。[5] 予考楚黔中治，当在唐黔州，稽之史策言秦楚疆界，及当时交兵形势，亦有可为佐证者。

(1)《通鉴》二："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正义》："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6] 由是观之，巫、黔二

---

① 《元和郡县图志》云晋文帝省。

② 《晋书》徐广本传："孝武世，除秘书郎，与校秘书。义熙初，封乐成侯。"《宋书》及《南史》本传并云："永初元年，诏除中散大夫。"是徐广盖晋末宋初时人，所著《音义》成书年代无考，姑从其时州郡为说。

③ 前续《汉地志》武陵郡并有酉阳，晋、宋因之。

④ 亦见《寰宇记》百二十涪州案语，胡三省《通鉴》四注，《清一统志》二百八十四辰州府古迹黔中故城下注同。

⑤ 史念海氏《秦县考》据沅水《注》以临沅即楚秦之黔中郡治，殊误。

⑥ 自湖北巴东、恩施、建始，皆楚巫郡之地。程恩泽说。

地在江之南，而复接壤。此黔中非唐黔州不足以当之。《秦策》，苏秦说“秦南有巫山黔中之限”①。《楚策》：“苏秦说楚西有黔中巫郡。”黔中在秦之南，楚之西，形势尤合。若为沅陵，则正居郢南之西，去洞庭不远，不当云秦南矣，与楚西亦未尽合。

(2)《燕策》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② 鲍《注》：“枳属巴部③。谓失地，秦昭廿七、廿八、廿九年连拔楚郡。”《史记正义》：“今涪州城在秦枳县，在江南。”《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一云：“《华阳国志》曰：‘涪陵，巴之南鄙，从枳县入泝涪水枳县，即今涪州所理是也，与荆楚界相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黔中地④。汉为涪陵县地。’”胡三省《通鉴注》：“汉之涪陵今彭水县；今之涪陵，乃汉枳县。”洪亮吉曰：“今四川重庆府之涪州及长寿南川二县，皆汉枳县地。”盖汉涪陵即隋后之彭水⑤，亦即唐黔州所理，亦即楚之黔中；汉巴郡枳县，即唐后之涪陵，亦即战国之枳，今涪陵长寿南川地与彭水正相接，所谓“自枳取黔中”，形势甚合。李吉甫奏：“涪州去黔州三百里。”⑥是秦兵自陇循西汉水顺流而下，即达枳地，稍东，遂可获黔中⑦矣。《秦本纪》：“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伐楚黔中，拔之。”楚黔中在今蜀极东南之境，故秦师因蜀发兵，一举而得。胡三省曰：“秦兵时因蜀，出巴郡枳县，以攻楚之黔中。”是也。⑧ 若在今湖南沅陵，则蜀师东下，应越峻岭，入五溪蛮夷之地，乃可进窥之；不然，则当在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之后，再击取之。然据《秦本纪》，拔黔中早在袭郢前二年，可以知其不然。是楚黔中地，宜当西汉水，故秦师下枳，即能得之也。

(3)《秦本纪》：“昭襄二十七年，拔楚黔中；二十九年，取郢为南郡；三十年，取巫郡江南为黔中郡。”是秦黔中郡地广，盖包有楚故黔中，及巫郡江南诸地。旧楚黔中，即楚置黔中郡之一部也。《六国表》：“楚顷襄王二十二

---

① 《史记》不载此文。近人张公量《苏秦游说辨伪》疑苏秦此语有误，不知此乃言秦南接壤之境，非谓即秦地，应善会。

② 亦见《史记·苏秦列传》。

③ 此据《汉书·地理志》。

④ 《清一统志》三百十七酉阳州援此说。

⑤ 彭水，隋始置。《隋书·地理志》：“黔安郡有彭水，开皇十三年置。”唐后因之。

⑥ 《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一引。

⑦ 即今彭水。

⑧ 同治《涪州志》一涪陵江下引郦道元曰：“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见延江水注），盖皆涪陵江矣，昔司马错泝舟取黔中即此。”（即本《元和志》说。）

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其旧黔中，秦昭二十七年已为秦所拔，而三十年[①]复拔之者，盖前次之被拔，楚献汉北地以和，而秦归之；至秦拔郢，楚都沦陷，其西南一带，秦人拱手而得，黔中遂复为所有矣。《通鉴》四：“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汉北及上庸地。”《水经·沅水注》：“昭襄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是并黔中前次被拔，而秦复归之之证。楚黔中，处今四川东境，秦得其便，故先拔之；逮秦得郢都以南巫郡洞庭江南一带之地，疆土开拓，乃移其郡治于武陵。《晋书·地理志》荆州：“（秦）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中上脱“黔”字，毕氏未校，此指秦置黔中郡，盖合楚旧黔中及巫郡为之。[②]《晋志》又云：“灭楚之后，分黔中为长沙郡。”甄烈《湘川记》：“（秦）分黔中以南长沙乡为长沙郡。”[③]《通典》：“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初分黔中地为长沙郡。”据是，知秦昭置黔中郡所领之广，即长沙亦由黔中析置者矣。而楚旧黔郡之偏窄，其不得冒秦黔中治以为楚者，不待辨矣。

(4)《秦本纪》:“伐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水经·沅水注》：“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是江南亦即秦昭置黔中郡之一部，而别于旧时巫郡黔中者。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江南，楚时为邑，地为郢西南，盖居沅、湘、辰、溆之间。《秦策》：“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高注：“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是也。[④]秦昭置黔中郡，治于辰州西，乃楚故江南之境。知彼以故楚黔中在辰州者，其说非也。《舆地广记》二十八：“辰州，古蛮夷地。春秋战国属楚。秦昭襄三十年，取楚巫、黔中及江南地，置黔中郡。”欧阳氏说辰州，但言战国时楚地，而不云属黔中。征之杜佑、李吉甫、乐史之说，皆同。杜佑说巫州云：“楚黔中之地。”巫州今湖南黔阳县。《舆地广记》二十八黔阳县：“唐正观八年，置朗溪县，属叙州，后置黔江城，元丰三年，升为黔阳县。”是湖南西南角，古为楚黔中地，可证楚黔中疆域，当跨有今四川东南、湖南西南、贵州东北一带之地矣。

(5)《史记·西南夷传》:“楚威王时[⑤]，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舆地广记》三十二夔州路黔州引此。又云：“秦昭王伐楚，

---

① 见楚顷襄二十二年。

② 程恩泽云此似误，非。

③ 见王应麟《王会篇补注》引。《古逸丛书》本《寰宇记》引“长沙乡”，无“长”字。

④ 详予《江南解》。

⑤ 《后汉书》作顷襄王。

取黔中以属黔中郡。”是亦以为楚黔中，当在彭水黔江一带也。[①] 丁谦《西南夷传考证》云：“黔，水名，于义为黑，今曰乌江[②]，古黔中郡，即汉武陵。章怀注：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按辰州古黔水，必郡虽置此，其辖境均在乌江流域耳。”按此说是也。《华阳国志·南中》篇：“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杉。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是楚黔中正当沅水西及西南之地。《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一辰溪县五城山下引《武陵记》云：“楚威王使将军庄跻，定黔中，因山造此城。”辰溪即汉辰阳，即《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据是知辰州乃攻黔中西经之路，或黔中东境，是辰州非黔中郡所理，又明矣。

(三)

胡三省《通鉴注》：“黔中，汉为牂柯郡之地，唐为黔中节度。”[③] 程恩泽以为误，不知胡乃说楚之黔中非秦之黔中也，虽不尽确，亦未可厚非。今贵州东北地，楚为黔中，可无疑义。《后汉书·南蛮传》：“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是其时仍为蛮夷聚集之区耳。[④]

又考黔中形势，战国时在楚关系至重。《通鉴》三：“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里；不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⑤] 此可见其地之扼要，故苏秦说威王曰：“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⑥]、郢动。”下黔中则临郢也。[⑦]《史记·张仪列传》：“楚发兵而至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

---

① 宋黔州治彭水、黔江二县。

② 原注，今乌江下游，仍有黔江河之名。

③ 事在周显王七年。

④ 同治《武陵县志·沿革》按曰：“黔本置自张若。《后汉书》乃谓置自白起。是时起方麈兵鄢、郢，安得南反沅、澧。”案《史记·白起传》：“攻楚拔郢，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是白起固曾伐巫、黔中也。《方舆纪要》八十：“秦白起取巫、黔中，自是楚势益削；而沅湘以南皆秦境。”又武陵县临沅城下云：一名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因筑此城以拒楚”（《明一统志》说同），是张若为白起将，谓白起伐楚，并无误也。《武陵县志》八《建置志》引《旧志》云：“白起伐楚黔中，楚人张若筑城以拒之。”以张若为楚人，则尤转述而误矣。

⑤ 原见《楚策》一，及《史记·张仪传》，《七国考》。胡注：“境，楚境也，扞关，楚之西境，‘从境以东’，谓扞关以东也。”然《楚策》境作“竟陵”，《通鉴》盖本《史记》文。

⑥ 《楚策》。

⑦ 高诱说，《史记·苏秦传》，《正义》同。

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又云："怀王十八年，秦复约与楚亲，欲以汉中之半易楚黔中；怀王愿以黔中易张仪。……怀王既惑之，又重出黔中地，竟释张仪。"《楚世家》："秦留楚怀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盖巫、黔之地，故秦人所窥伺也，其在楚西形势之重，可知矣。

《华阳国志·蜀志》："周赧王七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按《六国表》，秦击楚，楚与秦汉北及上庸地，在楚怀王十九年，即秦昭王二十七年，周赧王三十五年。《张仪列传》："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武关外，《正义》云"即商于之地"，盖商于在汉北之境。《蜀志》述司马错即赧王三十五年事，而误以为七年，且谓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亦与旧记不合，今附为辨正。

（四）

《秦本纪》："昭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正义》："黔中郡反归楚。"《六国表》："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反秦。"《楚世家》："襄王收东地兵，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按据上诸文互勘之，知"江旁十五邑"，即楚反秦之江南，亦即秦昭王时置黔中郡，是秦得楚黔中，翌年，即被楚取回，且以为郡。楚所立郡，今无考，未知仍名黔中否，观反者十五邑，则其疆域非小可知。考《秦始皇本纪》：丞相御史曰："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荆地。"青阳，《集解》引苏林以为长沙县。《汉书·邹阳传》所谓"越水长沙还丹青阳"者①，是"青阳以西"，即"长沙以西"，所谓"江旁十五邑"，疑即此一带之域。云"畔约击南郡"，即自江南出兵也。《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此江南当即秦昭三十一年反秦者，若然，则秦拔楚之黔中郡，自反归楚后，至始皇二十五年始定之。乾隆《辰州府志·沿革考》："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中及江南为黔中郡。次年复归于楚，又五十四年，为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置黔中郡如故。"与鄙说正同也。盖秦得楚黔中地，为时至短，其黔中郡亦瞬刻为楚废，故论楚黔中郡，应分三时期为说：（1）未为秦拔前之楚旧

---

① 嘉庆《长沙县志·疆域》："临湘故城，在府城南，今善化县界楚青阳地。"

黔中；（2）秦昭拔楚黔中而新置者三十五邑；（3）反秦而楚取为郡之黔中。今但论楚旧郡未为秦拔之黔中，及秦昭置黔中之形势，至反秦后黔中之割置，旧记缺略，今所不论。

附按《寰宇记》旧缺百一十三至百一十九，凡七卷。杨守敬于日本取得残本，补刻入《古逸丛书》。今检百一十八澧州条云："澧州，春秋战国时，其地属楚，秦为黔中郡；汉改黔中为武陵郡。"此但云澧州属楚，是不及楚黔中。又朗州条："春秋及战国时，并属楚为黔中郡，汉高帝五年，更名武陵。"此条阙言秦，以本书澧州条，及《旧唐书·地理志》核之，盖脱"秦"字，当云"春秋及战国时，并属楚，秦为黔中郡"乃合。附辨于此。

附说　黔中与二酉

《楚辞地理考·楚黔中郡考》一文，为余弱冠时所作。据《通典》所记唐代黔州及乐史《太平寰宇记》黔州在汉为武陵郡之酉阳县地，区别楚的黔中，与秦置郡的黔中管辖广狭不同。由苏代对燕王言"楚得枳（巴南郡之涪陵）而国亡"一语，足证楚人的黔中地宜广及于四川东境。2002 年 6 月 4 日，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古城于井中出土大批秦简，近二万枚，提及之地名有酉阳、迁陵、沅陵等。里耶古城在酉水流域，与四川接壤，即汉之酉阳，地在辰州、沅陵之北，遗址有古城四座，其中可能有张若等所筑之城堡。

最有趣的是六朝以来的地方传闻，谓酉阳有秦人藏书。降及后代，酉阳遂成为藏书的典故，有"二酉"之称。明人胡应麟藏书处名二酉山房，王世贞为之记，实缘其地有大、小酉山，因以为名。考湖南方志，都说大、小酉山在辰州府的沅陵县。《湖南通志》卷二十四，引（清）《一统志》："小酉山在县西北二十里，一名乌连山，亦名酉阳山，又引《九域志》沅陵有小酉山。"《方舆胜览》：山在酉溪口，昔秦人避地之所。尧时善卷、唐张果皆尝隐居在此。又有大酉山条云："在县西北四十里，上有龙湫。山巅有善卷墓（据《明统志》）。又引杜光庭《洞天记》第二十六洞天志：大酉山，周回一百里，名大酉华妙（洞）之天，在辰州。"按杜说出其《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的"三十六洞天"条，原文但言"在辰州界"。别有"妙华洞"条引《方舆胜览》记唐时瞿柏庭"戏跃入井，忽自妙华洞中出"。但杜光庭书实称"大酉山大酉华妙洞天"不作"妙华"。流传名字，微有出入。又辰溪县下有"大酉洞，出

丹砂”。大西山一名异地重出。[①]

这一事有关的最早记载是刘宋时盛弘之的《荆州记》。《太平御览》四十九西楚南越诸山有“小酉山”条。文云：“盛弘之《荆州记》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兴是。”湘东王即梁元帝萧绎，今查《全梁文》，其遗文有《玄览赋》长篇，实不见“访酉阳”一句。《金楼子》亦无之。然自李昉引述是语，此说遂屡见后人征引。唐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其书有南宋嘉定七年永康周登后序云：“段成式为宰相文昌子也。文昌少客荆州，酉阳，荆之属，成式岂尝寓游于此耶?”余闻《方舆记》云：“昔秦人隐学于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书千卷。梁湘东王尤好聚书，故其赋曰‘访酉阳之逸典’。”段氏此书所以取名曰“酉阳”，即据这一故实。方南生撰《段成式年谱》引段文昌《修仙都观记》：“贞元十五年，余游岷蜀。”《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云：“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所命。”盖文昌曾参韦皋幕，元和元年，刘辟之变平定，文昌已离蜀返长安。据方氏《段成式年谱》，其随父在蜀时年方三四岁。迨穆宗长庆元年，成式十九岁，复随父赴成都。《唐书·宰相世系表》：“长庆元年，文昌为西川节度使。”新旧《唐书·文昌传》：“长庆二年，黔中蛮叛，观察使崔元略以闻，文昌一介开晓，蛮即引还。彭濮蛮大酋蹉禄来请立石刊誓修贡献。”成式时年方二十岁，随父在成都，想必曾同至黔州。及太和六年，成式复随父自荆州来成都，时文昌复为西川节度。其《修仙都观记》即作于太和七年正月。成式前后三度随父居蜀，故后来取酉阳以名其书。

余犹记往年游酆都，见壁间有文昌刻石，即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言：“段相国修丰都县平都山仙都观。”当日漫游所至，记忆犹新。湖湘方志言大小酉山在沅陵及辰溪，其地明清皆属辰州。但最先出秦人书简一说，依萧绎赋所言，乃在“酉阳”。汉武陵郡领县十三，索、孱陵、沅陵、迁陵、酉阳诸县名，均见里耶秦简。《元和郡县图志》谓今（唐）黔州彭水、黔江、洪杜三县，本汉酉阳县地，又云：“今思州在楚为黔中地。”金早岁考证楚黔中，即用此说。酉水源出充县酉原山，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里耶即其所经。以里耶秦简证先代秦人出千卷藏书，知此传闻必有根据。但不能确定大小酉山必在沅陵，沅陵有吴阳墓简册出土，岂昔年亦有秦简流散，故其山被目为大小酉山耶？道教徒取之为洞天之一，因之其名益著。今以段文昌抚黔中蛮

① 《正统道藏》册九，14286 页（艺文本）。

事证之，当依《汉书》之酉阳地为合理。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

> 辰州在五溪、二酉之间，盖汉五溪也。亦曰武陵蛮，雄溪、樠溪、酉溪、沅溪、辰溪，俱在今泸溪县辖。……余行其地，登水边石洞数处。咸云：伏波避暑洞。……由辰溪八十里即大酉，云黄帝藏书处，黔中他洞皆湿，唯大酉独干洁，遥望洞口石脊，亦似桥山。小酉在贵竹酉阳。（唐晓峰兄举出）

这是明人的记载，王氏曾亲至酉水，说大酉石脊似黄帝葬处的桥山。又说大酉是黄帝藏书处，《晋语》司空季子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其中一是酉，殷周铜器有“酉”族徽二十余器。酉爵出土陕西耀县，罗泌《路史·国名纪》：“酉即酉水，为黔之彭水。”是黔中酉水流域原为黄帝子“酉”氏封地，酉水一名即来自黄帝子酉氏姓，故其地又有“黄帝藏书”的传说，由是言之，二酉地望应以“黔中”近川境为宜，与里耶有简牍出土之事亦相符合。

《楚辞》地名索引

二画

〔九州〕

思九州之博大兮。(《离骚》)

纷总总兮九州。(《九歌·大司命》)

九州安错?(《天问》)

〔九坑〕(一作阬,洪兴祖以《吕览》、《淮南子》之九山释之。)

导帝之兮九坑。(《九歌·大司命》)

〔九河〕

与女游兮九河。(《九歌·少司命》,古本无此语,疑《河伯》章所羼入。)

与女游兮九河。(《九歌·河伯》)

〔九疑〕

九疑缤其并迎。(《离骚》)

九疑缤兮并迎。(《湘夫人》)

三画

〔三危〕

墨水玄趾,三危安在?(《天问》)

〔大海〕

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大招》)

四画

〔不周〕(王逸注:"山名,在昆仑西北。")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离骚》)

〔不死〕(《山海经》:不死民在交胫国东。)

何所不死?(《天问》)

留不死之旧乡。(《远游》)

〔长薄〕(王注:"地名,在江北。")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招魂》)

〔长人〕(王注:"长人,长狄,

《春秋》云防风氏也。”按即《山海经》大人之国。）

长人何守？（《天问》）

长人千仞。（《招魂》）

〔介山〕

封介山而为之禁兮。（《九章·惜往日》）

〔丹丘〕（《尔雅》：“自齐州以南戴日曰丹穴。”王注：“《九怀》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

仍羽人于丹丘兮。（《远游》）

〔方林〕

邸予车兮方林。（《九章·涉江》）

五画

〔代水〕

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大招》，一作伐水）

〔北山〕

望北山而流涕兮。（《九章·抽思》）

〔北姑〕

宿北姑兮。（《九章·抽思》）

〔北渚〕

夕弭节兮北渚。（《九歌·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九歌·湘夫人》）

〔北极〕

魂乎无往，盈北极只。（《大招》）

〔台桑〕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天问》）

〔四荒〕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离骚》）

〔四极〕

览相观于四极兮。（《离骚》）

〔四海〕

横四海兮焉穷。（《九歌·云中君》）

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大招》）

〔玄趾〕（一作沚，王注：“山名，在西方。”）

黑水玄趾。（《天问》）

〔白水〕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离骚》）

〔汉〕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九章·抽思》）

六画

〔交阯〕

北至幽陵，南交阯只。（《大招》，一作交趾。）

〔回水〕

北至回水萃何喜。（《天问》）

〔有狄〕

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天问》）

〔有娀〕

见有娀之佚女。（《离骚》）

〔有莘〕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天问》）

〔有虞〕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离骚》）

〔有扈〕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天问》）

〔江〕

使江水兮安流。（《九歌·湘君》）

横大江兮扬灵。（同上）

朝骋骛兮江皋。（同上）

驰余马于江皋。（《九歌·湘夫人》）

捐余玦兮江中。（同上）

捐余袂兮江中。（同上）

旦予济乎江湘。（《九章·涉江》）

遵江夏以流亡。（《九章·哀郢》）

江与夏之不可涉。（同上）

上洞庭而下江。（同上）

悲江介之遗风。（同上）

泝江潭兮。（《九章·抽思》）

遵江夏以娱忧。（《九章·思美人》）

隐汶山以清江。（《九章·悲回风》）

浮江淮以入海兮。（同上）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渔父》）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

〔江南〕

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

〔羊肠〕

西薄羊肠，东穷海只。（《大招》）

〔羽山〕

日鲧幸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离骚》）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天问》）

〔西海〕

指西海以为期。（《离骚》）

〔西澨〕

夕济乎西澨。（《九歌·湘夫人》）

〔西极〕

夕予至乎西极。（《离骚》）

〔汤谷〕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天问》）

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全身兮九阳。（《远游》）

魂乎无东，汤谷寂只。（《大招》）

七画

〔扶桑〕（《说文》作榑桑，《山海经》作扶木。）

总余辔乎扶桑。（《离骚》）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九歌·少司命》）

〔苍梧〕

朝发轫于苍梧兮。（《离骚》）

〔庐江〕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招魂》）

〔岐〕

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天问》）

〔岐山〕（一作崏；一作汶）

隐岐山以清江。（《九章·悲回风》）

〔穷石〕

夕归次于穷石兮。(《离骚》)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天问》按《山海经》“轩辕之国在穷山之北”，即此。)

〔沅〕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

令沅湘兮而无波。(《九歌·湘君》)

沅有茝兮醴有兰。(同上)

乘舲船予上沅兮。(《九章·涉江》)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九章·怀沙》)

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九章·惜往日》)

〔沧浪〕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

〔赤水〕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离骚》)

〔辰阳〕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九章·涉江》)

〔县圃〕

夕余至乎县圃。(《离骚》)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天问》)

〔阰〕(王注：“山名”。《埤苍》：“山在楚。”)

朝搴阰之木兰兮。(《离骚》)

〔条〕(王注：“鸣条也。”)

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悦。(《天问》)

八画

〔空桑〕

逾空桑以从女。(《九歌·大司命》)

〔於微闾〕(《尔雅》作医无闾，一作微毋闾。)

夕始临乎於微闾。(《远游》)

〔枉渚〕

朝发枉渚兮。(《九章·涉江》)

〔河〕

与女游兮河之渚。(《九歌·河伯》)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天问》)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同上)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九章·悲回风》)

〔昆仑〕

邅吾道夫昆仑兮。(《离骚》)

登昆仑兮四望。(《九歌·河泊》)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天问》)

登昆仑兮食玉英。(《九章·涉江》)

冯昆仑以瞰雾兮。(《九章·悲回风》)

九画

〔南州〕

嘉南州之炎德兮。(《远游》)

〔南土〕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天问》)

汨徂南土。（《九章·怀沙》）

〔南夷〕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九章·涉江》）

〔南国〕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九章·橘颂》）

〔南疑〕

我将往乎南疑。（《远游》）

〔南岳〕

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天问》）

〔幽陵〕

北至幽陵。（《大招》）

〔咸池〕（王注："日浴处也。"）

饮余马于咸池兮。（《离骚》）

与女沐兮咸池，晞余发兮阳之阿。（《九歌·少司命》）

〔洞庭〕

邅吾道兮洞庭。（《九歌·湘君》）

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

上洞庭而下江。（《九章·哀郢》）

〔洧盘〕（王注："洧盘，水名。《禹大传》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

朝濯发乎洧盘。（《离骚》）

〔重泉〕

汤出重泉，夫何罪尤。（《天问》）

十画

〔夏〕

遵江夏以流亡。（《九章·哀郢》）

江与夏之不可涉。（同上）

遵江夏以娱忧。（《九章·思美人》）

〔夏首〕（王注："夏水口也。"）

过夏首而西浮兮。（《九章·哀郢》）

〔夏浦〕

背夏浦而西思兮。（同上）

〔阆风〕

登阆风而緤焉。（《离骚》）

〔流沙〕

忽吾行此流沙兮。（《离骚》）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招魂》）

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大招》）

〔郢〕

发郢都而去闾兮。（《九章·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同上，又见《抽思》）

〔高丘〕（王注："楚有高丘之山。"）

哀高丘之无女。（《离骚》）

〔涔阳〕

望涔阳兮极浦。（《九歌·湘君》）

十一画

〔梦〕

与王趋梦兮课复先。（《招魂》）

〔黄棘〕

施黄棘之枉策。（《九章·悲回风》）

〔崦嵫〕（王注："日所入山也。"按《山海经》鸟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离骚》）

〔淮〕

浮江淮而入海兮。（《九章·悲回风》）

〔逴龙〕（王注："山名。"）

北有寒山，逴龙绝只。（《大招》）

〔陵阳〕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九章·哀郢》）

十二画

〔寒山〕

北有寒山。（《大招》，《淮南子》曰："北极之山曰寒门。"）

〔傅岩〕

说操筑于傅岩兮。（《离骚》）

〔朝歌〕

吕望屠于朝歌兮。（《九章·惜往日》）

〔湘〕

济沅、湘以南征兮。（《离骚》）

令沅湘兮无波。（《九歌·湘君》）

且予济乎江湘。（《九章·涉江》）

浩浩沅湘。（《九章·怀沙》）

临沅湘之重渊兮。（《九章·惜往日》）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史记》作常流。）

使湘灵鼓瑟兮。（《远游》）

〔溆浦〕

入溆浦余儃佪兮。（《九章·涉江》）

〔鄂渚〕

乘鄂渚而反顾兮。（《九章·涉江》）

〔黑水〕

黑水玄止。（《天问》）

十三画

〔蒙山〕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天问》）

〔蒙汜〕（《尧典》："宅西曰昧谷。"《淮南子》："沦于蒙古，是谓定昏。"并此异名。）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天问》）

〔斟寻〕

覆舟斟寻，何道取焉？（《天问》）

〔嵞山〕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天问》）

〔雒〕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天问》）

〔雷渊〕（《文选》作雷泉，《山经》作雷泽。）

旋入雷渊。（《招魂》）

十四画

〔瑶圃〕

吾与重华游于瑶之圃。（《九章·涉江》）

十五画

〔嶓冢〕

指嶓冢之西限兮。（《九章·思美人》）

十六画

〔冀州〕

览冀州兮有余。（《九歌·云中君》）

二十画

〔醴〕（亦作澧。）

沅有茝兮醴有兰。（《九歌·湘夫人》）

〔醴浦〕

遗余佩兮醴浦。（《九歌·湘君》）

遗余褋兮醴浦。（《九歌·湘夫人》）

附宫阙名

〔春宫〕

溘吾游此春宫兮。（《离骚》）

〔瑶台〕

望瑶台之偃蹇兮。（《离骚》）

〔璜台〕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天问》）

〔两东门〕

孰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

〔修门〕（王注："郢城门也。"）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招魂》）

〔龙门〕（王注："楚东门也。"）

顾龙门而不见。（《九章·哀郢》）

〔寒门〕（王注："北极之门也。"）

逴绝垠乎寒门。（《远游》）

此编以《四部备要》本《楚辞补注》为据。自《惜誓》以下为汉人拟骚之作，不加采入。兹缀录地名，并著其文，略附注语，以备参稽。至郑、卫、秦、楚、陈、吴诸国，名属常见，概摈不录。《九辩》"放游志乎云中"，近人或谓此"云中"即指云梦，与《九歌·云中君》之"云中"所指相同，然细审其原文，《九歌》云："猋远举兮云中。"洪兴祖引《大人赋》"猋风涌而云浮"解之；《九辩》一语，王逸注云："上从丰隆而观望。"说俱是也。以为地名，与原意不合，附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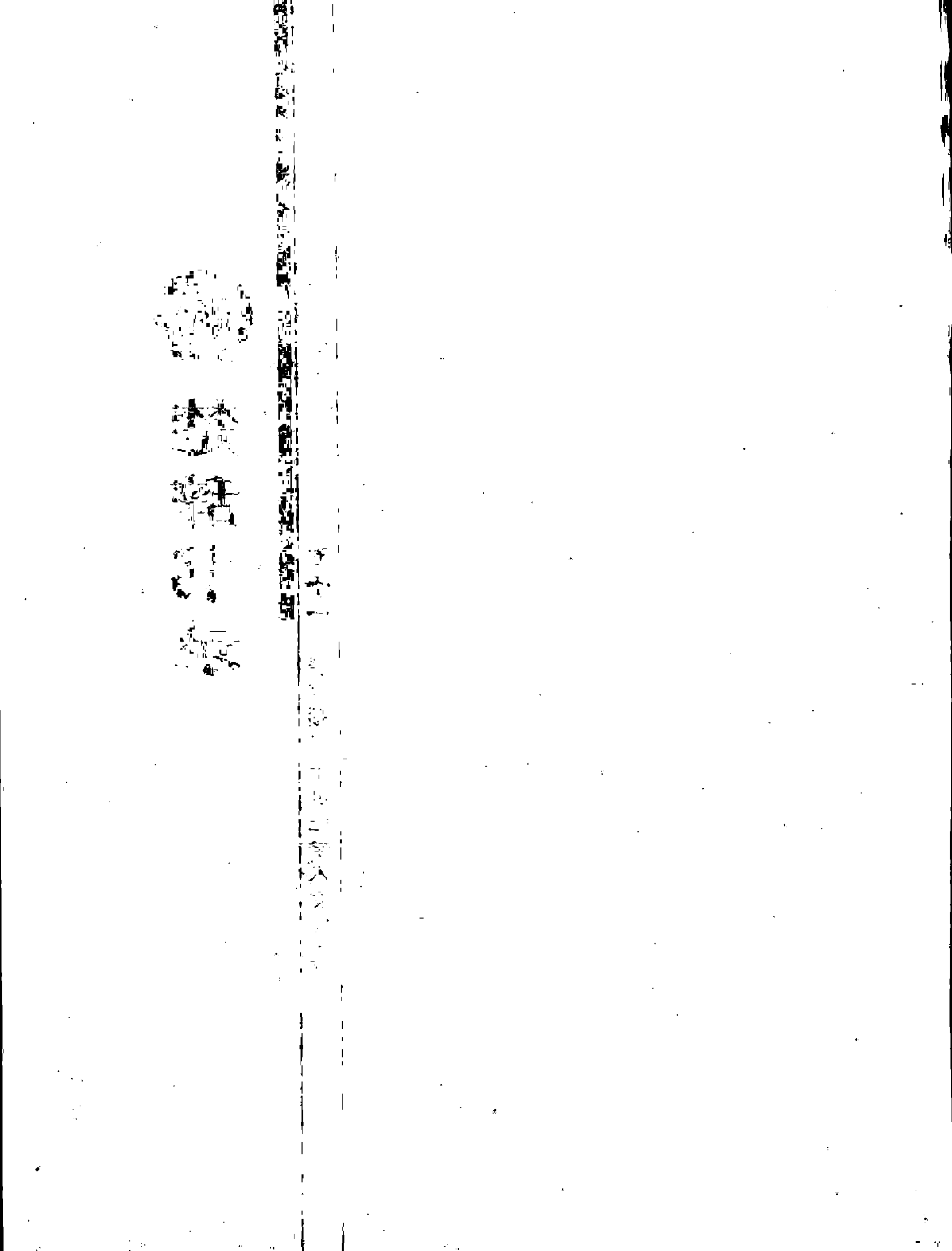
编者识



楚辞书录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目　录

曾 序

余尝以为治学一也，而古今难易殊焉。古者阻山川、艰锓镂、秘藏庋，故得书非易；其能以博赡名者，非其智有以大过乎人；其势位所遭，耳目所及，取精用宏，斯乃非乡曲一孔之儒所可几。而凡为学者，势必置之通邑大都，知风会所扇，获友师之益，非独闻见博，而故书雅记，尤得恣其广罗穷搜也。今者海寓大通，印刷术日猛进，举古所谓不能通之域不能得之书，无不可恣吾力以通之得之；则扬阐国学以光被四表，当大异乎前。而际兹汇通绝续之交，朝野肩斯文任者，独未闻有博综远绍之举，值亘古无前之会，而所见不越往乡曲之儒，岂智不若人邪？抑以其劳多而获寡，任重而名轻，故谢不为邪？吾独以为居今日而言学，于吾三古之书，百家之说，苟不能尽取海内外所藏秘本遗编，博稽而精校，穷本以钩玄，然后疏通而证明之；虽日号于众曰：吾日以著述为务，而究其所得，非向壁虚造，即掇拾唾余，或义新而鲜征，或理肤而辞费，足以骇庸众而不足以诒识者，固无以学为也。深识之士，卓然有立，其必有不随流俗为移转者在，而肩是者谁邪？间尝与饶子固庵言之，饶子因以所次《楚辞书录》示余，曰：是或子之志欤？其为我序之。余受而读之，则闳博精审，大异今士所为。诚治骚之先路，而乃于饶子发之，其能探治学之本，故著书满家，非苟为炳炳烺烺者也。抑余以为故书广矣，其待为目录提要者亦夥矣。饶子独于此时以《楚辞》先者，是岂仅赏其文辞之美邪？殆以身世所遭，与屈子无殊。《哀郢》、《怀沙》之痛，明王宗国之思，无人故都之叹，虽避地海隅，固未尝梦寐忘也。则以纂辑之劳，

寄怨悱之旨，其精神肸蚃，若屈子之灵，有以默相而阴启之也。其微旨所寄，所以诏国人范来学，意至深切警悚矣。世之有志于学者，苟本其义例，以讨究三古之书百家之说，博综约说，废起幽豁；其于发扬国故，作新民德，庶有豸乎！余以其著一书而二义备，因不辞谫陋而为之序。

乙未嘉平福州曾克耑

自　序

余辑《楚辞书录》竟，乃为序曰：屈子之书，自汉以来，或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于传。彦和则为调停之说，揭其同于风雅者四，异于经典者亦四。今观《离骚》，每摭经语，如奔走先后，明出于《诗》；謇謇为患，则本诸《易》。设非浸淫于经典者深，能如是？晦翁谓其志行或过于中庸，不可以为法。窃不谓然。其言曰："耿吾既得此中正。"又曰："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此其深契于《易》中正之义，从容中道，信道笃而自知明，固昭昭可睹也。《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今读《离骚》纷有内美，信姱练要，亦予心之所善，虽九死犹未悔，此本诸身者也；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终不察乎民心，瞻前而顾后，相观民之计极，此征诸庶民者也；法三后之纯粹，依前圣以节中，此考诸三王而不谬者也；指九天以为正，虽体解犹未变，此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夫其缱绻恻怛，不能自已者，所以自道其好修之故；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而无悔；以至于曲折反覆，累欷而重言之，盖当众阴疑阳之际，不如是，不足以宣其内美也。夫内美者何？《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屈子所谓内美者，非此而何耶？晦翁谓其不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是不知屈子之用心者矣。窃尝试论：自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申叔时对楚庄论九教，亦以

《诗》、《礼》、《乐》为先。故史老语楚灵王则引《说命》，伍举则引《灵台》，俱见于《楚语》，此北学南被之明征也。由是观之，屈子之学，源出于儒，盖不诬已！或以《离骚》侈陈怪谲，周流于天，升降上下，至目之为天学，如廖平之所云；不知此乃所为建天地质鬼神，要以明其耿吾中正之志耳，又乌得以天而限之哉？夫古人远矣，诵其书者，贵能窥其志之所存。善夫太史公之赞曰："予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盖《诗》、《书》隐约，欲遂其志，于《骚》何独不然？故《离骚》者，诗也。其论次前古治乱之故，则诗中有史矣。若史公之作，其文则史，而其志则兼《诗》、《骚》而有之，可谓以《诗》、《骚》为史者也；是不特《骚》源于《诗》而通于史，而史亦出于《诗》而合于《骚》，此史公所为独绝千古也。虽以晦翁沉潜之深，犹有未达，益见知人论古之不易。予悲屈子内美之合于《易》、《庸》中正之义，犹暗晦而不见白于后世也，故因是书而发之。

乙未端午，饶宗颐选堂序

书　录

知见《楚辞》书目第一

《楚辞章句》十七卷　汉沛国刘向编集　后汉南阳王逸章句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楚辞》十七卷，后汉校书郎王逸叔师注。屈平自伤忠而被谤，乃作《离骚经》以讽。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以《大招》为原作，乃皮日休说，非刘向编次），自沉汨罗以死。其后宋玉作《九辩》、《招魂》，及贾谊《惜誓》、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皆拟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汉武时，淮南王安始作《离骚传》。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至逸自以为南阳人，与原同土，悼伤之，复作十六卷《章句》。又续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为十七篇。然谓《大招》为原辞，可疑。夫以招魂为义，死非自作，或曰景差，盖近之。卷后有蒋之翰跋，云晁美叔家本也。"《四库提要》云："刘向编集《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天圣十年陈说之《序》谓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知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姚振宗云："逸进于朝，其本十六卷，自序言之甚明，是为经进本；其十七卷者，盖私家别本也。"（《隋书经籍志考证》）

北宋本　即明夫容馆本所祖。夫容本篇目后题宋版重雕；一行大题《楚辞》

卷之几，次行汉刘向编集，三行王逸《章句》；较俗本多刘向一行，犹存原式。书中避钦宗讳桓嫌名，特为谨慎。故叶德辉云："当为北宋靖康时刻。"惜世未之见。（季沧苇《书目》有宋刊本《离骚》四本，又宋版《楚词》三本，未审为何本。）

元刊本　许维遹《楚辞考异补》稿引之。（原书未见，据闻一多《楚辞校补》引。季沧苇《书目》有《楚辞》十四卷，四本，元刊。未详何本。）

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　西蜀高第刻，吴郡黄省曾勉之校。此为明代《楚辞章句》第一刊本。首题"汉刘向子政编集王逸叔师章句"一行，加"后学西蜀高第吴郡黄省曾校正"一行。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有正德戊寅王鏊序。（《郎园读书志》卷七有跋。考邵懿辰《四库标注》、闻一多《楚辞校补例言》分王鏊与黄省曾为两本，皆误。）北平图书馆藏。王国维《跋》云："书中不避宋讳。然目录自《九章》（按当作《九歌》，明刊《楚辞补注》及端平本《集注》皆同）至《九思》均有'传'字，与洪兴祖《补注》所引一本合。"（《观堂别集三》）

隆庆五年辛未刊本　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仿宋刻。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十八字。宋讳缺笔。有王世贞序，云："宗人用晦得宋《楚辞》善本，梓而属序。"篇目后有"隆庆辛未豫章夫容馆宋版重雕"一行。（《郎园读书志》、《经籍访古志》、莫氏《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并有考。）北平图书馆藏。双鉴楼有杨守敬旧藏并跋。又嘉业堂藏八册。

万历翻夫容馆本　行款同夫容本，卷一末有姑苏钱世杰写、章芝刻双行，为隆庆本所无。万历凌迪知刻《楚骚绮语》，版心有"钱世杰写"字样，可证此为万历翻本。此本宋讳不缺笔，详缪氏《艺风堂续记》。（郎《志》云：森立之《访古志》载有无名氏明翻宋本，无刻行年月，宋讳缺笔。又有此本云宋讳不缺笔，双边，当为重写而非影模。然与朱燮元本又各异。）

万历苏州郡守朱燮元刻本　行款与夫容馆同，亦附《疑字直音》。题朱燮元懋和朱一龙官虞校刻，无刊刻年号。前有予告大学士申时行序（时行以万历六年三月官东阁大学士，据署衔知此书为万历寺重雕夫容本，详《郎园读书志》）。六册。章句后附篆文《楚辞》，题朱官虞辑。《故宫善本目》著录。燮元，山阴人。生嘉靖四十五年，卒崇祯十一年。上海会文堂有石印本，眉上附蒋骥注。

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刊本　题："汉刘向子政编集王逸叔师章句"，"明后学武林冯绍祖绳武父校正"二行，第一页书口有"杭州郁文瑞书"，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凡十七卷。前有"冯绍祖万历丙戌序"，又有万历柔兆阉茂之岁钱塘黄汝亨贞父序：谓"绳武博物能裁，蒐自刘王，讫于近代"。首有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五则：一印古，二铨故，三遴篇，四核评，五译响。又附《屈原传》（《史记》)、各家《楚辞》书目（钞晁氏《读书志》及《直斋解题》)。又有《校楚辞后序》，署"万历丙戌盐官冯绍祖绳武父书于观妙斋"。见《皕宋楼藏书志》六七，《善本书室藏书志》二三。浙江图书馆收入善本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八册。又一本题《楚辞句解评林》，仍作十七卷，而实得一册，冯绍祖《后序》原题万历丙戌月轨青陆，此则改"丙戌"为"丁亥"，黄汝亨《序》亦缺末叶，两种皆日本内阁文库藏。

万历十四年俞初校刊本　十卷，有新都吴琯万历丙戌（十四年）序，谓王孙本已漫漶，予友俞太初氏复校以入梓。日本内阁文库藏四册，有林道春罗山手校并跋。(书影见本编卷首。)

万历凌氏刊陈深批朱墨本　十七卷，朱题王逸叙次，首楚骚，附录《史记·屈传》，题万历庚子（二十八年）九月王穉登书，每卷末附音义，移王世贞序于书末，卷终题吴兴凌毓楠殿卿父校。日本多藏此书，内阁文库八册，尊经阁、岩崎文库、京都大学语文学研究室俱藏四册。陈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雷州推官。(内阁文库《目》题陈深为宋人，尊经阁《目》作元人，皆误混为著《宁极斋集》之陈深。)

明杨鹤刊本　八卷。邵氏《四库标注》著录。

清嘉庆六年辛酉大小雅堂刊本　用隆庆重雕宋本，四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云："此刊草率殊甚，盖实祖万历翻本也。"

光绪十七年赵尚辅《湖北丛书》本　十七卷，版藏三余草堂。三册。

外国刊　日本宽延三年（即乾隆十五年）庄益恭（子谦）校刊本。首有服元乔序，附《楚辞音》。(刘师培《楚辞考异》据校，谓明刊而外，惟日本庄益恭此本较为精善。)

重定《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　宋济北晁补之无咎撰

补之少从苏轼游，著有《鸡肋集》七十卷。《楚辞》十六卷，旧录也；《续变》四十卷，新录也。(集中卷三十六有《离骚新序》三篇、《续楚辞序》一篇、《变离骚序》二篇，古少其例，可谓颛门之业。)其《离骚新

序》中篇曰："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卷，王逸传之。按八卷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集注·续离骚·九辩》第八下注晁本此篇以下有'传'字）。天圣中有陈说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补之以《大招》古奥，为原作，故迁次《渔父》后，是为《楚辞》上八卷。以宋玉《九辩》、《招魂》及贾谊、褒、向等西汉以前文为《楚辞》下八卷。而以王逸《九思》、韩愈《复志赋》等凡二十六人，共六十篇，为《续楚辞》。又录荀卿《成相》至李白《鸣皋》、顾况《招北客》等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为《变离骚》。《续》、《变》二编皆《楚辞》流派，又区别之云："《楚辞》已非《离骚》，《楚辞》又变，则无《离骚》矣，无以复知此始于屈平矣。"朱熹《楚辞后语》，即据晁书增删而成。《文渊阁书目》（九）有《续楚辞》、《变离骚》二部各三册。《四库提要》谓补之书不传。《山东通志·艺文》著录，未记存佚。但近人王泗原自述校勘《离骚》异文所据本，有道光十年重刊本晁补之《重编楚辞》。

《楚辞补注》十七卷《考异》一卷 汉王逸章句宋丹阳洪兴祖庆善补注

兴祖，政和进士，南渡后授秘书省正字，知真州、饶州，忤秦桧，编管昭州卒，见《宋史·儒林传》。晁公武与兴祖同时，其撰《读书志》著录《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而称未详撰人。《直斋书录》云："兴祖少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其篇次与《四库》著录王逸本同）。书成，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末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校正以补《考异》之遗。"知《考异》原别为一卷，然明刊本已散入各条之下。

明复宋本 每叶十八行，行十五字，注行二十字，宋讳缺笔，《考异》不别出。（详《皕宋楼藏书志》六七，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三。）《四部丛刊》重影印底本为钱塘丁氏旧物，现藏江苏省立图书馆。明版又有后印刓改本，兴宁罗氏藏。

按《四部》影本，乃初刊本，间有误字，如《离骚》"纷秋兰以为佩"之"纷"字，及《大司命》注"其非宫中少神明矣"之"少"字，后印本则刓改为"纫"、"小"。（图一九）

汲古阁毛氏重刊宋本 半叶九行，行十五字，注双行二十字，每卷首尾各叶版心有"汲古阁"字（见汲古阁《校刻书目》）。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室

藏四册，有王念孙校笔。（日本京都研究所《汉籍目》注：汲古阁校吴郡宝翰楼刊本。）

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仿汲古刊本　五册。日本静嘉堂藏竹添光鸿手校本。（竹添光鸿字渐卿，称进一郎，号井井，天草人，居东京。著有《左氏会笺》。）

《惜阴堂丛书》本　清道光间李锡龄辑，在第十五函。光绪二十二年长沙重刊。

湖北崇文书局本　十七卷，四册。

外国刊　日本宽延二年（即清乾隆十四年）刊本，静嘉堂、内阁文库并藏，八册。

《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建安朱熹元晦撰

《四库提要》云：朱子以王、洪二书，详于训诂，未得意旨，乃檃括旧编为此本。以屈原二十五篇为《离骚》五卷（《离骚经》第一至《渔父》第七，凡七题），宋玉以下十六篇为《续离骚》三卷（《九辩》第八至小山《招隐士》第十五，凡八题）。其订正旧注者为《辨证》二卷。又刊定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录荀卿至吕大临凡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然后语非成书，自《思玄》、《悲愤》及《复志赋》以下至于《幽怀》，仅存其目。故嘉定六年江西本只刊《集注》及《辨证》；后五年重校刊时始并刻《后语》，而《思玄》以下十九章则用归来子（晁补之）之说。《直斋书录》云："至谓《山海经》、《淮南子》殆因《天问》而著书，说者反取二书以证《天问》，可谓高世绝识。"周密《齐东野语》记南宋光宗绍熙内禅事曰："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与陈直斋谓熹此书"注在庆元（宁宗）退归之时，放臣弃子，有感而托"，其说相合。（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亦有是说。）

宋嘉定四年同安郡斋刊大字本　叶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双栏，附门人长乐杨辑跋。《善本书室藏书志》二三著录，仅《辨证》二卷。《双鉴楼善本目》著录，有"范从楫印"，"清誉堂藏书记"。又云："叶焕彬认为高丽本，不可解。"此本傅增湘旧藏，现归台湾"中央图书馆"。

嘉定六年癸酉江西刊本　此书初刊时，原只有《集注》、《辨证》。据端平本朱在（熹子）跋，谓《后语》六卷，至嘉定十年丁丑，在始刊行。《铁琴铜剑楼目》一九云："每叶十四行，行十五字，双行夹注，字数同。后附扬子云《反离骚》一篇，前有嘉定癸酉三月甲子□阳王涔序；云刊于□

贡郡斋，有陆时化印。”（陆，名润之，太仓人。王昶志其墓。）《天禄琳琅续目》著录亦无《后语》。

端平二年乙未朱鉴（熹孙）刊本　版匡高22公分，宽16.5公分，叶九行，行十八字，注双行，行十八字。《后语》有嘉定壬申邹应龙、嘉定丁丑朱在、端平乙未朱鉴三跋，为元本所无（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作端平乙未孙镒，“镒”字误）。此本旧藏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后归东莱刘氏。1953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影印本。有原尺寸影印及缩印两种。杨绍和《楹书隅录》云：“惟第一卷序首一叶影宋钞补，字极工。”

咸淳三年丁卯（湘阴令）施南向文龙刻本　《天禄琳琅目》著录。明蒋之奇重刻之。

元至治元年辛酉刊本　建安虞信亨宅重刊。日本有朝鲜复本。

天历三年庚午（即文宗至顺元年）刊　有《辨证》、《后语》。半叶十一行，行大字二十，小字二十四。陈忠甫宅刊。台湾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并藏。八册。

元至元丙子（元顺帝后至元二年）刊本　邵氏《四库总目标注》附识：“元刊半叶十一行，行大二十字，小二十四字，《后语》叙目后有建安傅子安宅重刊，至元丙子孟春印行，今在常熟翁氏。”《双鉴楼善本目》载此本。《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黑口双栏。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刻本　黎庶昌《古逸丛书》据此复影，有宝胜院印，行款字数与至元本同，《后语》叙目后有记云：“岁在癸卯孟春高日新宅新刊。”四册。光绪十年东京使署刊。

明成化十一年乙未何乔新刊本　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进士，官河南按察时刊此。其自序称：“坊本刓缺。偶与佥宪吴君原明论朱子著述，吴君出家藏善本，正讹补缺，锲梓以传。”书半叶九行，行十七字。为明刊《集注》最早之本。（乔新著有《椒丘文集》，事迹详《明史》卷一八三。）

正德十四年己卯休宁沈圻刊本　行款同何乔新本，前附何序。《集注》后有正德十四年张旭跋，《辨证》后有沈圻跋。（见丁氏《善本志》二三，持静斋旧藏。日本成篑堂藏四册。《郘亭目》云：正德沈圻休宁刻本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沈刻仅《楚辞辨证》二册，末有正德己卯冬十二月知休宁县事平湖沈圻跋，略称：幼承家君以原明吴君所刊《楚辞》授读，迩承尹休阳，会婺源乡进士汪济民以吴君旧本送圻，乃请于郡守

新淦文林张公，遂捐俸锓梓。

嘉靖十四年乙未吴县袁褧仿宋刊本　《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翻宋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北平图书馆、嘉业堂并藏六册。双鉴楼《目》著录。

嘉靖杨士林刊本　《集注》八卷，叶十行，行大小均二十字，翻元本，见缪《记》，双鉴楼《目》有。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吉藩府刻本　重刊成化本，行字略同，有陆长庚庄天合序，目录后题万历丁酉季春月谷旦吉府承司常山旸谷魏椿奉宣王翊銮命重刊。东莞熊氏劝影斋曾藏，有太仓陆润之印。缪《记》、《故宫善本目》、昌彼得《明藩刻书考》并著录。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元年）乌程闵齐伋校刊本　朱蓝套印，题曰“评点《楚辞》”，无《辨证》、《后语》。

天启六年丙寅槜李蒋之翘楚稚评校本　《集注》、《辨证》、《后语》之外增《附览》二卷。十二册。称“七十二家评林”，又有清刊本。

崇祯十年丁丑庆城沈云翔千仞编《楚辞集注评林》本　八卷，附《总评》一卷，或称“八十四家评点”，剽窃蒋之翘本。刘氏嘉业堂藏四册，日本内阁文库藏六册。《四库提要·楚辞类存目》著录。

崇祯十一年刊本　五卷。小田切藏四册，有“国瑗”、“怀璧”二印。

明吴讷校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目》有。明版四册。讷字敏德，常熟人。宣德间，官至右都御史。著《文章辩体》。

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刊　吴堂听雨斋后印八十四家评点朱墨本，无《辨证》、《后语》，袭沈本。

同治十年洪汝奎刊《唐石经馆丛书》本。

光绪三年崇文书局本（无《后语》）。

光绪八年江苏书局本（无《后语》）。

外国本　日本庆安四年（即清顺治八年）刊本，底本为成化何乔新刊，无《辨证》。（西村硕园疑是林罗山训点，京都村上平乐寺刻本。）京都大学吉田分校藏六册。尊经阁藏五册。内阁文库藏一部四册，一部三册。静嘉堂藏十一册，称《详解楚辞全集》。

朝鲜活字本　《郎园读书志》有高丽仿南宋嘉定本《楚辞辨证》二卷，避讳缺笔；疑即双鉴楼所认为嘉定本。

朝鲜复宋端平本　编首补钞明何乔新序文一篇。日本内阁文库藏。其邹应

龙《后语跋》中“应龙”二字概改为“余”。（图一六）

朝鲜复元刊活字本　《后语》目录后有“建安虞信亨宅重刊，至治辛酉（元英宗元年）腊月印行”木记，又有“甲戌五月密阳府开板”一行。日本《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云：“三册，甲戌即景泰五年也。庆长十九年（即明万历四十二年）德川家康在骏府贻其子秀忠云。”又静嘉堂藏二册。

朝鲜刊本　静嘉堂藏四册。（《静嘉堂目》于复元本朝鲜刊二册下注“活”字，此本不注。）

《离骚草木疏》四卷　宋河南吴仁杰斗南撰

本书题河南人，《四库提要》作昆山人。书取屈赋二十五篇之荪兰芝菊以至萹荠椟篁，悉按《尔雅》神农书面疏之，自比于史之有忠义奸臣传。《提要》谓：“不必合于骚人寄兴，而征引宏富，博物者资焉。”按陆九渊有答罗田令吴斗南书。吴氏此书上梓，时适为县宰。（参《郘亭书目》）

南宋庆元六年湖北罗田县庠原刻本　末有庆元丁巳（三年）仁杰自序，及庆元庚申（六年）方灿《跋》，称国录吴先生属刊于罗田县庠（吴氏官国子监学录，故称为国录），又有州学生张师尹杜醇吴世杰校正三行。《楹书隅录》云：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一册。

影钞宋本　《四库》著录。又见《天禄书目》。

旧钞本　钱曾《敏求记》云：此书经屠本畯删改，从曹秋岳处钞得原本。（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旧钞本二册。）

清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海昌祝氏刊本　附祝德麟《辨证》四卷。

知不足斋复郘南江藏宋刊本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校刊，在第七集。鲍廷博跋：“维时宁皇初政，韩侂胄方专拥戴功，与赵汝愚相轧，罢朱子，严伪学之禁。斗南未敢诵言，乃祖述《离骚》，譬诸草木，薰莸既判，忠佞斯呈，因以畅其流芳遗臭之旨。”

《龙威秘书》本　石门马俊良辑，乾隆甲寅大西山房刊行。在第二集。

《榕园丛书》本　仪征张丙炎辑，同治中刊。复知不足斋本，在《丙集》内。

崇文书局本　清光绪三年刊。

日本写本　内阁文库藏一册。

《天问天对解》　宋庐陵杨万里诚斋撰

《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比附贯缀，各为之解。（案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天问》之章，辞严义密，最为难

诵。柳柳州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宏杰异，析理精博，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所对别附于问，庶几览者莹然。”诚斋此篇，犹黄氏例也。）

明崇祯刊本　江苏省立图书馆藏一册。

《诚斋集》卷第九十五本　新昌胡氏校刊。

《豫章丛书》本　清胡思敬等辑，复江南图书局旧钞本，民国六年刊。

《离骚集传》一卷　宋晋陵钱杲之撰

《宋史·艺文志》、钱曾《敏求记》著录。止解《离骚》一篇，大体本王逸《章句》。篇末注言：骚文分十四大节，某几句为一节。

南宋刊本　瞿氏《铁琴铜剑楼藏目》一九云：“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卷端有方熏（字樗庵）画兰，末有舜城居士朱承爵校雠讫一行。”按此黄荛圃旧藏。孙延跋云：“嘉庆壬戌夏，士礼居主人新得桐乡金氏所藏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目》有此书一卷，盖得之荛圃者。

影钞宋本　旧为毛子晋物，《荛圃题识》云：“检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杲之注《离骚》一本，宋版影钞，影写本闻在小读书堆，宋版今又在余处。”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云：“借宋版影钞。”丁氏《善本志》有影宋本。又故宫藏影钞宋本一册。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影宋本《离骚》跋云：“此卷绝无毛氏印记，卷首钤珊瑚阁印，或为纳兰容若所模写。桐华馆为纯庙皇六子印。书底面用楠木板与书衣连缀，即便护持，仍不碍翻阅，故宫旧籍多有此装。此书必当时籍入禁中，后乃随皇子分府以俱出也。”

《龙威秘书》本　乾隆甲寅刊行，复宋本，在第二集。

《知不足斋丛书》本　歙县鲍廷博辑刊，在第十二集。

清光绪三十年南陵徐氏随《随庵丛书》景模宋本重刊　在第九册。

崇文书局本　日本静嘉堂藏有《离骚合缀》一卷，光绪三年刊，即《集传》与《辨证》合订。

《古书丛刊》本　在第一辑第十八册。

上海文瑞楼《离骚》三种本　吴《疏》、龚《笺》外；钱杲之《传》，影印徐氏本。（有通行石印本）

《楚辞芳草谱》一卷　宋长溪谢翱皋羽撰（宋邓牧《伯牙琴》有《谢皋父传》，称翱延平人）

倪灿《宋志补》著录。《千顷堂书目》作“楚辞芳草图谱”，有《说郛》本，在卷一〇四中。

《骚苑》四卷 明吴郡黄省曾撰，张所敬补

《千顷堂书目》、《四库提要》子部著录（入类书类存目）。是编摘《楚辞》字句，以供剽刿之用。后一卷为所敬所补。版本未详。

《楚骚绮语》六卷 明华亭张之象月鹿编

《四库提要》子部著录（入类书类存目）。

之象一字玄超，事迹附《明史》二八七《文苑·文徵明传》内。（又著有《古诗类苑》百二十卷，《唐诗类苑》二百卷。）此编摘录字句，参差杂录，不详出处，其失与黄省曾《骚苑》同。

明万历五年刊本 此凌氏编《文林绮绣》本，有万历四年凌迪知序。版心有钱世杰写，王伯才刻等小字。

清光绪六年刊会稽徐友兰《融经馆丛书》本 即八杉斋巾箱本。

光绪二十二年《文林绮绣》石印本。

日本文政四年（即道光元年）官版翻本 内阁文库静嘉堂藏三册，目入类书类。

《楚范》六卷 前人撰

《千顷堂书目》、《四库提要》诗文评（存目）著录。是书割裂《楚辞》之文，大分十二编，曰辨体、解题、发端、造句、丽词、叶韵、用韵、更韵、连文、叠字、助语、余音，以为拟作之法，盖专论《楚辞》修辞之书也。

明高濂（即刻《遵生八笺》者）校刊本 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楚辞》七卷 《三忠集》本 明晋江郭惟贤编

《四库提要》总集类存目著录。于《离骚》取朱子注。编为七卷。惟贤万历甲戌进士。官左副都御史。

万历二十二年刊本 有万历甲午湖广巡抚惟贤自序，谓哀楚屈原、汉诸葛孔明、宋岳鹏举三公遗文为三楚重，全书共十四卷。《四库》诋为书帕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六册。（图二三）

《楚辞述注》十卷 明莆田林兆珂孟鸣述

兆珂为万历甲戌进士。明人重举业，好以时文之法评古籍。兆珂此编外，尚有《檀弓述注》、《选诗约注》等。并科举之学也。此书有林氏万历辛亥《书楚辞述注后》，云“取王、朱二注订之”。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四册。（图二二）

《离骚经订注》一卷　明高邑赵南星梦白撰

《千顷堂书目》作《离骚经订诂》。南星事迹详《明史》卷二四三。《自序》云："于王逸所注，稍加删改，名曰订。"（序载《味檗斋文集》五）

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刊本。

《楚辞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　卷首附《楚辞》大小序明新安汪瑗玉卿撰，侄仲弘补

瑗，万历间诸生。《四库提要》著录卷目如上，《明史·艺文志》作《集解》十五卷，《好古堂书目》作《离骚集解》附《蒙引》、《考异》七册。所谓大序，乃录班固以至王鏊等序刊文。小序则分录王逸、朱熹、吴讷等文于各篇。盖仿《毛诗》大小序为之。《集解》惟注屈原诸赋。《蒙引》皆辨证文义。《考异》则以王、洪、朱三本互校。

万历四十六年刊本　不分卷，共八册。首有汪瑗自叙及万历间仲弘《楚辞集释补纪由》。又仲弘有题识谓："《天问补注》将竣。"此刊正缺《天问》一篇。日本京都大学藏。

万历乙卯（四十三年）焦竑序刊本　日本真轩旧藏十册，焦《序》为京都藏本所无。

日本旧钞本　长尾子生藏四册，原本不完，借内阁文库明版本补写。（内阁藏明刊四册，日写本四册。小田切藏明刊及补写十册。又写本《楚辞蒙引·离骚》二卷，二册。）

《离骚直音》六卷　明张学礼胡文焕同音

明万历二十年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一册。（文焕字全庵，钱塘人，刻《格致丛书》。）

《屈宋古音义》三卷　明连江陈第季立著

第又号一斋，以诸生从军，官至蓟镇游击。是书自跋及焦竑序皆题万历甲寅（四十二年）。于屈原赋，删《天问》一篇，宋玉赋加《高唐》等四篇，大旨在发明屈宋之音与《诗》、《易》等相合，力辟合韵叶音之谬，以羽翼其前著《毛诗古音考》。然自敦煌遗籍出世，若东晋徐邈《毛诗音》、隋骞公《楚辞音》，俱主协韵，知朱注叶音之说，远有所本，惜乎季立之未及见此也。此书音义具第一卷中。后二卷则录屈宋全文，删润旧注。

明万历刊《一斋全集》本　又道光二十八年重刊本。

清嘉庆十年乙丑《学津讨原》本　在第四十册，题张海鹏订。

清同治二年长沙余氏刊本　余肇钧《明辨斋丛书》第四集。

清光绪六年武昌张氏刻本。

《楚辞韵宝》　明孝感夏鼎铭章撰

鼎，万历三十四年武科举人。《湖北通志·艺文》云："鼎善读《离骚》，晚年以沈约四声部勒其书为《楚辞韵宝》。书成，参政夏时亨为其镂版于蜀。"是此书曾有刊本。

《楚辞疏》十九卷《楚辞杂论》一卷　明桐乡陆时雍仲昭疏

时雍，崇祯癸酉贡生。著《古诗镜》、《唐诗镜》，有名于时。

缉柳斋刊本　有周拱辰等序，题古檇李陆时雍疏。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并藏明刊本，六册。

学山堂梓行本　日本京都大学藏六册。

《楚辞榷》八卷　明檇李陆时雍叙疏　吴兴金兆清参评

明天启间刊本　四册。涵芬楼《烬余书录》有王伯申全部评点。翁覃溪旧藏。其第七卷为小山《招隐士》、扬雄反《离骚》，及时雍自作之《短招》，末附《读楚辞语》一卷。

《楚辞述注》五卷　明萧山来钦之圣源撰

明崇祯刊本　题明会稽王亹校定萧山来钦之述注。有戊寅（崇祯十一年）来氏序，及陈洪绶绘屈子像九歌图共十二幅。北平图书馆藏。（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三著录，称崇祯间刊。）

清康熙辛未重刊本三册。题萧山黄象彝象玉象霖同校。挖来刻书版，袭为己有。

《楚辞听直》八卷《合论》一卷　明莆田黄文焕维章撰

文焕，天启进士，崇祯中坐黄道周党下狱，因著此以寓感。其曰"听直"，取《惜诵》"皋陶听直"语也。其篇次为《离骚》、《远游》、《天问》、《九歌》、《渔父》、《卜居》、《九章》，而以《大招》、《招魂》附篇末，与旧本皆异。其合论一篇者为《听离骚》以至《听二招》共七篇（《听卜居》、《渔父》共一篇），合论全书者，为《听忠》、《听孝》以至《听礼》共十篇。

明崇祯十六年刊本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室藏。

《离骚经纂注》一卷　明宝应刘永澄撰

兴让堂刊本　王邃《离骚辑评》屡引其说。（永澄有《刘练江集》。）

《楚骚品》 明歙县汪道昆伯玉撰

道昆，嘉靖进士，官至侍郎。

明陶珽《说郛续》本在卷三九，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骚筏》一卷 明江西永新贺贻孙子翼撰

贻孙以文人习气说骚，有时亦可得言外意。惟以不求甚解为不落学究气，则浅薄不学者，多借口矣。（他著有《诗触》，以后人诗法诂经，《四库》讥其不免佻巧，论骚亦有同然。）

《水田居丛刊》本 道光咸丰间刊。

《读楚辞语》一卷 明秀水冯梦祯开之撰

梦祯，万历进士，官至祭酒。著有《快雪堂集》。

明版陆时雍《楚辞疏》及日本庆安四年刊注解《楚辞全集》并附有此卷。

《楚骚协韵》十卷附《读骚大旨》一卷 明鄞县屠本畯田叔撰

本畯初名畯，以门荫入仕。此本未改名以前刻，大旨以朱子《集注》于韵为未备，故广为此书，然说多未当。详《四库提要·楚辞类存目》。（本畯刻书颇多，如《山林经济籍》，是其一也。）

《离骚草木疏补》四卷 明屠本畯撰

是书于吴仁杰《疏》门类多所增删，自谓明简，实则反失疏略，说见《四库提要》。右二书《四库》著录并范氏天一阁藏本。

《楚辞笺注》四卷 明李陈玉撰

《好古堂书目》著录。钱澄之释《怀沙》为怀长沙，即本其说。

《楚辞评注》十卷 明竟陵王萌逊直撰

《孝慈堂书目》著录。《湖北通志·艺文》作三卷，误。《志》云：萌天门人，字逊宜，诸生。此书题高安朱轼可亭等校订（朱轼著有朱高安十三种，《朱文端公集》）。附侄王远《考音》，有自序。

康熙十六年丁巳刊本 日本西村硕园藏。

乾隆二年丁巳鲈香居士刊本。 按鲈香为姚培谦号，郑文焯曾书作鲈乡，非。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致和堂刊本。

《离骚草木史》十卷附《离骚拾细》一卷 明桐乡同拱辰孟侯撰

拱辰生当明清鼎革之际，有《圣雨斋集》八卷。

嘉庆八年癸亥圣雨斋重刊本。

道光二十六年刊《周孟侯先生全书》本 第二至第四册。

《楚辞通释》十四卷 明衡阳王夫之而农撰

是书删王逸本《七谏》以下五篇，而加入江淹《山中楚辞》二篇及己作《九昭》一篇，共四十四篇。每篇分段立释。《远游》则采方士铅汞之谈。有乙丑序例。大意论叔师之释《骚》未得"属辞比事"之旨。又谓必审其作品之异事，方不剌谬瞀乱。船山盖主屈子曾放居汉北者。

道光二十八年桂东郭孔岚补刊本。

同治四年金陵刊《船山遗书》本 分十四卷，并自作《九昭》为卷末。

《楚辞约注》 清高秋月撰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庄骚合刻》本，二册 秋月著《庄子释意》。

《联骚》一卷 清新安张潮山来撰

康熙三十六年河南新安张氏霞举堂刊《檀几丛书》本 在第三帙。

《楚辞灯》四卷首一卷又附《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 清侯官林云铭西仲撰

西仲，顺治戊戌进士，官徽州府通判。

《四库提要》云："此乡熟课蒙之本。《九章》篇次变易，其说本之黄文焕《楚辞听直》。"王邦采《离骚汇订》采之。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挹奎楼刊本 四册

岳雪楼《书目》有校抄本。又通行石印本。

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 改题为《楚辞易读》。

日本宽政十年戊午（即清嘉庆三年）翻刻本 题尾张秦鼎士铉校读，有鼎序。

又天保十三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嘉业堂藏。

《屈辞洗髓》五卷附《简明音释》 清宜兴徐焕龙友云撰

王邦采采入《离骚汇订》。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无闷堂刊本。

《离骚辩》一卷 清苏州朱冀天闲撰

此书力攻林云铭之说，然二人均以时文之法解古书。朱氏或袭旧以传讹，或创新而失当，纰缪乃所时有。王邦采《离骚汇订》采之。

康熙四十五年绿筠堂精刊本。

《山带阁注楚辞》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 清武进蒋骥涑塍注

是书又名《三闾楚辞》。《四库提要》云："注前冠以《史记·屈原传》、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次列《楚辞》地理五图（首总图，次《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

图》)。《余论》二卷，驳订旧注。《说韵》一卷，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针韵三例。”按屈子行踪，以图表之；采摭书目，达四百种。非率尔苟作者比。其世父蒋金式弱六著《翠楼居说骚》，专主评文，不另录。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山带阁初刊本　有癸巳七月自序。

雍正五年丁未刊本　有涑睦后序，题雍正丁未。目后题男蒋棨等校。并备列采摭书目。

来薰阁景雍正五年原刊本　民国二十二年印，地图五幅并全。

通行本　略去原目考正地图。

《离骚节解》一卷卷首附《离骚本韵与正音》　清长洲张德纯能一撰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德纯号松南，康熙庚辰进士。

康熙五十三年读书松桂林精刊本　有康熙甲午（五十三年）德纯自序。

乾隆乙巳（五十年）梓州郡署重刊朱黑套印本。

《离骚九歌解义》二卷　清安溪李光地晋卿撰

《四库提要》作《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其书谓《九歌》当止于九，不载《国殇》、《礼魂》二篇。

康熙五十八年《安溪讲义》本。

《榕村全书》本　第四四册，与《参同契》合帙。

张丙炎《榕园丛书》本　在丙集内。

《饮骚》二卷　清丹阳贺宽瞻度撰

宽号柘庵，顺治九年进士，大理寺评事。此书又名离骚笺释。前卷为《离骚》、《九歌》、《天问》，后卷为《九章》、《远游》、《卜居》、《大招》、《招魂》、《九辩》。书中如以女喻郑袖，丰隆蹇修喻上官子兰之徒，后人颇诋为曲说。

约康熙间刊本。

《天问补注》一卷　清萧山毛奇龄大可撰

《四库提要》著录。是编前为总论。后凡三十四条，先列《天问》原文，次列朱子《集注》，而后以《补注》继之。

《西河合集》本　在六十六册。(侄孙览辉重辑，萧山陆凝瑞堂刊。)

《庄屈合诂》　清桐城钱澄之饮光撰

澄之自号田间老人，尝问《易》于黄道周，经学笃实。《四库提要》著录是编于子部杂家类存目。其《庄子》止诂内篇，《楚辞》则诂屈原所作，先列朱子《集注》，次列己注。标以“诂曰”二字，实则衍绎朱注之义。

澄之当明末造，发愤著书，盖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也。

康熙刻本　《田间遗书》第二三至二六册（又同治二年刊《饮光先生全书》本）。

《离骚经解》一卷　清淳安方楘如文辀撰

楘如康熙丙戌进士，官丰润知县。是编所解甚略，马其昶《屈赋微》曾引用之。《四库提要·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乾隆甲戌佩古斋刊本　附《集虚斋学古文》后。

《离骚汇订》三卷附首一卷《杂文笺略》二卷　清锡山王邦采贻六撰

卷首有康熙六十一年（壬寅）自序。取王逸、洪兴祖、朱熹、徐焕龙、林云铭、朱冀六家之说，随文诠释，然于林、朱二家，多列举为抨击之资。其《杂文笺略》，乃《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之笺释，什七仍录旧注，参以己意者亦二三云。此书总目，以像传吊文自序书后及《离骚》白文为第一帙。其《离骚汇订》为第二三四帙。杂文为第五六帙，又名《楚三闾大夫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精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广雅丛书》本。

《楚辞注》一卷　清任邱庞恺霁公撰

恺，康熙己未翰林检讨。终建宁知府。著《丛碧山房集》。

钞本　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离骚经正义》一卷　清桐城方苞望溪撰

苏惇元《望溪年谱》云："所著《离骚正义》，不知其撰著年月。"

《抗希堂全书》十六种本　康熙嘉庆间方氏刻。

光绪二十四年嫏環阁重刊活字本　在第十二种。

《楚辞疏》八卷　清贵池吴世尚注　曹文超等参订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又名《楚辞注疏》。

雍正五年丁未尚友堂刊本　江苏省立图书馆藏（六册）。

《屈骚心印》五卷　清衢州西安夏大霖用雨撰

大霖又号梅皋。《四库提要》云：此书因林云铭《楚辞灯》而改订之，自述于林本外惟见朱子、来钦之、黄维章三家本，论韵称沈约为晋人。立说多不知何据。

雍正十二年刊本（有图）二册。

乾隆间一本堂刊本。

《楚辞新注》八卷 清蒲城屈复悔翁撰

《四库提要》云："是编自以新意疏解旧注，复颇工诗，故能求骚人言外意。然果于师心，亦往往臆为变乱。"或题为"楚辞新集注"。

乾隆三年戊午居易堂刻本 末一卷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

《天问校正》一卷 清蒲城屈复撰

是编随意移置其前后，谓之错简。

《昭代丛书》本 在辛集别编中，杨复吉辑，道光十三年刊。

《离骚解》一卷 清娄县顾成天良哉撰

成天，雍正庚戌进士，翰林院侍讲。作诗多至二千首，有《金管集》。

《四库提要》云："是编成于乾隆六年辛酉。大旨深辟自王逸以来求女譬求君之说。"

《九歌解》一卷 清娄县顾成天撰

上二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四库提要》云："其说以《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并十一篇为九，以合《九歌》之数。每篇所解以林云铭《楚辞灯》为蓝本，而加以穿凿附会。"

《读骚别论》一卷 前人撰

《四库提要》云："此书又举《九章》以下诸篇末及解者，一一评其大意。如以屈原之死乃身殉怀主，以《惜诵》为河、洛间人伪托，以《卜居》为战国时人所托，渔父即庄周，皆不免武断。"

《离骚中正》 清栖霞林仲懿山甫撰

仲懿，康熙辛卯举人，官铜陵知县。《山东通志·艺文》著录。

《四库提要》云："是编首载读骚管见数则，谓屈赋以执中为宗派，主敬为根柢，自叙学问本领，陈述帝王心法，与四子书相表里。又附会屈子名字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

《骚屑》九卷 清沈无咎辑

清刻本 见北平图书馆《善本乙目》。

《楚辞节注》六卷附《叶音》一卷 清华亭姚培谦平山撰

乾隆六年辛酉刊本 有张奕枢序，题鲈香居士读本。《叶音》，刘维谦撰。（培谦又著《古文斲》等。）

《楚辞详解》五卷 清黄州奚禄诒苏岭撰

乾隆九年甲子知津堂精刊本。

《屈子说志》 清陈远新撰

乾隆十四年刊本 日本西村硕园有钞本三册。

《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 清休宁戴震东原撰

戴氏精小学，诂注颇确。卢文弨序谓：微言奥旨，具见疏抉（亦见《抱经堂文集》六）。然此书成于早年，卢序不无溢美。所注为《离骚》以下屈赋二十五篇。《通释》上卷疏山川地名，下卷疏鱼虫草木。有歙汪氏梧凤《音义》，列举别本异文，足资考证。

乾隆十七年庚辰刊本 有汪梧凤跋。（汪氏有《松溪文集》）

光绪十七年《广雅丛书》本。

民国十二年沔阳卢靖慎始基斋编《湖北先正遗书》影印精钞本。

民国二十五年《安徽丛书》（第六期）影歙县许氏藏《屈原赋注初稿》本三卷。

民国建德周氏校刊本 称戴氏《屈原赋注》，不分卷。

《万有文库》本。

《楚辞订注》四卷 清闽漳许清奇订

乾隆二十年乙亥刊本。

《楚辞心解》 清江中时撰

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楚辞韵解》八卷 清滋阳丘仰文襄周撰

仰文号省斋，济宁人，滋阳籍。雍正癸丑进士，历官保安知县。《山东通志·艺文》著录（又有《省斋自存草》）。

陆耀序谓：省斋邃于《易学》，由《易韵》通诸《楚辞》，以毛检讨（奇龄）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读之，进退出入，无不就范（见《切问斋集》四）。

乾隆三十七年丘氏硕松堂刊本。

《楚辞读本》 清方人杰撰

乾隆三十七年刊《庄骚读本》本。 《楚辞》四册。西村硕园藏。

《屈骚指掌》四卷 清武进胡文英撰

王鸣盛有序 载《西庄始存稿》十五。

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离骚草木疏辨证》四卷 清海昌祝德麟撰

祝氏以吴仁杰《疏》多有未当，故辨证其舛误而并判之。钱泰吉有跋，见《甘泉乡人稿》。

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离骚笺》二卷 清闽中龚景瀚海峰笺

此书采王、洪、朱三家注、《文选》五臣注及吴氏《草木疏》，而别以己意笺其大义。其总论《离骚》谓作于怀王未返顷襄未立之时，略同陈第、顾成天之说。

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同治八年刊《澹静斋全集》本 子丰谷校刊。

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上海文瑞楼石印《离骚》三种本 即龚氏《笺》，及影宋本钱杲之《传》，知不足斋本吴仁杰《疏》。

《楚辞述芳》二卷附《杂记》三篇 清栖霞牟庭相撰

栖霞牟氏俗园刊本 序题乾隆六十年乙卯，为《雪泥书屋全书》之一。（牟氏又著有《周公年表》及《杂志》等，咸丰间，其子房刊行。）

《离骚解》一卷 清全州谢济世石霖撰

石霖别号梅庄，康熙进士，乾隆时官湖南驿盐道。

《梅庄杂著》本 在卷九中， 长沙梁家钰刊。

同治十一年重刊本 归义徐维益等刊。

《屈子贯》五卷 清嘉定张诗原雅撰

此书初刊当在康熙后期，题受业杨梦熊男吉同编。蒋骥采摭书目称为《楚辞贯》。

嘉庆三年戊午疁城万春堂重刊本。

《楚辞达》一卷《总论》一卷 清雷川鲁笔雁门撰

嘉庆九年甲子赵州师范校刊 范著有《滇系》。

《屈子章句》七卷附《屈子纪略》 清蕲水刘梦鹏云翼订

云翼，乾隆辛未进士。《四库提要》云："是书就诸本字句异同，参互考订，亦颇详悉。然不注字出某本，篇次尤多以意窜乱，皆未足依据。"

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又名《楚辞灯章句》。（有乾隆二十五年序）

嘉庆五年藜菁堂刊本。

《屈辞精义》六卷 清江都陈本礼嘉会撰

本礼又号素村，生乾隆四年，卒嘉庆二十三年。是编光绪《江都志》著

录名《楚辞精义》，大旨在发明微言大义，其说之独异者谓“曰黄昏以为期”以下为经，而其上则为叙。

嘉庆十七年（壬申）褱露轩刊本　自序题嘉庆十六年辛未。

陈氏读骚楼刊《陈氏丛书郁室四种》本　《楚辞精义》、《汉乐府三歌注》、《协律钩玄》、《急就探奇》四种。

《离骚精义原稿留真》一册　附今人陶秋英《离骚精义原稿综合校记》与《第三稿绎读》及姜亮夫《离骚精义手稿本跋》，1955年上海出版。

《九歌解》一卷　清万载辛绍业撰

嘉庆十八年癸酉笃庆堂刊本。

《楚辞新注求确》十卷　清分宁胡濬源撰

嘉庆二十五年务本堂刊本。

《楚辞韵读》附《宋赋韵读》一卷　清歙县江有诰晋三撰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嘉庆原刊本　咸丰重刻本，版皆旋毁。有诰著《音学十书》。（已刻者为《楚辞韵读》、《群经韵读》、《诗经韵读》、《先秦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等韵丛说》等八种。）

民国十七年影《音学十书》本。

《屈子正音》三卷　清桐城方绩撰

有管同序　载《因寄轩文》二集。

道光七年江宁邓廷桢精刊方植之《杂著》本　题邓廷桢方东树（绩子）订补。

光绪六年网旧闻斋重刊袖珍本。

光绪十年名德堂重雕袖珍本。

《离骚经章句义疏》一卷　清新城张象津汉渡撰

象津，号莪石，别号雪岚，乾隆庚子举人，官济宁学正。《山东通志·艺文》著录。有嘉庆丁丑象津自序。

道光十六年拜经堂刊本　为《白云山房诗文集》附刻三种之一。

《楚辞辨韵》一卷　清海康陈昌齐宾臣撰

昌齐官翰林时，与修《四库全书》。曾勉士云：“是书原为音韵流变而作，记于《楚辞》篇中。先生殁后，吴石华（兰修）从简端录出刻之，名曰《楚辞音义》；其实当名辨韵。”（曾跋又见《面城楼集钞》二）伍氏刊《岭南遗书》，因改题付梓。

道光三十年刊《岭南遗书》本　第五集。

《赐书堂集》本　嘉应吴兰修校刊。

《楚辞贯》一卷　清博川董国英撰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道光间正谊斋刊本。

《离骚赋补注》一卷　清吴郡朱骏声丰艺撰

道光间刊本　自序亦载《传经室文集》。

光绪八年临啸阁刊《朱氏群书》本。

《三益斋离骚注》一卷　清贺性灵撰

咸丰九年吴门刊本　后有诗樵自跋，封面刊有"古汲郡三益斋贺氏读本"十字。

《离骚注》　清顺德梁夔谱注

梁氏订注《离骚》、《哀江南赋》二篇名曰《古赋首选》。

同治八年镜古堂原刻《古赋首选》本。

又翻刻本、排印本、石印本。

《离骚释韵》一卷　清阳湖蒋曰豫侑石撰

曰豫，直隶候补知县。《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光绪三年刊《蒋侑石遗书》本（莲池书局版）　在《滂喜斋学录》中。

《离骚启蒙》一卷　清江宁端木埰子畴撰

光绪二年刊本。

《楚辞释》十一卷　清湘潭王闿运壬秋注

自叙谓：仿郑笺申毛之例，因章句而为笺，叔师义有隐滞，笺以表明。亦有不依章句者，如郑笺与毛异义，是其例也。

光绪十二年丙戌成都尊经书院精刊本。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仪征李氏刊本。

光绪二十七年《湘绮楼全书》本　衡阳刊。

《天问笺》一卷　清山阳丁晏俭卿撰

光绪十七年《广雅丛书》本。

《离骚九歌释》一卷附录李篁仙《离骚音韵》　清善化毕大琛撰

光绪十八年补学斋刊本。

《楚辞杂志》　清高邮王念孙怀祖撰

高邮王氏著书本　在《读书杂志·余编》中，共二十六则。

《读楚辞》 清德清俞樾荫甫撰

在《俞楼杂纂》中。

《楚辞人名考》一卷 清德清俞樾撰

右二种光绪二十五年重刊《春在堂全书》本 坊间有俞樾评点《楚辞》，疑出依托，故不著录。

《屈赋微》二卷 清桐城马其昶通伯撰

是书依王船山说以《九歌》之《礼魂》为前十篇，通用送神曲，用黄、林、蒋诸家说以二《招》为屈原作，因总为二十五篇，以合《汉志》之数。各篇义训上采王、洪、朱三家以至方苞、姚鼐、吴汝纶、姚永朴诸说，颇合博观约取之义，其尊敬乡先辈之意，亦可于言外得之。

光绪三十二年合肥李国松刊《集虚草堂丛书》甲集本 第十三册。

《离骚注》一卷 清新城王树枏撰

在陶庐丛刻中。又光绪间文莫室刊本。

民国十六年印本。

《离骚分段约说》一卷 清宁阳黄恩彤石琴撰

光绪间刊本 恩彤著有《知止堂集》。

《楚辞翼》 清北越董瓯州撰

日本西村硕园藏手稿本。

《楚辞串解》 清陈大文简亭撰

光绪间刻本 西村收入《读骚庐丛书》乾集中。

按《昭明文选》骚类选屈赋诸篇，注家多有疏说；选学书如方廷珪《文选集成》竟列骚为首卷；他若《古文辞类纂》等选本亦多及屈文；为笺证者，若近人高阆仙所著，考证详审。以非《楚辞》专著，故并从略，谨发其凡于此。

古写本

《离骚残卷》 《招魂》 《招隐士》

日本小川睦之辅氏藏古写本《文选集注》第六十三卷，为《离骚》残文，自起至“恐导言之不固”注“复更回移”止。又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第六十六卷，全卷完整为《招魂》、《招隐士》二篇。（本卷目录为“骚四”，次行低一格刻“宋玉《招魂》、刘安《招隐士》”二目。）此

三篇学者认为唐人写卷，罗振玉曾印人《文选集注》。昭和十年京都大学影印全部时，收《招魂》、《招隐士》人第三集，《离骚》人第八集。

宋刊六臣《文选》《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下云：五臣本无“不”字，故戴震谓“不”为衍文。然唐本《文选集注》有“不”字，与朱、洪本同，知五臣乃夺误。其有裨于校勘者此一例也。另详《外编校记》。

正文本

《楚辞》二卷

明新安吴勉学师古校刊本　题汉沛国刘向。江苏省立图书馆藏。（勉学又著有《唐乐府》等。）

《屈集》二卷　屈陶合刻明刊本　明戴尔望等评

按孙氏《祠堂书目》又有《楚辞》明蔡文范无章句本　文范字伯华，江西新昌人，以忤张居正谪官。

《离骚经》

明仁和金堡《经术丛书》本　堡，字道隐，崇祯庚辰进士，临清知州。永历后为僧，号澹归，又号今释，有《偏行堂集》。

按《经术丛书》为《考工记》、《大戴礼》、《离骚》、《公羊》、《穀梁》、《太玄》、《春秋繁露》七书。《堡刻丛书》尚有《道德》、《玄书》等共七种。

《屈子》六卷　（总评一卷、章评一卷、译韵一卷、译字一卷、参疑一卷、传一卷。）

明毛晋校　《郘亭书目》有《屈子》绿君亭刊本，无注。即此，按绿君亭为子晋书室名，子晋早年刻书，绿君亭与汲古阁并用，中年后则专用汲古阁之名。

《楚辞》

康熙二十年刊本　清胡介祉校，郭鼎京书。

《楚辞》五卷　清桐城姚莹长洲顾沅同辑订

道光二十八年泾县潘锡恩求是斋刊《乾坤正气集》本　复《四库全书》本。

《楚辞》七卷卷首一卷附录一卷

光绪二年丙子黎阳端本垛刊巾箱本　卷首为《屈子生卒年月考》，清江宁陈玚撰。谓屈子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即周显王二十六年。卒年约在

顷襄王九年后数年中，寿五十余。附录为《离骚启蒙》一卷，端木埰撰。所云："自诞生以至毕命，由始进以迄放斥，处万难合之时，而有不忍离之谊，无轻其生之心，而有不容不死之势。"可谓善达骚情。

《屈贾文合编》 清夏献云校

光绪三年长沙刊本 屈文三册。

《离骚经》 清含山张燮承订

张氏五种本。

《离骚》一卷 清田砚池撰

光绪二十五年戊戌梦鸱鸮楼刊 以上二种内容未详，姑列于此。

《楚辞正文》

日本川田监山校刻 明和八年（即清乾隆三六年）八月刊，有纪德氏序。

篆文本

《篆文楚骚》五卷 明长沙熊宇刊

卷首分书熊宇序，题曰正德庚辰（十五年）。

明刊本 《故宫善本目》八册。日本内阁文库藏十册。（图二〇）

《篆字楚辞》 明朱官虞辑

明万历刊本 附万历朱燮元刻《章句》本后。

日本硕园藏篆文《楚骚》六册，万历二十八年刊本，未知是否即朱刻。

《篆文离骚经》五卷 明陆士仁撰 池永道云写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六册。

日本人著述

《离骚传》二卷 日本长井江衎撰

莫天一藏 见《群书跋文》。

《楚辞师说》 日本浅见安正（䌹斋）著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第一七集 早稻田大学编。

《楚辞考》四卷 日本冈松辰（瓮谷）撰

日本明治（四三年）庚戌（即清宣统二年）东京刊 《汉文大系》二二册。

《楚辞玦》 日本龟井昭阳著

西村硕园藏。

《楚辞纂说》 日本西村硕园辑

按西村氏于大正七年辑成《读骚庐丛书》乾坤二集，共八册，未刊。此书自《历代诗话》、《四六丛话》录出有关《楚辞》之评语。

《楚辞》 日本桥川时雄著

日本昭和十八年印 日本评论社《东洋思想丛书》之一。

《楚辞考》 日本儿岛献吉郎著

原收入《支那文学杂考》中。有隋树森译，合《毛诗》研究，称《毛诗楚辞考》。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

《巫系文学论》 日本藤野岩友著 1951年，大学书局出版。

按氏著又有《天问与卜巫》，1952年角川书店版。

元以前《楚辞》佚籍第二

《离骚传》　汉淮南王刘安撰

《汉书》本传："武帝以安善文辞，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据班固《离骚序》以《史记·屈传》"国风好色而不淫"至"与日月争光"一段，即淮南《传文》。（西汉时"故"与"传"对称，训诂为"故"，采杂说著通论者为"传"。）班《序》又引淮南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

《天问解》　汉刘向撰

《天问解》　汉成都扬雄撰

上二种见王逸《天问叙》。（王《叙》云："至于刘向扬雄援引经传以解释之，亦不能详悉。"）

《离骚经章句》一卷　后汉扶风班固撰

见王逸《离骚章句叙》，只解《离骚》一篇。姚振宗、顾櫰三《后汉艺文志》并著录。洪兴祖《补注》载班固文二篇，其《离骚序》云："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文选·吴都赋》刘逵注"扬"字下，《魏都赋注》释"纯粹"释"畹"，俱引班氏《楚辞说》。

《离骚经章句》一卷　后汉扶风贾逵撰

见王逸《章句叙》，姚氏、顾氏《后汉艺文志》并著录。洪兴祖《补注》"羿"下引贾逵说。《说文·女部》"嫈"字下亦引贾侍中说，许《序》所谓"博采通人，考之贾逵"者也。

《离骚注》一卷　后汉扶风马融撰

范书本传称注《离骚》，姚氏、顾氏《后汉志》俱著录。《补注》《大招》“鹔鹩”下引马融说。

《楚辞》三卷　晋河东闻喜郭璞注

《隋志》著录，两《唐志》作十卷，《宋史·艺文志》无。敦煌本道骞《楚辞音》“兹”、“鸩”、“理”、“鸩”下并引郭注。详外编郭璞《楚辞遗说摭佚》。

《楚辞》十一卷　宋庐江何偃删王逸注

《隋志》著录已佚，姚振宗云：“盖亡于江陵沦陷时。”

《离骚草木疏》二卷　梁平原刘杳士深撰

杳于梁天监中，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仕至尚书左丞。博综群书，事详《梁书·文学传》。此书《隋志》著录。两《唐志》并草木下有“虫鱼”二字。宋宁宗时，吴仁杰撰《草木疏》，自序称杳书已亡。

按阮孝绪《七录序》：“文集录内篇四：《楚辞》类五种五帙二七卷。”所称五种，不知视现存者同异如何？序谓有梁普通四年始述此书。又谓平原刘杳所抄集，尽以相与，叹为康成传释，尽归子慎。此指杳所著《古今四部书目》。杳又有《寿光书苑》二百卷。

《参解楚辞》七卷　皇甫遵训撰

《隋志》著录。姚振宗云：此殆取王逸、郭璞、何偃三家注本而参考为训解也。（按遵又著《吴越春秋传》十卷。）

《楚辞音》一卷　东晋东莞徐邈仙民撰

邈，东莞姑幕人。广兄，仕至中书侍郎，太子前卫率，事详《晋书·儒林传》。他著有《毛诗音》。

《楚辞音》一卷　孟奥撰（始末未详）

上二种隋、唐《志》并著录，《宋志》无。

《楚辞音》一卷　宋处士诸葛氏撰

《隋志》著录，又见《册府元龟·学校部》，唐、宋《志》并无。姚振宗疑即琅琊诸葛璩。

《楚辞音》一卷　不著撰人

《隋志》著录，《唐志》无。

《楚辞音》一卷（残）　隋僧道骞撰

隋、唐《志》并著录。《隋志·楚辞类》序云：“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

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宋志》不见著录，疑佚于宋时。

敦煌出唐写本　此卷存《离骚》残八十四行，列伯希和目二四九四。日本神田喜一郎影入《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下册。王重民有考证，见《巴黎敦煌残卷叙录》。闻一多有《校勘记》，见《全集》卷二。起“驷玉虬以乘鹥兮”之“乘”字，终“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之“瑶”字。按卷内有“鶱案弇兹之神”句，是字本作“鶱”，从鸟（骞与鶱异字。《说文》“鶱，飞貌”）。日本古写本《文选集注·招隐士》“薠草靃靡”句下注云：“案萧（该）鶱等诸音咸以为蘋音烦，非。”知鶱音亦及小山文。按《日本见在书目》有释智骞《楚辞音义》，或谓《隋志》僧道骞即智骞之误（周祖谟说，见《辅仁学志》）。《续高僧传》记：隋东都内彗日道场沙门智骞，江表人。偏洞字源，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卷四十《杂科声德篇》释智果传）。《玉海》有释智骞撰《尔雅音义》二卷（《日本见在书目》作《尔雅音决》三卷）；唐慧苑《华严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俱引骞师注《方言》（慧琳书三十三引解“淡”字一条），盖缁素中之湛深小学者。（《楚辞音》敦煌残卷影本，见本编卷首。）

《离骚谱》一卷　唐陈康士安道撰

《唐书·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钱东垣辑《崇文总目》云：“依《离骚》以次声，阙。见天一阁钞本。”案绍兴十二年向子固奏：“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是此书佚于绍兴以前也。康士，僖宗时人，善琴，撰琴曲百篇，谱十三卷，内有《离忧》七章，《沉湘》七章，进士姜阮、皮日休皆为序以述其能。见《文献通考》。（按《皮子文薮》无此文。）

《楚辞章句》二卷　宋王勉撰

《宋志》著录。

《楚辞释文》一卷　古本　无名氏撰

《宋志》著录在王勉下。洪兴祖得此本于吴郡林虙德祖，其篇次不同今本。洪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则《释文》篇第与王注旧本相同，《补注》目录所引，如《离骚》下云：“《释文》第一，无‘经’字。”《九辩》下云：“《释文》第二。”皆洪本与《释文》歧出之易见者。洪氏《补注》已成，又得姚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当即上本。晁氏《读书志》云：“《释文》一卷未详撰人。以《离骚经》、

《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为次，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第之耳。或曰天圣中陈说之所为也。”黄伯思《序》云：“陈说之本以刘勰《辨骚》，在王（逸）序之前。”

《离骚约》二卷 失名

《崇文总目》、《宋志》并著录。

《楚辞赘说》一卷 宋宣城周紫芝少隐撰

《宋志》著录。《直斋书录》作四卷，谓紫芝尝为《哀湘累赋》以反贾、扬之说，又为此书，颇有发明。

《龙冈楚辞说》五卷 宋永嘉林应辰渭起撰

《直斋书录》云：“以《离骚》章分段释为二十段，《九歌》诸篇亦随长短分之。又推屈子不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浙江通志·经籍志》著录。

新校《楚辞》十卷《翼骚》一卷 宋昭武黄伯思长睿撰

《宋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世善堂书目》并著录，伯思于政和中官秘书郎，卒年仅四十。朱子尝论此本与洪庆善本并优于杭本及晁本。其自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序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又述版本云：“近世秘书晁监美叔，以春明宋氏赵郡苏氏本参校得失，其子伯以又以广平宋氏及唐本与太史公记诸书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旧本及博士杨建勋及武林吴郡椠本雠校，始得完善。”又述篇目云：“旧十六篇，并王逸《九思》为十七，而伯思所见旧本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后，与《九思》共十八篇。而王逸诸序并载书末，犹《古文尚书》汉本《法言》及《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体，骈列于卷尾，今放录之。”又云：“自《屈原传》至陈说之序，附以今序，别为一卷，目以翼骚。”惜其书已亡。

《楚辞协韵》一卷 宋崇安黄铢叔垕撰

《宋志》著录。朱子尝以此编寄漳守傅景元刻版，又采附《集注》中，《文集》有跋语二篇（见《朱文公集》卷八十二）。铢著有《谷城集》。

《离骚章句》一卷 宋金华吕祖谦伯恭撰

见晁氏《读书附志》。《浙江通志·经籍志》有吕成公所分《楚辞章句》一卷。

《楚词补旨音释》 宋宁海刘庄孙正仲撰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如上。按庄孙从舒岳祥游，著述甚富。袁桷志其墓，称此书为《楚辞补注音释》。(见《清容集》卷二十八。)

又《补元志》有“吴莱楚汉正声”二卷，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四家赋，兹不著。

《九歌谱》 元衢州吾衍子行撰

钱《补元志》著录。按吾衍一作吾丘衍，家于钱塘。

拟《骚》第三

《反离骚》 汉成都扬雄撰

《汉书·扬雄传》云："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唐写本　东瀛藏古钞卷子《汉书·扬雄传》，卷端残阙，起《反离骚》之"反"字，终传之上卷。卷尾有天历二年（即五代后汉乾祐元年，公元948）藤原良秀题记。日本官定为国宝（神田喜跋语），京都帝国大学编入景旧钞本第二集（昭和十年版，本册名。《汉书·扬雄传残卷》）。神田喜（一郎）有校记。其昭和九年跋云："书法率更，精健俊逸"，"渊"、"民"二字缺笔，盖初唐人书。栏内外有良秀校语，所征引皆六朝隋唐佚籍，有曰"训"曰"察按"者，乃姚察"汉书训纂"；有曰"集"者，乃顾胤"汉书古今集义"，多至百余条。服（虔）应（劭）古义，韦（昭）晋（灼）佚训，横遭颜监割弃者，亦得借存什一。今并录姚顾古训，附本书外编《反离骚》校记之后，借见唐宋以前佚籍之一脔，谅为汲古者所不废也。

宋刊本　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左右双栏。现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此书盖朱子《楚辞后语》卷二之第十六篇，但叶数由一至十四自为起讫，前后及中缝并无卷次，故张钧衡跋谓颇似单行。又因"瞿氏书目《天禄

续目》定为嘉定六年本，而疑《后语》未刊，仅刊此《反离骚》十余叶”。按端平本朱鉴跋云“《反骚》一篇亦附卷末”，乃指初刊《集注》时言，故此附末之十四叶似为单行本也。（参本编《楚辞集注》宋嘉定本条。书影见《中华文物集成》第五册440页及本书卷首。）

乾隆间绵州李调元《函海》本　《函海》雕版始乾隆辛丑秋。

民国五年吴兴张钧衡《择是居丛书》初集影宋尹家本　第十三册。

《古书丛刊》第二辑本　即从择是居本出。

《广骚》一篇　汉扬雄撰

《畔牢愁》一卷　汉扬雄撰

《汉书》本传云：“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文多不载。”李奇曰：“畔，离也。”宋祁引萧该案“牢”字旁著水。韦昭曰：“浶，骚也。”王念孙曰：“牢读为懰，忧也。牢愁，叠韵字也。畔，反也，或言‘反骚’或言‘畔牢愁’，其义一而已矣。”杨树达《汉书窥管》云：“畔牢愁为离忧，亦《离骚》之义。畔训离，牢训骚，《畔牢愁》即《离骚》。”又云：“《广骚》、《畔牢愁》皆旁骚为之，乃拟骚，非反骚也。王念孙以‘畔牢愁’与反骚为一义，误。”

《悼离骚》　汉扶风班彪撰

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文见《艺文类聚》。

《悼骚》一篇　汉安定梁竦叔敬撰（事详范晔《后汉书·梁统传》）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文载《东观记》。竦又著书数篇，名曰《七序》，文已佚，姚志从《七谏》列入《楚辞》类，兹不著。

《九咨》　汉涿郡崔琦子玮撰　（事详范书《文苑传》）

《九愤》　汉荥阳服虔子慎撰　（事详范书《儒林传》）

《感骚》三十卷　汉汝南应奉世叔撰

范书本传云：“及党事起，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十万言。”

上三种，顾《补后汉志》著录。文并佚。

《九惟》　汉陈留蔡邕伯喈撰

顾《补志》著录。文见《太平御览》，四字句，无兮字。

《楚辞九悼》一卷　杨穆撰

《隋志》著录，《四库提要》云至宋已亡。（姚振宗云：北周有杨穆字绍

叔，弘农华阴人，仕至并州刺史，不知是否即此人。疑后汉梁竦作《悼骚》赋，北周杨穆为之注。）按审其书名，或为拟骚之制，姑列于此。

《天对》 唐柳宗元撰

《唐柳先生集》本（卷十四）， 宋杨万里为之解。

《九讽》 唐襄阳皮日休袭美撰

始《系述》（即序），次《正俗》、《遇谤》、《见逐》、《悲游》、《悯邪》、《端忧》、《纪祀》、《舍慕》、《洁死》。其《系述》略谓：屈平既作《离骚》，止诡俗而为《九歌》，辨穷愁而为《九章》，是后词人，摭为《九辩》、《九怀》、《九叹》、《九思》，皆相去数百祀，足知其词罕继矣。又怪王逸不以扬雄《广骚》、梁竦《悼骚》为《离骚》两派。复嗣数贤之作，以九为数，命曰《九讽》云。

《反招魂》 前人撰

序谓："屈原作《大招魂》（原注：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

上二种见《皮子文薮》卷二（《四部丛刊》景明本），唐懿宗咸通中，日休登第以前作也。

《骚略》三卷 宋鄞高似孙续古著

似孙所著《骚略》共三卷，凡十八题。卷一《九怀》中之《苍梧帝》、《思禹》诸章，其下注《湘夫人》、《湘君》诸骚题；卷二《秋兰辞》下注《少司命》；乃自写登临感兴之为，所谓旁骚者也，亦仿佛杜甫乐府立新题写新事之意。卷二中之《花飞引》乃送友词，《蓬莱游》则记筑台游处之乐。卷三中《松江蟹舍赋》、《读易赋》等皆借题以抒恬淡之趣，与生平仕迹不类。然《九怀序》言《离骚》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故自许为知原志云。《四库》著录在别集类存目。

宋刊本 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双鉴楼旧藏。

明刊本 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亦双鉴楼藏。

《百川学海》己集本 左圭辑刊《百川学海》为宋度宗咸淳九年。

民国二十年鄞县张寿镛《四明丛书》第一集本。

《答天问》 明仪封王廷相子衡撰

廷相官至尚书。著有《浚川集》，诗文列名七子中。

《王氏家藏集》本 在卷四十一。日本尊经阁藏。嘉靖刊本。

《广离骚》 明余姚孙镳文融撰

镳，别号月峰，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此编引言自题曰“东海孙镳”。

明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藏并一册。（图二四）

《广离骚》 明惠安张正声撰（郑胤夙等校）

卷首有癸未春日梓行自序，言岁辛巳读礼家居课士岳阳时作。

明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一册。（图二五）

《续离骚》一卷又《蠹骚》一卷 明漳浦黄道周撰

《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著录共三卷。

万历刊本。

《天对》六篇 明陈雅言撰

《千顷堂书目》著录。按自此以下各篇，刊本莫详，著之以备征云。

《拟离骚》二十篇 明嵊县张灿蕴之撰

《千顷堂书目》、《浙江通志·经籍志》著录。《明志》作二十卷，非。

《拟骚》一卷 明安邱黄祯德兆撰

《山东通志·艺文》著录。祯，嘉靖癸未进士，官文选司郎中。

《补楚辞》一卷 明绍兴姚舜明著

《浙江通志·经籍志》引万历《绍兴府志》著录。

《变离骚》九卷 明浙江高元之撰

《续文献通考》、《浙江通志·经籍志》并著录。

《藏骚》一卷 明湘阴徐摇举撰

《广骚》 明邵阳唐正宗撰

上二种皆《湖南通志·艺文》著录。

续补

《九咏》 魏陈思王曹植撰

《四部丛刊》复明活字本《曹子建集》（卷九）（下各本多为《四部丛刊》景本）。

《九愍》 晋吴郡陆云士龙撰

分《修身》、《涉江》、《悲郢》、《行吟》、《纡思》、《考志》、《感逝》、《□征》等篇。（其一篇名阙，《全晋文》一百一列《纡思》在《行吟》前。）

明正德复宋本《陆士龙文集》（卷七）。

《山中楚辞》六篇　梁考城江淹文通撰

文六篇，不分目。王船山采其二篇入《楚辞通释》。

明翻宋本《江文通文集》(卷十)。

《五悲》五篇《释疾》三篇　唐范阳卢照邻升之撰

《五悲》分《悲才难》、《悲穷通》、《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五篇，《释疾》分《粤若》、《忠夫》、《命曰》三篇。

明刊本《幽忧子集》(卷四卷五)。

《吊灵均词》　唐释皎然撰

景宋钞本《昼上人集》(卷七)。

《吊屈原辞》　唐长沙刘蜕复愚撰

分《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三章。(按蜕文，《别下斋丛书》本题《文泉子集》。)

明问青堂刊本《刘蜕集》(卷一)。

《后招魂赋》　宋晁补之撰

序谓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似用皮袭美说。此篇为贤且孝之亡友王安仁作。

明刊本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二)。

《惜交赋》一篇，《幽誓》、《憨游》、《交难》、《归将》各一篇　宋吴郡范成大致能撰

赋序谓：屈原既遭子兰子椒之谮，伤楚国之俗，朋友道薄，故著《惜交》之词。《幽誓》以下四篇，以交难之前后事，隐括作次第。

爱汝堂刊《石湖居士诗集》(卷三十四)。

《招隐操》　宋朱熹撰

序谓：小山作《招隐》，左太冲、陆士衡相继有作，乃自为隐遁之辞，与本题不合；故王康琚作诗以反之，乃老氏言，又非小山本意。因推本小山遗意作一阕，又作一阕以反之；并请谷城（黄铢）共赋之。

明刊本《朱文公集》(卷一)。

《广招》　宋郭世模从范撰

从范为丞相赵公（鼎）作《广招》，友人张安国为作后序（序见景宋本《于湖居士文集》卷一)。按从范文不可见。《群贤小集》附录有其诗，《阳春白雪》卷五有其词。

《雪豁仙隐》　宋鄞县楼钥大防撰

序谓：双流宋德之来四明，访其大父阆中君雪豀之仙踪，为作《楚辞》以招之。

景聚珍本《攻媿集》（卷六）。

《黄河九昭》 金磁州赵秉文周臣撰

大安元年出守宁边作。曰九昭者，思圣道之昭也。凡《发源》、《洑流》、《化道》、《通塞》、《匡俗》、《避碍》、《种粹》、《入海》、《通天》九章。

汲古阁本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

畿辅丛书本《滏水文集》。

《愍逝》、《广招》各一篇 元会稽袁桷伯长撰

序云：《愍誓》哀谢（叠山）先生，《广招》悼（王）深宁先生。

元刊本《清容居士集》（卷二）。

清道光刊《宜稼堂丛书》本《清容居士集》。

《拟招》 元闽县吴海朝宗撰

闽人林升有贤德，为荣县簿，卒官；其子入蜀负丧，为赋《招魂》一篇。

《正谊堂全书》本吴朝宗先生《闻过斋集》（卷三）。

《九叹》 明青田刘基伯温撰

共九首，用刘向篇名，而文似《九辩》。

明隆庆六年括苍本《诚意伯文集》（卷九）。

《九诵》 明义乌王袆子充撰

序谓庚寅去国，戊戌避兵，中间悲苦之词，合次之得九篇。取《九章·惜诵》之语，题曰九诵。分《远游》、《皇天》、《世连》、《哀古人》、《皇纲》、《戎葵》、《崦嵫》、《瞻乌伤》、□□九篇。

清同治刊《金华丛书》本《王忠文集》 卷十六。同卷又有《述骚》一篇。

《吊屈平赋》 明新建王守仁伯安撰

正德丙寅，伯安谪龙场，经沅湘时作。

明隆庆刊本《王文成公全书》 卷十九《外集》一。同卷有《咎言》一篇，狱中作。

《短招》 明陆时雍撰

文见所撰《楚辞榷》。

《九哀》 明华亭夏完淳存古撰

夏允彝既殉节，仲子完淳荫授中书。弘光亡后二年，仍走吴易军为参谋，被执，不屈死，年十七。著有《南冠草》。《九哀》目为《曜灵》、《思群

公》、《南浦》、《结玉芝》、《云中游》、《临清流》、《秋士悲》、《王孙》、《望首阳》。

《艺海珠尘》本《夏内史集》(卷二)

《九昭》 明衡阳王夫之撰

序谓: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爰作《九昭》而叙之,并自注。附刻《楚辞通释》后。

《姜斋文集》本(卷五)《船山遗书》四十六。

《反招隐辞》 清长洲汪琬苕文撰

景林信写刊本《尧峰文钞》(卷一)。

《拟招隐士》 清大兴朱筠笥河撰

《畿辅丛书》本《笥河文集》(卷四)。

《小山招隐图赋》 清大兴方履篯彦闻撰

《畿辅丛书》本《万善花室文稿》(卷一)。

《七招》 清阳湖洪亮吉稚存撰

序云:"昔宋玉赋《大招》,枚乘著《七发》,予读而善之,因合其体仿焉。"

《北江遗书》本卷《施阁文乙集》(卷二)。

《九招》 清山阴王诒寿眉叔撰

序云:"用效吴客之设辞,仍假巫阳之本旨,成文十首,命曰九招。"盖合二体为之,与稚存同。

《榆园丛刻》本《缦雅堂骈文》(卷八)。

按历代拟骚之文,皆有所为而作,深符离忧之旨。本编据摭,初以有单刊者入录,继思丁部散漫,更难搜寻,因稍为补辑,用便初学。惟挂漏滋多,苴订有待。若仅效骚体如江文通《应谢主簿骚体》、沈亚之《湘中怨》、韩南涧《羁凤辞》等,则姑从略。至其见于《章句》及《后语》者,世所习知,故不录。

图像第四

《九歌图》 宋舒城李公麟伯时绘

《宣和画谱》(卷七)有“《九歌图》一”。未记卷子情状,后世所传,为本非一。

一绢本(有曹纬吴说跋)

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李公麟《九歌图》一,绢本,白描,凡六段。真笔,上上。有曹、吴等跋。”(据知不足斋本。《佩文斋画谱》引《严氏书画记》作“六卷”,非。《天水冰山录》〔即分宜籍没之册〕有李公麟《九歌图》一卷,即此。)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未集:此《九歌图卷》定为检法(按公麟熙宁进士,官大理寺丞,故称检法)真笔,其画止六段,实全本也。检法《九歌图》有二,此卷则检法别本,未知作于何年;而笔迹极精细,其在皇宋元丰之初乎?向后二十余年,而曹纬书词与跋,实徽宗崇宁壬午(即元年)岁也。纬书前有序后有跋,词悉同《昭明文选》,而绢素完好,中间无断缝,固知其为全本耳。然亦因词非灵均之旧,坐是不入宣和御府,以免靖康之难,斯又不幸中之幸者与!其后五十有四年,而吴说题后,实高宗绍兴丙子岁也(即二十六年)。说字傅朋,为宋小楷第一,墨迹传世绝少,仅见游丝书律诗与此跋为二,真可宝已。乃张浚题名,略无年月可考,或在放逐之岁乎?其后八十有六年而二谢书跋,实理宗淳祐壬寅岁也。二谢,天台人,兄曰奕恭,弟曰奕修,并好古成癖,尝建养浩

斋以藏法书名画，详载周密《云烟过眼录》中，称李伯时画《九歌》，曹纬吴傅朋跋者，指此。其后百五十年，而嗣四十三代天师（师名无为）为叔本舆公识尾，实高皇帝洪武壬申岁也。师书体婉丽，源出羲献，可与倪瓒并驱。又其后篆跋为刘珏佥宪笔，佥宪以画著名，天顺中，上距皇宋元丰之初几四百年矣。斯皆历历可考证者也。是后不著相传之次，直至韩存良太史获此卷于朱太保家，为著跋语甚详。寻为僮仆藏匿，割去太史跋语，以售王征君百谷（卷首尚存太史书签）。故百谷题识仅叙检法曹吴书画之妙，余皆莫及云。壬子冬百谷赋白玉楼，其所藏书画，亦颇有散失者。窃计检法此卷，向为府君所留意，奚可任其去来，因备物易归，并志韩朱以下相传之概，以示后人。末书万历癸丑。（又载于卞永誉《式古堂汇考》十二。杂录张丑鉴别《九歌》图语多条。）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二："李伯时《九歌图》卷，绢本。高八寸，长八尺余。图只按《文选》所载《东皇太乙》、《少司命》、《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山鬼》。凡九歌，其删去者，不图也。墨笔，作山水树石屋宇舟与人骑俱极纤细。人物间施浅绛色。图之景各随歌所诠次而描摹之。每图虚其左，曹纬为书歌，书法殊清劲。绢尾吴傅朋（说）题小楷一行及长跋，最精妙。"按此卷之为真本，张青父丑考辨至详。惟不言曾在钤山堂，岂有所讳耶？曹、吴诸跋，备载丑书中。曹纬，颍昌人，字元象。此为刘昌子明题。吴说钱塘人。此卷说父师礼（安中）于崇宁间得自刘子明，后归曹纬犹子功显。南渡之初流传经过如此。又明王稚登跋称："所见李伯时《九歌图》非一，此卷尤精密遒劲，用笔如屈铁丝，盖得意之作。"谢奕修跋尾言"借临于青屿，躬自模写"。是自淳祐以来，临摹非一。青父谓：龙眠画"流传日久，真迹罕存，以故赝鼎满天下。即今《孝经》、《九歌图》，摹仿不下千百，翻成恶道，令人起厌"。后世传本之多，诚无足怪！据张丑、吴升所说，此卷书《九歌》，无《大司命》、《河泊》、《国殇》三篇。考黄伯思与龙眠时相接，其跋此图云："《楚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载于《文选》，故是图贝阙珠宫乘鼋逐鱼，亦可施于绘素，后人或能补之，当尽灵均之清致也。"（《东观馀论》）是龙眠所画，乃依《文选》，仅六段而已，与文嘉、张丑所言者合。是卷著录，见周密《云烟过眼录》外（《佩文斋画谱》引），明茅维《南阳名画表》并记李公麟《九歌图》，有曹吴等跋，盖即张丑云"韩存良家藏"者也。

一澄心堂纸本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龙眠作画，凡临古则用绢素，自运则不设色，独用澄心堂纸。《九歌图》载在《宣和画谱》。上有'宣和中秘'印，纸系澄心堂，画法灵秀生动，即湘夫人一像，萧萧数笔，嫣然欲绝。龙眠收藏法画极多，留心书学，所书《九歌》，隶法劲逸，在宋亦称第一。卷旧在贾似道家，上有其印。元人题跋，诗多可观。"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云："李检法《九歌图》有二：一卷凡十一段，乃检法自书，是曾经宣和睿赏者。宋末藏赵（都丞）与懃家（按兰坡赵都丞《画目》中有《九歌图》）。此白描神鬼之像而无景界。近世摹撮本，皆祖此。真迹传至成化间，为吴江史明古所得，语具都穆《寓意编》中。"（按一卷为别本，即上有曹纬书词者。）

按此卷即《宣和画谱》著录者。都玄敬《寓意编》有李龙眠《九歌图》一卷，汪砢玉《珊瑚网》史明古藏有公麟《九歌图》（《式古堂汇考》二，九五），并即此，《消夏记》所载为龙眠自书歌词，亦与此同卷。

一素笺本

现藏故宫。卷高一尺四寸，广二丈二尺六寸。《石渠秘笈》（《初编》卷四十四）著录列上等。墨画，款署"（缺数字）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画"。前有内府书印，吴瑞征等印，清高宗御识云："此卷藏上海顾中舍家，为董香光品题四名卷之一。"卷末张若霭奉敕画，题"屈子行吟图"。高宗御书《九歌》全文于图中，影本载《故宫周刊》357～377期。

按此卷以乾隆御题，故目为真。既乏《九歌》书词，又无元人题识，殆出后仿。

胡敬《西清札记》三亦著录。引吴其贞《书画记》谓此为检法别本，然据张丑说，检法别本即有曹纬书词之绢本，胡氏以指此，殊误。

一素绢本（有米芾篆书）

《石渠秘笈》（《初编》卷三十六）著录，列次等地一，每段有米芾篆书歌词，白描画。卷首署"九歌图，龙眠居士制"八字。末熙宁丁巳仲夏芾题识。

按以龙眠画而有南宫书篆，殊可疑；列次等，宜也。

一素本笺本

《石渠秘笈》（《初编》卷十六）著录，题宋李公麟《九歌图》，列次等宙三。白描画，凡九段，未署款。书《楚词》本文，末有王樵、洪勋、王

稚登诸跋。按此无姓名，不足信。

一纸本（有吴炳篆书）

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三著录。宋纸本，高八寸七分，长一丈四尺五寸（《鉴影》作高一尺三寸，长二丈三尺）。图缺《国殇》、《礼魂》。首有屈子像及《九歌序》，俱篆书。元延陵吴炳彦晖篆书《九歌》文。有延祐旃蒙单阏炳题记，及宋权识，与江上逸史跋。

按李佐贤《书画鉴影》二，记此卷颇详。厉鹗《南宋院画录》有吴炳其人。其卷疑临本。

一本（有赵雍〔松雪子〕书赞）

曾为霍邱裴氏藏。有文明书局影本。闻原卷现在日本，较故宫藏者多《国殇》一段，共十图。按《赏溥杰画目》有李公麟《九歌图》，列“静”字二百七十一号，未详何卷。

《九歌图》宋时有木刻，宋曾宏父《石刻铺叙》（此书有《贷园丛书》及《知不足斋丛书》本，民国古物同欣社石印本。）“画帖”条云：二卷中有“伯时《九歌图》十二段”。

《九歌图》　南宋钱塘马和之绘

和之生当高孝两朝，擅山水人物。杨绍和《楹书隅录》云：“往得马和之画屈子《九歌图册》，董思翁跋，征仲小楷书《离骚·九歌》长卷。”是海源阁旧藏有此卷也。

宋人临《九歌图》

见明朱之赤《卧庵藏画目》。有大少《司命》、《东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七图、篆，又有《卜居》，缺《国殇》、《东皇太乙》，与他图颇异。

临龙眠《九歌图》　元吴兴钱选舜举绘

汪砢玉《珊瑚网》著录（亦见《佩文斋画谱》），文嘉万历戊寅跋：“求龙眠不得，得舜举斯可矣。”

《九歌书画册》　元吴赵孟頫子昂绘并书

自题“大德九年八月廿五日画并书”，首为屈原像附书《渔父》篇，次为《九歌图》，每图附书歌词，共十篇，无《礼魂》。有明崇祯（十年）丁丑宜兴蒋如奇盘初跋，清吴荣光题字，现归张大千大风堂藏，有影印本。民国己卯刊。其《云中君》一图，似后人强补。

赵本清末有木刻及石印本。石本出自木刻，颇失真。

按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三云“余在袁六完家见赵文敏所画《九歌》，为仇山村作，乃其少年笔，亦自奇异”，上图题大德为文敏五十二岁，而此则为少作。

《九歌图》 元赵孟頫绘并书

素绢本，行楷书，白描。书画相间。卷后题延祐六年四月十八日画并书。有自跋。卷首署“九歌图”三字，下有甲寅刘德新记。《石渠宝笈》（《初编》二十五）著录，列上等天二。

按文敏卒于至治二年，去延祐六年仅三载，此为其晚岁作品。

《九歌图》 元淮南张渥叔厚绘

此卷明初贝清江记其图状最详。自《东皇太乙》至于《国殇》凡二十一人，盖叔厚所作以赠周克复者。

贝氏言在三吴时，所见凡二，此其晚年之笔（洪武本《清江集》卷二十三）。然后世流传犹不止此。

一本 （有坡翁大篆书《九歌》）（即上举卷）

明贝琼《书九歌图后》云：“《九歌图》，淮南张叔厚作，以赠周克复者。越二十年而神气益新。克复既宝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书《九歌》之辞于各图之后，可谓二绝。”

按元和顾云彬录此文于《过云楼书画记》卷二，与吴睿书小篆《九歌》混而为一，似未深考。

一本 （有元吴睿篆书《九歌》）

清安岐《墨缘汇观》名画上云：“张渥临李龙眠《九歌图》，吴睿书词卷。”白宋纸本，凡十接，高八寸五分，长一丈五尺六寸。前画屈原像，卷首篆书“楚屈原像”四字。后篆书《渔父》一首。后图首篆“《九歌图》”三字。每图题名皆篆书，图后歌词隶书。后题“至正六年丙戌，淮南张渥叔厚临李龙眠《九歌图》为言思齐作，吴睿孟思以隶古书其词于左。”下押吴睿私印吴孟思章二白文印。后款“淮南张渥临”小行书五字，下押张渥叔厚白文印。纸尾倪云林题记壬子六月，观于思齐西斋。（吴升《大观录》十八：“此卷牙色纸本，临龙眠白描法。吴孟思隶书《九歌》在画之前。”）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吾休刘氏，世藏有元人张叔厚摹龙眠居士《九歌图》。孟思小篆书《九歌》，皆能品。”按孟思即吴睿字，湖州人，精篆隶，至正十五年卒。刘基铭其墓（见《诚意伯文集》卷八）。

清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张渥《九歌图卷》，纸色纯白，载《东图元览》，向藏余家。《庚子消夏记》称伯时《九歌图》，画法灵秀生动，元人张叔厚曾临此图，吴孟思以小篆书其文，在江南人家。"即此卷也。清胡敬《西清劄记》二："张渥临李龙眠《九歌图》，纸本，设色，画分十一段。后为至正六年吴睿题语，后幅倪云林跋。篆书《渔父篇》，八分书《九歌》，附《礼魂》，无图。"即此。

一本　（有元褚奂隶书《九歌》）

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三云："元弭贞期（渥号）白描《九歌图》褚士文隶书《九歌》卷，纸本完好，高七寸七分零，长一丈二尺四寸六分。大宗伯沈归愚物。末河南褚奂至正廿一年辛丑三月题记。"奂每书《九歌》一段，多有图记，款在《礼魂》后。（案奂字士文，钱塘人。至正间，官杭州路海宁州判官。）今归徐邦达藏，共十一图。部分影入《晋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画集》（二次全国美展专集）列第七十五，只印四段。又收入近刊《楚辞图》。

一本　（与赵文敏书合装横卷）

清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下："张渥《九歌图》赵文敏书合装纸本，横卷。白描仿李龙眠。工谨中有逸趣。文敏书作小行楷甚精，自题'秋日苕上归舟作'。兴到笔也，陆子英大令得于大梁。"

按《高江村书画目》"送"字号有张渥《九歌图卷》。注云"纸本，不真"，知此卷颇多赝作，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九歌图卷》，影本载《支那画帖》(一四八、一四九、一五〇、一五一)。题云："旧传张敦礼笔，又旧传张渥笔。毕秋飘藏，载《石渠宝笈三编》、胡敬《西清劄记》，日本山本悌二郎《澄怀堂画书目录》。"篆书《九歌》自《东皇太乙》至《礼魂》，无署款。按《西清劄记》二载此卷甚详。签题张敦礼；而后幅题跋称张渥作，审其文即钞贝清江跋也。胡氏不能辨，惟谓"此或市侩割张渥他图跋语，装入此卷以炫售。而又误题签，图有《礼魂》而跋不及，其为作伪益明"。则此卷为赝鼎也。

又《故宫已佚书画目》有张屋（渥）临李龙眠《九歌图》（静字五百十号)，未详何卷。

《屈原问渡图》　明江夏吴伟小仙绘

《珊瑚网》著录（在分宜严氏画品中)。

《屈原图》　明朱约佶云仙绘

绢本，着色。现收入《画苑掇英》上册第二十四，约佶又号弄丸山人，明宗室靖江王朱守谦之后。

《离骚九歌图》 明丹徒陆谨柽居绘

纸本一卷，白描写《东皇太乙》至《礼魂》。款云：明癸巳中秋，隗台陆谨写于娄文昌云泉山房。接幅陈白阳行书《九歌》及《卜居》。之后有文伯仁、王伯谷等跋。

胡敬《西清劄记》二著录。陆谨始姓杜，亦称杜堇，又号古狂。丹徒人，占籍燕京。

《湘君湘夫人图》 明长洲文徵明徵仲绘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云："纸本，立轴，长三尺五寸，阔一尺外，运笔如丝，朱碧简淡。"此图作于正德丁丑二月。自题"少时阅赵魏公所画湘君湘夫人，行墨设色，皆极高古。石田先生命余临之，今二十年矣。俄见画娥皇女英者，顾作唐妆，虽极工细，而古意略尽，因仿佛赵为此，而设色则师钱舜举"。万历六年仲子文嘉跋云："先君写此，时甫四十八岁。"王百谷云："先属仇实父写一幅，未惬意，乃自为之。"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云："钱梦庐得之高氏，后归于余。"此帖盖作以赠王履吉者。上方楷书《九歌》二首。（又详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惟误谓见《大观录》，该书实无之。）现藏国内。影入近刊《楚辞图》。

《九歌图册》 明太仓仇英实父绘

《佩文谱》九八引王世贞《尔雅楼藏画》仇英《九歌图》，凡九章，章各有文待诏书。纸本，自《东皇太乙》至《国殇》十幅（无《礼魂》）。文徵明行书《九歌》于乌丝栏，徵明题记：嘉靖甲寅书于玉磬山房，时年八十有五。《吴越所见书画》卷一著录。

王弇州《续稿》："仇实父图《九歌》，凡九章，各有徵仲待诏书。余所见数本，皆阙《招（按当作礼）魂》，而此并《国殇》去之。"（《佩文谱》八十七引，又见《式古堂汇考》二，一一四。）

按此卷现存有临本。

《九歌图》 明吴周官懋甫绘

纸本，高七寸五分，长一丈七尺七寸五分，白描临龙眠。自《东皇太乙》至《国殇》，有王雅宜书小楷。题"嘉靖丙戌秋七月，后学王宠书"。有高士奇康熙庚辰跋。

《吴越所见书画》二著录称：其"笔如游丝，远望竟如素纸，细看则人物

森严，云气滃郁，如出鬼工”。

《九歌图》 明华亭董其昌玄宰绘

吴修《论画绝句》云：“董文敏为焦弱侯（竑）作《九歌图》，仿李伯时白描人物，工细绝伦，余得于金陵，后为江心农购去。”

《九歌图》 明诸暨陈洪绶章侯绘

图起《东皇太乙》，终《礼魂》，共十一幅。每幅绘人物一，各题《九歌》篇名。末有屈原像，题曰“屈子行吟”。洪绶友人来风季子钦之撰《离骚述注》，绶少与风季同学《离骚》，故绘是图雕镌《述注》中，事详洪绶戊寅自序。

来《注》有崇祯戊寅及康熙辛未刊本，书前并附陈氏图。

重刊本有陶湘《喜咏轩丛书》丙编本（民国十八年印）。罗振常辑陈萧二家绘《离骚图》本，蟫隐庐石印。又收入近刊《楚辞》图中。

按陈氏又有《饮酒读骚轴》，见《退庵金石书画跋》。

《离骚图》 明当涂萧云从尺木绘

是图旧钱塘丁氏有影摹本（见《善本室志》），江阴缪氏复因丁本重摹之，均极工细。萧图前有李楷序。

原本刊于弘光乙酉（即清顺治二年），日本大正十三年泷川资言跋云：“尺木卒于康熙七年，年七十八。崇祯丙子壬午两科副榜，明亡不仕。忠义之气，流露笔墨间，是书可尚，不独绘事也。又称我邦（日本）得其《太平三山图》，传诸池霞樵，因悟六法，南宗之画，于是盛行。”

日本大正十五年“图本丛刊会”重刊本二册。底本出泷川家藏。《离骚》称经，《九歌》以下称传，计卷端合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为一图，次《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远游》五图，有目无画，凡例谓因兵燹阙失，俟续云。

武进陶湘《喜咏轩丛书》丙编本，此图与陈氏《离骚图像》并收（民国十八年印）。又罗振常辑印本。

近刊《楚辞图》本　日本静嘉堂藏有《天问传》一卷，萧云从画一册。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 萧云从原图，乾隆廷臣门应兆补绘

《清史稿·艺文志·石渠三编》及清《国朝院画录》并著录三册。乾隆四十七年特命内廷诸臣门应兆（一作诏）等补绘《离骚经》为三十二图，《九章》九图，《远游》五图，《九辩》九图，《招魂》十三图，《大招》七图，香草十六图；合萧画凡一百五十五图，为《四库全书》绘本。（案乾

隆中修《四库全书》，门应兆以工部员外郎充绘图分校官。）

陶湘《喜咏轩丛书》戊编本（复文津阁本，又据江南图书馆藏宋本《楚辞》校字。民国十九年印）。又收入近刊《楚辞图》下卷。

按《沅湘通艺录》八邵阳樊锥拟作萧尺木《补绘离骚图序》（骈文）及汪家骧铁樵批邵氏经籍笔记俱误门应兆补绘骚图为尺木事，应正。罗振常纠《邵亭目》之失以汪氏笔记为莫友芝语，亦考之未审。

《九歌图》一卷 清丁观鹏绘

宣纸本。仿李公麟笔意设色，并书《九歌》其上。《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一九〇）、《国朝院画录》著录。《赏溥杰画目》有之。列一千九十八号，原卷现存。

《陈萧二家绘离骚图》 民国上虞罗振常辑

取来钦之《楚辞述注》中陈洪绶图，与萧云从绘刻《离骚》八十四图合并影印。附《陈萧二先生事辑》。

民国甲子蟫隐庐印本 四册

《楚辞图》二卷

近刊本 收屈原像四，及李公麟《九歌图》（十四图）、张渥《九歌图》（十一图徐邦达本）、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与陈洪绶《九歌图》（十二图《楚辞述注》本）、萧云从《离骚图》、《卜居》、《渔父》及《九歌图》（九图）、《天问图》（五十四图）为上卷；门应兆补绘《离骚图》（《四库全书》本）为下卷，末附解题。

按屈子画像，有藏之奇木刻者，及汨罗图，附载隆庆版《楚辞集注》。明弘治戊午刻《历代名人像赞》，万历癸巳刻《历代圣贤像赞》，明彩绘《历代圣贤图像》，清南薰殿藏《历代圣贤名人像》（见《故宫周刊》204期）并有屈原像。（此四像俱载入近刊《楚辞图》。）萧云从言："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张僧繇图，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者。"（见《离骚图》凡例。）知陈老莲所绘盖出于想象，而赵文敏《九歌图》首屈子像，自有所据。今依张氏大风堂藏原册真迹复影，取以冠于本书之首。

又按《楚辞》有关之图绘，裴孝源《贞观画史》载顾恺之有"沅湘像"，夏侯瞻有《楚人祠鬼图》（梁《太清目》作马瞻），《图画见闻志》有宋王齐翰楚《襄王梦神女图》，均不可考。萧云从言：曾"见宋史艺作《渔父图》，李公麟作《郑詹尹图》皆有三闾真仪"。"香草图名，载之《蜀中画

纪》，乃黄荃所作。”又明陆治包山亦有《湘夫人图》，汪氏《珊瑚网》有元织绣《屈原问渡图》，并附记于此，不别为著录。《九歌图》自李龙眠以来，临摹至多，诸家所记，重床叠屋，而真赝杂出，良莠不分。今不殚繁琐，考索古近著录目，为理董一遍，或于研讨画学者不无少助云。

补记

李公麟《九歌图》　　（澄心堂纸本）

清朱彝尊跋云：“李伯时《九歌图》，用澄心堂纸作。每图书三闾大夫辞于后，笔法娟妙，匪特画居绝品也。题识残阙，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画’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玺。卷末元人题咏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偕昆山顾炎武宁人、嘉定陆元辅翼王、永年申涵光凫孟、嘉兴谭吉璁舟石观于宛平孙氏研山斋。”（《曝书亭集》卷五十四）

按宋王质《雪山集》五有《题九歌图》云：“《九歌》世未有能畅其旨者也。盖诉神之辞乎。顾神漠焉，至使抱石投沙以殒其躯，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负于兹贤哉！”王质在高孝两朝，以时代度之，所题疑指公麟原本。并小长芦是跋观之，则清高宗所题素笺本，即仿自孙承泽藏卷，其出于后人临摹，昭然若揭。

《九歌图》　朱季宁绘

明吴宽跋云：“朱子之注《离骚》，可谓无遗憾矣。后人既无容赘词，则有为《九歌图》者，其初盖出李龙眠，人从仿之。此本则崑山许君鸿高所藏也。图后各系其歌，许君谓为其乡先辈朱季宁中书之笔。予观之，信其书之妙，犹有晋唐人遗意也。歌名九，其为章实十有一，《楚辞辨证》亦以为不可晓。至于《礼魂》则画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图缺云。”（《匏翁家藏集》卷五十）

译本第五

一、德文

Das Li Sao und die neun Gesänge（《离骚与九歌》）

August Piizmaier 译。载 Dem Ⅲ，Bande der Denkschuiften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皇家科学院哲学史传记论丛》之三）p. 32，Wien，1852。

T'ien Wen，die，"Himmelsfragen" des Küh Yüa（屈原天问）Das ä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中国美术史之最古资料》）

A. Conrady 与 E. Erkes 合译。Leipzig，1931。

Aus den neun Liedern des Küh Yüan（屈原《九章》，译《抽思》、《怀沙》）

F. Biallas 译。分载 Jubiäumsband，Herausgegeben von der Deutse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anlässlich ihrer 60 Jahrigen Bestehens（德国《东亚自然科学及民俗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刊》）1873，1933，Tokyo，1933，Teil Ⅰ，pp. 395 - 409。

又载 Bulletin no. 9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34。（译《思美人》、《惜往日》）

又“Die Letzten der neun Lieder Kith Yüan's”（屈原《九章》，译《涉江》、《哀郢》、《橘颂》、《悲回风》）

载 Monumenta Serica Ⅰ.1935。

Küh Yüan's Fahrt in die Ferne（《屈原远游及注释》）

F. Biallas 译。载 Asia Major 7，1931，pp. 179－241。又通论，《史记·屈传》译文，载同杂志 4，1927。

Das Zurückrufen der Seele des Sung yü（宋玉《招魂》）

E. Erkes 译。Leipzig，1914。

Sung Yü's Chiu-pien Text，Ubersetzung und Erlüutungen（宋玉《九辩》，原文及译注）

E. Erkes 译。载《通报》31，1935，pp. 363－408。

Sung Yu's Chiu-piei (Neun Umstimmungen)（宋玉《九辩》）

E. Von Zach 译。载 üt de Mededeelingen van het china Institut，Batavia，1939，pp. 15－25。

二、英文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离骚》）

E. H. Parker 译。1879。

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离骚》及其作者）

J. Legge 译。分载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7，Oxford，1895。

pp. 77－92 有屈原小传及《怀沙》英译，pp. 571－599 为《离骚》解，pp. 839－864《离骚》译文。

The Li Sao，An Ele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s，by Chu Yuan（《离骚》）

Lim Boom Keng（林文庆）译，附刘勰《辨骚》英译，及论屈原生平时代背景与草木疏人名考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

The Nine Songs，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九歌》译文兼论巫）

A. Waley 译。Allen and Unwin，1955。（《国殇》另见）

Kih Yüan，His Life and Poems（《屈原之生平及其诗》）

F. Biallas 译。载 JNCBRAS 59，1928。为《东皇太乙》、《山鬼》、《惜诵》、《卜居》、《渔父》五篇译文。

The God of Death in Ancient China（《大司命》，《少司命》）

E. Erkes 译。《通报》35，1939。

Determining a Calling by Oracle（Pu chu）（《卜居》）

H. Giles 译。在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Prose*，1923，pp. 33 - 34。

又 F. Biallas 译在 Küh Yüan，His Life and Poems 中，JNCBRAS 58，1928，pp. 244 - 246.

The Fisherman（Yu fu《渔父》）

F. Biallas 译。ibid.，p. 246.

The Ta-cao（《大招》）Text，translation and notes.

E. Erkes 译注。London，*Asia Major* 1，1924.

The Great Summons（《大招》）

A. Waley 译。*Chinese Poems*，1946，pp. 36 - 42. 同书 p. 35 为《国殇》英译一篇。

《大招》又收入林语堂 *The Wisdom of China*，pp. 318 - 323。

The Chao-hin-shi（《招隐士》）

E. Erkes 译。*Asia Major* 1，1924.

Nine hymns，Nine declarations，Li sio.

上《九歌》、《九章》、《离骚》，又有 R. Payne 译。共十三篇。载 *The White Pony*，1947，pp. 81 - 109。

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

Yang Hsien - yi and Gladys Yang（杨宪益等）译。包括 Li Sao（The Lament《离骚》)、The Odes（《九歌》)、The Elegies（《九章》)、The Soothsayer（《卜居》)、The Fisherman（《渔父》)、Reguiem（《招魂》）诸篇，多据郭氏白话译本，Peking，1953。

三、法文

Le Li Sao Poème du Ⅲe Sièele avant notre ère（《离骚》）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译注。Paris，Maisonneure，1870，in - 8 PP. Liv - 66 sans le texte.

按 H. Maspero 曾译《九歌・东君》，载所著 Lègendes mythe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书经中神话故事》，有冯元君译）Journal Asiatique 214，1924，pp. 21 - 23。

La Deyination（《卜居》）

Élègie du Pêcheur（《渔父》）

G. Margouliès 译。载 Le Kou-wen Chinois（《中国古文》），1926，pp. 39 - 42。

四、意文

Kiu-Youen-Li Sao：Grande Poema Chinese del Ⅲ Secolo a C（《离骚》）

Nino De Sàanctis 译注。Milano，Sonzogno，1900，p. 79.

五、日文

《楚辞辨证》

浅见安正译　明治四十四年刊，《汉籍国字解全书》第十七集。

《离骚》

铃木虎雄译　1907 年重刊于《支那文学研究》中。

《国译楚辞》十四卷

释清潭万仞译　大正十一年初版（《国译汉大成文学部》第一卷）。是编首《解题》，次《离骚》至《招隐士》凡十四卷，并选译王逸、朱熹、林云铭三家注，次《楚辞后语》四十九篇，末附屈复《楚怀襄二王事迹考》，及戴震屈赋地理、草木、鸟兽考证。

别　　录

近人《楚辞》著述略第一

《楚辞考异》八卷　仪征刘师培撰

此编以毛刊洪本为主，凡古籍类书所引异文，按条分缀。余惟订正误字，章句是非，概弗议及。序题辛亥正月。

宁武南氏校印《申叔先生遗书》本。

又见《中国学报》二期至五期，《国学丛刊》二卷一期。

《读骚论世》　长沙曹耀湘撰

民国四年本。

《天问疏证》　前人撰

《楚辞考异》附《读骚摘注》　洪宪元撰

民国五年印本四册。

《楚辞新论》　梓潼谢无量撰

是编略注《离骚》一书。又论屈原思想为南方文化，与北方学派不同，以爱国及超人间为其特征。

民国十二年商务版。

《屈原》　陆侃如编

民国十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印本。

《离骚章义》　傅熊湘撰

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屈宋方言考》 瑞安李翘述

民国十四年兯熏馆刊本 是编考证楚语约七十字。

《楚辞讲义》一卷 井研廖平撰

廖氏谓：并无屈原其人，“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自序，其他屈赋多是秦博士所作。开后来瞽说之端。

《六译馆丛书》本 民国十四年成都存古书局刊。

《楚辞之研究》 支伟成著

民国十八年印本。

《读骚大例》一卷 湘阴郭焯莹子燮撰

杨树达有跋（《积微居文录》下）。

民国二十年北平文字同盟社排印本。

《楚辞札记》二卷 永年武延绪撰

民国二十二年武氏印本《所好斋札记》之一。

《楚辞概论》 游国恩撰

是编目次为：一、总论，二、《九歌》，三、屈原，四、宋玉，五、楚辞的余响，六、楚辞的注家。

民国二十二年商务本。

《楚辞拾遗》 镇江陈宜进宦撰

是编诂训，引古为证，约四十余条。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蓁庐丛书》石印本。

《楚辞札记》八卷 徐英撰

民国二十四年钟山书局校印本。

《离骚集释》 衡瑜章撰

是书网罗古近之说以释《离骚》一篇，附有《史记·屈原传疏记》及《离骚韵谱》。

民国二十五年商务本。

《读骚论微初集》 游国恩撰

著者欲撰《楚辞笺证》，搜罗捃摭，先取所聚讼者一一撰为专文，总成斯集。其目次为：《屈赋考源》、《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论九歌山川之神》、《天问题解》等。

民国二十六年商务本　著者又续收近作为是集下卷，总名《楚辞论文集》。

《楚词研究》　卫聚贤、何天行等著

民国二十七年《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

《离骚研究》　陈适著

是书分渊源、内容、外形、注家、影响五部研究。

民国二十九年商务本。

《屈原研究》　郭沫若撰

重庆印本　又有近印本。

《楚辞校补》　闻一多撰

此书用力甚勤，不少新见，惟征引多属类书，《楚辞》善本惜不多觏。民国三十年初印单行本，后收入《全集》中。

《楚辞发微》上卷　路百占撰

民国三十三年河南镇平禹廷中学图书馆印本。

《屈原之思想及其艺术》　郭银田著

民国三十三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印本。

《楚辞地理考》三卷　饶宗颐撰

是书考释自高唐至楚黔中共二十篇，大体主屈原本无放居汉北之事。末附索引，及《楚辞地名讨论集》。

民国三十五年商务本。

《楚辞义述》一卷　陈培寿撰

石印本。

《楚辞作于汉代考》　何天行著

中华书局印本。

《离骚浅释》　缪天华著

195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印。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著

1952年棠棣出版社印。

《离骚语文疏解》　王泗源著

1954年版。

《离骚正义》　佘雪曼著

1955年香港印。

《离骚九歌辑评》　王滢著

《中华丛书》本　辑录谁家，不著己意。

按近刊《楚辞》研究或白话译注之作颇多，大都坊间易得，有目共睹，兹暂从略。

《楚辞》论文要目第二

一、屈原与楚辞

《屈子发微》	陈介石	《唯是杂志》（一）
《屈原研究》	梁任公	《文哲学报》（三）
《笺屈六论》	刘永济	《武汉大学史哲季刊》（四，二）
《屈原研究》	周而复	《国学月刊》（三，八）
《读楚辞》	胡　适	《文存二集》
《楚辞略说》	刘大白	《立达季刊》（一，一）
《楚辞各篇作者考》	陈钟凡	《图书馆学季刊》（一，四） 载中国韵文通论
《楚辞与毛诗异同论》	磐　宾	《莽苍社刊》（二，一）
《屈原贾生列传讲记》	陈　柱	《学术世界》（一，七）
《楚辞研究》	周干庭	《齐大月刊》（一，四）
《屈原生卒年月及放流地考》	范希曾	《国学季刊》（一，一）
《屈原》	苏雪林	《学术季刊》（一，四）（台北）
《屈原之死》	陶　光	《大陆杂志》（一，八）
《屈原の立场》	日本白川静	《立命馆文学》（一〇九，一一〇）
《楚辞校补》	易培基	《国学丛刊》（一，一）
《楚辞校勘记》	范　午	《文学丛刊》（一）

《楚辞识疑》	许笃仁	《浙江图书馆馆刊》（四，四）
《楚辞补说》	陆侃如	《文学年报》（三）
《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跋》	闻一多	《大公报图书副刊》一三六 收《全集》中
《骞公楚辞音之协韵说与楚音》	周祖谟	《辅仁学志》（九）
《楚辞音韵》	周干庭	《齐大月刊》（一，六又二，一）
《屈宋韵谱》	王天受	《华西学报》（四，五）
《楚辞韵释》	陆志韦	《燕京学报》（三三）
《王逸楚辞章句识误》	刘永济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二，三）
《楚辞旧注考》	骆鸿凯	《制言》（三四）
《楚辞义类疏证》	骆鸿凯	《制言》（一九）
《楚辞文句集释》	骆鸿凯	《制言》（四四）
《楚辞章句征引楚语考》	骆鸿凯	《国学丛刊》（一，二）
《楚辞连语释例》	骆绍宾	《湖南大学期刊》
《楚辞用夏正考》	游国恩	《文学杂志》（二，三） 收入《楚辞论文集》
《楚辞地名考》	钱　穆	《清华学报》（九，三）
《楚辞与中国神话》	玄　珠	《文学周报》（六，八）
《楚辞与文学》	郝立权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 （七，七，八）
《屈原赋说》	日本西村时彦	《艺文》（一一，六、七、八、九）
《楚辞概说》	日本桥本循	《立命馆大学论丛》一五辑
《楚辞概说》	日本盐山清	《国语》（香川）（三，四）
《关于楚辞所表现之思想》	日本本田成之	《支那学》（二，二）
《楚辞诸本之内容异同考》	日本斋滕护一	《斯文》（一七，三、七）
《浅见絅斋之楚辞观》	日本斋滕护一	《斯文》（一七，一一）
《汉镜文与楚辞文学》	日本驹井和爱	收入氏著《中国古镜の研究》第二章
《上代支那之神话传说与楚辞》	日本星川清孝	《汉学会杂志》（二，一）

Kü Yüan，His Life and Poems. Biallas，JNCBRAS 59（1928）（互见译本）

Chü Yüan Studies，J. R. Hightower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1954

二、离骚

《离骚释例》	廖　平	《中国学报》(三)
《离骚经补释》	胡韫玉	《国粹学报》(六，八，七，八)
《离骚文例》	胡光炜	《国学丛刊》(二，四)
《离骚研究》	游国恩	《国学月报汇刊》(一)
《屈子作骚时代考》	唐景升	《国学年刊》(一)
《屈子作骚时代考》	王蘧常	《大夏》(一，一)
《离骚作者新考》	沈筱瑜	《中日文化》(三，一)
《离骚讲话》	钱基博	《青鹤》(三，三)
《离骚本义》	徐　英	《安徽月刊》(二，四)
《离骚章义》	卫仲璠	《学风》(五)
《离骚解诂》	闻一多	《清华》(一一，一) 又《全集》本
《释离骚》	郑思苓	《国文月刊》(六五)
《离骚摘注》	许本裕	《中国学报》(四，五)
《离骚赉菉葹释》	徐　复	《制言》(二，三)
《离骚漫录》	日本青木正儿	《支那学》(二，二) 重刊于 《支那文学论丛》1927
《离骚的用比》	蒯涤非	《清华周刊》(三五，二)
《离骚辨名》	杨观震	《中华季刊》(一，四)
《离骚文字版本异同之比较及其纠谬》	黄焕文	《东吴》(一，一)
《离骚浅论》	苏雪林	《中国语文》(二，五、六)(台湾)
Notes on the Li-sao Riddle	萧叔平	Studa Serica 8，1949 《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三、九歌

《九歌的作者和时代》	杨观震	《中华》(一，一)

		又有《九歌的演变》载《中华季刊》
《什么是九歌》	陆侃如	《国学月报汇刊》(一)
《九歌之来源及其篇数》	李嘉言	《国文月刊》(五八)
《九歌解题》	姜亮夫	《学原》(二，二)
《楚辞九歌之篇章》	日本龙川清	《会津短期大学学报》(二)
《楚辞九歌之研究》	汪　馨	《中日文化》(三，五—七)
《九歌新编》	闻一多	《文学什志》(二，七) 又《全集》本
《九歌通笺》	刘永济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一)
《屈原九歌考》	日本藤田秀雄	《佐贺大学文学论集》
《九歌湘神考》	孙作云	《留日同学会季刊》(二，四)
《九歌山鬼考》	孙作云	《清华学报》(一一，四)
《九歌九辩考》	徐中舒	《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三)
《九歌为汉歌词》	孙楷第	《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1916
《再论九歌为汉歌词》	孙楷第	《学原》(二，四)
《读孙楷第九歌为汉歌词考》	许文雨	《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
《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构》	日本青木正儿	《支那学》(七、一) 纪庸译　《国文月刊》(七二)
《楚辞九歌叙事文学的要素与神话传说》	日本星川清孝	《汉学会杂志》(五，三)
《铜鼓图文与楚辞九歌》	凌纯声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
《楚辞国殇新解》	苏雪林	《大陆杂志》(四，七)
《司命考》	闻一多	《全集》本
《论九歌大司命》	苏雪林	《文艺创作》(二五—三一)(台湾)
《论九歌少司命》	前　人	《祖国周刊》(香港)

四、天问

《天问校笺》	刘盼遂	《国学论丛》(二，一)

《天问研究》	游国恩	《国学月报汇刊》(一)
《楚辞天问管见》	李　翘	《文澜学报》(二，一)
《天问通笺》	刘永济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三，二)
《楚辞天问补注》	周悦让	《金陵学报》(一一，一、二合刊)
《天问释疑》	徐旭生	《读书杂志》(四)
《天问释天》	闻一多	《清华学报》(九，四) 又《全集》本
《天问里旧约创世记》	苏雪林	《说文月刊》吴稚晖八十纪念号
《天问里的后羿射日故事》	前　人	
《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搅海神话》	前　人	上二篇俱刊于《东方杂志》
《天问九重天考》	前　人	《中央周刊》(民国三十六年)
《天问雄虺九首考》	前　人	《国文艺》
《关于楚辞天问篇》	日本星川清孝	《汉学会杂志》(一，二)
《天问之原型及类型》	日本滕野岩友	《国学院杂志》

Zu Ch'ü Yüan's T'ien-wen(关于屈原之天问)E. Erkes，Monumenta Serica 6 (1941) 273 - 339 On the T'ien Wen "Reconstrution" by Prof. Erkes，A. Fang，Monumenta Serica 7 (1942) 285 - 287Bemerkungen zur T'ien-wen Frage(关于天问之问题)H. Wilhelm，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427 - 432

五、九章　九辩

《九章通笺》	刘永济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五，一)
《九章解诂》	闻一多	《清华学报》(一四，二)
《楚辞九章之研究》	方授楚	《学术丛刊》(一)
《九辩通笺》	刘永济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四，四)

六、远游　招魂　大招

《大招招魂远游的著者问题》	陆侃如	《读书杂志》(二)
《驳远游大招为东汉人伪作说》	范希曾	《文哲杂志》(三)
《招魂非宋玉作说》	郑　沅	《中国学报》(九)
《宋玉赋辨伪》	刘大白	《中国文学研究上》

《宋玉评传》	陆侃如	《小说月报》（十七）号外
《见于先秦文学之招魂》	日本铃木虎雄	《支那文学研究》1925
《楚辞远游篇作成年代考》	日本上岛一夫	《汉学会会报》二，1934

按近代中西学者有关《楚辞》之论著颇繁，大都散见各杂志中。时人所编如《文学论文索引》、《国学论文索引》一至四篇、《民国学术论文索引》，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次刊行《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现出至昭和二十六、二十七年度）日本学术会议所编《东洋文学语学篇文献目录》（1954年版）于论文采摭颇备。其专为《楚辞》论文编目者，近哈佛大学 James R. Hightower 所作《屈原研究》（*Chü Yüan Studies*）末附目录列举《楚辞》论文计一百三十八篇（刊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廿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214—223 页），合以上举书，虽不无缺漏，而大体已具。兹删其要，并且补缺略，以日文西文附焉。其先为论文后收入专书与无关宏旨者，概行刬削，学者欲知其详，盍取上列索引诸书而翻检之。

外编　《楚辞》拾补

“离骚”异文亦作“离慅”考第一

《史记·屈原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按司马贞《史记索隐》本“离骚”作“离慅”。单行《索隐》（卷二十）“而作离慅”句下云：“慅亦作骚，按《楚辞》慅作骚，音素刀反。应劭云：离，遭也；骚，忧也。又《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据《广雅丛书》复毛晋本）若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刘氏嘉业堂景宋蜀大字本裴骃《集解》则作“离骚”。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索隐》本、枫、三本‘骚’作‘慅’。”枫盖指日本枫山文库本《史记》，三指日本三条西实隆写本《史记》。是屈传之作“离慅”，东瀛古钞本多与《索隐》同。

《史记》三家旧注，古各单刊。明毛晋复刻《索隐》三十卷，据晋《跋》乃取北宋秘省大字本。又元世祖中统二年曾刊《史记索隐》（见《拜经楼题跋》二），较毛刻注尤备。自三家注合刻，于原注多所芟节，今存南宋黄善夫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据影）字作“离骚”。引《索隐》文，无起句“慅亦作骚”以下十字，已有删削。而“音素刀反”句下，又有“一音萧”三字。余藏明嘉靖金台汪凉本与黄本同，而“素”字作“索”。今依足本《索隐》，知“离骚”二字《史记》一本作“离慅”，与《楚辞》异。洪氏《补注》、朱氏《集注》皆未及校，此古本所以可贵也。

慅字不见于字书。张文虎曰：“《索隐》本作慅，疑今本史文皆后人所

改。”则一本作“离慅”。《广雅·释诂》：“慅，愁也。”又《释训》：“慅慅，忧也。”《九叹》：“蹇骚骚而不释。”慅慅即骚骚也。慅与骚通。《诗·陈风》“劳心慅兮”，《释文》云“慅，忧也”。重言则曰“慅慅”。《尔雅·释训》：“慅慅，劳也。”《释文》“郭：骚、草、萧三音”。慅亦音“萧”，与《索隐》“骚一音萧”正合。可知“慅”、“骚”乃一字。又形声字从叟从蚤每同音通用。如《诗·生民》“释之叟叟”，《释文》字又作溲，“淘米声也”。《尔雅·释训》：“溞溞，淅也。”郭音骚，即其例证。故与慅亦一文，“慅”训忧训愁，与《离骚》之为离忧正合。

晋郭璞《楚辞》遗说摭佚第二

自叔师而后，注《楚辞》者以郭璞为大家。《隋志》：《楚辞》三卷，郭璞注；两《唐志》：璞注《楚辞》皆作十卷，其书已亡。《一切经音义》颇引璞所注书，独不及《楚辞》。自敦煌僧道骞《楚辞音》残卷出，其中引璞说凡四，遗文剩义，世皆宝之。闻一多《跋》益以《江赋》一条，以为景纯注骚，今所见者，略尽于此。然郭注《尔雅》、《方言》、《山经》、《穆传》，其书俱在，间每援引《楚辞》为说，比而辑之，亦可窥其崖略，未可忽也。

惟郭注《山海经》引《离骚》文，间称曰“离骚经”，与王逸注本同，唐皮日休《九讽序》亦云“屈平既放，作《离骚经》”。晋唐皆然。可见洪兴祖引《释文》无“经”字，未必真为古本也。

又引《九章》、《天问》、《远游》语，则称曰“离骚”，引《九歌·湘夫人》则曰“《离骚·九歌》”，引《招魂》则曰“楚辞”，颇与宋人辑注《楚辞》统称屈原所作为“离骚”相符。知晦庵《集注》目录题曰《离骚·九歌》，而云“檃括旧编，题屈原二十五篇为《离骚》”者，其说固远有所据也，疑自晋以来本子已如此。彦和《文心·辨骚》篇以“骚”名统《楚辞》，正六朝以来之习惯焉尔。兹就郭注各书引及《楚辞》者辑录如下：

陬　《尔雅·释天》：“正月为陬。”郭注：“《离骚》云：摄提具于孟陬。”

江蓠　洪氏《补注》引郭璞云“江蓠似水荠”。

宿莽　《尔雅·释草》：“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离骚》云。”

又郭氏《尔雅图赞》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子嘉之，讽咏以比。"（《艺文类聚》八十一）

车　《尔雅·释草》："藒车乞舆。"郭注："藒车香草。见《离骚》。"

薜荔　《山海经》二《西山经》："小华之山，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郭璞《传》云："萆荔，香草也，蔽戾两音。"

按洪兴祖引以"缘木生"句为郭注文，与明本《山经》异。郝懿行云萆荔、薜荔古字通。

翳　《山海经》十八《海内经》："北海之内有蛇山。……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郭璞《传》："凤属也。《离骚》曰：驷玉虬而乘翳。"（"而"各本并作"以"）

按《广雅·释鸟》："翳鸟，凤皇属也。"字作翳，即郭说所本。唐本《文选集注》作"乘翳"，引王注亦作"翳"，与洪氏《补注考异》一作同。骞《音》及宋本朱熹《集注》并作"鹥"，从鸟。

崦嵫　《山海经》二《西山经》："崦嵫之山。"郭璞《传》："日没所入山也，见《离骚》。奄兹两音。"

又骞公《楚辞音》作"兹"，下引："郭云止日之行，勿近昧谷也。"

若木　《山海经》一《南山经》："其华四照"，郭璞《传》："言有光焰也，若木华赤，其光照地，亦此类也。见《离骚经》。"（按《离骚》："折若木以拂日。"）

蜺　《尔雅·释天》："蜺为挈贰。"郭注："蜺，雌虹也。见《离骚》。"（郝懿行云蜺者霓之假借。按《离骚》云："帅云霓而来御。"）

鸩　《楚辞音》鸩下："郭云：凶人见欺也。"

珵　《楚辞音》珵下："郭本止作程字，取同音。"

巫咸　郭璞《山海经图赞》云："群有十巫，巫咸所统。"又有《巫咸山赋》，序云："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贵神。"（《艺文类聚》七《全晋文》一二〇）

糈　《山海经》一《南山经》："糈用稌米。"郭璞《传》："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一音婿。稌，稌稻也，他睹反。糈或作疏，非也。"（按《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郭训糈为祀神米，本此。）

《楚辞音》鸩下："郭云：奸佞先己也。"

以上《离骚经》

帝子 《山海经》五《中次十二经》："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传》："《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按《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山经》郭注文甚长，不录。）

褋 《方言》四："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郭注："《楚辞》曰：遗余褋兮澧浦。音简牒。"（按句见《九歌·湘夫人》）

涷雨 《尔雅·释天》："暴雨谓之涷。"郭《注》："今江东呼夏月暴雨为涷雨。《离骚》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是也。涷音东西之东。"（按句见《九歌·大司命》）

以上《九歌》

凭 《方言》二："凭，怒也，楚曰凭"。郭注："凭，恚盛貌。"《楚辞》曰："康回凭怒。"（按句见《天问》）

烛龙 《山海经》十七《大荒北经》："是谓烛龙。"郭璞《传》："《离骚》曰：日安不到？烛龙何燿？"（按语见《天问》，作"烛龙何照"。郭引"照"作"燿"也。）

九衢 《山海经》五《中山经》："其枝五衢。"郭璞《传》："言树枝交错，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离骚》曰：靡萍九衢。"（按句见《天问》而称曰《离骚》。）

毕日 《山海经》九《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郭《传》："庄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离骚》所谓'羿焉毕日？乌焉解羽？'者也。《归藏·郑母经》云：'昔者羿善射，毕十日。'"（下略。按毕日二句见《天问》。明本字作彃日。）

朴牛 《山海经》三《北山经》："（敦薨之山）其战多兕旄牛。"郭《传》："或作撲牛。（郝懿行《疏》作'樸牛'，此据成化本。）撲牛先《离骚·天问》，所未详。"

按《天问》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是郭璞本作"樸"或"撲"。洪氏《补注》谓"朴无樸音"，非也。《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徐文靖（《管城硕记》）以为朴牛即仆牛，音同字异。然郭说乃以樸牛说旄牛，视为动物名，与王逸训朴为大，义别。（"恒秉季德"，王静安以为即卜辞所见先公之王亘及季，可备一说。）

以上《天问》

王英 《山海经》二《西山经》："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郭《传》："谓玉华也。《离骚》曰：'怀琬琰之华英。'又曰：'登昆仑兮食玉英。'"（按上句见《远游》，下句见《涉江》。）

棘 《方言》三："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间谓之棘。"郭《注》："《楚辞》曰：'曾枝剡棘'。亦通语耳。音已力反。"（按句见《九章·橘颂》）

任石 《文选》郭璞《江赋》："悲灵均之任石。"李善注："《楚辞》（按见《九章·悲回风》）曰：'骤谏君而不听，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怀沙砾而自沉兮。'《史记》曰：'屈原作《怀沙》赋怀石自投汨罗。'怀沙即任石也。义与王逸不同。"

以上《九章》

大壑 《山海经》十四《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郭《传》："《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离骚》曰：'降望大壑。'"（按句见《远游》）

以上《远游》

巫阳 《山海经》十一《海内西经》："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传》："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楚辞》曰：'帝告巫阳。'"（按句见《招魂》）

以上《招魂》

隋僧道骞《楚辞音》残卷校笺第三

《隋志》著录《楚辞音》，有晋徐邈、宋诸葛氏、孟奥、隋僧道骞及失名五家，书皆失传。朱子《集注》独言："道骞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盖自赵宋以来，骞音已不可得见。近岁敦煌所出，乃有骞《音》《离骚》残卷，旷世瑰宝。王重民、闻一多先后为考校，惟多疏略。周祖谟复发其协韵之说，然未及全文也。时贤有注《离骚》者，颇采摭骞音，惟或误增（如县圃其高一万一千里句，原卷万上无"一"字），或误夺（如引"汝者，灵氛汝屈原也"句，漏"灵氛"二字，致不可解），知据他处转引，似未睹原卷影本也。兹为复影，并重加补校如下（以下引骞公《音》简称曰"音"）。

乘鷖 唐钞《文选集注》作乘翳。刘永济《离骚通笺》据戴本，以翳字为正，然证此卷，隋本乃作鷖，知二字通用，作鷖未必非。

溘 《文选集注》引王逸曰："溘犹奄也。"而此卷作"掩"，洪氏《补注》引王作掩，与此同。又骞《音》引《埤苍》："溘，依也。"今本《广雅·释诂》云："溘，依也"。王念孙据《众经音义》引作"溘"，此卷可为佐证。

轫榰 《音》于榰下引《迩疋》（即《尔雅》）："榰，柱也。"又轫下引王逸云："枝，轮木也。"是王注又作"枝"，然洪《补注》引王作"搘，轮木"。又言"搘一作支"。考唐钞《文选集注》正作"支"，《诗·小旻》疏引

注同，可见字有楮、掿、枝、支数本之异。

圃 《音》引《广雅》："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一尺六寸。"乃《释地》文。与《淮南子·地形训》合。（据影钞宋本。惟《淮南子》作二尺稍异耳。）今本《广雅》作"万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疑数字有误。

奄兹 《音》引《山海经》，乃《西山经》文，其中瘅作"痺"。"其实如瓜"句"实"下无"大"字，并与成化本《山经》小异。《音》又引《禹大传》，亦见《西山经》郭注。成化本"洧盘"误为"洧盘"，可据此卷正。又引《穆传》："逆驱升于弇山。"郭注："弇，弇兹山，日所入也。"明天一阁本作"日入所"，非。《音》于"奄"下云宜作"崦嵫"。于"兹"下云"宜嵫"。闻校：唐写本《文选》残卷作"奄兹"，按《文选》原卷实作"崦嵫"，闻氏未见影刊，故误。

胡刻《文选》引王注："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贤人。"唐本《文选》同，明正德刊《楚辞》亦同，与此卷合。知《补注》及今本《章句》作"卒至"者非是。

须臾 唐钞《文选》作"须臾"，陆善经本作"逍遥"，謇公以消摇为非。而云"须臾者，谓待卜日也"，义较长。

《音》引《广雅》证王逸说，语见《释训》。按《说文》："僔，聚也。"《广雅·释诂》："蓴，总（原作缌，依王念孙改），聚也。"张衡《南都赋》："森蓴蓴而刺天。"又扬雄《甘泉赋》："齐总总撙撙其相胶轕兮。"蓴蓴、撙撙与僔僔并通。

溷 《音》引《广疋》"浊也"。乃《释诂》文。

女 《音》云"以谕女也"，本王逸说，洪《补注》"谕"作"喻"。

溘 《音》云："奄并作晻字。于感反。引《广疋》：'晻晻，暗也。'"按此诂王逸义。《广雅》文见《释训》。《博雅音》"乌感反"，同。

字诂 《音》引《字诂》共二则：一溘字下，（晻）《字诂》云"亦陪字也"。其一荪下云："《字诂》：虀、荃，今荪。"考《尔雅·释言》："陪，暗也。"《玉篇》："陪同晻。"又虀，《玉篇》云"同荪"。并与《字诂》义同。按《字诂》即张揖著。《隋志》有《古今字诂》三卷。《唐志》作《古文字诂》二卷，张挹撰。《一切经音义》引称张揖《字诂》。《匡谬正俗》、《两汉书》注、《文选》注并引之。任大椿《小学钩沉》有辑本。上二条可补其缺。

贻　与《补注》一本同。唐本《文选》亦作贻。

宓　《音》云："亡笔反。"按洪《补》宓音伏。然隋时固读如密也。

纬繣　《音》云："宜作㨨，同许韦反。""宜作 㦊，同夫麦反。"引《广疋》："㨨㦊，乖剌也。"

按《博雅音》："㨨音挥；㦊，呼获反。"（据王念孙校）公孙罗《文选音决》："纬音挥，繣，呼麦反。"音正相近。《说文》："㨨，戾也。"謇公据《广雅》为说，所引乃《释训》文。《玉篇》："㦊，乖戾也。"分言之，马融作"徽嫿"（《广成颂》），字亦通。

骄　《音》引《字林》云："怚也，子恕反。"按《淮南子·缪称训》"矜怚（据茅本）生于不足。"高注："怚，骄也。"（怚或误为怛，王念孙已订正。）又《说文》："怚，骄也。"即《字林》所本。宋刻大徐本作"矫也"，非。据此可正其误。段云："此与女部𡟭，骄也，音义同。"又《方言》郭注："怚音骄怚。"

逴　《音》云："本或作遥字，与招反。"按唐本《文选》亦作"逴"。《补注考异》及各本无作"遥"者，此当是隋以前别本。

偃蹇　《音》三引《广雅》。一为《释训》文（卷六），一为《释言》文（卷五）。今本作"偃，仰也"，其一"偃蹇，㤨也"。今本《广雅》不见。謇公湛精雅故，征引独多，惜王氏为《疏证》时，未及见此以为考校之资。

鸩　《音》引《广雅·释鸟》文。《淮南子·缪称训》："晖日知晏，阴谐知雨。"许慎记云："晖日，鸩鸟也。阴谐，晖日雌也。"张揖本此。謇云《淮南子》作"云日，字或作䲰"。按今所见《淮南子》各本，如景钞北宋本、茅坤批本、《汉魏丛书》本、庄逵吉本、《道藏》本并作"晖"，无作"云日"者，而"日"或误作"目"。刘文典《集解》，王叔岷《斠证》均校定"目"为"日"误，而不知唐以前《淮南子》本又有"作云日"也。刘逵《吴都赋注》："鸩鸟一名云日。"（以下数语略同《中山经》郭璞注，兹从略。胡刻《文选》"日"误作"白"。）与古本《淮南子》合。其作"䲰日"者，王念孙《疏证》言《御览》引吴普（按普，庆陵人，从华佗学）《本草》："运日一名羽鸩，运或作䲰。"《名医别录》："鸩鸟毛有大毒，一名䲰日，生南海。"刘氏《新语·殊好》篇"䲰日嗜蚍"，《说文》："鸩，毒鸟也，一名运日（小徐误作目）。"知"䲰"与"云"、"晖"、"运"字并通。

唐本《文选》作“鴂鸠”，字同。洪《补注》《释文》：“雄作鸠，误。”刘师培《考异》云：“《汉书·扬雄传》颜注引‘鸠’作‘鴂’，似以作鴂为正。”然证之隋唐本，其说亦非。

宅 《音》云“如字。或作𡧍音”。按《补注》：“宇一作宅。云若作宅，则与下韵叶。”今謇本正作宅，下韵：“孰云察余之善恶。”謇《音》“恶，乌各反”。与好恶之读“乌故反”别，是宅正与恶叶也。闻一多《校补》谓作宅为非；或据陈第拟音以斥洪说，盖于謇《音》未细核故。

畣 按《广雅·释言》：“对，畣也。”经传通作答。《音》作畣从曰。《晋公盦》有此字。（《筠清馆金文》三，一七，吴荣光释。）《汗简》：“畣，荅。出《牧子文》，俗作畣字。”与此异。

珵 按《玉篇》：“珵，除荆切，美玉也，埋六寸光自辉。”可与王注及此所引《相玉经》参照。《相玉经》，《汉志》不载。魏《志》钟繇《传注》引《魏略》太子与繇书曰“窃见玉书称”云云，姚氏《汉志拾补》列在形法家，据謇《音》，则《相玉经》隋时书尚存也。又据謇《音》，知隋前古本有误珵作“瑶”者，洪氏《考异》所无。

苏 《音》云：“宜作苏，同私胡反。”按《说文》：“穌，把取禾若也（按若即䅳）。”樵苏字当作穌，謇公据《说文》正之为是。

幐 《音》云：“杜絙反。”按王《注》：“帏谓之幐。幐，香囊也。”《玉篇》：“帏，香囊也。”

帏 《音》云：“又袆，又纬，同许韦反。”按帏通作袆。《尔雅·释器》：“妇人之袆谓之缡。”亦见《诗·东山》毛《传》。《说文》：“帏，囊也。”段《注》谓：“凡囊皆曰帏，非《毛诗》之帏。”清人多取其说。今核謇《音》，则隋以前本，帏与袆固通用也。

糈 《音》云：“宜作稰字，驶吕反。”按大徐本《说文》：“私吕切。”音同。他本有作“稰”，（《汉书·扬雄传》颜注引孟康说）未见作“稰”者。謇公盖据《说文》正。

又云：“依字宜先吕反。”按《山海经·南山经》：“糈用稌米。”郭注：“糈谓祀神之米名，先吕反。”是謇公取郭璞音也。

日勉升降以上下 《音》云：“曰灵氛之词。”按五臣谓“此巫咸之言”说异。清戴（震）、张（惠言）、姚（鼐）、曾（国藩）、吴（汝纶）以至蒋（骥）、龚（景瀚）、叶（树藩）各家亦皆以“曰”为巫咸之词。

《音》云：宜作矱。按《广雅·释诂》：“矱，度也。”《说文》：矱，规

蒦商也。一曰度也，或作蘉。引《离骚》"求榘矱之所同"。騫公乃依许慎说。

严　《音》引《迩疋》云："俨，敬也。"按《释诂》文。《释名》："严，俨也。"《文选》各本作"俨"，騫公盖读"严"为"俨"。

鹎鵊　此条引《文释》云：下言："按江之意，秋时有之。"《文释》为书名，闻一多《跋》疑系"释文"之倒误。（然无名氏《楚辞释文》为宋人所传，騫公隋人，年代悬绝，不应引及其书。况《释文》未见为旧本，说详《四库提要》。）今考《文选·思玄赋》："鶗鴂鸣而不芳。"善《注》引服虔云："鶗鴂一名鵙，伯劳也，顺阴气者生，贼害之鸟也。王逸以为冬鸟，缪也。"与騫公引《文释》语正同。《一切经音义》引书有曰《文字释训》、《文字释要》者。"文释"可能为其省称。又《思玄赋》有旧注，李善云"未详注者姓名"，此句胡刻《文选》善注前有"鶗鴂，鸟名也；以秋分鸣"九字。当是旧注文。騫公言"江之意"，其人无考，江或注字之误，岂指《思玄赋》注欤？疑莫能明也。

又《音》引《广疋》："鹎鵊，布谷也。"按《后汉书·张衡传》章怀注引《广雅》语亦同。然《广雅·释鸟》原文云："鹎鵊、鶪鶝，子鴂也。""击谷、鴶鵴，布谷也。"騫公实混为一条。至章怀之误，王念孙《疏证》已纠其失矣。

迎　《音》云："鱼敬反。"陈第谓"迎"恐是"遻"字误。戴震以迎为迕，古音御或讹作迎，方绩同其说。今证以此卷，知"迎"字自不讹，戴说非也。

调　《音》云："徒雕反。调，和也。"调上与同叶。朱骏声疑调为 詷形讹，殊为臆说。而吴才老谓调音同，证以此卷，隋时仍读如字。自宋以来，韵学盛行，注家于骚不讹之韵，每轻为改字，如上举二字，是其著例，实多无据。以騫《音》观之，古读殊不尔。惜騫公书自宋已亡，使吴才老、陈季立辈能及见之，其立论必不如是之悍耳。

沬　按《广雅》："沬、既、央、极，已也。"《招魂》亦云："身服义而未沬。"王逸注云："沬，已也。"说同騫《音》。沬，亡盖反，沬与兹叶。诸家以沬为沫，陈第云："古音迷，读平声。"殊无据。证以騫《音》，字当从未作沬，非沫也。宋本《集注》正作沬。段玉裁以"兹""沬"乃之脂合韵，是。

今按謇公此卷有裨于《楚辞》之考证者，约有八事：

一曰：可校隋以前古本之异同也。如求索作"索"（《方言》同），瑶，《音》云"或作璠"，是。

二曰：可校王逸《注》之异文也。如上举"卒至"之作"卒遍"，"勃勃"之作"浡浡"，与《补注》一本合。"凿"之作"鑿"，与他本异。

三曰：可考古章句之遗义也。如"勉升降"句云"灵氛之词"，可息清人之异论。

四曰：可考古协韵及古音切也。协韵说周祖谟已发其凡。至若音切则当合郭璞《尔雅》、《方言》注之音，及《博雅音》与《文选集注》所引公孙罗《音决》等而综辑之，可别撰为"楚辞旧音"。

五曰：可据以辑《楚辞》佚注也。如郭璞遗说，辑已见前。

六曰：可据以辑校古小学书及其他古籍。残卷引《字诂》、《字林》，俱可补清人《小学钩沉》等之缺；所引古籍如《淮南子》之"云日"，可正今本之讹。

七曰：可辨古文字之异体也。如畣之作畣，与《广雅》及《汗简》异，而同于金文。

八曰：可据以订古之韵读也。如"怀乎故宇"之作"故宅"，与"恶"读乌各反相叶，足正陈第之误。

是卷注音之字二百八十有奇，惜乎残缺不全，然残膏剩馥，沾溉后人多矣。其他见于《文选集注》引公孙罗《音决》者，尚有四条：

> 岐，骞音奇，又巨支反。（《吴都赋》，《集注》卷九）
>
> 刈，骞上人鱼再反。（《离骚》，《集注》卷六十三）
>
> 严，骞上人鱼检反。（同上）按卷见此条，作鱼检反。
>
> 蘋音频。即《字林》所谓青蘋草也。萧（按指萧该《文选音》）骞等诸音，咸以为蘋音烦，非。（《招隐士》，《集注》卷六十六）

兹并录之，以存其概。

唐本《文选集注·离骚》残卷校记第四

日本所藏失名钞本《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未著录。据冈井博士《柿堂存稿》引《御堂关白记》：长保六年（即一条天皇年号，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年）九月，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又其卷八卷九末并有源有宗嘉历元年识语（即日本醍醐天皇年号，当元泰定三年，1326 年），盖此书自北宋时传入扶桑，卷中于唐诸帝讳，或缺或否，其写自东瀛，抑出唐手笔，不能遽定，要所据为唐本，则无疑也。《集注》共一百二十卷，全帙旧庋金泽文库，后散出各处不全。东京大学仓石教授为余言：当原卷发觉被人剪拆盗出，岛田翰即以此负咎自戕。今《集注》有罗振玉影刊十六卷，及京都帝国大学影印旧钞本（自第三集至第八集），惜非全貌。其卷六十三为《离骚经》，起注引王逸《序》至“恐导言之不固”为上卷，自“时溷浊而嫉贤兮”以后为下卷，今仅存上卷而已。兹撷其要，撰为校记，至王注异同亦多，从略。

（一）唐本无“曰黄昏以为期”二句。六臣本《文选》亦无之。洪兴祖疑后人误以《九章》二句增此。今唐本正无二句，可为洪说佐证。

（二）“聊须臾以相羊”句，及所引王逸注并作“须臾”，与謇《音》作“婆臾”合。明本则并作“逍遥”，謇公云：“本或作消摇二字，非也。”

（三）“长顑颔亦何伤”句，唐本“顑颔”作“减淫”，《集注》引：“曹，减摇二音，陆善经曰：顑颔亦为咸淫”。

按《说文》：“顑，饭不饱面黄起行也。从页咸声，读若戆。”又：“颔，

面黄也。”《集注》引曹宪音读“減摇”。唐本作“減滛”，及“咸滛”，他本所未见，当是音假。“颔”与“顉”通。《玉篇》及《一切经音义》引《说文》云：“摇其头也。”（见《古本考》）《左传》“迎于门顉之而已”，本作“颔”，杜注“颔摇其头”。《释文》：“颔本又作顉。”曹音颔为摇，疑取音义于此，“摇”又转为“滛”，故又作咸滛耳。

（四）唐本有，而明本无者，如“皇览揆余于初度”之“于”字，又“重申之以揽茝”之“重”字。

（五）唐本无者，如“折若木以拂日”之“以”字，似夺。

（六）唐本异文多与《考异》引之一作同。如：

齐怒之“齐”（明本作斋）。

按六臣本《文选》亦作“齐”同，《考异》斎一作齐。刘师培引《匡谬正俗》、《御览》、《事类赋注》并作齐。作斎者乃通假字。

夭平羽之野之“夭”（明本作殀）。

“何不改此度也”及“道夫先路也”（明本无二“也”，而注云一本句末有也字）。按《屈赋音义》：“与上也字一呼一应。俗本删去者非。”核以唐本，其说是。黄省曾本有“也”字。

（七）唐本“世”字避作“代”，或作“时”或作“俗”，又“民”字避作“人”。按洪氏《补注》云：“李善注本有以‘世’为‘时’为‘代’，‘民’为‘人’之类，皆避唐讳。”

（八）众皆竞进以贪婪句，唐本注云：“陆善经本无众字。”

（九）唐本误者如“好朋”误为“好明”，“凿枘”误为“凿柄”。其注文亦有一二误笔。

（十）唐本有异体字，如“蘂”、“滞”等。

唐陆善经《文选·离骚》注辑要第五

日本旧钞《文选集注》卷第六十三屈平《离骚经》，注引公孙罗《音决》按语言："序不入，或并录后序者皆非。"《集注》作者按曰："此篇至《招隐》篇钞脱也。五家（即五臣本）有目而无书，陆善经本载序云云。"（即王逸《离骚序》）《集注》既载陆氏异文，又时著其说于王逸旧注之下，有裨于骚学至巨。《集注》为天壤孤本，残帙虽经景刊，而购求不易，故不惮繁琐，移录其要，以饷读者。

善经，玄宗时人。《集贤注记》云："开元十九年三月萧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陈居注《文选》。（中略）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玉海》五十四引）惟《文选集注》屡称引"陆善经本"。（上举外，又如六十一上，江文通《杂体诗》下云："《音决》陆善经本有序，因以载之也。"）则善经注《文选》似曾独力成书。日本新美宽著《陆善经之事迹》，即主是说，详《支那学》中（九卷第一号）。

陆注《离骚》，不少新义，如解胡绳为冠缨，皆与叔师异诂。颇领亦作咸摇，独殊于他本，并足以资考镜而广异闻。治《楚辞》者向未捃摭（洪氏《补注》引《文选异文》及五臣说不及善经），断玑碎璧，其可宝贵为何如耶！《集注》本《离骚》残存其半，自《九歌》至《九辩》并缺，不力稽其同异，是可惜耳。（《集注》《招魂》及《招隐士》尚存，兹不录。）

王逸注　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后校书郎中，注《楚调》，后为豫章太守也。

按楚调，调当是词字之误。

庚寅　岁月日皆以寅而降生，为得气之正也。
按此本王逸说。

皇览　言父观揆之为初法度。

内美　内美谓父教诲之。

扈　扈，带也。

纫　纫谓纪而缀之。《礼·内则》曰："衣裳绽裂，纫针请补缀。"

迟暮　喻时不留，己将凋落，君无与成功也。

先路　言君何不改此度而用贤良，求人于正，吾则为先道也。

申椒　申椒，椒名。菌桂，生于桂枝间也。

窘步　窘，迫也。尧舜行耿介之德以致太平；桀纣猖狂，唯求捷径，而窘迫失其常步，以至灭亡。

踵武　言已急欲奔走先后以辅翼君，望继前王之迹。

齐怒　君不察我中情，反信谗言而同怒己也。
按此释"齐"为"同"。

灵修　灵修，谓怀王也。言己知謇谔之言以为身患，忍此而不能舍。指九天以行中正者，唯欲辅导君为善之故也。

数化　化，变也。言我不难离别放流，但伤君数变易耳。

畦　为区隔也。

萎绝　萎绝，犹将死也。言所种芳草，冀其大盛，忽逢霜雪，遂至萎死。喻修行忠信，乃被放流，不惜身之时亡，恐志士亦罗（罹）害也。

婪　婪，贪之甚。此句原按："陆善经本无众字。"

凭　凭，每也。

嫉妒　谗谄之徒，行皆邪僻，乃内恕诸己以度人，各与其嫉妒之心。

顑颔　顑颔亦为咸淫（按原卷作"长减淫亦何伤"）。

木根　贯，穿；蘂，花也。木根取其顾本也。

胡绳　胡绳，冠缨也。庄子云："曼胡之缨。"
按《庄子·说剑》："曼胡之缨，短后之衣"，成玄英《疏》："曼胡之缨，谓屯项抹额也。"《释文》："曼胡，司马云：曼胡之缨。谓粗缨无文理也。"《魏都赋》："三属之甲，缦胡之缨。"铣《注》："缦胡，武士缨名。"此说与王逸注训胡绳为香草义独异。

謇吾法夫前修　带佩芳草，蹇然安舒。

朝谇 谇，告也。告以善道，所谓谏也。好自修系，以为羁饰，謇然朝谏而夕见废，言忠之难也。

九死 亦心之所善，虽死无恨。九，言其多也。

谣诼 谓共为谣言而诼诉也。谚曰：“女无善恶，入宫见妒。”《方言》云“楚以南谓诉为诼”，音涿。

按《方言》十：“诼，愬也。”此以愬为诉。

追曲 随曲而行。

竞周容 皆竞比周相容以为法，言败乱国政也。

所厚 所以屈忍者，欲伏清白以死，直节坚固，乃前世之所共厚也。

相道 相道，谓君侧之人；不敢言君，指其左右。

按此与王《注》释相为视迥异。

止息 言步马于兰泽之中，驰往椒丘，且焉止息，犹俟君命也。

信芳 虽不我知，情其信芳也。

四荒 观乎四荒，欲之他国也。

繁饰 言外服鲜华，喻内行修洁也。

博謇 博謇，宽博偃蹇也。原按“陆善经本謇为蹇”。

按五臣《文选》作蹇，同陆本。

历兹 已之所行，皆依前圣节度中和之法，而被放流，经历于此，故抚心而叹。

陈辞 谓兴亡之事也。

九歌 言夏启能修禹之功，奏《九辩》、《九歌》之乐以和神人。《九辩》亦见《山海经》。

五子 太康但恣娱乐，不顾祸难以谋其后，失其国家，令五弟无所依。

羿 羿，夏诸侯，《左传》云：“羿因夏人以代夏政。”

浞 《左传》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羿以为相，杀羿，因其妻而生浇。

严而祗敬 原按“陆善经本严为俨”。

按《补注》，俨一作严，与此同。

周论道既莫差 原按“陆善经本‘既’为而”。

阽 临也。

按《补注》云：“阽，临危也。”

未悔 临我身于死地，亦未悔于初。

凿枘　枘将入凿，须度其方圆，犹臣欲事君，先审其可否。

哀朕时　自哀不与时合也。

陈词　陈辞于重华也。

中正　言我耿然既得中正之道而不愚，时将游六合以后（疑应作俟）圣帝明王。

轫　轫，止车木也。苍梧舜所葬也。

灵琐　琐门铺道，言欲留君门侧以尽忠规。

勿迫　弛节徐行，忽迫令急也。

须臾　原按“陆善经本须臾为逍遥”。与明本《章句》同。

奔属　奔走以属继也。

雷师　雷声赫赫，以兴于君也。

云霓　云霓恶气，以喻臣之蔽拥。

上下　言欲求贤辅君，而谗佞之人，聚相离绝，纷纷众多，乍离乍合，斑然参差，或上或下，言其盛也。

延伫　暧暧，光渐微之貌。犹政令渐衰，不可以仕，将欲罢归，故结芳草，迁延伫立，有还意也。

蹇修　言先解佩玉以结诚言，令其蹇然修饰以达分理，冀宓妃之从己也。

按《广雅》：“理，媒也。”此释分理，采王逸说；惟解蹇修为修饰，则与王逸训伏羲臣名迥异。

洧盘　王逸曰蹇修既通诚言于宓妃，而谗人复相上（下）离合而毁之，令其意乖戾，暮则归舍穷石之室，朝沐洧盘之水，而不肯相从。

按此引王说，语与《补注》本多出入。

二姚　幸及少度未有室家，留取二姚与共成功，不欲速去之意也。

不固　欲留二姚，则辞理愞弱，媒氏拙短，恐相导之言不能坚固，复更回移。

唐宋本扬雄《反离骚》合校第六

《魏书》常景赞扬子云云："蜀江导清流，扬子挹馀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汉书·扬雄传》："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雄盖亦有不平之意乎？其为《反离骚》往往摭原之文。如"掍申椒以菌桂"，是以"掍"诂"杂"也。曰"横江湘以南往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泛滥兮，将折衷乎重华"。是证原济沅湘南征之为实也。是篇不独文辞之美，而汉师遗训，往往乎在。朱子《集注》既录《反离骚》于《后语》中，今端平及嘉定两宋本俱存，而《汉书》景祐本亦影刊流布于世（即百衲本）。东瀛又有唐人旧钞卷子《汉书·扬雄传》，《反离骚》文俱完整。合储本而参校之，亦可互见其得失，或于骚学不无涓埃之助也。班书宋祁校语多可采，王怀祖每引之，以纠时本。张菊生取以校景祐本，亦多相合（详《校史随笔》）。今持校唐钞，符契者夥。是可匡谢山之疏失（《鲒埼亭集·外编》辨宋祁《汉书》校本）而为宋氏辨白者也。又据唐钞，知三宋本间有并讹者，弥见古本之可贵。惟唐本亦有误写之处，今随文举似。此唐钞《扬雄传》，神田喜氏曾为校记，惟未及端平嘉定两本。兹重为校核，但揭其荦荦大者，庶免骈枝之诮。嘉定本现藏台湾，未克寓目，惟乌程张氏已影写刊行，故据校云。

（一）唐本义长可证宋本之不讹者

超既离乎皇波　注：“超，远也。”景祐本嘉定本端平本，并讹“远”为“速”。

骋骅骝于曲　三宋本并讹“于”为“以”。宋祁曰“以字疑作于”，是。

神龙之渊潜兮　景祐本无“兮”。宋祁曰“渊潜”下当有“兮”字，是。

“阳侯素波”注　言屈原袭阳侯之非，景祐本讹“非”为“罪”。宋祁曰“罪当作非”，是。

何恐日薄于西山　三宋本并无“何”。宋祁曰“疑有何字”，是。

“崦嵫勿迫”注　景祐本“勿”作“忽”，审注言“崦嵫勿迫，喜于未暮，何乃自投汨罗”云云。“何”、“勿”二字，应从唐本。

“薛芷”注　景祐本讹“芳芷”为“于芷”。

傅说　嘉定本讹“傅”为“传”，注同。

雄鸠作媒　“鸠”三宋本并作“鸩”，误。应从唐本作鸠。参王念孙说。

焉驾八龙　景祐本误脱“焉”。宋祁曰：“古本驾上有焉字，淳化本无，《刊误》据史馆本添。”是也。按师古注含有焉字意。

圣哲之不遭　景祐本脱“不”字。

（二）唐本误字

后土方贞注　“图累”讹“圆累”。

“琼茅”注　“《离骚》云”上脱“《离骚》曰怀椒糈而要之晋灼曰”十二字。

“圣哲不遭”注　“不遇”讹“不过”。

斐斐迟迟　脱一“斐”字。

“由聃所珍”注　“二人守道，不为时俗所污”。唐写本“污”作“行”，非。

“《九招》、《九歌》”注　“茹惠”讹作“茄惠”。

（三）两义可通者

杨侯　唐写本“杨”字从木，三宋本并从扌。

欃枪　唐写本端平本并从木，景祐本嘉定本并从扌。

素初眝　唐写本景祐本并作“素”，嘉定端定两朱注本作“累”。

驾鹅　唐写本作“驾”，而注作“鴐”。三宋本并作“鴐”。案司马相如《子虚赋》“连驾鹅”，《史记》作“驾”，汉书作“鴐”，是通用之证。（泷川资

言《史记会注考证》云：各本作驾，《索隐》单本中统本作䴐。《汉书·古今人表》作驾，知《史》、《汉》各本皆混用。）《左传》之“荣驾鹅”，唐宋石经从马，而刊本于定元年及襄廿八年又从马从鸟者互用。《山海经·中山经》“驾鸟”，郭注：“或曰当作䴐”。顾亭林以驾为误。日本神田喜又以䴐为误。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再续》谓：“《说文》无䴐字，当用鴐，假借作驾也。”《广雅》作“鴐鹅”，是其证。

（固）不如嫛而幽之离房　景祐本端平本两“固”字并无，嘉定本则上有下无。

固相态以佳丽　宋祁说：监本两“固”字皆有，神田喜谓唐本于文势为长。

旖旎　三宋本并作旖柅。

奚必（云）女彼高丘　三宋本并有“云”字。

其他异文无关于文义者不记。

附　陈姚察唐顾胤佚训条录

唐钞《汉书·扬雄传》卷，栏内外缀有后人校语，时征引旧文。有曰训、曰察，有曰集者，即陈吏部尚书姚察《汉书训纂》（《隋志》著录三十卷）及唐弘文馆学士顾胤《汉书古今集义》（新旧《唐志》著录二十卷）。两书《日本见在书目》并有之，则曾传入海东，今书已亡。校语所引，吉光片羽，弥觉可珍。（校语书法，与卷尾“天历二年五月点了藤原良秀”十二字相同，似即出良秀笔。）今就《反离骚》录出共约四十条。班书旧注，为师古割弃者，可借窥一二。姚察仕履，世所共知，顾胤吴人，永徽中，累迁起居郎，兼修国史，事附《唐书·令狐德棻传》，与李延寿、李仁实同以史学显称当世云。

婵嫣　《集义》：“晋曰：《方言》：蝉出口未也，言胄出于周，雄是其末也。韦云：历远，绵连之貌也。顾云：蝉连，相系续之言也。”（案钱绎《方言笺疏》一云：“蝉，出也。楚曰蝉，或曰未及也。”与晋灼所引异。）

豐烈　《训纂》：“如曰：豊，美也，烈口也；离，人也。应曰：皇，美也。韦曰：豊烈，大业也。”

潭　《集义》：“应云：楚人深渊云潭。”《训纂》：“苏曰：音滔。”

往　《集义》：“《说文》：往，远行也。”

累　《训纂》：“□□，察案：《公羊传》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何休口累累从君死，齐人语也。徐邈力追反，相累而死也。又力伪反，亦谓相累从也。”《集义》：韦曰（以下漫漶）。

澳汈	《训纂》："苏曰：澳音《礼》不澳之澳；汈音燃。晋云：俗谓水浆不寒不温为澳汈，以字义言之。"（按王先谦《补注》引宋祁说作不寒而温。） "苏音是，察案《方言》：曰撚音诺典反。《楚辞》以为切澳汈之流俗是。"
缤纷	《集义》："王逸云：缤纷，盛貌。"
十世	《集义》："虽有始生之年、始仕之年二说，而晋□□说是也。"
钩矩	"□曰：钩矩，尺寸度也。李……衡也。张云：鏇玑……也。如云：象椒兰，佞人之徒也。履以綦，欲蹈□恶人也。韦云：上言带钩矩，此宜为称上之衡，衡有斤两之数也。"
欃枪	察案："《尔雅》云：彗星为欃抢。"
资	《训纂》："如曰，资者以为资货。韦曰：资，取也。"
娵娃	《集义》："如云：韦昭作颏，云闾颏，梁王魏婴之美人。《通俗文》云：南楚以好为娃。"（案王先谦《补注》曰："官本注末有'韦昭曰，娵，当作颏，梁王魏婴之美人曰闾颏'十七字。"）
鬻	《集义》："如曰：□□也。韦云：鬻，卖也，索求也。言取二美之尟，卖之九戎，无利也。"
捷	《训纂》："如曰：捷，接也。"
蹇	《集义》："韦云：道曲而难也。"
蓁	察案："《广雅》云：木蘩牵为榛。《字林》云：音口人反。"
拟	察案："《说文》云：拟，相向也。"
灵修	《集义》："韦云：灵，神；修，远也。言君德当神明高远，故以喻□□□灵善修智也。"
椒兰	案："韦云：并楚佞臣也。"
喽偻	《集义》："案《诗传》云：虫声也。"
茄	《集义》：音何。
淖约	《集义》："韦云：淖约，争美好貌。"
嘑	《集义》："韦云：言美目如茱萸之嘑坼。"（案王先谦《补注》引官本作"言其目如茱萸之拆也"。）
被离	《集义》："音光被，离音丽。"
庆	《集义》："案：《小雅》云：羌，发音也。刘逵注《吴都赋》云：羌，楚人发语端也。"

横　《集义》："《广疋》云：'横，筏也。'《方言》云：'方舟谓之濻'，郭璞云：'扬州呼渡津船为杭，州□濻，濻音横。"

（案钱绎《方言笺疏》九引郭注云"扬州人呼渡津舫为航，荆州人呼濻"，语略异。）

阳侯　《集义》："案□非度江中□阳侯之波起也。"

靡　《训纂》："如曰：靡音河水浼浼之浼；靡，琼玉之华。"

汨罗　《集义》："韦曰：汨罗二水名，音幂。"

蘼芷若惠　《集义》："韦云二四，皆香草也。"

糈　《集义》："韦云：糈，祭糈也。王逸云，糈，精米也。"

灵氛　《集义》："案王逸云'灵氛，古贤明，知吉凶'。江皋，江边平泽也。"

鹈鴂　《集义》："大如博谷，杂黑色，常以春分鸣，鸣则百草不芳。"

摎流　《集义》："苏云齐恭音摎缚之摎。晋云摎流，犹缭绕也。"

涛　《训纂》："如曰：大波之回转者。察案：许慎注《淮南》云，湖（?）水涌起，还者为涛也。"

溷　《集义》："案《埤苍》云，溷，乱也。"

彭咸　《训纂》："李云，殷大夫。"

上辑约四十条，其漫漶难晓者不录，所云晋曰韦曰诸氏，指晋灼、韦昭、如淳、应劭、苏林、李奇、张晏、服虔诸旧注也。

跋

近人侈谈骚，述作充栋，其间率尔操觚，虑居泰半；于骚学流变，漠如也。频年为诸生讲授《楚辞》，颇着意于板籍同异，薄有论次，妄冀综掇遗芬，以为初学津逮。既东渡日本，于彼邦所藏旧椠秘笈，耳目所及，辄为移录。已故西村硕园氏，嗜骚成癖，平生庋藏《楚辞》书籍，为数近百，余从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教授假其藏目，亦多稀觏之本，间为补记，即本编所著硕园藏者是也。自元以来，朱晦庵《楚辞集注》最为通行，复刻之繁，较王逸《章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有明尤甚，故本编于此二书版本，胪列独多。自惭黔陋，又僻在海隅，得书匪易；近贤有关目录之书，若晚清端木埰《藏楚辞目》及胡光炜《楚辞学考》、刘纪泽《楚辞书录》，皆未目睹。自知徒殚勼集之勤，仅具椎轮，遑论全豹；纰缪挂漏，惧多弗免；非敢充贫粮之馈，但聊备友生之问，沾婿厘订，请俟他日。至于戏曲中以《离骚》为题材者（若元睢景臣、吴仁卿，杂剧之《楚大夫屈原投江》，已失传。清尤侗、嵇永仁之《读离骚》，郑瑜《汨罗江》，铼情子《纫兰佩》，吴蘋《香饮酒读骚图》），实繁有徒；而方志中艺文一类，著录之书，有关《楚辞》者，为数尚夥，其刊行与否，多不可知；编者耳目所限，未遑遍采，凡兹二者，姑从盖阙。又《楚辞拾补》数篇，于异邦所藏唐宋古本，异文剩义，覃思所及，略为发正，并附于后，别为外编，或于校雠训诂之学，不无少助也欤。

乙未重阳饶宗颐识于香港大学中文学系

本书写成，多蒙友侪之助。张大千先生惠以赵松雪绘屈子像影片，并允刊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刊本诸书，承京都大学水野清一教授远道影赐。图像部分，荷陈君仁涛将所藏绘画有关著录各书，惠假披阅，俾得广搜博采。译本资料更得熊式一博士、牛津大学 David Hawkes 及澳州雪梨大学 A. R. Davis 诸教授惠寄参考。良朋嘉贶，诸所心感，并书以识弗谖。

作者附识

后记

此书为第一部《楚辞》书目，继起而作者多家，以姜亮夫之书最流行。近期《楚辞》之学，如日中天，楚地出土文物，包括两湖及湘西的简帛资料，更倍蓰于前，待增入书录，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应有第三次之增补工作。

以清代《楚辞》著作版本而论，有崔富章纂辑，吴宏一、陈炜舜校补之目录，共七十一种，具见《清代诗话知见录》附录一一二："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图书文献专刊之六，可以参阅。

敦煌卷子騫公之《楚辞音》残卷，作者僧名，有道騫智騫之殊，騫字又或作骞，从马（据《日本国见在书目》）。日本《文选集注》中《文选音决》引《騫公音》有四条，赞宁《法华传》卷七释僧映传中言及之骞师，开皇中卒于江阳永齐寺，年代与隋之道騫符合。门人黄耀堃著《道骞与楚辞音残卷作者新考》，曾加考证。

2003年宗颐记



图一　赵孟頫绘屈子像（张氏大风堂藏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真迹》，原图宽 16 公分，长 27 公分）

图二　敦煌唐写本隋僧道骞《楚辞音》残卷一（据《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复影）

图三 騫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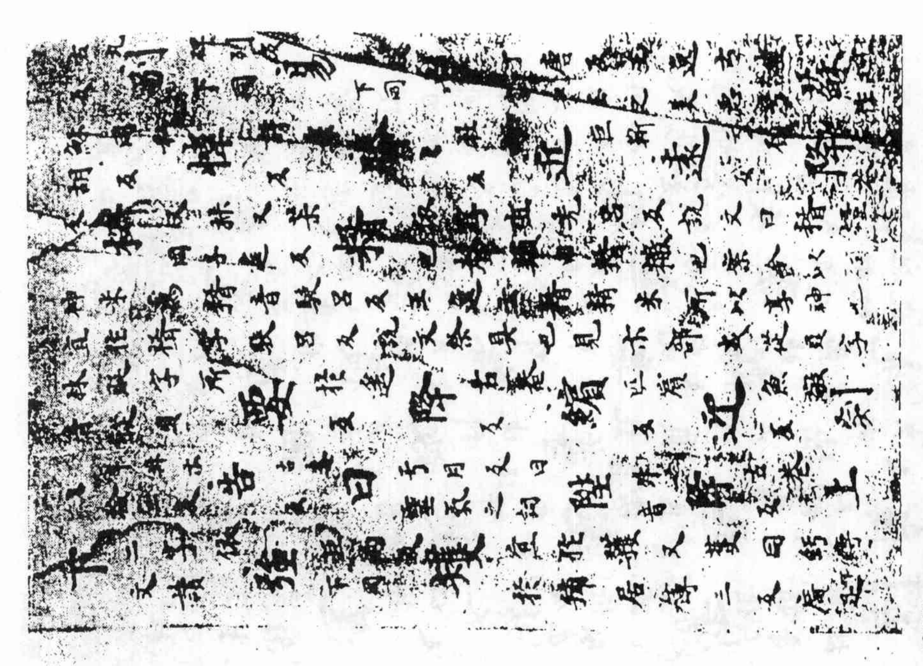


图四 骞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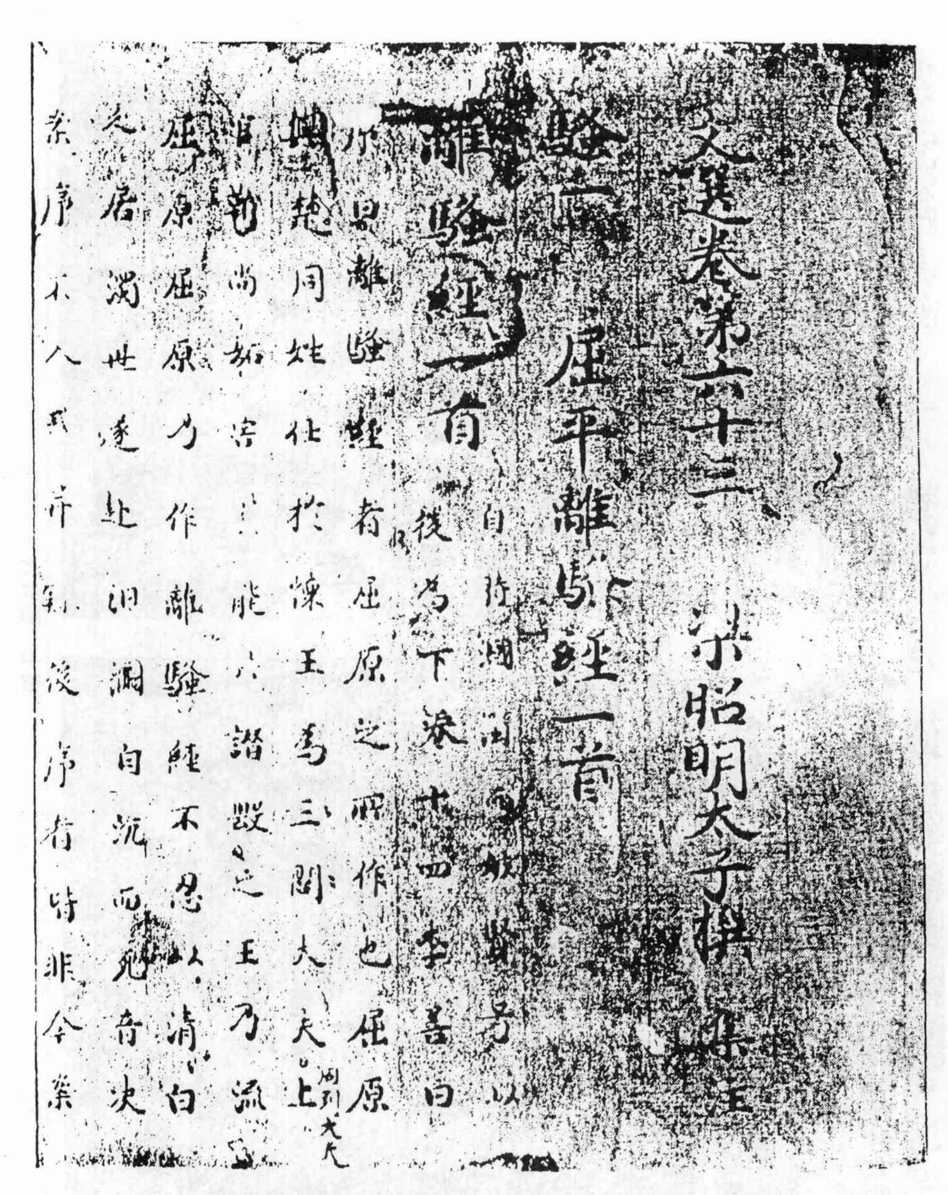
图五　謇音四





图六　謇音五

图七　謇音六



文選卷第六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集注

屈平離騷經一首

離騷經一首

後為下卷十四李善曰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

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

屈原屈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

之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音決

图八　日本藏唐写本《文选集注·离骚》（采自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第八集）



反離騷其辭曰

有周氏之蟬嫣兮，□鼻祖於汾隅 應劭曰：蟬嫣，連也。

己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

氏，而食采於揚，故始祖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

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 應劭曰：諜，譜也。

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叙也。

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 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

之交。超，遠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

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歷河及江也。江河四瀆之

水，故云大波。虖，古乎字也，其下並同。

因江潭

图九　日本藏唐写本《汉书·扬雄传·反离骚》(采自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第二集)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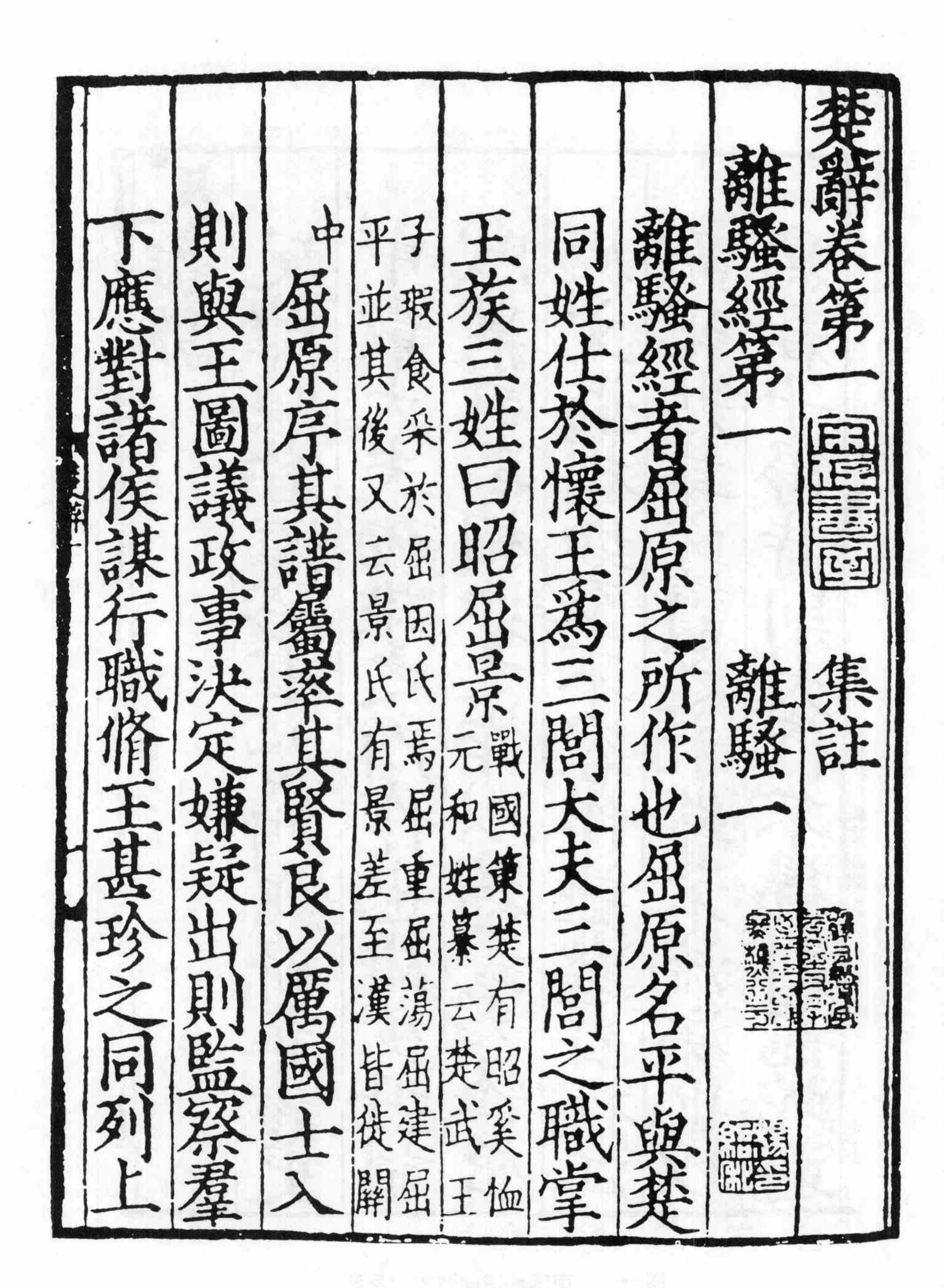
洪氏目録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

图一〇　南宋嘉定四年（1211）同安郡斋刊《楚辞辨证》（亦见《文求堂书影》及《中华文物集成》第五册）

反離騷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

图一一　南宋嘉定间刊本《反离骚》


楚辭卷第一　集註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

图一二　南宋端平二年（1235）朱鉴刊《楚辞集注》

（据复影本）

楚辭卷第一　　集註　　朱子集註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

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也又云景氏有景差景舍漢皆其關也）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

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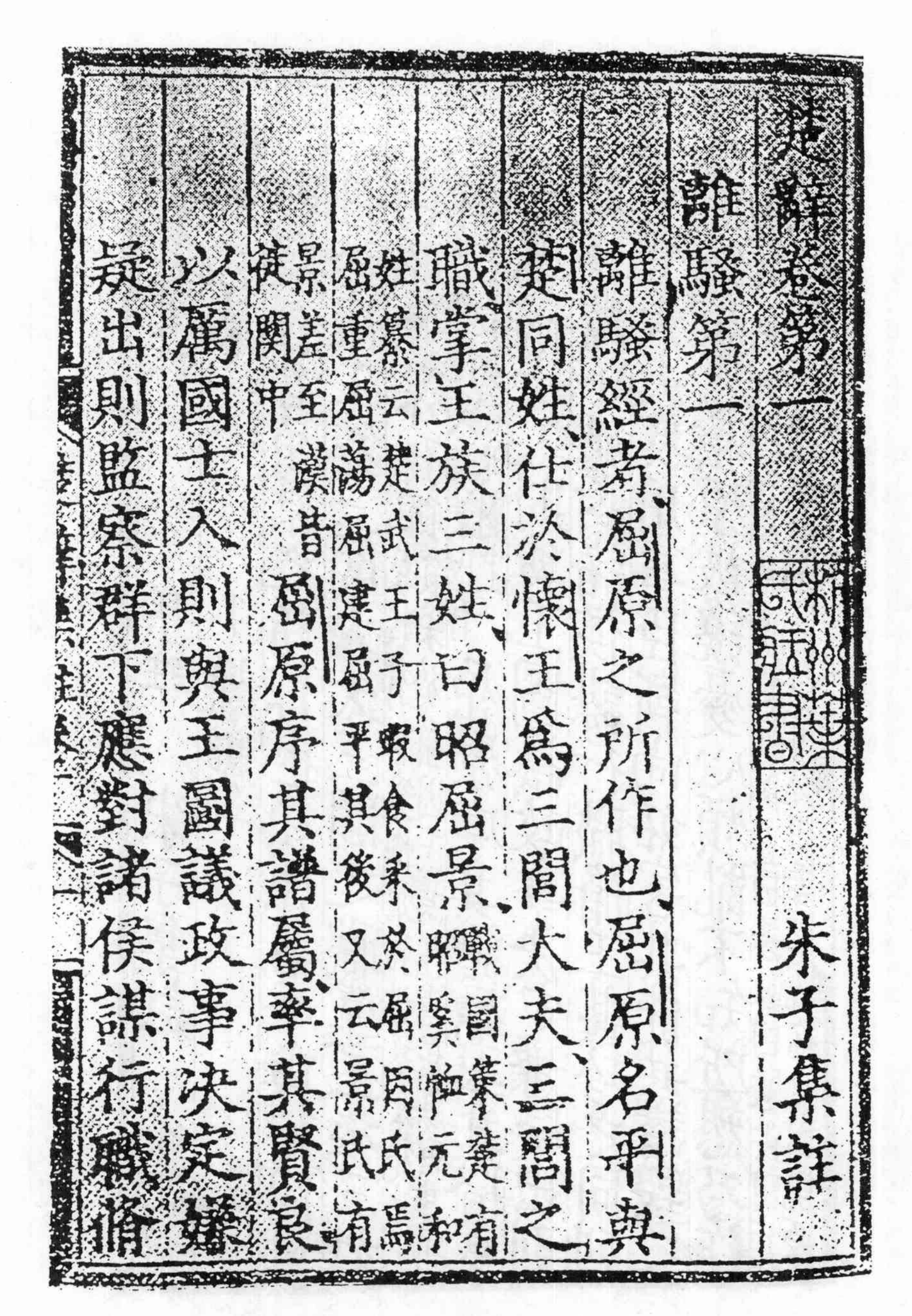
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

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

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

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憂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屈原）

图一三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日新宅刊《楚辞集注》
（据《古逸丛书》本）



楚辭卷第一　　朱子集註

離騷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

图一四　明成化十一年（1475）何乔新刊《楚辞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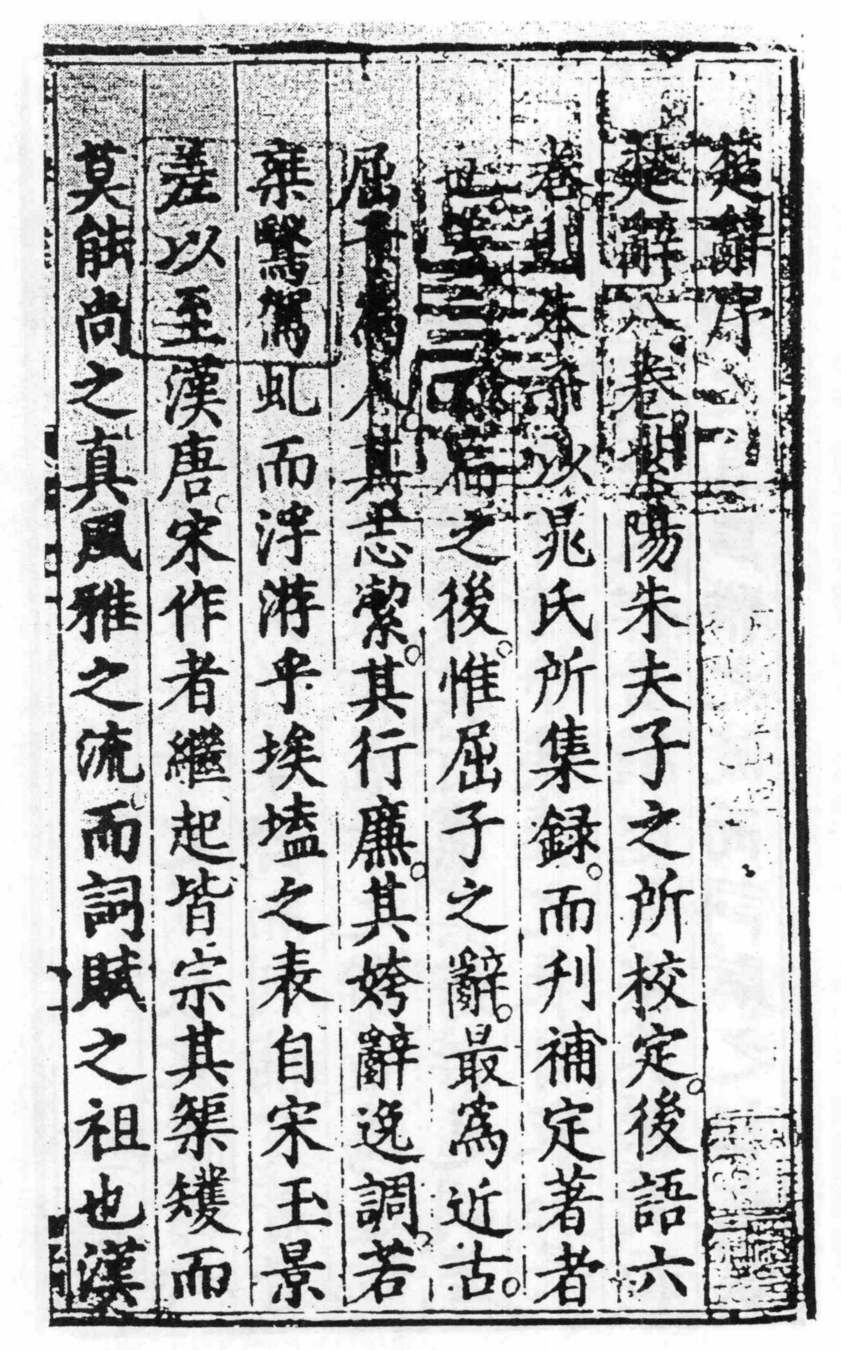
（亦见《明代版本图录》）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本於以晁氏所集録而刊補定著者也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絜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乘鷖駕虯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榘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

图一五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吉藩府刊《楚辭集注》

（以下并日本内阁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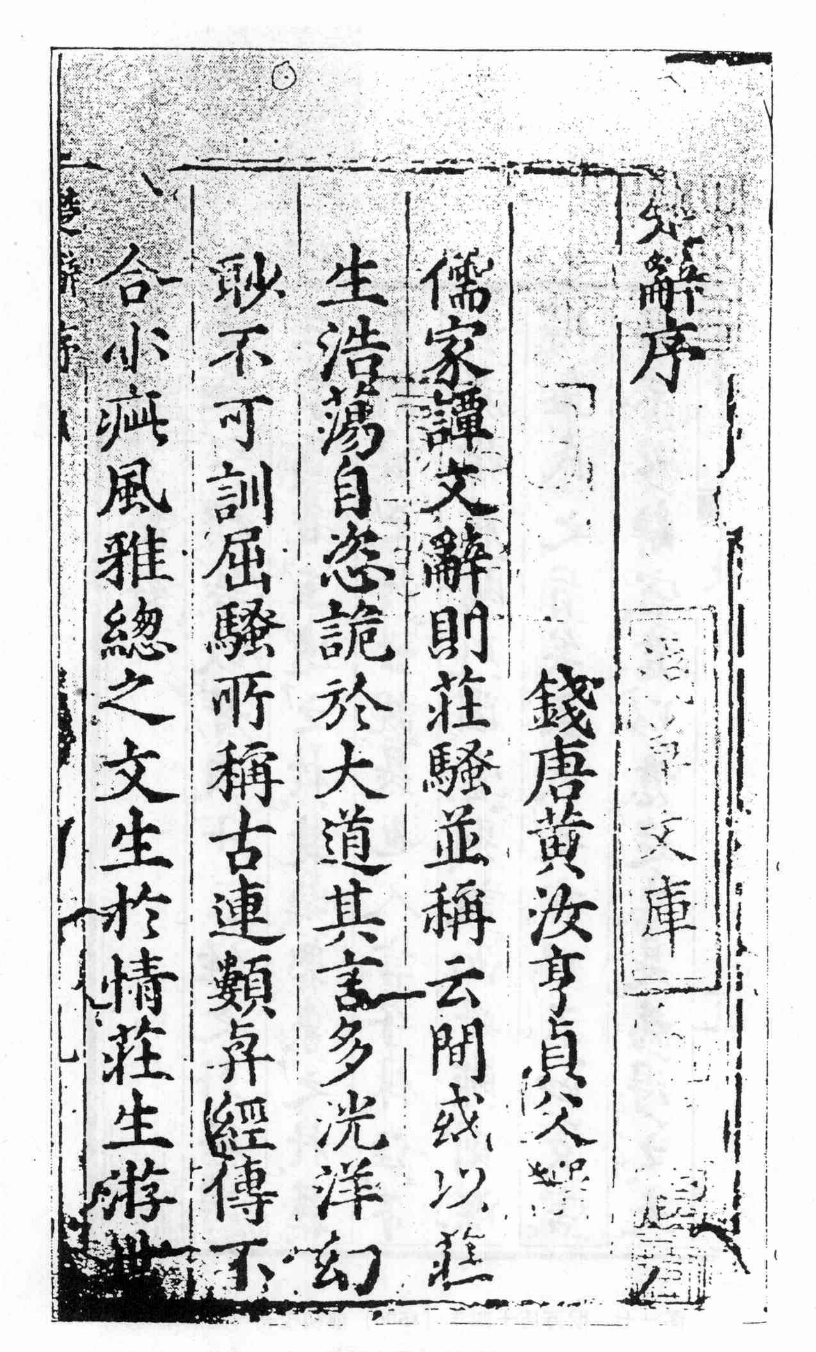

楚辭序
楚辭八卷後語六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
卷出本於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
世[illegible]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
屈[illegible]其志絜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
離騷篇蛻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
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榘矱而
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

图一六　朝鲜刊《楚辞后语》（祖本为端平本，此为邹应龙跋，文中凡“应龙”二字改为“余”）



楚辭敘
古之稱善故者自十三經之外吾得
三家焉若王逸之於楚辭郭象之於莊
子劉峻之於世說是也人言子休注年
刻孝標勝臨川固當別論而升降則深
得孟氏之旨矣孟氏之言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

图一七　明万历十四年（1586）俞初校刊《楚辞章句》
（日本林罗山手校）



楚辭序

錢唐黄汝亨貞父撰

儒家譚文辭則莊騷並稱云閒或以莊

生浩蕩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洸洋幻

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舁經傳不

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游世

圖一八　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楚辭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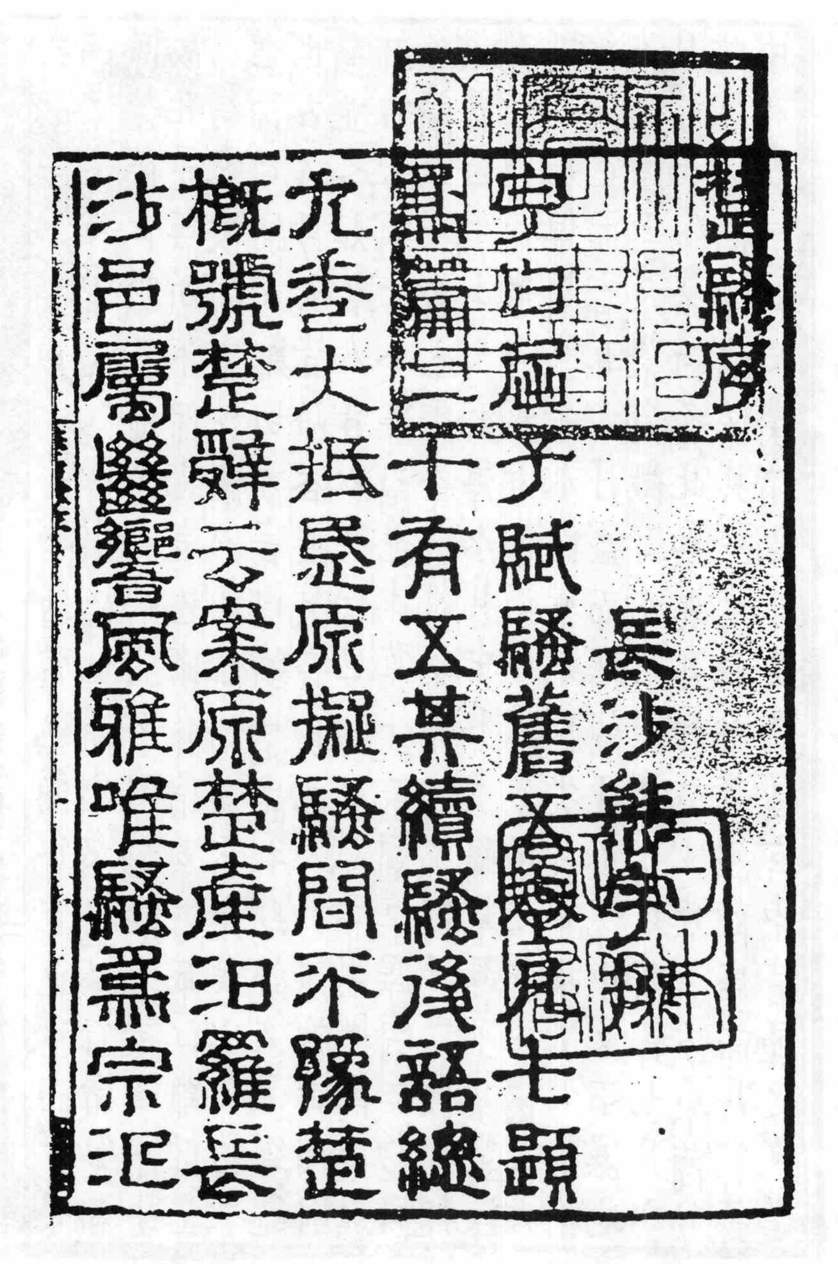
之葯

紉秋蘭以爲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

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
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
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茝蘭則
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
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
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
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
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
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
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
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
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蕑兮
陸機云蕑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

图一九　明复宋刊改本《楚辞补注》（兴宁罗氏守先阁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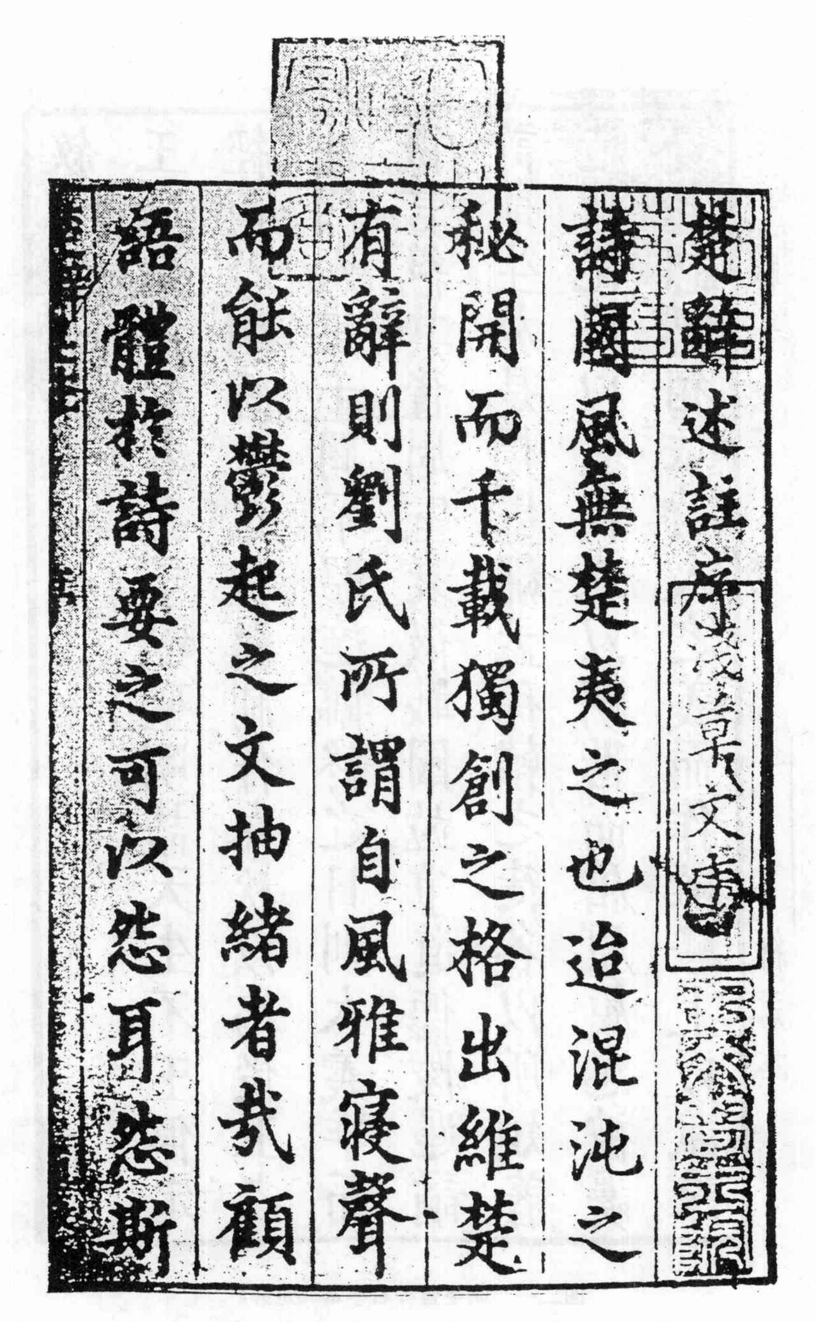
图二〇　明正德十五年（1520）熊宇刊《篆文楚骚》

敘

王逸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

敘　一　　綠君亭

图二一　明毛晋绿君亭本《楚辞》



楚辭述註序

詩國風無楚奚之也迨混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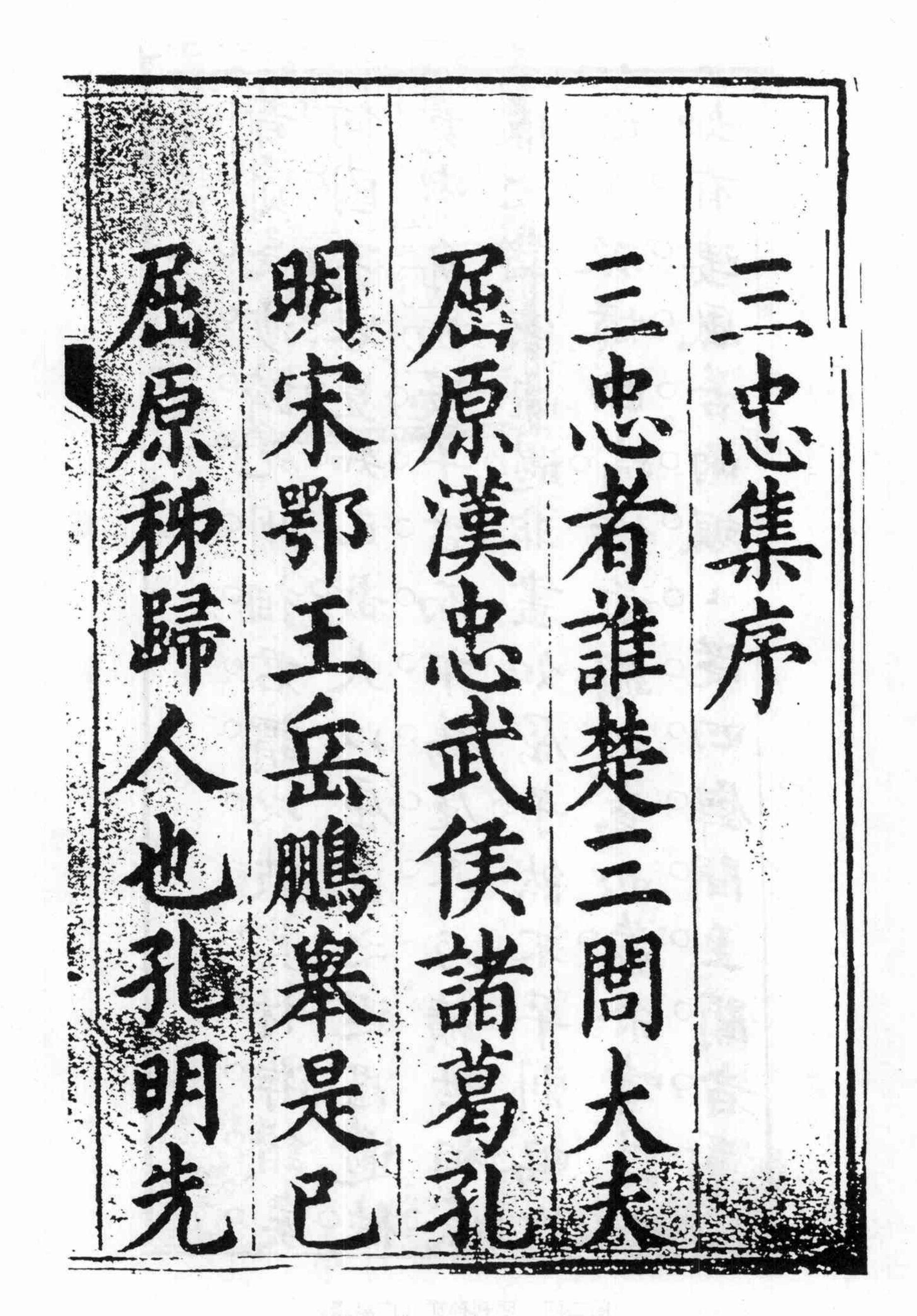
秘開而千載獨創之格出維楚

有辭則劉氏所謂自風雅寢聲

而能以鬱起之文抽緒者哉顧

語體於詩要之可以怨耳怨斯

图二二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林兆珂《楚辞述注》


三忠集序
三忠者誰楚三閭大夫
屈原漢忠武侯諸葛孔
明宋鄂王岳鵬舉是已
屈原秭歸人也孔明先

图二三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郭惟贤编《三忠集》

引言

昔賈長沙讀九州相君謂以彼其材游諸侯

何國不容豈知己哉夫以屈氏之遐思邁往

竟潔身而沒千古而下為厘耳乃曠世相感

後之諸家者遇非晝如屈子然不平則鳴故

注〻孤憤幽痛倣前騷之意而羨余嗜讀之

如有淒風苦雨颯〻送四壁間至聞者蓋

图二四　明刊孙矿《广离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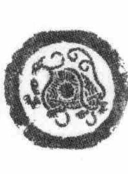
廣離騷序

士大夫服奇好古。讀書每有餘恨。曾不能。詩此今恨也。以莊之才。使擱管為。騷風調豈在屈下。而汗漫

图二五　明刊张正声《广离骚》



詩需騷風調豈淹藉下酒并鶯
肯來能詩。此今賦也。以難之。大使
士[illegible]服。有好古讀書有餘暇
實[illegible][illegible]序



楚辞与词曲音乐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藝蘅七詞曲管录

目　录

目录

FOREWORD

This book by Mr. Jao Tsung-I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Tz'ŭ on lyric poetry, dramatic poetry, and music is based on a paper he presented to the Xth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Marburg, Germany, in September, 1957. It was then my privilege, as a fellow-delegate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give an English summary of his paper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could not follow Chinese, and now I have been honoured by a request from the author to write a few words by way of introduction.

Mr. Jao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state of Ch'u, which he has studied from various angles: literary, musical, archae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logical. To the XXI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held at Munich prior to the Conference of Sinologues of the same year, he had given a talk on "Ch'u-Tz'ŭ and Archaeology" . His published works on the Ch'u-Tz'ŭ and related subjects form an impressive list, although they represent but a fraction of his manifold researches. Indeed, his indefatigable industry and prolific output leave one breathless with wonder and amazement.

The present volume, slender as it may be,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 should like to draw attention particularly to his discussion on music connected with the Ch'u-Tz'ŭ in Chapter 4, and his confirmation

of Wang Y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tle Li Sao in Appendix i. He rejects the view held by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at Li Sao is a synonym of Lao Shang, a type of music, and argues for the retention of Wang Y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tle as "Sorrows of Exile" . This is one example of the variou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e finds in this book. The reader will no doubt find many more on his own, and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of me if I were to go on enumerating all the merits of Mr Jao's book.

April, 1958. James J. Y. Liu.

《楚辞》与词曲音乐

一、《楚辞》与中国文人生活

《楚辞》和《诗经》，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木本水源，一切韵文，无不从它产生出来。历代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受过《楚辞》的影响。沈约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因此有人说："诗文不从《楚辞》出者，纵传弗贵，能于《楚辞》出者，愈玩愈佳。"（明蒋翚语）其实不但文学创作必以《楚辞》为基础，即文人的生活，向来亦和《楚辞》结不解缘的。试举《世说新语》所记晋朝两件有趣的故事作为例证：

> （1）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座无人。"（卷十三《豪爽》）

《楚辞》可以培养出一种"傲睨万物"的人生态度，提高一个人的独立人格，踏进另一超现实的精神境界。

> （2）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卷二十三《任诞》）

这说明名士、酒和《离骚》三者的相互关系，《离骚》可以把生活艺术化、诗化。《离骚》中的幻想和酒混合了，便能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奔放豪迈的心态，好像周游于天地般，上下左右，充满着奇丽幽怪的东西，它种下了无限的灵感的泉源。王氏这一句话，给予后来的文人很大的影响，这像一颗“想象的种子”，构成了中国文人性格的核心。

北魏卢元明性好玄理，每饮酒赋诗，遇兴忘返。少时曾从故乡涿县还洛阳，途中遇中山王熙，熙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惟须诵《离骚》饮酒，自为佳器（《魏书》四十《卢玄附传》）。唐代钱芸士亦喜读《离骚》，冯贽称他“读《离骚》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斋”（见《云仙杂记》引《姑臧记》）。这和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一样的陶醉于艺术生活之中。宋季潘庭坚，跌宕不羁，傲侮一世。为福建安抚使司机宜文字的时候，喝醉了酒，骑着黄犊，歌《离骚》于市，人以为仙（见《齐东野语》四）。以上是一些文人与《离骚》的有名故事。

关于《楚辞》对中国历代文学的影响，像辞赋方面，产生了许多摹拟的作品，本人在另一本书《楚辞书录》上已有很详细的论述。现在只想讨论《楚辞》对于词、曲和音乐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关涉的范围很广，不能不加以限断。所以这儿对于词的材料，仅以唐宋为主；音乐则以七弦琴为主；戏剧因材料较少，故清代的有关资料，也加以述及。

二、《楚辞》与五代两宋词

现在先谈“词”。“词”的特质，在于言情细腻，行笔婉曲。五代小词，正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它和《楚辞》在作法及风格上，原有许多相通之处。（一）词尚比兴，喜欢以香草美人作为譬喻，在材料的运用上亦和《楚辞》一样以女性为中心。（二）词主含蓄，立意须有“寄托”，通常不把事情直说，而要用些风花雪月字眼，隐约其词，使作者的情意在半吞半吐中表现出来。所谓“不敢放”又“不敢彰”，正是妙境（清谭献语，见《明镜词序》）。这亦和《楚辞》一样以“隐”、“秀”为美。故唐代的词祖温庭筠，前人便说他是屈原的再世。像清周之琦《题温飞卿词》云：

方山憔悴此何人，兰畹金荃兴托新。绝代风流乾膜子，前身应是屈灵均。

正是一例。词的妙处在于缱绻要眇，一唱三叹。往往上面的意思本可接入下意，它却偏不如此，而于其间用些美丽的词藻，传神写照，更加动人。故此有人说："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楚辞》所谓"君不行兮夷犹"，恰可说明这种意境（见刘熙载《艺概》）。

词的命意和用字，取材于《楚辞》者甚多。前者是寓旨的所在，后者是词藻的驱遣，一属于文章的内容，一属于文章的外形，即所谓"义"与"辞"是（朱子《楚辞后语》揭其选文之标准有二，一曰辞，一曰义）。这两方面，本论文将择要加以讨论。

唐五代的词，以温庭筠最为精妙绝人，然所作不出于"绮怨"一类。韦庄、冯正中各家的词，大都流连光景，惆怅自怜，只是些绵丽的句子，没有《离骚》幽忧之意。刘禹锡、孙光宪在词藻上，偶然用"湘妃"和"淮南桂树"。（刘禹锡《潇湘神》云："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又《杨柳枝》云："淮南桂树小山词。"孙光宪《河渎神》云："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李后主的词，"凄凉怨慕，亡国之声，"（此苏子由语，见陈鹄《耆旧续闻》）。但没有使用《离骚》、《九歌》上的字眼。

其次论宋人的词。南宋人很喜欢用《楚辞》来作它的词藻，但北宋人则寥寥无几。苏轼曾说："熟读国风与《离骚》，诗之曲折尽在是。"但他的词只用过"纫兰为佩"、"凭仗飞魂招楚些"等语。至著《续楚辞》、《变离骚》的《楚辞》专家晁补之，他的词集中只有三处运用楚辞之语汇（参看附录《宋词采骚摘句图》）。其他大家如欧阳修、周邦彦、贺铸、秦观各人的词，均无只字涉及《楚辞》。只有刘敞用过"丛桂"（《清平乐》）、晏几道用过《涉江》（《生查子》）、李之仪用过"泽畔"（《南乡子》），如是而已。

北宋词人，没甚采摭《楚辞》的字眼，以我推测，有二个原因：（一）北宋是太平盛世，故没有产生类似屈原的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绪。（二）北宋时《楚辞》这门学问尚未十分发达，所以没有南宋人使用《楚辞》词句那样普遍（参看附记《补述北宋楚辞学》）。

南宋学者研究《楚辞》的甚多，一方面因中原陷虏，偏安江左，"民离散而东迁"，"哀故都之日远"，和屈原的时代相似；一方面那些放臣迁客，贬斥远方，身世之感，离忧愤懑，有的特为《楚辞》作注，来寄托他们的感慨。

(像朱熹晚年著《楚辞集注》，乃因感赵汝愚贬永州事，故注骚以寄意，说见《齐东野语》。吴仁杰作《离骚草木疏》，则譬之草木，薰莸异品，以喻忠奸，详鲍廷博《跋》。）而且文人的习惯，很喜欢表示一己志洁行芳的清高品格，因之采用《楚辞》“纫兰”、“独醒”一类的词句，拿来自己比况，那是再适当没有的词句。

南宋词家，最喜欢用《楚辞》的字句，和摹仿《楚辞》文体的，要算辛弃疾，他那篇有名的“中秋饮酒送月”的《木兰花慢》，自己写明是“用《天问》体”，那篇写怪石的《摸鱼儿》，采用《九歌·山鬼》语，自称改名为“山鬼谣”，还有专摹仿《招魂》，用结尾的“些”字，像题瓢泉的《水龙吟》。后来蒋捷亦仿作一首，题为“招落梅之魂”，即效辛氏的体裁。

辛氏又有剪裁《离骚》语，表现得奇崛雄伟的，如“开山径，得石壁”的《千年调》（以上各首词见附录《宋词采骚摘句图》），又有杂用《九歌》、《渔父》之语，表现得旷荡闲适的，如“三山被召饯席作”的《水调歌头》，兹录于下：

>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由于辛氏才气洋溢，复熟读《楚辞》，随手拈来，无不出神入化。

高似孙有《莺啼序》一首，序云：“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春之神也，其词凄婉，含意无尽，略采其意以度春曲。”即采取《九歌》词句为之（赵闻礼《阳春白雪》卷四题别号，作高疏寮作，详见附录《摘句图》）。

在全首词中，用《楚辞》文句贯串而成，表现出特别风格的尚有汪莘，他的《乳燕飞》一词，序云：“汪子感秋，采《楚辞》赋此。”又《水调歌头》三首（见《摘句图》），淋漓痛快，偶然插入些《楚辞》句子，笔调很是自然，兹录《乳燕飞》如下：

> 去郢频回首。正横江、荪桡容与，兰旌悠久。怅望龙门都不见，似把长楸孤负。念往日佳人为偶。独向芳洲相思处，采蘋花杜若空盈手。乘赤豹，谁来后。　云中眼界穷高厚。览山川、冀州还在，陶唐何有。

木叶纷纷秋风晚，缥缈潇湘左右。见帝子冰魂厮守。应记挥弦相对日，酹一杯太乙东皇酒。问此意，君知否。

又马端临之父廷鸾，亦有檃括《楚辞》的《水调歌头》（见《摘句图》），都是学稼轩的，可以后先媲美。

辛派的词，豪迈郁勃，稍后一辈的词人，和他作风接近的，有刘克庄（1187—1269）、刘辰翁（1234—1297），亦都喜欢用《楚辞》之语句入词。例如他们说及“醉”和“醒”的问题，同从《渔父》篇“众人皆醉我独醒”一句脱胎而来，却表现两种不同的心绪：

尝试平章先贤传，屈原醒，不似刘伶醉。拚酩酊，卧花底。——刘克庄《贺新郎》（《全宋词》二一〇，3页上）

我醉招累（指屈原）清醒否？算平生，清又醒还误。累笑我，醉中语。——刘辰翁《金缕曲》“壬午五日”（详见《摘句图》）

但梦绕青神，尘昏白帝。重反《离骚》，众醒吾独醉。——前人作《齐天乐》（详《摘句图》）

同样是说醒不如醉，意思是指黑漆漆的周遭，倒不如关闭眼睛不看还好。但在刘克庄是表现一种慷慨之音，在刘辰翁则为一种沉痛之语，因为辰翁目击宋亡，身经亡国的惨痛，所以词句更为愀怆。

词创作的成功，不单在能熔铸旧的语汇，还要能构成新的意境。这跟着每个作家的性格、学养、遭遇而异其风致。南宋词人，采用《楚辞》写出一些警句，试加分析，有豪语、壮语、快语、隽语、幽怨语、凄艳语、荒寒语、沉痛语等等的不同。

豪语

倚阑干，二三子，总仙才。汝歌《远游》章句，云气入吾杯。——姜夔《水调歌头·富览亭作》。

壮语

百二山河空壮，底事中原尘涨，丧乱几时休？泽畔行吟处，天地一沙鸥。——张元幹《水调歌头·泛太湖》（《全宋词》八五，4页下）

快语

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痛饮读《离骚》。——张元幹《水调歌头·登垂虹（亭）》（《全宋词》八五，6页）

读罢《离骚》，酒香犹在，觉人间小。——刘过《水龙吟》（《全宋词》一八五，7页下）

隽语

断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骚人兰与芷。不数春风桃李。——苏庠《清平乐·咏桂》（详《摘句图》）

幽怨语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吴文英《莺啼序》（《全宋词》二三五，29页下）

黑云飞起。夜月啼湘鬼。魂返灵根无二纸。千古不随流水。——张炎《清平乐·题郑所南画兰》（《全宋词》二六七，3页上）

凄艳语

金齿屐，翠云篦。女萝为带蕙为衣。——丘崈《鹧鸪天·采莲曲》（《全宋词》一七六，7页上）

荒寒语

去国情怀，草枯沙远，尚鸣山鬼。——张炎《征招·听伯长琴》（《全宋词》二六四，5页下）

一转花风，萧艾遽如许。……薛老苔荒，山鬼竟无语。——张炎《祝英台近·题水墨兰石》（《全宋词》二六九，6页上）

沉痛语

叹沉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哀。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刘过《沁园春·观竞渡》（《全宋词》一八五，3页上）

同是《楚辞》的字眼，到某一人的手中，便表现不同的品格，所谓笙磬异音，事关性分。总要驱遣自如，结构天成，无斧凿痕迹，方为妙手。因一方面是性灵的流露，一方面是书卷的酝酿，一是天才，一是学力，两者是相需的。

《离骚》之文，引类譬喻，香草美人，以配品德之忠贞，饮露餐英，以比人格的高尚。南宋词题咏草木，往往取材于骚，加人作者的想象力，便产生一种新的"意趣"。试举一些例子：

木犀　如王千秋句云："花儿不大，叶儿不美。只一段风流标致。淡淡梳妆，已赛过骚人兰芷。"（《解佩令》）（《全宋词》一三一，5页下）

兰　如张炎句云："所思何处，愁满楚水湘云。肯信遗芳千古，尚依依泽畔行吟。"（《国香·赋兰》）（《全宋词》二六六，2页下）

海棠　如李石句："纵饮菊潭餐菊蕊，茱萸。医得人间瘦也无？"（《南乡子·十月海棠》）（《全宋词》一五七，6页下）

水仙　如辛弃疾句："灵均千古怀沙恨，记当时忽忽，忘把此仙题品。"（《贺新郎·赋水仙》）（详《摘句图》）

芙蓉　如蒋捷句："腥翁一点清寒髓，惯餐英菊屿，饮露兰汀。"（《高阳台·芙蓉》）（《全宋词》二七五，6页上）

梅　如俞国宝句："恍然梦断浑非昨。问溪边竹外，新来为谁开却。无限冰魂招不得，拟把《离骚》唤觉。"（《贺新凉·梅》）（《全宋词》一七五，11页下）

方岳句："娟娟玉立载归壶。渺渺愁予肯入、楚骚无？"（《虞美人·见梅》）（《全宋词》二二七，10页下）

菊　如刘克庄句："餐饮落英并坠露，重把《离骚》拈起。野艳幽香，深黄浅白，占断西风里。""尚友灵均，定交元亮，结好天随子。"（《念奴娇·赋菊》）（《全宋词》二〇八，1页上）

芦（花）　如方岳句："黯西风，吹老满汀新雪。天岂无情，离骚点点送归客。"（《齐天乐·和楚客赋芦》）（《全宋词》二二七，9页下）

这些花草，都具有骚人的灵魂，故其品格正可以骚来比拟。至于咏歌兰、桂，更多采用《楚辞》，魏了翁谓："屈平《离骚》，常以兰自况。"（详《摘句图》）屈原如此，其他词人的用心，亦复如此。

词的题材，不少为吟咏时节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相传为屈原的忌日，故词人的作品尤多。

这个佳节亦称"重午"或"蒲节"。宋词中关于这个题目，采用《楚辞》语句的，不下三十余首。大抵说及"竞龙舟"、"吃粽子"的风俗，主要是凭吊屈原。刘克庄、刘辰翁所作最多。兹举一二句：

谁信骚魂千载下，波底垂涎角黍。（刘克庄《贺新凉·端午》）（详《摘句图》）

欸乃渔歌斜阳外，几书生，能办投湘赋。歌此恨，泪如缕。（刘辰翁《金缕曲》）（详《摘句图》）

有的还以五月四日——端午前一日为题。像赵以夫《和方时父癸卯五月四日韵》，即其一例（《全宋词》十4页下，详《摘句图》）。

张炎《词源·论词》，特别举出“离情”一类，他说：“情至于离，则哀怨必至。苟能调感怆于融会中（指情与景之交融），斯为得矣。”《离骚》和《九歌》是千古离情的绝唱。周邦彦词云：“大都世间最苦惟聚散。”故这类词，感人尤深。宋词如：

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俦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柳永《古倾杯》。即用《九歌》句。）（《全宋词》卷三十二，7页上）

登山临水送将归。悲莫悲兮生别离。不用登临怨落晖。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雁飞。（辛弃疾《忆王孙·秋江送别·集古句》）（《全宋词》一七四，7页下）

带叶分根，空翠半湿荷衣。沅湘旧愁未减，有黄金，难铸相思。（张炎《声声慢》）（《全宋词》二六三，7页上）

这些句子，多么动人啊！汪莘的词说道：“《离骚》都是相思曲。”那是没有错的。

复次，王恭“饮酒读《骚》”一语，宋代词人已成为一种口头禅。只辛弃疾词，便见了四次：

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全宋词》一六六，5页下）

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生查子》）（《全宋词》一七四，5页下）

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水调歌头·赋松菊堂》）（《全宋词》一六，6页上）

未堪收拾付薰炉，窗前且把《离骚》读。（《踏莎行·木犀》）（《全宋词》一六九，7页下）

他如：

请细读《离骚》，为君一饮千钟。（王之道《凤箫吟》）（《全宋词》一○四，4页下）

醉揖南山，一声清啸，休把《离骚》读。迟留归去，月明犹挂乔木。（赵鼎《念奴娇》）（《全宋词》九三，3页上）

“读《骚》”已是文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一个节目。宋人读《骚》，据严羽《沧浪诗话》云：

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为戛釜撞瓮耳。

必须抑扬亢坠，杂以痛哭流涕，方能尽楚骚音节之美。朱熹序子厚诗，称：“其于骚词，能以楚声古韵为之节奏”，“凌厉顿挫，闻者为之感叹”，是宋人尚有一套读法，惜已失传。

关于“骚意”、“骚情”、“骚人恨”一类名词，尤为常见。如：

时事艰难甚矣，人物眇然如此，骚意满潇湘。醉问屈原子，烟水正微茫。（方岳《水调歌头》）（《全宋词》二二七，2页上）

骚情酿就，书味薰成，这些情也。（方岳《瑞鹤仙》）

冰弦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周密《绣鸾凤花犯》）（《全宋词》二五三，5页上）

而“续《离骚》”、“反《离骚》”，因之亦变为词中的成语：

对东皇太乙，续《离骚》，需词伯。（李曾伯《满江红》）

万山一水秀还明。此时三楚客，何意续《骚经》。（吕胜己《临江仙》）（《全宋词》二○五，8页上）

升平代，凭高望远，当赋《反离骚》。（王以宁《满庭芳·重午登楼》）（《全宋词》一一○，5页上）

陈人杰所作的《沁园春》，其小序言："作'思古人'一曲，无妨反《骚》。"（《全宋词》二六一，1页）次一首的词题为"天问"（并详《摘句图》），亦无非受到《楚辞》的影响。

南宋初，洪皓有《怀归》一词，句云：

> 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三闾憔悴《赋怀沙》。（《临江仙》）（《全宋词》九一，4页下）

他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不屈，被留十余年始还。事见他所作的《江梅引》词。他的满腔忠愤，正和屈原一样，故亦同其哀怨。言为心声，诚非虚语。

大体言之，宋词取材于《楚辞》的，约有三类：

（一）檃括　即就《楚辞》某篇撮其词句，组织而成。此法似创自苏轼，他的《哨遍》写明"檃括《归去来辞》"，即开此例（《全宋词》三九，2页）。辛弃疾、马廷鸾的檃括《楚辞》（《全宋词》二四七，4页）即学他的方法，但这是偶然一用而已。

（二）剪裁　不是取全篇改制，而是摭拾数语而成。像下面张孝祥《过潇湘》一词：

> 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湘。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水调歌头》）（《全宋词》一三八，2页上）

（三）套语　许多《楚辞》上的字眼，成为惯用的词儿。如说祝寿，则用"揽揆"、"庚寅"，说水上景物则用"珠宫贝阙"，说清高则用"独醒"，说离别则曰"捐袂"，说高洁则用"芰荷衣"，说修饰则用"纫兰佩"，这些套语，用得很多，几乎成为陈腔滥调了。

附　补述北宋楚辞学

北宋治《楚辞》，以晁补之为专家，其《重定楚辞》、《续楚辞》、《变离骚》诸书，现均有传本（在《晁氏丛书》第四册中）。韩元吉有拟骚《羁凤

辞》，其《南涧甲乙稿》云：

宋兴，鲜于谏大夫始作《九诵》。靖康之难，二宫在郊，九品胡理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愤之音。由是国朝骚词，遂与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庞谦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单父……尝游江湘，睹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奋笔而为之。（《甲乙稿》卷十四《九奏序》）

北宋骚学，文中略存梗概。《九诵》为阆中鲜于侁作（文载《宋文鉴》卷三十），东坡甚称赏之，谓其“瘖瘵千载之上，追古屈宋，友其人于冥漠”，叹为雅音之再作。（《东坡文略》卷六十《书鲜于子骏传后》。宋许顗《彦周诗话》曾论《九诵》，谓：“观尧祠舜祠二章，气格高古。自东汉以来鲜及。”）坡公又云：“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词二，草书三，画四。”（《分类东坡诗》十一《书文与可墨竹序》）世但知与可以画竹名，今读其《丹渊集》卷一，《问神词》以下诸篇，直追宋玉小山，太白子厚非其匹也，东坡所赞，洵不虚矣。凡此皆拙撰《楚辞书录》所未及，故补识于此。

三、《楚辞》与戏曲

今再论戏曲与《楚辞》之关系。

元曲小令间有采《楚辞》语句的，如杨朝英《阳春白雪》（卷二）录蒙古阿鲁威的双调《蟾宫曲》（俗名《折桂令》），前九首即以《九歌》品成（文见附录二），是其一例。

元人的杂剧，取材于屈原投江的故事颇多。

扬州睢舜臣（一作景臣，字嘉贤）《楚大夫屈原投江》。

吴弘道（字仁卿）《楚大夫屈原投江》。

以上二种，曹寅校《录鬼簿》、姚燮《今乐考证》、王国维《曲录》俱著录其名，书已失传。（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云：“《永乐大典》卷二〇七四〇《杂剧》四，原收此剧，惟不详为睢吴两家谁氏之作。”）

明人所作的杂剧有：

袁于令　《汨罗记》

徐应乾　《汨罗》

见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著录。（《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

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

清人杂剧以屈原《离骚》为张本的，有下列各种：

（一）尤侗《读离骚》　这是他的《钧天乐》传奇之一种。凡分四折，第一折据《天问》、《卜居》铺叙。第二折据《九歌》而出“关目”。第三折用《渔父辞》，加以变化，言洞庭君怜悯屈原，使白龙化为渔父，迎他入水府为仙。第四折记祭屈原事，用宋玉《招魂》、《神女》等赋。他的才气纵横，驱使《楚辞》各篇，悲凉激楚，学《楚辞》而得其气格骨力。像《屈原题壁混江龙》一曲，淋漓大笔，直可与《天问》相伯仲，如首折“湘累问天呵壁”之混江龙云：

> 小儿造化，七颠八倒总由他。我问他，九重谁垒？八柱谁加？我问他，女娲手，怎补黏五色石？我问他，康回头，怎撞漏百川洼？我问他，五百八十九分，老羲和打过几盘算？我问他，二亿三万余里，莽章亥踹破几双靴？那日月呵！为甚急忙忙，跳双丸，乌飞兔走？那星辰呵！为甚密丛丛，编五珠，虎攫龙拏？那云雾呵！为甚纠缦缦，白马黄牛陈海市？那风雨呵！为甚豁条条，婴儿少女闹窗纱？那雷电呵！疾轰轰，可是玉女投壶挝石鼓？那霜雪呵！飕霏霏，可是瑶姬剪绿绣琪花？那虹霓呵！光闪闪，跨桥梁，何人题柱？那河汉呵！响轧轧，弄机杼，若个乘槎？那山呵！颤巍巍，半青天，谁堆起千岩万嶂？那水呵！古都都，平白地，怎塌下九曲三巴？说不尽中天外，大人国、女子国、毛民国，谁认为程途兜搭？记不起上古前，《循蜚记》、《因提记》、《禅通记》，那晓得谱牒根芽？没调停，揖让征诛，酒三杯，棋一局；硬分张，中国蛮貊，盘四角，路三叉。可怪的：马出图，龟出书，更死麒麟哭断二百年鲁史；可疑的：燕生商，熊生夏，并活鸟冀、扶起三十世周家；可诧的：四目颉，鬼泣神号，只一画、乱演典、坟、丘、索；可憎的：一足夔，鸟兽仪舞，费百拜，强分凶吉宾嘉。最奇的：画九鼎，魑魅魍魉，四乘推开碣石；最巧的：排八阵、龙虎鸟蛇，一竿钓出琅琊。可恨的：酒池肉林，无愁天子，尽消受、玉杯象箸；可惜的：夏台羑里，有道圣人，也不免、铁锁铜枷。天那！若是劝忠呵！不见那苌弘血、比干心，镂剑鸱皮吴国恨；若是教孝呵！不见那伯奇蜂，急子节、偏衣金玦晋军哗。若是爱才呵！不见那孔先生，孟夫子，抵掌高谈，整日价、羸马栈车休馆舍；若是恶佞呵！不见那卫大夫、宋公子，胁肩谄笑，一般儿、峨冠博带坐官

衙。若是福善呵！不见那西山上绝粟采薇，千载饥寒乌啄肉；若是祸淫呵！不见那东陵下，脍肝吮血，终朝醉饱虎摇牙。说富呵！有那陶朱公散千金，怎教苦黔娄、曳杖操瓢，褴褛模样；说贵呵！有那苏季子相六国，怎教老侯嬴、抱关击柝，冷淡生涯。论年呵！可笑那颓彭祖，八百岁一世龙钟，偏则是泣颜回少年白发；论貌呵！可厌那螽无盐，三千人一身宠爱，偏则是葬西施薄命黄沙。这一椿椿皮里阳秋，写不完董狐笔；一件件眼前公案，载不了惠施车。便百千年难打破闷乾坤，只两三行怎吊尽愁天下？休怪俺书生絮聒，且听波上帝嗟呀。

真是气象万千，惊天地而泣鬼神，难怪“读《离骚》”一剧，清世祖看后，非常高兴，特命宫中伶人，搬上舞台演唱，这可见它的价值了。（吴绮题此剧本有《采桑子》一词云：“潇湘千古伤心地，歌也谁闻？怨也谁闻？我亦江边憔悴人。青山剪纸归来晚，几度招魂，几度销魂。不及高唐一片云。”）“读《离骚》”有《西堂全集》本、《西堂曲腋》本，及邹式金《杂剧新编》本。

（二）嵇永仁《续离骚》　此曲共四种，盖寓歌、哭、笑、骂皆是文章之意，欲以续《离骚》。其四种为：一刘国师教习扯淡歌，二杜秀才痛哭泥神庙，三癞和尚街头笑布袋，四愤司马梦里骂阎罗。永仁康熙初为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僚，耿精忠之难，被执，系于狱中，烧薪为炭，书于四壁，此即在狱中写成，故多愤慨之语。自言：

歌、哭、笑、骂皆是文章。遘此陆沉，天昏日惨，性命既轻，真情于是乎发，真文于是乎生。虽填词不可抗骚，而续其牢骚之遗意，未始非楚些别调。

又他在开端《满庭芳》一词有云：“如闻泽畔骚语，咽风尘。况随干戈满地，怎当得、涕泪沾巾。填忧愤，英雄百折，抱义叫天阍。”可见他满腔悲愤，借此发泄。他的拟骚是继续骚的精神，而不摹仿骚的文句，这和尤西堂是不同的。此书有清人杂剧集本。

（三）郑瑜《汨罗江》　尤侗云：“近见西神郑瑜著《汨罗江》一剧，殊佳，但櫽括《骚经》入曲，未免聱牙之病。”焦循剧说称此以《离骚经》作曲，读原文一段，歌曲一段，立格甚奇，得未曾有。是剧有《盛明杂剧三集》本。

（四）张坚《怀沙记》　谱屈原一生事。上本演楚王，耽于酒色，及张仪、靳尚、郑袖之事，依《史记·屈原传》及《战国策》为背景。下本始写屈原本人，其中《著骚》、《大招》、《天问》、《山鬼》、《沉渊》、《魂游》等作，皆袭用《楚辞》原文，加以贯串而成。模文范义，匠心有余，而才气不如尤侗远甚。有《玉燕堂四种曲》本。

（五）周乐清《纫兰佩》　先是毛声山有意撰《雪恨传奇》十种，总名《补天石》，以补古来人事之缺陷。其一曰《汨罗江屈子还魂》未成，周氏乃祖述其意而作此曲。谱屈原沉江而死，后复回生为楚王所用，将悲剧改成团圆之喜剧，翻觉淡而无味。是剧有道光间刊本。

（六）吴藻《饮酒读骚图》　此为一折之短剧。剧中人物只有谢絮才一人。描写她嫌自己是个弱质女子，因改易男装，描成小影一幅，名为《饮酒读骚图》，悬于书室。他日，又换作闺装，对这幅小影，大读《离骚》，狂饮痛哭，终则收图而去。故此曲又名“乔影”，作者幻想摆脱女儿身，自我陶醉，为此以抒其愤慨。词颇亢爽，有豪士气。这曲虽不是摹仿《楚辞》，却受到《楚辞》的间接影响，算是另一种风格。（齐彦槐题词说：“词客深愁托美人，美人翻恨女儿身，安知蕙质兰心者，不是当时楚放臣。”很能道出他的心事。）《饮酒读骚图》有道光乙酉莱山吴载功刊本。

从上举各种杂剧，可看出明清戏曲取材于《楚辞》的一般情形。所谓“饮酒读离骚”、“续离骚”、“纫兰佩”这些名目，在宋词中已成很流行的套语，它们虽由《楚辞》而来，事实上和宋词亦不无关系的。（近人所作剧本以屈原为题材者颇多，大都世所习知，故不复及。）

四、《楚辞》与古琴曲

中国音乐，以七弦琴与政治学术关系最深。《史记·乐书》所谓“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这是它的显著作用。故鼓琴可以修身理性，见志观治（见《上古琴论》），当以道言，而非以艺言。

每一琴曲的名称，即是它的内容的表识，名称与内容是配合的，琴所弹出的声音，即其内容的表现。苏琴山云：“弹琴须要得情，有是情斯有是声，声情俱肖，乃有曲。”（《春草堂琴谱》）所以作曲家往往借某种事物来象征它的内在含意，而且作为标题。譬如六朝所传《碣石调·幽兰》一操（有《古逸丛书》本），隐寓着时人暗蔽，不知贤者，有悲士不遇的深意，即其著例。

很多古琴曲是取材于《楚辞》的。《楚辞》中的警句，汉时被谱人琴曲，像《九歌》“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二句，亦见于琴操。民间的相和歌《今有人》一首，载《宋书·乐志》（十一），谱入《陌上桑》调，题作“楚词钞”，即用《九歌·山鬼》之词。其文如下：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新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荃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飖神灵雨。风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忧。（《宋书·乐志》十一）

此就《楚辞》原文，删减助字，点窜而成，为三三七句体。崔豹《古今注》称“罗敷弹筝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是《陌上桑》原为筝曲。《宋志》云：“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所录相和歌十三曲，内属于《陌上桑》调者，尚有魏文帝词的《弃故乡》，武帝词的《驾虹蜺》，及这首《今有人》。唐李白《瑟诗》云“弹作《陌上桑》”，则以为瑟曲（参看熊朋来《瑟谱》卷六）。

汉时盛行楚声，故琴中有楚歌，王逸有七言诗一首，题曰“琴思楚歌”。（原见张溥《百三家集》。逯钦立云：此本《楚辞》注文，非王逸之诗。）

明初《神奇秘谱》凄凉调有楚歌一首，内有楚霸王卸甲，疑即琵琶曲《十面埋伏》所由昉，亦即楚声。汉末又有“楚琴”之名，阮籍《乐论》云：

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扆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全三国文》卷四十六）

所谓“楚琴”，疑即以楚声弹出者。

有关《楚辞》的古琴曲，可考的有《屈原叹》及《屈原自沉》，谱皆失传。《屈原叹》仅存其目于《幽兰谱》末琴调名中。（《隋志》有“琴历头簿”，据马国翰辑本《琴历》三十八曲，多与《幽兰谱》所附相同，惟无《屈原叹》。）屈原《自沉》一操，则见于窦俨所编《大周正乐》。（《太平御览》五百七十八《乐部》引《大周正乐》云：“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自伤怀忠而见疑，忧愁，面目黧黑，临河而哀思。著《离骚》、《九歌》、《九

叹》、《七谏》之辞，仰天而叹，援琴而鼓之。”此以刘向《九叹》、东方朔《七谏》为屈原作，误也。《崇文总目》：《大周正乐》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学士窦俨撰，显德中，俨奉诏集缀。）

自唐以后流传的琴曲，用《楚辞》作题材的，为数不止十操，大抵表现怨悱苍凉之音，故徐珙《大还阁琴谱》选取琴曲的标准，其一是“忠贞骚怨之琴”，即指此类。兹就所知有关《楚辞》的琴曲，论列如下：

（一）《离骚》

俞炎《炉火监戒录》序，提到《离骚》谱。此曲宋人很喜欢弹奏，见于诗词的记载颇多，欧阳修琴诗云：

> ……无射变凛冽，黄钟催发生。咏歌《文王雅》，怨刺《离骚经》。二典意淡薄，三盘语丁宁。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

琴曲中有大雅属黄钟调（见《神奇秘谱·霞外神品》下卷），欧公诗以《文王雅》与《离骚经》对比，并指琴曲名而言。又赵以夫词云：

> 听《关雎》盈耳《离骚》婉，歌不足，为嗟叹。（《贺新郎·次刘后村》）
>
> 无奈熏风吹绿绮，闲理《离骚》旧曲。（《贺新郎》题云：“芝山堂下兰开双花瓣……”《全宋词》题作《沁园春调》，误。）

词中所言的《关雎》亦琴曲名（《五知斋琴谱》卷五谓《关雎》旧有二谱，彼所录者，为徵音十段），故与《离骚》合称。又陈著词云：

> 孤坐小窗香一篆，弦绿绮，鼓《离骚》。（《江城子·重午书怀》）

宋林洪山家清供记：“张（镃）约斋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数杯后，命左右作银丝供具，良久，出琴一张，请琴师弹《离骚》一曲，众方知银丝乃琴弦也。”（《小石山房丛书》本）

元耶律楚材酷嗜琴，曾与人对弹五十曲，有夜坐弹《离骚》诗云：

一曲《离骚》一碗茶，个中真味更何加！香销烛烬穹庐冷，星斗阑干山月斜。（《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一）

从上引各事，可知宋元文人很喜欢鼓《离骚》琴曲，欧公诗已及之，则此曲的产生，当在北宋以前。

明初宁献王朱权《神奇秘谱》列次《离骚》于下卷“霞外神品”，霞指南宋杨缵《紫霞洞琴谱》。（《浩然斋雅谈》下：“杨缵字继翁，号守斋，又称紫霞。……洞晓律吕，尝自制琴曲二百操。”《千顷堂书目》郑瀛《琴谱》下云：“宋大理少卿杨公缵最知琴，尝与其客毛敏仲、徐天民著《紫霞洞谱》一十三卷，元季何巨济受业于徐，而瀛又受业于何，谱分正外二调，各一卷。”）《离骚》大概是《紫霞洞谱》中所不收的，故被列在“霞外”。明晁瑮《宝文堂书目》下艺谱类有《霞外正宗琴谱》，或者《离骚》曲亦收在这一书中。

《秘谱》载：“臞仙曰：《离骚》之操有二，其十八段者屈原自作也，十一段者后人追感而作。”“原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乃付诸徽轸，告乎上下也。”这与《西麓堂琴统》、《伯牙心法》等书俱以此曲为屈原自作。考唐僖宗时，陈康士安道善琴，撰琴曲百篇，《文献通考》谓“内有《离忧》七章，《沉湘》七章”，《唐书》及《宋史·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康士《离骚谱》一卷，《崇文总目》称其“依《离骚》以次声”（钱东垣辑本），《诚一堂琴谈》云：“陈康士撰《离骚》九拍。”宋以来所传《离骚》一曲，疑出自康士之《离骚谱》。

琴曲的《离骚》又名“骚意”（《兰田馆琴谱》），《神奇秘谱》所收为十八段谱，自明至清琴谱，收录《离骚》一操，计有三十种之多。（据查阜西《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总表》，有：《神奇秘谱》、《风宣玄品》、《琴谱正传》、《西麓堂琴统》、《太音补遗》、《重修真传琴谱》、《文会堂琴谱》、《藏春坞琴谱》、《乐仙琴谱》、《徽言秘旨》、《大还阁琴谱》、《澄鉴堂琴谱》、《蓼怀堂琴谱》、《德音堂琴谱》、《琴谱析微》、《诚一堂琴谱》、《卧云楼琴谱》、《自远堂琴谱》、《兰田馆琴谱》、《琴露轩琴谱》、《琴学轫端》、《二香琴谱》、《悟雪山房琴谱》、《稚云琴谱》、《蕉庵琴谱》、《天闻阁琴谱》、《天籁阁琴谱》、《琴学业书收两谱》、《沙堰琴编》。）

诸家所称应用调名、转弦及段数互有异同，兹就常见而较重要的琴谱，比较如下：

（1）《神奇秘谱》用凄凉调（即楚商），紧二五弦各一徽，凡十八段。

（2）郭裕斋《德音堂琴谱》亦用凄凉调，紧二五弦各一徽，凡二十二段。其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段神奇谱并无之。

（3）云志高《蓼怀堂琴谱》称夷则调，紧二五弦各一徽，凡二十段。

（4）《大还阁琴谱》称无射调，凡二十段，不明言转某弦。《诚一堂琴谱》与之相同，因编者程允基和徐青山弟子夏于涧同游，即由徐氏再传而得，徐氏有跋，自谓"是谱传自沈太韶"。琴旨："无射与楚商同，紧二五各一徽。"

（5）唐松仙《天闻阁琴谱》载刊自《诚一堂琴谱》，惟称姑洗调，但亦紧二五弦各一徽。

（6）黄景生《悟雪山房琴谱》，夹钟均羽音，凡二十段。（按夹钟均乃正调紧二五七弦，同清商调，俗呼姑洗调。是谱以《离骚》作清商调，与他谱异。）

（7）吴灴《自远堂琴谱》称商调羽音，紧二五弦各一徽，凡十六段。（注云：曲中以一弦六弦羽声立体，当定为商调羽音。）

各谱所称调名颇为分歧，以用紧二五弦各一徽，并称"凄凉调"者为合。弦音应是尺凡合士上尺工。

至于分段复多不同，像秦维翰的《蕉庵琴谱》和《自远堂琴谱》只分为十六段，许多琴谱大都每段不加标题，其他则标题及分段起讫复不一致。兹取《神奇》与《蓼怀》二谱略比较如下：

	神奇谱	蓼怀堂谱
一　段	叙	灵均叙初
二　段	灵均叙初	指天为证
三　段	指天为证	成言后悔
四　段	成言后悔	长叹掩涕
五　段	长叹掩涕	灵修浩荡
六　段	灵修浩荡	郢路徘徊
七　段	回车延伫	女须詈予
八　段	女嬃詈予	幽情隐悯
九　段	就舜陈词	就舜陈词
十　段	埃风上征	尘埃上征
十一段	虙妃结言	虙妃结言
十二段	犹豫狐疑	犹豫狐疑

十三段	灵氛就占	灵均（应作氛）就占
十四段	巫咸决疑	巫咸决疑
十五段	璚佩众薆	琼佩众薆
十六段	兰芷不芳	兰芷不芳
十七段	远逝自疏	远游（应作逝）自疏
十八段	临睨故乡	南国冒归
十九段		临睨故乡
二十段		从居彭咸
		尾音

《蓼怀谱》多出“幽情隐悯”及“南国冒归”二标题，又省去首段标题之“叙”，各谱不但分段起讫不符，而且音律亦异。如回车延伫一段，各谱皆以散声拂一至六起，《神奇》列第七段，《蓼怀堂》、《大还阁》、《诚一堂》、《天闻阁》皆属第六段，《自远堂》属第五段，《德音堂》属第八段。《蓼怀堂》第十一段起泛音，标“虙妃结言”，《神奇谱》则属之“埃风上征”，应以《神奇谱》为是。

《离骚》这曲，我曾下了半载的工夫，弹过数十遍，对它颇有体会。大抵古人制曲有三种：一是以声写情，二是按律谐声，三是依文叶声（说见刘铁云《十一弦馆琴谱》序）。《离骚》是属于第一种的，试以《神奇秘谱》本论之：

“长叹掩涕”段，双弹再作，描写涕泣之声；而飞猱、引上、退复，则表示叹息。“回车延伫”段，先以散声之滚、拂，状车马驰骤；未叠用虚点、虚罨及掐、撮，凡再作三作，把屈原那一种徘徊反顾、不忍远离的悲伤怨慕的情绪，活现出来。“女媭詈予”段，自“上六合六”再作以下，表现着重遝反复，像女人唠叨琐絮的意态。“埃风上征”段，大半用泛音，令人有凭虚御风、飘然远举的感觉。（《蓼怀堂》题作“虙妃结言”，不甚确切。）“犹豫狐疑”段，前两用拂，继重用双弹，逐渐绰上；结用泼、剌、双弹再作，表现着紧张怔忪和矛盾犹疑的心情。“就舜陈词”、“巫咸决疑”两段，取音略同，而恳切有味。“琼佩众薆”段，全作泛音，多叠音涟字，深有感于众美受小人隐蔽，而生出无限慨叹。“兰芷不芳”段，承上突转，正如所谓由“昵昵儿女语”忽作“划然变轩昂”之状，用拂、滚和长锁、小锁之音，复以抹、挑同音弹出。含意在悲叹时事缤纷变易，已不可复为。“远逝自疏”段，中间数

句，极为沉郁顿挫。“临睨故乡”段，起作大慢、打圆，有徘徊眷恋之意。——《德音堂谱》在此段前，增入泛音一段凡三用拂，仿佛表示着升陟皇天，腾云驾雾，极为佳妙。末数句屡用打的指法，声音更觉沉痛；结以剔第二弦散第一弦如一，苍凉激楚，低徊不尽。

是谱只是撷取《离骚》的精神，没有和经文配合起来，故徐祺跋云：

> 《离骚》之操，有合于经文者，惟浙中徐南山李通侯弹之。而不知者以其应文为妙，然以文协声，终属支离阻滞，何怪乎先贤之不录也。是谱传自沈太韶先生，不第音度大雅，而其慷慨击节，深有得于忠愤之思，直与三闾在天之灵千古映合，固有不在文而在乎声，且不在声而在乎神者欤！（《大还阁琴谱》。按徐南山即徐时琪，著《绿绮新声》）

明末有人把琴谱的《离骚》与屈原《离骚》经文相配，终是龃龉不相入。可知《离骚》这一琴谱的创作，是“以声写情”，而不是“依文叶声”的。

（二）《泽畔吟》

见《神奇秘谱》，亦属凄凉调，和《离骚》相同。共分四段：其一“游于江潭”，其二“行遇渔父”，其三“蒙世尘埃”，其四“鼓枻而歌”。朱权云：“是曲也，或云雪江之所制也，拟屈原以正事君，与时不合，于是见放。”《五知斋琴谱》亦言：“雪江作《泽畔吟》、《广寒秋》。”

此曲作者雪江，据张炎《词源》下云：“近代杨守斋神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词；与之游者，周草窗、徐雪江、奚秋厓、李商隐。”（夏氏《周草窗年谱》引此云。雪江未详）考汪元量时与徐雪江唱和，《湖山类稿》中有《南归后答雪江》一首；又《水云词》有《长相思·越上寄雪江》，《柳梢青·湖上和徐雪江》，其中有句云“闲却梅花一曲琴”。守斋、水云都是琴学大师，徐雪江跟他们来往，当然亦精于琴理，这首《泽畔吟》无疑是他所作的。他生在南宋末季，和屈原遭遇很相近，他眼见宋的灭亡，谱出《泽畔吟》的琴曲，是很有深意的。

这曲第二段全是泛音，和《离骚》“琼佩众薆”很相近。末段叠用双弹拟鼓枻之声，像是由《离骚》“犹豫狐疑”一段截取而成。结句芒合六智ㄋ上八合芦合写廿一女一声与《离骚》完全相同，所以《泽畔吟》可说是《离骚》的缩本，似乎是徐雪江仿效《离骚》，删其大意而成。

《西麓堂琴统》此曲有两谱。又见于《风宜玄品琴谱》、《正传藏春坞琴谱》等书。

(三)《搔首问天》

见《自远堂》、《天闻阁》、《悟雪山房》、《蕉庵》各琴谱，凡七段，亦作八段。旧称蕤宾调，原徵调商音，紧五弦一徽。天闻阁谓“楚大夫作《天问》，即此操也。其节奏抑扬顿挫，其神韵咨嗟浩叹，一片孤忠，见乎词矣”。惟《楚辞》天问原辞极长，和这操琴曲很不相类。这亦是依声写情，首段数用飞吟并撞仙之指法，进退上下，一唱三叹。第三段用泛音，极为愀怆动听。前五段步步跌急，至第六段泛音后转慢，若无可奈何，自作宽解。全首很能写出悲愤抑塞之情。

这操自是出于后人所谱，所谓“搔首问天”一语，本非屈子的事，《云仙杂记》一“搔首问青天”条云：“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吸呼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注云：出《搔首集》。可见“搔首问天”和屈子的“呵壁问天”，含义本来有别。今用搔首来指屈子，只是借用而已。

《梅庵琴谱》所录《搔首问天》，林钟调徵音，凡九段，题屈原作。考此曲最早见于《五知斋琴谱》，原题《秋塞吟》，注云“金陵派”，又名《骚首问天》；以后《治心斋琴学练要》称为搔首问天，《春草堂琴谱》称之为《屈子天问》。而注云“又名《水仙操》”，与《古斋考定琴谱目录》云“一名《秋塞吟》”，《自远堂》但称之为《水仙操》，和上列七段的《搔首问天》，截然系两曲，《五知斋》又有长篇的说明，认为“秋塞吟为汉明妃作，曲中忧愁悲怨，听之增人牢骚不平之气”。可见这一操正名应曰《秋塞吟》。完全没有屈子问天的意味，梅庵题曰屈原作，那是附会，不足为据的。

(四)《宋玉悲秋》

明汪芝《西麓堂琴统》云：“宋玉感秋气而有悲哉之叹，后人因被之于徽轸。”《琴统》现仅有传钞本，原书未见过。《自远堂谱》分十段，《天闻阁》转录之，吴灴定为宫调商音，谓“是以四弦商声立体，以二七两弦羽声为用”。惟经过打谱及翻成工尺之后，乃知是避五弦散弹的变宫，即不转弦而换调，弦音宜为尺工合士乙尺工。(汪孟舒谓《松风阁琴谱》之《悲秋》，即潞藩〔纂集《古音正宗》〕之“秋闺”，弹法略有不同。)

此曲多用异弦同音叠字，往往连用数音，特具有双声叠韵之美；同时用飞吟曲折往复，工于嗟叹；第五段泛音尤为凄婉。（光绪间刊《释空尘枯木禅琴谱》又有《金风落叶曲》，谓“宋玉所作，音韵萧瑟，息心静听，俨然有草木黄落雁叫云飞之志”，注即“梧叶舞和风”，与此《悲秋》异曲，亦附会为宋玉作，殊误。）

附　论《招隐》

见《神奇秘谱》上卷，刊入宫调，即不转弦正调。朱权按：《琴史》曰，是曲乃西晋时左思见天下溷浊，将招寻隐者，乃作《招隐诗》，又引《招隐曲》云云。此曲弹出，古淡有味，与《离骚》泽畔等风格完全不同，和《楚辞》应该没有关系。惟淮南小山始作《招隐士》，刘向、王逸皆列入《楚辞》。朱熹作《招隐操》，分为《招隐》及《反招隐》二篇，系有小序云：“淮南小山作《招隐》，极道山中穷苦之状，以风切遁世之士，使无遐心，其旨深矣。其后左太冲、陆士衡相继有作，虽极清丽，乃自为隐遁之辞，遂与本题不合。故王康琚作诗以反之，虽正左陆之误，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朱文公集》卷一）其说甚是。琴曲上的招隐，系招寻隐者入山，和淮南小山之辞招山中之隐者出山，用意完全相反，故与《楚辞》无关。

以上各曲，皆曾弹过，略谙它的取音和美妙之处，故加以充分说明。尚有若干曲未经弹出，姑记其目于后：

《屈原问渡》(《九歌》)

张廷玉《理性元雅》云：“屈平投南荒，问渡于渔父，自弃汨罗而不悔，后人拟是曲，令入琴中而吊之。”亦属凄凉调，《西麓堂琴统》云：一名《九歌》。凡分九段。《太古遗音》、《风宣玄品》、《琴谱正传》、《立雪斋琴谱》等俱载此曲。宋末俞琰《炉火监戒录》小序自云：“（帝㬎）德祐后，闭户静坐，以琴自娱……《离骚》、《九歌》……皆有谱。”（《学海类编·保摄类》）俞氏的《九歌谱》，不知视此何如？（《千顷目》有《俞琰琴谱》四十篇）

《远游》

《西麓堂琴统》云：“三闾被谗见放，伸志远游之篇，肆情傲物，游神八表，避世之士，而作此以宣其湮郁不平者也。”曲分八段，只见于是谱。

《渔父辞》

《理性元雅》：“此篇乃屈原遭谗被放而作。”亦属凄凉调。

《屈原》

见《文会堂琴谱》。

《吊屈原》

见《琴谱正传》。

《续离骚》

杨时百琴话举出，为《与古斋琴谱》目录所有而未见者。

由上可以看出古琴曲取材于《楚辞》之多，后人每附会为屈原所作，如《诚一堂琴谈》云："屈原作《天问》、《远游》、《离骚》、《独醒》诸弄。"这种说法，是不足信的。

宋姜夔的《越九歌》，论作法是摹仿鲜于侁的《九诵》（《砚北杂志》云：《越九歌》乃规模鲜于子骏《九诵》，然言辞峻洁，志度高远，颇有超越骅骝之意）。然熊朋来《瑟谱》云："近代姜尧章又作《越九歌》，以拟楚之《九歌》，而自为鼓瑟之谱。"是《越九歌》又谱入瑟，亦值得一提的。

附录一 《离骚》劳商辨

一、释劳商

《楚辞·大招》云：

>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魂乎归徕，定空桑只。

王逸注云："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乐听也。或曰伏羲驾辩，皆要妙歌曲也。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朱子《集注》亦云："伏羲之《驾辩》，楚之《劳商》，皆古曲名，而未有考。"古曲曰辩者，如《九辩》，见《离骚》、《天问》及《山海经》。王逸谓辩者变也。王夫之言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按《宋史·乐志》言舞曲有辩，可以比证。

近人于劳商，颇有新解：

（一）朱起凤云："唐商古通用。以地名为曲名，在齐曰高唐，在楚曰劳商，此方音不同之故。"（《辞通》卷九七阳）

（二）游国恩云："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是一物而异其名。离骚之为楚曲，犹后世'齐讴'、'吴趋'之类，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的转音，故以为另

一曲名。”（《楚辞概论》）

二家皆以同音假借立说，其实非是。揆王逸之意，商乃宫商角徵羽之商音。按乐曲取之商音者，有清商、楚商、慢商、侧商等名，皆可于古琴曲调考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有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数种。其命名之故，以意度之，四弦曲、瑟调曲以主乐器为特征，平调曲、清调曲，则以乐调为区别，楚调曲则出于楚声。即从音乐上加以分类。）

清商 宋玉《长笛赋》：“吟清商，追流徵。”（《文选》二十九李注引）贾谊《惜誓》：“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称乎《清商》。”朱注：“《清商》，其歌曲名。”据此语清商乐器亦单用瑟。《古诗十九首》：“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又传《苏武诗》：“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清商本指乐调而言，凡乐曲之用清商调者，得谓之清商曲。若南朝之清商乐，仍是汉世相和歌之遗。自西凉龟兹乐传入，惟琴工犹存古调。郭茂倩云：“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氏五弄，楚调四弄。”故清商之义，仍须于古琴求之。清商者即商音取高半音也。今琴曲上清商调为紧二五七各一徽。《神奇秘谱》亦称曰姑洗调。其“姑洗意”即“清商意”，紧二五七各一徽，即茁与匔相应，茌与匔相应，茁与匔相应，秋鸿捣衣皆此调也，弦音为士上尺工六五仕。

侧商 王建《宫词》：“侧商声里唱伊州。”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云：“林钟商，今夷则商也。管色谱以凡字杀，若侧商即借尺字杀。”姜白石《琴曲侧商调序》云：“琴七弦散声，加变宫变徵为散声者曰侧弄。”“侧商之调久亡，乃以慢角转弦，取变宫变徵散声。”《转弦歌诀》云：“只缓三弦成慢角。”即从正调先慢第三弦，使为慢角调，再慢四六两弦便成侧商调。《唐书·乐志》云：“侧调者生于楚调。”侧商与侧楚侧蜀，同为“侧弄”，溯其源，仍出于楚调也。

慢商 明潞藩所刻《广陵散真趣》，为慢商调，其第三段有评云：“慢商调，惟广陵一曲，故为绝调。”太古遗音解慢商为“慢二（弦）一徽”，又一作慢一三应一弦散声。《广陵散》之定弦法，第二弦低半音，令与一弦同音高，使同时打拨可加重音量。《乐府诗集》四十一“楚调曲”序云：“其《广陵散》一曲，今不传。”是《广陵散》原属楚调。

楚商 琴之外调，又有凄凉调或称楚商调。《转弦歌诀》云：“二五俱高凄凉

音。”谓紧二五弦各一徽，使茝与芎相应，及茁与芎相应，弦音为尺凡合士上尺工。《神奇秘谱》有神品凄凉意及神品楚商意，俱即凄凉调。《离骚》、《泽畔吟》、《屈原问渡》皆属此调。

是故以琴弦论，第一弦为宫，第二弦为商，桓谭《新论》云：“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见《通典·乐典》引）凡于第二弦紧慢，使高半音或低半音，以定调，皆是商音之变。括言之：紧二五弦为楚商，紧二五七弦为清商，慢二弦为慢商，慢三四六弦为侧商，此其大较也。所谓“劳商”者，王逸言“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此说至确。故劳商当是以商弦为体，犹琴曲之楚商及清商，即由商音交织而成也。凄凉调亦名楚商，《神奇秘谱》凄凉调有楚歌，谱霸王别姬之事，此即所谓楚声，亦紧二五弦取调。王逸以楚声绞商音训“楚劳商”，则劳商之义，可以楚商清商比况之。于此可证琴曲之外调，自战国时已有，而所谓“楚声”，亦应于音乐上求之，方能探骊得珠。游氏徒以同音通假立说，谓劳商即离骚一名之异写，实不足为典要。近世采其说者，似应加以审辨。

二、“离骚”解

离骚之名，汉氏以来，其说不一。《史记·屈原传》云：“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应劭（《史记索隐》引云“离，遭也；骚，忧也”）、颜师古（见《汉书·贾谊传》注云：“离，遭也；忧动曰骚。”）均用班说。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离骚》称经，乃后世之士祖述其词而尊之耳，非屈子意。叔师以“径”训“经”之说，自洪兴祖、朱晦庵，悉讥其非。

离骚二字，本楚国之方言也，亦得倒言曰“骚离”。《楚语》上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远者距违。”韦昭注：“骚，愁也；离，叛也。”《困学纪闻》云：“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余按古谜语每倒言，如“慷慨”亦作“忼康”，“黄昏”亦作“纁黄”（《九章·思美人》），“溟涬”亦作“涬溟”（《庄子》司马注），是其比。项安《世家说》亦引伍举“骚离”之言，谓“为楚人之语，自古如此，

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梁章钜《文选旁证》已引王、项两说）。其说是也。

《史记索隐》云：“骚字亦作慅，按《楚词》慅作骚，音素刀反。”是《索隐》本离骚作“离慅”。日本《枫山文库》及三条西实隆写本并同。宋黄善夫本，明汪谅本《索隐》不全，无“慅亦作骚”以下十字。项氏解离骚，谓“以离畔为愁”，与叔师训离为别，骚为愁，取义最近。是离骚者，易言之，即别愁也，亦谓之离忧。《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离忧。”与史公释离骚为离忧正合。清蒋骥注云：“离，别；骚，愁也。篇中有‘余既不难离别’语，盖怀王时初见斥疏，忧愁幽思而作也。”屈复《楚辞新注》亦援《离骚》是语，以申“离骚”二字之义即离别之忧。

是说也，多见疑于世，然寻绎骚中语，言“离”者不一而足。如云：“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注：“判别也；服兰蕙，守忠直，判然离别，不与众同。”此托女媭喋喋之言也。再则云“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而自疏”。王注：“言贤愚异心，何可合同，知居与己殊志，故将远去自疏，而流遁于世。”此屈子邅道昆仑以前，自道其远离之决心也。文中于去楚之情，低徊往复，若不能自已者。是所云“离心”，即离忧也，亦即离骚也。宁溘死以流亡，而不忍枉道以苟合，此固屈子之初志。然于楚宗国之邦，义无可去，离乎？否乎？将安抉择？此矛盾心理，即《离骚》一文所为作也。孔子云：“迟迟吾行，去父母国之道也。”屈子上天下地，临睨故乡，仆悲马怀，蜷曲不行，宁从彭咸之所居，而终不愿去其祖国，在此矛盾观念交织冲突之下，又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以死。故知《离骚》篇名之取义，要以离别之忧一说，最能道出屈子心事。顾欲明此义，须于《离骚》本文通体玩会，庶几得其精神所在，尤当本悲剧之法则，以究其辨析善恶与去留冲突之心，苟徒乞灵于训诂，将何从悟入耶？读《离骚》者，应先明此一谛也。

盖屈子于善恶之辨至明，其言曰：“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自以为官三闾大夫时，职司教养，恐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又言：“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则恐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楚人尊善，早著明训。至《大学》益阐“止于至善”之义，其引《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郑注谓“楚昭王时书”。今不可见，而屈子云：“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非此意耶！又伍举之言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夫屈子所遭际，岂非德义不行之时乎？此所以不恤骚

离而远游者，与伍举之意正合也。

由是言之，《离骚》取义，应以叔师所说为确；而史公离忧一解，亦最能体屈子之志。至于其他异说，若周圣楷以离为明，骚为扰。（楚宝）戴东原谓“离犹隔，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屈原音义》）。说并迂曲。

离骚二字，译成西文者，英人 E. H. Parker 翻为“Sadness of Separation”。而 Georges Margoulies 于所著“Le Kou—wen Chinois”（《中国古文》，法文本，巴黎刊）亦作“Tristesse de la Separation”。皆依王叔师说。林文庆则译为“Encountering Sorrows”，据班固以离为遭遇，解作动词。H. A. Giles 序林氏书，力讥前说之误。由今观之，巴克所译未必非，而林氏亦不见其为得也。

附录二 《宋词采骚摘句图》

《摘句图》采自《全宋词》。其只用骚经字面而意与屈子无关者不录。同阕词有删节中间句者，所录上下文各用引号作识。调名下为词题，亦以引号表之。题后括弧两数字，上指卷数，下指页数。兹录本为拙文所取材，不忍废弃，故并存之。昔高似孙有《选诗句图》，故仿其名以命篇。

苏　轼　路尽河回人转舵。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三八、一〇上）

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归朝欢·和苏坚伯固》（三九、一三下）

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殢人娇·赠朝云》（三九、一四上）

晏幾道　长恨涉江遥，移近溪头住。闲荡木兰舟，误入双鸳浦。——《生查子》（三四、七上）

晁补之　想沉江怨魄归来，空惆怅，对菰黍。——《消息·端午》（五五、三上）

洒泪作招魂，枫林子规啼晓。——《离亭宴·吊黄鲁直》（五六、四上）

二十南游，曾上会稽千仞。捐袂江中往岁，有骚人兰荪遗韵。——《万年欢·和季良》（五八、三上）

李之仪　角黍满盘无意举，凝魂。不为当时泽畔痕。——《南乡子·端午》（七〇、九下）

李清照　“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

篱。”——《多丽·咏白菊》（二九〇、九上）

宋高宗　那如江汉独醒人。——《和渔父词》（一、六下）

叶梦得　冥鸿天际，尘事分付一轻芒。认取骚人生此，但有轻篷短楫，多制芰荷裳。——《水调歌头·和休官咏怀》（八四、五上）

陈与义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临江仙》（一〇二、八上）

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清平乐·木犀》（一〇二、九上）

张元干　《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八五、四下）（已见上引）

《水调歌头·登垂虹》（八五、六上）（已见上引）

洪　浩　《临江仙》（九一、四下）（已见上引）

赵　鼎　《念奴娇·夜饮南园作》（九三、三上）（已见上引）

王安中　席次，早焚烈芰荷衣。敲朴谊谊，牒诉匆匆，抗颜自喜。—《哨遍·为蔡侯原道以北山移文度曲》（九八、二上）

王以宁　《满庭芳·登栖霞楼》（一一〇、五上）（已见上引）

杨无咎　不奈书生习气。对群花领略风味。骚人已去，欲纫幽佩，重为湘酹。——《水龙吟·木犀》（一一七、二上）

沅湘人去已远，劝君休对景，感时怀古。慢啭莺喉，轻敲象板，胜读《离骚》章句。——《齐天乐·端午》（一一七、九上）

周紫芝　除尽把，平生怨感，一时分付《离骚》。——《汉宫春·己未中秋》（七九、一上）

苏　庠　断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骚人兰与芷。不数春风桃李。淮南丛桂小山。诗翁合得攀翻。——《清平乐·咏岩桂》（七七、六下）

王之道　《凤箫吟·和彦时兄重九》（一〇四、四下）（已见上引）

侯　寘　彩笔题诗。休诵骚人《九辩》词。——《减字木兰花》（一三〇、一三下）

王千秋　《解佩令·木犀》（一三一、五下）（已见上引）

张孝祥　《水调歌头·过潇湘作》（一三八、二上）（已见上引）

料天关虎守，箕畴龙负，开神秘，留兹地。——《水龙吟·望九华作》（一三九、一下）

欲吊沉累无所，但有渔儿樵子，哀此写离忧。——《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一四二、八上）

甄龙友 清江旧事传荆楚。叹人情，千载如新，尚沉菰黍。且尽尊前今日醉，谁肯独醒吊古。——《贺新郎》（一四三、九上）

姚述尧 兴来吟咏，灵均谁谓今绝。——《念奴娇·次刘周翰韵》（一四五、一下）

杨冠卿 不见独醒人，愁对湘妃语。——《生查子·赋湘妃鼓瑟笺，湘妃泛莲叶上，有片云擎月》（一五八、三下）

赵磻老 高诵《远游》赋，独立桂香兰。——《水调歌头·和平湖》（一五三、三下）

想像切云高，晓日罗昏雾。——《生查子·再和丞相》（一五三、五上）

朱　熹 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鹧鸪天·江槛》（一五五、六上）

辛弃疾 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纫兰结佩带杜若。入江海曾约。——《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一六三、二下）

"灵均千古怀沙恨。记当时匆匆，忘把此仙题品。""弦断招魂无人赋，但金杯的皪银台润。愁殢酒，又独醒。"——《贺新郎·赋水仙》（一六三、三上）

绿树听鹈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鹈鴂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一六三、五上）

兰佩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空壹郁，共谁语。——《贺新郎·和徐斯远下第》（一六三、七下）

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沁兰春·带湖新居将成》（一六四、五上）

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一六四、五下）

新词好，似凄凉楚些，字字堪题。——《沁园春·答余叔良》（一六四、五下）

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沁园春·答杨世长》（一六四、六上）

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菑。——《沁园春·破戒一醉》（一六四、七上）

闻道尊鲈正美，休裂芰荷衣。——《水调歌头·和王政之》（一六

五、二下）
《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饯席上作》（一六五、四下）（已见上引）
《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一六五，六上）（已见上引）
我亦卜居者，岁晚问三间。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戏作》（一六五、六上）
《满江红·山居即事》（一六六、五下）（已见上引）
与客朝餐一笑，落英饱便归休。古来尧舜有巢由。江海去悠悠。待说与佳人，种成香草，莫怨灵修。——《木兰花慢·寄题吴克明广文菊隐》（一六六、七上）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木兰花慢题序》（一六六、七上）
听兮清佩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 路险兮山高些。愧余独处无聊些。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芬芳，团龙片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予之乐，乐箪瓢些。——《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一六七、二下）
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屦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摸鱼儿·雨岩有石，状甚怪，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名山鬼谣》（一六七、四上）
休说。搴木末。当日灵均，恨与君王别。心阻媒劳，交疏怨极，恩不甚兮轻绝。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赵晋臣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一六七、六下）
怪新来，却见文反离骚，诗发秦州。——《雨中花慢·登新楼有怀》（一六八、一下）
落花时节，杜鹃声里送君归。未消文字湘累。——《婆罗门引·别杜叔高，叔高长于楚词》（一六九、二下）
“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吾使丰隆前道，叫开阊阖。周游上下，径入寥天一。览玄圃，万斛泉，千丈石。”“璘珣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一六九、三下）

《踏莎行·赋木犀》（一六九、七下）（已见上引）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晚。”——《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一七〇、七下）

胸中不受一尘侵，却怕灵均独醒。——《西江月·和赵晋臣赋秋水瀑泉》（一七二、五下）

《生查子》（一七四、五下）（已见上引）

漫天春雪来，才抵梅花半。最爱雪边人，楚些裁成乱。——《生查子·和赵晋臣春雪》（一七四、六上）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赋》（一七四、六下）

《忆王孙·秋江送别集古句》（一七四、七下）（已见上引）

许及之 “独炷炉香薰衣润，对潇潇翠竹都忘暑。时展卷，诵骚语。”“问楼头倦客谁怀古。回首独醒人何在，空把清尊酹与。漾不到潇湘江渚。我又相将湖南去，已安排吊屈嘲渔父。君有语，但分付。”——《贺新郎·端午》（一七五、二上）

丘　密 《鹧鸪天·采莲曲》（一七六、七上）（已见上引）

李　石 《南乡子》（一五七、六下）（已见上引）

俞国宝 《贺新凉·梅》（一七五、一一上）（已见上引）

刘　过 《水龙吟·寄陆放翁》（一八五、七下）（已见上引）

《沁园春·观竞渡》（一八五、三上）（已见上引）

张　镃 云动精神衡岳去，向君山帝乐锵韶濩。兰艺畹，吊湘楚。——《贺新郎·陈退翁分教衡湘将行索词》（一八六、一一下）

韩　淲 人不见，句还成。又听求友莺。濯缨一曲可流行。何须观我生。——《醉桃源·昌甫有曲名之濯缨，因和》（一八七、一六下）

多雅尚，少时情。沧浪渔父缨。高歌宁与俗争鸣。朱弦疏越声。——《醉桃源·和昌甫》（一八七、一六下）

宋玉悲秋合反骚。——《浣溪沙·秋思》（一八七、二三上）

高似孙 青旂报春来了，玉鳞鳞风旌旆（原误作旆）。陈瑶席、新奏琳琅，窈窕来荐嘉祉。桂酒洗、琼芳丽景，晖晖日夜催红紫。湛青阳，新沐人声，淡荡花里。　光泛崇兰，坼遍桃李，把深心料理。共携手、蘅室兰房，奈何新恨如此。对佳时、芳情脉脉，眉黛蹙，羞搴琼珥。

折微馨，聊寄相思，莫愁如水。　青苹再转，淑思菲菲，春又过半矣。细雨湿香尘，未晓又止。莫教一鸩无聊，群芳亹亹。伤情漠漠，泪痕轻洗。曲琼桂帐流苏暖，望美人、又是论千里。佳期杳渺，香风不肯为媒，可堪玩此芳芷。　春今渐歇，不忍零花，犹恋余绮。度美曲、造新声，乐莫乐、此新知，思美人兮，有花同倚。年华做了，功成如委，天时相代何日已。怅春功、非与他时比。殷勤举酒酬春，春若能留，□还亦喜。——《莺啼序·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春之神也，其词凄婉，含意无尽，略采其意以度春曲》（一八三、二上）案《全宋词》录自《阳春白雪》四，粤雅堂本《阳春白雪》有题序，此照补。

姜　夔　昔游未远，记湘皋闻瑟，澧浦捐褋。——《念奴娇·毁舍后作》（一九四、一上）

《水调歌头·富览亭作》（一九四、三上）（已见上引）

史达祖　如今但柳发晞春，夜来和露梳月。——《万年欢·春思》（二一六、三上）

蕙花老尽离骚句。绿染遍，江头树。——《青玉案》　（二一六、一〇下）

些字轻魂几度销。兰骚蕙些，无计重招。——《一剪梅·追感》（二一六、一八下）

高观国　万蕊金寒，三秋梦好，曾记餐英清咏。——《齐天乐·菊》（二一七、一下）

黄岩叟　灵均逝魄无凭。但湘沅一水，到底澄清。菰黍万家，丝桐五彩，年年吊古深情。——《望海潮》（二三八、五下）

汪　晫　《离骚》古意盈洲渚。也莫道龙舟吊屈，浪花吹雨。——《贺新郎·开禧丁卯端午》（一八八、六下）

李处全　我爱五湖烟水阔，待扁舟，寻到揞机处。访媭女，共媭女。——《贺新郎·再和七夕》（一八九、六下）

程　泌　算汨罗醒处，元来醉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沁园春·读史记有感》（一九〇、三下）

楚国《离骚》，唐朝词学，未信芳尘□歇。——《喜迁莺·别陈新恩》（一九〇、四下）

程　垓　问故乡何日，重见吾庐。纵有荷纫芰製，终不似、菊短篱疏。——

《满庭芳·时在临安，晚秋登临》（一九七、三上）

吕胜己 《临江仙·同登裴公亭》（二〇五、八上）（已见上引）

卢祖皋 念《离骚》恨远，独醒人去，阑干外，谁怀古。——《水龙吟·淮西重午》（一九八、三上）

洪咨夔 扈江蓠，贯薜荔，制芙蓉。——《水调歌头·送曹侍郎归永嘉》（二二〇、二四上）

魏了翁 慨想二江遗迹，更起三闾忠愤，此日最为宜。——《水调歌头·虞永康筑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成，唐涪州赋水调歌，即席次韵》（二〇一、一下）

彼云云，谩自怨灵均，伤兰植。（自注：屈平子建愤世之不见知，《离骚》常以兰自况，而子建亦谓秋兰可喻，桂树冬荣。）——《满江红·次韵咏兰》（二〇一、二下）

石兰衣，江蓠佩，芰荷裳。——《水调歌头·管待李参政》（二〇一、四下）

更时把、荷衣芰制，从容平熨。云淡天空诗献状，竹深花静机藏密。——《满江红·和李参政惠生日》（二〇二、一下）

数初度庚寅，未来甲子，尽自宽闲。——《木兰花慢·许侍郎生日》（二〇二、六下）

《离骚》乡里住。恰记庚寅度。挹取芷兰芳。酌君千岁觞。——《菩萨蛮·江通判生日》（二〇三、一一上）

直自《离骚》国里，行到林间屋畔，万里入双眸。——《水调歌头·送蒋成父》（二〇三、一一下）

吴　泳 "书凭湖雁寄，手把江蓠折。""芳草鸣鹈鴂，野菜飞黄蝶。"——《千秋岁·寿友人》（二二〇、一八下）

郑　域 篱边菊，畹中兰，甘避芳尘不。——《蓦山溪·桂花》（二〇六、二上）

李　刘 好在灵均初度，唤起长庚佳梦，霜月照金罍。——《水调歌头·寿赵茶马》（二二四、四上）

汪　莘 《乳燕飞·汪子感秋，采楚词赋此》（二一八、一上下）（已见上引）

欲寄唐虞无限意，《离骚》都是相思曲。——《满江红·谢孟使君》（二一八、二上）

五柳爱寻王母使，三闾好作湘妃曲。——《满江红·自赋》（二一

八、二上）

寻渔父，问湘灵，拄杖斜阳里。——《蓦山溪》（二一八、二下）

秋风袅。湘君来了。一曲烟波渺。——《点绛唇·咏芙蕖》（二一八、三上）

孜孜地。访兰寻蕙。谁会幽人意。——《点绛唇》（二一八、三下）

寄语山阿子，何日出幽篁。兰衣蕙带，为我独立万寻冈。头上青天荡荡，足下白云霭霭，和气自悠扬。一阵东风至，灵雨过南塘。招山鬼，吊河伯，俟东皇。朱宫紫阙，何事宛在水中央。长望龙輈雷驾，凭仗箫钟交鼓，宾日出扶桑。我乃援北斗，子亦射天狼。——《水调歌头》（二一八、四下）

谁与玩芳草，公子未西归。天然脱去雕饰，秋水落芙蕖。发轫朝兮东壁，弭节夕兮两极，故国人踌躇。梦里不知路。南斗正扶疏。鸩不好，凤不利，忆三闾。算来何事，苦道岁晏孰华余。首拜东皇太乙，复次云君司命，高曳九霞裾。山鬼正含睇，慕我欲何如。——《水调歌头》（二一八、四下）

“周流天上地下，我马亦悠哉。”“被明月，佩宝璐，冠崔嵬。可怜幼好奇服，年老在尘埃。”——《水调歌头》（二一八、五上）

晞汝阳阿上，濯汝洞庭湖。——《水调歌头》（二一八、五上）

吴　潜　可怪底，屈子《离骚》，兰蕙独前席。——《暗香·东园梅花》（二二二、四下）

“景回计院行有日，约同官酌酒于西园，取吕居仁《满江红》词分韵以饯行色，盖反骚也。余得对字，就赋。”——《满江红题序》（二二二、八下）

赵以夫　听《关雎》盈耳《离骚》婉。——《贺新郎·次刘后村》（九、六下）

无奈熏风吹绿绮，闲理《离骚》旧曲。——《贺新郎·芝山堂下兰开双花》（九、七上）

听得长淮风景，唤起《离骚》往恨，杜若满汀洲。——《水调歌头·次方时父癸卯五月四日》（一〇、四下）

郑清之　休道三闾曾旧识，轻把木兰相对。延桂同盟，索梅为友，不复娇春态。年年秋后，笑观芳草萧艾。——《念奴娇·菊》（二〇四、一下）

王　迈　美人痛饮读离骚。因感秋英，饷我菊花糕。——《南歌子·谢送菊花糕》（二〇六、五下）

人物渺然，蕙兰椒艾，孰臭孰香。昔尹公和靖，与龟山老，虽同名节，却异行藏。——《沁园春·谨详和靖龟山二先生出处之节，求质正于西山真先生》（二〇六、七上）

留元刚　褰荇带，揞笋竹。披荷芰，餐椒菊。——《满江红·泛舟武夷，午炊仙游馆》（二〇六、九下）

赵君举　人有纫兰佩，云无出岫心。——《南歌子》（一〇、一〇上）

刘克庄　万卷星罗，千篇电扫，肯学穷儿事楚骚。——《沁园春·又答叶贤良》（二〇七、四上）

也不消颠怪，骑驎披发，谁能委曲，令鸩为媒。——《沁园春·吴尚书和作再答》（二〇七、四下）

送老三家水竹村。休休也，任巫阳来下，未易招魂。——《沁园春·答陈上舍》（二〇七、五上）

《念奴娇·菊》（二〇八、一上）（已见上引）

东皇太乙敕瑶姬。淡傅胭脂。——《汉宫春·红梅》（二〇七、八下）

且阁起庄骚，专看老易，课程尤省。——《转调二郎神·三和》（初和题云"余生日，林农卿赠此词，终篇押一韵，效嚬一首"。）（二〇八、八上）

向绛河濯足，咸池晞发。——《满江红·寿王实之》（二〇九、二上）

今似得，三闾公子，四明狂客。——《满江红·和实之》（二〇九、二下）

任天孙笑拙，女媭嫌直。——《满江红·和实之》（二〇九、三上）

殇子彭篯谁寿夭，灵均渔父争醒醉。——《满江红·和叔永吴尚书，时吴丧少子》（二〇九、三上）

麻与麦，俱成长。蕉与荔，应来享。有累臣泽畔，感时惆怅。——《满江红·端午》（二〇九、四下）

自和山歌，国风之变，《离骚》之裔。——《水龙吟·自和》（初唱为己亥自寿）（二〇九、六下）

灵均标致高如许。忆生平，既纫兰佩，更怀椒糈。谁信骚魂千载后，

波底垂涎角黍。——《贺新郎·端午》（二一〇、二下）

《贺新郎》（二一〇、三上）（已见上引）

“艾子萧郎方用事，怪先生、苦死纫兰芷。”“晚觉醉乡差快活，那独醒公子真呆底。”——《贺新郎·甲子端午》（二一〇、九上）

张　榘　楚湘旧俗，记包黍沉流，缅怀忠节。谁挽汨罗千丈雪，一洗些魂离别。——《念奴娇·重午次丁广文韵》（二一五、三下）

“三闾何在，把《离骚》细读，几番击节。蘺蕙椒兰纷江渚，较以艾萧终别。清浊同流，醉醒一梦，此恨谁能说。”“三叹灵均，竟罹谗网，我独中情切。”——《念奴娇·叠前首韵》（二一五、四上）

黄　机　“俨琼缨翠弁，气清芬只，珠幢绛节，光陆离兮。”“行吟湘水之湄。看云卷云舒无定姿。”——《沁园春·送赵运使之江西》（二三九、二下）

短棹拟携西子，长吟时吊湘灵。——《西江月·泛洞庭青草》（二三九、九下）

杨泽民　蟹鱼橘柚渐上市。是当年，屈宋乡里。——《西河·岳阳》（二二〇、一四下）

郭应祥　且同北海邀佳客，共向东篱看落英。——《鹧鸪天·重九》（二二五、三下）

黄师参　滴露研朱，披肝作纸，细写灵均孤愤篇。——《沁园春·饯郑金部去国》（二二六、五下）

赵长卿　午日熏风，楚词高咏，度遏云声脆。——《醉蓬莱·端午》（一四、二下）

未须收拾入熏炉，窗前细把《离骚》读。——《踏莎行·木犀》（一五、四上）

方　岳　《水调歌头·寿吴尚书》（二二七、二上）（已见上引）

天于我辈悠哉。纵作赋问天天亦猜。——《沁园春·和林教授》（二二七、四上）

绛老从头甲子，《离骚》几度庚寅。——《西江月·和郑省仓韵，因以为寿》（二二七、六上）

“呵护九关多虎豹，谁道去天一握。”“渺渺愁予初度也，山沍同云垂幕。”——《念奴娇·和君用》（二二七、八上）

《齐天乐·和楚客赋芦》（二二七、九下）（已见上引）

《瑞鹤仙·寿丘提刑》(二二七、一〇上)(已见上引)

“问月”——《哨遍题》(二二七、一〇下)

恐天问灵均未知此,又底用咸池重洗。——《哨遍·用韵作月对》(二二七、一〇下)

《虞美人·见梅》(二二七、一一下)(已见上引)

郭世模 “光风转蕙泛崇兰,漠漠满城飞絮。”“江北江南,灵均去后,谁采蘋花与。”——《念奴娇》(二二八、五下)

李昂英 斗了还休,倩渠衔寄,三闾角黍。——《水龙吟》(二三〇、四上)

赵孟坚 杜若满汀,《离骚》幽怨,鸥夷去国,烟浪遨游。——《风流子·清涵万象阁》(四、五上)

马廷鸾 把酒对湘浦,独吊大夫醒,当年皇览初度,饮露更餐英。服以高冠长佩,扈以江蓠薜芷,御气独乘清。谁意椒兰辈,从臾武关盟。哭东门,哀郢路,悄无宁。人世纷纷起灭,遗臭与留馨。一笑远游轻举,三叹道长世短,晦朔自秋春。洗眼看物变,朝菌共灵椿。——《水调歌头·檃括楚词答朱实甫》(二四七、四上)

排闷诗篇,浇愁盏酒,自读《离骚》自劝。——《齐天乐·和张龙山寿词》(二四七、四上)

李曾伯 把《离骚》读遍,椒兰荃蕙,奚敢及,众芳首。——《水龙吟·戊申寿八窗叔》(二四〇、二下)

谓有溪可钓,有田可秣,有兰堪佩,有菊堪餐。——《沁园春·庚寅为亲庭寿》(二四一、一上)

一餐湘菊,共赋芙蓉。——《沁园春·和广文叔》(二四一、二下)

大块赋形,皇览揆予,俾尔昌而寿。——《哨遍·和陈次贾为寿韵》(二四四、一上)

仿《离骚》览揆度新讴,空云鬻乌丝。——《八声甘州·借八窗叔韵寿之》(二四四、三下)

《满江红·和立春韵简云岩》(二四六、七上)(已见上引)

唤醒门前弧矢梦,钩月相辉初度。——《贺新郎·辛亥初度》(二四三、三上)

刘之才 怨抑难招,沉魄当年独醒。——《声声慢·五日》(二三五、一上)

吴文英 真姿凝澹,返魂骚畹。——《琐窗寒·玉兰》(二三六、八上)

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楚江沉魄。——《澡兰香·淮安重午》

（二三五、二四下）

《莺啼序》（二三五、二九下）（已见上文）

听露井梧桐，楚骚成韵。——《惜秋华·七夕》（二三五、三三下）

怅断魂送远，《九辩》难招。——《惜黄花慢·次吴江饯尹梅津》（二三五、三四上）

叶　润　《离骚》困吟梦醒，访台城旧路。——《莺啼序》（二五二、七下）

陈人杰　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诵山谷之诗，不觉喟然，因作思古人一曲，他时倘遇知己，无妨反骚。——《沁园春·题序》（二六一、一上）

"天问"——《沁园春》题（二六一、一下）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二六一、三上）

为修名不立，此身易老，古心自许，与世多尤。——《沁园春·次韵林南金赋愁》（二六一、五下）

南金又赋无愁。予曰，丈夫涉世，非心木石，安得无愁时，顾所愁何如尔，杜子美平生困踬不偶，而叹老嗟卑之言少，爱君忧国之意多，可谓之得所愁矣。若于着衣吃饭，一一未能忘情，此为不知命者，故用韵以反骚。——《沁园春·题序》（二六一、五下）

陈　著　应是南风湘浦正波涛。千古独醒魂在否，无处问，有谁招。——《江城子·重午书怀》（二五九、一七上）

周　密　《绣鸾凤花犯·赋水仙》（二五三、五上）（已见上引）

宝络风流，何如细蘂堪餐。——《声声慢·逃禅作菊桂秋荷，目之曰三逸》（二五四、四上）

酒醒未醒香旋消。采江蓠，吟楚招。——《明月引·赵白云初赋此词，以为自度腔，其实即梅花引也，因用韵以写幽怀》（二五四、八下）

愁多病多腰素消。倚清琴，调大招。——《明月引·养源再赋，余亦载赓》（二五四、八下）

"江蓠摇落江枫冷，霜空雁程初到。""楚山远、《九辩》难招，更晚烟残照。"——《征招·九日登高》（按此首与《明月引》二首并悼杨守斋词）（二五四、一〇下）

砚凉闲试霜晴帖。颂菊骚兰，秋事正奇绝。——《醉落魄·别洪仲

鲁》（二五五、三下）（案此周晋词）

刘辰翁 惟有我公荣。旁人笑独醒。——《菩萨蛮·题醉道人图》（二五六、七上）

叹魏阙心，磻石魄，汨罗身。——《行香子·叠韵忆古心公》（二五六、一二上）

“沉兰坠芷。想重整荷衣，顿惊腰细。”“但梦绕青神，尘昏白帝。重反离骚，众醒吾独醉。”——《齐天乐·和节庵端午怀弟》（二五六、二二下）

几度唤起醒累，淋漓痛饮，不学愁予句。——《酹江月·五日和存吾，时北人竞渡》（二五六、三〇下）

梦回酷似灵均苦。叹神游、前度都非，明朝重五。满眼《离骚》无人赋，忘却君愁吊古。——《金缕曲·壬午五日》（二五六、四八下）

“锦岸吴船鼓。问沙鸥、当日沉湘，是何端午。”“空泪落婵媛婆女。我醉招累清醒否，算平生、清又醒还误。累笑我，醉中语。”“忽惊抱、汨罗无柱。欸乃渔歌斜阳外，几书生、能办投湘赋。歌此恨，泪如缕。”——《金缕曲·五日和韵》（二六五、四九上）

钟情賸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摸鱼儿·甲午送春》（二五六、五二下）

醒复醒，行吟泽畔，焉能忍此终古。招魂过海风林暝，招得魂归无处。——《摸鱼儿·和中斋端午》（二五六、五三下）

陈允平 相思为谁兰恨销。渺湘云，无处招。——《明月引·和白云自度曲》（二五七、七上）

过揽桂褰蓉，纫兰采菊，独许寒梅。——《木兰花慢·丙辰寿叶制相》（二五七、一三上）

赵必瑑 已矣骚魂招不返，兰枯蕙老余香歇。——《满江红·和李自玉蒲节见寄韵》（七、五下）

蒲寿宬 江上事，寄蜉蝣。灵均那更恨悠悠。——《渔父》（二七七、二下）

李好古 听到三闾沉绝处，惨悲风、摇落寒江岸。——《贺新郎·僧如梵摘阮》（二六一、九上）

王沂孙 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醉蓬莱·归故山》（二六二、一〇下）

张　炎　《声声慢·为高菊墅赋》（二六三、三下）（已见上引）

“纵荷衣未改，病损茂陵，总是离索。”“楚魄难招，被万叠闲云迷着。”——《解连环·拜陈西麓墓》（二六三、七上）

“荷衣消翠，蕙带余香，灯前共语生平。”“天空水云变色，任愔愔山鬼愁听。”——《声声慢·送琴友季静轩还杭》（二六四、一上）

湘潭无人吊楚，叹落英自采，谁寄相思。——《新雁过妆楼·赋菊》（二六四、二下）

余音犹在耳。有谁识、醉翁深意。去国怀怀，草枯沙远，尚鸣山鬼。——《征招·听袁伯长琴》（二六四、五下）

《国香·赋兰》（二六六、二下）（已见上引）

《清平乐·题所南翁画兰》（二六七、三上）（已见上文）

此去山中何所有，芰荷制了集芙蓉——《瑶台聚八仙·为焦云隐赋》（二六七、四上）

缥缈波明洛浦，依稀玉立湘皋。独将兰蕙入《离骚》。不识山中瑶草。——《西江月·题墨水仙》（二六九、五上）

《祝英台近·题水墨兰石》（二六九、六上）（已见上文）

黄公绍　谁赋珠宫并贝阙，怀王去后去沉湘。——《潇湘神·端午棹歌》（二七二、四上）

蒋　捷　“湘漓云外，独醒何在，翠药红蘅，芳菲如故。”“生平惯受椒兰苦。甚魄沉寒浪，更被馋蛟妒。”“泝波同步。待月明洲渚，小留旌节，朗吟骚赋。”——《女冠子·竞渡》（二七五、二下）

醉兮琼瀣浮觞些。招兮遣巫阳些。君毋去此，飓风将起，天微黄些。野马尘埃，汙君楚楚，白霓裳些。驾空兮云浪，茫洋东下，流君往，他方些。　月满兮西厢些。叫云兮笛凄凉些。归来为我，重倚蛟背，寒鳞苍些。俯视春红，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晓，招君来至，我心伤些。——《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二七五、四上）

《高阳台·芙蓉》（二七五、六上）（已见上引）

陈　深　深谷修兰楚楚。续《离骚》、载歌初度。——《水龙吟·寿白兰谷》（二七六、八上）

晏　璧　恁了却残年，教人愧杀《离骚》。——《芭蕉雨·梅》（二七九、四上）

赵癯斋 功名事，不信朝鳞暮羽。九关虎豹如许。——《迈陂塘·寿监丞吴芹庵》（二八一、九下）

《续夷坚志》 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故宫台榭只荒丘。忍回头。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宋宫人玉真《杨柳枝》（二九二、四下）

梅　苑 堪吊独醒人，临泽国，袭清风，且咏《离骚》句。——《蓦山溪·咏梅》（一九三、六上）

附阿鲁威曲　折桂令　以《楚辞》、《九歌》品成

穆将愉兮太乙东皇。佩姣服菲菲，剑珥琳琅。玉瑱琼珥，烝肴兰藉，桂酒椒浆。扬枹鼓，安哥浩倡。纷五音兮琴瑟笙簧，日吉辰良，繁会祁祁，既乐而康。（《东皇太乙》）

望云中帝服皇皇，快龙驾翩翩，远举周章。霞佩缤纷，云旗暗蔼，衣采华芳，灵连蜷兮昭昭未央。降寿宫兮沐浴兰阳。先戒鸾章，后属飞廉，总辔扶桑。（《云中君》）

问湘君何处翱游，怎珥节江皋，江水东流。薜荔芙蓉，洛阳极浦，杜若芳洲。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何故夷犹。玉佩谁留。步留椒丘，忍别灵修。（《湘君》）

促江皋腾驾朝驰，幸帝子来游，孔盖云旗。渺渺秋风，洞庭木叶，盼望佳期。灵剡剡兮空山九疑。澧有兰兮，沅芷叶叶，行折琼枝。发轫苍梧，饮马咸池。（《湘夫人》）

令飘风涑雨清尘。开阊阖天门，假道天津。千乘回翔，龙旗冉冉，鸾驾辚辚，结桂椒兮乘云并迎，问人间兮，寿夭莫凭，除却灵均，兰佩荷衣，谁制谁纫。（《大司命》）

正秋兰九畹芳菲，共堂下蘼芜，绿叶留荑。趁驾回风，逍遥云际，翡翠为旗。悲莫悲兮，君远将离，乐莫乐兮，与女新知。一扫氛霓，晞发阳阿，洗剑天池。（《少司命》）

望朝暾将出东方。便抚马安驱，揽辔高翔。交鼓吹竽，鸣篪絙瑟，会舞霓裳。布瑶席兮聊斟桂浆。听锵锵兮，丹凤鸣阳。直上空桑，持久操弧，仰射天狼。（《东君》）

邀王侯四起冲风。望鱼屋鳞鳞，贝阙珠宫。两驾骖螭，桂旗荷盖，浩荡

西东。试回首，昆仑道中。问江皋兮，谁集芙蓉，唤起丰隆。先逐鼋鼍，后驭蛟龙。(《河伯》)

若有人兮含睇山幽。乘赤豹文狸，窈窕周流。渺渺愁云，冥冥零雨，谁与同游。采三秀兮，吾令蹇修。怅宓妃兮，要眇难求。援夜啾啾。风木萧萧，公子离忧。(《山鬼》)

按阿鲁威一作阿鲁灰，以泉州路总管入为经筵官，在泰定朝。详孙楷第《元曲家考略》。

附录三　《楚辞》琴谱举例

兹摘取《神奇秘谱》中《离骚》及《泽畔吟》两曲二三段以示例，并于其旁注出工尺，以供参考。

离骚

首段

第十段

埃風上征

虙妃結言

末段

臨睨故鄉

泽畔吟

首段

（一）遊於江澤 憔悴枯槁

（二）行遇漁父

末段

鼓

櫑而歌

段鼓櫑聲

入本調泛聲

屈原問渡

第壹段

第貳段

第叁段

第肆段

第伍段

第陸段

第柒段

第捌段

第玖段

別調悽涼

調法先以本調調定次緊五絃下一

徽散挑五名十勾三次緊二絃下一

徽散挑五大九勾二

漁父辭 凡四段

此篇乃屈原遭讒被放而作漁父蓋

古巢父荷蒉丈人之屬或曰亦原托

辭耳

第壹段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

[illegible]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illegible]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

[illegible]

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第貳段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illegible]

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

[illegible]

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

[illegible]

自令放為。

[illegible]

第叁段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illegible]

振衣安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

[illegible]

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第肆段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曲終

以上屈原《问渡》、《渔父辞》两曲，皆属凄凉调，采自《理性元雅》，《渔父辞》则与原词相配，盖依文叶声。是书明刊本，现极稀覯。此为友人拜纳博士自东京内阁文库影示者，而本文经已印成，特为附刊于末。

作者识

补 记

《图书集成》（《乐律典》一百四），列古琴弄名，有《吊三间》、《独醒操》、《离骚九拍》（原注陈康士撰）等，均属凄凉调。

元袁桷《琴述》云："蔡氏五弄，杨司农（缵）为精加细绎，皆张氏（按指张岩所传琴谱）所载。""今世琴调，清商号为最多。郭茂倩记古乐府琴辞，亦莫盛于清商。杜佑叙论雅乐，谓楚汉旧声，犹传于琴家，蔡氏五弄楚调四弄，至唐犹存。""越有徐理氏……其五弄与杨氏亦无异。……益知楚汉旧声，非杨氏所作。"（《清容居士集》四十四）袁氏力主宋末杨缵所传《蔡氏五弄》即楚汉遗声，以申《通典》之说（见卷一百四十六"清乐"条）。考《旧唐书·乐志》亦云："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新唐书·乐志》文略同。此均足为余说楚声当于琴曲中寻求之佐证。

南朝时相和三调，据技录所记，其使用乐器略异，平调无节，瑟调清调皆有之。至三调之命名，本与乐调有关，《魏书·乐志》载神龟二年，梁旧官陈仲儒奏依京房立准调，略谓："……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又依琴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百衲本《魏书》作"平调以宫为主"，与瑟调重，此据严辑《全后魏文》。）此说颇重要。知相和歌三调可以琴定弦。瑟调即以第一弦为宫，清调则以第二弦之商为宫，此殆清商一名所由昉也。于此足见相和调名与琴调之关系，其详容别论之。

附记

作者于1957年8月，代表香港大学出席在德国马堡举行之第十届汉学会议，本篇即当日提出之论文，原名“楚辞对于词曲音乐之影响”，兹改为今题，并重加补充修订，增入附录三篇。

饶宗颐记

《楚辞异文辨证》序

浦江黄灵庚先生殚十余年之精力，为楚辞异文之搜讨、比勘，著成《楚辞异文辨证》共十六卷，检书至千余种，迈超刘、闻诸氏，往往匡正姜书之失，尤为骚学界所共推服，其用心勤劬，业绩昭著，无待予之揄扬。余一向以为古书异文之繁赜，实为汉籍难读一大困厄，出土经典写本与今本之乖忤，马王堆之《易》，阜阳之《诗》，假借之夥，讹变滋多，世无刘向，孰从而正之。《楚辞》得夏侯灶墓残简，仅存《离骚》、《涉江》零句数字，遂使《骞公音》得擅其美，为可惜也！

异文处理，愚意须有所抉择与取舍，不徒炫博，明世类书援引，重床叠屋，苟非语涉肯要，何劳斠录！瑞安孙氏主芟剔蓁芜，诚校雠之典范。君不以立异鸣高，如力依据上下文义，订《九歌》扬舲之非是，良具卓识。《离骚》汉人尊之为经，王注保存汉师旧诂，后人肆逞臆之见，翻令旧束创痏眯目，窃以为《离骚》唐人引用，每作“楚辞”之代称，宜有人为纂义疏，先为长编，平停众说。以出土之文物，理旧闻之当否，绝学未稀，大业在望，君其亦有意乎？

庚辰饶宗颐时年八十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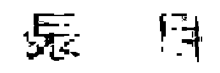
选堂赋话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目　录



小　引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古之为赋者，在德音九能之列。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堂庑之上，揖让之间，以微言相感，自有其实用之价值也。刘彦和云："登高之旨，睹物与情。"宋龚鼎臣《东原录》："赋者，缘物以成文，必辞理称，则彬彬可观。"夫缘物有作，荀况《蚕》、《云》之类是也；往往折衷于理，故文有其质。若乃兴情之制，则犹诗之缘情，而日趋绮靡，六朝俪赋，斯其极挚，《芜城》、《小园》，靡亦甚焉。降而下之，以赋为科举之习作，间且成散体之尾闾，《文苑英华》所收，读之殊难终卷，肤受不精，浸失旧观。现存论赋较早之书，有日本流传失名之《赋谱》，作于太和以后，分述句式之壮、紧、长、隔、漫、发、送等法门，唐人律赋作法，可窥一斑。五代赋集多至二百卷[①]，《永乐大典》"赋"字号只存二卷[②]，征引《大全赋会》，多属有明考试有关性理之作，亦赋之别格也。[③] 然明人拟古，鸿篇屡出，于以制割大理，羽翼风骚，亦甚有可观者，而世多忽视之。其时小学虽亡，赋仍间作，岂至皋文修补黄山，始成绝业也哉！[④] 何君沛雄，向从余问学，特致力于赋。既有志乎《全汉赋》

---

① 见唐圭璋《南唐艺文志》著录："江文蔚《唐吴英秀赋》七十二卷，出《宋志》；徐锴编《赋苑》二百卷，出《崇文总目》。"

② 即卷一四八三七及卷一四八三八。

③ 如盱江邹子益《圣人拟天地参诸身赋》。

④ 此反章太炎《辩诗》说。

之辑，复勼集诸家赋论，都为一帙，以便来学，而征及下走。余愧无诠次，偶有著笔，祇同目论，稽考史事，辄及赋篇。拉杂言之，馈贫而已；若云欲师斲轮，言其甘苦，则吾岂敢。

甲寅岁暮，饶宗颐识

赋者，古诗之流也。诗言志，赋亦道志，故汉人或称赋为诗。庄夫子《哀时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褒《九怀》云："悲九州兮靡君，抚昔叹兮作诗。"刘向《九叹》云："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文廷式尝举此三例以明赋亦可谓之诗，见《纯常子枝语》二十六。余谓屈赋《九歌》已云："展诗兮会舞。"[①]《九章》亦云："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展诗、赋诗，同以见志。此亦以诗代赋之先例，可补文氏之说。《汉书·艺文志》云："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楚辞》自屈之以下至庄忌、王、刘之流，俱为失志之赋，名虽曰赋，其旨仍无以异于诗也。

《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诗赋联言。注家谓："诗赋雅乐，《关雎》、《鹿鸣》之类。"乱即《关雎》之乱，二八指舞，此舞与乐并作也。如注说，此处诗赋指雅乐，是但指诗，而为偏称也。汉志诗赋略虽兼指诗与赋二类，然名称早已出此。

世之为文学史者，习谓《诗经》为北方文学，楚辞为南方文学，强分畛域，然陈良楚产，北学于中国。楚君臣赋诗，见于《左传》者，其例至夥。宣十二年，楚庄王引《周颂》。成二年，子重引《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子产赋《吉日》。昭七年，芈尹无宇引《北山》。昭十二年，子革引佚诗《祈招》。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沈尹戌引大雅《文王》及《桑柔》：楚人沐诗教者深矣。故屈赋中袭用诗句者不一而足。若《九歌·少司命》"援北斗兮酌桂浆"，此取之《诗·大东》"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也。《哀郢》："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此取之《诗·豳风·九罭》"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也。《九辩》云："窃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飡。"此取《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飡兮。"以此足见屈赋上承于《诗》，故曰："赋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自灵均

---

① 见《少司命》。洪兴祖注："展诗，犹陈诗也。"

唱骚，始广声貌。南国之文，虽自创新局，抑亦《诗》之流亚也。

王逸《招隐士序》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爱士，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诗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如诗之有大小雅焉。"自屈赋以来，为辞赋之分类总集者，似以此为最早。汉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又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谓之小山、大山者，叔师云犹言小雅、大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事谓之雅（《释名·释典艺》）。山之为言宣也（《说文》）、产也（《释名》），以山为书名，亦如三坟、九丘之比。坟，分也；丘，区也。以地理名书，古有此例。《淮南子》有《说山训》，高诱注："说道之旨，委积若山，故曰说山。"

循是言之，小山、大山，乃书名而非人名。若何点何胤，人称为大小山，此又别例。

汉志列严夫子赋二十四篇，在贾谊之前，即吴人庄忌著《哀时命》，尝为梁孝王客。《史记·司马相如传》："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忌子助有赋三十五篇。又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其人与枚皋同时。颜师古引《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从行至茂陵造作赋。"知西汉初年，赋以庄氏一家最盛。助又荐朱买臣，盖皆会稽郡吴人，并传习楚辞。《汉书·朱买臣传》："方会邑子严（庄）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武）帝甚悦之。"又《地理志》："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茂，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是楚辞之学出于吴，盖本自庄忌也。

最先为屈赋撰传者为淮南王。淮南王国都于安徽寿春，实为楚之故疆。溯楚自陈东徙寿春之郢，为最后之国都。近年出土铜器甚夥，若曾姬无恤壶，其铭文云："圣趄之夫人曾姬无恤，望安兹漾（指汉水）陲，蒿闲（间）之无鸥（匹）。""后嗣甬（用）之，职在王室。"情意缱绻，居然乐府古辞之遗响，犹挽歌也。蒿间盖即蒿里，杨树达读为"稾矢"，颇牵强。无鸥者，伤其无偶，与好逑义正相反。向来以无恤为人名，非是。余谓无恤乃成语，犹言"不吊"（《诗》"昊天不吊"）。此铭辞意富伤感，知蒿间、蒿里原指蓬蒿没人之葬地，不必泰山下也。[1] 淮南王居旧楚都之寿春，习于楚俗，故能为楚辞，理

---

① 吐鲁番出姚茛白雀元年帐券，有"归蒿里"三字（《文物》第19期，1973年10月）。崔豹《古今注》：《蒿里曲》"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西北边地，亦目葬地为蒿里。

有固然。《招隐士》之托意以招屈原，亦非无故也。

《汉书·地理志》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鞄）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此段极重要。知楚都寿春为楚辞萌芽之地，而吴又其传播之区，故枚乘撰《七发》，亦本于《骚》。乘与严忌均吴王濞之客也。《地理志》云："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盖目《骚》为赋，与《艺文志》称屈原赋正可印证。

楚辞以用兮为主要语词；马王堆三号墓《老子》写本，所有兮字均写作呵，如"渊呵似万物之宗"，与"呵亓（其）若冬涉川，猷呵其若畏四叟（邻），严呵其若客"。老子为楚苦县人。汉志苦县在淮阳国，淮阳都陈，顷襄王自郢徙此，汉初陈涉将葛婴尝攻下之。老子以呵为兮，正用楚言。《经典释文》河上本作渊旮，兮字下从曰。孔广森《诗声类》谓："猗、兮音义相同，猗，古读阿。"今《老子》汉初写本作呵，可证孔说。猗兮原皆为南音，《吕氏春秋·音初》篇涂山氏作歌："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此自南疆之旧曲，连用猗兮两助词，异形而实重声，均宜读为"呵"，岂所谓声曲折者非耶?[①]

《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征能为楚辞者，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汉九江本秦郡名（非今江西），地及淮南，亦楚之故疆。《御览》八百五十九："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老，每一诵，辄与粥。"其人老迈，殆楚遗民之余裔乎?[②] 宣帝喜其诵，则被公必能为楚声，如隋释道骞之善读者。隋志称："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则汉人之习楚辞，乃祖被公之音可知矣。刘向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则楚人之赋，原有其声腔，宜于唱诵，有如后世曲之有弋阳腔、黄梅调乎。宣帝时被召诸高材皆辞赋家，汉志刘向有赋三十三篇，又有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汉中都尉华龙赋二篇，又车郎张丰赋三篇，注张子侨子。是子侨及子丰均能赋。子侨与华龙俱见《萧望之传》，别作子蟜；望之

---

① 太炎尝举《晋语》惠公葬时之诵，威兮怀兮，猗兮违兮，皆曲折咏叹之词，非有实义。言其逗留曲折，非韵所持，固诗之特异者。然则《老子》中此类词句，未尝不可视为战国楚人之曲折也。

② 被公向不知为谁。日本楠山春树谓有四人名被，在淮南左右，即茅被、周被、伍被等，尚乏确证。

亦有赋四篇。刘向又编集《楚辞》，为《天问解》(见王逸《天问叙》)。楚辞之兴，宣帝提倡之力独多，而辞赋作者亦于斯时为盛。刘勰《诠赋》篇所以有“繁积于宣时”之语也。

汉初简牍有楚辞写本。安徽阜阳残简《离骚》只存四字，又《涉江》存五字，文残辞“□槖猗（兮）北辰游”[1]，以“猗”为“兮”。

诗赋略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夫词之闳衍，实出于庄生之卮言与寓言，故不持一端之觭见，为孟浪之语，相待而两行，故因以曼衍，而以寓言为广。《高唐赋》李善注：“此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登徒子好色赋》，此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假设其事，即寓言之为用也。《子虚赋》之区分其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其高、其埤、其上、其下，则齐物之洼者、污者、前者、随者，导其先路；而《招魂》之天地四方，亦其滥觞。自非区其性质方向为言，则其辞何得闳衍而环玮？卮言之施于赋，而篇幅遂弥富矣。庄生云：“振于无竟，而寓诸无竟。”故终不免于滥。或曰庄生书西汉未盛行，余谓枚乘《七发》，为太子奏方术之士，举庄周、魏牟为首，岂得谓赋家未沐其膏泽也哉？刘勰云：“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缅也。”《周礼》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六辞者：祠、命、诰、会、祷、诔。后世文体可追溯焉。而词者又人神交接之辞；《说文》：“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既曰多文辞，则有长篇之祝辞可知矣（秦简有马祭祝辞）。古者卜祝异职，史迁云：“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卜掌卜事，而祝以文辞事神。今殷墟甲骨出土数万片，皆卜者贞问之语，其祝者之辞则罔见，殷人之文学，宜存于祝辞；而祝辞书于典册，卒归澌灭。《殷契后编》两云“其品司在兹”（《综类》三一三），品司殆即品词也，惜其词已亡。《招魂》云：“工祝招君。”盖楚巫原有招魂之制，存于民间，宋玉特连缀成篇，故曰祝辞之组缅也。

《招魂》：“帝告巫阳，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命难从。”五臣吕延济曰：“阳对天帝之招魂者，乃掌梦官之主也。”是古必以掌梦之官主招魂也。《周礼》夏官占梦：“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以除恶鬼。驱鬼必有文辞，汉世刚卯为韵文，而中黄门倡，侲子和，呼十二神以追寻恶凶（见《续汉书·礼仪志》）皆其类也。故东方朔有骂鬼之书，而王延寿作《梦赋》，乃叙梦中鬼物，备极恐怖；其所取

① 《文物》1983（5），23页。

材，必自黄门振子之咒辞，及西汉“执不祥，劾鬼物”诸篇（是书共八卷，见汉志）。延寿文颇为西儒所激赏，故述其源流如此。

《天问》云：“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古诗十九首》：“三五蟾兔满。”“四五蟾兔缺。”少室石阙铭图像，亦月中有兔与蟾蜍共见。王充《谈日篇》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归其说于儒者。张衡《灵宪》：“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其数偶。”天文家亦以为言。蛤指蟾蜍也。今观汉初马王堆盖棺之图，月中有蟾、兔俱见，实为二物，知此说渊源甚远，不始于纬书矣！足正闻一多之说。庾信《象戏赋》：“阴翻则顾兔先出，阳变则灵乌独明。”乌兔正分指日月也。

扬雄《反离骚》，朱子极加诋諆。方望溪则谓吊屈之文，无若反骚之工者，其隐痛幽愤，视贾、严犹若过焉。知雄之言虽反而实痛也（《望溪集》五）。贾谊经长沙，为赋以吊屈原；至晋元帝时，庾阐补零陵太守，入湘川，为文以吊贾谊，其辞若兰生而芳，玉产而洁（见《晋书》九十二《文苑传》），则又颜延之《吊屈文》“物忌贞芳，人讳明洁”所袭用者矣。

班孟坚之为《两都赋》也，极众人之所炫耀，折以今之法度。故西都尽铺陈之能事，盛夸长安之制，东都则陈太清之化，述法度之宜。其言曰：“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李善注引《淮南子》说之。按《管子·内业》云：“监于太清，视于太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孟坚直用其语。房玄龄注：“太清，道也。”此太清亦即太素，汉志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东都赋》云：“昭节俭，示太素，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又云：“相与嗟叹玄德。”善注引《尚书》：“玄德升闻。”按《老子》：“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新出《黄帝经·法中大分》章云：“王天下者有玄德。”盖谓太清之世，无为之至治也。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章帝）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迁都，欲令车驾迁远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猜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章怀注：“章帝时有神雀等瑞。”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王景因神雀而进《金人论》，必在是时，非章帝之世。班赋所谓天人合应，以发王明者也。其《金人论》惜乎不传，金人疑即浮图金人。永平之世已有求法之传

说，北齐王琰《冥祥记》载明帝梦见神人身黄金色，项佩日光，其事亦见《后汉纪》："永平八年诏楚王英论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范书英传》）张衡《西京赋》亦言："展季桑门，谁不能营?"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此类梵译名词，已见于永平八年之诏中。则王景所作《金人论》，殆与佛教传入之事有关，惜此文不传，否则必大有裨于佛教史也。是时神雀之颂，班固、傅毅皆有文章，当在永平十七年也。若杜笃《论都赋》，原文备载于《后汉书·文苑》本传，其赋云："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对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合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埳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濇，曷足以居乎万乘哉!"明在建武十九年，证之《光武纪》："建武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其事正合。《两都赋》之作，其作代向来不可确知，范书本传系于固为郎之后。今以《东都赋》遂绥哀牢，开永昌一事证之，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夷哀牢内附，置永昌郡。[①] 知《东都赋》之成，必在永平十二年之后，谅在十七年间乎？当与王景上《金人论》相去不远。高阆仙《李注义疏》于《两都赋》写作背景，未遑细考，爰尔缕述之。

魏晋尚名理，如裴顾《崇有论》，影响所及，赋家亦主核实，左思其例也。思序《三都》，谓："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而成公绥以为"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于是为《天地赋》，"俯尽鉴于有形，仰蔽视于所盖"。仍取征实之学。又皇甫谧为左思游扬，亦病"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挚虞亦以"古诗之赋，以情文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言赋有四过（《全晋文》五十三）。西晋之赋，重于事形，而灭于情义，盖一反建安以情纬文之旨，亦时代使然。世之言赋评者，多未援成子安之语。子安每与张华受诏，同为诗赋，卒于泰始九年（《晋书·文苑传》只录其二赋）。盖晋开国之文士，宜在太冲之前列，知人论世，有不可不知也。

六朝长赋，世推大谢《山居》、庾子《哀江南》为巨构。然张缵之《南征》（见《梁书》）、沈约之《郊居》，正相伯仲。《山居》有自注，而颜之推之

---

① 《郡国志》作永平二年，分益州置，实脱"十"字。

《观我生赋》亦自著事实，片言短记，尤有裨于考史。如记台城陷，梁武曾独坐叹曰："侯景于文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弃城逃窜，是一百二十日，弃（盖）天道纪大数，故文为百日。然后知《哀江南赋》所谓天道周星，谅亦指此耶。谢赋区岩栖、山居与丘圆、城傍四者之异，故唐吴筠撰《岩栖赋》，以阐其意，陆龟蒙作《幽居赋》，则以别于沈休文之《郊居》。谢赋自注详于山川，尤有助于地理，惜颜谢两篇皆有缺文，如谢赋于"远西"下缺字至四十四。谢意在废艳辞，存深意，去饰取素。注云："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与其诗"道以神理超"，"理来情无存"，可相证发。其赋云："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而终之以"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虚远。事与情乖，理与形反。既耳目之靡端，岂足迹之所践"，则仍居之未安，而资之不深，是以只成近虑浅智而已，非真能灭人事而绝迹云峰，不免朝市之累，谢固不失有自知之明也。

左太冲《三都赋》以魏为正统，薄蜀陋吴以尊魏，正所以谀晋也。自习凿齿之论起，宋人竞为新说，扶汉黜魏，故宋王腾撰《辨蜀都赋》（文见《赋汇》卷三十二），讥左思不顾正气之沦溺，而为申论蜀之横被狂抑之所由，致辨于情理，读左赋者，宜三复其言。

世讥左思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见《世说》注引别传）。按洛阳出土左棻墓志记："父熹，字彦雍，太原相，弋阳太守。"可订史云"父雍"之讹。史称棻拜修仪，志称贵人。隋志著录《左九嫔集》四卷。棻于泰始八年拜修仪。《文馆词林》六五二引左思《悼离赠妹诗》："峨峨令妹，应期挺生。"张溥百三家不收左思。于荀公会（勖）集题辞云："江左文士，盛谈茂先散珠，太冲横锦，若二荀之流，忽而不言；不几乘大辂笑椎轮乎？"言下颇有不平。思与挚虞，同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挚为皇甫玄晏高弟，思赋亦乞玄晏为序，引以为重，非偶然也。

隋志《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水经·淄水注》、《文选》二十八注均引左思《齐都赋》注。知《三都》之外，别撰有《齐都赋》，传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在《三都》前。"《文选集注》本《三都赋序》下注："陆善经曰：旧有綦母邃注。"又若干句下有"綦母邃曰"。两唐志有綦母邃《三京赋音》。按卫权《三都赋略解序》称：为序者，太子中庶子皇甫谧。《晋书》谧传征为太子中庶子，在武帝咸宁二年，谧有高名，晋初累征不起，又曾就帝借书一车。今皇甫谧及刘逵注载在《文选》，刘逵及卫权序在《晋书》，

皆非苟作。卫为楷子，字伯舆，贵妃兄子，汝南王亮以为尚书郎。[①] 裴松之注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粗有文辞。至于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不合传写也。见"卫臻传"。权，陈留襄邑人。[②]

又《世说》注引《左思别传》："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西州高士；挚仲治（洽）宿儒知名，非思伦匹。"按挚虞于赋亦有所见，《艺文类聚》五十六引《文章流别论》一段甚长，述赋有四过："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挚虞赋说可与其师玄晏比观，与太冲同主征实者也。思造张载问岷蜀事者，盖载父收，蜀郡太守。载于太康中至蜀省父，经剑阁，因作铭。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益州名书录》引益州学馆记成都石室图书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此人向来失考，当即载父之张收也。

陆士衡《述祖德赋》云："西夏坦其无尘，帝命赫而大壮。登具瞻于太阶，濯长缨乎天汉。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观。"西夏指蜀，此谓陆逊猇亭之胜。此文见《艺文类聚》，而本有误作我衣者。"戎"、"我"形近而讹，姜亮夫撰陆机及张华两年谱，均谓张华解衣推恩及于士衡，盖为误本所累，亟宜订正。双梧书屋本《历代赋汇》外集此赋亦作"戎衣"，不误。

徐摛赋篇，《艺文类聚》引其《冬蕉卷心赋》四句云："拔残心于孤翠，植晚玩于冬余。枝横风而悴色，叶渍雪而傍枯。"颇觉奇警，传称其好新变之体，此即宫体所由昉也。

简文《与湘东王书》，称当日作者，"有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辨，亦成佳事"。士简即吴张率。《梁书》录其《河南国献舞马赋》。其传称："《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文者，并补作之。"可谓好事。士简又著《文衡》十五卷，使其书能传，不让刘彦和专美于前矣。升逸即周舍。

萧子显著《鸿序赋》，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比之孟坚。其自序谓为文"须其自来，不以力作，而为诗赋，《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又称："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物色之感，萌于兴会，佳句忽来，若有神助，不捉住即飞去矣。子显可谓深知其中甘苦者。

---

① 《世说》注引《左思别传》说，非，严可均已辨之。

② 按或误以为瓘，见《卫觊传》，乃河东人。

萧选于赋分类中有物色一目，俞曲园深诟病之，谓“风月雪赋之物色，义既不通”；不知彦和《文心》有《物色》之篇，即昭明之所本也。

为释氏作赋者，似始魏高允《鹿苑赋》，见《广弘明集》。晋时彭城王纮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成帝下其议，太尉司空蔡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于义者有疑焉。”于是遂寝，事见《晋书》七十七谟传。道明称佛者夷狄之俗，此即韩昌黎以佛为夷狄之一法之所本。蔡亦辟佛，世但知有韩而不知有蔡，可叹也。若高允之赋，盖为北魏献文帝作。帝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志存淡泊，移居北苑崇光宫，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释老志》详焉。允赋称其“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盖指此也。帝建永宁寺于平城，浮图高三百尺。郦道元谓为“工在寡双”者也（《水经注·漯水篇》）。此鹿苑乃在山西者。余向日旅印度，尝临鹿苑，残甃废塔，有僧徒阒其无人之叹矣。

《文选》孙兴公（绰）《游天台山赋》，范荣期称掷地金声者也。“泯色空以合迹，消一无于三幡”句下，李善注云：“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观三也。言三幡虽殊，消令为一，同归于无也。”又引郗敬舆（超）与谢庆绪（敷）书云：“近论三幡诸人，犹多欲既观色空，别更观识，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观，于理为长。然敬舆之意，以色、空及观为三幡。”郗超为支遁信徒，盖本道林之说。《弘明集》王该《日烛篇》云：“今则支子特秀，领振玄标，一言发则蕴滞披，三幡著则重冥昭。……孙濯流以逸契，咏《邃初》于东皋，何深味以栖素，轻大宝于秋毫。道风之所扇荡，深连之所消遥。才不难则贤不贵，愚不笑则圣不高。”孙殆指孙绰乎？超著见陆澄《法论目录》，有《论三行》，即三幡之义也。孙称支公于王逸少，谓其拔新领异，盖夙所服膺者。

《晋书·庾敳（子嵩）传》，录其《意赋》，云：“以豁情，衍贾谊之《服鸟》也。”此盖《文心》所谓致辨于情理者流。其辞曰：“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从性分言之也。“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则庄生知天地为稊米之义。从子庾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机悟之言，足窥玄致。东海王越冀其有

吝，斅醉答："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其外物知分如此。

明汪芝《西麓堂琴统》云："宋玉负才放志，不协于时，感秋气而有悲哀之叹，后人因被之徽轸。"（《琴曲集成》，1211页）自远堂、天闻阁诸谱均有此曲。此后人理《九辩》之秋声以入琴也。自潘岳《秋兴赋》檃括其语，赋家赓作，东晋曹毗、梁元帝、宋陈普、明冯时可俱有《秋兴赋》。南齐褚渊有《秋伤赋》。元帝云："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直是"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荡妇秋思赋》）一类句法也。晋夏侯湛赋秋可哀，李白赋悲清秋，未若李颙（充子）之赋悲四时，则真淮南所谓木叶落长年悲者矣。明祝枝山《知秋赋序》："立秋其夕顿凉，不俟一叶。"感淮南之论，则有取于一叶落天下知秋之义；知秋而不悲秋，亦秋兴之余韵也。

庾信《春赋》类七言诗。元帝集中《春赋》句云："苔染池而尽绿，桃含山而并红；露雹枝而重叶，网蒙花而曳风。"与庾句："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可相媲美。倪璠谓此梁朝宫中，子山创为此体，然齐萧悫已有《春赋》，亦五七言句相杂，如"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分明为子山"二月杨花满路飞"所祖。悫字仁祖，梁上黄侯晔之子，北齐天保中入北，工于诗咏。其"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为知音所赏，见《北齐书·文苑·颜之推》附传。

向论敦煌曲与孝子之关联，未见梁武之《孝思赋》也。《广弘明集》二十九载之云："导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无已。"诚至性之文。"无一息而缓念，与四时而长切"一段，不啻感四时之赋矣。诵"寒冰已结，寒条已折，林飞黄落，山积白雪"诸句，令人陨泪。此赋太常卿刘之遴尝为注，道宣不载，殊为可惜。

庾信《象戏赋》，盖入周后武帝天和三年帝制《象经》成，王褒为注，信则进赋揄扬。《唐书·吕才传》周武帝《三局象经》，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即是书也。

杨敬之茂孝《华山赋》，气势浩瀚，似三峰之积仞，若黄河之奔流。中间形容众山之状诸"者"字，学《齐物论》引喻繁富，尚无奇者。其赞曰以下累用廿二个"矣"字，不必掷地，已成金声，足叹观止。无怪韩愈亟称叹，而李德裕之咨赏也。敬之之称项斯，世传为美谈，然此赋得昌黎游扬，士林一时传布（见《唐书》一百六十本传），后人则鲜知之。赋中云："蜧蠓纷纭，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杜牧作《阿房宫赋》："蜂房水涡。"即用其语。故洪迈以为杜即摹仿杨作（《容斋五笔》卷七），然小杜造句铸辞，实

取资多方。刘克庄云："余读陆傪《长城赋》：'千城绝，万城列；秦民竭，秦君灭。'不觉失笑曰：'此岂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欤?'傪名辈在樊川前。"（《后村大全集》一百七十五）袁枚则以其"开妆镜也，弃脂水也"，乃出自汉边韶《塞赋》。[1] 边氏连用十"也"字，皆四字句式。若："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其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象日月也。"牧之袭其法，连用六"也"字，神明变化，青出于蓝矣。宋王楙又谓："牧之盖体魏卞兰《许昌宫赋》。"[2] 然卞赋平铺，只末段用三字句，稍见错综有致，余文绝无兔起鹘落之势，远非杜比（卞赋见《赋汇》卷七十二）。刘后村尝指出贾谊《过秦论》"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诸句，语本《吕览》"鉏耰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称贾生可谓善融化者（《大全集》一百七十八）。按语见《仲秋纪·简选》引世有言曰，而讥其为不通乎兵家之论者，是殆战国末年为兵家所驳之恒言。其末段"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以下专用"也"字叠至七次，行笔可谓浩乎其沛然矣。而《过秦论》结语，"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以下，亦用"也"字，叠至九次，显自《吕览》变化而来。而《阿房赋》末段议论，叠为比较句法，用"多于"者五次，"灭六国"句以下，专用"也"字收束凡六次，则学《过秦》痕迹犹历历可睹。杜牧喜兵书，又习为纵横家言，此赋以兵家纵横之笔出之，故奇险旷逸，一洗往辙，为《樊川集》中第一奇文（明季朱一是评语）。东坡为之读遍，即再三咨嗟，至于夜分不寐（见《道山清话》），非东坡之神解，无此鉴赏力。而此文分明得力《过秦论》，范蔚宗所云"笔势纵放，实天下奇作"者，惟此赋足以当之。姚铉《唐文粹》选赋至精，此篇列于第三，于宫殿中特立"失道"一目，以为千秋龟鉴，可云有识。

柳子厚撰《牛赋》，语皆四言，与《瓶赋》为体相同，盖仿扬子云者。赋云："牛虽有功，于己何益?"以牛自喻，言牛虽有耕垦之劳，利满天下，而莫以自保，不免穿缄縢、实俎豆之用，亦自伤也。东坡在海南尝录此赋，以遗琼州僧道赟，并书其后，谓："客自高州载牛渡海，海南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笑其以烧牛肉易香供佛求福，何福之能得?则悯杀生之愚。据年谱，苏文作于哲宗元符三年三月十五日，是月放鱼于城北作记，其书此赋以贻僧人，意岂有同于此欤?

---

① 《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边赋见《赋汇》一三〇。

② 《野客丛书》二十四。

则与子厚用意不同。梅尧臣有《问牛赋》，乃感汉相丙吉之事，“恐天令之愆错”。然后世“我自我，物自物，天自天，人自人”，已不能喻此义，梅赋慨乎言之。“故宫博物院”有宋人水墨画《问喘图》，拖尾有王逢（原吉）跋，可与梅氏赋参看。以牛入赋，尚有陈臧道颜《驶牛赋》断句（《赋汇》一百三十六），云：“价齐骥騄。”则咏牛之驭车。《吕览·勿躬》称：“王冰作服牛。”说者谓即卜辞之高祖王亥。《慎大览》云：“武王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不复乘，牛不复服。”此服牛即驶牛，渊源甚远。余尝行身毒各地，见牛与人骈肩，闲步过市，牛虽服箱耕垦，操作最劳，而受人之崇奉也亦最隆。身毒梵书传为瞿频陀所造，频陀训智，而译曰瞿者，谓牛也（见《翻梵语》）。身毒之牛如神，与柳州、琼州相去不可同日而语，使子厚居彼土，当无不平之鸣，而《牛赋》亦不庸作矣。

唐皮日休《上忧赋》，以为南蛮不宾，天下征发，民力将弊，因为赋以见志云：“既忧其身，须忧其时。”言臣忧者凡十七八，悃愊恻至，诚范希文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者，欧阳子言行天下，未有一人能如李习之之忧，使其见日休此作，则其忧宜加甚矣。呜呼！唐之文人能为社稷忧者，不可一二数，终无救于覆亡者，讽谕不行，赋于何有，可胜叹哉！

陆甫里《求志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圣人之志，莫尚乎《春秋》。得文通陆先生所纂之书，伏而诵之，作《求志赋》。”叹其“用千载之遗法，发一辞而可判”。是龟蒙亦宗陆元冲为《春秋》之学者。陆淳，河东人；殁后，门人谥为文通，乃柳子厚之师。淳著《春秋纂例微旨》，子厚作《陆文通先生墓表》，章孤桐于河东此文颇多阐发，惟未及甫里是篇。盖唐季为《春秋》学多祖文通，不独子厚而已。赋亦有关于经学，此其一例也。

《赋苑》八卷，“中央图书馆”藏，不著编撰人。前有蔡绍襄序云：“李君持万瑶（宝）之丰襟，洞千秋之朗鉴。吐吞云梦，走荀贾于笔舌之端；囊括寰区，役马班于雌黄之什。灵蛇握而隋珠和璞，已镕象于一腔；武库储而东壁西昆，欲大观于亿禩，乃以钊剧理楚之罅，广拾名山秘府之遗。凡六朝以前，暨荀宋而后，厘为上下八卷，名之曰《赋苑》。”此书据其凡例云：“人因世次，文沿人集，故不足分门别类。自甲午岁始辑，积至捌佰柒拾伍首。”录赋始荀况而讫隋萧后。《四库提要》（三十九）著录为纪昀家藏本，谓但称曰李君，不著岁月。相其版式，乃万历以后书也。按据《千顷堂书目》，李鸿《赋苑》，字渐卿，吴人。

《赋海补遗》二十卷，明周履靖等编，亦“中央图书馆”藏。首页题《赋海补遗》卷之一，次行题沛国子威刘凤，嘉禾逸之周履靖，四明纬真屠隆同辑。次行题金陵书林叶如春绣梓。其下接周履靖题识，文云：“余观作赋，始祖风骚，创于荀宋，盛于两汉。迄至魏晋六朝，贾曹傅陆之俦，纵横玄圃；司马江王之辈，驰骋艺苑。浩如河汉，灿若斗星。惭余管见，不能遍阅，仅纂题雅词玄句寡意长者七百余篇，名曰《赋海补遗》。少俟暇时披览，倚韵追和，无暇计其工拙也，观者幸毋大噱。周履靖识。”全书类别，凡分天文、时令、节序、地理、宫室、人品、身体、人事、文史、珍宝、冠裳、器皿、伎艺、音乐、树木、花卉等，共二十部。履靖，浙江嘉兴人，以辑《夷门广牍》著名，此书四库未著录。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赋珍》八卷，明刊本。题芝山施重光庆征甫辑撰。起成公绥《天地赋》，讫王元美《二鸟赋》。前有延陵吴宗达序，有“清仪阁”印，盖为张廷济旧藏。

《选赋》六卷，郭正域评点，吴兴凌氏“凤笙阁”朱批本，末附选赋名人世次爵里；《文选》赋部分之单刊本，颇便读者。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为万历癸未进士。礼部侍郎，著有《黄离草》，论为文不可专学一家。[①]

日本存《赋谱》一书（五岛庆太氏藏），论赋句法，有壮紧、长隔等式。小西甚一著《文镜秘府论考》曾引用之。韩国有《朝鲜赋》一卷，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四）。

又日本慈觉大师将来外典，其中有《诗赋格》，及《丹凤赋》。《通鉴》二一三突骑施人贡，玄宗宴之丹凤楼，胡注：“东内大明宫正门曰丹凤门也。”

以地域辑录赋集，如同治十二年杨浚集《闽南唐赋》六卷，收十二家，一百四十四篇。始陈诩、林藻，至徐寅、黄滔、韩偓，资料大都辑自《全唐文》、《赋汇》及《英华》。自序称：“调吻不叶，有如瘖疠；选典失均，又如跛躄。”深中律赋之病。

自扬雄为《反离骚》，此例一开，后此为赋以反案为文者比比皆是。唐皮日休作《反招魂》，金赵秉文为《反小山赋》，明徐昌业为《反反骚》，清汪琬作《反招隐》，皆步此涂辙。

江淹赋《邃古篇》，颜之推亦作《归心篇》，于天道回旋，多所诘难，竞仿屈子，驰骋其词。若夫黄泉罔极，坤维谁系，尚无人设问。陈石遗欲撰

---

① 明陈山毓有《赋略》一书，已佚。

《地问》而未遑，著其说于《宋诗菁华录》中王逢原《原蝗篇》后，谓："逢原有此才，恨不起九原，使操笔赋之。"比岁文章之业，江河日下，世无逢原，为之掷笔三叹。

况蕙风谓李白《惜余春》、《愁阳春》二赋，烟水迷离，举以比证词有事外远致之旨（见《词学讲义》）。谪仙浸淫齐梁，会心不远，往往郁伊易感，俯仰难怀。乐府与赋，皆异曲同工，不独此二赋也。

明人以赋题画，若陆治《练川草堂图》，为睢阳朱继甫作，乃有沛彭年（孔加）之《练川草堂赋》，现藏士林，允称剧迹。

宋储国秀作《宁海县赋》，其序曰："孙兴公作《天台赋》，信耳闻而任臆度。宁海其东麓也，事或湮没而弗著，独一贝邱存旧名，而临海天台交有之莫订其实。余家宁邑盖五世，其山川里社之所隶，人物土产之所钟，有亲见，非剽闻，有谂知，非臆度也。"此纯为征实之赋，固可助兴公之遗，然"其引而申之，不能极美，触而长之，不克尽丽"（借皇甫谧语），则读者又不能无憾焉。岂宋人之赋，则而未丽，自与汉人之丽则、丽淫者殊轨也欤？

祝枝山希哲以狂草名噪朱明，著书满家，所著《兴宁县志》，近颇流传，其赋尤称大家。若《大游赋》长逾万言，古今罕敌，余如《萧齐求志赋》、《栖清赋》，亦清警可诵。

黄山谷题跋记王右军书《文赋》，褚遂良临之。唐陆柬之行楷书《文赋》，今存故宫，李倜跋称其笔法正自兰亭来，揭奚斯许其有晋人风格。

赋以海外风物为题材者，晋殷巨有《奇布赋》，作于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镇作南方，大秦国来献火布，盖即 Asbestos 也。去魏文撰《典论》为时不远；《典论》尝镌诸石，力斥火浣布之不可信，嗣乃刊削之。张华《博物志》卷二《异产》引《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则此布汉世有献者，又在巨之前矣。

珠崖自汉已入中国版图，《汉书·地理志》谓"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是也。明丘浚为琼人，乃作《南溟奇甸赋》以夸耀之，谓："年有八蚕之茧，岁三穮以常穮。"其丰收一如暹罗也。湛若水以正德八年正月奉命往封安南王，至其地，因撰《交南赋》，以存故实。朱舜水于丁酉三月在越南供役，作《坚确赋》，其句云："确则繇坚而致，坚不能并确而陈。"忠耿之情，跃然纸上。又明陈乃玉为《噶喇吧赋》，其句云："原夫永乐初登，舟遇彭兄（即彭亨，在马来半岛）之山；地生金铄，人指麻衣之洞。"（原注逸之勿里洞，即麻逸）"彼文岛（指 Muntok）无文之可羡，寔叻（原注国名，即新加坡）

少寔以堪扬。庆磐石之安，落落山居，亚齐（在苏门答腊北部）文身而跣足；收鱼盐之利，鳞鳞水厝，暹罗亚答与胶章（即茭章 Kuchang，可作席）。”文载《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噶喇吧，即今印尼耶加达也。梅县罗芳伯于坤甸东万律撰《游金山赋》，其句如："日气熏蒸，草木曾无春夏。”“晨昏淋浴，周身雨汗交流。”文虽庸近，自是写实之作，见林凤超编《坤甸历史》。金山指东万律山，因产金矿著名。上举诸赋，皆咏南裔海外邻邦，虽非杰构，亦足为考史之助。

琴之有赋，滥觞甚早。汉志已有《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刘向有《雅琴赋》，傅毅、蔡邕皆继而有作，至嵇叔夜叹观止矣。唐人律赋，张隋之赋无弦琴，吴冕之赋昭文不鼓琴。黄滔之赋戴安道碎琴，均别出机杼。余尝为《寥天一阁沙砾琴赋》，序之曰："蒙夫以谭嗣同琴号沙砾，有铭曰寥天一阁者见假。感其遭运遇于领会，同嵇生之尸化，遂为赋以悼之。”其辞曰："纹裂春冰，轸销夏绿。神韫龙宫，生譬蛇足。忍死须臾，委命寸木。魂夺猗兰之操，泪续湘妃之竹。虞渊顾影，运会何速？山鬼夜鸣，秋风野哭。一弦一柱，世短意多。方出沙砾，遽泣铜驼。且捐净土，甘冲网罗。重阴难改，尚寐无吪。仁者之言，惑亡理胜。妙声未绝，法身先证。宁异鷇音，呜呼谁定！唯兹旦宅，聊比昆峰。前毁者光泽，后凋者长松。生知倚其神变，县解托乎高踪。一人寥天，顿萌生意。坤维罔极，乾阳无死。六合同声，八荒一指。浑沌非无可凿之姿，金刚有常不毁之理。皮骨纵落，真实在迹；志士怛化，畴与论此。感瑶山之丛桂，每摧折于芳菲；抚兹桐而奏曲，长寥亮而不亏。超六人以韵畅，配三仁而心归。溯玄津之重枻，闵遗响于孤徽。”按“浑沌非无可凿之姿”，语见《北齐书·文苑传序》。“昆峰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先折”，见《祖鸿勋传》。览者详焉。

枚叔《七发》，章太炎谓乃解散《大招》、《招魂》之体而成。章实齐谓七体肇自孟子之问齐王，似均未核。近日曾撰《释七》一篇，附录于此：

枚乘首创《七发》之体，后人称曰“七辞”[1]。刘勰《文心雕龙》有《杂文》篇，专论“对问”、“七”、“连珠”三者，谓皆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枚叔之文，举六事以起楚太子之疾。每段之末，辄有“太子能强起”之问句，因事而异。自至悲之音，至美之味，至骏之马，以至八月广陵波涛至怪异之壮观，皆不足以起太子之沉痾，而太子概以“仆病未能”答之。此“强起”

① 《太平御览》卷五九〇文部铭志下，连珠之上，为七辞一类。

者，即所谓“起废疾”之起，欲以起太子，故名文曰七发。发者，《风赋》云：“发明耳目。”《七发》亦言“发皇耳目”，是其义也。李善《文选》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七谏》盖东方朔之作。自初放、沉江，至谬谏凡七段。王逸称：“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原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此释《七谏》所以为七之旨。考诸子篇章，以七名者，《管子》有《七法》、《七臣七主》。《大戴礼·主言》，论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王制》“明七教以兴民德”，《尚书》五教，此则演而为七。《左传·宣十二年》言死有七德，《管子·五辅》篇论义有七体。秦汉以来，著论者颇多采用七数，不特《七发》与《七谏》为然。《管子·七臣七主》篇，虽名曰七，而文中实论“六过一是，以还自镜而知得失”。所谓“七”者，乃包括“六过”与“一是”言之。枚叔《七发》之为篇，原共八首。首篇是序，而末为总结，中间所陈，仅六事耳。李善谓“说七事”，必合序言之，方有七也。向来解“七”之取义，可得二说。刘勰云：“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弟也。”此以七窍说之。李善又云：“乘恐梁孝王与吴王濞同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则以七为少阳说之。《庄子·应帝王》言，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而混沌凿窍，七日乃死。[①]《易·复卦》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则七之数，在《易》有来复之义，此天道也。《七发》为太子起沉痾，以“七”为名，其有取来复之意乎？“七”于《易》数为少阳，《说文》“七”字云：“《易》之正也。”《易》占用九不用七，盖用变而不用正也。七为少阳，九为老阳，李氏以《易》数譬之，不若径以人体阴阳说之之为愈也。案《素问·阴阳离合论》，人身有三阴、三阳之离合。三者何？谓开、阖与枢。开者，所以司动静之基；阖者，所以执禁固之权；枢者，所以主动转之微。此可以脉搏见之。故少阳少阴，皆为枢；病者之转机，在于是焉。吴客为楚太子诊疾，“察其虚中重听，恶闻人声”。善注以《素问》“精气夺则虚，黄帝八十一问阴病恶闻人声”解之。度枚叔必当细绎《素问》之书，其于阴阳离合之义，庸有不知之理？则李氏所谓，欲发阳明于君者，人身之中，胃为阳明。《灵枢经》以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中身而上，名曰广

---

① 医书则以配九州，称为九窍。《灵兰秘典》论云：“生之末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经》：“地有九州，人有九窍。”

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太阴指脾脏。胃在人身中，在脾之前，故为阳明。阳明之脉，即胃脉也，故“发阳明”者，谓胃气调和而百病可瘳矣。李氏之意，殆指此欤？自《七发》、《七谏》而后，诗中又有《七哀》一体，王仲宣倡焉，曹子建、张孟阳赓作焉，俱载《文选》（卷二十三）。五臣吕向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欲而哀、鼻酸而哀也。”是其哀叹可谓原于七窍。刘勰称：七窍所发为七发。此说正可为其张目，不可谓持之无故也。西汉翼奉以五际六情说诗，以为“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与）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参迮鹤寿《齐诗翼氏学》）。此情之数为六。然《礼运》谓：“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则以为七情，故七哀者实通乎七情，亦汉人之说也。《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其数散于天下。”古哲喜以数区别事物，七亦其一，故在天有七政（《舜典》）、七纬（《新论·思慎论》），在地有七泽（《子虚赋》）、七赋（《法言·问道》指五谷桑麻），于礼有七庙（《王制》）、七礼（《士丧礼》），于乐有七律（《国语·周语》）、七始（《汉书·礼乐志》）。自春秋以讫汉世，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七复如三九，以指成数。《诗·大东》织文之数，曰：“终日七襄。”《尔雅·释地》言七戎六蛮，亦其例矣。有询《七发》之取义，因效汪中《释三九》，撰为是篇。若夫《七发》，自汉而后蔚为新文体，踵武者众。傅玄《七谟序》及挚虞《文章流别论》（俱详《御览》文部引），叙述已备，不复多及云。

赋学研究的展望

——第二届国际赋学会议特邀演讲

余以耆年，久荒赋学，幸蒙邀请，愧不敢当，聊陈数语，以为抛砖引玉云尔。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自此以后，国际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由专著论述，以至总集之校勘整理、选本之注释语释，亦云周备。时至今日，赋学重兴，实非始料所及。是次赋学会议，集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及日、韩、美国学者于一堂，切磋琢磨，提交论文达五十篇之多，赋学昌隆，可谓空前矣。

长久以来，文学史家均横加否定赋学之价值，此非持平之论。一种文体、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厄于时论，直如古镜蒙尘，黯然不张；然而精光宝气，终会刮垢磨光，重见天日。赋学即是一例。

赋在汉代最为流行。桓谭《新论》第十二为《道赋》篇，导刘勰《诠赋》之先路，惜已散佚。严可均《全汉文》仅辑得四条，其中有云："（扬）子云言能读千赋则善赋。"班固《两都赋序》云："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是西汉之赋有千篇之数。

赋之成为研究对象，似起于刘宋时君臣之合力提倡，梁、魏因之。赋篇之结集，见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略如下表：

朝 代	编 者	书 名
宋	谢灵运 明帝刘彧 （新渝惠侯）刘义宗[1]	《赋集》九十二卷 《赋集》四十卷 《赋集》五十卷
后魏	崔浩	《赋集》八十六卷 《续赋集》十九卷
梁	武帝萧衍	《历代赋》[2] 十卷

就宋而言，赋集即有三部。上述诸集，惜皆亡佚，然亦足以说明当时朝廷对赋之重视。

关于赋之研究路向，下列数项，务留意焉。

一、言志类赋之独立研究

诗言志，赋亦言志。《楚辞·九章·悲回风》云："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眇志所惑，即赋诗以明，赋亦如之。此意可参拙文《骚以言志说》。赋中不少为贤人失志之作。《隋书·经籍志》卷四称梁有《遂志赋》十卷，惜亡。《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有陆机《遂志赋》，其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刘歆有《遂初赋》、刘桢有《遂志赋》，皆此类也。此书十卷，即裒合众作。及后唐代韩愈有《复志赋》，亦即此类。今宜汇辑历代言志之赋，都为一篇，以见赋以言志之遗。

二、赋音佚书之辑录

《隋志》所记，各赋有音。如《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毋邃撰。《二都赋音》一卷，李轨撰。又《两唐志》有李轨《齐都赋音》一卷，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薛综《二京赋音》二卷，褚令之《百赋音》一卷[3]，郭微

① 刘义宗乃刘裕中弟道邻六子之一，《世说新语》著者刘义庆之弟。初赐爵新渝县男，后进爵为侯。元嘉二十一年（公元 444）卒（见《宋书·宗室传》）。

② 据《梁书》卷四十三《周兴嗣传》，周舍、周兴嗣奉敕注梁武帝《历代赋》。

③ 《隋书·经籍志》作御史褚诠之《百赋音》十卷。按《隋志》有《褚诠之集》八卷。

之《赋音》二卷[1]。《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足见褚音之影响。吕忱即《字林》作者，未闻注赋。

赋之有音，因多奇字不易晓，赋音与文字声训极有关系。现敦煌出土《文选音》一种（萧该有《文选音》三卷）；綦毋邃之音注，亦可从现存日本之《文选集注》辑得一二；其余宜加以稽考整理。赋音之辑佚整理，不但有功于赋学，且惠及语言文字之学云。

三、赋与图关系之研究

赋或因图而作，或为赋而作图。例如《天问》，即先有图，而后有文。至若先有赋文，后绘图书，其例更多。《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张彦之《历代名画记》载，晋明帝有《洛神赋图》，顾恺之继作。晋史道硕有《蜀都赋图》、《琴赋图》，宋史敬文有《张平子西京赋图》。《隋志》著录梁有《杂赋图》十七卷，亡。足见梁时赋之有图。此赋与图之关系研究，亦绘画史之重要资料也。

四、赋之文化史研究

赋文资料，乃文化史之宝藏。赋为铺陈某一事物之专篇，对于文化史专题研究，往往提供重要资料，片言零句，亦足甄采。以乐舞百戏为例，张衡《西京赋》之写百戏，实为研究古代杂技史之重要资料。他如建筑史，班固《两都》、张衡《两京》，其于长安洛阳之城市规划、宫殿建构，描画详尽，甚有功于古代建筑史之研究，自不待言。至如《水经注》、《艺文类聚》所引有关宫室台榭赋作之零章断简，亦弥足珍贵。《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引魏武《登台赋》"引长明，灌街里"断句，为研究古代邺城建筑、街衢结构，提

[1] 《隋书·经籍志》作郭徵之。

供可靠资料。[①] 又卷十九《渭水》注引繁钦《建章凤阙赋》序[②]，卷二十四《睢水》注引齐随郡王《山居序》[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魏明帝《玄武观赋》，均为古代建筑史之吉光片羽宝贵资料。又《水经注》中关于石刻、诗赋，引述甚繁。石刻资料已有专门著述，惟辞赋尚阙如。对于辞赋资料，应有专文撰录，以供文化史、文学史家参考。

五、赋与修辞学之研究

修辞学近年发展甚快，惟辞赋在修辞学上之意义，尚未闻有通体之研究。辞赋修辞学，实属研究之新领域，亟待开拓。且辞赋之语言艺术、修辞技巧，较诸诗骚，更臻成熟。诚如葛洪《抱朴子·钧世》篇所云："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可惜如此丰富之语言修辞材料，迄今尚未有系统性之研究。唐世有《赋谱》，与杜正伦《文笔要诀》合抄，日本所存，称为"国宝"。《赋谱》只论律赋，宜综合汉魏六朝及宋元以后诸赋，扩大为"赋修辞学"，则可为赋学研究，开新局面。

六、赋学纪事之作

笔记杂书，叙及赋者，无虑百数；以赋之资料论之，亟待好事者为之钩

---

①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曰："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人，经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经止车门下，魏武封于邺，为北宫，宫有文昌殿。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宝堰下，注之隍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

② 《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注曰："《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凤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

③ 《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注曰："余按《汉书·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复道自宫东出杨之门，左阳门，即睢阳东门也。连属于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谢氏赋雪亦曰：'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今也歌堂沦宇，律管埋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

稽纂集。此举可效《唐诗纪事》、《全唐文纪事》，撰作《赋学纪事》。姑举一例，偶检明叶盛《水东日记》，其中涉及赋者灿然可记。如卷八记“东坡《赤壁赋》真迹，寄传尧俞者，尝于俞尚书家见之。‘洗盏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又高元之有《变离骚》九篇，卷二十四即载其《变离骚序》。卷三十载虞雍公《诛蚊赋》及诸家题记。数则资料，对于赋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之研究，皆极宝贵。倘遍查各书，弋获必富，是为斯学恢宏光大，其功不在诗文记事之下，惜尚无人为之矣。

侧闻国内近年治赋者多家，著述宏富，若《全汉赋》之辑成，《历代赋汇》之整理，均足大书特书，为古书整理规划之外，大著新猷，嘉惠来学。上举琐细各节，注意所及，聊发其耑。余年已颓耄，无能为役，惟冀同志合力以竟其功，区区之意，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司马相如小论

——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

文学家能够承先启后，非有过人的才智不办。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既能上承楚辞的余绪，下辟汉赋的新路，自足以当上“非常”的称号而无愧。法国吴德明曾经写过一本研究司马相如生平时代与作品的书，并附译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一文。在日本时，我跟吉川幸次郎先生谈过这本书。吉川先生以为司马相如不大容易研究，而且他的赋很难翻译，我也有同感。

《文选》卷四十四檄文类收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书》二文。《史记》本传说：

>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汉武帝好大喜功，为了开拓边境，招西南夷人来归，于是派唐蒙打通到夜郎西僰的道路。[①] 唐蒙杀了巴蜀人的领袖，当地的百姓感到震恐。相如本来是蜀郡成都人，所以武帝派他到巴蜀去安抚百姓。《喻巴蜀檄》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来的。但是当时朝中大臣如公孙弘辈和蜀中长老都以为通西南夷

① 由新近地下文物的发掘显示，武帝时势力已达到当时的滇地（晋宁山）了。

的工作是徒劳无功的，都想请武帝撤销原意。相如恐怕武帝信心动摇，于是以私人身份写了一封《难蜀父老书》，“借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本传）。其实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给武帝看，坚定他的信心的。文中有几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

“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这两句奉承话，适足以稳定汉武帝的信心。于是公孙弘等人的反对，也就对武帝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非常人”、“非常事”二句话，后来变成汉代的习语，时常被人征引或仿作。如《后汉书·班彪列传》，说班固奏记东平王苍书时，亦引用这两句话：

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可见这两句话在当时流行的情形。《文选》卷三十五收有汉武帝两篇诏令。第一首说：

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武帝诏令颁于元封四年，而相如《难蜀父老书》，《文选》注未有说明写成的年份，大抵在元封四年之前。所以武帝“非常之功，非常之人”的讲法，说不定是摹仿《难蜀父老书》“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两句，而变化出来的。

只有非常人才能说出非常之话。相如本身是非常人，才有这种非常话，但非常人的司马相如，只有遇到非常人的汉武帝才能发挥他非常人的才华，显露他非常人的潜力。如果司马相如不是遇到非常人的武帝，他的非常人的才干，大概就要与草木而同腐，沦泥淖以湮灭，我们再不能读到他的作品了。《史记》说相如初事孝景帝时，为散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所以他的才能不能伸展；后来他到梁孝王处作客，“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

游士居数岁”，亦得不到非常人的赏识，梁孝王只令他与诸生同舍。这时虽然他著有《子虚》之赋，但亦不能改变梁孝王对他的待遇。直到梁孝王死后，武帝读到他的《子虚赋》，才惊叹于他的才华。经过他的同乡狗监杨得意的推引，始得出任郎官。从此展现出他非常人的才具来，写出非常人的作品。而他琴挑卓文君，“亡奔成都”之事，世人都以之为耻；他们都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他的学问，但只有不拘小节的汉武帝才能提拔他这个非常人，相如才能“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能够不拘小节，着眼于大体，武帝自然是个非常人。“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两句，正是武帝自道之语。

司马相如早年的生平很值得研究——因为这个时期的生活，对他以后的行事有很大影响。《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本传都只能提供司马相如早年生活的概略情形，未足以作深入的探讨。相如四川成都人，在相如之前，除了文翁以外，四川并没有特出的文学家[①]，学术风气不浓厚。当时文学气氛最浓厚的地方是梁地。相如之所以游梁，大概是文翁所指使的。相如之后，蜀地的文风渐渐兴盛，先后有王褒、扬雄、李尤等人，为蜀文学放出异彩。相如初游梁，不为孝王所见重。梁孝王是汉文帝的幼子，很得窦太后钟爱，时常厚赐给他。“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梁孝王世家》）。排场与天子无异。又孝王好“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而其中“公孙诡多奇邪计”，舌辩多端。窦太后本想立孝王为帝，但为袁盎等人所阻挠。孝王后来指使羊胜、公孙诡等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景帝由是怨恨孝王，与他疏远。景帝三十五年，孝王“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明年六月病死。从此文学集团解体，相如便返蜀。相如虽然做梁孝王幕客，却与这次政治暗杀无关，所以并没有多大牵连。相如游梁，正是这个文学集团最全盛的时期。他能够与当时负盛名的文士相往来，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当时的赋体仍留于篇幅短小的阶段，相如学到写赋的方法，演成长篇。梁孝王曾经在山东东部建造东苑[②]，“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相如作《子虚》之赋以为规劝，目的是令孝王归于节俭，但梁孝王却未加理会。《子虚赋》，《文选》列入畋猎类，人物有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三人，借三人的讨论畋猎事情，以通于讽谏。排比铺陈，堆

---

① 战国时虽有游士尸子（佼）卒于四川，但他不算蜀人。

② 东苑中有平台、修竹园。枚乘作有《修竹园赋》、《兔园赋》。

垛夸饰。文章最后说："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这是反对梁孝王拟于天子的畋猎行为而作的。

《子虚赋》不能打动梁孝王的心，正因为梁孝王并不是非常人，所以非常人的司马相如也就藉藉无名，不能露出头角。后来得到得意的荐引，才遇到非常人的名主——汉武帝，从此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为武帝写下《上林赋》，极尽夸张之能事。《上林赋》与《子虚赋》写作方法相同，其实不写也罢。

相如文思缓慢，属于"迟才"一类。《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相如含笔而腐毫。"范文澜注引《西京杂记》：

>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汉武帝却是一个文思敏捷的人。《太平御览》八十八引《汉武故事》说：

> 上好词赋，每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

《西京杂记》所说的，大抵是《子虚》、《上林》二赋。我以为文章只讲求工拙，不在于迟速之分；迟速并不影响文学的价值。

司马相如在汉朝文学上的建树有两点：第一是相如的文章常有新意。如《难蜀父老书》的"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就是司马相如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创获。第二是 hyperbole（hyper 是超越的意思）夸饰法。在相如之前，赋的作品都是短篇的，直到司马相如才有长赋出现；而且前人的作品在描写铺排方面，都不及相如的尽情表现。他的夸张手法，灵感得自枚乘《七发》，从而开拓赋体，增长篇幅。《七发》中间写波涛部分，枚乘极写水之形态，这大概是相如赋铺张闳丽之所本。《七发》由楚辞衍伸而来，仍属楚辞系统。楚辞中的《招魂》亦多用夸张手法。《招魂》的夸张，是衬托宇宙之大，与枚乘、司马相如的夸张描述小事物方面，方向不同，但所用心思则一样。《文心雕龙》有很多篇都提到司马相如的作品，值得抄下来互相比较参照。如《诠

赋》篇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类指事类，艳即"诗赋欲丽"之丽的特质。但文学作品只以丽为本质，并未足以成就其不朽的价值，所以后来扬雄论赋有"丽以淫"、"丽以则"的说法。扬雄《法言·君子》篇批评司马相如作品说："文丽用寡，长卿也。"认为他单重华彩，说理成分不足，只有"丽"的部分而已。扬雄看得不对，相如赋也说理，只不过以讽喻方法表现，属于内在的，不拘形于赋的外在表现方式。由于扬雄只看作品的外表，难怪他以"文丽用寡"的说法来批评司马相如了。真正能体会到相如的用意的，只有太史公一人。《司马相如传赞》说：

>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终曲而奏雅，不已亏乎？

其中"扬雄以为靡丽"句以下数语属衍文，出自《汉书》本传赞文，今本《法言》并没有这几句话。司马迁将相如的作品来和《春秋》、《易经》、大小雅相比，说相如作品"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以为适于诗之讽谏，不属于"丽淫"一类，反归于"丽则"之属。至于《文心雕龙》，也附和扬雄之说。《才略》篇云：

>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辟宗。然复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这更加不足道了。（李锐清笔记）

论《文赋》与音乐

陆士衡文章，如玄圃积玉，古今同赏。而词义深博，沾溉无尽者，莫如《文赋》一篇。六朝论文家若刘勰、钟嵘，于《文赋》皆无好评[①]，臧荣绪《晋书》则称其“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②]。此指出《文赋》之精要，在于辨析文体。盖自魏文《典论》，区别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草创尚简；至于桓范，益加恢廓，其《四要论》中，有关文体者，存《序作》、《赞象》、《铭诔》三篇。[③] 盖侈论文体，在当日成为风尚。《诗品序》所举，陆机《文赋》外，又有李充《翰林》、王微《鸿宝》、颜延论文（即颜延之著《庭诰》）、挚虞《文志》（即《文章志》）。且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他若任昉之《文章始》[④] 亦着意于此。迄刘勰之《文心雕龙》，极为详赡，遂集文体论之大成。[⑤] 昭明太子《文选》，亦区文章为三十八

---

① 钟嵘《诗品序》：“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非穷，知言之选难备矣。”又《序志》篇评魏文以下各家谓：“陆机巧而碎乱。”然《文心》持论，多根据《文赋》。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赋序》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云：“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即本此。

② 见《文选》十七《文赋》李善注引。

③ 见《群书治要》卷四十七。

④ 《隋书·经籍志》：任昉《文章始》一卷。注云：亡。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载《文章缘起》一卷，梁太常卿乐安任昉撰。

⑤ 刘勰书中自《辨骚》至《书记》各篇，当是承袭桓范以来讨论文章体制之作。此为关于Genre方面。至于《体性》、《定势》篇，则专论Style方面。

类。陆机《文赋》，对于文体之区分及说明，“往往以数字括论一体，皆确不可易”①，有承先启后之言。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体论”实占极重要之一面，缀文之士，咸以辨体为先。② 文体有二义：从形式言，指文章之“体制”；兼其内蕴与作者之性格言，则指文章之“体性”。体制与体性，本厘然为二事，而自魏以降，每混称曰“文体”。体制已见上论，至于论文章体性，刘桢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③ 陆厥、刘勰又称曰“体势”。《文心·定势》篇云：“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此皆其例。

他书有言文体之形成者，为《文心雕龙·体性》篇。

有言文体之演变者，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体三变。”江淹《杂体诗序》，称：“魏制晋造，固亦二体。”

有言文体之运用者，为张融《门律自序》：“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论文》：“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义略同此。

此所谓“体”，特指风格，非论体制。今观《文赋》，除论体制“诗缘情而绮靡”等句以外，有但言文之“体”者，则指体性、体势而言。如：

>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
>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

即言文无常体，要以通变为方，与刘勰、张融所论，其奚以异？可知《文赋》中文体论之重要。故研读《文赋》，须从臧氏“心识文体”一语入手。

① 此黄侃语，见《文选黄氏学》。

② 明吴讷《文章辨体》云：“文章以体制为先。”陈洪谟云：“文章莫先于辨体。”此辨体制之事也。而刘勰于《体性》篇云：“宜摹体以定习，固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又《定势》篇：“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此则别体性之事也。

③ 刘桢语。见《文心雕龙·定势》篇引。《南齐书·陆厥传》，厥与沈约书：“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植（应作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

一

《文赋》为中古文学理论之名篇，近世言文学批评者，皆知珍视。影响所及，遍于域外。试举《文赋》研究之业绩，约有数端：

（一）专释文章体制十句，如王闿运《答陈复心问》，纯本士衡之说，多有发明。见《王志》。

（二）究明文例文义。有黄侃（见《文选黄氏学》）及其门人程会昌之《文论要诠》[①]、骆鸿凯之《文选学》。

（三）辨证写作年代及其生平，有逯钦立、陈世骧、姜亮夫、Achilles Fang[②]、高桥和巳[③]。

（四）翻译成外文，有 G. Margouliès、B. M. Alexéiev、陈世骧、E. R. Hughes、方志彤（Achilles Fang）等。[④]

二

《文赋》写作年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 杜子美《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归》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今观《晋书》本传无二十作《文赋》语，子美殆别有据也。（卷四十九"陆机入洛年"条）

① 《文论要诠》，84—98页，开明书局出版，民国三十七年印行。

② 逯钦立文见《学原》第一卷第一期，1948。陈世骧1952年重订版 *Essay on Literature* 后记，复论《文赋》写作年代。又 Achilles Fang："Review on E. R. Hughes，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fu"，*HJAS* XIV，1951，p. 615。

③ 高桥和巳《陆机の传记とその文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一、十二册，京都，1959。

④ 文赋译本，有下列各种：

1. G. Margouliès 法文译本，刊于 *Le Fou dans le Wensiuan*，1926年再版，1948年巴黎印行。

2. B. M. Alexéiev 俄文译本载 *Bullu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1944。

3. 陈世骧 *Literature on Light against Darkness*，1948。*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1952.

又一海知义译陈著部分为日文《陆机の生涯と文赋制作の正确な年代》，《中国文学报》第八册，1958，京都。

4. Achilles Fang，"Rhyme Prose on Literature: the Wen fu of Lu Chi"，*HJAS* XIV，1951.

此疑杜甫说别有所本。近人逯钦立、陈世骧均力证《文赋》乃士衡晚岁所作，可为定论。惟姜亮夫撰《陆平原年谱》又持异议，繫其事于晋太康元年（即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时机年二十岁。其说云：

> （陆）云与机第八书有“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云云，与《感逝赋》、《扇赋》等同称，似《文赋》应作于赵王伦诛后，即机年四十一前后。然此处“文赋”二字恐当作“文”与“赋”解；不然，则与“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二语，不甚可通。故仍从工部“二十作《文赋》”之说。

今案“文赋”二字作为文章泛称，本亦习见。如《三国志·王粲传》言“刘桢咸著‘文赋’数十篇”，即其一例。然细读陆云与兄此札：

> 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①] 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漏赋》[②] 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

札中先言“省诸赋”，次第提及《述思赋》、《文赋》、《咏德颂》、《扇赋》、《感逝赋》、《漏赋》，可见此处“文赋”二字，当是专篇之名，绝不得视为“文”与“赋”之通称。至“文适多”二句，方志彤氏谓与《典论·论文》之“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语相仿佛。其所译文，亦依此意。惟不敢确定其说之当否。[③]

---

① 《晋书·张华传》：“华诛后，（陆机）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机文无《咏德赋》，云与兄札则作《咏德颂》。张华遇害，在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四月，时机年四十矣。《咏德赋》不传，《艺文类聚》卷二十引陆机《祖德赋》。姜亮夫谓“祖德”即“咏德”之误（见所著《陆平原年谱》78页，及《张华年谱》70页），尚乏确证。

② 《扇赋》文见《全晋文》九十七，题作《羽扇赋》。《漏赋》据《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积水违方”句下引陆机《刻漏赋》，《艺文类聚》六十八等类书引作《漏刻赋》。

③ 陆云札“《文赋》甚有辞”至“文适多”二句，方氏译注见其 Hughes 书评 632 页。其译文云：“The Wênfu is very eloquent, and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beautiful passages in it. As literature is a thing that can take on diverse form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treat if completely.”按此段断句尚有问题，如读作“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知兄呼尔不”，似应译作“But if a text is lengthy（多），the style（体），then is apt not to attain Ching（清），I wonder if you agree on this point”（此英译文与 Dr. G. E. Sargent 斟酌，附此致谢）。

寻陆云与兄诸札，论文之“体”及文不宜“多”之由，其言如次：

(1) 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①]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

(2)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

(3) 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

此论文不贵多，贵在文体能高绝。故云：“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适多”二句，以上引数札观之，似可读为“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体清自能高妙，多则不易工。此士龙为文戒多之说。“体”字正连下文读。如是则与子桓“文非一体”之说不可并论，亦不必疑其语之不甚可通也。士龙之文学观点以“清”为重。其与兄书又云：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应作“势”）而不取悦泽。[②] 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张公文无他异，正是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足见士龙主“清省”。其赞许士衡之文曰：“清新相接”。评《述思赋》曰：“清妙。”评《漏赋》曰：“清工。”于此可明“体便欲不清”一语，“清”即“清省”、“清新”。士衡文繁，故士龙谓其“犹皆欲微多”。此“多”字与“文适多”[③] 句之“多”，用法正相同。故士龙对于《文赋》，本其向来论文原则，仍病其辞多而体不清也。[④]

① 此句依丁福保刊《全晋文》断句，读作“体都自不似事”，此与“体便欲不清”句法相同。其论《扇赋》云“如有不体”，此诸“体”字，俱指文体而言。

② 《文心雕龙·定势》篇引此云：“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黄季刚《札记》云：“今本《陆士龙集》作尚洁，盖草书‘势’、‘絜’形近，初讹为‘絜’，又讹为‘潔’也。”

③ 文适多之“适”字，可解作“若”，假设之词。《后汉书·逸民传序》“适使矫易去就”，即其例。

④ 张溥《百三名家集·陆清河集题辞》云：“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妙若《文赋》，尚嫌绮语不尽。”

逯钦立考证，谓士龙与兄书共三十五札，其中十札涉及《愁霖》、《喜霁》、《登台》三赋及《岁暮赋》，皆永宁二年以后之书简。札中提及《文赋》与《感逝赋》，足见士衡以《文赋》寄士龙，必在永宁二年，故《文赋》至早为永宁元年岁暮之制。永宁元年，士衡四十一岁，与《叹逝赋》年方四十正合。按此说至确不可易。考《文赋》首段内暗嵌陆士衡所作诸赋之名。兹列举如次：

遵四时以叹逝

士衡有《感时》、《叹逝》二赋。《感时赋》云："历四时以迭感，悲此岁之已寒。"《叹逝赋序》云："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即士龙与兄书所谓"感逝赋愈前"者也。

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士衡有《述思赋》云："情易感于已揽，思难戢于未忘。"又云："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又《行思赋》、《思归赋》、《愍思赋》均以"思"名篇。又《幽人赋》云："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与悲落叶两句略同。

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

士衡有《浮云赋》与《白云赋》。又《祖德赋》有句云："形鲜烈于怀霜。"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1]

集中有《祖德》、《述先》二赋。庾子山《哀江南赋序》云："陆机之辞

---

① "诵先人之清芬"，《文镜秘府论》作"先民"。善注引毛诗"先民有作"，孙志祖《文选考异》谓：疑本文是"先民"，人字避唐讳改。《文选旁证》及胡绍煐《文选笺证》皆用是说。方氏英译作"He croons the clean fragrance of past worthies"。按（机集）《艺文类聚》二十有《述先赋》句云"仰先后之显烈"，"亮身没而吴亡"，明指其先世，译作 past worthies 似太泛。方氏英译尚有若干小处可商榷者，附举如次：

[兽扰]　善注："扰，驯也。"乃用《周官·天官》注。《潜夫论·志氏姓》"扰驯鸟兽"，方氏译为"to the consternation of other beasts"，解作惊扰，盖用五臣刘良训扰为乱之说，不如李善之当。

[粲风][郁云]　《文赋》："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五臣吕向曰："粲然如风飞飙立，郁然如云起翰林。"此二句程会昌读作："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粲有明丽之意。方氏译粲风为 laughing wind，郁云为 dense clouds，不甚可解。

[受欰]　方氏云：I adopt the reading 欰 in place of the usual 嗤 or 蚩；Hu K'ochia in his textual notes recommends this reading。按胡克家《文选考异》原云："两欰字皆当作'欰'……说文无嗤字，有欰字，云：'欰欰，戏笑貌。从欠山声。……'彼误'欰'为嗤，当互订正。"（原刊胡刻《考异》卷三，27页）方氏引胡说实当作"欰"，作"欰"者乃误刻。查字书无"欰"字。许巽行《文选笔记》嘉德按语，及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亦谓"欰"为"欰"之讹。

[巧心]　"虽濬发于巧心"句，方译：Originality is a thing often looked at askance by the fixed eye. 陈译：Although an art truly wrought from the depths of a master mind. 按方译上句只以 Originality（新意，创作力）一字译之，意未具足。查"巧心"，李善失注，《汉志》儒家《王孙子》一篇注云："一曰巧心。"《文心雕龙·序志》："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巧心二字本《汉志》，与下句"拙目"相对成文。陈译"巧心"作 master mind 似亦未尽善。

赋，先陈世德。”

《文赋》自是其晚岁所作，故开首总述平生各赋，檃括为言。由此一端，足证《文赋》绝非年二十所作。

三

《文赋》理论，撰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已多所分析。其中最有趣者，有一段讨论为文最高法则，提出行文须具备“应”、“和”、“悲”、“雅”、“艳”五个要素，盖全借乐理以发挥文理。曹丕《典论》言文气清浊之异，曾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假音乐为喻，说明文气即文人心中自然之律吕，与音乐之节奏无殊，各有其天才，上智下愚，不能移易。士衡运用音乐原理以论文病，子桓实开其先。兹录文赋要语如下：

（一）“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黄侃云：“以上言清而无应，此文‘小’之故。”

（二）“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

黄云：“以上言应而不和，此辞‘瘁’之故。”

（三）“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黄云：“以上言和而不悲，此理‘虚’之故。”

（四）“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

黄云：“以上言悲而不雅，此声‘俗’之故。”

（五）“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黄云：“以上言雅而不艳，此辞‘多’之故。”按“多”字未妥，应作“质”。李善注云：“言作文之体，必须文质相半，雅艳相资。今文少而质多，故既雅而不艳。比之大羹，而阙其余味；方之古乐，而同其清氾。言质之甚也。”

由是言之，无“应”则病于“小”，不“和”则病于“瘁”，不“悲”则病于“虚”，不“雅”则病于“俗”，不“艳”则病于“质”。此数病端，方氏、陈氏译文如下：

方译	陈译
靡应——no “music”	without “resonance”
不和——no “harmony”	(throw the hymn into) “discord”

不悲——no “sad”　　(fails to move with) “pathos”

不雅——not “decorous”　　(an offence to) “grace”

不艳——lack “beauty”　　(innocent of) “glamour”

以上诸语，曰譬曰象曰犹，皆以音乐取譬，可喻于琴道，宜先以音乐释之。

应　应乃调弦法，即使琴上两弦散声与按音相应，或异位泛音之相应，以求两音之和谐。由于取调之不同，所用弦次及相应之徽位亦异。有时转弦而换调，得紧或慢一律以求音之应和。例如奏黄钟调时，要使第七弦之散声与第五弦之第十一徽按音相应，以及第四弦之散声与第一弦第八徽按音相应。琴曲之《大胡笳》、《昭君怨》即属此调。总之，“应”即使异弦之乐音高下相宜，成同度或八度之和谐，此为构成旋律之基础，凡能弹七弦琴者，无不通晓。Hughes 氏译“应”为 Answer，极为不妥。《文心·声律》篇云：“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应”即调琴之方，彦和亦取以喻文。其说视士衡又进一步。

和　《国语·周语》伶州鸠云：“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声应相保曰龢(和)，细大不逾曰平。”凡使高低长短不平之音连续结合，而能保持在和谐状态下之优美节奏即是“和”。故“瘁音”则失之过弱，“偏疾”则失之过急，皆有失于和谐。为文而有此种现象，刘勰谓之“文家口吃”①。其言曰：“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应”与“和”，本所以论音乐之旋律，文章亦有同然。彦和之说，实本之士衡也。惟彦和所论之“和”与“应”，进而指句中平仄之和调暨句末用韵之应协，已受永明以来声律说之影响。②

悲　鼓琴要能使人悲，不悲则其感人也不深。为文亦然，不悲即缺乏情

① 《文心·声律》篇：“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疵也。”

② 以用韵之相应而论，士衡多用楚音。陆云与兄书云：“……音楚，愿兄便定之。……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文心·声律》篇因谓：“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彦和盖嫌士衡用楚音过多，有失雅正。此一问题极饶兴趣，须将陆机韵文各体用韵，与楚辞用韵并与晋宋辞人用韵作一比较，或可看出其间同异之原因，当俟另论。至《文赋》“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二句，刘勰引作“知楚不易”。黄季刚谓：“彦和盖引‘取足不易’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张公之言而变。‘知楚’二字，乃涉上文而讹。”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逆据黄说改为“《文赋》亦称取足不易”。方氏英译此二句作“This clever trick will spare you the pain of deleting and excising”。既于校语未举出《文心雕龙》异文，而所译视原意，似非尽惬。

感。如何然后能悲，必也由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先有悲心于内，乃可形之于外。《说苑·善说》篇记："雍门周说孟尝君，鼓琴必先忧戚盈胸，然后移动宫徵，微挥羽角，则流涕沾襟矣。"《关尹子·三极》篇亦言："善琴者应有悲思之心，自能手物相符。"是故由情以生音，则其音感人。[①] 为文之道，何曾不尔。故不可"遗理"，不能"寻虚"。遗理则乏内容，寻虚则失真意。无真性情真血肉之声音与语言，乌足以感人耶！

雅 乐有雅、郑之分。雅为正声，以别于淫曲、俗曲。士衡所指之《防露》、《桑间》，《防露》即《房露》[②]，《桑间》，《礼记》谓之亡国之音。《北堂书钞》一百六引《说苑》佚文："孙息学悲歌，引琴作郑、卫之音。灵公大感，故作卫公之曲，歌而和之。"此乃琴曲能悲而不雅之例。然琴曰"雅琴"，西汉人以为"德乐"。刘向有《雅琴赋》，谓"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愔愔"是也。[③] 汉时雅琴有赵氏、师氏、龙氏各家（见《汉书·艺文志》）。《别录》称"（赵）定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此则雅而能悲之例。又谓："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④] 若夫"道行和乐而作者，则名其曲曰'畅'"[⑤]。"操"与"畅"者，因人之穷达，而其琴心亦遂以异。穷则独善其身，要不失于正，故谓之"操"。达则兼善天下，其道无不通畅，故谓之"畅"。无论穷与达，其曲皆折衷于正，故谓之"雅琴"。《七略》云："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⑥] 即"畅"亦有"雅畅"之目。《文选·琴赋》"雅昶唐尧"句李善注引《七略》"雅畅"第十七。此琴曲重"雅"之说。士衡论文，亦取乎此。然自晋宋以来，趋重情文，虽间得"流连哀思"之妙[⑦]，而每失之不雅。故《北齐书·文苑传论》江左梁末之文，

---

① 《金楼子·立言篇上》："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苟无感，何嗟何怨也？"即申明须先有悲心，由情生文之理。

② 防露，李善注存二说。于《文赋》注云："未详。一曰谢灵运《山居赋》'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遂以《七谏》为《防露》也。"善又于谢庄《月赋》"徘徊房露"下注："《房露》，盖古曲也。《文赋》曰：'寤房露与桑（四部丛刊景宋本作'霜'）间，又虽悲而不雅。'房与防古字通。"后说是。如孙志祖、薛传均、胡绍瑛皆以《月赋》注为正。

③ 见《文选·琴赋》"愔愔琴德"句下，李善注引刘向《雅琴赋》。

④ 《后汉书·曹褒传》注引刘向《别录》。

⑤ 语见《风俗通》。

⑥ 《文选·长门赋》"援雅琴以变调兮"句下，李善注引《七略》。

⑦ 《金楼子·立言篇下》："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指形文），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指声文），性灵摇荡（指情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虽悲而不雅[①]，即借用《文赋》语，可为定评。此点关系文运升降，须别为说，下再详之。

艳 雅而不美，则伤于质直，故士衡主张雅必有艳。此则大异于汉人之论。艳（豔）字从丰（豐）。丰，大也，本有丰满之意，引申训为“美色”[②]。《左传》言“美而艳”，范宁曾用“艳而富”三字称赞左氏之文。艳本为形容词，继亦作名词用。乐府中之大曲，曲前有艳，后有趋（略如吴歌前之和声及歌后之送声）。如《艳歌罗敷引》、《艳歌何尝行》，是歌辞之有艳，乃为一种补足辞句，所以增加歌辞音调上之美感。魏武帝诗《步出夏门行》旧注“朝游清泠，日暮嗟归”二句为艳。

至若描写声音之美妙时，亦得用“艳”字形容之。如繁钦称道薛访唱歌之神之处，谓为“哀感顽艳”。倘借《文赋》语说，即谓其所唱歌辞能“悲”（即哀感）又能“艳”，故尽善妙之能事。士衡他文有《鼓吹赋》，云：“饰声成文，雕音作蔚。响以形分，曲以和缓。”描绘音声，亦假形以摹状之。可知“艳”字实具有“形文”、“声文”两重意义。如过于清虚，便失之质实与单调。于形文、声文均有不足之感，是又病于“不艳”矣。

以上五项，实际皆为音乐上之原则。向来解释《文赋》者，未能先从音乐方面探究，故难以阐明。括而言之，“应”与“和”系讲音乐文章之声律，“雅”是讲音乐与文章之品格，众所习知，惟“悲”与“艳”二者之提出[③]，即后刘勰所谓“情”与“采”，此对晋宋以来文学观念之影响，尤有极重大之意义。

四

以悲哀为音乐内美之所在，其说甚早。《论衡·书虚》篇称乐正夔能“调声悲者”。又《自纪》篇云：“师旷调音，曲无不悲。”枚乘《七发》言：

> 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使师堂操畅，伯牙为之歌。

---

① 《北齐书·文苑传论》：“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

② 《方言》二：“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郭注艳云：“言光艳也。”

③ 《文赋》云：“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悽若繁弦。”炳若句是“艳”，悽若句是“懑”。《南齐书·陆厥传》沈约答厥书云：“士衡虽云‘炳若缛绣’，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即由此加以引申。

……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

扬雄《琴清英》：

晋王谓孙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处高台邃宇，连屋重户，藿肉浆酒，倡乐在前，难可使悲者。乃谓少失父母，长无兄嫂，当道独坐，暮无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检琴而鼓之。晋王酸心哀涕曰：何子来迟也？（《御览》五七七引）

《西京杂记》："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鹄寡凫之弄》，听者皆悲不能摄。"桓谭《新论·琴道》篇、阮籍《乐论》记雍门周、季流子之鼓琴，无不令人悲而凄恻流涕。故王充云：

闻音者皆欲悲。（《论衡·超奇》篇）
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同上《自纪》篇）
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同上《感应》篇）

王褒《洞箫赋》云：

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

嵇康《琴赋序》云：

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1]

弹琴要以悲为主，施之文学，亦有同然。建安时代文学作品，不少以

---

① 《琴赋序》此数句，R. H. Van Gulik：His K'ang and his Essay on the Lute，译文如下：Praising the quality of the instruments，they held delicacy and elaborateness for the best. Describing their tones，they stressed melancholy and sadness. Lauding the influence exercised by their music，they held the power of causing the hearer to weep the nost important（p. 52）。

"悲"为美。曹公之作，钟嵘称其"甚有悲凉之句"。王粲、曹植之《七哀》诗，并其著例。所谓"七哀"者，谓七情中以哀为主。《文选》五臣吕向注云：

> 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耳闻而哀，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谓一事而七情具也。

王诗写流连之痛苦，曹诗叹浮沉之异势，与他篇《九愁赋》命意相似。萧统于《文选》上之文体分类，赋与诗皆有"哀伤"一门（见卷十六、卷二十三）。乐府中相和歌辞之楚调曲，亦以哀伤为主，其中有《怨诗行》、《怨歌行》。《七哀》诗即厕于怨诗之中，晋代乐工所奏，分为七解。相和歌辞又有《吟叹曲》，又杂曲古辞有《伤歌行》、《悲歌行》（陆机又有《悲哉行》）。其内容无不以悲哀为主题，而与音乐相配合。

音乐以悲哀为主者，取其易以感人，故富刺激性。音乐之为物，原在使人精神得到愉悦，乃特欣赏悲哀之曲调，岂非求乐而反得哀乎？于是有持反对之说者。阮籍《乐论》云：

> 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云：美哉鸟鸣！使左右吟之。曰：使丝声若是，岂不快哉！……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故谓之乐也。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虽出丝竹，宜谓之哀，奈何俯仰叹息，以称乐乎？

此即其一例。以悲为乐，尤为一般变态心理者所偏嗜，以其易以感人。[①] 故论乐者乃以"悲"为美，影响所及，文学亦为之。《文赋》公然主张为文要"和"又要"悲"，不悲更成文病。稍后萧绎（梁元帝）对于文笔之"文"所下定义，进一步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谓之文。"刘勰所谓"情文"，哀思是其唯一条件。以哀思作为区别"文"、"笔"之标准，哀思即能悲之谓。庾信《哀江南赋序》云：

---

① 一海知义《文选挽歌诗考》，论后汉至六朝，多于宴会时唱挽歌，而不尽在葬时举行。此亦以"悲"为乐之一例。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此虽剽自《琴赋》之语，但以“悲”为文章之美，与上述音乐要能使人悲之论，正一脉相承也。

五

建安时代文学，特别趋向抒情文方面发展，不再视文章为载道工具。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注重情感，固与时代有关，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但自另一方面观之，文学理论之转变，音乐似负有相当启导作用。

当时文学倡导人物，为曹操、曹丕，皆为音乐之极端爱好者。操尤好汉旧曲之丝竹相和歌。[①] 死后叮嘱，要婢妾于月旦十五日，在其帷帐中作伎乐。[②] 丕则钟情于薛访（车子）之喉转及女琐之清唱。[③] 自言：“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与吴质书》）是其赋诗多借丝竹之助。曹植亦言：“夫为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④] 足见知乐之重要。不知乐，即不足以言文，音乐与文章关系之深于兹可见。子桓《典论》借音乐以喻文气，即导《文赋》之先河也。

琴曲虽以“悲”为美，然自汉以来，囿于儒家思想，贵乎雅正。《法

① 曹操嗜相和歌，事详《晋书·乐志》及《宋书·乐志》。

② 见《文选》陆机《吊魏武文序》。

③ 详叙繁钦文，及《文选》中曹丕《答繁钦书》。

④ 曹植语，见《文选》四十二子建《与吴季重书》末，李善注引植集此书别题。又《文选》或本《与吴季重书》，间有此三句。袁褧本“知”上无“不”字。胡克家《考异》谓此三句乃后来所添。

言·吾子》篇云："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左传·昭元年》称："先王之乐……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之。"至于"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①]。道家思想亦取中和，《真诰·甄命》篇：

> 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径往问之："子尝弹琴耶？"答曰："在家时尝弹之。"真人曰："弦缓何如？"答曰："不鸣不悲。"又问"弦急何如？"答曰："声绝而悲。"又问："缓急得中何如？"答曰："众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学道亦然。执心调适，亦如弹琴，道可得矣。"

以道言，贵得中和，然以艺言，则不"悲"不足以动人。此道与艺之所以异趣。士衡所举"应"、"和"、"悲"、"雅"、"艳"五项及其相关性，缺一不可。若失其一，便成文病。其中"雅"一义，仍是儒家传统观念。推原其本，所以使"悲"而不过于哀伤，"艳"而不至于淫滥。故汉人之见，实以"雅"为中正之道。若士衡，则以"悲"为主，而以"雅"救"悲"之失于淫侈，以"艳"救"雅"之失于朴质，其所重盖在悲而艳。悲则承建安以来之侧重言情，艳则造成晋宋以后之趋于缛丽。迹士衡本人之所成就，亦在此"悲"与"艳"二端。其所为赋，如《感时》、《思亲》、《述思》、《怀土》、《行思》、《思归》、《叹逝》等，皆陆云所谓"情文"者[②]，无不哀感动人。彼自谓："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不啻为其文心好悲之自我写照。[③] 士衡之文，士龙评其"多瑰铄"、"多绮语"，钟嵘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即能"艳"之明征。故其所重仍在"悲"与"艳"。士衡文"多"楚[④]，刘勰《定势》篇云："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知其得力于楚辞者多也。建安以后，文章浸失雅正之道，至晋宋而弥甚，专向"悲"与"艳"方面发展，变本加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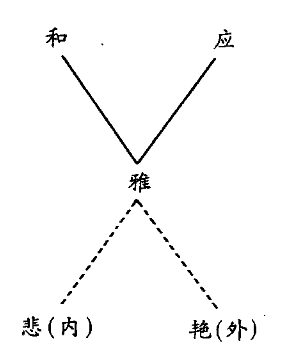
① 参中岛千秋《雅琴の音乐思想について》，《支那学研究》十三号。

② 情文相生之说，又见《世说新语·文学》："孙子荆（楚）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③ 陆机所赋多以悲哀为主。如《大暮赋序》之言死生云："乐莫甚焉，哀莫深焉。""故极言其哀，而终之以达。"又《怀士赋序》云："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机赋以摅情之作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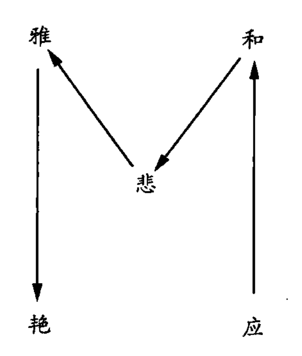
④ 机文多楚，不特音取楚音，而句法亦每取《离骚》。如《文赋》"怵他人之我先"，即用"恐高辛之先我"，"良余膺之所服"，"识前修之所淑"，即本"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皆其例。机弟云亦深于楚辞，作《九愍》以拟《离骚》。云与兄诸札，于《九歌》、《九辩》、《渔父》、《九怀》等篇，均有所评骘，具见陆氏兄弟均深于楚辞。

揆其所由，《文赋》所提出此五个观念，影响殊巨，实形成魏晋以后主要之文学思潮，至刘勰始加以矫正。兹将就此五项绘为二图如下，以资比较：



甲图

此汉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之说。以“雅”居正，主乎中和。纵有“悲”、“艳”，亦须折衷于“雅”，务使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循此途则仍是尚质。



乙图

此《文赋》之理论。要和而能悲，雅而能艳。嗣是文人，乃以藻饰相高，流连哀思，文胜而质衰矣。

上举两图，可明质文递变之故。至刘勰论情采，乃言立文之道有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考“情文”二字始于陆云，其与兄札云：

> 赋《九愍》如所敕，此自未定，然云意自谓故当。……至兄唯以此为快，不知云论文，何以当与兄意，作如此异。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泛说耳。

二陆兄弟论文，意见颇有出入，此尤其确证。彦和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盖演畅士龙贵清之说。又言：

>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则主文质相剂，“情”、“采”相兼，以救“采”溢于“情”之病。视士衡之论，尤得其平。此所以挽当日之颓风，自是时代之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也。

六

《典论》假音乐之节奏以比况“文气”，至陆机更多用音乐之原理，以说明文律。上举应、和、悲、雅、艳五者而外，又云：

>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黄侃谓：“后宋范、沈声律之论，皆滥觞于此，实已尽要妙也。”此所以使“声文”、“形文”二者，各极其胜，俾能“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以盈耳”。士衡讨论为文通变之道，如何在文义上“袭故而翻新”，如何在音律上“沿浊而入清”，要如“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亦取音乐以譬喻文学，具见其对于音乐有相当之体会。

陆机以后，能从音乐中悟出为文之道者，无逾于范晔。其《狱中与甥书》有云：

>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耶？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何从而来。

自己弹奏与听人弹奏，截然为两种不同功夫。一是鉴赏，一是练习。鉴赏须对乐理有相当培养与陶冶，方能辨别曲子之优劣。范氏自言及功力不及“自挥”。至于超音乐之境界，弹者无意，而听者别有会心，所为弦外之音，蔚宗乃独有深契。此种论调，已开钟嵘、严羽论诗之先河。但彼所体到者，非得

之于禅理，乃得之于音乐。彼又云：

>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

观此足见其对音乐了解之深。子桓谓气有清浊，彼则谓音有清浊。气即音所由生，无气便不成音。繁钦所谓"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歌唱如是，行文亦复如是。① "大细得宜"是"和"，"哀音外激"是"悲"。而驾驭操纵之，尤赖乎内在之力量，即"气"是也。故歌唱（内转）之气，与行文之气，其理正合。可见音乐与文章相通，子桓所由借以取譬，非无故也。

在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以前，文学批评之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不少论文之要义，乃从音乐体会得到。士衡《文赋》正其一绝好例证。陆厥、沈约，受士衡之影响尤深，其著论多剽袭士衡《文赋》之语。② 兹略为引申，愿世之治文学批评史者共商榷之。

1961 年 1 月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原载 1961 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 14 册

---

① 孙德谦《六朝丽指》谓："汉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于承转处迎刃而解。"意谓无虚字而气能转。

② 《南齐书·陆厥传》厥与沈约书云："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士衡所以遗退终篇……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沈约答书："……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如此数语皆本陆机《文赋》。

《芜城赋》发微

鲍明远《芜城赋》千古传诵。以“驱迈苍凉之气，为惊心动魄之词，赋家绝境”（姚姬传评语），未有逾此。顾此文果何为而作耶？集云：“登广陆故城作。”说者以为“宋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诞据黄陵反，沈庆之讨平之。命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照盖为感事而赋”[①]。近人吴丕绩为《鲍照年谱》，遂谓此赋作于孝建三年。予考《南史·孝武纪》：“大明三年四月乙卯，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黄陵反。秋八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其事实在大明三年。何氏误记，而吴君不能校正，何其疏耶！再考刘宋时，广陵为南兖州治。《宋书·州郡志》：“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以前治京口）照以文辞之美，历事临川王义庆、始兴王濬。为佐史国臣，皆于二王为南兖州刺史时，义庆镇南兖州，在元嘉十七年十月（《宋书·文帝纪》）。及在广陵有疾，始求解州（《南史·临川烈武王附传》）。照时必贡诗见赏，奉笔相从[②]，必曾驻州治之广陵也。濬镇南兖徐二州，在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文帝纪》），照被命从之[③]，亦必曾驻广陵也。是时边境反安，民殷物阜，盖为广陵全盛之日。迨元嘉二十七年冬，魏人南侵，至瓜步，广陵遂陷北虏。《南史·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余家。”此当日广陵涂炭之情状。其后

① 何义门说。亦见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

② 照集中有《瓜步山揭文》云：“鲍子辞吴客楚，指兖归扬。”盖还都赴兖时作。详谱。

③ 集中有《蒜山被始兴王命作》一诗。黄节云：此当是濬镇京口时命所作也。

竟陵王诞败，孝武命城中无大小悉斩，沈庆之执谏，自五尺以下全之，男丁杀为京观，死者数千人（《南史》诞传）。广陵经再度摧残，于是闾阎扑地之名都，遂为荒烟蔓草野鼠城狐之窟宅。照亲临其盛，复睹其衰，情发于中，遂为赋之如此。轸竟陵之祸，同于王濞，故以“盐田”、“铜山”拟之；愤孝武剪落洪支，猜忍未已，故托“厉吻”、“赫雏”以讽之。若乃“孤蓬”、“惊砂”，指诸王之不相安；“塞草”、“边风”喻拓跋氏之入寇。煮豆燃萁，寓意尤远。读者徒赏其铸语伟丽，倾炫心魂，而未绎其神情。兹掇摭史传，参合赋文，加以疏论。庶韬光沉响，得以抉发，倘亦治选学者所乐闻欤！

沵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

《说文》：“迆，衺行也。”亦作迤。《禹贡》：“东迤北，入于汇。”《释文》引马融曰：“迤，靡也。”《文选·甘泉赋》注：“施靡，相连貌。”按施、迤同音，迤沵即施靡之倒词。[①] 李善注：“迤相连渐平貌。”与施靡义同。刘宋立国江表，自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皆不守。淮水以北，化为虏庭（《宋书·州郡志》）。扬州为王畿所在，其地又皆平原旷野，无险可守，故云“沵迤平原”也。

李善注引《广雅》云：“驰，奔也。”按《尔雅·释宫》：“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释名》：“疾趋曰走。走，奏也；奔，变也，有急变奔赴也。”“南驰”、“北走”盖指南北疆理之极。考宋之境域，南尽交、广，北暨梁、秦，故举苍梧、雁门二郡以括其地也。

重江复关之隩。

复关旧无解，及读《南史·竟陵王诞传》，记沈庆之进军广陵，克其外城，乘胜又克小城，方悟所谓复关，即外城、小城也。

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

李善注云：“全盛，谓汉时也。”按此暗示元嘉中，广陵之繁荣。《宋书·二凶·始兴王濬传》云：“出镇京口，听将扬州，文武二千人自随。优游外藩，甚为得意。”照时侍王左右，文宴从容。先是临川王义广镇南兖州，照为国侍郎（虞炎《鲍照集序》）。时河、济俱清，照献颂有云：“闾闬有盈，歌吹无绝。朱轮叠辙，华冕重肩。”可与《芜城赋》此段互相印证。盖照身与其盛，故赋先从全盛时写入，为后来芜废张本。

① 《尔雅·释丘》：“迤逦沙丘。”《广韵》：“峛崺，沙丘状。”《甘泉赋》：“登降峛崺。”注：“峛崺，邪道也。”按迆迤、峛崺与沵迆亦一语之转。

才力雄富，士马精妍。划崇墉，刳濬洫。

《芜城赋》盖有感于竟陵王诞事而作。此二句虽泛写广陵物力之富，亦隐寓诞事。《宋书》及《南史》诞传云："初讨元凶，与上（孝武）同举兵，有奔牛（指曲阿之奔牛塘）之捷，至是又有殊勋（谓平丞相南郡王义宣也）。上性多猜，颇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为南兖州刺史。诞知见猜，亦潜为之借。至广陵，因魏侵边，修城隍，聚粮练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诞反。"按赋所言即指诞聚才力之士，练精甲，修城隍也。又诞谋反事，与吴王濞相似，故文中举"盐田"、"铜山"比况之。

板筑雉堞之殷，井干烽橹之勤。

《南史》诞传云："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广陵王。二十六年为雍州刺史。以广陵凋敝，改封随郡王。"按诞本封于广陵，及魏南侵，广陵被扰，乃徙封。至大明元年，出镇南兖，因复修葺广陵城。诞传又云："大明二年，发民筑治广陵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姓！'"此即当日板筑之事实。又按诞修广陵城，所以防魏，故有烽橹之设。《释名》："楼无屋曰橹。"《南史・文帝纪》载："魏人至瓜步，声欲渡江，帝登烽火楼极望。"照所谓"烽橹"，殆即烽火楼之类也。

出入三代，竟瓜剖而豆分。

李善注："王逸《广陵郡图经》曰：'郡城，吴王濞所筑。'然自汉迄于晋末，故云出入三代。"按此表面指汉、魏、晋，而实影射宋武帝、少帝、文帝三世，眷其盛而悲其衰。"瓜剖豆分"，隐示孝武时诸王之不睦，同室操戈，盖深有慨夫南郡王义宣、太子劭、始兴王濬及竟陵王诞之事也。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此写入广陵之芜废。其地两经兵燹，故荒凉如此。《南史・竟陵王诞传》载："诞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风，飞落屋瓦。及迁镇广陵，将入城，冲风暴起扬尘，昼晦。"又载："沈庆之克广陵，男丁杀为京观，死者数千。每风晨雨夜，有号哭之声。"所谓"风嗥雨啸"者，殆谓此耶？

饥鹰厉吻，寒鸱赫雏。

刺孝武之雄猜也。宋文帝十九男，长太子劭，次始兴王濬，俱以巫蛊事谋反伏诛。其三为孝武帝骏。嗣位以后，于诸弟间极为猜忍。武昌王浑、竟陵王诞、海陵王休茂，先后有罪授首。浑、休茂年仅十七耳。"赫雏"一语，

疑暗指二王事，兹略表其事如下：

王　名	被害年月	年　纪	事　实
武昌王浑 文帝第十子，江修容出。	孝建二年八月庚申，以雍州刺史有罪自杀。	元嘉二十四年，年九岁，封汝阴王。魏寇汝阴，徙武昌王。死时年十七。	《宋书》本传云："浑迁雍州。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逼令自杀。"其诘浑诏有"我与汝亲则同气，义则君臣，云何一旦反欲见图，文檄处分，事迹炳然。不忠不义，乃可如此。如其凶图获逞，天下谁当相容"等语。
海陵王休茂 文帝第十四子，蔡美人出。	大明五年四月丙午，以雍州刺史反被诛，传首建业。	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为雍州。死年十七。	因左右张伯超谋杀司马庾深之，集兵建牙。驰檄。行营参军沈惕之拒之，为所杀。其日，参军尹玄庆（一作度）起兵攻休茂。擒之，将出中门，斩首。母妻皆自杀。

按二王均以孱幼无知，而蒙大戮，孝武之猜忍，于兹可见。溯其即位之初，孝建元年二月，而有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之难。明年，杀武昌王浑。越四年（大明三年），而有竟陵王诞之变。又越二年，而有海陵王休茂之诛。而南平王铄（文帝第三子，吴淑仪出），又以中毒死。元嘉之末，出讨劭、濬，流血凉阙。八年之间，阋墙叠见。照始事始兴（王濬），睹此末运，闵悼旧王，无能扼腕？而竟陵之歼，殃及民庶，广陵庐舍，废为丘墟，受祸之酷，过于北魏。照伤囊日托乘之乐，痛宋室骨肉之变，故不觉其言之痛切也。虞炎序："孝武初，照除海虞令。"一本有"时主多忌，以文自高。趋侍左右，深达风旨。以此赋述，不复尽其才思"等语，意必不容于朝。观所作《代放歌行》诗意，颇及孝武之雄猜（吴汝纶说），足征予说之不谬也。

伏虣藏虎，乳血餐肤。

讥孝武之信谗，于昆弟间不能相容，及宫闱之乱也。《宋书·竟陵王传》引诞拒命时投诸城外表云："岂意陛下信用谗言，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剪。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扞徐、兖。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右军宣兰，爰及武昌（指武昌王浑），皆以无罪，并遇枉酷。臣有何过，复至于此？陛下宫帷之丑，岂可三缄？"可见当日实情。观照之所讽，岂亦同感夫此耶？

白杨早落。

慨宋室之剪落洪支也。似指太子劭、始兴王濬事（本末详《宋书·二凶传》）。

塞草前衰。

寄托魏人南侵。先是元嘉二十八年，魏兵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民，故云“前衰”也。南兖州与魏接壤，故云“塞草”。其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边风急”者，指魏兵之压境也。

孤蓬自振，惊砂坐飞。

喻朝廷之猜忌，宗室诸王之不相安。因竟陵、海陵被害诸事而感发也。

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

“同舆”句，暗指孝武与诞辈。本是同根生，初在宫中之欢娱，诞表所谓“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也。“离宫”句，寄托诞讨元凶，预同举兵，及奔牛之役，尽瘁国事，以衬孝武之刻辣寡恩。“岂忆”二字，讽甚！（诞）表云：“往年元凶祸逆，陛下入讨。臣背凶赴顺，可谓常节。及丞相构难（按即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臧、鲁协从（按指豫州刺史鲁爽及车骑将军臧质），朝野恍惚……臣前后固执，方赐允俞。社稷获全，是谁之力？”此道勤王之功，即“离宫苦辛”之事也（表文可为此二句注脚）。照益因始兴之被祸，悯竟陵之惨酷，故借“芜城”为题，纾其隐痛。其后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掌书记之任。上荆本非所愿，故诗语多悲郁（用黄节说）。而寻阳之变（时晋安王子勋僭号义嘉），临海牵及，卒罹于祸，而照亦身殉之。智者虑悉于未萌，而不能免祸于既成，悲夫！

又按或说：“临海王子瑱（即子顼）为荆州，有逆谋。照为掌书记，随至广陵见汉吴王濞故城，因赋其事讽之。”（《六朝文絜》评语）今按《南史·子顼传》：“初封临海，荆州刺史。明帝即位，进督雍州。长史孔道存不受命，应晋安王子勋。事败，赐死。年十一。”是临海之乱，乃应子勋，非素有蓄志；且属童稚，文理未通，安用照之讽耶？惟此文必作于大明五年四月海陵王被诛之后。考《宋书·孝武纪》“临海王子顼以大明六年秋七月，为荆州”，照侍王上荆，必在是年。集中有《发后渚》及《登翻车岘》诗。后渚在金陵（见《韵府》），翻车岘在句容县北（《嘉庆一统志》）。时后自京口，必经广陵。谓《芜城赋》作于是时，理或然也。

原载《东方杂志》第四十一卷第四号

论庾信《哀江南赋》

辞赋之学，近时西方已颇措意。文学史上以“致位通显而表其乡关之思”闻名之《哀江南赋》，亦有人愿花十年之力，加以译注。騠骑之功，固不可没[①]；然于该赋精义所在，尚有待于抉发焉。令狐氏于《周书》卷四十一为王褒、庾信两人立传，以二人者在当日联镳齐名。观天和中齐王宪语姚最曰：“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周书·艺术·姚僧垣附传》）可以见之。

其时文士“唯褒颇与信相埒，自余莫有逮者”。南北遘兵多年，及陈始与北周通好，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乃请王褒及庾信，周并留而不遣（《周书》三十九《杜杲传》）。信南归绝望，始寄情于是赋。自王通论次文人得失，谓“徐、庾为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中说·事君》篇），影响所及，魏徵于《隋书·文学传序》讥徐、庾“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安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袭用其说。令狐德棻于《周书》本传评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体以淫放为本，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荡心”。至贵之为词赋罪人。盖唐初隆开国气象，主文德而薄辞采，衡以季札观乐之方，子山此赋自是亡国哀音。此乃时代观点使然，若以纯文学言之，斯非平情之论。

---

① William T. Graham: “The Lament of the South, ‘Yü Hsin's’, Ai Chiang - nan f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天宝以后，乱离日积，文学观大变。杜公漂泊西南天地之间，不免有“词客哀时且未还”之叹。《哀江南赋序》言“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杜因有“庾信平生最萧瑟”之语，无异以庾信自喻，嗟东归之无日。李义山于情文尤其所耽。观《樊南甲集序》，称“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状，能感动人”。此则缠绵吞吐于声情，故所作能回肠荡气。有得于子山者独多。以视唐初之贬仰庾氏，相去何啻千里！此时代风气之转移，知人论世，其轩轾初固无定准也。

南宋楼钥有《题哀江南赋后示韩陈二生》一跋云：

> 史称信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今只见此数篇。……予得之于沙麓萧茂先家，迨今……盖三十四年矣……二生来问，适新是帙，令句句详读，且究其用事，非徒然也。盖辞之为体甚多，学者不无利钝于其间。……故今观览，欲彼摩其朴钝，发其清新，此老夫之意也。呜呼！理者，性之所自出；才者，气之所由形。中人以上，苟得其养，性使可复；才也者，不可强而致也。或曰：理重才轻，取其重而舍其轻可也。曰：势有不可偏废者焉。理则体，才则用也。体与用具，然后可以持躬而应物。二生其志之。（《秋涧文集》卷七二）

楼氏教人读庾赋，要究其用事，即刘勰《事类》篇所云“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之术，亦即陈寅恪所称古事今典之运用。庾氏精熟《左传》，用其事以比方为最多。又言“发其清新”，犹有取于杜句“清新庾开府”，借诗以论赋。至于较量理与才之重轻，如体与用之相需，理以尽性分，而才则气所由以表现。才不可学而得，庾文之胜处，即其气之不可及。《周书》庾传总论“文章之作，本乎情性……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哀江南赋》以气为主。虽长逾万言，所以超出同时若干长篇巨制，若南朝张缵之《南征赋》，北魏阳固之《演赜赋》，赡富有余，而语乏铿锵，所逊即在气之不逮。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河朔重乎气质。”实则北人之作，质有余，而气苦憾于不足。魏氏李骞之《释情赋》，李谐之《述身赋》诸篇，读之味同嚼蜡，即乏气以支撑之也。李善《上文选注表》云：“气质驰建安之体。”建安之作，由于“雅好慷慨，世积乱离，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时序》）。庾赋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即以建安为师，故情余于文，气足以控抟全局。文中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句，至于篇终，

如大曲之入破，一气到底，而句法变化，议论锋起。貌虽俪体，直是散行。而连续驱遣"之"、"而"、"于"、"曰"、"焉"、"不有"、"其何"等虚字，纯任自然，不假斧凿，与刻镂堆砌殊科。[①] 其气之宏，由于其才之大。楼氏所云"不可强致者"，此其不可学处，全在以气为主。读此赋者，幸于兹三致意焉。

又楼云："信文集二十卷，只见此数篇。"南宋所传，如姜夔云："庾郎先自吟《愁赋》。"倪璠编庾集中无愁赋，吴兆宜本庾集尚有此赋断句。王若虚谓"庾氏诗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奇怪"（《滹南遗老集》三十四），是宋金人所见庾文，尚有此赋也。

庾赋以气胜，而情文兼茂。危若悲哀之意，赋中波谲云涌，层出不穷，令人读之回肠荡气，一唱三叹。同时人忧愤之作，如萧詧与江陵构隙，反而称藩于周，导致梁之覆灭。史称其"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见邑居残毁，常怀忧愤。乃著《愍时赋》以见志"，其文具载《周书》四十八詧本传。虽愤懑悔恨之意，形诸楮墨，若"岂妖沴之无已，何国步之长沦"，"忽萦忧而北屈，岂天灵之我欺"等句，不免怨天尤人，惟其赋有质而无文，虽传而不为人所重者，以辞藻匮乏，丽旨都无，实同犬羊之鞟，何能动人之心？同是著文以哀时，彼固自哀，而人不能哀之，乃知"信言不美"，此"情采"所以重要。庾信不特以气胜，而情采尤不可及也。

一

向来注《哀江南赋》者，多详于出典。自徐树谷以讫高步瀛之笺注，无不皆然。至子山作赋之动机，罕有能道出者。陈寅恪作《读哀江南赋》，始发其端倪。既考定其作赋之年代，为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十二月，又谓赋末云"不独思归王子"，乃因杜杲使陈，与宣帝对答，涉及王褒、庾信羁于关中，不免有南枝之思，而终不获遣回南朝；复以沈炯东归有《归魂赋》，故作《哀江南赋》以见意。说近是矣。

按沈炯以梁敬帝绍泰二年（公元 556）获遣东归建康，仅四载以疾卒于吴中。《哀江南赋》之作，去《归魂赋》已二十年。谓为促成子山作《哀江南》之直接动力，似尚难言，疑必别有近因。考宣政前一载为建德六年丁酉（公

---

① 康达维教授曾论此赋使用虚字之奇特。其所举二例：一为"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按此应是"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之作倒装法。又"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于字当训"甚"。

元577)。是年正月，北周灭齐（见《周书・武帝纪》)，时信在洛阳（为洛州刺史)，遣主簿曹敏奉致平邺贺表（《庾集》卷七)。是岁七月以后，征为司宗中大夫，遂还长安。北齐之亡，颜之推自悯其遭遇，撰《观我生赋》。篇末句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秦。"其自注言：

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

所谓"至此"，自指齐亡事。当周兵陷晋阳，之推颇进奔陈之策，为丞相高阿那肱所阻，出为平原太守，守河津。齐亡之后，遂入周。可见《观我生赋》实成于齐亡之岁。文中忌讳之句，尚留方圈（如"非社稷之能卫"，及"实未改于弦望"等句)。所称"吾王东运，我祖南翔"，自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于典午旧主，尤存眷眷不忘之意。之推与阳休之、卢思道、薛道衡等十八人同征，随驾赴长安（《北齐书・阳休之传》)。此即"终荷戟以入秦"。故其赋云"亡寿陵之故步，临太行以逡巡"，而终以"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等句，心中未尝不自讼也。《家训・勉学》篇："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情非得已，故《观我生赋》当作于其入关之时，可无疑义。[1]

庾信适于是年秋后，自洛征还长安，必与之推相值。两人者，旧皆梁臣。江陵之顷，同典校书。《观我生赋》"或校石渠之文"句，自注云：

王司徒（指王僧辩）表送秘书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周弘正等校经部，王褒及正员外郎颜之推等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等校集部。

是颜介与子山同事元帝，同校书于秘府，《哀江南赋》所谓"谬掌卫于中年"者也。江陵之陷，梁臣自王褒以下并俘至长安；之推亦痫疢而就路。（《观我生赋》自注："时患脚气。")旋奔北齐，冒砥柱之险，水程七百里。之

① 缪钺《读史存稿》有《颜之推年谱》，不言《观我生赋》作于何时，只引"三为亡国之人"句注语，谓为齐幼主承光元年丁酉，即周武建德六年（公元577)，时之推四十七岁。

推《从周人齐夜度砥柱》诗，有“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句。此后遂与子山相左。及至齐亡，复入长安，与子山重晤叙旧。子山见其《观我生赋》，枨触旧感，轸念归魂，或因此而引起作《哀江南赋》之动机。我故谓《哀江南赋》之作，沈炯《归魂赋》为远因，而之推《观我生赋》则为近因也。

读《观我生赋》记台城之陷云：“就狄俘于旧壤”，“唯翁主之悲弦”[①]。又记江陵之败云：“惊北风之复起”，“恨流梗之无还”[②]。羁旅之臣，能不落泪！与子山正异曲同工。至于二赋字句，间有类似之处，时贤已道之，兹不俱论。然当是庾仿颜，而非颜袭庾。颜作在前（详见附表）。颜文以一己之涉履为经，时代背景为纬，用《易·观卦·九五》爻辞“观我生”句为题目。颜论文章，原出于经，即以宗经为先之实践。又主文“以理致为心肾”。故其文以事义为重，情文次之。庾信则取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以名篇，既怊怅以述情，亦沉吟而铺采。既以时代为经，复以身世为纬。信本家江陵，乡关思切，归来无日，惟赖招魂。羁旅怀乡，岂独王子？其文以情为首，辞义次之，故感人也深。夫以悲哀为主，其事原出音声。嵇康《琴赋序》云：“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此叔夜之所讥议者，而子山反有取焉，且袭用其句，足见其所重者在情，而不在理致。故特楬橥“哀”字。《淮南子·齐俗训》云：“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琴能使人悲，必弹奏者将情感全部投入，不徒于弦音之美；文之感人亦复如此。子山知“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制题既佳，摅文独伟，虽因颜作所引起，而结音联辞，写时代之悲哀，迥非颜文所能比拟。此其所以为千古之绝作也。

附表

548　梁太清二年戊辰（东魏武定六年，西魏大统十四年）。

庾信三十六岁。

八月，侯景反。

十月，侯景至建业。

---

① 自注云：“公主子女，见辱见雠。”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见《史记·大宛传》。

② 其历史背景，详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二《颜之推传注》。

552　梁元帝承圣元年壬申（北齐天保三年，西魏废帝钦）。

十一月，元帝即位于江陵。

信转右转将军，奉命校书。时左仆射王褒与正员外郎颜之推校史部，信与周确等校集部（《观我生赋》自注）。

554　梁承圣三年甲戌。

九月，魏于谨攻江陵，至襄阳，萧詧会之。赋云："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谓詧也。

556　西魏恭帝三年丙子，梁敬帝绍泰二年，北齐天保七年。

沈炯与王克获遣归至建康。

炯作《归魂赋》，序云："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

557　周闵帝元年丁丑，陈武帝永定元年。

十月，梁敬帝逊位于陈霸先。赋中"有妫之后"及"无赖子弟"等句，指霸先也。

562　周武帝保定二年，陈天嘉三年。

周、陈通好。

575　周武帝建德四年乙未，陈太建七年。

殷不害自周还陈（《陈书·不害传》）。

577　周建德六年丁酉。

正月，周灭齐。

颜之推入周，作《观我生赋》。自注："至此三为亡国之人。"按"至此"二字，可谛是赋必作于齐亡之岁。

578 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陈太建十年。

十二月，作《哀江南赋》。

二

《哀江南赋》旧注及摹拟者考：

隋 魏澹注。

《北史·魏澹传》："隋初，陈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之，令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博物。"庾集有注自此始。《通志·艺文略》：《哀江南赋》，魏彦渊注。

余嘉锡云："《通志·艺文略》益以魏彦渊一家，即魏澹也。此盖所注《庾信集》中之一卷，经唐人析出，偶存于宋秘阁者。"按《隋书》魏澹字彦深，《通志》作彦渊。作深乃避唐讳。《隋书·经籍志》集部有著作郎魏彦深集三卷。

唐 张庭芳注《哀江南赋》一卷。

见《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宋志》别集类。焦竑《国史经籍》作唐张芳注，夺一"庭"字。李峤《杂咏》亦张庭芳注。巴黎伯希和三七三八号敦煌卷有其残简。[1]

崔令钦注《哀江南赋》一卷。

《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哀江南赋》，崔令钦注，一卷。《唐书·宰相世系表》："令钦，国子司业。"《全唐文》三九六云："肃宗朝，迁仓都郎中。"[2]

王道珪注《哀江南赋》一卷。

见《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别集类。

按高步瀛举出《白帖》卷三"馆驿"第十及"舟"第卅一，并引《哀江南赋》注。又晏同叔《类要》卷九及卷卅三，并引《哀江南赋》注，已不能

---

① 张庭芳事迹，参看拙编《敦煌书法丛刊》，十六册（诗词类），东京二玄社印。

② 崔令钦仕履事迹，详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辨出为张为崔也。

清 胡渭注《哀江南赋》。

《四库提要》："《唐志》载张庭芳等三家尝注《哀江南赋》，《宋志》已不著录。近代胡渭始为之注，而未及成帙。（吴）兆宜采辑其说。"

徐树谷、徐炯同撰《哀江南赋注》一卷。

康熙间精刊本、《昭代丛书》别编（丁集）本。炯为树谷弟，昆山人。

吴兆宜注《哀江南赋》。

在吴注《庾开府集笺注》内。吴郡宝翰楼刊本。详《四库提要》。

倪璠注《哀江南赋》。

在《庾开府全集注》内。康熙三十六年崇岫堂刊本、光绪甲午儒雅堂本。

民国 李详《哀江南赋序笺》。

在《国粹学报》第七卷四号。

高步瀛《哀江南赋笺》。

载《北平师大月刊》第14、18、26期。

附 失名《庾子山年谱》一卷。

《历代名人年谱大成稿本》（"中央图书馆"藏）。

（以上注本）

卢献卿《愍征赋》。

"范阳卢献卿大中进士……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也。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本事诗》、《全唐文纪事》，697页）

毛奇龄《哀江南赋》。

《西河合集》。

王昙《哀江南文》。

见《烟霞万古楼文集》。纪明福王事。

《后哀江南赋》。

汪士铎作。见《悔翁日记》。

王闿运《哀江南赋》。

见《湘绮楼文集》。记太平天国事。

黄孝纾《哀时命》。

见《匑厂文稿》。次庾子山韵。

（以上摹拟）

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

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内有王仲宣《登楼赋》一首，共十四行，著录于陆翔译之《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目录》。余旅法京时，曾见原物，略有校记，附于拙作《敦煌本文选斠证之二》(《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二期，1958，2)。友人陈祚龙先生另撰《敦煌写本登楼赋斠证》(《大陆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五期)，指出此写卷《登楼赋》全无“兮”字，盖因“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谓“仲宣制作是赋之先，或已深受魏武之影响”，“不用兮字作为语助与余声，当系为求迎合魏武之情调”。陈先生入校诸本，为胡克家刻《文选》，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为习见之三种本子，并谓各本之有“兮”字，概为衍文。今案《艺文类聚》卷六十三“楼”类，引魏王粲《登楼赋》，亦无“兮”字，兹据影绍兴本录其文如次(以明胡赞序刊小字本参校)：

登兹楼以四望，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实显敞而寡仇。接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虽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凭轩槛以遥望，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目极(胡小字本作“楧”)，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川既漾而济深。昔尼父之在陈，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岂穷达之异心。惟日月之逾迈，俟河清其何极，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步栖迟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天惨惨而无色，

兽狂顾以求群，鸟（胡小字本作“乌”）相鸣而鼓翼。原野阒其无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阶除而下降，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怅盘桓以反侧。

文句既多删节，字亦与《文选》多异。《艺文类聚》为唐高祖武德七年欧阳询、裴矩、陈叔达奉诏撰集，此敦煌写卷《登楼赋》，前有刘希夷《代白头吟》断句[1]，则当钞写于《类聚》成书之后。是《登楼赋》删去“兮”字，非始见于敦煌卷，原无足异者。顷循览是卷异文，觉犹有若干剩义，兹再扬榷论之。

一、尽删“兮”字为汉以来诗赋惯例

诗赋有助词兮字者，汉以来异本常删去。例如《大风歌》：日本九条道秀藏平安朝写本《文选》，所载《大风歌》三句，皆无“兮”字。[2]《天马歌》：《史记》并有“兮”字，《汉书》省之，王先谦补注谓应有“兮”字。[3]《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宋书·乐志》《陌上桑》调《楚词》钞，改作“今有人，山之阿”，尽删“兮”字（参拙作《楚辞与词曲音乐》）。《洛神赋》：宋高宗草书此赋，句尾多无“兮”字。此皆其著例。汉初，贾谊《鹏鸟赋》，史汉所录，互有不同。《史记·屈贾传》：“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俱有“兮”字。《汉书·谊传》则作“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四字一句，删去“兮”字。[4]《文选》五臣本《鹏赋》，亦无“兮”字。足见西汉时辞赋间将“兮”字省去，亦有移易其位置者。《吊屈原赋》：《史记》“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一段，《汉书》作“于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是其例。即移“兮”字于下句之末。

六朝文士引用楚辞，亦每省略“兮”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论五言诗之始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惟全曲。”今按《沧

---

① 终于“须臾鹤妖乱如丝，但看故（古）来歌舞”，下残。全诗可参《搜玉小集》。

② 见吉川幸次郎《关于汉高祖之大风歌》，《中国文学报》第三册，33 页。

③ 参看逯钦立《汉诗别录》，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315 页。

④ 惟中间引《老子》“祸兮福所倚”二句，及引《庄子》“其生兮若浮”，“兮”字不删，余皆省之。又《史记·伯夷列传》，引“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等句，同《汉书》无“兮”字，而《史记·谊传》则有之，同一书中已自不同。

浪之歌》，见于《孟子·离娄》及楚辞《渔父》，又《水经注》引地说，俱作"沧浪之水清兮"，有"兮"字。钟嵘《诗品序》："夏歌曰：'郁陶乎余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按《离骚》"名余曰正则兮"，本有"兮"字，此省。《水经·夏水注》："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此《九章·哀郢》文，原有"兮"字，此省。《北史·隐逸·张文诩传》，引"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亦省"兮"字。

或改为其他语助者：《南史·刘勔传》：刘谅引"帝子降于北渚"，湘东王云"目眇眇以愁予"，今本"以"原作"兮"。具见引用辞赋原句，助字可以省改。《登楼赋》见六朝人征引者，亦每省去"兮"字。《宋书·王华传》：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文心雕龙·丽辞》篇："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水经·漳水注》："漳水又南，径当阳县，又南径麦城。王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之曰'夹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长洲'，是也。"临文引用，省略"兮"字，乃至寻常。再观王粲所自作各赋，无"兮"字者有：《槐树赋》、《柳赋》、《白鹤赋》、《鹖赋》、《鹦鹉赋》、《莺赋》。有兮字在句中或句末者有：《游海赋》、《浮淮赋》、《出妇赋》、《寡妇赋》、《初征赋》、《羽猎赋》、《迷迭赋》、《玛瑙勒赋》等。是仲宣所作他赋，屡用"兮"字，自非迎合魏武可知。

二、敦煌写本异文斠补

敦煌写本，诸多异字，陈先生已略论之，兹更补陈如次：

"聊暇……"

按暇字与胡本同，李善注"暇"字下云："古雅（切）。"又注："暇或为假。楚辞云：'迁逡次而勿驱，聊假日消时。'"许巽行《文选笔记》引师古曰："楚词云：'聊假日以偷乐。'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闷。假延日月，苟为娱乐耳。今俗犹言借日度时。今之读者改假为暇，失其意矣。"今按《类聚》及唐写本皆作"暇"，未必为后人所改。

"览斯宇"

敦煌本此句缺。《类聚》亦作"览"，与《文选》同；张溥作"觉"，未可据。

"寡求"

按“求”，《文选》作“仇”。“求”常读为“逑”。《诗》：“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尔雅·释诂》：“仇，匹也。”郭注引《诗》：“君子好仇。”《太玄经·玄测》曰：“谨于媐執。”范望注：“執，匹也。”《释文》：“媐与妃同，執音仇。”仇与逑、執字并通。唐写本作“求”，乃省借。

“侠清漳”

胡刻《文选》作“挟”，《水经·漳水注》引作“夹”，《类聚》作“接”。

“曲沮”

“沮”字，与《文选》同。《水经·沮水注》：“沮水又南，径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作“沮”字是。《类聚》作“曲阻”，恐误。

又《水经·漳水注》云：“漳水又南，径当阳县，又南径麦城。王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之曰‘夹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长洲’，是也。”熊会贞《水经注疏》：“沮水注叙昭王墓，东对麦城，随引《登楼赋》‘西接昭丘’以证之。意以所谓西接者，就麦城言，已隐隐以仲宣所登为麦城之楼矣。此于麦城更凿凿言之，曰‘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之’，且揭出夹清漳、倚曲沮二语，以麦城在沮漳间也，是不从盛弘之当阳城楼之说，郦氏必有所据，今不可考矣。”今按仲宣楼古迹，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以为当阳城楼，与郦说异。又《文选》五臣刘良注云：“登江陵城楼。”明王世贞则谓在襄阳，此后出之说，自不可信。

“陶沐”

《艺文类聚》、《文选》并作“陶牧”，《水经注》引亦同，与此迥异。陶牧，地望未详，五臣张铣云：“陶，乡名；郊外曰牧。”不言所在。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终于陶。”按此说实误，《水经·夏水注》已纠正之。其言曰：

> （夏水）历范西戎墓南（墓在今监利县西北）。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晋太康地记》、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记，并言在县之西南。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检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观其所述，最为究悉，以观径其地，故违众说，从而正之。

郭仲产有《南雍州记》。据其调查所见，此乃范西戎墓，与陶朱公无涉，

郦氏据以驳正诸家说，是也。《史记·越世家》引《括地志》："齐州平阴县东陶山南五里有朱公冢。又曹州济阴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冢。"

敦煌写本作"陶沐"，颇疑"沐"或"木"之异文。[1] 古地名以木称者，如構木（《左·庄四年》）、杜木（格伯殷）、根木、楮木（散氏盘），木指都邑四疆之封树。陶木与昭丘对言，殆指陶地之封树。姑备一说。

"通于怀土"

"通"，各本作"同"。按《释名》："通，同也。"两字可通。怀土者，陆机有《怀土赋》，可参看。

三、《登楼赋》写作年代

赋云："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李善注引（《书·毕命》）孔传云："十二年曰纪。"按此文当作于建安十年以后。《三国志》二一《王粲传》："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骚乱，皆不就。乃之荆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卢弼集解云："粲年十七岁，为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又云："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八月表卒，时粲年三十二岁，在荆州已十六年矣。"案粲于兴平四年之荆州，至建安九年（公元204）恰为十二年。是年七月，曹操破邺，自领冀州牧。赋云"逾一纪"，即在建安九年之后，至十三年八月刘表卒，九月刘琮降操，此四年之间所作。粲传又云：

> 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袁绍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俊杰也。表不知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赋中"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似发端于曹操收用冀州豪杰之

---

① 《墨子·节葬》篇："越之东，有輆沐之国。"《列子·汤问》篇作"辄木之国"。是"沐"、"木"通用之证。

时。建安九年，操领冀州，士已有归心者。粲是时依刘恰一纪，年二十九矣。其作此赋，操尚未下荆州。又足见敦煌本不用“兮”字为语助，与魏武究无何关系之可言也。

四、余论

粲长于词赋，魏文谓其“《初征》、《登楼》、《槐赋》，虽张、蔡不过也”（《典论·论文》）。而陆云评云：“登楼名高，恐不可越。”又云：“仲宣登楼，前即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与兄平原书》）传诵既久，拟作亦夥。如晋孙楚有《登楼赋》，其句云“聊暇日以娱心”。又枣据亦有《登楼赋》，有云：“……登兹楼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桑麻被野，黍稷盈亩。……怀桑梓之旧爱，信古今之同情，钟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不特仿其体，且袭其句。此文衣被词人，已非一代，吟诵所致，且及边陲。拙文前论，愧未周浃，聊因陈君之佳作，重为轸发，仍乞有以教我也。

法京国家图书馆此卷，乃杂录诗赋，王仲宣此赋之后，下接《落花篇》。其词云：

> 仲春欲半风始暄，澹荡先来吹果菌，菌里□花开不歇，桃花未尽梨花发。蛾眉无数春园里，共爱春风满园起。欲举红树弄芳范（花），更起因风乘洛范（落花）。花洛因风不因折，飞满空中下如雪。散衡玉面点凝妆，乱着罗衣碎成缬。纷纷林里满林芳，一回风起一回香，半着罗裙人掩得，半飞红沼水漂将。晚来零落花渐稀，见在收将且送归，攲中擎得□兼□，袖里捻看畏却飞。归去明朝须早来，且废新荘（妆）事镜台，忽愁一夜风吹尽，一般吹尽一般开。

文采绮艳，未谙出何人之手。因曾录存，附载于此，以供欣赏，且俟知者。

原载1962年《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

《辞赋大辞典》序

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 Hyperbole 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c），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汉人取其体以咏物述志，牢笼山川，驱遣风物，益以文字、词汇之递增，遂肆为侈丽闳衍之辞，浸以涓流，蔚为大国。

刘歆《诗赋略》所录赋家，举作品最多者，迹其存佚之篇，概如下述：庄忌著录二十四篇，今存一篇；淮南王著录八十二篇，今存一篇（有名无文）；淮南群臣四十四篇，今佚；枚皋一百二十篇，今佚；司马相如二十九篇，今存十篇；严助三十五篇，今佚；刘向三十三篇，今存九篇（不计《九叹》）；王褒十六篇，今以赋名者仅存二篇；扬雄十二篇，今存十一篇。枚皋与淮南群臣今无一篇之存。淮南王为篇八十，今只有《招隐士》与《屏风》一赋。观《淮南子》书，文辞瑰伟，洵不愧为首位赋家，相如以前，导夫先路，赋之成型，肇功于彼辈，惜诸作沦佚，得非赋史之巨憾乎！

近世撰文学史者，于赋多所蔑视，或嗤为冢中枯骨。余曩日撰《赋话》，曾力辨其非。十载以还，赋学重兴。《全汉赋》且已辑集印行。其他论著蜂起，硕果丰茂，盛极一时，学术风气之消长，往往非始料所及也。近顷辞典一类之书流行，成一时之风尚。诸家乃有《辞赋大辞典》之作，霍君松林、徐君宗文实董其役，经营三载，网罗宏富，区为九类，所收词条共四千五百，灿烂炳焕，度越前古矣。余独惜研究者多而撰作者寡，但

得此资为宪章，有所凭借，何患乎无大作乎哉！故知积习生常，幽思摛藻，张大汉之德馨，冀来者之秀发，指日可期，无待扬扢。用是不揣固陋，乐为喤引。

1994 年 6 月于香港

赋话六种序

赋学之衰，无如近代；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古之为赋者，在德音九能之列。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堂庑之上，揖让之间，以微言相感，自有其实用之价值也。刘彦和云："登高之旨，睹物兴情。"宋龚鼎臣《东原录》云："赋者，缘物以成文，必辞理称，则彬彬可观。"夫缘物有作，荀况《蚕》、《云》之类是也，往往折衷于理，故文有其质。若乃兴情之制，则犹诗之缘情，而日趋绮靡，六朝俪赋，斯其极挚，《芜城》、《小园》，靡亦甚焉。降而下之，以赋为科举之习作，间且成散体之尾闾，《文苑英华》所收，读之殊难终卷，肤受不精，浸失旧观。现存论赋较早之书，有日本流传失名之《赋谱》，作于太和以后，分述句式之壮、紧、长、隔、漫、发、送等法门，唐人律赋作法，可窥一斑。

五代赋集多至二百卷，见唐圭璋《南唐艺文志》，"江文蔚《唐吴英秀赋》七十二卷，出《宋志》；徐锴编《赋苑》二百卷，出《崇文总目》"。《永乐大典》赋字，只存二卷（即卷一四八三七及一四八三八），征引《大全赋会》，多为有明考试有关性理之作，亦赋之别格（如盱江邹子益之《圣人拟天地参诸身赋》）也。然明人拟古，鸿篇屡出，于以制割大理，羽翼风骚，亦甚有可观者，而世多忽视之（明陈山毓有《赋略》一书）。其时小学虽亡，赋仍间作，岂至皋文修补《黄山》，始成绝业也哉！（此反章太炎《辨诗》说。）何君沛雄，向从余问学，特致力于赋。既有志乎《全汉赋》

之辑，复裒集诸家赋论，都为一帙，以便来学，而征及下走。余愧无诠次，偶有著笔，祇同目论，稽考史事，辄及赋篇。拉杂言之，馈贫而已；若云欲师斫轮，言其甘苦，则吾岂敢。

乙卯仲春饶宗颐叙



文选卮言

卷十一



文藝風言

目　录

敦煌本《文选》斠证

敦煌莫高窟石室所出唐人《文选》写卷，罗叔言影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者，有《西京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此三种俱有李善注；又任昉《王文宪集序》、沈约《恩幸传论》至范晔《光武纪赞》，则为白文。日本神田喜一郎影入《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者，有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王俭《褚渊碑文》，俱白文无注，及《文选音》一种。余旅法京时，每日至国家图书馆，馆藏有关《文选》各写卷，细读殆遍。又伦敦大英博物院藏亦有《文选》残卷三种，为成公绥《啸赋》、《答临淄侯》、《阳给事诔》残简，并为影录。计英法所庋敦煌《文选》写本，共得十六，兹依今本卷次表列如下：

卷　次	篇　名	行数起讫	编　号
卷末题"《文选》卷第二"一行，与今本善注合	张衡《西京赋》	三三行。由"井干叠而百增"起，至赋末李善注。字里行间偶注反切	伯希和目二五二八
今本卷第十一	王粲《登楼赋》	共十四行	伯希和目三四八〇
今本卷第十八（原卷题"《文选》卷第九"，知为昭明旧"三十卷"本）	成公绥《啸赋》	共四十一行。起"自然之至音"，终"音声之至极"句	斯坦因目三六六三

续前表

卷　次	篇　名	行数起讫	编　号
今本卷第三十八	谢灵运乐府一首（《会吟行》），鲍照乐府五首（《出自蓟北行》、《结客少年场行》、《东门行》、《苦热行》、《白头吟》）	存六十五行，起“以秋芳来日苦短”句	伯希和目二五五四
今本卷第四十	《答临淄侯》	存二行“而辞作暑赋弥日……而归憎其皂（即皃字）者也伏想……”十六字	斯坦因目六一五〇
今本卷第四十五	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李善注）	存一百二十行。起“不可胜数”句，终“释褐而传”	伯希和目二五二七
今本卷第四十六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存十行。起“共也我大齐之握机”句，至“普汎而无（私）”句	伯希和目二七〇七
同上	同上	存五十四行。起“用能免群生于汤火”句，讫王文宪集序开端两行	伯希和目二五四三
同上	任昉《王文宪集序》	存八十行。起“之旨沈郁澹雅之思”句，讫“弘量不以容非攻乎异论归之”句	伯希和目二五四二
今本卷第四十八	扬雄《剧秦美新》（后段）、班固《典引》（开端）	存二十七行	伯希和目二六五八
今本卷五十（原卷题“《文选》卷第廿五”，知为昭明旧三十卷本）	沈约《恩幸传论》至范晔《光武纪赞》末	存六十七行	伯希和目二五二五
今本卷五十三	李康《运命论》	存三十四行	伯希和目二六四五

续前表

卷　次	篇　名	行数起讫	编　号
今本卷五十五	陆机《演连珠》	存百四十五行	伯希和目二四九三
今本卷五十七	颜延年《阳给事诔》	存七行，起“贞不常祐义有必甄”句	斯坦因目五七三六
同上	同上	存三十五行。起“受陷勍寇”，讫篇末，并《陶征士诔》篇题	伯希和目三七七八
今本卷五十八 原卷末题“《文选》卷第二十九”，知亦昭明之“三十卷”本	王俭《褚渊碑》文（后段）	存五十四行	伯希和目三三四五

此外与《文选》有关之写卷又有：

（一）《杂诗》二首，潘岳《悼亡诗》四首，石崇《王明君辞》一首

刊伯希和目二五〇三，此卷乃《玉台新咏》，罗氏《古籍丛残》已印出。

（二）《文选音》

刊伯希和目二八三三，存二十三节末，至第廿五节开端。《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已刊出，周祖谟有文研究，载《辅仁学志》。

（三）《李陵苏武往复书》

巴黎所藏有三卷：其一列伯目二四九八，为天成三年戊子岁（公元928）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写本；其一列伯目二八四七，为丁亥年（公元927）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静惠写本；其一列伯目二六九二，为壬午年（公元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写本。伦敦所藏亦有二卷：一列斯坦因目一七三，一列斯目七八五。此皆唐人假托苏、李之作，与《文选》所收《答苏武书》不类。

上举十五种《文选》写卷，大别言之：

（一）白文无注三十卷本

此类即《梁书》、《隋志》所云之《文选》三十卷本，乃昭明原来编第，

李善作注始析为六十卷。伦敦藏之《啸赋》，巴黎藏之《剧秦美新》、《典引》、《恩幸传论》至《光武纪赞》与《褚渊碑文》并著卷数于末，盖即三十卷本。

(二) 李善注本

此类只见两卷，即巴黎藏之永隆钞本《西京赋》，及《答客难》、《解嘲》，刘师培并撰有《提要》。

其中有原属一卷，裂为数段可以缀合者，如伯目二七〇七、二五四三、二五四二诸卷是。《登楼赋》同卷又钞唐人《落花诗》，则非《文选》原本，乃偶笔录王仲宣此文耳，姑并列于此。

兹十数卷，俱唐人或更早之写本，吉光片羽，弥觉可珍，持与扶桑所传百二十卷本之《文选集注》，及宋刊、胡刻诸本，参互校核，创获殊多。清代学者于选学致力至勤，惜限于闻见，如许密斋（巽行）平生校雠萧选至七十二岁，凡十三次，始成定本，而所见不出汲古阁本。（见许氏《文选笔记》卷一《密斋随录》。）益叹今人眼福，迥非前贤之所能及。兹就勘校所及，依各卷次第，记之于后。

一、永隆写本　《西京赋》薛综、李善注

此卷罗氏影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寺在长安，此当出寺僧手录。永隆为唐高宗年号（公元 680），伦敦所藏写卷列斯坦因目一八三五号者，末亦题永隆元祀，与此堪称双璧。善上《文选》表，在显庆三年（公元 658），至永隆相去二十二年，考善卒在载初元年（即永昌元年，武后年号，公元 689），是此永隆卷缮写时，善尚生存。李匡乂《资暇录》谓：“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此永隆写本未知为初注抑覆注本，然距善之卒，仅九年耳。

蒋黼跋此卷云别有校勘记，原文未见；惟刘师培则撰有《提要》（刘文有误处，如谓“少君已见《西都赋》，各本复注少君事”，然《西都赋》但注少翁事耳）。高阆仙《文选李注义疏》，已尽将此注异文录入（间有微误者，如此卷“穷身极娱”，而高氏以为当作“穷欢”，不知穷身语乃见《楚辞·大招》），两家辨订异同，颇为详备，兹之考校，多所采摭。又日本上野精一氏

藏有旧钞《文选》白文，中有《西京赋》，故并入校，即文中所称上野本者也。

井幹叠而百增 唐永隆年弘济寺写本《文选》残卷张平子《西京赋》起此，“井”字已漶，“幹叠”二字余左半。“增”字，永隆本、各刻本并同，惟汉《郊祀志》颜注引作“层”。颜注又云：“幹或作韩，其义并同。”

臣善曰汉书 永隆本注前半行，存此五字，以刻本校之，无薛注“崛高貌”三字。“曰”下无“广雅”六字。《汉书》下接“孝武立神明台”。字数殆与《四部丛刊》景宋六臣本同（以上简称“丛刊本”），知此行共十二字。永隆本凡善注皆作“臣善曰”，后不再举。

又曰武帝作井 永隆本后半行注存此六字，以位置推之，其下应是“幹楼高五十丈”，即此行同前行各十二字，而丛刊本尚有“辇道相属焉”，为永隆本所无。以上善注二段，胡刻作“神明井幹已见《西京赋》”。其非善注原貌可见。

（跱游极）于浮柱 永隆本上三字已漶灭。

置浮柱之上 永隆本注后半行仅存此数字，“之”字为各刻本所无。

（两头受栌）者 永隆本此句止存一“者”字，其上漶，其下接正文。知胡刻“广雅”以下十六字为永隆本所无。

累层构而遂跻 “跻”永隆本注作“隮”，各刻本文注并作“隮”。

隮升北辰极也 永隆本注止此，“升”下无“子奚反”，“极”上无“北”字，胡刻本、丛刊本同有，又有善注“山海经”八字，但“经”下并脱“注”字。

集重阳之清瀓

雰埃 此上无“消散也”三字。

下地之垢秽 “垢”字各刻本作“埃”。

之中也 “也”字与丛刊本同，胡刻无之。

上为阳清又为阳 永隆本、丛刊本同，胡刻“阳清”二字误倒。

故曰重阳 丛刊本脱“曰”字。

入帝宫 “入”上各本有“而”字。

宸音辰 胡刻、丛刊本此上并有“雰音氛”三字，永隆本无。

瞰宛虹之长鬐 “寃”字与日本上野氏藏古写本同，各刻本作“宛”。案寃为寃俗字，《说文》兔部：“寃，屈也，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又雨部：“霓，寃虹。”此寃虹为屈折之虹也。又扬雄《解嘲》“谈者宛舌”，师古

曰："宛，屈也。"故冤与宛通。

鬈渠只反　永隆本止存此注末四字，其上漶者当是薛注及善曰十六字，其下无"广雅"以次三十字。又永隆本切音皆称"反"，后不再举。

瑶光与玉绳　永隆本正文作"瑶"，注作"摇"。"玉"字古写无旁点。

第七曰摇光　马国翰辑本运斗枢，引《曲礼正义》、《檀弓正义》、《史记·天官书索隐》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皆作"摇光"，惟《西京赋》注作"瑶光"。不知永隆本正作"摇"，与各本引合，《文选》刻本涉正文而作"瑶"耳。

怵悼栗而怂兢　《龙龛手鉴》云：正作"怂"，今作"慫"。丛刊本作"耸"乃借字。

言恐堕也　永隆本"言"上无"怵恐也"以次十字。

《方言》曰怂悚也先拱反　各刻本"方"上有"广雅"六字，此下有"怵音"六字，"悚"作"栗"。案《方言》十三："耸，悚也。"永隆本与之合，两刻本并误。丛刊本又误薛注之"栗"为"悚"。

增桴重棼　"增"字与丛刊本同，胡刻作"橧"，《考异》谓尤氏之误。案《礼记·礼运》"夏则居橧巢"，《释文》云："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则登反。"是橧、增字通用。

反宇业业　丛刊本"反"下校云"五臣作及"。

屋扉边头瓦　"扉"字各刻本并作"飞"。

旗不脱扃

熊虎为旗　此句之上，永隆本无"《尔雅》曰"三字，各刻本有。案句见《周礼·春官》，非《尔雅》文，刻本误。

左氏传曰　文见宣十二年，《释文》、《正义》并云："张衡《西京赋》云，旗不脱扃，薛综注云，扃所以止旗。"今各本此段薛注止云"扃，关也"，无止旗句。知崇贤所谓"旧注是者因而留之"，盖有删节。永隆本"关"字多误作"開"。

蕲巨衣反　永隆本此句居末，盖顺序为注，各刻本误倒在"楚辞"上。

栎辐轻骛　胡刻"栎"字误从车旁，但注从木旁，与各本同。此节注乃薛注，丛刊本置于"善曰"之下，误。

连阁云蔓　"连"字永隆本先作"途"，后改"连"。胡刻作"途"。丛刊本作"连"，校云"善本作途"，胡绍煐曰"作连是"。"蔓"字与上野本同，刻本正文与注并作"蔓"。

门千户万

说文曰诡违也　永隆本“西都”上无此六字，各刻本并有。案此非《说文》语，《说文·言部》：“诡，责也。”《心部》：“恑，变也。”应如本书《辨亡论》上善注：“《说文》曰：恑，变也，诡与恑同。”方合。但永隆本既无此语，当是后人混增。

转相逾延

移贱切　永隆本无此三字，胡刻混入他本音切，误与薛注相连。

望叫窱以径廷　“叫”字永隆本与上野本同。丛刊本作“窌”，校云：“五臣本作叫。”胡刻作“窌”。胡绍煐谓“叫”盖“窌”之假，后人加穴。

方万反　永隆本“方”上脱“返”字。

墱道丽倚以正东　“墱”字各本皆同，丛刊本校云“五臣本作隥”。“丽”字各本作“逦”，注亦各随正文。

一屋一直　永隆本“屋”乃“屈”之讹。

乃从城西建章馆而逾西城　“城西”二字及“而”字乃永隆本所独有。

墱都亙切　“西墉”下，永隆本无此四字，刻本并有。

横西洫而绝金墉

洫城池也　永隆本“墉”上无此四字，因已见本篇上文“经城洫”句下薛注，有者殆非善留薛注原貌。

墉墙谓城也　永隆本有“墙”字，各本并无。

似此山之长崖　永隆本“崖”字各本作“远”，案赋云“遐坂”，则注作“长崖”正相应。

洫已见上文　句与胡刻同，指上文“营郭郛”句下善注，丛刊本复作“《周礼》曰：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疑茶陵陈氏所谓增补六臣即属于此类，丛刊影印宋建阳本，亦增补本也。

城尉不弛柝　“弛”字，永隆本、胡刻本同，丛刊本文注并作“驰”。

郑玄周礼注（凡十八字）　永隆本无，刻本并有。

柝音托　刻本作“柝与欜同音”。永隆本无郑注欜字，故云“柝音托”。然刻本之“欜”，亦与今《周礼·天官》之“柝”所见异本。

前开唐中弥望广潒　各本并同，丛刊本校云：“唐五臣作堂”，“潒，五臣作象”。

汉书曰建章宫其西则唐中数十里　永隆本有此十四字，胡刻作“唐中已见《西京赋》”，盖已见从省例。丛刊本则增补此注，尚有“如淳曰唐庭也”

六字，概从《西都赋注》截取。

又曰五侯大治第室连属弥（望）　“又曰”二字跟上文“《汉书》曰”来，胡刻已省去《汉书》建章宫一节，故“又曰”二字改作“《汉书》曰”三字。丛刊本已增补上节，而此节复作“《汉书》曰”，非善注之例，盖增补时失检。“弥”下永隆本脱“望”字，各刻本并有。“弥望”下，胡刻有“弥竟也言望之极目”八字，乃颜监《汉书注》，或后人混入，永隆本、丛刊本并无之。《考异》云：“袁、茶本无此八字，是。”

字林曰激水潒也　此永隆本引文，下四字有误。胡刻作“潒，水潒瀁也”，与《说文》合。任大椿《字林考逸》六《水部》：“潒，水潒漾也。”《说文释例》云：“漾即瀁之篆文。”是任氏所据《文选》与《说文》合。丛刊本“潒瀁”作“潒潒”，袁、茶本同，案《广雅》释训“潒潒，流也”，是作“水潒潒”者义亦可通，但异于所引《字林》原文矣。

顾临太液（二句）

汉书曰建章宫其北治太液池　永隆本、丛刊本同，胡刻作“已见《西京赋》”，但永隆本“治”字与《汉书·郊祀志》合，胡刻西都注，丛刊本《西都》、《西京》两注皆误“治”作“沼”。

渐台立于中央（二句）

汉书（十五字）　永隆本、丛刊本有此十五字，胡刻作“已见《西京赋》”。

眇赤文也　永隆本作“眇”，乃“旷”之讹。正文仍作“旷”。

清渊洋洋　“渊”字避讳缺末笔，以下多同，从略。

峨峨高大也　永隆本此句在“臣善曰”之下，是善注也。胡刻在“善曰”之上，丛刊本亦作薛注。

三山已见西都赋　永隆本、胡刻本同，丛刊本引《汉书》十八字与《西京赋》注同。此节注永隆本特多误笔，如“三辅”脱“三”字，“清渊海”下衍“三”字，“三山”又误作“波山”。

龉音吾　永隆本注作“齬”，正文则为“龉”。其言音某者只此三字，胡刻此上有垒音等十一字，永隆本无之，丛刊本则二字反切、单字注音，并分系正文各字之下，其与胡刻并有者，如“龉”下系“音吾”二字则相同，“崑”下只系一“罪”字，与胡刻作“音罪”二字者不同，又“嵒”下系一“岩”字，而胡刻则无“嵒音岩”三字，此种分歧，颇难究诘。

长风激于别岛　永隆本先作“隝”字，后乙去，旁作“岛”字。上野本

及各刻本并作“隝”，丛刊本校云“五臣作岛”。隝与岛同。

水中之洲曰岛　永隆本只改正文，注仍作“隝”。又各刻本“隝”下有“音岛”二字，永隆本无。

濯灵芝之朱柯　“之”字，永隆本、上野本同，各刻本作“以”，丛刊本校云“五臣作於”。

北海中　“北”字各刻本并作“皆”。

海若游于玄渚

无冯夷　各刻本“无”作“舞”。

水一溢一否为渚　永隆本此句，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引“《韩诗》云一溢一否曰渚”相合，各刻本并误作“水一溢而为渚”，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并引《释文》及善注，而释之云“谓一溢而一涸”。

三辅三代旧事　各刻本脱“三代”二字。

中坂蹉跎　此下各刻本有“广雅”以次八字。永隆本“蹉”字作“嗟”。

采少君以端信　“以”字，上野本及各刻本并作“之”，与永隆本异。

少君栾大已见西都赋　胡刻本、丛刊本“栾大”上并有《史记》三十一字述少君事，永隆本无之。丛刊本节引《汉书》四十一字述栾大事，不作“已见西都赋”。案《西都赋》五利下删引《汉书》。胡刻、丛刊并于“曰”上脱“大”字，致误栾大语为武帝语。而丛刊本补录此注则作“大曰”，不误。

屑琼蘂以朝飡　“飡”从冫，永隆本、上野本并同，各刻本从歹，高步瀛谓“当作餐，亦作飧，饔飧字从夕不从歹，作殩者误”。

精琼靡以为粮　各刻本误“精”为“屑”，又以“粮”为“怅”。永隆本“精”字不误，“粮”乃“怅”之误。

美往昔之松桥　永隆本“桥”字，各刻本并作“乔”。

列仙传曰赤松子　永隆本此段凡十七字，丛刊本句末多“以教神农”四字。

又曰王子乔　永隆本此段凡二十二字，丛刊本同。连上二段胡刻作“已见《西都赋》”，其《西都赋》“松乔群类”下善注，与丛刊本同。

天路隔无相期　“相”字，永隆本引枚乘诗误衍。又此句下，永隆本无“要乌尧反”四字，殆非善注，刻本误以他注混入。

韦照曰　韦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作曜。永隆本或作“照”，间或作“昭”，各刻本概作“昭”。

想升龙于鼎湖

下迎黄帝上骑龙乃上去　此段善注引《史记》封禅文书有删节。永隆本不复“黄帝”字，应从刻本加；刻本“骑”上无“上”字，应从永隆本加，文义乃足。

如脱屣耳　“屣”字乃《汉书·郊祀志》文，《封禅书》作“躧”，《汉书·地理志》颜注云：“躧字与屣同”。

若历世而长存　永隆本“世”字不缺笔。

言若历世不死而长存　永隆本此句，当是善初注原貌。胡刻本、丛刊本并作“言若历代而不死”，殆是后注曾删润。

街衢相经

一面三门　胡刻本、丛刊本“一”上并有“街大道也经历也”七字，又有善注四十七字。永隆本并无之，且但作“面三门”，无“一”字。

廛里端直　永隆本正文与注并作“厘”，上野本作“缠”（《西都赋》“傍流百厘”，又作“缠”），各刻本并作“廛”。

都邑之宅地曰厘　永隆本“宅”字，各刻本作“空”。案《周礼·地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郑注：“郑司农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谓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孙诒让曰：“通言之，廛里皆居宅之称；析言之，则庶人工商等所居谓之廛，士大夫所居谓之里。”薛注作“宅地”，盖不用先郑说。

以廛里任国中之地　刻本并脱“里”字。

当道直启

故曰第也　各刻本此下并有“北阙”以次八字。

期不陀陊　永隆本、上野本同作“陀”，各刻本同作“陁”，但永隆本注又作“陁”。

好工匠　各刻本无“工”字。

方言曰陁式氏反　各刻本“陁”下并有“坏也”二字，案《方言》六：“陁，坏。”郭注：“谓坏落也。”永隆本盖有误脱。

说文曰陊落也　各刻本并误“陊”为“陁”。

土被朱紫　此句下，永隆本止有薛注，各刻本多善注十二字。

设在兰锜　永隆本正文作“兰”，而注作“阑”，各刻本文注并从艹。

武库天子主兵器之官也　永隆本“武”上无“锜架也”三字，此殆后人所加。如薛注原有，则应顺文次序，不在“武库”之上。“官”字各刻

本作“宫”。

刘逵魏都赋注曰　案《魏都赋》“附以兰锜”句下，《吴都赋》“兰锜内设”句下，并引《西京赋》句。吴都注在“刘曰”之下，魏都注在“善曰”之下，然并无注释，不见此处所引十余字。善于《两京赋》薛注已有去留，则于《三都赋》之刘注或张注有所删汰，并不足异。

非石非董畴能宅此　二“非”字，上野本、各刻本并作“匪”。永隆本初脱“能”字，后淡墨旁加。

因显自决　各刻本“自”作“口”。案《汉书·佞幸传》宋本、今本并作“白”，应照改。

诏将作为贤起大第　各刻本“将作”下有“监”字，《汉书》原作“将作大匠”。

木土之功　“木土”二字，永隆本与《汉书》合，各刻本倒作“土木”。

廓开九市

阛中隔门也　各刻本此句下有“崔豹释阛阓”十四字，或疑薛综不能引崔说，因谓崔说应在“善曰”之下，然善顺文作注，又不应在“九市”之上，殆后人混入。

汉宫阙疏曰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永隆本、丛刊本同有此，胡刻本作“九市已见《西都赋》”。案《西都赋》“九市开场”下注同，又“道东”下各刻本有《苍颉篇》七字，永隆本无。

俯察百隧

隧列肆道也　刻本无此句，胡刻于善注末作“隧已见《西都赋》”。案《西都赋》“货别隧分”下注引此五字，上冠“薛综《西京赋注》曰”，前后自能照顾，即“重见者云见某篇亦从省也”之例。丛刊本薛注无此五字，而善注内作“薛综《西都赋注》曰隧列肆道也”十二字。

周制大胥　“胥”作“胥”，与汉《韩敕碑》同。

今也惟尉

为三辅更置三辅都尉　此节善注引《汉书》凡二十六字，乃删节《百官公卿表》内史条文，以三辅都尉释赋文“今也惟尉”，其义甚明，五臣翰注即用其说，高步瀛据《玉海》引《黄图》曰“以察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更可互证。今胡刻及丛刊本无“更置三辅都尉”六字，而易以“市有长丞”十六字，反与赋文不相照，殆后人误改，而翰注袭用者乃未误改之本也。

瑰货方至　“瑰”字，永隆本文注并同，各刻本注作“瑰”，而正文则作“瓌”。

鸟集鳞萃

言奇宝　胡刻六臣并误脱“言”字。

鳞之接也　“接”字，他刻本作“萃”。

鬻者兼赢　“赢”乃“嬴”之讹，注同。

匮也　“匮”下脱“乏”字。

裨贩夫妇

以自裨益者　薛注止此，各本无“者”字，下有“裨，必弥切”四字，丛刊本注中已有此四字，正文“裨”下又系“必弥”二字，知薛注混入之音切，殆在增并六臣注之前。

日夕为市　《周礼·地官》原文为“夕时而市”，永隆本微误，各刻本亦以“而”作“为”。

贩夫贩妇为主　永隆本、六臣本同，与《周礼·地官·司市》合。胡刻误作“裨贩夫妇为主”。《考异》知尤本与袁本、茶陵本不同，尚未勘《周礼》原文。

蚩眩边鄙

以欺或下土之人也　胡刻、丛刊本“或”作“惑”，无“也”字。惑、或字通。

而贳之　与《周礼·天官·典妇功》合，胡刻、丛刊本并误“贳”为“买”。

郑司农曰　胡刻、丛刊本并误作“郑玄”。又各本此下有引《苍颉篇》、《广雅》、《左传》注共二十四字。

优而足恃

昏勉也　胡刻、丛刊本此下并有“邪伪也”三字，永隆本无，高步瀛云：“疑后人窜入”。

丽靡奢乎许史　“靡”与上野本同，各本作“美”。又各本此句下有薛注十四字。

生元帝帝封外祖父广汉为平恩侯　各本无“生元帝”三字。案此注节录《外戚传》文，据《传》，乃宣帝立元帝为子时，封太子外祖父广汉为平恩侯，及元帝即位，广汉已前卒，复封广汉弟子嘉为平恩侯，奉广汉后，善注不了了。

壮何能加

汉书曰翁伯以败脂而倾县邑　刻本“汉书”下有“食货志”三字，案所引《汉书》乃《货殖传》文，此后人以旁批误混者。永隆本“败”乃“贩”之讹。

质氏以洫削而鼎食　“洫”乃“洒”字形近之误，下文“洒”字不误，各本上下文并作“洗”，与《汉书》原文不合。

以为翳　“为”乃“马”之讹，“翳”乃“医”之讹。

晋灼曰胃脯今太官常以十月　各本脱“常”字，又“月”误作“日”。胡刻“太”误作“大”。

以末椒姜坋之讫　“讫”字与《史记索隐》引同，《汉书注》无。

拟迹田文

箭张禁酒赵放　此节引《汉书·王尊传》文，今本《汉书》“箭”作“翦”，宋祁曰“江南本、浙本并作箭”，是永隆本并可为宋祁校《汉书》之证。胡刻、丛刊作“箭张回酒市赵放”，乃混入《汉书·游侠》、《万章传》“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语，误。顾炎武云：“《王尊传》箭张禁酒赵放，晋灼注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箭张回即张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异耳。”刻本注末有“一云张子罗”以下十七字，永隆本无之。

趫悍虓壑　“趫”字与《汉书·卫青传》颜注同，刻本文注并作“趏”。

虓呼交反　胡刻脱“虓”字。丛刊本以“呼交”二字夹入正文“虓”下，故善注无此四字。

睚眦蠆莽　“莽”乃“芥”之讹。

僵仆也　此三字薛注，永隆本无。

涉好煞　刻本“涉”下有“外温仁内隐忍”六字。

睚眦于尘中独死者甚多　“独”字，与《汉书·原涉传》合，各刻本皆作“触”。王念孙曰：“独当为触，言涉于尘世中数以睚眦之怨杀人。”其引证为荀悦《汉纪》载原涉事虽作“独”，而载郭解事则作“触”；又范书《王允传》“睚眦触死”，章怀注引前书《原涉传》正作“触死”。高步瀛谓永隆本作“獨”，案此字犬旁甚分明，以为从手者，乃傅会之谈。

而公孙诛

安世者京师大侠也　刻本无“者”字以次六字。

上书告敬声　“告”字刻本作“曰”字。

父子死狱中　“死”上各刻本有“俱”字，案连上三条永隆本与《汉

书·公孙贺传》合，刻本误。又各本注末有“阳石北海县名也”七字，误，盖阳石不属北海，殆以铣注混入。

剖析豪氂　“剖”字，上野本作“割”，“豪氂”二字，各本文注并作“毫釐”。

五县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　此注胡刻作“五县谓五陵也，长陵、安陵、阳陵、武陵、平陵五陵也，已见《西都赋》”。“武”乃“茂”之讹（袁本亦误作武）。丛刊本作“五县谓五陵也，《汉书》曰：高帝葬长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五陵也”。案“高帝”至“平陵”即《西京赋注》，茶陵本所谓增补者也。

擘破裂也　“擘”字，各本文注并同，案《周礼·考工记·旊人》郑注：“薜，破裂也。”不作“擘”。《说文·手部》段注云：“薜乃擘之假借，《西京赋》李善引《周礼注》作擘，岂其所据与今不同欤?”

所恶成创痏　“创”字，丛刊本作“疮”。

苍颉曰　“曰”上各本同脱“篇”字。

郊甸之内

五十里为近郊　“近”字，胡刻误作“之”。

百里为甸师　此句各本并同，高步瀛曰：“师字衍，百里上当有‘二’字。”又曰：“甸师，官名，见《周礼·天官·序官》，师为衍字明矣。”又曰：“二百里为甸，与卢植《礼记注》合。”

五都货殖

王莽于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阳、邯郸、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也　“淄”上脱“临”字。《汉书·食货志下》云：“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王念孙曰：“称字涉下四称字而衍，司市师，即所云市令、市长。”案宋本《汉书》已有“称”字，今永隆本无“称”字，正可为王说佐证。此注“市长”与“长安”之“长”字，易混，故胡刻与丛刊各有舛误不可句读处。胡刻本注云五都已见《西都赋》，检《西都赋》“五都之货殖”注，同永隆本此说，然“成都”误作“城都”，“市长”下误衍“安”字。丛刊本此注同永隆本，而无“司市师也”四字，然“成都”误作“城郭”，“市长”下衍“安”字，与胡刻同误，其《西都赋》注引《食货志》原文，注首多“于长安及”四字，下至“皆为五均司市称师”止，然“更名”下删“长安东西市司”六字，“市长”下仍衍“安”字，此皆不明当时制度，不知洛阳

等五都各有市长，及长安东西市各有市令，王莽既立五均官，遂易此七地之市长市令为五均司市师也。各本注末尚有“迁谓”以次十二字，永隆本无。

隐隐展展

重车声也　《考异》谓袁、茶本无“车”字。薛注末胡刻有“丁谨切”三字，从刊本正文“展”下夹注同，乃他注混入，永隆本无。

方辕接轸　永隆本此节无薛注。

隐轸幽辐　四字与《古文苑·蜀都赋》合，刻本并作“隐隐展展”。

封畿千里　永隆本善注首无“毛诗”以下十一字。

地绝高曰京　从刊本“高”下衍“平”字。

百卌五　“卌”，各本并作“四十”，《容斋随笔》五云：“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卌音先立反，今直以为四十字。案秦始皇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而太史公误易之，其实四字句也。”永隆本之“卌”，乃所谓“直以为四十”者，如依泰山石刻读一音，则不合本赋句法。此节薛注末有“也”字，善注末无“所”字，与各本异。

右极盩庢　永隆本注作“庢”，正文作“屋”，各本文注并作“厔”，王先谦《汉书补注》曰：“庢从广，俗从厂，非也。”

盩庢山名（七字）　永隆本无，高步瀛曰：“盩庢非山名，无者是。”

汉书右扶风　“书”下各本误衍“曰”字。

遂至虢土

华阴（七字）　永隆本薛注无此七字。

右扶风有虢县　各本并同，姚鼐曰：“善注非是，此当引地志弘农郡陕县故虢国。”高步瀛曰：“右扶风虢县在今宝鸡县，与上言左暨不合，姚说是也。”案《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云：“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善引右扶风虢县，是后汉并入雍县之西虢，赋言左暨河华，应指大阳之北虢及荥阳之东虢。

上林禁蒬　“蒬”字，各本作“苑”，“蒬”、“苑”字通用。

禁人妄入也　各本复“禁”字。

邪界细柳

皆地名　“地”字，各本并同，高步瀛曰：“尤本地名误作池名。”

联五柞

云有五株柞树也　从刊本脱“五”字。

郑玄（九字）　永隆本无善注“郑玄”以下九字。

款牛首　“款”字，各本并同，许巽行谓“俗多误作欵”。

甘泉宫中有牛首池　“池”字，各本并作“山”，今本《黄图》无此文。又高步瀛曰：“《上林赋》张揖注：牛首池在上林苑西头，亦不在甘泉宫中。”

缭亙绵聊　“亙”字文注并同，上野本亦同。各本皆作“垣”，《魏都赋》善注引此句亦作“垣”。

缭亙犹绕了也　“亙”字，各本并作“垣”。

四百菀之周围　“百”下各本有“余里”二字。

臣善曰亙当为垣　此句各本作“今并以亙为垣”，案善注，永隆本与他本文句虽异，其意则一。因善据薛本作“亙”，薛并以亙本义绕了释之，而善意则以垣墙为义，故云当为垣也。若作“以亙为垣”，虽不失李注指为假借之意，而刘申叔则认为非李注。至五臣本则作“垣”，故铣注“垣也”。今各本赋文已作“垣”，而又载善注以亙为垣，是文注不照。案《说文》云：“亙，求亘也，从二从囘，象亘回形。”《说文句读》曰：“亙回者，回环也。”《说文释例》曰：“回，只回一面旋转，亙，求亙也，展转回环，上下求之，故象其两面旋转。”此亙之本义，即薛注犹绕了意。又《说文》云：“垣，墙也，从土，亙声。”是亙又可借声作垣用，此善训垣墙而云以亙为垣也。其意仍本诸《西都赋》“缭以周墙四百余里”二句，诸家说并不了了。

北至甘泉　“至”字，胡刻误作“有”。

动物斯止

植犹草木动谓禽兽　“犹”、“谓”二字，各本并作“物”字。高步瀛谓永隆本二字皆作“谓”，亦一时目误。

臣善曰周礼曰　永隆本分节录注，于“缭亙绵联”二句作一节，“植物斯生”二句又作一节。从刊本并四句为一节，以两节中薛注归薛，善注归善，亦无错误。胡刻已并四句为一节，又但照注之先后直录，致此节居先之薛注接于上节善注之下，又此节注引《周礼》之上未删善曰，令一节中善曰复出，此尤本剔注时失检。

动物宜毛物植物宜皂物也　此《周礼·地官·大司徒》文，两句并无“也”字，注末之“也”，乃注文用为止截词。胡刻及从刊本两句并有“也”字，似《周礼》原文如此，此传写时浅人所加。“皂物”与相台本《周礼》同，《释

文》八出“早物”字，注云：“音皂，本或作皂”，是永隆本又胜陆氏据本矣。

群兽否骙

韩诗曰　当从各本作“薛君《韩诗章句》曰”。

�曰否否行曰骙骙　各本“否”作“駓”，又“否”、“骙”二字不重，陈乔枞未见永隆本，故《韩诗遗说考》引此注亦不重否骙二字。高步瀛曰：“作否未必是，而駓骙二字则各宜复，与《毛诗》同。”

聚似京涛　“涛”字正文及注皆从水，此为永隆本保存善注本真貌之一特点。上野本从足旁，胡刻及丛刊本文注皆从山。案本书二十二谢叔源《西池诗》“褰裳顺兰沚”，善注云：“潘岳《河阳诗》曰‘归雁映兰涛’，沚与涛同。”此李善沚同涛之说也。而卷二十六《河阳诗》次首云“归雁映兰畤”，丛刊本“畤”下校云“五臣作涛”，善注“《韩诗》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经典释文》二九《尔雅》释水出“沚”字，注云：“本或作涛，音同。”此善以《韩诗》之“沚”释潘诗之“涛”，而《释文》可证其相同也。又薛综谓水中有土曰涛，薛君《章句》谓大渚曰涛，《穆天子传》一郭注谓水岐成涛，涛，小渚也，《经典释文》五谓水枝成渚，此又“涛”与“沚”皆训小渚之说也。《毛诗传》及《尔雅》皆谓小渚曰沚。（陈奂以薛君之“大”字为误。）胡刻“似”作“以”。

善曰涛直里切　胡刻、丛刊并有此注，永隆本无。

不能纪

夷坚闻而志之　永隆本、丛刊本及《考异》所见袁、茶本并无此句，惟胡刻有之，或后人照《列子·汤问》篇加入。

世本曰　“世”字缺笔作“廿”。

黄帝史　丛刊本“史”误作“吏”。

林麓之饶

木丛曰林　“丛”字，各本作“丛生”二字。

林属于山为麓　句与《穀梁传》合，传原作“鹿”，借字。各本误“为”作“曰”。

注曰麓山足　胡刻有此句，乃《穀梁》僖十四年范注原文，但永隆本、丛刊本、袁本、茶陵本并无此句。

梓棫楩枫

枫枫香也　各本作“枫，香木也”。

尔雅曰梅柟　各本“柟”下有“郭璞”以次十三字。又丛刊本正文“柟”

作“楠”，故善注“尔雅”上有“楠亦作柟”四字，袁、茶本同。

粽子公子柟音梓音姊棫　下“子”乃“反”之讹，“梓”上脱“南”字，“棫”下脱“音域”二字。

嘉卉灌蘐　“蘐”字文注并同，各本概作“丛”。

蔚若邓林

灌丛蔚皆盛貌　各本“蔚”下并衍“若”字。

与日竞走　“竞”字，各本皆同，《山海经·海外北经》原作“逐”。

渴饮河渭河渭不足　复“河谓”字，与《山海经》合，各本脱此二字。

道渴而死　“而”字与《山海经》合，各本脱。

棣爽橚槮　胡刻善注凡举“苅”、“棣”、“橚”、“槮”四音，永隆本无“苅”音，丛刊本有“苅”、“棣”二音，余皆并注正文本字下。

草则葴莎菅蔽　“蔽”字各本并作“蒯”，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传》下云：“古蒯字，本作蔽”。

菅茅属也　各本无“也”字，而下有“古颜切”三字。

胡郎反　“胡”上不出“芫”字，胡刻有。丛刊本录各家注中之字音，多移于正文之下，而注中从省，如善注“芫”字，胡刻有“胡郎反”三字，而丛刊本无，但正文“芫”下系“胡郎”二字，是其例。然亦有不尽省者，且有注中之音与正文下不一者，如此句“蒯”字，善注内已有“苦怪切”三字，正文下又注“古坏”二字，殆未细辨原注与后人混加之注也。

戎葵怀羊　丛刊本此句下注云“皆草名”，此非薛、李注，不知如何混入，永隆本、胡刻本并无。

莦莪葵　“莦”字及下文“音肩”之“肩”字，与《尔雅》合。各刻本概误作“莦”与“眉”。

弥皐被冈

覆被于皐泽　“皐”字各本并误作“高”。高氏《义疏》本作“皋”而无校正语。

编町成篁

篠箭也　各本“篠”下有“竹”字，又句下有“荡大竹也”四字。

尚书曰　各本“曰”下衍“瑶琨”二字。

泱莽无彊　各本“莽”作“漭”，“彊”作“疆”。

言其多　各本“言”上有“泱漭”以次七字。

黑水玄阯　丛刊本“阯”下校云“五臣作沚”。案《释名·释水》四曰

"小渚曰沚"，又《释丘》五曰"水出其前曰阯"。高步瀛曰："诸沚字，以沚为本字，阯借字。"

灵沼之水沚也　"沚"字从水，各本并同，《考异》谓当作阯。

水色也　此三字各本并作"水色黑，故曰玄阯也"。

树以柳杞

山海经曰杞如杨赤理　永隆本善注末无此九字，各刻本并有，高步瀛谓后人所加。

揭焉中跱　"跱"之各本作"峙"。高步瀛曰："《说文》字作峙，跱峙并同。"

豫樟观　"樟"字各本作"章"。

织女处其右

汉宫阁疏曰　"阁"字，各本作"阙"。此注凡十七字，胡刻作"已见《西都赋》"，案《西都赋》"右织女"下注即此十七字。丛刊本两处皆注此十七字。

日月于是乎出入

日出汤谷　"汤"字各本作"旸"，今本《淮南子》及类书所引多作"旸"。

出自汤谷　"汤"字与《楚辞・天问》同，胡刻作"阳"。洪兴祖《楚辞补注》云："书云宅嵎夷，曰旸谷，即汤谷也。《说文》云：旸，日出也，或作汤，通作阳。"

次于蒙汜　"次"字各本误作"入"。又胡刻善注末有"汜音似"三字，疑后人以洪氏《楚辞补注》混入。丛刊本则注于正文下，永隆本无。

鲔鲵鲿魦　"魦"字，与丛刊本、袁本、茶本并同。《考异》谓"尤作'鲨'，误"。今本《毛诗》、《尔雅》并作"鲨"。

修额短项　"额"字各本作"额"。

皆鱼之形也　"之"字各本并脱。

山海经注曰　各本误脱"注"字。

尔雅曰鳢鲖也　各本并同，高步瀛云："'曰'上应有'注'字。"

毛苌诗传曰鲔似鮥　"鮥"字，各本并误作"鲇"，致《考异》别生枝节，然永隆本"鮥"字明与《毛诗・卫风・硕人传》"鲔鮥也"及《周颂・潜》郑笺同，善注"似"字，殆因传钞者与下句相混而又有脱误所致，此处应依《毛传》原文，余详下条。

鲇奴谦反　此句及上下文，永隆本与各本并同。案赋文与注并无"鲇"

字，何以忽出此音。又赋云“鲔鲵鲿魦”，今此注之前释鲔，其下释鲿，则中间应有释鲵之注。检《尔雅·释鱼》郭注有“鲵鱼似鲇”之文，似为善所引用。但传钞者既因鮥鲇形近而混，遂致上下文有混有脱，今假拟上条及此条注为：“毛苌《诗传》曰：鲔，鮥也，于轨反。《尔雅注》曰：鲵似鲇，鲇，奴谦反。”则顺赋作注，文无疑误，即此本“似鮥”之“似”字应删，“鮥”下应加“也”字，又“鲇”字之上加“《尔雅》注曰鲵似鲇”七字。

又曰鲿扬也魦鮀也　此注各本并同，文见毛苌《诗传·鱼丽》篇，如照上条补回《尔雅注》，则“又曰”应作“毛苌《诗传》曰”。胡氏《考异》明于此注脱误，但未见永隆本之“鮥”字，故所订仍有未洽，此古钞本所以可贵也。

驾鹅鸿鹍　“驾”或作“鴐”，或又谓当作“鸣”，异说纷纭，案《左传》：唐宋石经从马，而刊本于定元年及襄二十八年则从马与从鸟互用，《史记》、《汉书》亦混用不分，详见拙著《楚辞书录》。

又曰鹍鸡（共十一字）　永隆本无，胡刻、丛刊并有。

鸹鸨二鸟名也　胡刻作“鸹鸨，已见《西都赋》”，案丛刊本增补《西都赋》“鸧鸹鸨鶂”下注凡三十三字，此云已见《西都赋》，即“凡鱼鸟草本皆不重见”之例，丛刊本全录之，即“增补”之例，然永隆本初注如此，则前条十一字及此条从省者，当是后注时所增删。然有可疑者，乃鸹鸨驾鹅之次序，何以不顺赋文作注耳。又各本“鸨”字，永隆本文注并作“鳵”，上野本同。

鹍音昆　胡刻有此三字在注末，永隆本无，丛刊注本文下。

季秋就温

孟春鸿雁来　胡刻脱“雁”字。

禽兽之知违就温　“知”字各本作“智”。“违”下脱“寒”字。

集隼归凫　“集”称字各本误作“奋”，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集”，上野本及《考异》所见袁本并作“集”。

沸卉軯訇　“軯”字与上野本同，各本作“锵”，丛刊校云“五臣作砰”。

奋迅声也　永隆本薛注此四字在“沸卉軯訇”下，释“沸卉軯訇”为“奋迅声也”，不必重举正文，如“连阁云蔓”下直注“谓阁道云云”，“槭爽欂槮”下直注“皆草木盛貌”，是其例。吕延济注即袭薛义，《考异》以袁、茶本无此四字为是，说不可据。又各本此句下有“隼，小鹰也”四字，乃他注混入，永隆本无。

寒风肃煞　“煞”字各本作“杀”，上野本作“敍”。

寒气……（共七字）　各本薛注“孟冬”之上有此七字，乃他注混入，永隆本无之。

善曰……（共十七字）　各本有善注十七字，永隆本无之。

冰霜惨烈

善曰李陵书……（共十字）　各本薛注后有善注十字，案与本书李陵文不合，疑他注混入，永隆本无之。

刚虫搏挚　丛刊本“挚”下校云“五臣作鸷”，然济注作“挚”。

礼记……（十一字）　各本善注《毛诗》下有《礼记》十一字，永隆本无。

迺振天维　各本“迺”上有“尔”字，上野本则校笔旁加“尒”字。又“迺”字各本并作“乃”。

衍地络　永隆本手旁与木旁多因连笔不分明，《玉篇·手部》：“㧋，申布也。”与薛注合，各本作“衍”，上野本“衍”上有校语云：“《玉篇》入手部。”

蔌林薄　“蔌”从艹，上野本同，案隶书从竹从艹之字多混用，今本概作“簌”。

草木俱生也　“俱”字各本并作“丛”。

荡动蔌扬　各本“动”下“扬”下并有“也”字。

寓居穴托

苟寄值穴　各本“寄”下有“而居”二字，“穴”下有“而托”二字。

於灵囿之中　“於”字，上野本同，胡刻作“彼”，丛刊本“彼”下校云：“五臣作於。”

毛诗曰王在灵囿　胡刻此句作“已见《东都赋》”。案《东都赋》“谊合乎灵囿”下善引《毛诗》二句，丛刊本此处所补亦《毛诗》二句。

出于无垠鄂门　各本“门”上有“之”字。

许慎曰垠鄂端崖　永隆本赋文作“垠锷”，而所引《淮南子》及许注则并作“垠鄂”，此各依所据本也。各刻本许注作“垠锷”，则与《淮南子》“垠鄂”原文不照，殆后人因赋文而误改许注。据陶方琦、高步瀛诸氏所说，则“㓵”为正字，咢、鄂、堮、锷皆假借字。

虞人掌焉

善曰周礼……（十六字）　各本薛注后有善注凡十六字，永隆本无。

柞木翦棘 丛刊本“柞”下校云“五臣作槎”。

国语注曰 各本误脱“注”字。

槎斫也 与《国语·鲁语》韦注合，各本“斫”上多一“邪”字。

左氏……（八字） 永隆本无此八字。

迒杜蹊塞

迒兔道也 各本脱“兔”字。

骈田偪仄 丛刊本“仄”下校云“五臣作侧”。案永隆本字亦作“侧”。

麀鹿麌麌 此《毛诗·吉日》句，各本误作“麀鹿攸伏”，乃《灵台》句。金甡诸氏讥李注何不引《吉日》成句，不知永隆本正引《吉日》也。

驾雕轸 “雕”字与丛刊本同，胡刻作“彫”。

倚金较

古今注……（二十五字） 永隆本无此二十五字。胡刻在薛注之末，善注之前。高步瀛则移“善曰”于“古今注”上，作为善注。

猗重较兮 “猗”字，丛刊本作“倚”，《考异》云：“袁、茶本‘猗’作‘倚’是也。”案《考异》之说，殆谓正文作“倚”，则注应同作“倚”耳。阮元《毛诗注疏·淇奥》篇校勘记云：“猗字是，猗、倚假借也。”“兮”下胡刻有“音角”二字，丛刊本无此二字而正文“较”下注“角”字。

说文曰较车輢上曲铜也 永隆本此注与《说文》小徐本全合。大徐本“铜”字合，而“輢”作“骑”。《文选》则各刻本概作“钩”不作“铜”，卷三十四七启“俯倚金较”下善注“《说文》较车上曲钩”，亦不作“铜”。《初学记》十二引作“较车輢上曲铜钩”。案“輢”字：因《考工记》郑注及《广韵》、《韵会》所引相同，故诸家注《说文》尚未概改为“骑”。若“铜”字，则各家并舍大小徐本而据《文选》误本改作“钩”字，惜乎其未见永隆本也。

璿弁玉缨 句与《说文》引《春秋传》合，丛刊本“璿”下校云：“五臣作琼”，与今本《左传》僖二十八年文合。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云：“淳熙本琼作璚，案璚与琼同。”

又髦以璿玉作之 “又”字各本并作，《考异》谓当作“义”。

缨马鞅亦以玉饰 各本“鞅”下有“也”字，无“亦”字，“饰”下有“之”字。又薛注首“弁马冠”三字，六臣本无，而良注云：“弁马缨冠也。”

建玄戈 “戈”字先作“弋”，后加浓笔作“戈”，但注中“弋”字尚未改。上野本作“戈”，各刻本文注概作“弋”。案“玄戈”星名，《史记》、《汉书》、《天文志》注并作“玄戈”。《晋书·天文志》亦曰：“其北一星名玄戈，

皆主胡兵。”《后汉书·马融传》作“玄弋”，误。

北斗第八星名为矛　各本“矛”下有“头”字，高步瀛曰：“头字误衍。”

今卤簿……（十四字）　胡刻、丛刊并有此十四字，永隆本无。

招摇在上　永隆本脱“上”字。

以起居坚劲　“居”字与《曲礼》郑注合，各本误作“军”。案孔疏云：“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明指“起居”说。

象天帝也　“帝”，丛刊本误作“师”。

棲鸣鸢　丛刊本“棲”下校云“五臣作栖”。

棲谓画……（八字）　各本薛注“鸣鸢”下有此八字，疑他注混入，永隆本无之。高步瀛曰：“《考工记·梓人》，张皮侯而棲鹄。贾疏曰，缀于中央，似鸟之棲，《诗·宾之初筵》郑笺引《梓人》此文释之，曰：‘棲，着也。’此棲字意同，非谓画于旗上也。”

旌旗之流飞如云也　“流”字，胡刻同，丛刊本作“旒”。

弧旌枉矢

弧旌枉矢以象弧　此《考工记·辀人》文，各刻本“象弧”误作“象牙饰”。

虹旄已见上注　本赋上文“亙雄虹之长梁”句下善注“《楚辞》曰建雄虹之采旄”，此云已见，盖从省之例。刻本乃重出“楚辞”九字，殆六臣本概行增补，而尤氏从六臣本剔出时失检耶。

高唐赋曰蜺为旌　刻本此注并作“《上林赋》曰拖蜺旌”。案《上林赋》善注仍引《高唐赋》句。此节善注，自“牙饰”以下疑六臣并注时有误，此又永隆本未经混乱之可贵处。

天毕前驱　丛刊本“毕”下校云“五臣作罼”。

载獫猲獢　上野本同，丛刊本“猲”下校云五臣作“獥”，胡刻亦作“獥”，案《毛诗》作“载猃歇骄”，《释文》云：“歇，本又作猲；骄，本又作獢。”永隆本善注引《毛诗》字用原文，刻本改《毛诗》字以就赋文。

古今注……（二十一字）　永隆本善注无此二十一字。（刻本注内“同”乃“周”之讹）

汉书音义曰大驾属车八十一乘　胡刻作“已见《东都赋》”，案《东都赋》“属车案节”下引同，但“乘”下多“作三行”三字。丛刊本《东都赋》注与胡刻同，而此节注则非用《东都赋》注增补，乃别作“《汉杂事》曰：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

本自虞初

厌效之术　“效”字，各刻本作“祝”。

凡九百卌篇　“卌”字，各本作“四十三”。

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卌三篇　此句为《艺文志》文。胡刻此下有“初河南人”以下二十三字，乃《艺文志》注文，但中多一“初”字，不合颜注体例，又多“乘马衣黄衣”五字，可证其非直录旧注。丛刊本先注虞初洛阳人，后乃用《艺文志》此句。《爱日斋丛钞》五节引此注似从六臣本出，又作“黄衣使者”，而不作“黄车”。案善引《艺文志》止取虞初一句，各本或连注文，或杂他说，分歧如此，而概括于“《汉书》曰”，三字之下，明为他注所混乱。故永隆本乃善注真貌，后人欲据此误本选注以补《汉书》，皆未细考。

小说家者盖出稗官　“稗”字，《汉书》从禾。胡刻“者”下有“流”字，“出”下有“于”字，盖《艺文志》原文。《考异》谓袁、茶本无“流”、“于”二字，与永隆本同。又各本“官”下有“应劭”以次十字，永隆本无。

寔俟寔储

皆当具也　“当”各本作“常”。永隆本薛注止此，无善注十九字。

善曰……说文曰储具也　案《说文·人部》：“储偫也，从人诸声。”又：“偫，待也，从人从待。”据诸家所举《西京赋》、《羽猎赋》、左思《咏史》、曹植《赠丁翼》诸注，储字无一同义，既皆作“《说文》曰”，而又无一与今本《说文》相同，段茂堂谓为兼举演《说文》语，犹是调停之说，纵使崇贤所见《说文》多异本，亦不应无一相同，而前后又绝不作照应语也，未经混乱之永隆本已无此文，则为他注混入无疑，故据《文选》误注以删改其他古籍，乃属险事。

奋鬣被般

长毛曰鬣　“长毛”二字，两刻本同误作“毛苌”。《考异》谓“苌”当作“长”，不为无见。

般与斑古字通　“斑”各本作“班”。高步瀛曰：“斑、辬之或体，作般、作班、作斒，皆借字。”

螭魅蝄蜽　丛刊本“螭”作“魑”，胡刻“蝄蜽”作“魍魉”。高步瀛曰：“离本字，魑俗字，螭借字也。”又曰：“蝄蜽与《淮南子》、《国语》同，杜注《左传》作罔两，《周礼·春官》作方良。”

左氏传　应同各本“传”下有“曰”字。

铸鼎蒙物　“蒙”乃“象”之讹。

莫能逢之　“之”与《左传》宣三年文同，各本涉赋文误作“旃”，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引误本《文选》注“旃”字作异文，不知永隆本原与传同作“之”也。

杜预曰（若顺也）螭山神兽刑　永隆本无“若顺也”三字。“刑”乃“形”之讹。案此节皆杜预宣三年《左传注》文，各本“螭”上有“《说文》曰”三字乃误衍，许嘉德知非《说文》之文，而不悟为杜预注。

毛苌诗传曰旃之也　永隆本无此注，胡刻、丛刊并有。盖《魏风·陟岵》传文，或以《采苓》郑笺当之，误。

禁御不若　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引惠栋说：据张平子赋及《尔雅·释诂》郭注，知今本《左传》“不逢不若”句，乃晋后传写之讹，应从张、郭作“禁御不若”。

正垒壁乎上兰　上野本“乎”作“于”。

《汉书》曰……（共十九字）　胡刻作“飞廉上兰已见《西都赋》”，案《西都赋》“披飞帘”下注同此十九字，但“曰”上有“武纪”二字，丛刊本从西都注补此注，亦有“武纪”二字。

结部曲

善注引司马彪（凡二十九字）　案此注已见《西都赋》“部曲有署”句下，胡刻不云已见从省，似尤氏从六臣注分剔时失检。又丛刊本“军候”之“候”字误脱。

骇雷鼓　“骇”字，刻本并作“駴”，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骇。”

燎谓烧也　“也”，各本作“之”。

善曰《周礼》曰鼓皆駴（凡十八字）末云“骇与駴同”　永隆本无此注，案注谓赋文之“骇”与《周礼》之“駴”字同也，各本倒转赋文作“駴”而《周礼》作“骇”。

赴长莽

方言曰……（十一字）　永隆本薛注无此十一字，刻本并有。

迾卒清候　高步瀛曰：“迾”本字，“列”乃通假字。

郑笺（十字）　永隆本注末无此十字，刻本并有。

缇衣韎韐　“韎”字从未，《说文》段注曰：“许云末声，《广韵》音末，诸经音莫介反省从之，郑谓当从未声，《周礼》音妹者从之。”“韐”字，永隆本文注从夹，而引《毛诗》从合，刻本并从同。

睢盱跋扈　“跋”字，刻本并作“拔”，丛刊本校云“五臣作跋”。高步

瀛曰："陈孔璋檄，李注引作跋，是李与五臣同，六臣校语不足据。"阮元《诗经注疏》校勘记云："拔、跋古字通用。"

毛苌曰韎者茅蒐染也　此《毛诗·小雅·瞻彼洛矣》传文，"韎"下无"韐"字，"染"下无"草"字，此六字可证今本《毛诗》之失，并可止王氏《经义述闻》纷如之说。

无然畔换郑玄曰畔换　"畔换"二字，今本《毛诗·皇矣》篇诗、传、笺释文，并作"畔援"，丛刊本同。胡刻引《毛诗》作"畔援"，郑笺作"畔换"。案《说文通训定声》："援"字"换"字下并云："援，假借为换，《诗·皇矣》无畔援，《汉书》叙传注引作换。"

光炎烛天　胡刻同，丛刊本"烛"作"燭"，铣注同。又"炎"下校云"五臣作焰"。

罴謹也　丛刊本"謹"误作"权"。

吴岳为之陁堵

有岳山吴山　此善注节引《汉书·郊祀志》"自华以西名山七"之文，即志中列举之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共七山也。注只引吴山、岳山以释赋文"吴岳"，即与上句"河渭"对举，盖吴山在汧县，岳山在武功县，明是二山各别。但吴山又有吴岳之名，致异说分歧。此注五字，胡刻本、丛刊本并作"一曰吴山。郭璞云：吴岳别名"十一字，训诂未谛，乃不明地理者妄改，此亦永隆本未经混乱之可贵。至吴山与岳山之别，分详《汉书·郊祀志》、《地理志》王先谦《补注》中。

骙瞿奔触

白虎通（十四字）　各本《羽猎赋》下字音上有此十四字，永隆本无。

羽猎赋曰虎豹之凌遽　"豹"字笔微误。"凌"字与第八卷《羽猎赋》同，刻本正文及薛注作"倰"，引《羽猎赋》作"陵"。

失归忘趣　"趣"字与五臣同，各刻本作"趋"。

不徼自遇　"徼"字文注并同，各本并作"邀"。高步瀛曰："《说文》有徼字，无邀字，邀与徼同。"

趣向（六字）　各本薛注有此六字，但"趣"字异于正文之"趋"，当是他注混入，永隆本无之。

飞罕潚箾　"罕"字，与丛刊本同，《群经正字》曰："篆作罕，隶当作罕，今皆作罕，凡从网之字，经典皆作罒，其变罒为四者，惟罕与罙二字，此隶变之尤谬者。""潚"下，丛刊本校云："五臣作橚"。向注同。"箾"字，

各本文注并同，高氏谓唐写本作“拍”，乃一时目误。

矢不虚舍　“舍”字各本同，丛刊本校云“五臣作捨”。

说文曰铤小矛也　“矛”字与《说文》合，向注同，《东都赋》注引亦同，但刻本并误“矛”为“戈”，赖有《方言》“矛或谓之铤”可证，故《说文》注家知刻本选注“戈”字之误。

当足见蹍　“蹍”字，注中作“蹍”，各刻本作“踬”，五臣向注作“碾”。

值轮被轹　胡刻“轹”下有“音历”二字，与薛注相连，殆尤氏从六臣本割取善注时，尚有他注未删，永隆本无此二字。

烂若碛砾　高步瀛疑薛注本、李注本“碛”并作“积”，惟向注作“碛”，今本以五臣本乱李注本。

竿殳之所揘毕　丛刊本“毕”下校云“五臣作觱”，向注同。

八棱……（十八字）　永隆本无此十八字。

揘毕谓柲也　“谓”下各本有“揰”字。

又音笔　永隆本善注无此三字，刻本并有。

白日未及移晷　胡刻“移”下有“其”字，《考异》谓尤氏误衍。

狝谓煞也　“谓煞”二字，各刻本止作一“杀”字。

善曰（十五字）　永隆本无，刻本并有。

绝阬逾斥　《广雅·释地》王念孙《疏证》曰：“甿字，本作沆，或作坑、阬。《说文》：沆，大泽也。《西京赋》：阬、斥，皆泽也。李注阬音冈，失之。”

为䴕　各本“䴕”下有“尾长”以次十字，永隆本无。

翚飞也　胡本误复一“翚”字。

毚兔联猭　许巽行谓“联”当为“獑”，引《吴都赋》注“獑猭逃也”为义。丛刊本“猭”下校云：“五臣作逯”，永隆本注中音切，亦作“猭”。

皆说禽轻狡难得也　各刻本“禽”下并有“兽”字。

莫之能获

淳于髡曰夫卢天下之骏狗也　《齐策》三“卢”字作“韩子卢”，“骏狗”作“疾犬”。刻本作“韩国卢”，与《诗·齐风·卢令》篇孔疏所引《战国策》合，此又唐处《战国策》异本也。

东郭逡　“逡”字与《国策》、《诗》疏合，胡刻、丛刊并作“䨲”。

环山……韩卢不能及之（十二字）　永隆本无此十二字，末云“不能及”，殊违原意，殆非善注。

犹比方也　“犹”上脱“比”字。

尚书传曰者之　“者”乃“诸”之诸。案《尚书·说命序》：“求诸野”、“得诸傅岩”，孔传云“求之于野”、“得之于傅岩之谿”，皆以“诸”为“之于”合声，胡刻、丛刊并作“诸之也”。

迺有迅羽轻足　“迺”字，各本作“乃”。丛刊本“有”下校云“五臣作使”。

寻景追括　丛刊本“景”下校云“五臣作影”。

括箭之叉御弦者　胡刻、丛刊并作“括箭括之御弦者”，《考异》谓“御当作衔，之字不当有”。高步瀛谓永隆本亦有误字。案《说文》桰下云：“一曰矢括，筑弦处。”段注云：“矢桰字，经传多用括，他书亦用筈。”张文虎《舒艺室随笔》云：“张弓引满，矢头抵弓背之一点，其根筈弦处如筑之也。”《释名》云：“矢，其末曰桰。桰，会也，与弦会也。”筑、会、御、衔，义并相近。

兽不得发

臣君曰　“君”字用以代“善”之名，说详下。

青骹挚于韝下

青骹鹰青胫者盖　“盖”乃“善”之讹。胡刻作“善曰”二字，丛刊本于“者”字止，空一格作“善曰”皆误。《考异》据袁本正之，以善字属上读。

雁下韝而击　“雁”乃“鹰”之讹。

礼记曰……宋鹊之属（四十二字）　永隆本、丛刊本、袁本、茶本并无此四十二字，胡刻有之，乃他注混入。

莫之敢伉

郑玄……（共十字）　永隆本无此十字，胡刻、丛刊本并有。高步瀛曰：“诗笺无此文，殆后人误增。”

迺使中黄育获之俦　“中黄”下各本并有“之士”二字，永隆本无之，乃独异处。高步瀛引《文心雕龙·指瑕》篇：“《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而推论云：“似无者是。”

朱鬘鬆鬘　“鬆”字各本作“鬣”，《考异》谓应作“鬆”。

曰焉而死　“曰”下脱“乌获之力”四字。

植发如竿　丛刊本“竿”下校云“五臣本作隅中”。

襢裼戟手　“襢”字文注并同，各刻本文注并作“袒”。

奎踽槃桓　“奎”字五臣本作“跬”，翰注同。“槃”字注同，日钞本亦同，今刻本并作“盘”。

盘桓便旋如抟形也　“如抟形”三字，胡刻无，丛刊本善注亦无，而五臣李周翰注则作“跬踽盘桓，抟物之貌”，仍存袭用薛注之迹，殆删并六臣注时，删薛综而存五臣，尤氏剔取善注，不知曾经删并，故尤本善注无此三字。（高氏《李注义疏》未校出此三字。以后类此者不再举）

广雅曰般桓不进也　“般”字与《广雅·释训》合，各本概作“盘”。

鼻赤象　金甡曰：“顿其鼻即谓之鼻，犹《子虚赋》脚麟即谓持其脚也。”案“鼻”属动词，与下句“圈”字对文，五臣注“鼻谓执鼻牵之”，得其意。

象赤者怒　各刻本“赤”上有“鼻”字，盖涉赋文误衍，当以永隆本无“鼻”字为正。

圈养畜圂也　“养”字各刻本误脱。下“圈”字各刻本及《说文》并作“闲”。

摣狒彔　下二字上野本作“髴彙”，胡刻、丛刊并作“狒猬”，丛刊“狒”下校云“五臣作髴”。案“狒”，《说文·内部》作𥜿，所引即王会解之费费及《尔雅》之狒狒，桂馥《说文义证》又引《山海经》郭注作“髴髴”，并声借字，皆指一名枭阳之食人兽。又《说文·彑部》：“彙虫似豪猪，重文作蝟。”《经典释文》三十：“彙本或作猬，又作蝟。”各本并字异而义同，故赋文与注，字或不能画一。

批窳狻　“窳”字与胡刻同，丛刊本作“貐”。

狒兽身人面　胡刻、丛刊本薛注并作“狒”，说详上条。

类貙虎爪食人　“爪”字，各刻本误作“亦”，《考异》谓“亦当作爪”。盖以《尔雅》文义推之，适与永隆本合。

突棘蕃　上野本同作“蕃”，各刻本作“藩”。

杜预……（共十四字）　永隆本无。

为之摧残

拉郎答切　永隆本无此四字，丛刊本只注“郎答”二字于正文“拉”下，可见确非薛注，胡刻此四字误连于薛注之末。

凡草木刺人者　胡刻、丛刊本并无“者”字，案《方言》三原无“者”字。

陵重甗　“甗”字文注并同，《毛诗·大雅·公刘》、《皇矣》孔疏，《尔

雅·释山》并作“甗”。郭璞注云：“谓山形如累两甗。甗，甑也。”胡刻、丛刊并作“巘”。又善注末“巘，言免反”，永隆本仍从山。知薛从瓦，而善从山。

如马枝蹄　“枝”字与《尔雅·释畜》合，各本并作“跂”。

杪木末

獑猢猨类而白，自要以前黑　各本并脱“自”字。“要”字各本作“腰”。（高氏误“白”为“自”）

获谓握取之也　“握”字，各本作“掘”。

拂飞鼯

状如狐　各刻本及《尔雅》注“狐”，上并有“小”字，永隆本误脱。

昭仪之伦

后宫也　各刻本“宫”下有“官”字，永隆本误脱。

乐北风之同车

昔贯大夫恶　“昔”字与《左传》昭二十八年文合，各刻本误脱。

毛诗北风　“毛”字各刻本并脱。

般于游畋　“般”字，上野本同，与《尔雅·释诂》合。各刻本作“盘”，与《尚书·无逸》孔疏引《释诂》文合。

文王弗敢盘于游田　句与《尚书·无逸》合。各刻本无“文王”二字，“田”字作“畋”。

其乐只且只且辞也　胡刻脱下“只且”二字。丛刊本脱下“只”字。

且子余反　各刻本脱“且”字。

鸟兽单　“单”字各本作“殚”，通借字。

殚也　各本“殚”下有“尽”字，永隆本误脱。

善曰国语……（共十二字）　与今本《楚语》微异，永隆本无此十二字。

长杨之宫

退还也　“还”字，各本作“旋”。又此注末有“说文”以次十字，永隆本无。

臣君曰　“君”乃“善”之讹。案上文“兽不得发”句下，善注亦作“君臣曰”，疑“君”字用以代“善”之讹，并非笔误，如《文选集注》，任昉《奏弹曹景宗》文末作“臣君诚惶诚恐”，乃以“君”字代“昉”之名，又任昉《奏弹刘整》文开端作“御史中丞臣任君稽首言”，“君”字亦所以代作者之名也，殆唐人风尚如此。

数课众寡

善曰……（共十一字）　永隆本无此注。

置牙摆牲　“牙”字与上野本同，各本作“互”。案《汉书》颜注：“互或作牙，谓若犬牙相交。”《广韵》“互俗作牙”。

破磔悬之　“磔”字，各本误作“砾”。

颁赐获卤　“卤”字，五臣作“虏”。铣注同。

槁勤赏功　“槁”字从木，各本并从牛。

赏有功也　各本脱“也”字。

左氏传注曰　各本误脱“注”字，《考异》引何义门校补“注”字，与永隆本合。

千里列百重　“里”字误衍，高氏以为“列作里”，盖一时目误。

汉官仪汉有五营周礼天子六军五军即五营也六师即六军也　各刻本五军句接“五营”下，六师句接“六军”下。

千列列千人也　永隆本无此六字。

方驾授邕　上野本同作“邕”，旁有校笔“雍”字。各刻本文注并作“饔”，盖通假字。

善曰郑玄……（共二十一字）　永隆本无此二十一字，胡刻、丛刊本并有。

升觞举燧既釂鸣锺　各刻本以“觞”为“觞”，以“镛”为“锺”。

臣善曰说文　各刻本“说”上多“升进也”三字。

膳夫骑驰　末二字，各刻本倒作“驰骑”。

皆视也　“也”下，各本有“贰为兼重也”五字，永隆本无。

空减无也……及减无者也　二“减”字，丛刊本并误作“灭”。又各刻本“者”下脱“也”字。

御同于长　“长”下脱“者”字。

辣炰夥清酤㧟　“辣”字与上野本同，各刻本作“炙”。高步瀛谓：“字书无辣字，疑为馀字之讹，然无他证。”

辣炙也　永隆本薛注有此三字，各刻本既以“炙”为“辣”，故无。

楚人谓多夥　“多”下脱“为”字，各刻本有。

广雅曰辣多也音支　各刻本“多”上误衍“日”字。或谓《广雅》无辣字，殆今本有佚文。《左传》襄二十九孔疏云：“《西京赋》：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与多为韵。”此又孔氏与李善所见本不同。

皇恩溥洪德施 从刊本此句下校云："善本无此二句。"案《魏都赋》"皇恩绰矣"节下善注有"《西京赋》曰皇恩溥"七字，可见善本非无此二句，故六臣本校语有不可信处。《考异》于此举出袁、茶各本，颇觉纷纭，又有错字，致其说不明。若梁章钜所云："正文溥，注作普，亦似有误也。"不为无见。

皇皇帝也普博 永隆本此七字是薛注。从刊本薛、李二注并无此文。胡刻混作善注，"帝"下无"也"字，"博"下有"施也"二字。此上四句，永隆本分二节录注，胡刻并四句为一节，致"皇帝"之注，直接"音支"之下，故混成善注。

士忘罢

罢音皮 各刻本善注末有此三字，永隆本无。

相羊五柞之馆旋憩昆明之池 "相羊"，从刊本作"儴佯"，校云："善本作相羊。"又"羊"下、"憩"下，各刻本各有"乎"字，永隆本无。

憩息也 各刻本善注末有此三字，永隆本无。

简矰红

其丝名矰红也 胡刻"红也"二字作"音曾"二字。高步瀛云："合两文校之，疑当作矰，射矢，长八寸，其丝名红也。矰音曾。"案"矰红"与"豫章"对文，则丝名应是"矰红"，刻本于"矰音曾"上误脱"红也"二字耳。从刊本同胡刻，"音曾"字移正文之下。

蒱且发 "蒱"字与注同，刻本作"蒲"，《淮南子·览冥训》高注："蒲且子，楚人。"

列子曰 刻本无"曰"字。

弱弓纤缴 句与《列子·汤问》篇合，各本"弓"误作"矢"，"缴"下衍"射"字。高氏谓永隆本"弓"误作"兮"，非是，书手连笔似"兮"字耳。

掛白鹄 "掛"字，各刻本作"挂"，注同。"鹄"从刊本作"鹤"，校云"善本作鹄"。

往必加双

双得之也 各刻本无"也"字。

磻以石缴也 "以"字，各刻本误作"似"。《考异》引何校举正，是。又"缴"上各本有"著"字，永隆本无。案《说文》"磻以石箸雉缴也"，应有"著"字。

为水嬉

琴道雍门周曰水嬉则舫龙舟　与《三国志·郤正传》注引桓谭《新论》“水戏则舫龙舟，建羽旗”合，《琴道》为《新论》篇名。“舫”字，各刻本并作“艕”，乃“舫”之籀文。

浮鹢首

船头象鹢鸟鹢鸟厌水神　各刻本不覆“鹢鸟”字。

为画……（共十三字）　永隆本无此十三字，各刻本有。

翳华之　“之”乃“芝”之讹。

建羽旗

谓垂羽翟为葆盖　各刻本“盖”下衍“饰”字。

水嬉建羽旗　各刻本“嬉”下有“则”字。

纵櫂歌　“櫂”字，五臣作棹，铣注同。

槐子　“子”字，各本作“女”，句末“子”字同。

櫂歌也　“歌”下脱“引櫂而歌”四字。

方曰　“方”下脱“言”字。

今正櫂歌也　“正”乃“云”之讹。

发引龢　“龢”字，各刻本作“和”，高步瀛曰：“《说文》：龢，调也。此赋乃唱和之和，不应作龢。”

狡鸣葭　“狡”字注文同，各本作“校”。

馀和也　“馀”下脱“人”字。薛注末各刻本混入“和胡卧切”四字，永隆本无之。

臣善曰杜执葭赋　“执”乃“挚”之讹。各刻本“杜”上脱去“善曰”字，误。

汉书有淮南鼓员谓舞人也淮南鼓员四人然鼓员谓无人也　案《汉书·礼乐志》丞相孔光奏“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之中有“淮南鼓员四人”。此注所引有复误处，如删去“谓舞人也淮南鼓员”八字，改“无”字为“舞”字，则文义适合，盖赋云“秦淮南”而善引此舞人解释之，并非十分适切，故用“然”字作转语，他本无“然”字者，殆非善注原意。各刻本“汉书”下有“曰”字，误。又“四人”下无“然”字。案永隆本录注，以“齐槐女”二句、“发引和”四句、“感河冯”二句、“惊蝄蜽”二句分作四节，胡刻分节相同，丛刊本则并十句为一节。两刻本于“杜挚”上脱去“善曰”二字，遂令善注“杜挚”以次三十余字混作薛注。

怀湘娥

感动也

说文……（共七字）　连上条善注，各刻本有，永隆本无。

堕湘水之中因为湘夫人也　“之”、“也”二字各刻本无。

惮蛟虵

蛟虵龙类　各刻本无“虵”字。

灑鰋鮋　“灑”字注同，各刻本并作“纚”，高步瀛曰：“纚字疑误。”

鰋音偃　胡刻无此三字。丛刊本此节注内无反切，各系于正文下。

搏耆龟

搏抚皆拾取之名　“抚”乃“摭”之讹。

龟之年者神　“年”字，各刻本并作“老”字。

蝨潜牛　“蝨”字从虫，各刻本从中，注各同正文。案《说文》蝨，重文作“蝨”。

沉牛麈麖　“麈”初写作“麈”，后加淡墨作“麈”，高氏指为误作麈者，未审其后改也。各刻本并误作“鹿”。

潜泜形角似水牛　“泜”乃“牛”之讹。

南越志　“志”字，各刻本作“誌”。

一名沉牛　句与《上林赋》注引《南越志》合，各刻本无此句。此节善注所引《上林赋》文注，惟永隆本全合。

何有春秋

常误之也　“误”乃“设”之讹。

周礼……（共十字）　永隆本无此十字，各刻本有。

滥于泗渊　“渊”字避唐诗，缺左右两直，各刻本代以“流”字。

摘漻澥　永隆本书手，从木与从手之字，似无严格分别，然今写从木之字，此卷右旁必有分明小点，今写从手之字，此卷虽从上向左撇下，但右旁必无小点也。此“摘”字左旁不能谓为从木，惟右旁则误从“商”。各刻本并作“擿”。

布九罭　句与各本同，《考异》云：“罭当作罭，善注罭与罭古字通，谓引《毛诗》之罭与正文之罭通也，盖善罭五臣罭，而各本乱之。”案《考异》所云非是，说详下。

摘探谓一二周索也　“探”字各本作“搜”，与正文相应，但“探”字又与五臣向注“擿，探也”同。“二”乃“一”之讹。

毛诗曰九域之鱼　案《毛诗》及《释文》皆作“罭”，此作“域”者，善所见本也，故下云：“罭与域，古字通。”各本引诗作“罭”，非善真貌。

里革曰禁罝罜　韦昭曰罜麗小网也　“禁罝罜麗”四字，如依里革所言“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兽虞于是乎禁罝罗……水虞于是乎禁罜麗”语气读之，则“罝”字衍，然文义无碍也。至《国语》原文，据明刊李金校本为：“禁罝罜。韦昭曰：罝当为麗，罜麗，小网也。”则依韦注所正，文从字顺，故王引之主之，与永隆本所引亦无大差异。若据黄荛圃札记本作“禁罝罣麗”，虽与杨倞注《荀子·成相》篇所引相同，然加以韦注宋校、黄校诸说，则不易爬梳，姑从略。《文选》各刻本作“罝禁罜麗”，《考异》谓“罝”字不当有，亦与李金校本合。颇疑永隆本之“罝”字为正，各本之“罝”，乃有疑于“罝”字而妄改者。

罭与域古字通罭音域　“域”字乃善注对所据《文选》之“罭”与所见《毛诗》之“域”作疏通语，应是善注本真貌，各刻本作“缄”，误，胡克家、郝懿行等所谓善作缄者，殆随误本而为想当然之辞。

里音独　“里”字乃“罜”之讹。

摷昆鲕　“昆”字，丛刊本作“鲲”，薛注仍同，各本作“昆”。

摷责交切　永隆本薛注无此四字，各刻本有。

蘧藕拔　“蘧”字，丛刊本作“蕖”，向注同，但薛注仍同作“蘧”。

逞欲畋敿

麇子曰麋　下“麋”字乃“麑”之讹。

季梁曰　“梁”字与《左传》合，各刻本作“良”。

今民馁而君逞欲　“民”字缺笔。

音鱼　“音”上当有脱文。各刻本有《广雅》、《尚书传》等二十字，下接“《说文》曰：敿，捕鱼也，音鱼”九字，永隆本似脱其上二十七字。案《说文》无“敿”字，《周礼·天官·敿人》释文云：“音鱼，本又作鱼，亦作敿”，依释文是“鱼”与“敿”通。《左传》隐五年孔冲远疏观鱼者云：“《说文》云：渔，捕鱼也，然则捕鱼谓之鱼。”此善注训敿为捕鱼说，自可通；但以《说文》所无之字而谓之“《说文》曰”，则恐为后人所加，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举此敿字为李注《文选》望文傅会之证，是以误本归罪于崇贤也。但永隆本“音鱼”之上所脱佚者不知究为何文。

干池涤薮

郑玄……（共九）字　永隆本善注无此九字，各刻本并有。

蚳蝝尽取

虫舍蝝　“舍”下脱“蚳”字，各刻本有。

未孚曰卵　“孚”乃“乳”之讹，各刻本及韦注原文作“乳”。

遑恤我后

遑暇也　“遑”字，各刻本作“皇”。

我躬不悦　“悦”字，各刻本及《毛诗》并作“阅”。

焉知倾陁

贵且安乐　“且”字，各刻本作“在”。

何能复顾后日倾坏耶　“耶”字，各本作“也”。

陁音雉　永隆本无此三字。

大驾幸乎平乐　“乎”字，上野本作“于”。又丛刊本“乐”下有“之馆”二字，校云：“善本无之馆。”

张甲乙而袭翠被　丛刊本“张”，下校云：“五臣作帐。”

袭服也……（共二十二字）　永隆本薛注无此二十二字，观其误改李尤赋之“维陬”为“维限”，当非薛注。又此二十二字中脱一“平”字，误一“限”字，六臣本与善单注本竟同其误，亦可证两本同出一源。

音义曰……（共二十六字）　永隆本善注无此二十六字。

纷瑰丽以奓靡　“奓”字，五臣作“侈”。

程角牴之妙戏　“牴”字疑误笔，注中并作“抵”，与《汉书·武纪》合。各刻本并作“觝”。

秦名此乐为角抵　此句与各刻本同，然《汉书·武纪》文颖注无“秦”字，“抵”下有“者”字，文义较顺。

技艺射御　各刻本并同，文颖注“技”上有“角”字。

乌获舡鼎　“舡”字各刻本作“扛”，观下注“扛与舡同”，知善本赋文作“舡”。

皆至大官　与《史记·秦本纪》合，各刻本无“至”字。

武王有力力士任鄙　各刻本少一“力”字，失《史记》原意。

王与孟说举鼎　“举”字，丛刊本误作“扛”。

扛横闲对举也　“闲”，《说文》作“关”，《龙龛手鉴·手部》“扛”下引《说文》则作“闲”，与永隆本合。案《说文》云“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广韵》云“开樠栌户上木”，是二字义通。胡刻、丛刊本作“开”，误。

扛与舡同　“舡”字，胡刻作“舩”，字同。

衡陿鷰濯 各刻本“衡”字作“衝”，“陿”字作“狭”。“鷰”字五臣作“燕”。

匈突铦锋 “匈”字刻本作“智”，字通。

跳丸剑之徽霍 “徽”字，上野本同，各刻本作“挥”。案《说文》：“徽，帜也，从巾，微省声，《春秋传》曰：杨徽者公徒。”石经借作“徽”。张衡《东京赋》“戎士介而扬挥”，薛综注“挥，谓肩上绛帜如燕尾者”，是借挥作徽。李善注引《左传》与石经同作“徽”，故又云徽与挥古字通。此文“跳丸剑之徽霍”，谓跳丸剑者之形疾，是借“徽”作“挥”。又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扬素挥以启降路”，善注亦云：徽与挥古通用。

跳都雕切 永隆本薛注无此音，各刻本并有。

华岳蛾峨 “岳”字各本作“嶽”，岳古文，嶽篆文。

朱实离离

灵草芝莫 “莫”乃“英”之讹。

赤也 “赤”上脱“朱”字。

实垂之貌也 各刻本无“也”字。

苍龙吹篪

羆豹熊虎 “熊”字，永隆本与各刻本并同，《考异》谓当作“龙”，据赋文四兽类当作“龙”。

声清眢而蜲蛇 “眢”字，各刻本作“畅”。

女莫也 “莫”乃“英”之讹。

被毛羽之襳襹 “襳襹”字注皆从衣，各刻本文注并作“纖纚”，《龙龛手鉴》以“纖”为正，“襳”为俗。

三皇时皮人 “皮”乃“伎”之讹。

毛羽之襳襹 各刻本“毛”上及“之”下并有“衣”字，而无“襹”字。

后遂霏霏

皆幼伪作之 “幼”乃“巧”之讹。

汉书赞曰 “赞”字，各刻本误脱。

臣瓒曰 各刻本无“臣”字。

毛诗……（七字） 永隆本无此七字。

復陆重阁 “復”字，各刻本作“複”，丛刊本“複”下校云“五臣作復”，高步瀛曰：“複、復字通。”又曰：“六臣本作覆，非。”不知指何种六臣本。

磞砺激而增响　“响”字与刻本同，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音”。

磅磕象乎天威　“磅”字与刻本同，丛刊本校云“五臣作砰”。

增响重声　“重”字，与丛刊本同，胡刻作“委”，《考异》依袁、茶本作“重”，谓尤氏误改作“委”。

威怒也　各刻本无“也”字。

是为曼延　“曼”字，丛刊本作“蔓”，注同，非。胡刻“延”下有“去声”二字，下与薛注相连，高步瀛曰：“盖五臣音注，尤氏失删者。”

神山崔巍　“巍”字，五臣作“嵬”。

欻从背见

所作大兽从东来　各刻本“所”上有“伪”字，“大”字作“也”字，是分作二句读，高步瀛谓永隆本胜。

欻许律切　永隆本薛注无此音。

熊虎升而挐攫　“挐”字，永隆本与各刻本同，高步瀛引段玉裁说，以今本《说文》拏、挐互误，订正作“拏，持也，从手，奴声，拏攫字当从奴，女加切。至于烦挐、纷挐字，当从如，女居切”。案本书《九辩》“枝烦挐而交横”，挐字从如，则此赋挐攫字应从奴。

挐皆伪反　“皆伪”二字涉上下注文而误，依胡刻则作“挐，奴加反”，依订正应作“拏，女加反”。

大雀踆踆

七轮切　永隆本薛注无此三字，各刻本并有。

垂鼻辚囷　“囷”字，丛刊本作“輑”，校云“善本作囷”。

状蜿蜿以蝹蝹

海鳞大海也　下“海”字或“鱼”字之误，或其下脱“鱼”字，各刻本并作“大鱼也”，高步瀛《义疏》本作“大海鱼也”，其校语云：“海字，依唐写增。”

含利飏飏　“含”字与各刻本同，高氏谓“唐写含作舍，毛本同”，盖偶尔目误。

蟾蜍与龟

水人狸貌　“狸”字，各刻本作“俚”。

蟾音詹　各刻本作“昌詹切”。

奇幻倏忽（二句）　永隆本原脱此二句，后以淡墨旁加，各刻本句下有薛注、善注，共十八字，则未加上，“倏”字，各刻本作“儵”。

吞刀吐火

楚辞……（共十字）　永隆本无此十字，各刻本有。

流渭通泾

东海黄公成山河　“公”下各刻本有“坐”字。

淮南王好士方画地成河　各刻本“士方”上有“方”字下有“士”字，此误脱。

赤刀粤祝　胡刻“祝”下有“音咒”二字，非薛注，而下与薛注混连。

有能持赤刀　各刻本“有”上有“东海”二字，“能”下无“持”字。

禹步祝厌虎者　“越祝”二字，各刻本作“以越人祝法”五字。“虎”字原写作“唐”，后以淡墨微改似“虎”字。

卒不能救

少时为幼能制蛇御虎　“幼”乃“幻”之讹。“为幻能”三字，各刻本作“能幻”二字。

常佩赤金为刀　各刻本无“为”字。

术既不行　各刻本无“既”字。

遂为虎所煞也　各刻本“煞”作“食”，又无“也”字。

故云……（共十一字）　永隆本无此十一字，两刻本并有。

侲童程材　“侲”字，各刻本文注并同，永隆本文注亦同，惟引《史记》文则依《史记》作“振”。高步瀛曰：“振、侲字通。”“童”字，各刻本正文从人，注仍作“童”。

史记……若振女即得之矣　《史记·淮南王安传》“振女”下注云：“《集解》徐广曰：《西京赋》曰“振子万童”。骃案：薛综曰：“振子，童男女。”字并作“振”，字句与《文选》少异。

譬陨绝而复联

身如将堕　“堕”字，各刻本作“坠”。

骋足并驰

于撞上作其形状　“上”字，各刻本误作“子”。

陆贾杂语　“杂”乃“新”之讹。

增驾百马而行　句与《新语·无为》篇合，各刻本“而行”二字作“同行也”三字。

般乐极　“般”字文注并同，各刻本作“盘”。

般乐饮酒驱骋田猎　二句与《孟子》合，各刻本“乐”作“游”，“驱”

作“驰”。

微行要屈

要或为徼　永隆本无此四字。胡刻、丛刊本并作薛注。

臣善曰汉书曰武帝与北地良家子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　胡刻此二十一字作“已见《西都赋》”，盖已见从省之例。丛刊本有此，乃从《西都赋》注补回，即陈仁子本所谓增补六臣注之例。

又曰武帝微行始出　“又曰”二字，承上文引《汉书》期门事，胡刻作“《汉书》曰”，因上文期门事所引《汉书》已从省，故此处应出“《汉书》曰”，丛刊本上文已有“《汉书》曰”，此处不云“又曰”而再复出，是删并六臣注时失检。“始”字与《汉书·东方朔传》合，各刻本误作“所”字，《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所见本仍作“始”字。

要屈……（共九字）　永隆本无此九字，各刻本并有。

周观郊遂　“遂”字，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隧”，济注同。

字林曰閭里门也　各刻本脱“字林曰”三字。案任大椿《字林考逸》七閭阎条所引止《后汉书·班固传》注及《西都赋》注，而不及此注，盖所见本亦脱此三字也。

章后皇之为贵

欲小则如蚕蠋　“蠋”字与《管子·水地》篇合，各刻本误作“蝎”。

欲大函天地也　“函天地”三字，今《管子·水地》篇作“则藏于天下”。

适驩馆　“驩”字与胡刻同。高氏《义疏》云：“五臣驩作欢。”案丛刊本“欢”下无校语，而五臣良注则作“欢”，知丛刊本从五臣也。

掖庭令官　“令”字，各刻本误作“今”，《考异》引陈景云云当作令，与永隆本正合。

从嫮婉

薛臣善曰嫮婉好貌也　此善注引《韩诗》及薛君《章句》说，“臣善”二字，殆“君”字，或“君章句”字之讹。高步瀛曰：“治《韩诗》者不见此本，故不敢辑入薛君《章句》中，然则此本虽误，有益于古书亦大矣。”各本无注末“也”字。

捐弃也　各刻本有此三字，在善注之末。案善注顺文作注，此三字顺序应在引《毛诗序》之上，今在注末，殆为后人所加，故永隆本无之。

促中堂之陿坐　丛刊本“陿”下校云：“五臣本作狭字。”

中堂堂中央也　各刻本不复“堂”字。

秘儛更奏　“儛”字，各刻本作“舞”，舞、儛字同。

美声鬯于虞氏　“鬯”字，各刻本作“畅”。

左氏传产曰　“产”上脱“子”字。

蛊媚也　永隆本无此三字，此后人所加。

增蝉蜎以此豸　“蝉蜎”二字从虫，而音注并从女。胡刻作“婵蜎”，文注同。丛刊本二字并从女，文注同。“此”字，丛刊本校云：“五臣作跐，音此。”济注同。胡刻“豸”下注“音雉”二字，与薛注混。

姿态妖蛊也　“姿”字，各刻本并作“恣”。

蝉媚此豸　薛注“媚”字与正文异书，胡刻作“蜎”，丛刊本作“娟”。

若惊鹤之群罢　“罢”字，胡刻同，丛刊本作“罴”，夹注“魄美切”，五臣济注亦作“罴”。案余萧客、王念孙皆以“罴”为“罢”之讹，胡氏《考异》云：“袁、茶本罢作罴，下音媿美切，疑善‘罢’五臣‘罴’也，媿美切，盖善‘罢’之音。”

相鹤经……（共十五字）　永隆本无此十五字，各刻本并有。

振朱屣于盘樽　丛刊本“朱屣”下校云“五臣作珠履”。

朱屣赤地丝屣　下四字，各刻本作“赤丝履也”。

奋长褎之飒缅　“褎”，各刻本作“袖”。案《说文》：“褎，袂也，俗褎从由。”

要绍修态

态骄媚意也　“骄”，各刻本作“娇”。

昭藐流眄　“昭”字文注并从召，各本并从名，丛刊本“眳藐”下校云：“五臣本作昭邈。”案昭，齿绍切，《玉篇》“昭目弄人也”，据此则赋文作“昭”，当无疑义，惟永隆本善注“昭，亡挺反”，是善作“眳”字读。案《广雅》：“眳，嗔也。”《玉篇》：“眳，不悦貌。”如此，则与赋文不照。高步瀛未校出昭字，谓眳藐，犹绵藐。

转眼视也　“视”字，各刻本误作“貌”。

臣善曰昭亡挺反　胡刻此音切在“善曰”之上，丛刊本在薛注之末，永隆本作“善音”。又各刻本“挺”作“井”。

绝世称独立　“世”字缺笔。“称”字，各刻本并作“而”。

展季桑门

闻柳下季之言　“季”字与《国语·鲁语》合，各刻本作“惠”。

家语昔有妇人曰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焉　此注删节《家

语·好生》篇文。胡刻“曰”上多“召鲁男子不往妇人”八字，“柳下惠”上多“子何不若”四字，“惠”下多“然”字，“女”下多“也”字。丛刊本略同胡刻，而“鲁男子”易作“柳下惠”，“曰”下又无“柳下惠”三字，“女”下同多一“也”字。案《家语》记此事略与《毛诗·巷伯传》、《荀子·大略》篇相同，永隆本善注节引二十一字，意义自明，胡刻及丛刊本增加字数，并多一“召”字，有违原意，此亦永隆本未经浅人混乱之可贵处。

诏楚王曰　“诏”字与后《汉书·楚王英传》合，胡刻误作“制”字。又注末“说文”六字，永隆本无。

列爵十四

《汉书》曰汉兴……（共二十五字）　此善注节引《汉书·外戚传》文。胡刻作“见《西都赋》”。案《西都赋》“十有四位”下注，先引《汉书·天文志》九字，次引《外戚传》一百余字。丛刊本以《西都赋》注、《天文志》及《外戚传》增补，而列举十四等，有遗漏，有误并，则汇录六臣注时错误也。

飞燕宠于体轻　丛刊本“燕”下校云：“五臣作鷰。”向注同。

逞志究欲　丛刊本“志”下校云“五臣作至”。

逞快也　“快”字，各刻本误作“娱”字，五臣济注仍作“逞快”。

《楚辞》曰逞志究欲心意安　句与《楚辞·大招》合，各刻本句末衍“之也”二字。

穷身极娱　丛刊本“身”下校云“五臣作欢”，高步瀛谓身作欢是，且多推测语，又谓“尤袤本《文选考异》云五臣作敬亦非，案见陆心源《群书校补》第一百卷”。案《楚辞·大招》云“穷身永乐年寿延”，王注：“言居于楚国，穷身长乐，保延年寿，终无忧患也。”赋文二句正用《大招》二句，毋庸别生枝节。

他人是媮　“媮”字，《毛诗》作“愉”，高步瀛谓愉与媮、偷三字并可通，特训乐与训薄义异。

唐诗曰　各刻本“诗”下多“刺晋僖公”以次十二字。

弗曳不娄　“不”字不作“弗”，与《白帖》所引同，而与《韩诗外传》及《玉篇》所引不合。

不极意恣骄　“骄”字，各刻本作“娇”，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引作“恣娱”。.

自君作故

君作故　与《国语·鲁语》合，各刻本“故”下衍“事”字，殆浅人

所加。

增昭仪于婕伃

孝成帝……(共十九字)　永隆本无此十九字。

乃更号曰昭仪在婕伃上　句与《汉书·外戚传》合，各刻本并将“昭仪”与“婕伃”互倒，谬甚。

昭仪尊之也　《外戚传》“昭”下有“其”字，永隆本误脱。各刻本止存“尊之也”三字，而无上半句，误甚。

许赵氏以无上　从刊本“以”作“之”。

约赵氏故不立许氏　《外戚传》“约”下有“以”字，永隆本脱，各刻本并无“约以”二字。

王闳争于坐侧

渝易也　永隆本无薛注此三字。

非陛下之有　“之有”二字，与《汉书·佞幸传》原文合，各刻本误倒作“有之”。

蹔劳永逸无为而治　“蹔”字与五臣本及翰注并同，各刻本作“暂”。

汉祖创业蜀汉书平当曰　“蜀”下应有“汉”字，与下“汉书”字连，永隆本脱一“汉”字。

今汉继体承业三百余年　“业”字与《平当传》合，各刻本误作“基”字。“三”字，永隆本与各刻本同误，依《平当传》应作“二”字。

其舜也与　“与”字与《论语》合，各刻本作“欤”。

躭乐是从　永隆本正文作“躭”，善注作“湛”。各刻本文注并作“耽”。案《尚书·无逸》“惟耽乐之从”，传、疏与释文耽皆从耳，《论衡·语增》篇引作“惟湛乐是从”(“是”字，与张衡所见本同)，“湛”字与李善所见本同。《毛诗·鹿鸣·常棣》之“和乐且湛”并作“湛”。陈乔枞《韩诗遗说考》云：“耽，《毛诗》作湛，耽、湛，皆媅之假借；《说文》：媅，乐也。媅又作妉，《尔雅·释诂》：妉，乐也；《华严经音义》上云：《声类》：媅作妉；《一切经音义》四：媅，古文妉同，是也。耽字本义《说文》训为耳大垂，湛字本义《说文》训为没，皆以音同假借为檝乐字，据《韩诗》云：乐之甚也，则从甚作媅者为正，妉字乃其或体耳。”以耽湛为媅之假借，段玉裁、王筠诸家说文注并同。《文选集注》本陈孔璋《答东阿王笺》“谨韫玩躭”之“躭”，各本作“耽”，《集注》引《音决》云：“媅，多含反，或为躭，同。”知各本之“耽”或“躭”，《音决》乃作“媅”。《正字通》云：“眈乐之眈从目，《易》、《书》、

《诗》本作耽，伪作耽。”其说近于武断，《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皆沿其误。又《玉篇·身部》：“躭，俗耽也。”

二百余期

从高祖至于王莽二百余年　永隆本此句与胡刻同，丛刊本薛注无此句，而别见于翰注，作“二百三十年”。似汇六臣注者取翰注之确数，舍薛注之不定数之所为。高步瀛曰：“自高祖元年乙未至孺子婴初始元年戊辰，共二百一十四年。”

衿带易守

函谷闬铭　此本常以“闬”为“关”。

地形险阻守而难攻　《管子·九变》篇此句“守”上有“易”字，各刻本有“易”字无“而”字。

声烈弥楙　各刻本“声”字作“馨”字，“楙”字作“茂”字。

传闻于未闻之者　丛刊本“者”下校云“五臣作口”，永隆本“者”下注一小“口”字，然其下善注有“者，之与反”，亦非改“者”为“口”也。

孔业子……（共二十字）　永隆本无此二十字，各刻本并有。

未一隅之能睹

说文……（共十一字）　永隆本善注无此十一字，各刻本并有。

论语　各刻本“语”下有“曰”字。

举一隅而示之　今本《论语·述而》篇无“而示之”三字，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皇本、高丽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案《文选·西京赋》注引有此三字，又晁公武《蜀石经考异》云：举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与李鹗本不同。据此，则古本当有此三字也。”案《四部丛刊》影日本覆刻古卷子本《论语》有此三字。又日本所称能存先唐真本面目之天文版《论语》无“而”字，有“示之”二字。

前八后五　各刻本“八”下有“而”字。

广雅……（共二十三字）　永隆本无此二十三字。

尚书曰自契至成汤八迁　“书”下应有“序”字，永隆本及各刻本并脱。

尚书序曰盘庚五迁　“《尚书》序曰”应作“又曰”，永隆本及各刻本并误。

孔安国……（共十字）　永隆本无此十字，各刻本并有。

尚书曰盘庚迁于殷　各刻本误脱“《尚书》曰”三字，“殷”下并误复一“殷”字。

率喻众戚　各刻本作“率籲众慼”，与今本《尚书》同。案《释文》三出“籲”字及“慼”字，“籲”注“音喻”。《说文》、《玉篇》引“慼”作“戚”。故永隆本之“喻”与“籲”同音假借，“戚”、“慼”字通。

同天号于《帝皇》

方今……（六字）　永隆本无此六字，各刻本并有。

尚书刑德放曰……天有五帝皇者煌煌也　各刻本无末句，永隆本有。高氏《义疏》云：“《艺文类聚·帝王》部引有此句，《太平御览·皇王》部引《书纬》同。”

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道烂显明也　《御览》引此二句，“皇者”作“天道”，“烂”下有“然”字，永隆本似涉上注而误，应据改。各刻本无下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元命苞”卷引此注，亦未知善注原有二句。

掩四海而为家

圣人能天下为一家　《礼记·礼运》此句“能”下有“以”字，各刻本并有，永隆本误脱。

莫我大也　此节注，永隆本初写脱“汉”字，又“业”字误作“汉”字，后各以淡墨改正。

以靡丽为国华

吾闻以德荣为国华　句与《国语·鲁语》合，各刻本脱“荣”字。

独俭啬以偓促　“偓促”二字，各刻本并从齿旁，《玉篇》分收于人部、齿部、足部。案《史记·司马相如传》作“握龊”，《汉书》作“握踀”，本书相如《难蜀父老》文作“喔踀”，善引应劭注同。又《史记·郦食其传》作“握齱”，《汉书》同。本书《吴都赋》六臣校云“善作握龊”。并通用字。

言独为此节爱　各刻本脱“此”字。

善曰汉书注……（共三十八字）　永隆本无此三十八字。胡刻脱“善曰”二字。案《汉书》注乃韦昭注，今本《汉书》无之，见《史记·郦食其传索隐》所引，高氏指为《陆贾传》，偶混。又注引《公羊传》注，案之隐公元年何休《解诂》，有误有倒，《考异》尚未检原文而悉正之。

蒙窃惑焉

何故及去西都　“及”乃“反”之讹。

非我求童蒙　“非”字，今本《周易》作“匪”，各本句末加“也”字。

辩之之说也

说犹分别解说之　各刻无“之”字。

文选卷第二

永隆年二月十九日

弘济寺写

校后语

综上校勘，所得要点，举例如下：

（一）永隆本有可证今本古籍之疑误者，如：

《毛诗》“瞻彼洛矣”传：“韎韐者，茅蒐染也”之“韐”字，详“缇衣韎韐”条校记。

《说文》“车上曲铜”之“铜”字，“鋋，小矛也”之“矛”字，分详“倚金较”条，及“矢不虚舍”条。

《汉书·食货志》“皆为五均司市师”之“称”字，《东方朔传》“武帝微行始出”之“始”字，《王尊传》“箭张”之“箭”字，分详“五都货殖”、“微行要屈”、“拟迹田文”各条。

《经典释文》八“早物”之“早”字，详“动物斯止”条。

（二）永隆本有独异之字，如“聚似京涛”、“建玄戈”、“昭藐流昹”各条所举，是其一例。

（三）永隆本有与《古文苑·蜀都赋》相同者，详“方辕接轸”条。

（四）永隆本屡见之“臣君曰”三字，见“兽不得发”、“长杨之宫”及“从嫌婉”三条校记，疑为唐人一时之风尚。

（五）永隆本有疑误处，各本因之分歧者，如“弥望广潒”注之引《字林》，“青骹挚于韝下”注之“盖”字，即其一例。

（六）永隆本与各本皆有脱误，据未经窜改之李善注，犹可推寻原意，较胜胡克家之扪索，如“鲔鲵鲿魦”注中之“鮥”字，即其一例。

（七）各本分节有不同者，因之纂录薛注、善注时，遂致混乱，如“皇恩溥”条校记所举，是其例。

（八）尤袤本与六臣本同源，尤本善注多从汇并之六臣注中剔出，校记“今也惟尉”、“张甲乙而袭翠被”各条所举，即其一例。

（九）善注所引古籍，永隆本多与原文吻合，他本每多歧异，如“骈田偪仄”、“蔚若邓林”、“骋足并驰”各条所举，皆其例。

（一〇）善注征引古籍或有删节时，各本因之每有增润，或再删剟，致违原意，如“展季桑门”、“列爵十四”、“莫之能获”各条所举，皆其例。

（一一）他本善注有不合崇贤礼例者，以永隆本对照，可知其曾经后人羼乱。如“本自虞初”条所举，即其一例。

（一二）六臣注本有增补处，见“前开唐中”各条。

（一三）六臣本校语有不足信者，详“睢盱跋扈”各条。

（一四）胡克家《考异》有不尽可据者，详“沸卉訇軿”各条。

二、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残卷

起《答客难》“不可胜数”句至《嘲解》“释褐而傅”止。伯希和目二五二七，共一百二十二行，李注本之第四十五卷也，已影入罗氏《石室丛残》。

刘师培《提要》云：“每行字数由十七字至十四字，注均夹行，书法至工，前六行均漫其半，‘世’字、‘治’字、‘虎’字各缺末笔，此亦李注未经窜乱之本也。故文与各本多殊……足证后世所传李本，均与唐本乖违。试更即注文言之，此卷之例，李氏自注均冠‘臣善曰’三字，所引《汉书》旧注，则各冠姓名在李注前，以之互勘各本，或彼有而此无，或此省而彼弗省，或此分而彼合，或此有而彼无，或文字不同，均治选学者所当考及也。”

校记

不可胜数悉　本文起此五字，在行末，其上漶灭者应是九个字。胡氏翻刻尤氏善注本“数”字下有注云“文子曰群臣辐凑”，《四部丛刊》影宋建本亦有此注，而移并于次句“或失门户”之下，此卷无此注。

失门户使苏秦　此行末存此六字，上加漶灭者八个字，适与前行末“悉”字连接。胡刻本“户”字下有注云“言上书忤旨，或被诛戮”。丛刊本同有此注，与“文子”七字并在“户”字下，此卷并无。

之士曾不得掌　第三行末存此六字。“士”字，胡刻本、丛刊本、北宋监本《史记·东方朔传》、北宋本《汉书·东方朔传》并作“世”字。

曰时异事异虽　第四行末存此六字，以位置计此行只漶八个字，文句与《汉书》同。各刻本“曰时异”之上多三十四字，与《史记》同。“事”字上《史记》有“则”字。丛刊本下“异”字校云“五臣作殊字”。“虽”字之上，胡刻、业刊并有善注“韩子”以次二十八字，此卷无。

身乎哉诗曰鼓钟 第五行末存此七字，其上漶灭七字，与刻本字数合。《史记》无“哉”字。《汉书》“曰”作“云”。

□善曰毛诗小雅文也□苌曰有诸中必刑□于外 第六行下半存此二十字，作双行夹注，应在正文“于外”之下，两刻本此注并在次句“于天”之下。“刑”字刻本并作“见”。

鹄鸣于九皋 “鹄”字位于第七行顶格，以下完整。两刻本及《史记》“鹄”字作“鹤”，无“于”字。《汉书》“鹄”作“鹤”，有“于”字，与《毛诗》合。“皋”字，同汉《孔彪碑》。

臣善曰毛诗小雅文也长苌曰皋泽也 “臣善曰”三字应是善注真貌。此“小雅文”，指《鹤鸣》篇，与上节指《白华》篇者义各有当，刻本并两节注为一节，故“小雅文”止一见，下“毛苌”字亦改为“又”字。

乃设用于文武得明信厥说 “明”字颇暗晦，两刻本及《汉书》无此字。此十一字《史记》作“逢文王得行其说”。

封七百岁而不绝 “封”字下，两刻本及《史》、《汉》并有“于齐”二字。

臣善曰说苑 胡刻无“臣善曰”三字，丛刊本无“臣”字。（此种异文，以下从略。）

此士所以日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两刻本“日”下有“夜”字，“孳孳”下有“修学”二字。《汉书》有“夜”字。《史记》有“夜”字，有“修学”二字，“孳孳”作“孜孜”，“敏行”作“行道”，“怠”字作“止”。

辟若鹥鸰 “鹥”字同《汉书》，刻本鄦作“鹡”。自此至“则敏且广矣”，凡百七十余字，《史记》无。

礼义之不僁 “僁”字，各本皆作“愆”，《龙龛手鉴》以“僁”为俗字。

臣善曰皆孙卿子文也 各本无“也”字。

水至清则无鱼 《汉书》“水”上有“故曰”二字。

黈纩塞耳 “塞”字，刻本及《汉书》作“充”。丛刊本校云：“五臣作蔽。”

黈纩以黄绵为丸悬之于冕以当两耳所以塞聪也刘兆榖梁传注曰黈黄色也土斗反 此三十四字，刻本作“薛综《东京赋》注曰”以次二十八字，与《东京赋》“黈纩塞耳”句下薛注相同。案此节善注，写卷与刻本义同而文异，或后注修改前注之故。刘兆之“刘”字不甚明，疑指晋刘兆。

赦小过 “赦”字用别体。

毋求备于一人 “毋”字，各本作“无”。

检身若弗及 “弗”字，两刻本作“不”。

使自索之

揆度其法以开示之 “示”字，两刻本作“视”。

盖圣人之教化如此 《汉书》无“之”字。

欲其自得之 《汉书》无“其”字。

今卋之处士 “世”字缺笔。《史记》此句上接“修学行道不敢止也”句。

魁然无徒 此句上两刻本有“时虽不用”四字，与《史记》同。写卷及五臣本无上四字，与《汉书》同。“魁”字，两刻本及铣注并作块，《汉书》注“师古曰魁读曰块”。《史记》此句作“崛然独立”。

廓然独居 此句《史记》作“块然独处”。

卑辞厚礼以遗之 “之”字同《史记·勾践世家》原文，两刻本作“吴”。

遂灭之子胥已见上 两刻本无下五字。

寡偶少徒 “偶”字，《汉书》作“耦”。

固其宜也 “宜”字，《史记》作“常”。

子何疑于予哉 《史记》至此句止。

郦食其之下齐 句与胡刻《汉书》并同，丛刊本句首多“汉用”二字。

臣善曰史记……闻燕昭王招贤……使于燕昭以礼待之 刻本“招”字作“好”，“昭以”二字作“燕时以”三字。此删节《史记》文，写卷与刻本各有长短。

李斯已见上 写卷此五字乃善注“已见从省”之例。两刻本并作“又曰”以次十八字，殆合并六臣注者复录已见上文之注，即茶陵本所标之“增补”六臣注也。

汉书……臣请说齐王……乃听食其罢历下守战备 此《汉书·郦食其传》文，善注所引，但有删节，并无窜改。两刻本同无“请”字，无“听食其”三字，而“战”下多“之”字，乃经后人窜改，比对《汉书》本传，即见所改之陋。

是遇其时者也 《汉书》及五臣本无“者”字。

以管窥天 “管”字，殆书手偶从别本，善本当作“筦”，观此卷善注引服虔音管，可以推知，胡刻及《汉书》皆作“筦”。“窥”字见《隋龙藏寺碑》，刻本作“窥”，《汉书》作“闚”。

岂通其条贯 “岂”下各本并有“能”字。

发其音声哉 五臣本“哉”上有“者”字。

□□□□音管 上四字漶，第一字颇似“服”字，疑即《汉书》旧注“服虔曰筦”四字，与刻本同。

臣善曰庄子……子乃规规而求之以察……是直管窥天 两刻本“乃”上无“子”字，“直”下有“用”字。案今本《庄子·秋水》篇并有“子”字及“用”字，又“规规”下有“然”字。此上所引服虔、张晏、文颖之说，乃《汉书音义》旧文。自《庄子》以下乃善自注，故冠以“臣善曰”为区别，胡刻误混。丛刊本以服说、文说分注正文本字之下，而张晏说乃录于铣注之下，亦混。

岂能发其声哉 两刻本“声”上有“音”字。

犹是观之 《汉书》“犹”作“由”。

譬由鼱鼩之袭狗 《汉书》“由”作“犹”。

臣善曰李巡 写卷“臣善”之上有如淳、服虔音十二字，与胡刻同，丛刊本分附正文本字下。胡刻“李巡”上无“臣善曰”三字。

〔说文靡烂也（共十六字）〕 两刻本并有此十六字，写卷无。案“縻烂其民”语见《孟子》，“煮米使縻烂”语见《释名》，若《说文》则《米部》“縻，糁也”，《非部》“靡，披靡也”，皆与善注所引不合。惟《火部》云“𪏰，烂也”，桂氏《义证》云“客难借靡字，李引𪏰义以释之”，王筠、沈涛等皆信此是善注曲为之说，其实写卷已无此注，刻本所有者又与原引书不同，故此注当是后人混入。本书二五卢子谅《赠刘琨诗》“靡躯不悔”下同有此误。检本书卷三三《招魂》“靡散不可止”下，善录王逸旧注“靡，碎也”，此乃善引旧说真貌。

而终或于大道也 “或”字同《汉书》，刻本作“惑”。

解嘲一首 扬子云 写卷题顶格，作者姓字同行。刻本题低三字，姓字另行。丛刊本无“一首”二字。刻本题下侧注“并序”二字，写卷无之。案此篇所谓“序”者，乃《汉书》雄传中《解嘲》文之前言，非另有序文之目，写卷无“并序”二字，当是原貌。“嘲”字，刻本皆从口，《汉书》皆从言，写卷题从口，文中皆从言。

起家至二千石 《汉书》“起”上有“或”字。

汉书音义曰 两刻本无“曰”字。

时雄方草创太玄 《汉书》无“创”字，王先谦《补注》云：“宋祁曰：‘草’下当有创字。”案济注云“草创，言造作也”，知五臣本亦有“创”字。

人嘲雄以玄之尚白　两刻本“人”下有“有”字。丛刊本校云五臣本无“之”字。《汉书》“人”作“或”，无“之”字。《补注》云：“宋祁曰：‘或’上当有人字。”

将无可用也　两刻本无“也”字。

而雄解之　“而”字同《汉书》，刻本无。

其辞曰　此下为《解嘲》正文，写卷与丛刊本皆提行，胡刻则连续而下。

吾闻上廿之士　“世”字缺笔，注同。以下不另记。

臣善曰孔丛子……有云为于世者也　刻本“孔”上有“尚书”以次十九字，末句无“者”字。

生必上尊人君　《汉书》“必”作“则”。

析人之圭　“圭”字同《汉书》，刻本及铣注作“珪”。

朱丹其毂

〔东观汉记（以次二十七字）〕　刻本有此二十七字，写卷无。

今吾子　《汉书》无“吾”字。

小玉堂殿　“殿”字与《汉书》注晋灼说同，两刻本无之。

下谈公三　“三”字颇晦，画间似有两点，各本并作“卿”字。

目如燿星　“燿”字，与丛刊本同，胡刻作“耀”，宋本《汉书》作“曜”，《补注》本作“燿”。

壹从壹横　“壹”字，刻本作“一”。“横”字，《汉书》作“衡”。

〔史记秦王曰知一从一横其说何〕　刻本有此十三字，写卷无。案《史记·田完世家》：“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又《战国策·韩策》：“秦王曰：‘吾固患韩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此注似删节旧文，但句读错误，且为写卷所无，当是他注混入。

顾默而作太玄　《汉书》无“默”字。

支葉扶疏　“支”字同《汉书》，刻本作“枝葉”。

独说数十余万言　“数”字与刻本同，《汉书》无。胡克家以向注有“数十万言”句，指为五臣乱善，不知写卷善单注本正文亦有此“数”字。又《汉书补注》引王鸣盛曰：“今《太玄经》具存，正文大约与五千文之数合，此云十余万言，不可解。”

〔以树喻文也说文曰扶疏四布也〕　写卷无此十三字，刻本皆有。案《说文·木部》枎字下作“枎疏”，段注云：“古书多作扶疏，同音假借也。”刻本此注似后人误混。

孅者入无间　“孅”字，《汉书》及五臣本作“纖”，两刻本作“细”。“间”字，《汉书》及五臣本作“伦”。

〔春秋（以次二十五字）〕　写卷无此注，两刻本并有。

何为官之祏落也　“祏”字从示，各本并作“拓”，师古音托。

〔拓落（以次九字）〕　写卷无此注，刻本并有。

客徒欲朱丹吾毂　“欲”字与《汉书》同，胡刻无。丛刊本“欲”下校云“善无欲字”。案六臣注本校语疑所见异本，若胡刻无“欲”字，乃尤氏从六臣注剔取善注时照校语删去耳。

不知跌将赤吾之族也　“知”下脱“一”字。

跌差也　刻本此下尚有“赤谓诛灭也”五字，写卷无。

往者周罔解结　“者”下丛刊本校云“善作昔”，胡刻作“昔”。“罔”字刻本作“网”，《汉书》作“罔”。

合为六七

臣善曰十二已见东方朔客难　胡刻作“十二国已见上文”，丛刊本录“张晏”以次二十六字，与客难“十二国”句下注同。案胡刻此注，义与写卷相同，但添一“国”字，仍非善注真貌，丛刊本则所谓“增补”也。

张晏……就秦而七也　刻本“而”作“为”，无“也”字。（刻本注末无“也”字者写卷并有，此下不另记。）

并为战国

晋灼……之意也四分则交午而裂如田字也　此注与《汉书》注引晋灼说同，刻本上“也”字作“耳”，无“四分”以次十一字。

士亡常君国亡定臣　二“亡”字，刻本并作“无”，《汉书》上“亡”字作“无”。

失士者贫

〔春秋（以次十四字）〕　刻本并有此注，写卷无。

或凿坏以遁

史记曰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　刻本无“曰”字，“过”字作“窃”字。案善注截取《史记·范雎传》，“过”字与原文合，刻本作“窃”，疑后人所改。

普来反　刻本“普”上有“坏”字。所有注音，写本用反，刻本用切，此下不另记。

是故驺衍　“驺”字刻本作“邹”，《汉书》作“驺”。

〔应劭（以次七十字）〕　刻本有此注，写卷无。以《汉书注》引应劭说

校勘此注，知注中误“天事”为“大事”，又“谈天邹衍”句多一“邹”字。此种错误，两刻本相同，亦可证尤氏善单注本乃从六臣注中剔出。

犹为万乘师

不便利也〔赵岐（以次二十字）〕　自“赵岐”以下共二十字，刻本有，写卷无。

左东海

〔应劭（以次八字）〕　刻本有此注，写卷无。

右渠搜

连西戎国也　“连”字，与刻本同，《汉书补注》所引无“连”字。

�支亦搜　写卷“亦”旁有校笔作×，刻本与《汉书注》同作“渠”。

在金城河关之西　“关”字与《尚书·禹贡》孔传合，刻本及《汉书补注》并误作“间”。（何焯校作“关”，与写卷暗合。）

前番禺

应劭曰南海县　“县”字，刻本作“郡”，《汉书补注》引官本亦作“郡”。

苏林曰音番　下二字，刻本作“番音潘”，《汉书补注》：“宋祁曰：番，苏林音潘。”

后椒涂　“椒”字，胡刻同；丛刊本作“陶”，校云“善作椒”；《汉书》作“陶”，颜注云：“今书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考异》谓善从应劭作“椒”，而不从颜监作“陶”；王先谦谓当阙疑。

东南一尉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会稽回浦也　胡刻无“回浦也”三字。丛刊本此句无善注，而于向注后有如淳说，亦无此三字。案《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回浦下云“南部都尉治”，写卷有此三字，与《汉书》合。

製以锧鈇　“製”字与丛刊本《汉书》并同，胡刻作“制”。“锧”字，《汉书》作“质”。

服虔曰刑缚束之也　刻本“刑”作“制”，无“之”字。王念孙谓制字乃“徽”之讹，说详次条。

应劭曰音以绳徽弩之徽　“音”字，刻本讹作“东”。《汉书补注》云：“官本引萧该《音义》曰：徽旧作黴。应劭曰：徽，音以绳黴弩之黴，该案音挥。”案此乃王先谦录宋祁校语，萧该《文选音》，已佚，宋祁引此，至堪重视。《补注》又引王念孙云：“《广雅》：徽，束也。《文选》李注引服虔曰：徽，缚束也。应劭曰：徽，音以绳徽弩之徽，则旧注皆不误。”

臣善曰说文曰纠三合绳　刻本“绳”下有“也”字。案《说文·丩部》作“纠绳三合也”。

何休曰　刻本“休”下有“注”字。

结以倚庐

汉律以为亲行三年服　“以”字，与胡刻同，从刊本作“不”。《考异》谓茶陵本作“不”，袁本作“以”。案《汉书注》引作“以不”二字。

〔结为倚庐以结其心〕　写卷无此八字。

晏婴粗衰斩　写卷此句与《左传》襄公十七年文合，刻本误倒“衰”字在“斩”字下。

天下之士　句与胡刻《汉书》并同。从刊本“天”上有“是以”二字，校云“善无是以字”。

营于八区

史记（以次二十一字）　刻本有此注，写卷无。

人人自以为皋繇　“皋”字《汉书》作“咎”。“繇”字，刻本作“陶”。

稷契泉咎繇　“泉”字乃“暨”之讹。

戴纵垂缨　从刊本“纵”下校云：“五臣作纚，音史。”

阿衡已见上　此五字刻本引《诗》及《毛传》共十八字。

五尺童子

臣善曰五尺童子已见李令伯表　此注乃“已见从省”例。从刊本及胡刻并复出“孙卿”以次十六字，与李令伯表“五尺之僮”句下注同。《考异》云：“袁本作已见李令伯表十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案茶陵本题作“增补”，此十六字即所补也。尤袤善单注本异于此写卷作“已见”，竟同于茶陵本所增补，知尤本所从出之六臣注本，盖与茶陵本同源。

故当塗者升青云　“故”字，各本并无。“升”字，《汉书》作“入”。

譬若江湖之崖勃澥之岛　《汉书》“崖”作“雀”，“岛”作“鸟”。师古曰：“雀字或作崖，鸟字或作岛。”王念孙曰：“臧玉林《经义杂记》云：‘古岛字，有通借鸟者，《禹贡》鸟夷，孔读鸟为岛，可证。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岛，其地广阔，子云借鸟为岛，浅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臧说是也。’”宋祁引萧该《音义》曰：“案《字林》，渤澥，海别名也，字旁宜安水。”

乘雁集不为之多

方言曰飞鸟曰双雁曰乘雁　案《方言》六“飞鸟曰双，雁曰乘”，此卷句

末“雁”字疑衍。刻本作“四雁曰乘”，非《方言》文，殆因《汉书注》应劭“乘雁，四雁也”之说致混。《汉书补注》云：“乘之为数，其训不一，四字后人所加，《方言》无四字。”

昔三仁去而殷虚　“虚”字同《汉书》，师古曰“一曰虚读曰墟”，胡刻、丛刊本并作“墟”。

臣善曰三仁已见上　写卷此注当是“已见从省”之例。两刻本各异于此，殆有疑混。丛刊本善注无“三仁”之文，而五臣翰注列举比干、箕子、微子后略述其事，并讥李善引《孟子》注二老为“误甚”，且以扬雄为“用事之误”，其陋如此，疑非五臣真貌。但并六臣注者取此较详之注，因删去李善“三仁”之注，其事甚显。胡刻善单注本云：“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其次序与《论语·微子》篇同，但已违“从省”之列。又《考异》无此注校记，当是袁本、茶陵本与胡刻从同，而与写卷相异。

孟子曰伯夷避纣……天下之大老（共六十五字）　写卷此注六十五字与《孟子·离娄》篇相符，但二“作”字误为“祚”，句末少“也”字。两刻本并删去中间“大公辟纣”一节，共二十七字。案五臣讥善引二老，姚宽《西溪丛话》既反斥之，乃并注者竟删善注以曲就五臣，然可证尤氏单注乃从六臣注剔取。

种蠡存而越霸　“存”字，五臣作“在”。《汉书》“越”作“粤”，“霸”作“伯”，师古曰：“伯读曰霸。”

臣善史记……勾践反国　“善”下脱“曰”字；“反”字，刻本作“返”。写卷“蠡”字及上句“胥”字，并用别体。

乐毅出而燕惧

臣善曰五羖已见李斯上书　此“从省”例。两刻本并复出《史记》百里奚事，凡四十七字，但“闻百里奚”下脱一“贤”字。又两刻本三十九卷李斯上书“得百里奚于宛”句下同引“史记”，凡七十一字，即注首多“晋献公”十余字，而“闻百里奚”下亦脱“贤”字。于此可推知者，即六臣注之祖本李斯书注原脱“贤”字，其后增补者随之亦脱“贤”字（《考异》谓各本皆脱）。单注本已从六臣注中剔取，故李斯书及《解嘲》两注皆同脱“贤”字。

史记曰乐毅……乃使劫骑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畏诛遂西降赵　写卷此注乃删节《史记·乐毅传》文，两“乐毅”皆不省“乐”字及降赵之“降”字，并与《史记·乐毅传》原文相符，但“骑劫”二字误倒。丛刊本注乐毅事不冠以“《史记》曰”或“又曰”，遂与上文《史记·秦本纪》载百里奚事混连；

其删去两“乐”字，以及“奔”字代“降”字，皆与《史记》原文不合；“奔赵”之下“惠大恐赵用乐毅伐燕”亦有脱误。此下又有“铣注同”三字。案五臣注常用善注所引古籍而删去书名，又常增减古书中二三字以灭其袭引之迹，如以五臣单注本与善注对勘，即可了然。据丛刊本此注，可以推知其为五臣之铣注，并六臣注者上段已采善注，因下段铣注与善注大同小异，但文较平近而稍详，故即以铣注为善注之下段，只于注末记“铣注同”三字，此为六臣注本通病，所谓五臣乱善者多属此类。胡刻“乐毅伐齐”上有“又曰”二字，注末“惠大”改为“惠王”，似经尤氏补修，或尤氏据本不误。

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　“摺”字，五臣作“拉”。

臣善曰危穰侯已见李斯上书折摺已见邹阳上书晋灼曰摺古拉字也力答反

此注与胡刻全同。丛刊本善注止留“晋灼”八字，“力答”切音则注正文本字下，其“危穰侯”事以五臣良注入录，已不增补，亦不留原注“已见李斯书”等语。《考异》于此条无校语，殆袁本、茶陵本并与胡刻相同，而丛刊本之祖本独异。

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　“以”字，《汉书》作“虽”。

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吾闻圣人不相　此注与《史记·蔡泽传》文相合。两刻本“孰”作“熟”。又删去“先生”以次十二字。“曷鼻”之“曷”字，据北宋本《史记》、南宋本《史记集解》并同，刘师培据不明显之影本以为“昌”字，非。

当其亡事也　连下句二“亡”字与《汉书》同，刻本作“无”。

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世”字、“治”字并缺笔，刘师培据此定为李注未经窜乱之本。

说苑　“菀”字刻本作“苑”。

高枕已见上　此“已见从省”例，丛刊本复引《汉书》、《楚辞》，当是并六臣注者增补之例，胡刻单注本亦同复出，则尤氏剔取善注时，未审其为后人增补也。

或释褐而傅　写卷至“傅”字止，以下佚。

以上为李善注本，自此以下为白文无注本。

三、啸赋残卷

伦敦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文选》残卷，旧列斯坦因目三六六三号，新目

编七二八四号，共四十一行，每行十六至十九字，起“自然之至音”，终“音声之至极”，为成公子安《啸赋》，白文无注，末行题“《文选》卷第九”。案善注本《啸赋》在第十八卷，知此为昭明三十卷本。篇中不避唐讳，有点校，有音切分注本字两旁，于隋唐《文选》反切旧音，大有裨助；至其别体字颇与他卷相同。兹以胡克家本、四部丛刊本及吴士鉴斠注《晋书》本传校记如下。

〔良〕**自然之至音** 此卷行首从“自”字起，以上佚百七十余字。

优润和于琴瑟 “琴瑟”二字误倒。

反亢阳于重荫 “荫”字，各本并作“阴”。

唱引万变 “引”字右旁从人不从丨，与《唐宝室寺钟铭》同。下文不另记。

纷繁骛而激杨 “骛”字，各本并从马。“杨”字见下“柔桡”条。

固极乐而无荒 “固”字，丛刊本作“故”，校云：“善作固。”此卷书手误倒“极乐”二字，有校笔勾正。

喟仰拚而抗首 “拚”字，各本作“抃”。《玉篇》云：“抃同拚。”

或冉弱而柔桡 “桡”字从木旁，此卷从手从木之字多不分。丛刊本作“扰”，校云“善作桡”。

横郁鸣而滔涸 “鸣”字，胡刻作“鸣”，丛刊本校云：“善作鸣。”

冽缭眺而清昶 “冽”字，《晋书》作“咧”。“缭眺”二字，胡刻作“飘眇”，《考异》疑为尤氏误改。“眺”字，丛刊本、《晋书》同作“眺”。

逸气奋涌 “涌”字，胡刻作“湧”。

烈烈飚扬 “烈烈”二字，胡刻及丛刊本作“列列”。许巽行《文选笔记》云：“列与烈通，《毛诗传》曰：烈，列也。”

啾啾嚮作 “嚮”字，各本作“響”，下文同。

奏胡马之长思 “奏”字，五臣作“走”。“思”字，丛刊本作“嘶”。

向寒风乎北朔 “向”字，丛刊本作“回”。并于“嘶回”下校云：“善作思向。”《晋书》“向”作“回”。

又似鸣雁之将鶵 “鸣”字，各本并作“鸿”。“鶵”乃“雏”之别体，近似《唐王训墓志》。

南箕动于穹仓 “仓”字，各本作“苍”。

清飙振乎乔木 “乎”字，《晋书》作“于”，连上四句同用“于”；《文

选》则三句用“于”，一句用“乎”。

荡埃蔼之溷浊　“荡”字，丛刊本作“流”。“蔼”字，《晋书》、丛刊本并作“霭”。

变阴阳之至和　“之”字，《晋书》作“於”，与上联“而播扬”之“而”字相配。《文选》作“之”，与上下句无别。

游崇崗　“崗”字，胡刻作“崗”，丛刊本、《晋书》作“岡”。

藉兰皋之猗靡　“兰皋”，各本作“皋兰”。

荫修竹之蝉蜎　“蝉蜎”二字，丛刊本从女旁。

乃吟咏而发叹　“叹”字，胡刻、丛刊本并作“散”，善无注，向注谓发散其志。

声骆驿而響连　“骆驿”，《晋书》及五臣本作“驿驿”。“響”字已见上。

若夫假象金革　“假象”二字，各本并同，写卷用别体。“象”字，见隋《李景崇造象》。

訇磕聊嘈　“聊”字，胡刻、《晋书》有口旁，丛刊本从石旁。

发徵则隆冬熙蒸　“蒸”字，《晋书》作“烝”。

骋羽则严霜夏彫　“彫”字，各本作“凋”。

音均不恒曲无定制　“均”字，五臣作“韵”。此二句各本并同，丛刊本校云：“善无恒字，有二曲字。”《考异》谓“袁本、茶陵本同有此校语，非”。

行而不留　“留”字，笔误，《左传》襄二十九年作“流”，各本并作“流”。

假芳气而远逝　“假”字，用别体作假，见魏《郑义碑》。

羌殊尤而绝世　“绝”字，丛刊本校云：“五臣作纯。”翰注云：“纯，厚也。”

宁子捡手而叹息　“捡”字，《晋书》作“敛”，丛刊本校云：“五臣作敛。”良注同。

尼父忘味而不食　“尼”字，胡刻作“孔”。

百兽率儛而抃足　“儛”字，胡刻、丛刊本无人旁。

此音声之至极　“此”字同《晋书》，胡刻、丛刊并作“盖亦”二字。

文选卷第九　上句为《啸赋》终篇，此题篇第提行。此行下半有“郑𢼄（似敬字，Giles 新编目录指为家字，不似）为景点讫”六字，字体较大且草，疑即点校及注音切者所题。次行为五言诗四句，字体较大，凡三行，似书手牢骚语。纸背有“撼揩”二字音训。

附　王仲宣登楼赋

卷列伯希和目三四八〇。赋前残存七言诗二句，赋文共十四行，后接七言古体诗《落花篇》。此赋夹在诗篇之中，当非《文选》写本，句中“兮”字尽皆删去，尤为特异。而书法拙劣；但所用同音假借字、别体字，亦有不宜忽略者，因并校记如下：

登楼赋一首　王仲宣　今本《文选》卷十一题前一行标明分类为“游览”，题下无“一首”二字，写卷并异。

实显敞而寡求　“寡”字别体，与《隋太仆卿元公墓志》同。“求”字，《文选》作“仇”。“仇”、“求”古字通。

侠清漳之通浦　《文选》“挟”字，此用别体。

北弥陶沐　“沐”字《文选》作“牧”。

黍稷盈畴　《文选》“黍”字，此用别体，与《汉孔宙碑》同。

遭汾浊　“汾”字误，《文选》作“纷”。

逾己以迄今　“己”字，《文选》作“纪”。

涕横坠而弗襟　“襟”字复上“开襟”，误，《文选》作“禁”。

人情通于怀土　“通”字，《文选》作“同”。

俟河清乎未期　“乎”字，胡刻、丛刊本并作“其”，五臣本作“乎其”。“期”字误，各本作“极”，叶。

翼王道之平　各本“翼”字作“冀”，“平”上有“一”字，并是。

惧斩瓜之徙悬　“匏”字用别体，“徒”字与《魏慈香造象记》相似。

畏井渫　“畏”字别体。

天惨惨而奇色　“奇”字，《文选》作“无”。

意切悍而憯恻　《文选》“悍”作“怛”，“侧”作“恻”，并是。

盘桓以返侧　“返”字误，《文选》作“反”。

四、谢灵运鲍明远乐府七首残卷

卷列伯希和目二五五四，存六十五行，为乐府七首，白文无注，每行约十四或十五字，字极佳。卷端四行极残阙。本文仅校其下七首，即谢灵运《会吟行》，鲍明远《东武吟》、《出自蓟北门行》、《结客少年场行》、《东门行》、《苦热行》、《白头吟》。现行注本此数篇并在第二十八卷，无注本当在第

十四卷。校勘所得，多近古义。然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指为萧统原本，恐不可信。日本狩野直喜曾在俄京见此影本，撰有跋文。

首四行上截已佚，观所残留，“（兰）以秋芳，来日苦短”数句，知为陆士衡《短歌行》。案丛刊本六臣注《文选》陆士衡乐府十七首，《短歌行》居末，次接谢灵运《会吟行》，编次与此写卷相同。但胡刻善单注本士衡十七首中，《短歌行》次第十四，盖自第九首《齐讴行》之下，次序即异，故胡克家《考异》于陆士衡《日出东南隅行》校云：“此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而失著校语。”又丛刊本乐府上《君子行》篇五臣向曰之末接云：“善本无此一篇。”此句疑为并六臣注者之辞。而许巽行《文选笔记》“君子行”条云：“观古词下注‘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后’。”此“附后”之句，似为刻单注者之辞。而胡刻单注本已无此附记，且并无此篇。盖传本分歧，不易爬梳如此。

乐府一首　五言，写卷第五行起此。丛刊本“府”下有“诗”字。侧注“五言”二字，两刻本并在《会吟行》之下。

会吟行　谢灵运　写卷第六行如此，丛刊本则分姓字于第三行，胡刻又并总题子题姓字共一行。

迤莚皆静寂　写卷第八行起为《会吟行》正文。“莚”字同《唐宁思真墓志》。

敷绩壶冀始　“敷”字、“冀”字用别体，与《魏汶山侯墓志》及《唐王仲建墓志》同。

飞鷰跃广途　两刻本“燕”字皆无鸟旁，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鷰”。

津呈窈窕容　“津”字，两刻本并作“肆”，有善注引《周礼》郑注以释“肆”字，高步瀛谓《周礼》无此郑注，则所谓善注已大有可疑。至写卷之“津”字，用承上句“清沚”，以下句“路”字承前句“广途”，脉络颇清，惜无他本可证。又《西都赋》“列肆侈于姬姜”句，五臣向注两处相同，但“善曰”之下，止有郑注而无《周礼》句，而日本上野藏古钞本则“肆”字作“女”，此或可以旁参。“容”字，五臣作“客”。

自来弥世代　“世”字，与五臣本同，不避唐讳，两刻本并作“年”。

范蠡出江湖　“蠡”字用别体，近似齐李清为《李希宗造象记》。

牵缀书土风　“牵”字别体，与《唐王征君临终口授铭》同。

乐府八首　五言，写卷总题如此，日本藏古写本《文选集注》卷第五十六与此同式（《集注》本此行前有“乐府”二字，乃鲍明远、谢玄晖二人乐府之总题，即其第五十六卷分目之“乐府三”也），丛刊本“府”下赘一“诗”

字，无“五言”二字。胡刻无“五言”二字。

东武吟　鲍明远　《集注》本姓字与“八首”总题同行。丛刊本题下侧注“五言”二字，姓字在次一行。胡刻“吟”下侧注“五言”二字。似是总题、子题、姓字三项同行，但因子题注文占却位置，故姓字延伸在次行。

僕本寒乡士　“僕”字用别体作僕，见《周岐山县侯姜明墓志》。

占募到河源　“占”字，各本并有善注“应募为占募”之语，《集注》本又引《音决》“占，之瞻反”，及“刘良曰：占寡，谓投募也”。丛刊本校云：“五臣作召。”注引“铣曰：召募，谓投募也”。《集注》之引五臣与六臣注之引五臣，如此分歧，殆删取不同，但六臣本校语指实五臣作召，似以一偏赅全体，岂所见本有不同耶？

密塗亘万里　“塗”字，《集注》引陆善经本及各本并同。丛刊本校云“五臣作途”，下引五臣“良曰”亦作“途”。《集注》引五臣“张铣曰”亦作“途”。两本文句全同，但良与铣异，《集注》本连姓著录，似较可据。

要兼刈葵藿　“要”字，丛刊、胡刻作“腰”，五臣本、《集注》本作“腰”。《集注》引《音决》“要，一招反”，末云“今案《音决》腰为要也”，是写卷与《音决》同。

空负百年冤　“冤”字，各本并作“怨”。《集注》引《音决》云：“怨，于元反，或为冤，非。”知写卷祖本远在《音决》之前。（此句善注，《集注》作“言怨在己，若荷负也”，今刻本作“若何负之”。）

出自蓟门北行　“蓟”字同《集注》，各本并作“蓟”，《魏司空王诵墓志》以“薊”为“蓟”。“门北”二字，各本并作“北门”。丛刊本、胡刻并于题下侧注“五言”二字。

严秋筋簳劲　“簳”字，各本并作“竿”。《集注》云：“今案《音决》竿为簳也。”是写卷与《音决》同。

虏阵精且强　丛刊本“强”作“彊”，校云“善作强”。

天子案剑怒　“案”字，各本并作“按”，惟《集注》引善注作“案”。

萧鼓流汉思　“萧”字，各本并从竹头。

旌甲被胡霜　“旌”字用别体，右下从圭，与《魏北海王元详造象》同。《集注》本作“旍”，与《唐张兴墓志》相近。（胡刻《曲水诗序》之“绥旌”直与《张兴志》同。）

结客少年场行　从刊本、胡刻题下并侧注“五言”二字。

去乡卅载　“卅”字，各本并作“三十”二字。

九衢平若水　“衢”字，各本文注并作“塗”。

车马如川流　“如”字，各本作“若”。

苦热行　从刊本注“五言”二字，胡刻无。

玄蜂盈十围　“蜂”字用别体，与《集注》本同；其右下从“牛”，与《唐宴石淙诗石刻》同。

吹蛊痛行晖　“痛”字，五臣本、《集注》本并作“病”。（五臣注云：“病行客使无光晖。”《集注》作“张铣曰”，从刊作“良曰”。）

障气昼熏体　“障”字，各本并同。从刊本校云：“五臣作瘴。”所引“向曰”亦作“瘴”，但《集注》引“吕向曰”仍作“障”。

芮露夜沾衣　“芮”字，刻本作“菵”，注同，《集注》作“茵”，引《音决》云：“茵，亡雨反。”

生躯蹈死地　“蹈”字，《集注》作“陷”，注云：“今案五家陆善经本陷为蹈也。”

君轻君尚惜　上“君”字与《集注》本同，两刻本作“财”，从刊本校云：“五臣作爵。”

白头吟　从刊本侧注“五言”二字，胡刻无。

直如朱緜绳　“絲”字用别体，与《唐魏邈墓志》同。

点白信苍蝇　“点”字与《集注》同，从刊本校云“五臣作点”。两刻本并作“玷”。终卷残阙三行，以下佚。

五、答临淄侯笺残纸

斯坦因目六一五〇号，残存二行，止十六字。Giles 大英博物院敦煌写卷目录新编七三三〇号，但不知此为《文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今本次卷四十，无注本当次卷二十。

而辞作暑赋弥日……而归憎其皃者也伏想……　写卷存二行，止得十六字如上。下“而”字，两刻本及古写五臣单注、《集注》并无。“憎”字，胡刻作“增”，误。“皃”字用别体，《集注》本多与此同，亦与《梁萧憺碑》、《魏饶阳男元遥墓志》相近。“伏想”之上无注文，当是无注本。

聲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
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
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清激
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玄妙足以通神悟靈
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
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唱引萬變
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
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騖
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
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
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
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
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
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飆揚啾啾響作奏
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鳴鴈之將鶵群
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

大英博物院藏《文选》五十卷《楼赋》残卷

读《文选序》

一、《文选》编成之年代及背景

昭明自序云："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词林……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自述其编书经过如此。昭明事迹，详周贞亮著《昭明太子年谱》附《昭明太子世系表》[①]，惟不论《文选》成书年代。近人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②] 定"《文选》编撰，开始于普通中，而成于普通末年"。按普通元年，昭明年二十岁。普通只有七年，七年昭明恰廿六岁。[③]《文选》所收作品，其限断有二事可注意者：一为详于近代[④]，一为不录生存。[⑤] 梁代作家如任昉、沈约、陆倕、刘峻皆入选。刘峻之《辨亡论》实作于天监十五年以后，其人则殁于普通三年[⑥]；陆倕卒于普通七年。[⑦] 今《文选》收其《石阙铭》及《新刻漏铭》二篇，知《文选》编成应

①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二卷一号，1931。

② 《国文月刊》76期，1949。

③ 昭明逝于中大通三年，年三十一岁。

④ 宋、齐、梁作品甚多。

⑤ 此晁公武引窦常说，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

⑥ 见《南史》本传。

⑦ 时昭明二十六岁。

不早于普通七年。[1] 刘孝绰为《昭明太子集序》，其中有“粤我大梁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编次谨为一帙十卷”云云，时为武帝普通三年。《梁书·孝绰传》云：

> 迁太府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

梁于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明山宾为道选。明山宾著《吉礼仪注》二二四卷、《礼仪》二十卷，盖为礼学专家。陆倕与徐勉书荐沈峻，以《周官》立义。其时颇盛礼学，昭明诸学士均深于礼者。[2]

普通四年，东宫新置学士明山宾、殷钧为东宫学士。[3] 是时乃东宫全盛时期，《文选》之编撰，或始于此时。诸人之中，刘孝绰与昭明关系最深，一度任太子舍人，两度为太子洗马，两掌东宫书记。昭明起乐贤堂，使画工先图孝绰，孝绰集其文章并为之序，故孝绰必为《文选》主持策划之人。

大通元年，到洽、明山宾、张率皆于是年卒。今《文选》不收此数人作品，则其编成定稿必在普通七年之末陆倕卒后。

《玉海》引《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三十卷。”按何逊未任东宫职，此说似未可信。高阆仙已驳之。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谓昭明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等，谓之高齐十学士。按刘孝威乃事萧纲，则殊张冠李戴也。

二、《文选》选文之标准问题

《自序》述其不录经、史、子之文，而独选取史述赞者，以其能“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二语最为扼要。J. Hightower 译作：

> Their matter derives from deep thought, and their purport places them among belles letters.

---

① 缪钺《诗词丛论》46页，亦以陆倕卒岁证知《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

② 参《四库提要辨证》经部按语。

③ 见《梁书·明山宾传》。

按以事（matter）、义（purport）对言，其说甚早。孟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已将事、义分开。班固《东都赋》："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李注："扬雄、相如辞赋之高者，故假以言焉。"此以"义"对"事"，似为昭明所本。事者，或说为事类。事类一名，起于东汉。《越绝书·越绝篇外传》记："因事类以显后世。"曹丕《答卞兰教》云："赋者，事类之所附也。"是"事类"二字不自《文心》开始。事类复特别施用于赋。挚虞《文章流别》云："古时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辅。"此则以情义与事类对待为言。可见事即事类。左思《三都赋序》："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则以辞代事。辞者，载事之文也。范晔谓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则其言事与义，取与情、韵相配。

朱自清撰《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云："事，人事也；义，理也。引古事以证通理叫做事义。《抱朴子·喻蔽》评王充云：'事义高远[①]。'"此则"事义"合言。按《文心雕龙》言事义者更多。略举如下：

(1) 事义浅深。(《体性》篇)

(2) 学贫者迍邅于事义。(《事类》篇)

(3) 其五曰：观事义。(《知音》篇六观之一)

(4) 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篇)

此则合事与义而为一辞矣。《颜氏家训》论文章："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是时已习用"事义"为一名。朱氏揭举《抱朴子》、刘勰"事义"之语，以为昭明所祖。按事义分言，莫先于班固《两都赋》，朱说未为谛也。

至于沉思翰藻之对言，则亦始于汉季。有以藻（辞）与义对举者。曹植诗云："流藻垂华芬，骋义经寸翰。"若沉思与翰藻之对言者，始于魏卞兰之《赞述（魏）太子赋》。文云：

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

---

① 见《文史论著》。

之忘味，奉读无倦。（《初学记·皇太子》篇）

左思《蜀都赋》："幽思绚道德，摛藻挟天庭。"幽思即沉思也。摛藻一词，汉代常见。如延熹二年《义郎元宾碑》："图籍擒（摛）翰著作，时人莫能预其思。……"则亦以"摛翰"与"预思"对举，开后世思与翰相对之先河。诗赋欲丽，丽为诗赋特征。东汉杜笃《书攄赋》云："加文藻之丽饰。"（《类聚》五五）文藻必须丽饰，然佐以幽思，则文而有其质矣。此辞赋所以有丽则、丽淫之分，以有事义，故丽而能则也。由藻之出现，知纯文学（belles letters）应起于汉季。卞兰之语正反映出此一实情。思与藻对举，诸家之语，表之如下：

时　代	思、藻对称	出　处
东汉	预思　摛藻	《元宾碑》
魏	沉思　华藻	《赞述太子赋》
晋	幽思　摛藻	《蜀都赋》
梁	沉思　翰藻	《文选序》

至于翰藻一词，又有可得而言者。翰藻本借义于飞禽，亦倒称曰"藻翰"。潘岳《射雉赋》："敷藻翰之陪鳃。"李善注："藻翰，翰有华藻也。"《文心》之论翰藻见于《风骨》篇者，谓"宜如翰飞戾天"。吴杨泉《草书赋》："发翰摅藻，如华之杨枝。"则以卉木为喻。兹表之如次：

翰为气骨——力之表现
　＋　　　　＋
采为辞采——美之表现

是知翰藻原为两事，朱氏单以辞藻当之，似亦未尽恰切。又《文选序》所言之篇翰，则指文章而言。复有异称如下：

（1）翰墨　《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2）文翰　如王俭《文翰志》。

（3）翰林　如李充《翰林论》。

义归乎翰藻者，观曹植诗云"流藻垂华芬，骋义径寸翰"，以翰代笔，则如蔡邕《笔赋》"惟其翰之所生"是也。惟流藻又须骋义，此可取以解说"义归翰藻"一句；即辞藻之中须有义，否则只为虚辞浮采而已。故《文选》一书中，

非徒为美文，其中尚有“幽思掞道德”；即 morality。此义为昭明论文之宏旨，阮元辈徒见其一端耳。

昭明选文标准，根据此二句，向来有若干异说：

（一）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

> 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

此说侧重“翰藻”。

（二）翁方纲《杜诗精熟文选理理字说》：

> 萧氏之为选也，是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缋目之，不亦诬乎！

此主肌理，以侧重藻缋为非。

（三）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 若说“义归乎翰藻”一语专指比类，也许过分明尽；如说这一语偏重“比类”，而合上下两句浑言之，不外“善于用事，义于用比”之意。

此说则主“事类”，恐亦太偏，诚不免翁方纲所讥。

三、昭明文学见解与文质综合观

文质问题在建安至魏已成为讨论之主题，阮瑀、应玚皆有《文质论》。昭明之文学见解是主张综合折衷论。其选文工作，《文选》以外，又有二书：

> 一为《正序》十卷，撰古今典诰文言。——此为经世文编。
>
> 一为《英华集》二十卷，“五言诗之善者”。《隋志》作《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此为诗选。

与《文选》可谓鼎足而三。文笔观念在宋、齐已极发达，二者界限甚为分明；

《文心·总术》已具论之。《文镜秘府论》引《文笔式》，以韵者为文，非韵为笔。昭明《文选》文与笔兼收，拟综合文、笔，泯其分界。任昉以“笔”名，《文选》收任文极多。若《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皆入选（文共十七首），为众家之冠，可见其兼重“笔”，非纯以“翰藻”之文为主。又萧选已言不选经、子之文，但于经则取子夏《诗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左传序》、束皙之《补亡诗》，可见仍是“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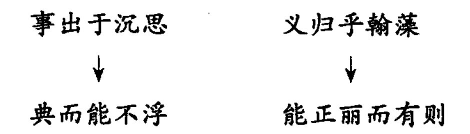
昭明之文学见解，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

>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文选》之编集功夫在于选择作品，亦是实现此一理想，此一见解与刘孝绰正取得一致。刘氏《昭明文集序》云：

>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善众善，斯文在斯！

此亦折衷综合之说。故知：



事出沉思，则质而不浮；义归翰藻，由丽而有则，正合文质彬彬之旨。

范晔之文章以缛丽胜，而其论文则主不得纯主盛藻，徒以工巧图绩，意无所得，故主藻绩之中必有义。晋氏以来，赋家持论，亦主义与理。左思《三都赋序》，讥于义则虚而无征，则患在不实也。皇甫谧《三都赋序》明云：

> 因文以寄心，托理以全制，为赋之首。

挚虞论赋亦主“以情义为主，事类为辅”。是赋亦主乎事义，求能征实，皇甫谧言“托理全制”，故知所谓文选理之理，实刘勰云：“擘肌分理，唯务折

衷。”（《序志》）即此事义之所托，非可单纯视作事类，或以譬喻解之。是朱自清之说仍是落于一边也。

《文心·谐隐》：“会义适时，颇益讽谏。”如是则会义几乎同于讽谏矣。

又事类有二，即古典与今典。[①]

（1）直接的——在当前所见、所闻、所思。

（2）间接的——借古以言今。如《西征赋》之作法。辞赋上事、义互相为用。

后人亦有以辞、义分开来看古典文学作品。如黄节《诗学》：“于三百篇求其义，于《楚辞》以降求其辞。”不知《楚辞》以降，虽其文章有时辞胜于义，然无义之辞，又焉能流传于后代。只是义胜，抑为辞胜，视其如何偏差而已。

四、《文选》与文体分类问题

Prof. James R. Hightower 撰 the Wen Hsüan Genre Theory（《文选与文体论》）尝将《文选》文体分类，与《文心》作比较。[②] 汪辟疆以为：“刘彦和为昭明上宾，《文选》类目之区析，刘氏未尝不与有力焉。”又云：“选楼诸子，近则本刘彦和所论列，远则守挚仲洽之成规，斟酌损益，非由独创可知也。”[③] 按天监十六年，昭明时十七岁，到洽迁太子中庶子，刘勰兼东宫通事舍人。时同为东宫通事舍人者，又有何思澄。[④] 是昭明与刘勰有旧，甚有确据。

《文选》分类法既远承挚虞、刘勰旧规，此外似尚别有根据者：

（一）晋、宋以来，文章分体，总集之作，风起云涌。[⑤] 昭明在东宫时有书几三万卷，此类之书必曾寓目。

（二）《文选》收任昉文计十七篇，诗一篇。[⑥] 昉他著有《文章始》一

---

① 见陈寅恪说。

② *H. J. A. S.* VOL. 20/3 4，1957.

③ 《与黄轩祖论文选分类书》，《制言》18期。

④ 见何融《萧统年表》。

⑤ 见附表。

⑥ 昉卒于天监七年。

卷。[①] 今传《文章缘起》[②]，列八十四题，向疑其伪书。[③] 然核其类目，有可与《文选》所列文体参证者：

（1）于诗云："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言，多则九言。""又三言八字之文。"今任书开首为三言诗，晋夏侯湛作，以至九言诗，高贵乡公作。

（2）序云："吊祭悲哀之作。"今《文选》所收，只有哀、吊文、祭文，而无悲。张铣注："悲，盖伤痛之文。"《文章缘起》有悲文[④]、祭文、哀词、挽词各体。序所谓悲哀之作，故悲字乃文体。Hightower 译作 Threnody (Pei) Lament (ai)。注云："Pei as a separate from is into mentioned in Wen Hsüan , or else where , so far as I can discover. "

按 Threnody 为挽歌、葬歌，与悲似不同，应如蔡邕制作，悲某君文之例。

由上两项似可推知《文选》之分类，其中有斟取任昉之处。

（三）张率以天监十七年[⑤]，除太子仆射[⑥]，普通三年[⑦]为太子家令，与中庶子陆倕、仆射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是张率与昭明关系至深，不在刘孝绰之下。张率著有《文衡》十五卷，殆亦论文之作，则张氏之文学见解，对萧统或有影响，亦未可知。

---

① 《隋志》称其有录无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详何人。

② 夷门广牍本，明陈懋仁注。

③ 《四库提要》即有此说。

④ 蔡邕作《悲温舒文》。

⑤ 统年十八岁。

⑥ 见《梁书》本传。

⑦ 统二十二岁。

附表　昭明以前及同时之文章总集与分体总集略表

甲　总集类

书　目	编撰者
善文，五十卷。	晋杜预。见成瓘《篛园日札》。宋裴骃《史记集解·李斯传》引之。选文兼记作者，《后汉书·马皇后传》李贤注引，似唐时尚有其书。
翰林论（梁五十四卷，隋志三卷）。	晋李充。充成帝时丞相王导掾。
文章流别志、论（梁志二卷、论二卷）。	挚虞①
集苑，六十卷。	谢混
集林，一百八十一卷（梁二百卷）。	刘义庆
集林钞。	
文苑，一百卷。	会稽孔逭
文苑钞。	

乙　各体总集类

书　目	编撰者
赋集，九十二卷。	谢灵运
诗集，五十卷。	同上
诗英，九卷。	同上
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	昭明太子
古乐府，八卷。	
七集，十卷。	谢灵运
子抄，三十卷。	庾仲容
杂论，九十五卷。	殷仲堪
颂集，二十卷。	王僧绰
古今箴铭集，十四卷。	张湛
吊文集，六卷。	
碑集，十卷。	谢庄
诔集，十二卷。	同上
杂祭文，六卷。	释僧祐
众僧行状，四十卷。	同上
设论集，二卷。	刘楷

① 《文心·颂赞》篇对赞虞《流别》大有抨击，如"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详拙作《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

续前表

书　目	编撰者
客难集，二十卷。	
集论，七十三卷。	
杂露布，十二卷。	
杂檄文，十七卷。	
书集，八十八卷。	王履
策集，一卷。	殷仲堪
诽谐文，十卷。	袁淑

五、吐鲁番写本《文选序》之校勘

《文选序》古写本主要有二：一为吐鲁番三堡[①]所出之初唐写本，一为日本之上野钞本。上野本有杨守敬跋尾，罗振玉《文选集注》十六卷本所称楚中杨氏得一卷者也。高阆仙《文选李注义疏》曾据入校。三堡本见黄文弼之《吐鲁番考古记》，系 1928 年发见，存十七行，起“（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句，讫“自姖汉已来”句。余曾取与上野互校。如：

“譬陶匏异品”句，胡克家“品”作“器”，而三堡、上野两本均作“品”。

“舒布为诗，既其如彼”句，此二本悉同。胡本作“既言如彼”，“又亦若此”。明成都周满刊辽国重梓《昭明太子集》作“若斯”。

至于异体俗书两本相同者，如：

“表奏笺记之别”，二写本同，胡本辽集作“列”。又互作㸦，析作�，

姬作姖（从巨），

“移晷”作“晷”，辽集“晷”，误。

黄氏校记有误认者，如：

---

① 即哈拉和卓。

"吊祭悲哀之文"，黄误吊为予。原自不误。

其中文字异体可记者，如分"镳"作"镳"，缺火旁；"箴"作"葴"，从草；"诔"之作诔，"河梁"之作"何梁"等。

此序出张怀寂墓，有长寿三年（公元694）《寂墓志》，为武周时物。日本龙谷大学藏有长寿二年张怀寂"河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马告身"[1]，怀寂盖王孝杰部将也。

附录 《文选》解题

《文选》是中古诗文总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现在所知最早的总集，似乎是杜预编的《善文》。自《文选》流行，已被淘汰而失传了。隋唐时，考试以《文选》出题目，故《文选》成为士子学习作文章的基本读物；时人因之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及李善作注，详注出典。历宋至清，《文选》成为显学，有"选学"之称。五四以来，文学改革家排斥俪体，给一般骈文作家戴上"选学妖孽"的帽子，但《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是十分重要，不能抹杀。

《文选》编者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好士爱文，所罗致的助手，当时号为东宫十学士（见《南史》二十三《王锡传》）。以刘孝绰、王筠、陆倕等为首。萧统卒于梁中大通三年（公元531）。他所礼接的文士，陆倕于普通七年卒（公元526）。查《文选》收有陆倕文篇，但没有选刘、王作品，故知《文选》编成必在526年以后，531年之前这一段之间。

萧氏在《文选序》上提出他选文的标准，是要合乎"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要求。他在说明著书体例，排除经、史、子三者，但对史书中的赞、论等，如果能够具有"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的条件，亦可破例入选。可见他如何重视辞采。另一方面，在章、表、奏、启部分，却占极大的篇幅。如任昉一人即收有十篇之多。从另一角度，可看出萧氏对实用性的文篇，亦不漠视。他并非完全以文藻为主，同时兼顾文和笔的。

《文选》分体共三十八类。有人病其过于繁碎。如果拿它和《文心雕龙》论文章体式作一比较，便发觉有些地方，暗合于《文心》。《文选》成书在前，似乎尝参考过刘书，但萧选类目，割裂骈枝之处甚多，不及《文心》义例

① 《西域文化研究》三，p. 294—p. l. 35。

之严。

《文选》自宋后有刻版，本子繁多，主要有四个系统：

（一）无注本。萧统原来三十卷本。敦煌有六朝写卷残帙，存于法京。

（二）李善注本。六十卷。现存有唐永隆年写《西京赋》残卷。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国子监始刻李注本（北京图书馆藏残本）。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尤袤刻本，最为重要。

（三）五臣注本。三十卷。唐开元中，吕延祚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本，世谓为五臣注。日本有唐写本（天理大学藏，已印入该校善本丛书），台湾"中央图书馆"有宋绍兴十四年建阳陈八郎刊本。

（四）六臣注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宋本通行有三种：赣州本，前李善注，后五臣注；明州本，绍兴二十八年刊，先五臣，后李善；日本足利学校秘籍丛刊复印（汲古书院印）广都裴宅本，崇宁五年刊。台湾翻印。

日本另有《文选集注》，为百二十卷本。《集注》撰者未详，所引李善注，较宋本为详。京都大学影印本。

翻译

Erwin Van Zach：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Introduction by James R. Hightower Haw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XVIII 1958.

Stadies：James R. Hightower：the Wen Hsüan Genre Theory，*J. J. A. S.* 20，1957.

David R. Kneehtges：Wen xuan' 2 vol. Princeton University，1982，1987.

Gerhand Schmitt：Aufschlüsse über das Wenxuan in seiner frühesten Fassung durch ein Manuskript aus der Tang-zeit，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 Schafter Zu Berlin，Band XIV，Heft 3. 1968.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收入《选学丛书》中。

黄侃《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骆鸿凯《文选学》。

林聪明《昭明文选考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文选》论文

饶宗颐《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57），

又第二期（1958）。

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

古田敬一《文选编纂の人之时》，《小尾郊一退官论文集》，广岛。

斯波六郎《文选诸本の研究》，在《文选索引》卷之前，1957，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印。

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文物》，1976（11）。

冈村繁《文选集注と宋明版印の李善注》，《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论集》，讲谈社，1979。

齐益寿《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古典文学》第三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

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

文选之学，兴于隋唐。[①] 曹宪开其朔，而李善集其成。善为注六十卷，敷析渊洽，为世所称。厥后吕延祚以善止引经史，不释述作意义，乃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复昭明之旧，为三十卷。开元六年，延祚上之，名曰“五臣注”。[②] 赵宋以降，五臣盛行。其时锓版，有以李注合于五臣，号曰“六臣注”。[③] 今所传宋椠，或先五臣，次李注，如明州本、广都裴宅本[④]是也。或先李注，后五臣，如赣州本[⑤]是也。然六臣本于善注及五臣多有增芟，时复羼杂，非尽本来面目。[⑥] 五臣后出，立说荒陋，且多剽自李注，久为学林所诟病。清代选学昌明，从事校雠者，若何义门、陈景云、余古农、许巽行辈，勤于辨析，竭尽心力，思复崇贤之旧观。胡克家既据宋淳熙辛丑尤袤于贵池镂版之李善单注本，加以重雕。彭甘亭、顾千里实预其役，爰有《考异》之作。惜尤刻仍非未经合并之本，故其正文，或与五臣相杂。

① “文选学”一名见《旧唐书·儒林·曹宪传》及《新唐书·文艺·李邕传》。

② 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③ 《直斋书录解题》云：“五臣注三十卷，后人并李善原注合为一书，名六臣注。”

④ 明州本，绍兴三十八年修正，六十卷，题梁昭明太子撰，五臣并李注。有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参军兼监卢钦跋语。广都裴宅本，原为徽宗崇宁五年刊，南宋宝庆、咸淳间河东裴氏重刻。题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贤馆直学士李善注，共列三行。明嘉靖六年袁褧覆宋刻，自此出。

⑤ 赣州本，题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分列四行，无刊版年月，为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详《皕宋楼藏书志》），茶陵陈仁子本从此出。

⑥ 淳熙尤袤跋云：“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

盖南宋时除尤刻外，已无完善李注单刊之本，即尤本亦非尽旧观也。[①] 李注原书，既不易觏（敦煌所出李注，惟《西京赋》及《答客难》、《解嘲》两残卷），倘五臣原本具在，持以勘校，其异亦可以立见。乃胡氏刊书时，除尤本外，所见仅为明袁褧本及茶陵陈仁子本。所据既止于此，雠校所得，自不免于事倍功半。是故循六臣本以求善注之原貌，不若求之五臣单注本，爬梳剔抉之为便也。顾千里故谓："使有五臣而不与善注合并，即合并矣，而未经合并者具在，即任其异而勿考，当无不可。"其言是矣。惜五臣单注本，清世治选学者均未之见，而人间传帙甚稀。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有《五臣注文选》三十卷。见于著录，仅此而已。[②]

以余所知，五臣单注古本之存于今者，盖有两种：一为宋椠本，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公元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共三十卷，十六册。首三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第四卷以后为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③] 一为日本所存旧钞残页，三条公爵家藏。昭和十二年影印一轴，列《东方文化丛书》第九。宋椠本，余未获见；日钞本，扶桑学人知其可宝，既为印行，然尚未有人专作研究者。兹试为校覈，并与胡刻六臣本参证。惜五臣宋椠未能合校，惟有期诸异日耳。

日钞残五臣注，仅存卷第二十。影刊卷子高八寸七分，全长四十一尺。纸背写日本正历四年（公元993，宋太宗淳化四年）；具平亲王撰《弘决外典钞》卷第一。[④] 起邹阳《狱中上书》，自"玉人李斯之意"句至篇终。接司马长卿《上书谏猎》、枚叔《上书谏吴王》及《重谏吴王》、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女有不易之行信而"句下缺。中间又缺去任彦昇《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启萧太傅固辞夺礼》三篇，与《奏弹曹景宗文》前半，即接"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景宗"句迄篇终。又接《奏弹刘整》，迄"范及息逡道是采"句，下又缺脱。接《奏弹王源》，

① 见胡刻《文选考异序》。序出顾广圻手，亦载《思适齐集》卷十。

② 《读书敏求记》卷四云："宋刻五臣注《文选》，镂版精致，览之殊可悦目。唐人贬斥吕向，谓比之善注，犹如虎狗凤鸡。由今观之，良不尽诬。昭明序云都为三十卷，此犹是旧帙，殊足善耳。"

③ 见屈万里《台湾公藏宋元本联合书目》。查长洲王颂蔚《古籍经眼录》记重校新雕《文选》三十卷，为绍兴三十一年建阳书肆刊者，即此。顾廷龙有《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见《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102期。

④ 纸背《弘决外典》为具平亲王所撰四卷本中之卷第十本。有卷首亲王序文，引外典目录年代略记。此书别有弘安七年金泽称名寺圆种手钞本册子，纸面有"花王藏"、"日纯"墨书，据推断为镰仓时代书写，与此卷可相表里。

文缺篇首，仅存“丞王源忝籍世资”句起，讫终篇。下接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繁休伯《与魏文帝笺》、阵孔璋《答东阿王笺》、吴季重《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俱完篇，至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褒德赏功有自来矣”句。据此卷日人所附解说云：“原纸数共二十二枚”，似其初非卷子本，重印时为裱成长轴耳。原本每行字数，十四、十五、十六字不等；注双行，每行二十二三字。书法颇工。

此钞本有济、良、铣、向、翰等注，无李善注，自是五臣注本。按五臣注复昭明之旧，为三十卷。自《奏弹曹景宗》以下，在李善注为卷四十，《上书吴王》以下数篇，在善注为卷三十九，则此本于五臣注应为卷第二十。钞本唐讳民、基等字，并缺笔。其字体及纸质，据鉴定为日本平安朝中期所书写，则其依据本子，可能为唐本，亦可据以觇五臣注唐本之原状。

本文校记先列日钞正文并注，次以四部丛刊影宋庆元间建阳坊刻六臣本雠校，其与李善单注有歧异者，又以胡刻入校。又日本所传唐钞《文选集注》卷七十九可与此残页参校者，有《奏弹曹景宗》以下至《答东阿五笺》共六篇。[①] 其他复以古刊史书合校。邹阳、枚乘书、相如谏猎、江淹上书共五篇，分以北宋景祐本《史记》、南宋重刊淳化本《汉书》、绍兴重刊北宋监本《梁书》校；《答临淄侯笺》，以绍熙本《三国志》校。谨揭所据古本于此。

案此残卷起邹阳《于狱中上书》“玉人李斯之意”句，其上缺。

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案此与景南宋重刊淳化本《汉书》同，景北宋景祐本《史记》“玉人”作“卞和”。

子胥鸱夷

案“胥”作“肙来力”，《汉韩敕碑》如此。

比干强谏

案《四部丛刊》六臣本“强”作“彊”（以下简称“丛刊本”）。

纣割其心

案“割”字，丛刊本作“剖”。

赐之死，取之死其尸

① 京都大学影印本在第四集。罗振玉影写本亦有《奏弹刘整》至《答东阿王笺》一册，其目录题为“弹事笺”，并谓：“无前后题，以李本卷四十三推知为卷八十五。”然善注《奏弹刘整》在卷四十。又《集注》原书于《东阿王笺》末实题“文选卷第七十九”。罗说殊误。

案日钞“取”下“之死”二字衍，从刊本无，是也。

沇之于江

案“沇”字，日钞连笔致讹。从刊本作“沉”是。

（以上济注）

有白头如新

案“有”字，《史记》、《汉书》、《邹阳传》及明翻宋本《新序》皆有；从刊本、胡刻本并无。

文不相得

案“文”字误，从刊本作“言人”二字。

情若相倾�盖之间

案“匡”字误衍，六臣本“相”下有“得”字，“倾”下接“盖”字，是。

（以上铣注）

籍荆轲首

案从刊本作“藉”。“藉”、“籍”通用。

以奉丹之事

案从刊本“之”下校云：“善本无‘之’字。”《汉书》亦无，《史记》、《新序》并有，与五臣同。

荆轲见于斯曰

案“斯”乃“期”之讹。

秦购将军之首

案从刊本此句下有“金千斤”以次三十八字，其末为“愿得将军之首”。日钞因其文之末四字相同而误脱。

以献于秦王，王必喜

案从刊本不复“王”字，而复“秦”字，盖分句不同。

臣左手持其袖

案从刊本“左”上有“因”字。

遂自到藉也

案从刊本“到”，作“刎”。又“藉”下有“借”字，是。

丹即燕太子丹也

案从刊本无“丹也”二字。

（以上向注）

案此节善单注本出《史记》曰而删节其文。日钞与六臣本所录向注，则不标《史记》之文，而就善所引者略为加减，如“今有一言”句删去“今”字，“遂自到”上加“从之”二字。行文减色，沿袭之迹全露。

临城自到（古郢反）

案六臣本无“反”字，下同此者从略。

以却齐而存魏

王奢自齐亡之魏

案丛刊本“奢”下有“齐臣也”三字，乃李善引孟康说。惟孟康原作“亡至魏”，五臣删其齐臣二字，故作“自齐亡之魏”。

今君来

案丛刊本“君”下有“之”字，乃李善引孟康原文，五臣删去。

遂自杀，齐兵遂却之也

案丛刊本“杀”作“到”，无“之也”二字，五臣改孟康之到为杀，而加“齐兵遂却”一句，两句重用“遂”字，亦五臣临文失检败露处。

（以上翰注）

案丛刊本此段先录善注，后云翰注同。再检善单注本起《汉书音义》曰，止“遂自到”句，无“齐兵遂却”句，盖孟康说。曰钞五臣单注本无“齐臣也”及“之”字，而有“齐兵遂却”句。三者比勘，则五臣略改善注之迹甚明，而日钞为五臣真貌，亦灼然可见。

苏秦不信于天下，无为燕尾生

案丛刊本无“于”、“无”二字。《史记》有“于”字，“无”作“而”。《汉书》有“于”字而无“无”字，《新序》及善本同。此节注语，日钞作“济曰”，丛刊本作“翰注”。

为魏取中山

白圭为中山将六城

案日钞“六”上脱“亡”字，丛刊本有之。

中山之君，将诛之，亡魏

案“中山之君”四字，丛刊本但作“殆”字，又“亡”下有“人”字。

（以上良注）

案丛刊本此节，先录善注，后云良注同。惟善注乃引张晏说，见《史记》、《汉书》注，并作“君欲杀之”；今作“殆”者，乃并注时之误，故文义不顺。日钞作“中山之君”，当是良注原貌。而丛刊本谓良同作“殆”，是五

臣注已间接为人所乱。

食以玦㖞

案《新序》“食”下有“之”字。

更厚一骏马

案丛刊本“厚”作“烹”。

（铣注）

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案丛刊本复“中山”字。校云：“善本少一‘中山’字。”是日钞与六臣之善本同。考《史记》、《新序》复中山字，《汉书》不复。又丛刊本校云：“五臣本少一文侯字。”今案日钞用重点，明非少一文侯字。六臣本所见之五臣注，往往不同于日钞。或并六臣注时，校勘误混。《史》、《汉》并复“文侯”二字，《新序》则不复。

而赠圭宝玉也

案“圭”，丛刊本作“以”。

（向注）

岂移于浮辞哉

案“辞”，丛刊本作“词”。

为宗所刖

案“宗”乃“宋”之别体，他处同此。

而三以为相也

案“三”字，丛刊本作“王”，《战国策》原文作“三”。且中山君亦不称王，疑并注时误改。今日钞五臣本无讹，故此类错误，不应概目为五臣之陋。

膑刖足也

案丛刊本无“足”字。

（以上翰注）

卒为应侯

为魏齐所笞击

案丛刊本“为”下有“魏相”二字，“齐”下有“之”字。此句下“折齿摺胁”四字，亦五臣故倒善注原文“折胁摺齿”之显见者。

亡入秦

案“亡”字，日钞用别体字似“止”，全卷皆同。

（济注）

徐衍负石入海

谏殷五不听

案"殷"下丛刊本无"王"字。

水自河出为

案日钞"为"下脱"雍"字，丛刊本有之。

衍恶周末之乱，负石于海也

案丛刊本"衍"上有"徐"字，"石"下有"投"字，"也"作"中"。

（此段日钞作良注，丛刊本作向注。）

以移主上之心

案"主上"二字与《史记》、《汉书》、《新序》合。丛刊本作"人主"，校云："善本作'主上'。"此又六臣所据之五臣本，与日钞不同者。

百里奚乞食于道路

案丛刊本同，校云："善本无道字。"考《汉书》有，《史记》无。

宁戚饭牛车下

案丛刊本"牛"下有"于"字。校云："善本无于字。"日钞亦无于字，与《史记》、《汉书》、《新序》合，此又六臣所据五臣本不同日钞者。

合于行

案日钞"行"字与《史记》、《汉书》合，丛刊本作"意"，与善本同而无校语，是亦六臣据本异于日钞。

昔者鲁听季孙之说

案日钞有"者"字，与《史记》合。丛刊本无"者"字，与善本、《新序》、《汉书》合。然丛刊本不云"五臣无者字"，是亦据本异于日钞。

季桓子受三日不不朝

案日钞"受"下脱"之"字，又衍一"不"字，丛刊本不误。

鲁用季孙

案"孙"字，六臣本作"氏"。

（以上向注）

孔墨之辨

案"墨"字同《史记》、《新序》、《汉书》，丛刊本作"翟"。校云："善本作墨字。"是六臣所据之五臣本作"翟"，异于日钞之五臣本作"墨"。又"辨"字，各本并从言，下"伊管之辨"同。

鲁宋竟以弱

案从刊本倒作“宋鲁”，又无“以”字。

（济注）

积毁销骨

案此句下五臣无注，日钞、丛刊本并同。胡刻此句下善注各本互有倒误，与五臣注无涉。

秦用戒人由余

案“戒”乃“戎”之讹。

穆公为霸王也

案丛刊本无“也”字。

宣王所以强威

案“强威”，丛刊本作“强盛”。

（以上良注）

垂明当世

案“明”字与《汉书》同，《史记》、《新序》作“名”，丛刊本作“名”，校云：“善本作明。”此亦六臣据本异于日钞。

由余子臧是矣

案“子臧”二字，《史记》作“越人蒙”。

朱象管蔡是矣

案连上条二“矣”字，与《史记》、《汉书》同，丛刊本作“也”。校云：“五臣作矣。”考《新序》亦作“也”。

欲杀舜

案丛刊本“欲”上有“常”字。

言朱象管蔡

案丛刊本作“计此四人”，与日钞意同而文异，疑并注时曾加润色。

文为雠敌之矣

案“之矣”，丛刊本作“也”。

（以上向注）

捐子之心

案“之”下应复一“之”字，日钞误说。宜作“捐子之之心”。子之，人名。

田常之贤

案丛刊本"贤"下有"良"字。《史》、《汉》、《新序》、善本并无之。

齐桓奏穆

案丛刊本"齐"上有"五伯"二字。[①]

（翰注）

于子南面

案"子"下脱"之子之"三字，丛刊本有。

哙死之亡

案"之"上脱"子"字，丛刊本有。

杀简公

案"杀"，丛刊本作"弑"。

常为相

案丛刊本"常"上有"以"字。

何足说之也

案丛刊本作"何足悦也"。

（以上济注）

案此节五臣注易旧说"燕王哙"为"燕国君哙"。其上竟谓属国于子之者为燕昭王，古人讥五臣为"荒陋"者，并见于此。

欲善无厌也

修其墓

案丛刊本"修"上有"而"。

（良注）

强霸诸侯

案丛刊本"强"上有"而"字，同善本。日钞无"而"字，与《史记》、《汉书》并同。但丛刊本不云"五臣无而字"，则其校勘是否有漏，抑或据本不同，疑不能明。

献公遂文公

案"遂"上丛刊本有"之"字。

免吕都之难

案"都"乃"郄"之讹。

① 日钞此注在"而三王易为比也"句下，六臣本并在"不说田常之贤"句下。

遂强霸

案从刊本“遂”下有“以”字。[①]

仇为管仲，公子纠射桓公中钩，而桓公以为相，而一匡天下也

案从刊本作“仇，谓管仲为公子纠射桓公中钩”，无“而桓公”以下十二字。

（以上铣注）

案日钞此节与六臣本详略差十余字，细察日钞“仇”下之“为”字，应是“谓”字；“管仲”下应有“为”字。改正误笔，则上半节两本相合。至下半节日钞所有之“桓公以为相”二句，疑并六臣注时，因避与善注引《论语》重复而从省。

诚加于心

案从刊本“加”下校云：“善本作嘉字。”而《史记》、《新序》、《汉书》并作“加”，与五臣同。

而遂诛其身

案从刊本、善本、《汉书》俱无“而”字。《史记》“而遂”作“而卒”。

而为人灌园

案“而”字乃日钞所独有，又日钞阑外有旧校笔云：“或本无园字。”

知其才得也

案从刊本“也”作“之”。

使使迎之

案从刊本作“使使往迎子仲”。

为人灌园之也

案从刊本无“之”字。

（以上向注）

披心腹

案从刊本“腹”下校云：“五臣作肠。”然日钞、五臣并不作肠，此种分歧，或由于据本不同，或由于校勘误混，亦六臣本使人致疑处。

隳肝胆

案各本《文选》并作“隳”，注同。《新序》亦同。《史记》、《汉书》并作“堕”。

---

① 六臣本分此注在“强霸诸侯”句下，日钞则并下段在“一匡天下”句下。

无爱于士

案丛刊本“爱”下校云：“五臣本作变。”或所见异本。《新序》亦作“变”。

桀之狗

案丛刊本“狗”作“犬”。《史记》作“狗”，《汉书》作“犬”。宋祁曰：“犬字当从浙本作狗，则近古而语直。”是日钞又可为宋祁校勘《汉书》佐证。

骠，开也。跖，盗跖也。由，许由

案丛刊本无下七字，殆并注时因善注已明，故于翰注从省。依六臣例，“开也”下应有“余注同”三字。

（翰注）

沉七族

案丛刊本“沉”下校云：“善本作湛字”。《史》、《汉》并作“湛”，同善本。

今吴王

案丛刊本“今”作“令”，是。

以剑刺之也

案丛刊本“以”上有“因”字，句末无“也”字。

（以上济注）

投人于道路

案日钞阑外校记云：“本无路字。”“本”上残缺似尚有一二字。丛刊本校云：“善本无路字。”案《汉书》无，《史记》、《新序》有。

万乘天子之也

案丛刊本无“之”字。

（铣注）

犹结怨

案日钞“犹”旁有旧校笔“秖”字，丛刊本作“秖足结怨”，善本同。盖日钞与《史记》同，《汉书》则作“秖怨结”。《新序》作“秖足以结怨”。

德重也

案丛刊本作“德重者，人不以为德故也”。

（向注）

故有人先谈

案丛刊本引“善曰谈或为游”，考《史记》作“谈”，《新序》、《汉书》

作"游"。

辅人主之治

案从刊本"治"下校云:"善本作政字。"胡刻善本则作"治",与日钞、五臣同。

枯木朽珠之资也

案"珠"乃"株"之讹。从刊本校云:"善本无也字。"然胡刻善本及《史》、《汉》并有"也"字。

龙因也

案"龙"乃"袭"之讹。又日钞此注脱去题名,从刊本作"翰曰"。

独化陶钧之上

案"化"下脱"于"字,从刊本有。

造瓦器者也

案从刊本无"也"字。

故比之天

案"天"从刊本误作"矣"。此段良注,日钞在"众多之口"句下,从刊本在"陶钧之上"句下。

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轲之说

案"蒙"下,《史记》、从刊本、善本并有"嘉"字,独《汉书》无之。颜监曰:"蒙者,庶子名。今流俗书本蒙下辄加恬字,非也。"顾炎武曰:"传文脱嘉字。"王先谦曰:"蒙嘉事并见《燕策》、《新序》,此文《史记》、《文选》皆作蒙嘉。"是日钞所据本乃同《汉书》脱本。又从刊本无"以"字。校云:"五臣有以字。"所见本与日钞同。

周文五猎泾渭

案日钞阑外校云:"本无王字。"然《史》、《汉》、从刊本并有,独胡刻善本无。此节铣注刺秦王事,前段删录善注,其下如从刊本。六臣本并注时,删去铣复善者,故铣注起"为先言于秦王"句。

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

案句与《史记》、《新序》同,从刊本校云:"善本无沉于字。"而胡刻善本仅无"于"字,与《汉书》同,所谓无"沉于"者不知何本。

此鲍焦所以忿于世也

案句同《汉书》、《新序》。王先谦曰:"《史记》、《文选》世下有'而不留富贵之乐'七字。"又《汉书》"忿"作"愤"。此节济注鲍焦事,略删善注而

成。六臣本先录善注，故删铣复善者，只留不羁以下十九字，后云："余文同。"

墨子回车

故配也

案日钞误，从刊本作"故丑之"。

堀穿穴岩薮之中

案《新序》、《汉书》、善本并同，从刊本校云："五臣本作岩穴。"此亦六臣所见之五臣本不同日钞。又《史记》"岩薮"作"岩岩"。

而趋厥下者哉

案从刊本校云："五臣本无'者'字。"此亦所见五臣本不同日钞。

上书谏猎一首

案从刊本无"一首"二字。

方自击熊驰逐野兽

案从刊本无"驰"、"野"二字。

回上流谏也

案"回"乃"因"之讹，"流"乃"疏"之讹，"也"字，从刊本作"之"。

（以上为题名下向注）

遇轶才之之地

案二"之"间说"兽骇不存"四字。

力不得施用

案从刊本校云："善本无施字。"《史记》亦无"施"字，《汉书》"力"、"施"二字并无。

尽为难矣

案句下济注三十二字，从刊本录于"属车之清尘"下。

中路而后驰

案从刊本无"后"字，《汉书》亦无后字，宋祁曰："浙本驰上有后字。"王先谦曰："《史记》有后字。"均同日钞五臣本。

而况乎涉丰草骋丘墟

案胡刻、善本同。《汉书》无"而"字，《史记》作"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

不以为乐出万有一危之途

案日钞"为乐"之旁，有旧校"安"字，与《汉书》合。从刊本作"为

安而乐”，与《史记》合。

万乘天子谓也

案“谓”应在“天”上，日钞误倒，无“谓”字。

（翰注）

祸故多藏

案丛刊本“故”下校云：“善本作固之字。”《史记》、《汉书》并作“固”。

坐不垂堂

而伤之矣

案丛刊本无“矣”字。

（铣注）

上书谏吴王

为吴王濞郎

案丛刊本“郎”下有“中”字。

乘秦书谏王

案“秦”乃“奏”之讹。[①]

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案“昌”上“亡”上俱有“全”字，与《汉书》同。丛刊本则并无二“全”字。

汤武之士

案“士”字，六臣及他本并作“土”。唐人写卷，士、土二字，以两横旁有点者为士字，无点者为土字，不以上横长短作分别。

下不伤百里之心

案“里”，丛刊本及他本并作“姓”。

三光日月星不绝其明者（连下共二十七字）

案善引《淮南子》高注：“三光，日月星也。”济注不标出处，但取义，故其文如上录日钞本。丛刊本先录善注已有此语，故后录之济注删去“三光”五字，止录其“不绝”以下二十二字。

（济注）

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

案《汉书》善本并同日钞。丛刊本“以”下有“置”字，校云：“五

---

① 题名下济注，但节录善注而已，故丛刊本录善注，后云：“济注同。”

臣本无置字。”此六臣所见五臣本与日钞相同，而所据有置字，不知出何本。[①]

披腹心

案日钞与《汉书》同。丛刊本作“心腹”，校云：“善本作腹心。”此六臣所据之心腹，乃另一五臣本，与日钞异。

下垂不测之渊

廿斤曰钧

案丛刊本“廿”作“三十”。

不可测也

案丛刊本作“不可得知也”。

（以上向注）

百举必脱

是以尽脱于祸

案丛刊本无“以”字。

（良注）

变所欲为

案日钞与《汉书》同，丛刊本“所”下有“以”字，校云：“善本无以字。”是六臣所据五臣本有“以”字也，与日钞异。

谋逆之计变也

案丛刊本“变”下有“改”字。

弊无穷之极乐

案日钞此句与胡刻善本同。丛刊本“弊”作“敝”，无“极”字，《汉书》同。

宄万乘之重势

案“宄”乃“究”之讹。“重”字，丛刊本及他本并无之。

以居泰山之安

案“以”字同《汉书》，丛刊本及他本并无。

不知就阴而止

案“知”字与《汉书》同，丛刊本作“如”。[②]

---

① 《说苑》亦无置字。

② 《说苑》作如。

楚之善射者也

案“也”字与《汉书》同，从刊本有“也”字。

乃百步之内耳

案“乃”字与《汉书》同，从刊本“乃”下校云：“善本无乃字。”

言养由所得百中者

案从刊本“由”下有“基”字。

与之相北

案“北”乃“比”之讹。从刊本“之”作“人”。

言操持之也

案从刊本无“言”、“之”二字。

（以上铣注）

祸何自来哉

案从刊本“哉”下校云：“善本无哉字。”《汉书》亦无“哉”字。

殚极之绠断干

案“殚”，《汉书》作“单”，王先谦曰：“《文选》加歹为殚，不可从。”“绠”字，从刊本作“统”，校云：“五臣本作绠。”此与日钞同。

殚尽也绠索也

案从刊本无上三字，殆以已见善注，故并注时删去。

（翰注）

渐靡使之然也

靡磨也

案从刊本“磨也”作“无也”，似非浅人所改。《荀子·性恶》“靡使然也”，杨注：“或曰靡，磨切也。”枚叔用荀子语。“靡”盖通作“劘”。

（济注）

至文必过

寸寸度

案“度”下脱“之”字，从刊本有。

必有盈缩矣

案从刊本无“矣”字。

皆不中

案从刊本“中”下有“也”字。

（以上铣注）

径而寡失

若称文量

案“若”下脱“石”字，丛刊本有。

（良注）

手可擢而拔

案以“拔”为“拔”，见北周《赵智侃墓志》。《汉书》作“拔”，丛刊本“拔”下校云：“善本作抓字。”

先其未形也

案“也”字，《汉书》同，丛刊本校云：“善本无也字。”

不见益也

案丛刊本“见”下有“其”字，句末“也”字，与《汉书》同。

有时而亡

案日钞“亡”字形“止”混，此“亡”字旁有校笔作“亡”，又同见吴季重《答魏太子笺》。

恐一朝见困矣

案丛刊本讹“困”为“用”。

磨砻砥皆磨石

案丛刊本“皆”上有“砺”字。

臣愿大王熟计

案丛刊本无“大”字，又校云：“五臣本无臣字。”所见与日钞异。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按日钞脱“也”字。

上书重谏吴王一首

案丛刊本无“一首”二字。

既举兵及

“及”乃“反”之讹。

（题下济注）

昔秦两举胡戒之难

案“戒”乃“戎”之讹。又《汉书》“昔”下有“者”字。

南距羌筰之塞

案“筰”同《汉书》。丛刊本作“莋”，校云：“善本作筰字。”下文同。

而又反能东向

案从刊本无“反”字。

（良注）

厉荆轲之威

当率五国逐秦

案从刊本“国”下有“兵”字。

燕后复使荆轲

案从刊本无“后”字。

（以上铣注）

并力一心悉以备秦

案从刊本及他本并无“悉”字。

而并天下者是何也

案从刊本无“是”字，又“者”下校云：“善本作是字。”善本无“者”有“是”，与《汉书》同。

愿责先帝之遗约

案此句下从刊本有“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十一字，他本并同，日钞良注有“三公”字，乃正文误脱。

是大王之威

案“之”字与《汉书》同，从刊本校云：“善本无之字。”

不如朝夕之池

路言台下临路

案从刊本句首有“上临”二字，“下临”下有“苑”字。

朝夕池海水也

案从刊本无“水”字。

（以上铣注）

绝吴之饷道

鲁东海二郡也

案从刊本讹“郡”为“都”。

（良注）

亦不得已

荥阳县也

案从刊本“也”作“名”。

（铣注）

四国不得出兵以安其郡

案丛刊本及他本并无“以安”二字。

亦以明矣

案“以”，丛刊本及他本并作“已”。

赵王遂发兵应吴将郦寄园邯郸故云囚也

案“将”上应有“汉”字，“园”字应是“围”字之讹。丛刊本至“发兵应吴”句止，无“汉将郦寄”以次十一字。此十余字乃善注引应劭之说，日钞济注此十一之应是五臣删袭原貌，丛刊本无之，殆后人汇并六臣注时，以善注已明此事，故于济注内删去复善者耳。

（济注）

诣建王上书一首

案日钞此题不提行，直接上篇《重谏吴王》末句“愿大王熟察焉”之下。又丛刊本题下无“一首”二字。

江文通

景素好事

案“事”乃“士”之讹，丛刊本及绍兴重刊北宋监本《梁书·江淹传》并作“士”。

得罪连淹系州狱

案丛刊本“罪”下有“辞”字，“狱”下有“中”字。

淹既上书

案丛刊本无“淹既”二字。

（向注）

案丛刊本江文通题名下，先录善注，次录：“向曰：诣，谒也，余注同。”所谓同者，向述江淹事略与善引《梁书》同也，实则仍有异文。校记此上三则，乃向注与善之异，当是五臣真貌。

飞霜系于燕地

案“系”字误，丛刊本及绍兴本《梁书》并作“击”。

贱臣邹衍也事燕惠王左右谮之被系于狱乡天而哭盛下天为之霜降叩心言恨也

案丛刊本无“事燕”以次二十三字，殆因已具善注，故删并六臣注时，节去翰注。“下”乃“夏”之讹。

（翰注）

振风袭于齐堂

案“堂”字与《梁书》同。丛刊本作“台”，校云：“五臣本作堂。”又句

下注作："济曰：袭，及也，余文同。"案日钞济述齐庶女事同善注，但字句微异，殆济袭善注而微易其文字也。

女有不易之行

案日钞本文止此句，以下佚。

奏弹曹景宗

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

案日钞起此，以上佚。

遘兹多幸

非分而得之多幸

案从刊本"之"上有"谓"字，唐钞本《文选集注》所引铣注同。日钞误脱。

获兽何勤

言景宗

案日钞"言"上有汉高论功狗事，与丛刊本所录善引《汉书》一段相同，其删节《汉书》处亦同，而胡刻善单注本及《集注》所录善注皆多数字（即《考异》指出袁本、茶陵本所无之九字）。知胡刻及《集注》为李善真貌，日钞为向注真貌，六臣本则割向注为善注，遂两失之。

（向注）

锤鼎遽列

案"鼾"为"鼎"之别体，《集注》作斯，字见《龙龛手鉴·斤部》者，乃作鼎下从"斯"。

二八已陈

而已当此赐也

案"已"字与《集注》所录良注同，丛刊本作"亦"字。

（良注）

案以从事

皆以亲书从事

案"亲"字误，丛刊本及《集注》本并作"新"。

（良注）

略不世出挺拔也不略谋也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

案丛刊本"不"在"世出"上，日钞误倒，《集注》本则脱"不"字。

（向注）

圣朝乃顾

圣胡谓梁也

案“胡”乃“朝”之讹。丛刊本无“也”字。《集注》本于铣注前有“铣曰圣朝，谓梁武帝”，故删铣注此句。

（铣注）

致辱非所

案丛刊本“致”下校云：“五臣本作累。”此六臣本所见与日钞异。

臣谨以劾（胡伐反）

案日钞“伐”字阑外有校笔作“代”。

济日劾发其罪

案丛刊本脱“济日”二字。

（济注）

削爵士

案日钞“土”字，不论两横笔之长短，右旁加点者为土字。

收付廷尉法狱治罪

案《集注》本“治”作“罚”，注云：“今案钞五家陆善经本罚为治。”

白简以闻

按善本止此。日钞及丛刊本并有“臣昉诚惶”以下二十字，即《考异》所说“似善五臣之异”者也。《集注》则“闻”下止“臣君诚惶诚恐”六字。“君”字乃《集注》用为作者主名之代字，详见下“繁钦”条。又《集注》正文已删“稽首”句，仍留李周翰“稽首”注。

奏弹刘整

家无常子

兖号其家

案丛刊本此句下录善注作“青土号其家”，下云“五臣作兖土”。后又云：“良注同。”是良注作“兖土”也。疑日钞脱“土”字。案胡刻善注作“青土”，《集注》录善注则作“兖土”。

是士以義士节夫

案日钞“是”下衍“士”字。余与各本同。丛刊本校云：“五臣本義上无‘是以’二字。”是六臣所见异于日钞。

廿许年

案此与《集注》本同，各本并作“二十”两字。

叔郎整恒欲伤害

案"恒"字与《集注》本同，丛刊本校云："善本作常字。"

前奴教子当伯

案"伯"字，日钞、丛刊本并同。丛刊本校云："五臣本作百，后'当伯'字同。"是六臣与日钞所见异本，惟《集注》引"钞曰：教子、当百，二奴名也"。则"百"字与六臣所见本同。又日钞自"并已入众"至"不分逡"止，凡三十二字，旁有校笔作"︺"号，似表示此三十二字乃他本所无。又案庥注本此句下引陆善经曰："本状云奴教子当伯已下并昭明所略。"又善单注本"整即主"句下注云"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由此知"前奴教子当伯"句下"并已入众"起，至"整即主"止，约八百一十字，乃昭明所删，而善本补回者。现行胡刻及丛刊本于此八百余字大体从同，日钞则有二百九十余字连弹文佚去，然以《集注》所引钞五家本推之，当与丛刊本无大异。此外《集注》本只有"寅第二庶息"至"整便打息逡"八十余字，即上文删去三十余字，下文删去七百余字。又《集注》引陆善经本，则删去《集注》本所有之八十余字。再观日钞校笔，又有删去"状首"三十二字本子。则此八百余字之删存多寡，极不一致。细审善注云"因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一语，知所谓"详"者，未必全，所谓"引"者，乃引作注文，并非与正文连读。故以本状羼入正文，乃后人各以己意为之，而五臣则以全状羼入者也。

以钱婢姊妹

案丛刊本及善本"以"上有"又"字，日钞及《集注》引并无。

仍留奴自使

案丛刊本"使"下校云："善本有伯字。"日钞及《集注》引并无。

整便责范米六斗

案"斗"字，各本皆同，日钞旁有校笔作"㪪"。《集注》作"㪪"，所引钞曰作"㪪"，五家本两作"斗"。"升"、"斗"二字形近易混。

隔薄攘拳

案"薄"，丛刊本作"箔"。校云："善本无隔箔字。"案胡刻善本有。《考异》云："此尤添之，以五臣乱善。"案《集注》删节此段大异五臣，仍有"隔薄"二字，知非五臣独有，胡刻本有此，殆据本不同。又《集注》本作"簿"，后引五家则作"薄"。

突进屋中

案"屋"与《集注》本同，六臣从善本作"房"。

取车帷米去

案日钞“帷”下旁有校笔作“準”，《集注》本同作“準”，从刊本作“准”。

车阑来杖

案日钞“来”旁校笔作“夹”，《集注》本“阑夹”字同，从刊本作“栏夹”。

问失物之意

案从刊本“物”下校云：“五臣本无物字。”而日钞有之，知所见异本，《集注》本亦同有“物”字。

整及整母

案《集注》引五家本同。从刊本“及”下无“整”字。校云：“五臣作无及字。”是此校语有讹脱。

六人来共至范屋中

案各本并同，从刊本“共”下校云：“善本无共字。”

辄摄整父母旧使奴

案日钞《集注》引并同。从刊本“父”上校云：“善本有亡字。”

兴道先为零陵

案日钞及《集注》引同，从刊本“陵”下有“郡”字。

得奴婢四分赋

案“赋”字日钞与《集注》引五家本同。从刊本“赋”作“财”，校云：“善本作赋。”详六臣意，是用五臣之“财”字，故校云善作赋，但胡刻尤本善反作财，而日钞五家又反作赋，知六臣本校语殆不足信。《考异》所谓尤改之者，似未审此。又六臣本“四”下有“人”字。

乞大息寅，寅亡后

案日钞与《集注》引同，从刊本“亡”下校云：“善本作‘亡寅’。”

各钱五千丈

案日钞与《集注》引同，从刊本“各”下有“准”字。

先是众奴兄弟未分财之前

案日钞与《集注》引同，从刊本“奴”下校云：“善本有整字。”“未”下校云：“善本无未字。”

寅未分赎当

案日钞“当”下脱“伯”字，《集注》引及从刊本并有。

整归当伯行还

案日钞与《集注》引同。丛刊本“行”下校云：“善本无行字。”

疑已死亡回

案日钞与《集注》引同，丛刊本善本“亡”下并有“不”字。

刘整兄弟二息

案《集注》引作“第”，余同日钞，丛刊本“整”下校云：“五臣本无整字。”是所见异本。“弟”上有“寅”字，校云：“五臣本无寅字。”

停任十二日

案丛刊本“任”作“住”，《集注》引同，日钞误。

整即纳受

案“即”字，日钞与《集注》引同，善本亦同；独丛刊本作“则”。

二月九日夜去失车兰子

案“去”字，《集注》引作“亡”字，丛刊本作“云”字，校云：“善本无云字。”又“兰”，日钞与《集注》引同，丛刊本作“栏”字。

范及息逡道是采

案日钞止此，以下佚。

奏弹王源

丞王源忝藉世资

案原文“臣谨案南郡丞王源”句，日钞起“丞”字，以上佚。《集注》本“丞”下有“臣”字。

同之抱布

同抱有之事

案“有”乃“布”字之讹，《集注》本、丛刊本并作“布”。

熏莸不杂

案日钞与《集注》同。丛刊本作“熏不莸杂”。“莸”下校云：“善本作‘熏莸不’。”是六臣不从善本，而所据五臣与日钞异。

济曰季文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哲智也

案日钞“季文子”下十二字，六臣本无之，殆前录善注已有此文，故济注中删去复见者，与《集注》所录济注相同。又《集注》所录善注有《家语》“颜回”十四字，故日钞、丛刊两本同有之济注中《家语》十四字，《集注》中济注亦从省。

（济注）

宋子河鲂

铣曰诗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姜子齐宋姓也

案日钞复出“河之鲤”三字。丛刊本无引诗八句，殆因已具善注内，故从略，又脱“齐”二字。《集注》本铣注引诗止取下半章四句，亦因前录善注具全文也，“齐宋”及余文并同日钞。

（铣注）

蔑子辱亲

蔑轻也

案丛刊本“轻”作“无”。《集注》本向注末无此字，殆因已见前录善注。

以明科黜之流伍

案丛刊本“以”上日钞误脱“宜”、“真”二字，各本并有。

方媾如此婚姻者也

案日钞与《集注》引吕延济曰同，丛刊本无“将”、“媾”、“者也”四字。

答临淄侯笺一首

案日钞与《集注》本同。丛刊本、善单注本并无“一首”二字。

杨德祖

案日钞题名下注，李善、张铣及《集注》本引陆善经注，并引《典略》，但三家详略微异。

丞相主簿

案丛刊本“相”下有“府”字。

曹公以修前后漏泄

案“泄”下各本并有“言教”二字。

为收杀之

案“为”字，丛刊本作“乃”。绍熙本《三国·陈思王传》裴注引《典略》亦作“乃”。疑改“乃”为“为”，殆铣注真貌。

（以上铣注）

修死罪

案日钞与《集注》本、丛刊本同，《集注》引“钞曰：今上此书有犯死之罪，再言之者，怖惧之深也”。又注云：“今案钞陆善经本死罪下有死罪两字。”知《集注》所据本同日钞，而所见两本则并复死罪字。又善单注本亦复死罪二字。《考异》谓为尤氏所添，似武断。《三国志》注引《典略》删此句。

弥终也

案从刊本向注无此三字，以已见善注，故从略。《集注》引善注与单注本同有此三字。日钞乃作向注，是五臣用善注而没其名之证。

（向注）

损辱嘉命蔚矣其文

翰曰嘉命谓植书也蔚盛

案此节注，日钞全文如上。《集注》因植书已见钞曰而录在五臣之前，故翰注只截取"蔚盛"二字。从刊本"蔚盛也"在"嘉命"之上。于李周翰顺文作注文例不合。又有"辱污也"三字，应在注首而反在注末，且据日钞则五臣无此文，据尤本则善注亦无此文，殆六臣又有混他注为五臣注者。

（翰注）

斯皆然矣

应璩时居于汝颖太祖食邑故云魏

案从刊本无"于"字，无"太祖"下七字，殆因已见善注，故删。

（良注）

宣照懿德

案"照"，各本及《三国志》注并作"昭"，善注引《毛诗》同。惟《集注》引"钞曰：昭，明也"，昭下有四小点，似校笔作"照"。

无得逾焉

案绍熙本《三国志》与此同作"得"，但误本作"所"字。

斯须须臾也子贡曰仲尼日月无得而逾焉以比植文章

案"子贡"以下，日钞与《集注》避复他家注，故删"斯须"五字。从刊本"须臾"下接"比植文章"，因避复善注故删"子贡"十二字。但"比"误作"北"。

（良注）

弥日而不献

今修作

案"今"字误，从刊本作"命"是。此段铣注，日钞与六臣本同。然自"竟日不敢献"以上，乃采自善注而稍易其字面。《集注》所引善注与胡刻同，乃善注真貌。六臣本删善注而出铣注，正可与胡刻比对。许巽行《文选笔记》谓五臣混入，盖未细勘六臣本与善单注有微异也。

（铣注）

教使刊定

云后谁复相知

案"云"上，日钞脱"向曰植书"四字，从刊本有。

修又辞以无能

案从刊本脱"又辞"二字。

（以上向注）

绝凡庸也

翰曰孔子在位……不能赞一辞秦吕不韦聚智略之士作吕氏春秋……而莫能有变易者此皆圣贤用心高大……

案日钞此段翰注，孔子一节乃善引《史记》文；吕不韦一节乃善引桓子《新论》文；又据《集注》，"聚智略之士"句，亦日钞引《吕氏春秋》文；故知删去书名，变换字面，集众说以为己说，乃五臣注之真貌。《集注》本、六臣本所录翰注皆截取"此皆"以二十四字，因上文皆复善注也。

（翰注）

悔其少作

良曰植书云……壮夫不为是悔其少壮也子雲雄字……即法言也

案日钞"少壮"二字，从刊本作"少作"。日钞良注具如上文，六臣本则全作善注。云"良同善注"，以善单注本及《集注》所录善注勘之，善乃止于"壮夫不为"句，而良用善说之后，加"悔其少作"句作停顿，然后再以己意注"子雲"数句，日钞全为良注，具见良没善注之实，六臣全作善注，则以五臣乱善矣。《集注》本录良注，起"子雲雄字"句，盖善与良即已分录，自无须"悔其少作"句耳。许巽行《文选笔记》知善注无"雄与修同姓"之句，尚未知良注也。

（良注）

若此仲山周旦为皆有諐邪

案日钞、《集注》本全同。从刊本"此"作"比"，"旦"下有"之畴"二字，"諐"作"諐"。《三国志》注引"此"字同，"旦"作"之徒"二字，"为"作"则"，"保"作"愆"。

云如雄言

案从刊本"云"作"言"。

（铣注）

窃以未为思也

案"以"下无"为"字。《集注》本、《三国志》注、善单注本、从刊本

并有。

向曰鄙宗谦词过言谓壮夫不为者

案丛刊本脱“谦词”二字，“者”字作“也”字。

（向注）

经国之大美

案日钞“美”旁有校笔作“义”字，《集注》本、《三国志》注、善单注本、六臣本并作“美”，惟《集注》云：“今案陆善经本美为义也。”知日钞曾以陆善经本校过。

岂为文章相妨害

案“为”，各本并作“与”。

吾虽薄位为藩侯

案“薄”下脱“德”字，从刊本、《集注》本翰注及曹植原书并有。又日钞以此节为“济注”，误，应是翰注。

诵咏而已

案名《文选》本并作“诵咏”，绍熙本《三国志》作“诵歌”，易培基补注本作“歌诵”。

矇瞍昏耄

案日钞、丛刊本同，《集注》本济注“昏”上有“犹”字。

（济注）

惠惠子之知我

案上“惠”乃“恃”之讹，《集注》六臣并作“恃”。此节注，《集注》本前录善注止引植书二句，后录良注凡五十二字，良注起二句同善注，但改善之“曰”为“云”，又减善一“也”字。观此则善与良之别甚明。乃善单注本并下半之良注共五十一字全作善注，六臣本亦全以五十一字为善注，下云：“良同善注。”此亦五臣乱善之例也。《考异》谓：“袁本无后半三十七字，是。有者，乃并五臣入善。”不为无见。

（良注）

季绪璅璅

案《集注》讹“季”为“香”。

修云何足以云

案《集注》本“修”上有“故”字，下“云”作“言”，是。

（铣注）

与魏文帝笺一首

案“一首”二字，日钞、《集注》、善单注本并同，丛刊本无。

繁休伯

案日钞题名与文题隔一空格，不另行。题名向注，袭用善说有删润。丛刊本作：“向曰：‘繁，步何反，余文同。’”谓同善注也。然《集注》引“《音决》：繁，步和反”。知吕向此注全袭旧文。日钞夹注下直接本文“正月八日”云云。

领主簿繁钦

案“钦”字，各本同，惟《集注》本“君”。案《集注》本屡以“君”字代作者名，如任昉《奏弹曹景宗》结末作“臣君诚惶诚恐”，任昉《奏弹刘整》起句作“御史中丞臣任君稽首言”，但结仍作“臣昉诚惶”。又六臣本无“繁”字，亦无校语，与日钞及胡刻并异，殆据本不同。

薛访车子

案此四字，日钞、丛刊本、善单注本并同；《集注》本“车”讹“申”，而注仍作“车”，是亦从同。《魏文帝集》叙繁钦云：“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见善注引。篇题从《全三国文》卷七）又有《答繁钦书》云：“固非车子喉转长吟所能逮也。”（《艺文类聚》四十三引）是车子应为一职名。故善注引《左传》“叔孙氏之车子钼商获麟”释之。孔疏释杜注云：“杜以车子连文，为将军之子，钼商是其名也。”然孔疏又云：“《家语》说此事云：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钼商。王肃曰：车士，将军者；子，姓；钼商，名。今传无士字。服虔云：车，车士；子，姓；钼商，名。”今姑不论《左传》异诂，断以车子为将车之士，于魏文原书，可无窒碍。然繁钦笺云“年始十四”，又恐年幼不胜将车之任。此可疑之一说也。《集注》云：“今案钞，车上有弟字。”又云：“钞曰：姓薛，名访，兄弟之子也。”是谓薛访之弟名车者，有子能喉转也。《集注》又云：“陆善经本车为弟。”即陆本作“薛访弟子”，可解薛访之弟之子，义与钞曰相同，此又一异说也。李周翰注、日钞及《集注》别云“薛访车姓名”，未免望文生义。丛刊本引五臣作“薛访车子姓名”，可读为薛访是车子之姓名，此虽无据，亦一说也。上所引本，流传多歧，时代荒远，竟难究诘矣。

鼓吹乐署也

案《集注》同，丛刊本误“乐署”为“音乐”。

薛访车姓名

案《集注》句末有“也”字，丛刊本“车”下有“子”字。

（以上翰注）

能喉啭引声

案日钞、丛刊本、善单注同作“啭”。《集注》作“转”，注云：“《音决》：转，丁恋反。”又云：“今案五家本转为啭。”此与日钞正同。

哀音外激

案《集注》同此。丛刊本“音”作“声”，校云：“善本作音字。”此又六臣所见五臣本异日钞者。

幽暗散绝也

案《集注》同，丛刊本脱“暗”字。

（铣注）

巧竭意遗

案“匱”作“遗”，日钞与《集注》并同，字又见《唐润州魏法师碑》。

匱之也

案“之”乃“乏”之讹，丛刊本不误。

（翰注）

而此孺子

案“孺”作“殦”，日钞与《汉书》同，《集注》则作“孺”。

优游转化

案“转”字与《集注》同，丛刊本作“变”，校云：“善本作转。”是所据异本。

余弄未尽

案“弄”字，各本并同，《集注》引音决作“哢”。

悲怀慷慨

衽襟流皃

案“衽襟”，与《集注》同。丛刊本作“衽，衣衿”。日钞“流”上脱“泫”字，《集注》，丛刊本并有泫。

慷慨叹息

案日钞与《集注》同。丛刊本“息”下有“皃”字。以上日钞及丛刊本皆并作一节，《集注》于“流泉东逝”下多分一节。

（以上铣注）

謇姐名倡

案“倡”字日钞与丛刊本同，《集注》本作“唱”，注云：“今案钞音决唱为倡。”

佥曰诡异

翰曰诡奇也

案日钞与丛刊本同，《集注》作“吕向曰”。

案日钞、五臣本，与唐写《集注》本多别体字，两本或全同，或微异，兹不备录，其最易混目者，为“喉”与“唯”，因末笔斜拖，横磔难分也，《魏张始孙造象》直以隹为侯。又如“宋”。

答东阿王笺

案日钞与丛刊本同，《集注》与善单注本题下并有“一首”二字。

陈孔璋

案题名下向注“远绍辟之”，日钞“远”字乃“袁”之讹。案此节注，止东阿六字是向注。余皆善注。许巽行以为全是五臣注，亦误。

披览粲然

案“粲”作“粊”，日钞与《集注》同（又见《周圣母寺四面象碑》）。

高俗之材

案日钞“俗”旁有校笔“世”字，丛刊本作“俗”，校云：“善本作‘世’。”《集注》本作“世”，其济注则作“君侯高俗”，明是五臣避改。

明皃

案丛刊本作“粲然，明白貌也”。

（翰注）

拂锺无声

案“拂”字，各本并同，《集注》引“《音决》：㓼，芳勿反，或为拂，非”。考《说苑》原作“拂”。或疑此《音决》未必即公孙罗所著《音决》，不为无因。

过曰欲说东诸侯

案日钞此句，良注也。丛刊本作善，于良曰下云余文同；善单注本与丛刊本同。《集注》本所录善注此句作“欲东说诸侯王”，与《说苑》原文合，当为善注真貌。知丛刊本及单注本之善注反与日钞合者，实以五臣注为善注。

音义既远

案“音”字，各本并同，《集注》云：“今案钞‘音’为‘指’。”

焱绝焕炳

向曰焱绝焕炳言文词光明也焱火光焕炳皆明也

案此为五臣注原貌，丛刊本无下八字。

（向注）

夫之白雪之音

案上“之”字误，旁有校笔作“间”。《集注》本、丛刊本并作“听”。

然后东野巴人

案日钞、丛刊本同，《集注》本无“后”字，注云：“今案钞五家陆善经本，‘然’下有‘后’字。”

欲罢不能

案日钞与丛刊、胡刻并同，《集注》本“罢”作“疲”，注云：“《音决》：罢音皮，又如字。”是《音决》与日钞等本同，而《集注》独异。

谨韫椟玩耽

案日钞、丛刊同作“耽”，《集注》作“躭”，引《音决》云：“耽，多含反，或为躭，同。”知《音决》又作“媅”。耽、躭、媅诸字，另详见拙稿《敦煌写本文选考异》张平子《西京赋》“躭乐是从”句下校记。

以为吟诵

案日钞、丛刊本、《集注》本并同。《集注》云：“今案钞吟为琴。”是《集注》所谓钞又一别作“琴”，恐误。

韫藏椟匮玩珍耽好也

案日钞与丛刊本同。《集注》引良注自“玩珍”字起，因上文已引马融《论语注》“韫，藏也；椟，匮也”，故良注从省。以此知五臣袭用旧说多不标名。

（良注）

答魏太子笺一首

案丛刊本无“一首”二字。

吴季重

案题名下注，铣用善注，故丛刊本云：“铣同善注。”

以文帝所善

案“文”下脱“才为文”三字。

官至振盛将军

案“盛”字讹，丛刊本作“威”。

（以上铣注）

质臣言

案日钞“质臣”二字误倒。

奉读手令

案“令”旁有校笔“命”字，从刊本作“命”，向注亦作“手命”。

追正虑存

案“正”旁有校笔“亡”字，日钞用别体，凡“亡”字似“止”，又似“正”，枚叔《上书谏吴王》，亦有此校。是校者尚未悟其为别体字，殆校者与钞者之时代相距已远。

恩哀之降

案“降”字，从刊本作“隆”，校云：“五臣作降。”与此同。

岁不我与

案从刊本倒作“与我”。翰曰：“不与我，言不留也。”知五臣正文原作“与我”，殆日钞所据正文本又不同于注本耶？

冉冉疾行自

案“自”字乃“皃”之讹。

（翰注）

可终始相保

案从刊本同，“保”下校云：“五臣本作报。”此六臣所见五臣本与日钞不同。

众贤陈谓徐

案日钞有脱误，从刊本作“众贤谓陈徐之流也”，是。日钞上注在“相保”句下，六臣本录在“相保”句前。

（良注）

诚如来命

案从刊本同，“诚”下校云：“五臣本作试。”此又六臣本所见与日钞异。

凡此几此数子

案“几此”二字衍，从刊本作“凡此数子”。

谓冠至也

案“冠”乃“寇”之讹。

言众来如车辐之凑

案从刊本无“来”字。

（以上向注）

臣窃听之

案“听”字误，旁有校笔作“耻”。从刊本正作“耻”。

后来君子

谓後後者也

案下一“後”字乃“俊”之讹。

（铣注）

伏惟所天优逝典籍之场

案“逝”字讹，旁有校笔作“游”。又从刊本有校云：“善本无伏惟所天字。”然胡刻善本有此四字，且有善引《左传》乃何休说以释天字，而从刊云“善本无此”，当是所据异本。

休息篇章之圃

案从刊本“圃”下校云：“善本作囿。”

此众议所以归高

案从刊本“所”下校云：“五臣作可。”此六臣所见五臣本异日钞者。

远近所以同声

案从刊本“声”下有“也”字，而无校语，是所据五臣及善本并有“也”字。今日钞五臣与胡刻善本并无“也”字，明是所据异本。而《考异》云：“袁、茶本有也字，何校添，陈同，是也。”覈以日钞，知义门、少章诸氏之所是，亦有异而不知考耳。

吾世时在军中

案“世”乃“三十”之讹。

太子书云吾德不及萧王年与之齐矣故质以此答之

案从刊本无“太子”以次十五字，因善注引此十六字已录于前也。依六臣本例，向曰之末应有“余注同”三字。又向注“所天”、“抗高”、“萧王”、“同声”四节，六臣本分录四处，日钞则并在同声句下。

（以上向注）

已卌二矣

案“卌”，从刊本作“四十”二字，又有校云：“五臣本无已字。”此亦所见异本。

平且之时也

案“且”疑“日”之讹，从刊本作“生”，有校云：“善本作日字。”

游宴之叹

案“宴”字原笔如上，“叹”字讹，旁有校笔作“欢”。

下遇之才

案"遇"乃"愚"之讹。

略陈至惜

案"惜"字讹，旁有校笔作"情"。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案题下向注，乃向用善注。

耀灵慝景

案"耀"同善本，丛刊本作"曜"字。又"慝"字，丛刊本、善本并作"匿"，是。

平原入秦

案此节济注虞卿平原二事，并袭善注。

初至承前

铣曰承前谓前人之教化也

案丛刊本无"承前"、"也"三字。

（铣注）

北邻柏人

案丛刊本此节作"翰曰：柏人，县名，余文同"。所谓同者，以日钞比勘，乃翰袭善注而略节其字也。

唱然叹息

案"唱"乃"喟"之讹。

想李齐之流

案"想"旁有校笔作"存"。丛刊本作"存"，有校云："五臣本作想。"是六臣所见五臣本，与此日钞同。

逸豫于壃畔

案以"壃"为"疆"，见《魏恒州刺史朝韩震墓志》。

因非质之能也

案此钞校笔"因"旁有"固"字，"能"上有"所"字。"固"字，各本同；"所"字，丛刊本无，善本有。

赋事行资于故实

案"行"下校笔补"刑"字，是。

寿王去侍从之娱

虞兵寿王

案"虞"，各本及《汉书》皆作"吾"，班固《两都赋序》作"虞"，善注

引《汉书》同，王先谦《汉书补注》谓《说苑》、《新序》“吾丘”、“虞丘”并见，“虞”、“吾”，古同音，又“兵”乃“丘”之误笔。铣注此节，两引《汉书》，皆作善注。

张敞在外

案此节向注张敞、陈咸事，全同善注。丛刊本曰：“向同善注。”

愿左右之勤也

案丛刊本同作“愿”，校云：“善本作显字。”翰注：“愿在左右，亦质之心。”知五臣原据本作“愿”，与善异。

为郑冲劝晋王笺一首

案六臣本无“一首”二字。

题名注

案“公卿将校”之“校”，误笔作“授”。

褒德赏功有自来矣

案日钞止此，以下佚。

日钞此卷，为现存最古之《文选》五臣注本，可以窥见未与善注合并时之原貌。其有裨于选学者，举其例，约有下列诸事：

（一）可证五臣袭改善注。如邹阳书“王奢却齐”注条。

（二）可证五臣注有为人误乱处。如邹阳书“为魏取山中”、“卒相中山”及《答临淄侯笺》“蔚矣其文”各注。

（三）可证六臣本割并五臣及李善注有两误处。如《奏弹曹景宗》“获兽何勤”注条。

（四）可证六臣本之误字。如邹阳书“陶钧之上”良注之误“天”为“矣”。

（五）可证六臣本校语之歧异。如邹阳书“披心腹”句，校谓五臣作“肠”，然日钞实作“腹”。《答魏太子笺》“诚如来命”句，校谓五臣作“试”，然日钞实作“诚”。又“终始相保”句，校云：“五臣作报。”然日钞实作“保”。

（六）与《史记》、《汉书》参校。如《谏猎书》“中路而后驰”句，同《史记》而异于《汉书》。“而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句，同《汉书》而异于《史记》。又邹阳《狱中上书》“有白头如新”句，善本、六臣本并无句首之“有”字，惟日钞此卷有之，《史记》、《汉书》、《新序》同，足正善本之夺误。

（七）可与日本旧钞《文选集注》参校知其异于各本。如《答临淄侯笺》“若此仲山周旦”句，各本“旦”下有“之畴”二字，惟日钞与《集注》本无

之，异于众本。

（八）有旧校笔可资参证。如吴季重《在元城笺》“想李齐之流”句，日钞“想”旁笔作“存”，乃用李善本。又《答临淄侯笺》“经国之大美”句，日钞“美”旁有校笔“义”字，乃用陆善经本。惟日钞校笔有不悟钞手用别体字者，如吴季重《答太子笺》“追正虑存”句，日钞“亡”字用别体，而旁有校笔作“亡”，是校者未悟其为别体也，殆钞与校之时代，相距已远。

（九）钞本正文有特异者。如邹阳《上书重谏吴王》“并力一心悉以备秦”句，善本、六臣本、《汉书》并无“悉”字，独日钞有之。

（十）《奏弹刘整文》，五臣以昭明所删本状补入正文者八百余字。他本补引，则详略不一。上举各点，皆足资研究，特为指出，余详各句下记。惟日钞习用别体字，如“亡”字作“正”，“宋”作“宗”，“土”作“士”之类。又脱字[①]、衍字（如邹阳书济注“赐之死，取之死其尸”句，衍“之死”二字是）、误字（如邹阳书“秦用戎人”之“戎”误作“戒”，“枯木朽株”之“株”，误作“珠”，注中如“樊于期”误作“于斯”之类），触目皆是，并随文举例，具见前校记中，不复缕述。

日钞此卷，承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教授远道邮假，厚谊可感，谨此志谢。

原载《东方文化》第三卷第二期，1956年

① 如邹阳书“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句，注首脱“翰曰”二字是。

唐代文选学略述

《文选》一书，自隋迄今，为学文者必读之书。康南海《桂学答问》云："文先读《楚辞》，后读《文选》，则材骨立矣。""《文选》当全读，读其笔法、调法、字法。兼读《骈体文钞》，则能文矣。"清世盛行考据之学，考据家亦重文事，戴震其特出者也。戴氏言："做文章极难，阎（若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顾（炎武）、江（永）文章较胜。己则如大鲈，人如吾鲈一铸而皆精良矣。"言下颇自负。彼论文有二种，刚者如大坚石，柔则软如绵。又评相如"《封禅文》颜色如天上云霞，奇丽绝"（段玉裁编《东原先生年谱》），可谓善读文者矣。戴氏治《楚辞》，深懂文章肌理，刚柔之说似先于桐城姚氏，而在声色格律四字提出之前，创谈文"色"之美，尤具卓识。盖考核之务，必以文章修养培植其根基，所造有浅深，对于古人文笔之理解，亦视此而定。今之学人，文、史判为两途，考核家只论史事，无暇及于文章，与文绝缘。夫文理未通，未明古人立言之义例、行文之脉络、立论之轻重，欲求免于误解者几希！过激者且贬选学为妖孽，试问有几人真能读懂《封禅文》者！

苏轼力讥昭明书去取之谬，不知秦汉魏晋沉博绝丽之作，罔不在是。张戒因言："子瞻文欠宏丽，正坐读选未深。"其说良是。朱子论《封禅文》出于误解（见《岁寒唐诗话》，文廷氏《纯常子枝语》二十七引之），迥不如东原之精辟。

明代复古，《文选》一书弥受重视，一时有"选体"之目，山阴王思任云：

有论孟之显，则必有墨兵蒙（庄）寇（列）之幻。穷则定至于变，通则适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然而变起于智者，又通于智者，此三百篇诗之大常也，一变之而骚，再变之而赋，再变之而选，再变之而乐府、而歌行，又变之而律，而其究也，亦不出三百篇之围范。（曾益《李贺诗解序》）

标揭骚赋之后有“选”之一体，此自指选体诗而言。元明以来，选诗多有别出单行之本，如元刘履之《选诗补注》，明冯惟纳（《诗纪》之作者）之《约注》。故诗中选体，成为独立式样，不与乐府、歌行、律句同风。至于今时，学诗者无不溯源于选体，职是故耳。

《文选》所收，多历代传诵之名文。魏晋六朝以来，学文者起于髫龀之年，无不诵习之，朗朗上口，史书所记，可供谈助，举例言之：

蜀鲁国刘琰为固陵太守，后主（刘禅）立，封都乡侯。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蜀志》卷一〇《琰传》）

晋末，郭澄之西向为刘裕诵王粲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句，裕遂不再西伐。（《晋书》卷九二《文苑传》）

宋刘显，瓛族子。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号曰神童。（《南史》卷五〇《刘瓛附传》）

齐宜都王刘铿，明帝诛先帝诸子，铿咏陆机《吊魏武赋》：“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

王华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宋书》卷六三《华传》）

隋李德林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隋书》卷四二本传）

北齐时嬖幸赵鬼能读《西京赋》，言于东昏侯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灾乃大起芳乐、玉寿等诸殿。（《通鉴》卷一四三）

撰《茶经》之陆羽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嗫嚅若成诵状。（《新唐书·隐逸传》）

宋璟七岁能属文，一遍诵《鵩鸟赋》。（《颜鲁公文集》卷四）

足见名篇名句之魅力，前贤在儿时多能成诵，赋中之《西京》、《蜀都》、《鲁灵光殿》乃长文巨制，尚为人所笃好，《鹏鸟》、《过秦》短篇精警之作，一遍便上口，六岁童子优为之。昔贤无不能文，实与讽诵默识有关。杜甫诗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杜公子之烂熟《文选》，因之有"熟精《文选》理"之句！

隋开皇七年，以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考试选拔官吏，《文选》成为试士出题之读本。《北史·杜正言传》云：

> 杨素试正言题，令拟《上林赋》、《得贤臣颂》、《燕然山铭》、《剑合铭》。

故士子多摹拟《文选》名篇。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赋》、《别赋》；今集卷一只存《恨赋》一首（《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又若岑文本有拟扬雄《剧秦美新》一篇，见《全唐文》卷一五〇，又载《文苑英华》卷三五九。《新唐书·艺文志》有开元处士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殆收摹拟诸作，惜其书失传。

东友冈村繁论《文选》自编撰以来，颇遭冷落，至萧该始为《文选音》，遂导《文选》学之先路（《学术集林》卷十一）。实则早期《文选》所收诸赋，多有音、注之作。刘宋御史褚诠之著《百赋音》十卷，已能综合前人之作，远在萧该之前。诸赋名篇，自来多已别写成书单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

> 司马相如《上林赋》一卷
> 张衡《二京赋》二卷
> 《三都赋》三卷
> 左太冲《齐都赋》一卷

知当时各赋均别帙行世。唐时《文选》所收，有注之赋，见于著录者：

> 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赋》一卷
> 项岱《注幽通赋》一卷
> 薛综《二京赋音》二卷

今观柏林所藏吐鲁番出《幽通赋》注，非李善注本所采之曹大家注，或即项岱之注，有待细考。《文选》史述赞李善注引项岱三条，刘昭《续汉祭祀志》李贤注亦引项岱（误作威）注文。

綦毋邃音即《三都赋》注，共三卷，见《隋书·经籍志》引《七录》、《隋志》：梁有《诫林》三卷，綦毋邃撰。《通典》九五：晋哀帝兴宁中，有綦毋邃驳尚书奏事一条。其人盖晋穆、哀时人。日本《文选集注》抄本及《御览》引綦毋氏注六条（阮廷焯有辑本，见《大陆杂志》三三，四期）。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达、晋怀令卫瓘（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亡。《三国·魏志·卫臻传》裴注称：子楷，楷子权字伯舆，晋大司马汝南王亮辅政，以权为尚书郎，权作左思《吴都赋叙》，为注了无所发明。权，陈留人，事亦见《晋书·文苑》。其《吴都赋注》，近人周法高有辑本。

梁有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今李善注《典引》下仍著蔡邕注，其中另有"善曰"若干则，此外必为邕注，是未亡也。邕著《独断》，详于汉世政事。吴时巨公，注张衡《二京赋》者，先后有傅巽（一作武巽，非）、薛综。巽字公悌，北地泥阳人，客荆州，曾说刘琮降曹。文帝时侍中迁尚书，梁有《傅巽集》二卷。综，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为刘熙弟子，仕吴，官太子少傅，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有集三卷。综注全为李善采用。尤（袤）刻本《西京赋》"长风激于别隯"，注云："水中之洲曰隯，音岛。"此为薛综注原文。今隯字作坞。《类篇》阜部"坞，水中可居曰坞"是也。又有晁矫者，亦注《二京赋》，未详其始末。晋室南渡，郭璞亦注《子虚》、《上林赋》各一卷。梁又有《二京赋》，李轨、綦毋邃注，亡（俱见《隋志》）。张、左二家当时合为《五都赋》六卷。善注《运命论》下引张揖《上林赋注》云："紒，鬓后垂也。紒即髻字也。"是《上林赋》又有张揖注。凡此皆萧该、曹宪之所取资，《文选》音注之业，实当溯源于此。

萧该为《文选》作音义之第一人，众所共悉。该为萧衍第九子鄱阳王恢之孙，幼封攸侯。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与仪同刘臻、外史颜之推、武阳太守卢思道、散骑常侍李若、谘议参军辛德源、内史（吏部）侍郎薛道衡、著作郎魏澹（彦渊）等八人同诣魏郡陆爽子法言处宿，讨论音韵、声调、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法言著其说，成《切韵》一书（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前陆氏序文）。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对此八人仕履年代多所考证。其时颜

之推官外史，尚未为学士也。《北齐书·颜之推传》云："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可证。而萧该与何妥同至长安，则已拜国子博士，故法言序称之为"萧国子该"，《切韵》之音真正代表南音者以兰陵之萧该为主（颜之推籍琅玡临沂，刘臻则为沛国相人）。可见隋初该之学术地位。

法京敦煌卷P·二八三三《文选音》，研究者多家。王重民以书中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淬其锋"之"淬"字，《文选集注》引《音决》有云"萧，子妹反"与此卷合，遂定此卷为萧该之《文选音》。周祖谟从《广韵》音切，校其与此卷之违合，谓曹宪、公孙罗皆江都人，许淹则为句容人，江都、句容地相遍，故语音亦近，因定此卷为许淹音（说见《问学集》），理据未甚充分，尚待研究。

新旧《唐书》均言萧该著《文选音义》十卷，《隋书·经籍志》作《文选音》三卷，无"义"字。《文选·思玄赋》"行颇僻而获志兮"注下引萧该音，"颇"字本作"陂"，布义切。《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音决》云："漫，萧武平反。"又《汉书·扬雄传》，官本引萧该《音义》。萧氏音训，残膏剩馥，仅此而已。

尚论隋唐之际，选学蓬勃原因，继承前此音注之业而外，有三事须加措意者：（一）《汉书》学与《文选》学二者之兼行互补；（二）大型类书著述之兴盛；（三）崇文、弘文二馆收藏图书对于文学资料之助益。试分述之。

《文选》收汉人文章为夥颐，汉文多近典诰之制，艰深不易诵读，隋唐间，治《汉书》者多兼攻《文选》。《隋唐·儒林·萧该传》云：

> 梁荆州陷（公元544），与何妥同至长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撰《汉书》及《文选音》。

该与包恺同为《汉书》宗匠。《隋唐·儒林传》记阎毗受《汉书》于萧该。该著《汉书音》十二卷，又有《后汉音》三卷，见二《唐志》。此如李善著述，《文选注》而外，又有《文选辨惑》十卷、《汉书辨惑》三十卷（《新唐书》误作李喜，"喜"为"善"之形误）。是时《文选》一书地位，远不及《汉书》之崇高，为人所重。故萧该以《汉书》闻名远在《文选》之上。"汉书学"一名在唐初极为流行，详《旧唐书·秦景通传》云：

> 景通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

为大秦君，晞为小秦君。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纳言，乾封中……以《汉书》授沛王（李）贤。及贤为皇太子，累迁太子洗马，兼充侍读。（《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显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

是时学人之《汉书》著述，若顾胤有《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高宗且有《御铨定汉书》八十七卷，高宗与郝处俊等撰。处俊有《集》。《唐志》所载在李善《汉书辨惑》之前，计有刘伯庄《汉书音义》二十卷，敬播注《汉书》四十卷，又《汉书音义》十二卷，姚珽《汉书绍训》四十卷，沈遵《汉书问答》五卷，皆一时隽彦，可谓盛矣。日本《文选集注》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旁注屡言"察云"，指姚察之《汉书训纂》中之说，此即当日治选学必旁参《汉书》之明证。

隋唐之际，江淮之间，治《文选》为作音注续萧该而后者，以曹宪为魁首。在同一地区从事《文选》音者，据新旧《唐书·曹宪传》所载，又有魏模、许淹、公孙罗诸家，极一时之盛。《李善传》称其为广陵江都人，当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宪于隋炀帝时参预《桂苑珠丛》（一百卷）之编撰工作，人称其该博。又为魏张揖之《广雅音》。卢照邻十岁时从曹宪及王义方受《苍》、《雅》（见两《唐书》本传），义方著有《笔海》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唐初亦以博雅著闻。《隋志》类书类收《长洲玉镜》及诸葛颍之《玄门宝海》。《桂苑珠丛》见慧琳《音义》引用共一百三十余条（新美宽辑本），《珠丛》题隋诸葛颍等撰，亦为训诂类书，颍殆主持其事者。

自隋之后，王室提倡风雅，承六朝之余风，以编撰巨型类书为一时风尚。以贞观十六年成书之《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高士廉有《文思博要序》，见《文苑英华》卷六九九，3606页）、高宗时太子弘门下编修《瑶山玉彩》五百卷、《累璧》四百卷，最为巨观，惜均不存于世；惟有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幸行于人间，可窥见此类著述之规模。私家著述若张太素之《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孟利贞之《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俱见《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皆卷

帙繁重，见已沦佚，从各书之命名寻求之，其内容当是有关文藻之纂辑。孟利贞且著有《续文选》十三卷，其人与曹宪相同，从事类书，兼欲赓续昭明，广其选文工作。《瑶山玉彩》一书，似即步《桂苑珠丛》未竟之绪，《新唐书·艺文志》云："孝敬皇帝（即太子弘）令太子少师许敬宗、司议郎孟利贞、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右史董思敬等撰。"

《旧唐书·文苑》上《孟利贞传》云：

> 孟利贞，华州华阴人……初为太子司议郎……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称善。……利贞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又撰《续文选》十三卷。

是书由许敬宗领衔，参预其事者郭瑜、顾胤皆官崇贤馆学士，官阶高于李善（善仅为直学士）。李善未闻参加此一工作，殆因其时在潞王（李贤）府任记室之故。

曹宪与修《桂苑珠丛》，以博该闻名，而兼治《文选》。孟利贞取途与之相同，盖非博综难以治《选》，亦惟博综而能兼治《文选》，则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二者正相资为用也。

博综之业必赖大量图书之助。唐代图书之府有三：一为门下省之弘文馆，一为东宫之崇文馆，一为史馆，一时称之为三馆（三馆学士条，《旧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二馆而不计史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

> 东宫官属同崇文馆，贞观中置，太子学馆也，学士、直学士，学生二十人，校书二人……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

按崇文馆原称崇贤馆。李善与高宗显庆三年上《文选注表》题衔为"文林郎、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学士"，时尚名"崇贤馆"。据《旧唐书·王方庆传》云："兼侍皇太子读书，方庆言：孝敬皇帝（弘）为太子时，弘教门改为崇教门；沛王为皇太子，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遵典礼。"是避弘字讳改弘教为崇教，避贤字讳改崇贤为崇文。可见由崇贤改称为崇文乃在李贤由沛王立为皇太子时，即上元二年六月之事（参新旧《唐书》孝敬皇帝弘及章怀太子诸传）。显庆三年李贤犹未为太子也。

门下省之弘文及东宫之崇贤二馆，皆图书之府，李善于显庆三年任崇贤馆直学士，是时郭瑜、顾胤已为该馆学士。先是，贞观中《汉书》学宗匠秦景通为崇贤馆学士，时初设馆未久也。曹宪以该博被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赴，弘文馆乃在门下省者。当日学问该博之学人，多出身于此二馆，以图籍正在其掌握中也。不特《汉书》为然，唐代《史记》专家，亦多出自弘文与崇文二馆，刘伯庄、张嘉会、司马贞皆其例证，即张守节亦官东宫，接近二馆文士，程金造《史记管窥》已详论之。

《文选》学始于曹宪。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士〕（此二字据《儒林传》增），聚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学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儒林传》作一百五十岁卒）按肃于元和中官江都主簿，熟悉江都掌故，此为最早关于《文选》学之记载，两《唐书·儒学传》皆本此说。《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总集类曹宪《文选音义》下注云："卷亡。"又经部小学类有曹宪《尔雅音义》二卷及《博雅》十卷，无"音"字（按当从《隋志》作《广雅音》），又有《文字指归》四卷（《隋志》作《古今字图杂录》），是宪所长为文字训诂，不仅治《广雅》一书而已。

曹宪著述有《文字指归》、《曹氏切韵》二书，仅见日本新美宽氏有辑本，可补汉土之缺。《文字指归》，据唐麻杲《切韵》"功"字注、"绥"字注，慧琳《音义》二，希麟《音义》一，共得五条。其"芭蕉生交阯郡"一条，云出《文字指》，则此书名或无"归"字。

另《曹氏切韵》，新氏据和书《和汉年号字钞》、《五行大义》背记、《法华经释文》（大正）、《净土三部音义》、《园太历》、《倭名类聚钞》、《弘法内典钞》等书辑出多条（见该书 325—330 页），试举一例，如佛条云："佛，恍忽也，言忽无常也，见《牟子》。案佛道冲妙，难以指求，故言恍忽。"以老氏解佛义甚新颖。知唐时曹宪此二书曾传至扶桑。

考《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八年正月"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使于四方，观省风俗"。《册府元龟》卷六〇七：袭誉为扬州总管长史，撰《忠孝图》二十卷，贞观十三年上之。袭誉于贞观十七年转凉州都督（参郁贤皓《唐刺史考》，1445 页）。曹宪即由袭誉表荐为弘文馆学士也。

曹宪弟子及回乡治选学者，李善之外，如魏模、许淹、公孙罗，姓名皆

暗晦不彰。许淹，句容人，周祖谟考证敦煌本《文选音》，谓出自许淹，只备一说，难为的论。惟公孙罗，赖日本存世之《文选集注》，稍有事迹可征。

公孙罗，江都人，《旧唐书·儒学传》称其历沛王府参军。沛王即李贤，是与李善同居李贤府为僚佐。罗著有《文选钞》六十九卷及《文选音决》十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两《唐志》具有公孙罗《文选注》六十卷，《旧志》云：公孙罗《文选音》十卷，《新志》作《音义》十卷。二书卷数相同，说者均疑其为一书。据斯波六郎考证，日本《文选集注》所引，《钞》与《音决》皆见之，而每每互异，如《吴都赋》，《钞》作"郁"而《音决》作"蔚"；谢玄晖《八公山诗》，《钞》作"仟"而《音决》作"阡"之类。《集注》卷第四十七每引罗云，罗自指公孙罗说。《图书寮善本书目》卷四记"纸背间引公孙罗《文选钞》，可珍也"语，具见向来为人之所重视。

李善事迹见《旧唐书·儒学传》，《新唐书》则附其子《李邕传》。惟所记时间、人事有不尽详确者，尤以李善与章怀太子及贺兰敏之二人关系之深，须重作考证，于李善之生平行迹方能了然。

（一）李善与（章怀太子）李贤

标点本《旧唐书·李善传》云：

> 显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内。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

《新唐书·李邕附传》云：

> 父善，淹贯古今……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

按《旧唐书》"明庆"乃避讳改"显"字为"明"。善上《文选表》在显庆三年九月，本书各本皆同。李贤先封潞王，龙朔元年九月始为沛王。两传系沛王事于显庆，在上《文选表》之前，显然有混淆。兹据《旧唐书·高宗纪》列李贤大事如下：

永徽五年，在潞生皇子贤。

六年正月庚寅，封贤为潞王。

显庆元年六月，岐州刺史潞王贤为雍州牧。

龙朔元年九月壬子，徙封潞王贤为沛王……沛王贤为扬州都督。

足见贤为沛王乃由潞王徙封，事在龙朔元年九月（《唐大诏令集》三四《册扬州都督沛王贤文》：维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十月癸亥朔十七日己卯，皇帝若曰……雍州牧、幽州都督、潞王贤……是用命尔为沛王。《全唐文》一四同，详《唐刺史考》，1447 页）。显庆三年上《文选注》时，善安得为沛王侍读?

又显庆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为皇太子，李善任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当在太子弘东宫，其后始佐李贤，先在潞王府，后转沛王记室，因沛王兼扬州都督，善为江都人，有地缘之谊，然其事李贤，乃在贤未为太子以前。又李贤之妃为清河房氏仁裕之孙女，仁裕于永徽四年（公元 653）任扬州都督长史，贤以沛王为扬州都督在永徽五年即龙朔元年，先后一年[①]。见《文物》1972 年二期卢粲撰《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

（二）善居白塔寺

李善注《文选》始于居扬州时，曾寓白塔寺注《文选》，日僧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云："开成三年（公元 838）十一月廿九日。扬州有卅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寺〕，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注》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80 页）白塔寺者，陈名僧法泰晚年居之（《续高僧传》一），与汾州抱腹、岱岳灵岩、荆府玉泉为四大名刹，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十八便利之事（王邦维校注本，121 页）。

（三）李善与贺兰敏之

《旧唐书·李邕附传》云：

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

按善于显庆三年上《文选注表》时官衔已为崇贤馆直学士，不得谓为贺兰敏

① 此处庙号、年号疑有误。

之所荐引。考《旧唐书·外戚传》云：

（武）后取贺兰敏之为士彟后，赐氏武氏，袭封，擢累左侍极、兰台太史令。与名儒李嗣真等参与刊撰。

按《新唐书》则称其与元兢。当武氏炙手可热之时，名儒李嗣真、元兢皆与之参订著述。《新唐书·艺文志》伪史类著录有武敏之《三十国春秋》一百卷。先是萧方等著《三十国春秋》，此继其业，增益至百卷。是书残文，清汤球有辑本（在《广雅丛书》内），是敏之亦治史，故与元兢等交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二释家类收："《金刚经》一卷，唐武敏之所书，在长安。"则敏之亦工书者流。

敏之为兰台太史令，李善转任兰台郎，乃由其所汲引。若谓善任崇贤馆学士经其荐引，恐非事实。敏之败，流雷州以死，善亦流姚州。姚州今云南地，所窜更荒远，在当日被视为敏之之党羽。后遇赦始得还。

附　李善行事年表

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

住扬州白塔寺，注《文选》。

高宗永徽六年正月庚寅，以李弘为代王，封李贤为潞王，善为潞王府记室参军，未知在何年。

显庆元年　立弘为皇太子。

三年九月　善成《文选注》，上表，是时题衔为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

四年太子　宾客许敬宗与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等成《瑶山玉彩》，凡五百篇。

龙朔元年九月　徙潞王贤为沛王。

善为沛王侍读，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

乾封中　善出为泾川令。

贺兰敏之为左侍极，赐姓武，出为兰台太史令，善因敏之荐，转兰台郎。

咸亨二年　武敏之以罪流雷州，复原姓贺兰。

善坐与有故，配流姚州。

咸亨五年 改元上元，大赦，善获赦还。寓汴、郑间，以《文选》教授（赵夔《东坡诗序》云“李善于梁宋之间授《文选》学，注六十卷”）。

永隆年二月十九日 弘济寺写善注张衡《西京赋》。

载初元年（即永昌元年） 善卒。

善淹贯古今，人号曰书簏。或讥其不擅文，今存止《文选注上表》一篇。考同时学人若曹宪有集三十卷，郝处俊有集十卷，张太素有集十五卷，惟善无之。

善子邕，知名于代。其孙为僧玄晏，鄂州开元寺僧，与刘长卿、袁滋善，赞宁《宋高僧传》有其传。

《王公倰神道碑》记高叔祖善，兰台、崇文馆学士，注《文选》行于时。兰台指其为贺兰敏之兰台太史令之属官。

李善注之刊刻，似始于北宋。《宋会要辑稿》：“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版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此李善注雕版之经过也。《玉海》引《实录》景德四年校勘《英华》、《文选》之役，祥符二年十二月辛未又命张秉、薛映、戚纶、陈彭年覆校。郑重其事。今观韩国奎章阁《六家文选》书末附主事名单：

> 天圣三年五月校勘了毕。校勘官有公孙觉、贾昌朝、张逵、王式、王植、王畋、黄鉴。
>
> 天圣七年十一月雕造了毕。校勘印版有公孙觉、黄鉴。
>
> 天圣九年进呈。诸官有蓝元用、皇甫鉴明、王曙、薛奎、陈尧佐、吕夷简。

自天圣三年至九年参预刻书人名，具如上列，足见雕版之不易。今北京图书馆藏存李善注北宋刻本，台湾“故宫博物院”亦有相同残本，共十一卷，俱即此天圣间之国子监本（参张月云《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故宫学术季刊》二卷四期，1985 年）。此当为李善注单刊之最初刻本。北图此本，为周叔弢所捐赠者。

《文选》学兴起问题，涉及文章总集之来源，清代学者因致力萧选，久已

有所论列，如王鸣盛《蛾术编》十四、成瓘《篛园日札》、赵翼《廿二史劄记》，均有考证。《沅湘通艺录》中，学人复次其事为赋，多所扬搉，故友刘茂华著《江淮学术之启蒙及其成熟》（《浸会学院学报》第四卷一期，1977年），更为具体而微，可以参看。

《文选》为萧氏一家之学，萧该始为《文选音》，导其先路。该于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入隋拜国子博士。何妥著有《家传》二卷，使其书存世，可考二人之交谊。

又萧大圜，梁简文帝之子，撰《淮海乱离志》，《史通补注篇》讥令狐德棻《周书》未能兼采。《北史·萧圆传》称其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隋志》、两《唐志》均著录，惟卷数不同，亦《文选》之流亚，堪值一记。

萧统有子三，欢、誉、詧。詧称宣帝，子归即明帝，详周贞亮著《昭明太子年谱》（附《昭明太子世系表》，载《昭明文选论集》，台湾木铎出版社）。萧瑀为梁明帝归之子，入唐为尚书左仆射。瑀尝以刘孝标《辨命论》诡悖不经，乃著论非之，以为人禀天地而生谓之命，至吉凶祸福，则系诸人，今一于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柳顾言、诸葛颍叹曰：是足针孝标膏肓矣（《新唐书》一〇一《瑀传》）。按诸葛颍盖《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之著者，其博洽可知，对萧瑀之称誉，非信口开河者也。

瑀曾孙萧嵩，于开元十九年奏言："王智明、李元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善旧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嵩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玉海》五四引《集贤注记》）智明、光震学术非深，其解"蹲鸱"为芋子，见讥于学士向挺之，刘肃已著其事。萧嵩终不克完成先人之业。《新唐志》："《六典》三十卷，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是善经又参与《六典》工作。

惟当日陆善经所注，不少保存于日本流传之《文选集注》。向宗鲁著《书陆善经事——题文选集注后》一文已详考之。知其以河南府仓曹参军入集贤院为直学士。开元二十二年参预李林甫注《月令》。天宝五载为国子司业。善经著《孟子注》。《文选集注》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卅首》前识语云："音决，陆善经本有序，因以载之也。"五臣注本任彦昇《弹刘整文》，《集注》引陆善经云："本状云奴教子当伯已下，昭明所略。"又日本上野精一藏旧抄本栏外屡引陆善经本，如《文选序》"遂放湘南"，注云"陆本湘作江"，"则卷

盈乎缃帙"，注云："陆云：缃，桑初生之色也，近于黄。"《文选集注·弹曹景宗》"使蜎给蚊，聚水草有依"，注末有云"今案抄使上有致字"，五家陆善经本为"故"，所引陆说，至足矜贵。日本新美宽亦撰《陆善经之事迹》一文（《支那学》九卷一号）。《集注》卷六三善经《离骚经》注说，余曾辑要，载《楚辞书录》。对善经注《文选》之评价，屈守元曾举出三事（见《跋文选集注残本》，载《海角濡尊集》）。高阆仙早云："寻绎（善经）注，实未见佳处。"善经能诗，有句见《贺监集》。

《新唐书·艺文志》徐坚《文府》二十卷下注云：

> 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徐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从之。坚乃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余不能就而罢。

《艺文志》四复记：

> 开元中，又有卜长福者，为《续文选》三十卷。开元十七年上之，授富阳尉。

增广续补《文选》以外之文章，是一种纂文工作，与作注不同，卜氏上此书在开元十七年，前于萧嵩之新注二年，其后复有人补辑为《通选》之书，《旧唐书·文宗纪》云：

> 太和八年四月壬辰，集贤学士裴潾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潾所取偏僻，不为时论所称。

《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裴潾《太和通选》三十卷，当即此书。

李善之注，在唐时引起驳议非难者，崇文馆学士康国安即著《驳文选异义》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有《康国安集》十卷，次于张九龄之下，著其仕履。按《颜鲁公集》七《康使君希铣碑》云：

> 父国安，明经高第，以硕学掌国子监，领三馆进士……崇文馆学士，赠杭州长史。……先君崇文学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

即此人也。

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后题开元六年九月十日，此即所谓“五臣注”也。

《新唐书》卷二百《文艺中·吕向传》云：

> 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泾州人。……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疑是‘绵’）书”。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

又《赵冬曦传》云：

> 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逾年，冬曦与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

按向为泾州人，先是李善尝为泾川令，泾川可能李善曾官其地，带来选学研究风气，向似受其濡染。向与贺知章、赵冬曦同为直学士。冬曦与知章皆参加开元时张说主持徐坚编括《文选》以外文章之《文府》工作。向治《文选》，并与诸贤共事，故亦致力焉。观陆善经有诗见于《贺监集》，时诸人同为选学，故有来往。

“向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向出密宗巨匠金刚智门下，撰有记金刚智事，见圆照《贞元释教录》（参周一良《唐代密宗》，38 页）。五臣谫陋，李匡乂《资暇录》特著“非五臣”条以斥之，至谓：“乃知李氏绝笔之本，悬诸日月焉，方之五臣，犹虎狗、凤鸡耳。”匡乂为李勉子，字济翁，官南漳守。《唐刺史考》引《福建通志·职官》称李正己大中间，漳州刺史，并云字济翁，尚待覆考。自匡乂以后，唐宋学人群起共非斥五臣而尊李善，若丘光庭《兼明书》、姚宽《西溪丛语》、王楙《野客丛书》、东坡、容斋之俦，世所共知，惟下至清世，尊李抑五臣之论，相继不绝，以至于今日。北宋坊间刻本，实以五臣为主，观天圣四年沈严为秀州刻《五臣本后序》有云：“以制作之端倪，引用之典故，唐五臣注之审矣。可以垂吾徒之宪则，须时文之揞摭，是为益也，不其博欤。”不免溢言逾分，亦可见学林与书坊，见解之悬殊，有如此者！

五臣注始刻于五代孟蜀时毋昭裔。《宋史》四七九《孟氏世家》记毋守素父昭裔，“蜀宰相，太子太师致仕”，“昭裔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版，补三班奉职”。王明清《挥麈录馀话》二记：“毋丘俭贫时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盖误孟蜀为王蜀，又讹为毋丘俭（俭乃三国魏人）。此《文选》初次镂版，当是五臣注本。《崇文总目》总集类《文选》三十卷，吕延济注，即五臣本。毋昭裔本后人亦称之曰“二川”本。沈严后序云：“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脱夥。”颇致讥弹。真宗景德四年，始诏分校印李善注，大中祥符间，才告完成。是时毋昭裔刊版，已由其子上于朝，想校勘诸官必曾参考其书也。

现存五臣注本，日本三条家存有写本残帙。至于刻本，则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陈八郎本，及北京大学与北京图书馆分藏之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残存卷二十九、卷三十两卷。陈八郎本现已印行流通，书共十六册，有木记二：为“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一为江琪记，内云“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试正，的无舛错”，“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所谓古本是否指蜀刻毋昭裔本？而监本则明指天圣七年国子监刘崇超主事之李善注本，知曾以善注参校。杭州本据刻工人名证知为南宋初期刊本，书仅二卷，甚望有好事者能合刊影印问世，以嘉惠士林。江琪所据古本，究何所指，郑因百教授尝介绍此本谢客诗“孤屿”二字之重读，韩国奎章阁所据元祐九年之秀州学本亦有之。秀林本末引天圣四年沈严之《五臣本后序》，至为可珍，此赖傅刚之榀櫱（《国学研究》卷五）。北宋时五臣本与李善本，刊校者仍时参校，不免有混淆之处。余早岁曾校三条本，而陈八郎本无缘加以利用，今老矣，无能为役，望有同志能合上举诸本再精校，所谓“古本”真相或有大明之日也。

南齐时，张融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文见《南齐书》本传，盖引申木玄虚原赋末句“品物类生何有何无”之语。张赋结尾警句云：“亡有所以而有，非胶有于生末，亡无所以而无，信无心以入太，不动动是使山岳相崩，不声声故能天地交泰。”顾恺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敖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南齐书·张融传》）

日本所传《文选集注》写本《海赋》“朱燉绿烟，腰眇婵娟”之下，较胡刻所据尤袤本多“珊胡虎珀，群星接连，车渠马瑙，全精如此”十六字。此经黄侃校出，并讥杨翁守敬藏此卷于箧衍数十年，未能发见，如逸珠盈椀。屈守元《选学椎论初集》（上编）《文选杂述》记其事。今吐鲁番本《海赋》，此数句均残，仅存腰下一“眇”字，隐约可睹，无由勘核其原本有无此十六字，殊为可惜。西土高昌所出古写本，《文选序》以蒨丽胜，《海赋》零纸则结体秀整含蓄，字与字之间疏朗有致，风格不同，均出能书者之手笔。

唐初有以草书书写《文选》整部者，似即裴行俭。《旧唐书》卷八四《行俭传》云：“上元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惟余及虞世南耳。”（《新唐书》一〇八本传同）《宣和书谱》一八言“行俭与马载合称裴马，工草隶，以书名家。高宗尝以绢素诏写《文选》”。此本当藏于御府。传言行俭有选谱，撰草字杂体数万言并传于代，宋宣和御府只著其草书《千字文》。行俭出河东裴氏，父仁基，其事迹又详《张说集》一九《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历来书家写《文选》名篇，似以《文赋》为最早。黄山谷《题跋》有《书右军文赋后》一文云：

> 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李翘叟出褚遂良临右军书《文赋》，豪劲清润，真天下之奇观也。（《文集》卷二八）

山谷所见乃褚之临本，褚乃临羲之书者，世但知唐陆柬之写《文赋》，而不知乃渊源自右军、登善也。陆柬之行书《文赋》及《离骚》，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卷后有元至元四年五月十六日揭奚斯跋、至正廿一年五日危素跋。《宣和书谱》云：陆柬之，其隶行入妙，书《头陀寺碑》、《急就章》最闻于时，御府藏有其《头陀寺记》而无《文赋》。

后代名家书《文选》名篇见于著录者，如陆贽写《与山巨源书》，见《平生壮观》，李商隐书《月赋》，见淳熙秘阁续帖，明文徵明书《离骚》，现传有小字本。王宠曾抄《文选》全部。赵孟頫写《过秦》三篇，有董其昌跋。董书《月赋》及《登楼赋》，并见《壮观》，不具记。诗文家治选各有手抄本，如王渔洋手写之《文选钞》二册，今犹存于世，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尤可贵矣！

唐世《文选》成为考试必读之书，故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语，《文选》一书，流播至广且远。敦煌本《秋胡变文》中记士子求学携帙文书，内有《庄子》、《文选》（《管锥编》四册），可以见其在边陲流行，故莫高窟所出写本断片，三十卷本、六十卷带注本、六朝精写本皆有之。《西京赋》李善注残卷，永隆中写于弘济寺，永隆之顷，李善已自姚州赦回，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是注当为经多次增订之本，李匡乂称"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征之《西京赋》此写卷，自是事实。知古人成书之非易！惜弘济寺所在未能考出其地点。

开元时，《文选》且为赏赉外蕃之秘籍，《旧唐书》一九六《吐蕃传》云："（开元）十八年十月，名悉腊等至京师，悉腊颇晓书故，时吐蕃使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疏奏不省。"而《唐会要》三六云："开元十九年赐金城公主书，内有《文选》。"其后宋季，大理李观音得来求《文选》，以马交换，事见《宋史·兵志》。

东则日本，早在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亦言及《文选》，正仓院文书中有《文选音义》断简（参神田喜一郎《东洋学文献丛说》，291 页）。

日本之有《文选》残卷刊本，或谓在延喜十三年良峰众树所刊，时当五代梁乾化三年，即凤历元年，去唐六载耳。仅存曹子建《送应氏诗》第二首及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一首。傅云龙从贵阳陈氏渠得见此残本，为之影刊，载于《籑喜庐丛书》之三，此书光绪十五年李文田题耑。傅氏有跋，谓此为源亲房藏本，有印记。亲房任参议在永仁、延庆间，永仁元年即元之至大元年也，参傅云龙《游历图经馀记》一四。但日本学人以为赝作。《五代史补》记《文选》镂版于孟蜀毋昭裔，后于延喜此本二十载有余矣（《文选》版本扼要叙述，今不赘，见屈守元《文选杂述》，载《选学椎论初集》，台湾贯雅文化公司印）。

萧选以外，文章之苴补选辑，唐人多所致力，以广昭明之不逮，惜至今皆无传于后。章樵《古文苑》选录颇精，但不以《文选》为书名。

明代"广文选"、"续文选"一类之书殊夥，兹记其版本如次：

《广文选》，刘节编，嘉靖十六年晋江陈氏刊。

又，马维铭编，无佚草堂刊定，万历四十六年刊。

《广文选删》，张溥编，明刊本。

《广广文选》，周应治纂，万历二十四年刊。

《续文选》，胡震亨撰，万历刊本。

《续文选》，汤绍祖编，万历三十年海盐刊本。

其抽取《文选》某一类而单刊者，重要版本如：

元刘履《选诗补注》，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黑口本。

明冯讷《选诗约注》，万历辛巳槜李沈恩孝刊本。

明郭正域辑《评点选赋》，凌蒙初辑评，香港大学藏朱墨套印本。

至于拟选之作，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其传世作品，约举二三，如宋毛滂《拟秋兴赋》，明王宠《拟感旧赋》（《槜李丛书》本），清阮元有《拟射雉赋》（《揅经室四集》）。

《文赋》一篇，拟作特多，明嘉禾姚绶有《次韵拟文赋手书》一卷，见《穰梨馆书画录续编》卷六，末有王澍跋语。入民国，江阴夏孙桐亦有《次韵拟文赋》之作，见《观所尚斋文存》卷一。

连珠一体，后世拟撰尤众，详《箬园日札》记“七辞及连珠”条。

清人为连珠体者，以鄙陋所知，如王夫之有《连珠》二八首（本集卷一），陈济生有《广连珠》一卷，钮琇《竹连珠》（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顾沅《生死管》抄本），张之洞《连珠诗》（《广雅诗集》下册），俞樾《梵珠》取佛经语纂成连珠一百八首（《曲园杂纂》卷四二）。

前人对《文选》一书评骘，每抑扬任声。姚炫《唐文粹序》誉《文选》为奇书，陆龟蒙叹昭明之后，无后继者可操选政。明人则有讥《文选》为兔园册子者。（平湖钱士声著《甲申传信录》，尝于僧寺读《文选》，一僧曰秀才如许年岁，尚读此兔园册子。丁传靖《阖公诗存》卷六因有“读选还遭恶口禅”之句。僧人信口开河，固不足为训。）

前代文家靡不资《文选》为馈贫粮，杜甫采撷至富，具见李详之《杜诗证选》，其袭用选句不胜偻指。杜于《文选》，深有体会，其《示宗武》诗云：“熟精《文选》理。”《宋史·艺文志》著录词人张元干有《文选精理》二十卷，以“理”为书名，取自杜公，可见其深造有得。书竟不传于后，惜哉！世不乏湛深选学之士，安得玩咏旧文，加以爬梳，抉发《文选》之精理，续前人失传之秘，谨拭目以俟之。

一九九八年春

补记

拙文考曹宪事迹与李善及贺兰敏之之关系，颇有发蕴之劳。近见吴之邨惠贻其《滕王阁与孟学士》一节，考出孟学士即王勃《滕王阁序》云"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〇七四《马怀素墓志》云："父文超，龙朔初，黜陟使举检校江州寻阳丞，弃官从好，遂寓居广陵，与学士孟文意、魏令谟专为讨论，具有撰著。"怀素即文超之第三子，《新唐书·怀素传》称客江都师事李善。文超、怀素父子皆客寓广陵，于是知孟学士应指孟文意。《新唐书·曹宪传》谓，宪以《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因谓魏模即《马怀素墓志》之魏令谟。

又据杨炯《王子安集序》："九岁读颜氏（师古）《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沛王之初建车也，博选奇士，征为侍读。"勃被征入沛王府，实与李善共事。"百年之学"指曹宪，宪年一百五岁。故以王勃亦属江都《文选》学派人物。又于《文苑英华》卷六五六载王勃二文，《上武侍极启》，一称"武氏流雷州，善以牵连贬姚州"。王勃交趾省父，作《滕王阁序》，而有"兴尽悲来"之叹，似为武敏之而发。是亦足备一说，故附记之。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序

拙编《敦煌吐鲁番文选》，网罗世界各地收藏《昭明文选》古写本之残缣零简，由于闻见所限，未能全力以赴，久置箧衍，未敢厘定，赖荣新江兄之助，得以整比完编。就中柏林藏吐鲁番写本《幽通赋》并注，新江携来，尤为难得。比勘李善注引曹大家注，不是一物，疑出《汉书》旧注，一时难下断语，故刊于附录，用俟贤者之探讨。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收入之《五等论》，原为傅增湘旧藏，学界似有不同意见，本书暂行从略。法京收藏诸件，年前尝向巴黎国家图书馆申请，获得印行权，所有费用由北山堂佽助，谨在此深表谢意。

叙录之中，S·五五五〇号《晋纪总论》，荣新江据许建平考证比定。又S·一〇一七九残文，已印入《英藏敦煌文献》第十三册，已由新江细心比定为陆士衡《吴趋行》及《塘上行》，今并采其说补入，更为本书增色。其英藏断片，多得新江订补。

其他各收藏及先时刊布单位，日本朝日新闻社印之《吐鲁番古写本展》、江苏美术出版社印行之《敦煌》大画册暨北京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 The British Library，Staatsbiliothek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lesitz，Orientalteilung，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嘉惠既多，统此致谢。

1999 年 12 月　饶宗颐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叙录

昭明太子文选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本）

吐鲁番三堡张怀寂墓出土初唐写本，1928年发现，存十七行，起“〔怀〕沙之志，吟泽有颜额之容”句，讫“自姖〔姬〕汉已来”句。载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又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张平子西京赋（法藏P·二五二八）

李善注。起“井幹叠而百增”句及李注，“井”字已漶。讫篇终，尾题“文选卷第二”。共三百五十三行，行约十八字，注均双行，书法工整。丝栏，末尾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侧又有西藏文音译“文选”二字。弘济寺在长安，书于高宗永隆时，去李善于显庆三年（公元658）九月上《文选注表》，仅二十二年，为善注最早写本。《西京赋》先有薛综注及音，见《隋志》及《唐志》。是本先引薛注，继称“臣善曰”，今本删去“臣”字。同属永隆写本者又有英藏S·一八三五《论谏》一文，字体相近。

左太冲吴都赋（俄藏L·一五〇二）

白文无注。残存一叶，二十三行，朱丝栏，行十六、十七字。起“波而振缗，想萍实之复形，访灵夔于鲛人”句，讫“其秦乐也，则木石润色，其吐衷也，则〔凄〕风〔暴〕兴，或……”句，下缺。影体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献》。

扬子云羽猎赋、长杨赋，潘安仁射雉赋，班叔皮北征赋，曹大家东征赋，潘安仁西征赋（德藏吐鲁番本）

白文无注本。吐鲁番出。行书残叶。背为佛教说话画卷，原卷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起“亶观夫剽禽之绁（逾）”句，讫于《西征赋》“由此观之，土〔无常俗〕”句，约存二百四十行左右。上半及中间多破损缺失，共十断片，最大者20×324.5公分。影体见1991年朝日新闻社印之《吐鲁番古写本展》。

江文通恨赋（英藏S·九五〇四）

白文无注。首尾俱残，有界栏，朱笔句读。起“魂惑生到此”讫于“自〔白〕日西匿垄”，知即《恨赋》。“垄”之下，文当是“陇雁少飞”句，借“垄”为“陇”。共存九行，行八至十一字左右。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首先著录。

成公子安啸赋（英藏S·三六六三）

起“自然之至音”句，讫于篇末“此音声之至极”句。共三十七行，行十六字左右。末行题“文选卷第九”，知确为昭明旧三十卷本（善注已编入卷十八）。后有“郑敬为景点讫”数字，知施点者为郑敬，其人无考。卷背有“撼替”二字音注，潘重规疑如“说文音隐”之例。此赋余最初录出，见《敦煌本文选斠证》一，1958年《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三期。

束广微补亡诗六首（以下俄藏L·一四五二）

仅存第六首，起自“明明后辟也”。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五言、韦孟讽谏一首四言并序、张茂先励志诗一首四言、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

止于“驰心辇毂”句。原非李善注，而为另一注本。谢灵运事下引丘渊之《新集录》：韦孟《讽谏诗》下引张揖《字诂》，张茂先《励志诗》引江邃释蒲卢一名，有裨辑佚。此卷日本狩野直喜有跋，见《支那学》第五卷第一期；德国Gerhard Schmitt有考证，见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XIV.3，1968年。

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短歌行四言（以下法藏P·二五五四）

白文无注。纸缺下右方半截。起句为“〔兰〕以秋芳，来日若短”，讫“短歌可咏，长夜无荒”。

谢灵运会吟行、鲍明远乐府八首

鲍明远乐府八首，仅存《东武吟》、《出自蓟门北行》、《结客少年场行》、《东门行》、《苦热行》、《白头吟》，缺去《放歌行》及《升天行》二首。

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之吴趋行及塘上行（英藏S·一〇一七九）

白文无注，存陆士衡《乐府十七首》中之《吴趋行》尾部及《塘上行》，上部均残。据写本形式、字体，当与法藏P·二五五四同卷。按法藏P·二五五四末首诗为陆士衡的《短歌行》，在《塘上行》后，与今本不同。《文选》刻本系统中的袁本、茶陵本顺序正好是《吴趋行》、《塘上行》、《短歌行》，可证唐人写本原本如此。《英藏敦煌文献》第十三册题作“残文”误，参荣新江《英藏敦煌文献定名商补》，载《文史》第五十二辑。

张景阳七命（俄藏DX·一五五一、德藏吐鲁番本CH·三一六四）

俄藏DX·一五五一纸残缺，仅得“虞人数兽，林衡计鲜；论最犒勤，息马韬弦；肴驷连镳，酒驾方轩”句中八字而已。小字注引张晏《汉书注》，知为李善注。德藏吐鲁番出土CH·三一六四亦为《七命》残文，与上文应衔接，夺去“千钟电釂”至“我而为之乎”若干句，以下为“〔大夫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耶溪之铤，赤山之精，销逾羊头，镤越锻成”。且有李善注。“镤”字，尤褎本作“镤”，善注云“镤或谓为镤”，是两字通。

杨德祖答临淄侯笺（英藏S·六一五〇）

纸残缺，于“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憎其貌者也”句，仅存二行十六字。

东方曼倩答客难（以下法藏P·二五二七）

第一页，纸缺右上半部。起“〔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句，有李善注。

扬子云解嘲一首

止于“或释褐而传”句。详刘师培《提要》及拙作《斠证》二。

孔安国尚书序（法藏P·四九〇〇）

纸缺左方下半截，无注，亦不书撰人，于“八素”旁有淡墨注音。止“赞易道〔以黜八索〕”句。

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法藏P·四八八四）

白文无注。颜序得四行，起“〔帀筵禀〕和，阖堂衣（依）德”句；而第一行“情磐景遽，欢洽日斜，金驾总驷”句，“情磐景”缺去右半边，下缺八字，“驷”字在第二行。王序得五行，首二行完整，而第三至第五行缺去上半截八至十字。止于“固不与万民〔共也〕”句。

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法藏P·二七〇七）

承接上卷，得十行，惟第十行仅见“忘餐念”三个字之右半边，而缺去“私法含弘而不杀，具明废寝昃晷”数字。

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法藏P·二五四三）

此卷与上卷之间，缺去“念负重于春冰，怀御奔于秋驾”句，以至“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一节。此残页始于“用能免群生于汤火”，讫于篇末。任彦昇《王文宪集序》仅得三行；第三行“故吕虔归其佩刀”句缺去殆尽。

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法藏P·二五四二）

是卷始于“〔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句，至“攻乎异端归之〔正义〕句”，下文缺。

按，P·四八八四、P·二七〇七、P·二五四三、P·二五四二四卷之间，除缺去若干小段外，上下实相衔接。

任彦昇王文宪集序（俄藏L·二八六〇）

白文无注。起“〔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辞”，至“弘量不以容非，攻〔乎异端〕”句。

扬子云剧秦美新，班孟坚典引（法藏P·二六五八）

白文无注。纸甚残，合计得二十七行；前四行下半截约缺去十二字；十七至第二十二行下方缺一大洞。扬文“翱翔乎礼乐之场”句，首行仅见“礼乐之”三字。第二行始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句。班文得四行，第二十四至二十七行上方缺去。止于“贾谊《过秦》”句。

干令升晋纪总论（英藏S·五五五〇）

白文无注。残片只存下半截，许建平君比定为《文选》卷四十九《晋纪总论》，且谓与法藏P·二五二五似属同卷。残存文字起“〔遂服舆〕轸，驱〔驰三世〕”句，至“〔玄丰乱〕内，钦〔诞寇外〕”句。

沈休文恩幸传论（以下法藏P·二五二五）

白文无注。残卷起“〔屠钓，卑〕事也，板筑，贱役也”句，至篇终。

班孟坚述高纪，班孟坚述成纪，班孟坚述韩英彭虞吴传，范蔚宗光武纪赞

卷甚完整，合计得七十行。惟首四行上半部残损。原卷属题“文选卷第廿五”，知为昭明之三十卷本。

李萧远运命论（法藏P·二六四五）

白文无注。存三十四行，始“〔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句，讫“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句。

李萧远运命论（敦煌研究院藏〇三五六）

白文无注。存廿二行，起“之而弗为乎”句，讫“则善恶书乎史策，毁誉”句，与法藏P·二六四五卷衔接。王重民有校记，见《敦煌写本跋文四

篇》；李永宁有文介绍。已印入《敦煌》大型画册，江苏美术出版社印行。卷中“世”字不避唐讳，殆六朝写本。钤任子宜藏印。

陆士衡辩亡论（北京图书馆新一五四三）

共三纸，七十一行，长138公分。录《辩亡论》上全文，无注。《敦煌劫馀录续编》著录。白化文有校，见《敦煌遗书中〈文选〉残卷综述》，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陆士衡演连珠（法藏P·二四九三）

白文无注。存百四十五行，行十六字左右。起“博则凶”句，终“臣闻虐暑熏天”句，下缺。卷背为《金刚般若经旨赞》。

陆佐公石阙铭并序（法藏P·五〇三六）

白文无注。起“〔箕坐椎〕髻之长”句，讫“皇帝御天下之七载也，构兹盛则，兴此〔崇丽〕”句，下缺，共存四十五行。

颜延年阳给事诔并序（法藏P·三七七八）

白文无注。存三十五行，起“〔上下〕力屈”句，讫于篇终并《陶徵士诔一首》篇题。

颜延年阳给事诔并序（英藏S·五七三六）

存七行，起“〔敢询前〕典而为之诔”，至“负雪怀霜，如彼〔騑驷〕”句。

王仲宝褚渊碑文（法藏P·三三四五）

存五十五行，行十七字左右。起“诚由太祖之威风”句，至于篇终，末题“文选卷第廿九”，知为昭明三十卷本。此卷已经许寿棠、王重民校过。许氏举“群后恇恸于下”及“仪形长遰”二句之可贵。按建阳宋本同作“恸”，可订胡氏《考异》之非。五臣作“长逝”，“逝”即“遰”之异写，是作“递”者不如“遰”之长。王校有误处，如“土寓”即“宇”之籀文，王误作“寓”。有漏处，如“东野之秘宝”，今本作“东序”。善注“尚书公如故”，敦煌卷似衍“公”字。“齐王趑车”句，五臣误“趑”为“超”，乃形讹。

附录

文选音（法藏P·二八三三、英藏S·八五二一）

伯卷存九十七行，起今本《文选》卷廿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之后半，讫第廿五卷干令升《晋纪总论》之前半。斯本存六行，起今本《文选》卷五

八蔡伯喈《陈太丘碑文》之"重"字，至王仲宝《褚渊碑文》之"冠"字（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著录）。篇题用简称大字，如"出师"、"酒德"等是。"三国"作"圀"，乃武后时写本。文字与善注违异者七十余事，近于陆善经本有音无义，与诸家异，详周祖谟《问学集》，177—191页。

班孟坚幽通赋并注（德藏吐鲁番CH·三六九三＋CH·三六九九＋CH·二四〇〇＋CH·三八六五）

正文存"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零〕茂。恐冈（魍）魉〔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犁（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嬴取〕威于伯仪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人（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东厸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丧孝兮，伯祖归于龙虎：〔发〕还师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若干字缺文，全为补足。此赋注语甚长，现存起于子辂死事，当是正文"溺招路以从己兮"句下著，"子辂"即"子路"。李善注博引曹大家、应劭、项岱、晋灼、韦昭、张晏及《汉书音义》各说，皆不见于此注，不知出自谁氏。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76—78页。（荣新江）

王仲宣登楼赋（法藏P·三四八〇）

原为残纸一页，前书刘希夷《白头翁》断句，再抄此赋，共十四行。非《文选》原本。赋文删去"兮"字。后为《落花篇》七言，及樊铸、陈子昂《感遇诗》（乐羊为魏将）与蒲州进士冯待徵《虞美人怨》。

上吐鲁番、敦煌莫高窟所出《文选》写本残卷，属于李善注者三（《西京赋》、《答客难》与《解嘲》、《七命》残纸），白文明著卷数为萧统三十卷本者，有《啸赋》、《恩幸传论》至《光武纪赞》、《褚渊碑文》等。注本而非李善注者，若俄京之《文选》诗残卷、吐鲁番之《幽通赋》是。其中确为六朝精写本，如《曲水诗序》、《王文宪集序》，更觉宝贵。诸卷散在柏林、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各处，《吴都赋》仅一纸，向未刊布，弥为可珍。吐鲁番所出《文选序》，吉光片羽，亦附入焉。日本细川侯爵永青文库藏有注文《文选》古钞，据称出自敦煌，神田喜一郎先生已勒为专书，冈村繁考证，尤为缜密精细，具见所著《文选の研究》，故兹从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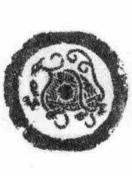
《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324页称，李木斋旧藏有开元四年二月写本《文选注》卷二，共二十七行，真赝未详。又法京列法藏P·二五四一号原为《文选》残卷，王重民目录稿初称无注，后改云有注。此卷现已失去，无从查考，

至为可惜。

凡石室所出秘笈《文选》有关写本，大体毕具于斯，按其卷第罗列，可免检索之劳，足为校雠之助。清世学人于选学致力至勤，惜限于闻见，若许密斋（巽行）平生校萧选至七十二岁，前后凡十三次，而所见不出汲古阁本（见许氏《文选笔记》卷一《密斋随录》），益叹今人眼福，迥非前贤所可及也。

1981年3月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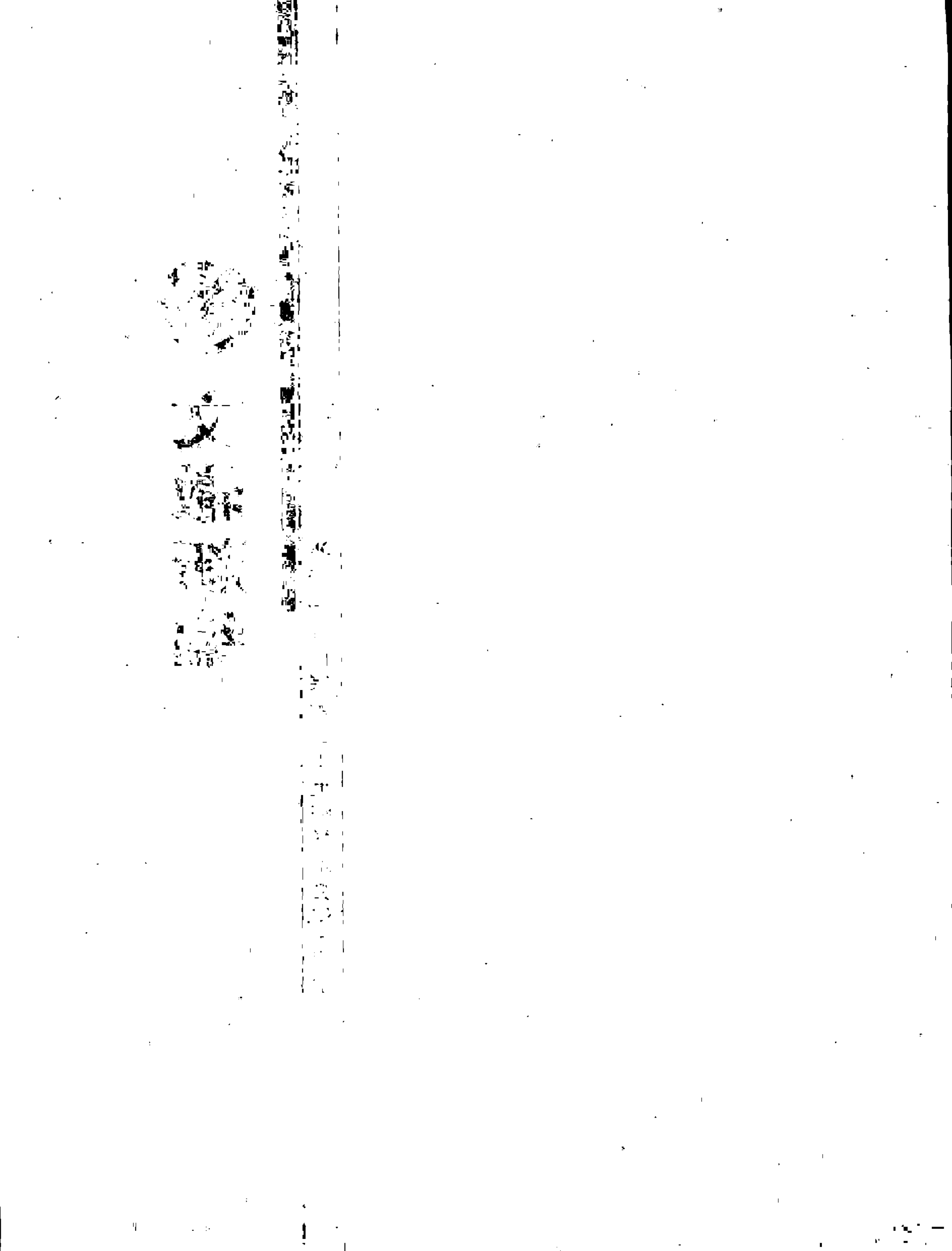
1997年7月再订



文辙新编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目　录

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

一、名号与文学

名号为事物之称谓，文字因之而孳生，文篇所由以构成，人类文明之基础也。近东开辟史诗发端云：

> E-nu-ma e-lis La na-bú sá-ma-mu
> Šap-lis am-ma-tum Su-ma la zak-rat

英译：when on high the heaven had not been named，Firm ground below had not been called by name.

> 天之高兮，既未有名。
> 厚地之庳兮，亦未赋之以名。

老子《道经》：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

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1]

近东史诗叙天地开辟即从无名（Sú-ma la）说起（la 即否定词之无），与《道经》言“无名，天地之始”最为吻合。近东重神道，凡名号之生，皆出于神，故开辟史诗最上神 Marduk 即有五十名之夥，皆赋以神之号。从（1）Marduk，as Anu，his father (ancestor) called him from his birth (Tablet VI，124) 至（50）Father Fnlil Enlil called his name Lord of the Land (T. VI. 136)。由日主至于地主，皆锡以种种之名。

马王堆甲、乙本《道经》并作“观其所噭”及“异名同谓”，与通行本之作“观其徼”无“所”字大异。两本悉同作“噭”，最可注意。而其义不易了解，兹试为解说之。噭，《说文》云：“吼也。”[2] 噭盖即叫。（《龙龛手鉴》：“噭，音古吊反，鸣也。……与叫同。”）观其所噭，谓察其所称呼也。董仲舒《深察名号篇》区别名与号为二物。其言曰：

> 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也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

又云：

> 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

号是大共名，名是散名；号是大凡，名是细目（大即《名号篇》开端云“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之大）。循是以言，马王堆《老子》云观其所噭，犹言观其所“謞”，即指号，谓所称呼之名号也。《庄子·齐物论》之言天籁、有激[3]

---

① 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并同作“以观其所噭”。罗振玉谓：徼，敦煌本作“曒”。朱谦之《校释》：“理显谓之曒。”观眇、观曒，以隐显说之。通行本作“无名，天地之始”。惟《史记·日者列传》引与帛书同。

② 《玉篇》引作吼。段注据文例改为“噭，口也。一曰噭呼也”。

③ 奚侗云：借为噭。

者、谲者[①]、叫者、謞者，意指宇宙间之形形色色，謞而效天地，是谓之号。至云“异名同谓”，犹董子所谓“异声而同本”，知老子《道经》首章实论名号之所肇始。由有无义言之，“观眇”出于“恒无欲”，眇者不可见，盖指名号所含之意义；“观所噭”出于“恒有欲”，噭则有声音可闻，有形体可见，当指名号所形成之语言及文字。今以董子解之，其义乃明。此章旧解繁赜，均与马王堆本不切合。此一新义，赖出土资料得以知之。

印度梨俱吠陀开辟史诗云：

Nāsad āsīn，no sad āsit tadanim

英译：There was not the non-existent，nor the existent then.

太初无无，亦复无有。（X 129，1）

tāma āsīt tāmasā gulhām agre；apraketām sālilām sārvām a idām.

英译：Darkness was in the beginning hidden by darkness；

indistinguishable，this all was water.

太初惟玄，复潜于玄（即玄之又玄），何处非水，深不可测。（同上三）

Kāmas tad agre sam avarta tādhi，

manaso retah prathamam yad āsit.

英译：Desire is the beginning came upon that，

(desire) that was the first seed of mind.

欲所肇始，心之彏薪。[②]

《水经注序》：“天以一生水。”故水为物之先。水与长天一色，玄之为色，水与天之所同。tama 存在于 tama 之中，非“玄之又玄”而何？kama（desire，欲）为心之第一种子。《道经》言从无欲到有欲，无欲则可观微妙之意义，有欲则可观有音形之名号。“欲”者，心之第一种子，一切知识皆自此出也。试

---

① 《释文》：谲，音孝，李轨虚交反，与效声谐。

② 《尔雅·释诂》：“权舆，始也。”王念孙以为其萌彏薪之假音。

表之如下：

欲（心之第一种子）{ 无：观眇——义之所存。
有：观所噭——可闻可见之名号

上说借吠陀以取譬解释，非谓《道经》之义出自吠陀也。

《周礼》中关于名之记录甚多。

> 《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
> 郑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
> 《夏官·大司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如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
> 《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论书名。"
>
> 郑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
>
> 《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
> 郑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郑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此示为别一说。名与文字二者可以互用，知者：

> 《管子·君臣》篇："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礼记·中庸》作"书同文"。
>
> 秦始皇《瑯邪刻石》："书同文字。"

合上三条观之，名与文及文字当是一事。故孙诒让云："审声正读则谓之名，察形究义谓之文，形声孳乳则谓之字；通言之，则三者一也。"[1] 郑注于《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亦解曰："谓正书字。古者曰名，今者曰字。"

---

① 《周礼正义》卷五十二。

郑说贯通礼书，以为名即是文字。清钱文昕、俞正燮、臧琳等多韪其说。（见臧琳《经义杂记》、钱大昕《潜研堂答问》、俞正燮《癸巳存稿》。）按加上一动词之“书”字则曰“书名”，或曰“书字”，有下列诸项：

谕书名——大行人瞽史

达书名——外史所掌

正书字

“谕”是教学之事（《老子》“譬道之在天下”，《说文》“譬，谕也”）。

“达”是传达之事，“正”是校订之事，任务不同。《隋志》经小学类有《正名》一卷，书佚（《广韵》二十七合引）。近日临沂出土婺（务）光残简有云：“大婺光曰：名不正不立。让于事则小识不。”（下缺）务光乃答汤问，则正名盖先殷之旧说也。

大司马之职掌，在仲夏时，须“读书契，辨号名”。郑注：

读书契，以簿书校录军实之凡要。号名者，徽识所以相别也。乡遂之属谓之名，家之属谓之号，百官之属谓之事。

此谓习兵之法，要注意册籍，及辨别徽号。

《说文》“名”字下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戴侗引《周官》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莫夜则旌旗徽识不可辨，故必谨其号名以相一，名之文所以从夕也。”（《六书故》第十一）彼申名字从夕之义，以司马夜事戒备证之。茇舍，草止之所，无险要可御，故特慎之。《齐语》云：“夜战声相闻……”《六韬·敌强》篇：“敌人夜来，当明号审令……或击其表里，徽号相知……”在夜战期间，须自己报名，方不引起误会，是冥不相见，以口自名，当出于古兵法。①

名之使用，古书均云出于圣人：

《礼记·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

---

① “冥”亦假借为“鸣”。《道经》二十一章：“幽兮冥兮。”马王堆甲本作“潸潸呵鸣呵”，借“鸣”为“冥”。

《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列子·汤问》："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说文》"名，自命也"一义盖用《礼记·祭统》语："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段注以为许之所本。

《周礼·小祝》："故书作铭，今书作名。"

《士丧礼》："古文作铭，今文皆为名"。

《甲骨合集》：一九六一七骨版："叀其名……叀其名。""名"字三见。此处名似是作动词用。又一九一零八："乃作[illegible]。"验之铜器彝铭：

郘公华钟："铸其和钟，□□……䜌（慎）为之名，元器其旧。"

楚公逆镈铭："氒（厥）格曰[illegible]柾八（克，又作[illegible]）……"[①] 字从木，作格。

𠫑羌钟："用明则之于铭。"

秦公钟："乍叔和（钟）氒名曰[illegible]邦……"（薛氏七·二）

吉日剑："朕余名之，谓之少虡。"

中山王[illegible]鼎云："隹十二二年中山王[illegible]诈鼎于铭曰……"

"明[illegible]之于壶。""明则"者，刘节谓："则，刻划也。"《说文》："等画物也。"刻之于铭，著己之劳伐，以垂子孙也。

铭亦作名，或作格，从木；又作诺，从言。岛根县大原郡出景初三年镜："母（母）人诺之。"又大阪和泉市出土十四字镜云："陈是（氏）作诺。诺之保子宜孙。"

早期铜器铭辞只有一二字或三数字者，实即《祭统》所云"自名"之"铭"。此类最简单之铭文，向来有文字书说及族徽。[②] 前者失之支离，后者病于笼统。如细作分析，不出（一）私名、（二）氏族名、（三）地名、（四）官职名、（五）祖先，诸名之结合。

① 《金文通释》四〇。

② 说或称为原文字。

余谓称之为“族徽”，不如用《周礼》之“徽识”较为恰当；因徽识不限于氏族一类而已也。

《周礼·司常》注：“事、名、号者，徽识所以题别众臣，树之于位朝，各就焉。”

可见事、名、号三者之相互关系。

《夏官》所辨之号名，表之如次：

乡遂——名州长至如东门（襄中）桐门西门庆比长东乡（眼）南乡（甄）

家——（采地）——号

百官——事

在国——表位

在军——象制

殷人立国多方，卜辞所见，方名特多。《周礼·夏官》有职方氏[①]、土方氏[②]、怀方氏[③]、合方氏[④]、训方氏[⑤]、形方式[⑥]。

训方氏云：“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郑注：“道，犹言也；为王说之。方，诸侯也；上下，君臣也。”又：“传道，世之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楚辞·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庄子·盗跖》篇：“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传道，即今人所谓 Oral tradition 者也。《周官》中有此专职，网罗四方传说为王诵之，其任务为“道四方之政事”。此之“道”，即《老子》言“道可道”之第二个道字。《释名·释言语》：“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以此语解老最合。道家出于史官，老子为周柱下史。《世本》云：“篯铿在商为周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⑦] 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又御史则掌藏

① 主四方职贡。

② 主四方邦国土地，掌致日景。

③ 主来四方之民物。

④ 主合同四方道路之事。

⑤ 主教导四方之民。

⑥ 主制四方邦国之疆界。

⑦ 《逍遥游释文》引。

书。老子于《道经》开端即云“道可道”、“名可名”者，以道与名骈举，而归于“大道”、“无名”。此超级之道与名，所以别于训方氏之传道及一般可以嗷称之名，其说虽出史官，而比史官更推进一步矣。

马王堆乙本以经法“论”篇言：“审三名以为事。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乱，三曰强主立而无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管子·枢言》：“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论名有三，而察名之论，导董子之先河。”

名与天地同生。董子云：“效天所为，为之起号。”又称无论大名之号与散名之名，“无有不皆中（合）天之意者”。如是则“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则“天人之际，可以合一”。司马迁传其学。史公《报任少卿书》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即本诸董生正名号之说。《深察名号篇》又云：

>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识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犹绳之审于曲直也。

此为董子至精之言。名即是直。返黑暗于光明，有赖于正名之事，而谓之曰引名。以引绳取譬，引名有如引绳，则曲直自见矣。《说文》举冥不相见，必自呼名，亦由黮黮以还昭昭之义。故正名之务，在于反真，反真必须覈名实，正名分。名从天生，皆合天意。效天所为以起名号，反乎其直，则合天道。此即所谓“究天人之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西汉人讲正名，至董仲舒、司马迁可谓十分精彩。其说尚保存于《春秋繁露》。东汉诂经家如郑玄解正名为正书字，虽有合于礼，而黯于大义，故不免苏舆之讥。其实名之所包，文字特其一端耳。

《释名·释言语》：“名者，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号，呼也；以其善恶呼名之也。”明时吕柟重刊《释名》，有后序云：“欲知义而不辩言，则于义不可精；欲辩言而不正名，则于言不能审。”“故名犹明也，释犹译也、解也。译而明之，以从义而入道也。”清代汉学以戴东原明道必先通词为把柄，实则吕氏已先言之矣。

世但知孔子论正名。徐幹《中论》引子思曰“事，自名也；声，自呼也；

貌，自眩也；物，自处也”（《贵验篇》），以申求己之义，是子思亦论“名”。今由临沂出土新资料婺光残简“名不正不立”之语，知“正名”是殷人之旧学，渊源甚远。孔子及其门人与后之为《春秋》学者张皇而光大之。

《汉书》：“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名谓不同，礼亦异数。”盖“辨名正物”为礼之大端。（《仪礼·丧服》传：“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儒、墨、名、法诸家，均摭取其义。道家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故主张无名。《老子·道经》之末章云“道恒无名。侯王者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阗（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通行本作‘不欲’）以静，天地将自正”（马王堆乙本《道》最末一条），与开端“无名，万物之始”相呼应。有欲之生，则以“无名之朴”镇之。《道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所谓“恒无欲也”。由有欲归于无欲，不观其所噭而观其眇，如是则反乎无名之朴而天地将自正，以宇宙本来即是如也。[①] 由有名而返于无名，为古代中国道术之关键，儒与道之分歧在此。论名、号之发展，宜首先注意；否则无从了解古代中国文学之思想基础。

二、诅盟与文学

文学作品表现手法，大抵不出抑与扬二途。抑即是从反面来作文章：讽刺及诅咒是也。讽刺（irony）有时用反面之语言（speaking by contraries），来引人入胜。《老子》所谓“正言若反”，是一种特别技巧。扬即歌颂方面，而皆以夸饰为美，否则无文学价值可言。中国古诗六义有风、雅、颂三体。风，讽也，近于反面之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侧重于扬；雅者，正也，用以言政事，抑扬之手法皆有焉。

古代以神道设教，文学作品，颂占最重要之地位。近东、印度远古之文学，以颂赞（hymns）为多。西亚巨神曰 marduk，即由 Mar（Accadian 语为儿子）＋utu（日），义即太阳之子（J. Bottéro 说）。埃及对太阳之崇拜亦极隆重，Aton（圆形之太阳）为宇宙唯一之神。其颂诗见《有关旧约之近东古代文献》（369—371 页）。希伯来文学颇受其影响，于《旧约》第一〇四号赞诗可以见之。

《山海经》在《大荒东经》及《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与日月所入之

---

①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论六家归于道术。故曰：“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与史卷异趣，可以见之。

山，有种种不同之名称。[①] 如“孽摇頵羝”（上有扶木）、“鏖鏊钜”，似是汉代输入之外来语，无从稽考。中国古代虽有十日并出、若木、羲和诸神话，但文献上对于太阳并无专篇之颂赞。九歌《东君》乃与《河伯》、《山鬼》并列。周代祭日有祝辞，是于《大戴礼·公冠》篇云：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孔广森云：“此朝日辞。”《尚书大传》载东郊迎日辞与此相同。陈寿祺云：“此二语古有是语，成王以之赞美周公，谓公德如日月之照临也。”考《尚书·洛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语与此同。[②] 可见此祝辞乃摘取《尚书》成句。《文心·祝盟》篇：“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辞。”亦引是语，而不知其乃袭用《尚书》。古代汉俗日月并重，《封禅书》齐国八神中有日主、月主，几乎处于同等之地位。西安出土汉砖文：“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九章·涉江》：“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歌咏日月，用以拟人，每借喻人主之威德，不似西亚、波斯以日为至高无上之神明，颂赞之篇，车载斗量也。

《诗》三百篇，周、鲁、商颂，皆重人事，非自然神之颂赞。颂本容字，只是形容祖先及人生之盛德。在祭祀上，配合乐与舞，故乐器有颂琴颂瑟。[③] 颂以过分颂扬，令人生厌，文学价值不高，今不欲详论。惟讽刺及诅咒性之文篇，最为动听。风之为讽，世多熟悉，兹专谈盟诅问题。

《诗·小雅·节南山之什》，诗序皆以为刺幽王之诗。“家父作诵（《说文》‘诵，讽也’），以究王讻。[④] 式讹[⑤]尔心，以畜万邦”。对王深加责备，而冀其有所悔改。惟《何人斯》一篇，诗序云：“苏公刺暴公也，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焉，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其诗云：

及尔如贯，谅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诅尔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

① 森鹿三教授列出有十四名。

② 魏文帝延康元年诏引作：“御衡不迷。”

③ 详臧镛《拜经堂文集·颂释》一长文。

④ 争讼也。

⑤ 《新语》引作“化”。

此为绝交诗。不止规讽，直是诅咒。《毛传》云：

> 三物，豕、犬、鸡也。民不相信，则盟诅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

《周礼·春官·诅祝》云："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宗之祝号。"郑注："八者之辞，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诅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诅祝之文辞共有八类，皆为告神明之作。盟与诅之分别，在于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神权时代，人类喜诅咒于神，使诅咒之恶果降于敌人之身。在西亚最有名之 Hammurabi 法典，最末一段全以诅咒之语言出之，为古今极精彩之诅辞。兹摘汉译数句于下：

> 顾众神之父赐我统取权力之大神 Anu，褫夺其光辉，翦除其王笏，诅咒其命运。……诅咒其本人，诅咒其子孙，诅咒其国家，诅咒其战士，诅咒其人民及军队。原（大神）Enlil 以其金口玉言大声诅咒之，并立使其诅咒降临厥身。

反复用无量数之诅咒（azāru）字眼，足以令人震骇！现存中国此类文字，有宋时初见于著录之秦告巫咸《诅楚文》。苏轼《凰翔八观诗》始记之，王厚之为作音释，章樵《古文苑》载之，谓《诅楚文》。近世出土者有三。摘数句如下：

> 有秦嗣王敢……告于不显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罪）……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不畏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诅盟……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应受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几灵德赐，克劑[①]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瘟犯诅，著者（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持与西亚法典比较，不啻小巫与大巫之比。近东、远东，古代皆有诅祝文学，

① 制，亚瓶本作剂，翦也。

殊觉有趣。

盟诅之手续，《周礼·秋官·司盟》云："掌盟载之法。……北面诏明神，既盟则二之。"西周焚簋云："邵（昭）联福盟。"鲁侯爵："用𩛥自𡕒盟。"盟字从血，示杀牲于明神之前。《文心·祝盟》篇："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

方明之制，见于记载，殷已有之。《伊训》佚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咨）有牧方明"。[①]《御览》引《三礼图》："方盟木，方四尺，设六色。……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观礼》云："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加方明于坛上。"方明木代表上下四方。郑注引《六玉》以说之，又列日、月、山川不同明神及其等次如下：

日——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

月——王官之伯会诸侯而盟，其神主月。

山川——诸侯之盟。

会盟必于方明之前者，表示天地四方共同鉴临。盟约之事，神明共鉴之，无敢或渝。

近年山西侯马出土大量盟书，共千余件，用作祭祀之玉币极多。此为晋赵鞅杀赵午之事。盟辞中涉及九氏二十一家。其载书惯语云："及群虖（呼）明（盟）者，䖒（吾）君其明亟覙（视）之，麻夷非是。""麻夷非是"一语，说者谓即《公羊》之"昧雉彼视"（襄二十七年），对于古代盟诅之实际情况，已极明了。所谓用骍毛者，侯马玉璧上墨书"羊羲"字样。《诗·閟宫》"享以骍牲"，郑注："其牲用赤牛纯色。"足见盟牲用骍。

《礼》郑注云："盟诅主于要誓。"要为契约，字亦作缨，有专职司之。散氏盘铭末记："厥左执缨，史正中农。"仲农史官署名，示执契以为公证人。要誓与盟约，其事不可分。《左传》称述极繁。曰要言，曰要盟，其语习见。举例论之：

左襄九年传：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又：楚子伐郑，子驷、子展曰：……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惟信。信者，言之瑞之，善之至也。……

① 《汉书·律历志》引。

《春秋》于盟必书，《穀梁传》隐八年盟于瓦屋下云："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杨士勋疏："周公制盟载之法者，谓方岳及有疑会同始为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屡盟，故云不及三王也。"周衰屡盟，直以要盟为儿戏，故《春秋》讥之。然则盟诅之事，极为慎重。三王之所不及，要以昭诸大神而莫爽，否则明神不临，以其言之无信也。

由于对春秋以来诅盟陈辞之礼制，与要言必昭告于大神等意义之了解，可帮助吾人进一步对屈原《离骚》之作意，得到合理之解释。"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者，犹之"陈辞于方明之下"，剖告于神明也。"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此"要"字极重要，亦以昭告大神巫咸而要言焉。此巫咸仍是《诅楚文》之不显大神巫咸，秦与楚诅盟所共祷告者也。清钱兆鹏精于周代史事，作《巫咸论》[①]，谓巫咸与子巫贤并殷贤臣。近年湖南发现商代遗址不一，证明殷时方国，南及湘境。巫咸地理，山西及越、湘皆有古迹，足见屈子所言之巫咸，可能与彭咸同指殷臣。

刘勰尝谓《招魂》为"祝辞之组缅"，说者据此加以推衍，以为古代宗、祝、巫、史有相互关系，遂目楚辞为巫祝之文学，复以比附通古斯之萨满教，亦有视屈原为巫长者矣。然彦和此篇，实以祝与盟骈列。其论盟之大体云："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以之说《骚》，最为恰切。因《离骚》之作，旨在表明"耿吾既得此中正"，掬肝沥诚，以邀天地四方明神之共鉴[②]，其云"相观民之计极"，"相览观于四极"，与《诗·皇矣》之"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曾无以异！春官诅祝所掌，告神明有盟诅等八者之辞，而大祝六祈则有祠命等六辞，皆辞之类也。不知说者何以有见于祝，而无见于盟耶？《离骚》长至三百七十二句，自"岂余心之可惩"以下，行文曼衍夸饰，尽驰骋之能事。观乎四荒，上下求索，其写作手法、布局盖有取于方明，以上下四方为谋篇经纬，构成如是长文。寻其中心思想，亦如《惜诵》之"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析中，戒六神与向服"。六神者，一说谓即上下四方之六宗。文中再三敷辞，升降上下，冀天地之鉴临，昭大神以要言，明其忠贞之志，其事义与盟正相似。故《离骚》者，可谓屈子祈天神昭鉴之盟辞也。故友陈世骧教授尝摭取《离骚》中言"时"数句，讨论屈赋中之时间（time）观念。鄙意屈赋骋辞及于上下四方，实摹仿

① 《述古堂文集》十一。

② 屈原与楚同姓，义无他适。近贤考三闾之屈姓人物甚备。余于湖北见1975年涢阳出土铜簠，铭云："屈子赤角为次女屈璜作。"为春秋屈姓之器。

方明。《招魂》因之。文中有空间（space）观念，其重要性不次于时间，惜尚无人加以抉发耳。

司马迁谓“屈子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此如孟子称“《诗·小弁》之怨，为亲亲也”。“诗可以怨”，骚亦出于“怨”。此盖受谮蒙谤者，鸣其不平，且自剖白，以明其心志。《释名》云：“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离骚》之作，亦此意耳。（又《九章》王逸云：“章者，著也、明也。”义复如是。）斯义既明，知屈子此文，质之天地以为正，要之灵巫而不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彼特假灵巫以道志，其人不必为巫，其文亦不必隶属于巫祝也。如是方可有得于作者之用心，庶免于拘泥。

至于“小事曰诅”一类之文学作品，刘勰已举出“后之谴咒务于善骂，惟陈思诰咎，裁以正义”。此类制作，至明、清尚有其例：黄石斋《骈枝别集》有《自诅》之篇。[①] 胡天游有《诅雨师》之文[②]，皆奇诡可诵。亦有以讼代诅，如韩愈之《讼风伯文》，明太祖深不以为然，为文辨之曰：“风张天地之威，乃天地之正气，国家载在祀典。愈以风托比奸邪，作文讥之，殊为慢神矣。”（《明太祖文集》）彼以人主之立场，主张必钦天畏地，谨人神而不可慢神。我恐退之读之，必不服气，未必首肯之也。

三、史诗与讲唱

印度史诗之来源，据说出于讚诵（Kirtana）。大抵分为故事与唱歌两部分节目，在庙中唱导。大战书摩诃婆罗多即由此而产生。由于伶工到处游行说唱，代代口耳相传，遂成为史诗。

佛家之本生经故事，亦施于讲唱。自东汉末翻译，传入中土，唱导之事亦复兴起。传说有曹植鱼山梵呗之事。[③]《梁高僧传》云：“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得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④] 所谓睒颂，即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五忍

---

① 略云：“余有悖德者四，反性为六，尔蹑泥首，听吾诅尔……”评其文者云：“……陆隐何巢，舟藏靡隐，处则不知所托，行则不知所之。悠悠苍天，彼何人哉！黄子所以自诅也。”

② 见《石笥山房文集》。略云：“岂黔罪宜于是罚，俾帝怒无佚，抑有以致之者？人气愁苦，孰原其由？讷讷沓兴，罔敢天诽，惟雨岳是聚，乃诅而讯之。……谁为汝为泽，惟实予敌；谁为女为霖，惟独予冤……”

③ 近年东阿鱼山有曹植墓碑出土。见《文物》，1975（5）。惜所记至略。

④ 《经师传说》。

辱无极章第三之睒菩萨孝感动天之故事。原出于 Syāma 仙人本生（Jātaka），即《洛阳伽蓝记》所载之闪子供养父母。自三国以来，因译者灌输强烈之孝顺观念，与汉廷提倡孝道互相配合，故传播极广。慧皎举出曹植二文，均不见于明人编撰之曹集。[①] 然宋武帝时，与著《京师寺塔记》[②] 之释昙宗同住于秣陵灵味寺之释僧意。其人善唱说，慧皎称其"制睒经新声，哀亮有序"[③]。则魏晋以来，为睒颂制声，大有其人。此犹在南齐竟陵王之前也。

此种在神庙宣唱之习惯和 Gātha Nārāśamsī（偈颂）组成之文体，可以随意扩大。印度人讲故事随时插入诗歌，用一边讲一边唱之表达方式，表现于佛经中为散文与偈颂杂陈。通过翻译传入中国，引起一般僧人及文士之注意和仿效。睒颂新声必是其一例，睒子故事，西方学人认为即是罗摩延那（Ramayana）中罗摩之父十车王（Desaratha）射死隐士独子故事所演化。罗摩延那与大战书都由歌唱之纪事诗与抒情短诗组合而成，因为唱时有增有减，时地不同，流传之唱本长短复有差异，写成文字便形成许多不同之传本。

希腊荷马史诗原亦是口头流传，逐渐踵事增华，记录下来，遂成万行以上之巨著。法国 Georges Dumezil 论 Myth 与史诗及小说有书多种。彼分析史诗有三型：un héro（英雄）、un sorcier（巫灵）、un roi（王）。其理论自成一套，很是动听。此以论印欧语系之史诗则可，若以论汉语之古代资料，则未甚适宜。古代中国之长篇史诗，几付缺如。其不发达之原因，据我推测，可能由于：（一）古汉语文篇造句过于简略；（二）不重事态之描写真（非 Narrative）。但口头传说，民间保存仍极丰富。复因书写工具之限制及喜艺术化，刻画在甲骨上，铸造于铜器上，都重视艺术技巧，故记录文字极为简省。即施用于竹简长条上，亦不甚方便书写冗长词句，不若闪族之使用羊皮可作巨幅。及至缣帛与纸絮发明以后，方可随意抄写长卷。

有人谓欧洲文体，汉文学皆有之，惟史诗为例外。然中国非无史诗，其侈陈寓言，讲说故事，曾经发展为纵横家之"说"。陆机《文赋》云："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而谲诳。"谲诳可作寓言看，炜晔可作卮言看。《庄子》一书，实亦"说"之一型，极尽夸饰之能事。其流衍为赋，赋发展至于庾信之《哀江南赋》，可以看作词藻繁缛之一种史诗，与印欧之史诗文学实异曲同工。

---

① 陈寅恪疑为伪托，见《四声三问》。

② 似是第一部伽蓝记。

③ 《高僧传》十三《唱导》。

至于保存于口语流传民间之文学作品，许多尚未笔之于书。西藏史诗《格萨尔》（*Gesar*），据1962年统计，民间流行便有一百五十多种，有八百万字。[①] 文备众体，有说有唱，散行与韵文均见，极近于印度史诗。以前法国R. A. Stein教授有专书介绍。其唱出之乐调，M. Helffer亦有详细研究。此史诗现已有中文译本。蒙古亦有民间史诗《格斯尔可汗》。[②] 其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口传史话，尤为丰富。以前丁文江《爨文丛刻》中之《宇宙源流》，凌（纯声）、芮（逸夫）、李（霖灿）诸家之整理苗族、麼些文献，李方桂发表之贵州水家口语，以及近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组译刊之纳西族民间史诗的《创世纪》彝族支系《阿细的先基》[③] 等等，皆有开辟史诗，可供研究。僮族有特康射落十一个毒太阳故事[④]，水家传说有十二个太阳与十二个月亮，似乎同于《山海经》，惟又出现玉皇、吴婆等名字，及“道光新来”之语。可见其逐渐增加，有极晚出之材料。史诗之形成，口口相传，随时画蛇添足，自是如此，毫不足怪。

关于上帝造人之故事，最早见于《西亚之开辟史诗》（Enūma eliš，when on high）第六版。上神Marduk之语曰：

> Blood I will mass and cause bones to be，I will establish a savage，“Man” shall be his name. Varily，savage-man I will create. He shall be charged with the service of the Gods，that they might be at ease.

> （据E. A. Speiser英译）
> 予将搏其血而畀其骨兮，
> 予将置仆竖，而命之曰“人”。
> 予将真正创造此“仆”——人，使其安心服事于神。

其造人之经过，乃拘系Tiamat之余党，执之于大神Ea之前，加之以罪而歃其血，以其余沥塑造人形焉。如是人之塑造乃出于叛逆者之血，此人所以有原罪而永远得为神之仆役，在上帝之面前，人只有俯伏战栗。《旧约》之

---

① 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调查。
② 1963年北京中文译本。
③ Seiji意义为歌。
④ 见《广西僮族文学》。

书，世所共悉，今不具论。若汉土则造人之说始于女娲。东汉应劭《风俗通》云：

>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七八皇王部引)

人乃由泥土造成，与西亚谓出于沥血不同。汉代有古帝感生说，乃对统治者受命之由来，提出特殊解释；纬书尤其代表。然衡之民族学家调查所得，多有类似者，略见下表，不欲详论。

人类诞生	古传说	民间口传
土造人	见《风俗通》	
鸟生人	《商颂》“玄鸟生商”	台湾泰雅族
石生人	《蜀王本纪》禹生石纽	台湾鲁凯族、婆罗洲亦有之
树生人	《楚辞》伊尹生于空桑	贵州花苗、菲律宾　又竹王故事
虫生人	汉高祖母刘媪	台湾布鲁族　梦与龙遇

西亚神话之 Tiamat，闪语义为溟海（La mer）。其神屡次构患，使天下不安，颇似汉土神话中之共工振滔洪水为害。及女娲簀芦灰以止洪水，杀黑龙而冀州[①]，始恢复天地之秩序。邃古众神相争之传说，各处多相同。《楚辞·天问》：“康回凭怒、地何以故东南倾。”《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以致天倾西北，地不足东南。而南印度神话乃谓 Siva 与 Parvati。在 kailasa 结婚时，诸天齐集，不胜重负，而地乃倾斜于北方。Siva 乃命 Agastya[②] 步至南方，使其均衡。其地即今之 Madura。南印地倾之说与汉土天倾相类似。麽些史诗之《创世纪》亦有“天不圆满，用绿松石来补；地不平坦，用黄金来铺”之句。又《天问》称：“女娲有体，孰制匹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曹植《女娲赞》称其“神化七十，何往之灵”。郭璞《大荒西经》注亦云：“女娲一日中七十变。”女娲之为人面蛇身，汉赋及画像石已获证明。《淮南子·说林训》言：“此女娲所以七十化

① 《淮南子·览冥训》。

② 传说称其制 Tamil 文法。今 Podiyil hill 尚有洞窟文字，说者谓与彼有关。

也。”如是其说已流行于西汉。按七十化之说颇近印度之言化身神变。康僧会翻译之《六度集经》，佛对比丘说：“睒子者，吾身是。”凡本生扮演之主角，悉为佛陀之化身。故《法华经》普门品观世音有三十二应化身。后来道教徒捏造之老君十六变词十八首①，老君亦有无穷之变形。女娲为造人之大圣，自然可以在一日中七十化，与佛陀、老君相同。女娲神话起于西南，苗族称之为 Kueh。何以天倾及七十化等说，与印度极相类似？其间关系如何？有待于深入研究。开辟史诗，瑶族所传者谓：“七日七夜洪水发，葫芦浮上到天门；七日七夜洪水退，葫芦跌落到昆仑。山上树木水淹死，世上全无一个人，尚剩伏羲两兄妹。……从此兄妹便成婚。”② 考之《独异志》：“宇宙初辟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西南苗、瑶系统之洪水传说，大抵皆与此相同。此类保存于口头文学者，亟须记音并作综合研究。闻一多《伏羲考》已开其端。唯世界洪水（Déludes）神话几乎各处皆有之。巴比伦则见于 Gilgamesh 史诗（Tablet XI）及 Sumerian、Atrahasis 残简，希伯来《圣经》见于《创世记》。其他，Bènose、Abyden 希腊、叙利亚皆有洪水故事，已详 G. Contenau 所著书。中国洪水传说，散见于古书，只存片段。虽经马伯乐整理，实不足目为史诗。后代演绎禹治水故事，踵事增华，又有唐人之《古岳渎经》③，嗣又演为无支祈故事。④ 更后有人著《大禹治水》小说，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山阴沈嘉然著），其书失传。中外洪水史诗、神话，其间异同、分合之故，尚须作全面爬梳整理，希望有人加以从事。兹略论其大概，以供参考。

荀子作《成相》篇，可算是一种非长篇之史诗。用三、五、四、三句式之唱词，必吸收民间说唱之史诗雏形。然步武者甚少。清卢文弨谓其体为后世弹词所自出，其说可信。元时有说书臣钱天祐者，撰《叙古颂》，上表自言“效荀卿《成相》之体为之”。共八十章韵语。其句式即循成相之旧规。举其末段宋元事：

> 杜鹃啼，兆祸基。安石招出金马来。斡离虎视，二帝青衣。良可悲。
> 忆中原，几变迁。代兴代废何可言。六合无外，航海梯山。归大元。

---

① 伯希和目二〇〇四。
② 《民间文学》，1962（1），96 页。
③ 《太平广记》四六七，题作李汤，似出李公佐。
④ 称其被禹锁于龟山足下，叶德均著有《无支祈传说考》。

全书存于《永乐大典》古字号（卷一〇八八八），似尚未有人加以引述。明杨慎谪居云南，作《历代史略词话》，分十段，起总说，讫于说《元史》。每段先系“西江月”或“蝶恋花”，再用一绝一律并七言句诗，作为说明，体裁已近戏文。然本身主要词句是三三四句式。如云：

一段词，一段话，聊珠间玉。一篇诗，一篇鉴，带武兼文。

实仍是承袭《成相》讲史一路。

讲唱文学至于唐宋，又有重要新发展。唐人讲一枝花话（郑元和遇李亚仙故事），自寅至巳，犹未完毕（元稹诗）。武平一论当日妖妓、胡人、街童、市子，呼歌舞蹈，谓之合生。其时僧徒讲唱自成一套，所谓文溆之“和尚教坊”，世所共悉。盖自佛教传入以后，一方面佛家神通事迹，为人吸收，开出六朝以来神怪小说一新路；另一方面对于讲唱技术之讲求，随时创新。慧皎《高僧传》列为十科，“诵经”之外，又出“经师”与“唱导”二项。表面看似重床叠屋，实则极有其道理。因经师与导师皆属于特技。经师长于转读梵呗，为声明之学；导师则须兼声、辩、才、博，谈无常则令心战栗，语地狱则便怖泪交零，辩说锋起，感人尤深。唐道宣本人为律宗大师，深病其淫音娇哢，目为郑卫之音，故并之称为“杂科”。宋赞宁则改唱导曰“声德”，实则经师与导师，其功用不同，而皆僧人做功德之特技。中唐以来，余风未减，观于文溆之唱，文宗以善吹小管，竟采其声以制曲。[1] 自敦煌石室变文经卷大量出现[2]，唐人讲唱之业，昭然大白。五代蜀地尤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3]，今巴黎所藏昭君变文可以验之。《茅亭客话》记蜀僧辞远，行与坐辄念《后土夫人变》，此《后土变》为敦煌所未发见。然北宋大观时，世有藏本，或称其词渎慢太甚，乃唐人所作以讥武后，则变文之取自传奇者也。[4]

唐张祜讥白乐天诗似目连经[5]，孟棨《本事诗》作《目连变》。敦煌变文中属于目连变者，其一称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后代由变文演进而为戏文。如明新安郑之珍编《新刻出相音注勸善目连救母戏文》三卷，刻

① 见《碧鸡漫志》。

② 已有五十余卷，包括讲经文、押座文等。

③ 《才调集》六。

④ 出《异闻录》，详叶德均考证。

⑤ 《唐摭言》十三。

画其事，可谓踵事增华；而宝卷亦有目连，今不具述。

大抵宣扬佛教，讲与唱兼施。转唱因地区不同，作风亦异。故道宣论："东川诸梵，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掘势之类也。吴越好浮绮，惟以纤婉为工。秦壤雍梁，音词雄迈。金陵昔呀亦传长短两引。剑南陇右，其风体秦。故知神州一境，声类既各不同。"南北殊风，此其大略也，唱导之事，深入民间，士庶奉佛既众，递相仿效。影响所及，或采释氏法事，以解书史，或取和声，以合清唱。试举二例论之：

（一）些与娑婆诃　《楚辞·招魂》每句用些字为助声。《玉篇》云："些，辞也。"唐德宗时楚有释些些师，口自言些些，故号之。赞宁为之系曰："些之声为商为羽耶？通曰：传家采录，其例有二：一则按文不音；二则口授知韵。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词声余，则苏个切也。若山东言少，则写邪切焉。此师荆楚间事也。"① 是些，楚言应为苏个切。宋沈括《梦溪笔谈》乃以梵语说之。朱熹云：

> 楚些，沈存中以些为咒语。如今释子念娑婆诃三合声。而巫人之祷，亦有此声。此却说得好。盖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却晓不得。②

极赞赏是说。叶梦得则谓："不知梵语何缘得通荆楚之间：大抵古文多有卒语之辞。"说亦有理。些当是助声。宋柳拱辰《永州风土记》："竞船举棹，则有些声；樵夫野老之歌，则有欸乃声。"些，助语，即楚辞之楚些③。僧人念《心经咒》结尾曰："揭谛揭谛萨婆诃。"④《宋高僧传·菩提流志传》："所慊者古今共译一切陀罗尼，末句云莎嚩诃，皆不窃考清浊。或云'萨婆诃'，或云'驭皤诃'，九呼不伦……故克取莎桑已反嚩无可反诃呼个反为正矣。"按梵语原是svāhā。湘友见告岳阳巫师念经每句末作 So……ko' h，即以些为助词之变音。《招魂》作者，无可能采用梵语。沈括、朱子之说，难以置信。惟此即儒者窃取释氏音声以解说书史之例，不可不知。

（二）鲁流卢楼与 ṛṛḷṝ　敦煌所出悉昙章用于唱诵者，不止一种。如伯

① 《宋高僧传》二十。

② 《道夫记》。

③ 麓山精舍辑本。

④ 玄奘法师译本，见《敦煌西藏文卷》，记音作 ga ti swa ha（P. T. 448）。

希和三〇九九号为一巨册，题曰《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诸帙皆言出自释定惠翻译。其序云：

> 夫悉昙章者，四生六道，殊胜语言。唐国中岳释沙门定惠法师翻注，并合秦音鸠摩罗什通韵，鲁流卢楼为首。

鸠摩罗什《通韵》现存于英伦史坦因列一三四四号，有云："鲁留而成斑。"所谓鲁流卢楼，实即梵语字之 ṛṛḷṝ。余于十年前曾撰文论《通韵》及此四字母之关系，为印度友人颂寿，刊于 Madras（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若干年来，叠有新知，更为补充。考《悉昙章》词句每嵌鲁流卢楼四字母于行间作为助声。如云：

> 鲁流卢楼弗慓只，鲁流卢楼晃浪晃。

皆有声无义，只是用作帮声而已。唐代《悉昙章》曲词之鲁流卢楼，广宁乐工唱王维《渭城曲》作"刺里离赖"为和声（李冶《敬斋古今黈》）。宋人唱词，张炎《词源》谓"哩字引浊啰字清，住乃啰哩顿唆𠰷"，即由鲁流卢楼变为"哩啰唆𠰷"与"刺里离赖"。

后来唱曲以此为助声，或省变为三字。清初曹寅有听闽乐闻有啰哩嗹句。有诗纪之云：

> 一拍么弦一和缠，舞余无复扫花钿。囝郎漫纵哄堂笑，摘耳犹闻啰哩嗹。

其序称："记董解元《西厢》曾有之。老子不独解禽言，并通蛇语矣。"囝郎见顾况诗，以此取笑。其实不止董解元、乔和笙唱本中见"哩哩啰哩哩来"，明王越词中亦有"哩啰啰哩啰"。金时，全真教祖师王喆辈仿《捣练子》句中亦有"哩啰嗹"。现代台南道曲唱本《出仙宫》云：

> 出仙宫　哩啰嗹　离了蓬莱腾彩云　腾彩云（你来）出离了天台　出离了天台　哩啰嗹[①]

---

① 法国施博尔教授藏陈荣盛抄本。

犹存其遗声。古代讲唱取自梵音之残迹，犹可追溯。礼失求诸野，其是之谓乎！

附录

今举贵州水家口传造人故事为例：

古时造人	天不成地（指天地不分的意思）
当初造天	地不成天
未成天	成块大平石
硬圆的石头仙人分开	才知贫苦
老辈的人	不知对赠（指不善说话）
混沌来了	知识开通
一个天	长似葫芦　中粗端细
仙人知他大了	他裂为二
成为两块	一俯一仰
以手握提	支去上面
高越山岭	天下空旷
杨千里	造十二个太阳
十个太阳	亮到半夜
十二个月亮	亮到早晨
天初亮	戴铁笠钢笠
戴来遮太阳	钢笠铜笠
热的太凶	石头也溶化的凸凹不平
忍不住	去射太阳
仙人家	造下铜弓
王者家	铜箭再手
造弓箭	管射太阳
射第一个	热亦不减
射第二个	热仍凶恶
射第三个	一点也不弱
射第四个	也不见弱
射第五个	水牛黄牛睁眼

射第六个　　猪狗才起来
射第七个　　鳝鱼泥鳅才蠕动
射第八个　　生出绿的芥菜
射第九个　　兄妹（或兄弟）作工
射第十个　　长出树与柴
（射）第十一个　　生出芦苇与草
我们相向　　不要射了
只留一个　　各里皆亮　　各方皆匀（平安）
玉帝王　　造火与水
十六（指天下人）皆取用　　巧愚同取
所有巧愚的人　　全是吴婆的人
处处皆有人　　各地皆有坡
当初造齐全了　　建牛龙殿
仙人打制天柱　　才真生出王来
尧王生出来了　　鳌鱼翻身
那鳌鱼　　撑在山岩之下
黄头龙　　撑在天中
百廿椽　　皆在王家
龙磨角　　去殿上相斗
他们相斗　　在山岭里面
那雷公　　跳得天都快崩了
又：
混沌出　　摇动天地　　造上（天）与下（地）
古时候乾坤　　分作阴阳
看地下　　四双龙鱼
四只鱼　　撑在山岭下
使他们伏而不动　　不使他们摆动鳍
使他们听　　不使睁眼
睁眼的时候　　山岭崩了　　地方震动
那年收成不好　　地方干旱
年头干旱　　道光就来（即位）

四、诗词与禅悟

时贤论诗与禅之关系，辄溯源于达摩。然慧皎创立《高僧传》，凡分十科。其四曰习禅，为之论曰："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光、昙猷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禅经虽短篇[①]，传入已自汉末。禅定为实践之本，东来诸僧"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其由来远矣。[②]

谢灵运已用"禅"字入诗，言："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诗》）晋简文前后，有若耶山帛道猷者，与僧竺道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因有诗曰：

>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③]

此更在大谢之前。杜甫《秦州积草岭》诗起句"连峰积长阴"，结云"茅茨眼中见"，实暗用此篇"茅茨隐不见"句。仇注不知也。其书札云："触兴为诗。"直是唐人兴象之说。此诗乃王孟之前导，可入《唐贤三昧集》。

僧徒能文事者甚多。隋时释真观[④]，八岁通诗、礼，和庾尚书林檎之作。时人语曰："钱唐有真观，当天下一半。"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江南儒士多被系。真观以名声满江表，谓其造檄，为元帅杨素鞫问。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令作《愁赋》。其辞略云：

> 愁之为状也，言非物而是物，谓无象而有象。虽则小而为大，亦自

---

① 宇井伯寿《译经史の研究》。

② 法京伯希和目藏文一二二八《为南天竺国菩提达磨禅师观门》云："何名禅定？答：禅为乱心不起，无动无念为禅定。何名为禅观？答：心神澄净名之为禅定，照理分明，名之为观。因有七种观门。"玄奘于显庆二年请入少林寺习禅，奏称："定慧相资，如车二轮，缺一不可。""少得专精教义，惟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奘师于定学，自觉仍有慊然。禅道重理入行入，尤贵实践。赞宁《宋高僧传·习禅论》，述其流变，言最扼要，兹不多赘。

③ 《高僧传》卷五《竺道壹传》。

④ 俗姓范氏。

狭而成广。……雾结铜柱之南，云起燕山之北；箭既尽于晋阳，水复干于疏勒。[①]

惜道宣不全录其文。姜夔称"庾郎先自吟愁赋"（《齐天乐》）不知同时尚有因事命题而非无病呻吟之《愁赋》，出于高僧之手也。南朝僧人之能诗者称惠休，经沈约品藻，钟嵘入于《诗品》，谓其"淫靡，情过其才"。宋武帝命还俗。唐僧人诗篇，大致见于宋元祐间菏泽李龏编之《唐僧弘秀集》十卷。起皎然，讫智暹。余会见南宋书棚本。其自序云："诗教湮微，取以为缁流砥柱。"后之步武者有毛晋辑《明僧弘秀集》十三卷。[②] 宋陈状元应行辑《吟窗杂录》，卷三十二，为古今诗僧，摘取佳句。如"一剑霜寒十四州"[③]，"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④]，为后人传诵者，皆与禅理无关。今观晚唐僧人所著《诗议》、《诗格》一类著作，皆从诗之体制、技巧、修辞着眼，未尝摭禅理以入诗也。

惟自六祖开宗以后，诗偈流行。诸大师于示法、开悟、颂古，动喜吟哦，为付法之用。禅宗本破除文字，至是乃反立文字，诗遂为禅客添花锦之翰藻矣。孟郊诗有《教坊歌儿》云："十岁小小儿，能歌得闻（一作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⑤] 似即对文溆"和尚教坊"一流之讽刺。[⑥] 若夫棒喝之篇，去竹枝不远，以"嘶"字贬之，已近戏谑。祖师之禅诗，具见《祖堂》、《传灯》、《会元》、《尊宿语录》等书，今不具论。曹山本寂，文辞遒丽，尝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宇内"（《宋高僧传》十三）。宗门尊宿好为偈诗，久成风气。至于《绕路说禅》之作，其言往往如咬铁餡，其义如重溟浩漾。[⑦] 不无佳制[⑧]，大都随缘而发，深入理窟。偶有意外之意，思外之思，去

---

① 《续高僧传》三十。

② 崇祯十六年刊，藏北京图书馆。

③ 贯休句，检元祐八年本《禅月集》，未见。

④ 元览句。

⑤ 《东野集》三。

⑥ 北宋遵式撰《往生西方略传》，记"唐德宗迎法照入内，用刘球绳床，教宫人五会念佛。"塚木教授引此为说。然《续高僧传》二十五《道仙传》，称其"薙草止容绳床"，盖僧人坐禅之具。

⑦ 《碧严种电钞》中语。

⑧ 五山诗僧，诗学诗功皆极深。所辑选之禅诗总集，如义堂周信之《祖苑联芳集》，蔚为巨观。又室町流行之（宋）松坡《江湖风云全集》可以见其别裁所在。至如崇祯时刊永觉和尚《禅馀内外集》，槜李曹谷序，称其"机辩自在，或痛快，或绵密，或高古，或平实，如摩尼圆映，五色不定，如巨海波澜，涌没何常"。兹揭其《示圆常上人四首》之一云："为峋山高鸟绝踪，石门天险孰能通。苦非铁额铜睛汉，只在青烟翠霭中。""铁额"四字可见禅家口吻。

怊怅述情甚远，以之警世牖俗则可，谓为真诗，则恐非诗人之所许也。[①]

诗僧之真能诗者，若唐之皎然，其句云：

> 白云供诗用，清吹生座右。[②]
> 花满不污地，云多从触衣。[③]
> 永夜出禅吟，清猿自相应。[④]

时谚谓“霅之昼，能清秀”，不愧谢康乐之后也。[⑤] 贯休句云：

> 荷缘冥目尽，一句不言深。野火烧禅石，残霞照栗林。[⑥]
> 真风含素发，秋色入灵台。[⑦]
> 唯宜高处著，将寄谢宣城。[⑧]

落想至高。故徐琰云：“味其语，正宜高处着眼，不当以诗僧看也。”（孙光宪亦云：“唐末诗僧，惟贯休骨气混成，境意倬异，殆难俦敌。”见天福三年《白莲集序》。）宋江西洪觉范，与东坡山谷游，著《石门文字禅》。其句云：

> 诗如画好马，落笔得神骏。[⑨]

真所谓“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外学之诗，与内学之禅，殊途而渐趋合一。故释达观（万历间人）为《石门文字禅》撰序云：

> 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未尝非文字也；

---

① 王渔洋尝举白杨顺禅师偈“落林黄叶水流去，出谷白云风卷回”，则不易觏。
② 《答裴集阳》。
③ 《酬秦山人》。
④ 《送清凉上人》。
⑤ 皎然名昼，湖州人，谢康乐十世孙。
⑥ 《寄山中伉禅师》。
⑦ 诗。
⑧ 《上王使君》。
⑨ 同庆长游草堂。

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名其所著曰文字禅。

言谲而理圆。禅弃文字，而复合于文字。僧人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定能生慧。诗即慧之表现，诗为定后所生，则定与慧，根本已是一而非二矣。[①]

至若诗家之得力于禅者，非仅以禅为其切玉刀而已。盖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敻。自司空图至于王渔洋，皆善用禅而不泥于禅，得活用之效。若严沧浪则依禅造论，得其契机，沾溉他人，而未能自食其果者也。

司空表圣之赞香严长老，曰："大师之旨，吾久得之。"又曰："一尘不飘，见大师力。"香严即邓州香严山智闲禅师，尝礼大沩山灵祐。祐召对茫然，乃将诸方语要尽焚之。曰："画饼弗可充饥也。"泣辞沩山去。于南阳忠国师遗迹[②]，芟草木击瓦砾自立，遂冥有所证。[③] 禅宗贵自辟户牖，沩山亦于敻无人烟比为兽窟处开创出门，求道之精神亦是如此。沩山论"道人之心……譬如秋水澄渟，淡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④]。仰山慧寂禅师于沩山处，因作圆相而顿悟。圆相之作，相传起于南阳忠国师[⑤]，即香严住处。故"圆相"代表沩、仰之禅学。又有所谓三照者，谓本来照、寂照、常照。香严为沩山法嗣，著有《三照颂》，其颂寂照之境界云："不动如山万事休，澄潭澈底未曾流。个中正念常相续，月皎天心云雾收。"形容已破初关，证入空寂之心境。以上即香严之宗旨及功力。表圣自言得之，则其参禅必有所得。观其《二十四诗品》，以雄浑居首。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虽用《庄子》之言，而环中即圆相之〇也。又其句云："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将心境着禅魔。"其不缚于禅，信能深知禅者。故以之论诗，则曰："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又云："近而不浮，远

---

① 赞宁于《习禅篇》论曰："经云不着文字，不离文字。非无文字。云不立文字，乃反权合道。"可明禅家不着文字之义。

② 《五灯会元》二：南阳慧忠国师，姓冉氏，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肃宗问："师在曹溪得何法？"师曰："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么？"其潇洒如此。

③ 此事见《宋高僧传》四十三、《景德传灯录》十一、《五灯会元》卷九，极著名。后代艺人每引用此典故。如董其昌是。

④ 《沩山灵祐禅师语录》。

⑤ 道泰及智境编《禅林类聚》七云："南阳忠国师见僧来，以手作圆相。"

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①] 此与沩山论道心之必如秋水澄渟，淡泞无碍，境界原自相应。谓其以参得之禅境，比拟诗境，无不可也。王昌龄《诗格》有象外语体及象外比体。表圣云"超以象外"，又进一步。昌龄论诗有五趣向：曰高格，曰古雅，曰闲逸，曰幽深，曰神仙。而僧齐己风骚旨格论诗有十体，一曰高古，二曰清奇，即合昌龄之高格与古雅为一。表圣《二十四诗品》中高古与清奇并同于齐己，似亦有取于同时缁流之论。[②] 故知表圣论诗，字面不及禅，而实有得于禅。

若严羽则不然，熟读禅灯之文，撏撦其语汇，正面借禅以喻诗。诗辨部分，其语最精，大都出自禅语。举例如次：

> 入门须正，若自退屈[③]
> 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
>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④]
> 自然悟入[⑤]
> 此乃是从顶𩕳上做来[⑥]
> 谓之直接根源[⑦]
> 谓之单刀直入[⑧]
>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⑨]

句句借禅为喻。严氏主旨在榻櫫当以盛唐为法，不可步武江西，持论颇近包恢《敝帚稿》。惜其本人非名诗家，不足以服人。自明讫今，非议者众。惟王

① 《与李生论诗书》。

② 考齐己《白莲》三有《寄华山司空图》诗"天门艰难险，全家入华山"，"瀑布寒吹梦，莲峰翠湿间"，可见原为交好。齐己入梁尚存。

③ 《五灯会元》十五：善暹禅师云："良由诸人不肯承，自生退屈。"

④ 《传灯录》十五：全豁禅师云："智与师齐，减师半德。"《五灯会元》三，"智"字作"见"，引作怀海禅师语。

⑤ "悟入"语习见。《宋高僧传·玄觉传》："觉唱道著明，修证悟入……号永嘉集是也。"

⑥ 《五灯会元》十八："介谌禅师踏着释迦顶𩕳。"《禅林类聚》："圜悟勤拈云：至简至易，最尊最贵。往还千圣顶𩕳头，世出世间不思议。弹指圆成八万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⑦ 《传灯录·永嘉证道歌》："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

⑧ 《五灯会元》九："（大沩山）灵祐禅师云：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直常。"

⑨ 《传灯录》十六："（雪峰）义存禅师：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扪摸?"又见《大涅槃经·井如来性品十二》、《禅林类聚》："东林总云：怪哉弘觉，二十年羚羊挂角，绝迹亡踪。"

渔洋则笃信之。谓“沧浪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乃不易之论”。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①] 纪昀云：

> 沧浪标妙悟，无迹可寻，有明惟徐昌榖高叔嗣传其衣钵。虞山二冯诋沧浪为呓语，不免挑之太过，叩寂寞以求音。陆平原之“思君如流水”刘舍人之“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则此论不倡自仪卿也。饴山（赵执信）坚执冯说，渔洋独笃信不移，亦有由欤。[②]

可谓平情之论。纪氏深疾山谷诗，谓其五古有腐、率、杂、涩四病（《书山谷集后》)。故以渔洋之说为正。渔洋论诗宗旨，见于《唐诗三昧集》，实祖沧浪之说，揭神韵二字，其内涵即承沧浪一脉。宜兴谢芳连著《诗庸》，渔洋序云：“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如‘雨中山果落’，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常建‘松际露微月’，刘昚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无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如此类语，渔洋著述中层见叠出。盖其晚年之定论。

伊应鼎编述之《渔洋精华录》，即师说之结晶，有云：“五言绝以古淡闲远为上乘。言景当如温伯雪子之目击而道存，信手拈来，不假思议也；言情则当如嵇叔夜之手挥目送，意在个中，神游象外也。故禅宗以可说为粗，以不可说为妙，是可说亦不可说为妙中之妙。”诗家以诗通禅之说，至是得到一个归宿。渔洋有《黄龙晦堂禅师》一诗云：“山谷大辩才，妙义皆糠粃，满院本犀香，吾无隐乎尔。”黄龙晦堂为山谷所从游。语次，问山谷“吾无隐乎尔”作何解。山谷诠释极精，晦堂皆不谓然，山谷不服。时秋香满院，晦堂乃曰：“闻木犀香否?”山谷曰：“闻。”晦堂乃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曾见五山诗僧漆桶万里毕生抄集山谷诗注，共二十一册，书名《帐中香》。[③] 其题句云：“香为江西诗祖焚，黄龙涎上起清芬。”即用此典故。古今笺黄之作，此最为繁富矣。《精华录》注云：“妙道只在当下，当面错过，但从故纸寻求，都无是处。当前花香，是现现成成，活活泼泼的一个。”禅只宜默照，

---

① 《池北偶谈》十七，《分甘馀话》二续责冯班之诋谋为风雅中罗织经；又《香祖笔记》屡及之，不具引。

② 《纪文达集·田侯松岩诗序》。

③ 天理图书馆藏善本。

而不宜辨析。近贤说诗禅者，至欲以曹洞正偏五位以说成诗之历程，不知作诗只是要触兴。“兴会神到，不可刻舟缘木求之。”[①] “诗而待于做，必无好诗。”况析之以五位，必无如此齐整。如是，复为诗披上一副禅学桎梏，何异以禅缚之?

吴兴董说，明亡为僧，著有《禅乐府》。以禅林故事制为乐府，大率三字为题。如《风幡动》云：

> 不是幡，不是风，蟭螟眼里击金钟。不是风，不是幡，一片征帆两岸猿。非幡动，非风动，梅花堕井泥牛痛。风动非，幡动非，柳絮悠扬信口吹。

纸上机锋，充满禅趣。《饶州荐福退庵休禅师上堂》：“风动耶?幡动耶?风鸣耶?铃鸣耶，非风铃鸣，非风幡动，此天与西天，一队黑漆桶。”(《五灯会元》)理亦如是。清初聂先与曾王孙合编《百名家词》，先自署那罗延窟学人，为之序曰：

> 余不知词而知禅，请以禅喻：五祖举示佛果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果入室云：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此绝妙好词也，近于丽纤。政黄牛云：解空不解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清寒。端师子云：我本潇相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此绝妙好也，近于豪宕。洪觉范云：秋阴未破雪满山，笑指千峰欲归去。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淡冶。首楞严曰：佛谓阿难，譬如一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非妙手，亦不能发。今诸公之词，各以妙指而发妙音。……尽使摸象之盲人，扣钟之聋者，忽如眼顿开，疾雷破柱，直得香象渡河，华鲸夜吼，岂不快哉。[②]

摘禅家妙句以证词境，妙用直喻暗喻，亦是一篇绝妙好文。宋人词集已以禅命名，陈与义集曰《无住词》，杨无咎集曰《逃禅词》。清初纳兰成德名其集曰《饮水》，取道明禅师语“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探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曹贞吉名集曰《珂雪》，王增孺《佛事文》谓天尊“焕发青莲，容与

① 《池北偶谈》十八。

② 《百名家词》题长水曾王孙道扶，庐陵乐读居士聂先晋人纂定。康熙缘荫堂本收《百名家序》，共一百卷，京大藏本只三十卷八册，有曾王孙序，而无聂先此序。

珂雪”。敦煌咒生偈“目净修广若青莲，齿白齐密由珂雪”[1]，亦取释典。

厉樊榭《齐天乐·秋声》警句：“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如《指月录》中语。故谭复堂评曰：“词禅。”董潮东风齐著《力一词》，有句云：“石坛风静，幡影书沉。阑角嫣然一笑，凝眸处，黛浅红深。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凄馨秀逸，说者谓为“真词禅”也。[2] 俞樾《采桑子》隽句：“死是禅心，活是仙心，一样工夫两样心。”不死不能活，颇能道破妙处。[3] 词心之通禅，与诗心之通禅，固无二致也。

五、文评与释典

刘彦和撰《文心雕龙》在南齐之世，审文体，辨声律。其人虽浸淫于内典，而书中只举“般若”一词，间用圆字论诗，未尝以禅理比附文事也。梁武天监六年，敕僧旻于慧轮殿讲《胜鬘经》，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卷[4]。神清《北山录》二：“梁太子网撰《法宝聊璧》二百卷，沙门僧祐、僧旻、宝唱、智藏咸皆缵述，颇多条目。”刘勰参加者，必此一工作。临川王即梁武帝六弟萧弘。勰时为其记室，仍以精通释典著闻。《文心》之作，初似未为人所重。然若干诗文评常用词汇，刘氏已开其先。举例言之：

兴　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十八：“右丞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兴来、神来，天然人妙。”此虽同于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文有神来、气来、情来”之语，然《文心·神思》赞已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兴来”二字出此。

味　钟嵘《诗品》：“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又评永嘉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以后司空图亦言“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诗味之论，发轫于此。然《文心》屡提及“味”字，如云：“繁采寡情，味之必厌。”[5] 此谓味出于情。又云：“机入其巧，则义味自生。”[6] 又云：“道味相附，悬绪自接，

---

① 英伦斯坦因目五六四五。

② 《两浙词人小传》。

③ 黄龙有四句云：“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圜悟云：“死水里浸杀。”

④ 《续高僧传》五《僧旻》。

⑤ 《情采》篇。

⑥ 《总术》篇。

如乐之和，心声在协。”[1] 举出道味、义味两词，皆与佛理无涉。

印度诗学，向来有 rasa 与 alamkara 二派。前者主情，后者重采。rasa 汉译为味，被目为诗魂（soul of poetry）。此派诗说，从未介绍入华，钟、刘辈之言味，了不相关。

唐贞元初，僧皎然居东溪草堂，“欲屏息诗道非禅者之意，因著《诗式》，既又寝而不纪”[2]。其书今存者恐非完篇。然自彼以后，僧齐已[3]、文彧（《诗格》）、虚中（《流类手鉴》。齐己《白莲集》与虚中上人来往诗，不一而足）、桂林僧、淳大师[4]、保暹[5]相继有所造述。其时缁流著诗格一类之书，中唐以来，成为风尚，似皎然有以启其先。

宋人喜以禅喻诗，每借用内典词语（loan terms）。此种“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向谓之格义（《宋高僧传·竺法雅传》），以释典事类比附诗说，盖亦格义之流亚。

（一）借用南北宗以喻诗文派别

六朝以来，南北对峙，风气既殊，互为轩轾，《北史·儒林传》已论南北学风之异。清许宗彦《记南北学》谓经学自东晋以后，分为南北；自唐以后，则有南学而无北学（《鉴止斋集》卷十四）。唐神清《北山录》第四论文学分南北，谓“宋风尚华，魏风尚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同书第三论佛学分南北宗云：“后诸学者以文殊为法性，以慈氏为法相……自伐其美，致使西极东华。人到于今，有南北两宗之异也。故南宗为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体性，德相业用范围法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犹指诸掌矣。”此中唐佛教折衷之论也。[6] 然自禅宗崛起，能、秀分途，能乃度（大庾）岭，“天下散传其道。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语见赞宁撰《神秀传》）荐福弘辩禅师答唐宣宗禅宗何有南北之名，云：“开导发悟有顿渐之异，故云南顿北渐，非禅师本有南北之称也。”（《禅

---

① 《附会》篇。

② 《宋高僧传》二十九。

③ 著《风骚旨格》。天理大学藏《永乐大典》卷九百九“诗”字号作《风骚诗格》，已有印本；宋人之《吟窗杂录》作“旨格”，宜参校。

④ 《诗评》。

⑤ 《处囊诀》。

⑥ 神清于元和中终于梓州慧义寺，见《宋高僧传》六。

林类聚》一）此乃与神清所揭西极（印度）东华（中国）共同之南北宗，大异其趣。然禅门南北宗之影响独巨，人多接受此说，而寖忘旧义矣。

空海大师于贞元二十年十二月至长安，留唐三载。归国著《文镜秘府论》，自云："阅诸家格式，勘彼同异。"故王昌龄《诗格》、杼山《诗议》，皆在甄采之列。其书南卷《文意》篇，曾借南北宗一词以论文云：

> 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

以司马迁属之北宗，贾谊属之南宗，汉土旧无此说。谊原籍洛阳，以南谪楚土，遂以隶南宗。篇中"迁传于贾谊"一语，年代明有舛错，各本似皆如此①，未喻其故。《文意》上半取王昌龄，下半取自皎然，众所共悉。若其眼心抄起自"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句，共四十四凡，比《文镜》条理更为清晰。昌龄《诗格》存于《吟窗杂录》者已非完帙，又有"诗中密旨"，俱无此段文字。故知以司马迁为北宗，贾谊为南宗，必非出自转引，谅为空师自撰，揣其意，似以骚人怨刺者为南宗，风雅不失其本者为北宗。

诗论之区分南北宗，见于题贾岛作之《二南密旨》。撮录如次：

> 论南北二宗　宗者，总也。言宗则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
>
> 南宗例　如《毛诗》云：林有朴樕，野有死鹿。如钱起诗：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
>
> 北宗例　如《毛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如左太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潘魏君。

观其例句，似以虚而尚比兴者为南宗，实而用赋体者为北宗。

又释虚中著《流类手鉴》云：

> 诗有二宗：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吟窗杂录》卷十三）

---

① 参小西甚一《考文篇》，又参本文末附注。

似以见题先者为南宗，见题后者为北宗，前者顿而后者渐，意颇暧昧，未知然否？

词家亦有借南北宗立论者。清张其锦为《梅边吹笛谱序》云：

> 南宋词有两派：一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所见颇新。以清空属南宗，豪放为北宗。惟合白石与梦窗为一派，似有可商，未为确论。

董其昌论书揭南北宗，亦假禅立说，最为脍炙人口。他若张作楠之《梅簃随笔》，辨道家有南北二宗（见《越缦堂读书记》），剽袭陈说，不免牵强。论文说诗，假南北宗立义者，代有其人。其实与释氏原旨无关，只是借喻而已。唐人假南北宗以拟顿渐，记有僧问越州石佛晓通禅师："如何是顿教？"师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渐教？"曰："云生碧汉。"（《五灯》卷十六）以景色比方，亦饶诗意。取南北宗以喻诗，陈义不过如是已耳。

（二）借禅宗三句语说诗

叶梦得《石林诗话》，"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流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涵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浅深以是为序。予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当为涵盖乾坤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当为随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门远，五月江深草阁寒'，当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同参。"按云间乃云门之误。仇注杜诗卷六，录此段于《题省中壁》诗后，仍作云间，未之是正（新印中华本）。《五灯会元》十五：鼎州德山缘密禅师，为云门文偃禅师法嗣："上堂我有三句语，示汝诸人。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作么生辨？若辨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文偃师尝说过："河里失钱河里摝，上堂涵盖乾坤目。"涵盖乾坤原文师语，未尝举示例句。以后云门各禅师多祖述之。

信州西禅钦师僧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师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断众流句？"师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曰："春生夏长。"

鼎州普安道禅师三句颂："涵盖乾坤曰：'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见，头头用不伤。'截断众流曰：'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随波逐浪曰：'辨口利舌问，高低总不亏。远知应病药，诊候在临时。'"

日芳上座[①]僧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

师竖起拄杖。僧问："如何是截断众流句？"师横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掷下拄杖……

南康军云居大庆海印禅师（云盖颙禅师法嗣）僧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师曰："合。"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曰："阔。"曰："如何是截断众流句？"师曰："窄。"……庐山归宗慧通禅师[②]僧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师曰："日出东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断众流句？"师曰："铁山横在路。"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曰："船子下扬州。"

云门说偈最饶诗意。此三句语例子甚多，不能备录。上举诸师答案各异。或举现成句，或别出心裁，或示以拄杖，或喻以空间[③]。开悟处不同，得力句亦随之。黄檗志因禅师说："得力句在脚，一步进一步。"[④] 为学经历亦是如此。三句语原是空间不同，未必有何先后可说。随波逐浪句即景而生，所谓"有时入荒草，有时上孤峰"[⑤]。杜诗如"林花着雨，水荇牵风"、"侵陵雪色，漏泄春光"等名句，触处皆是。此三句语不限于杜少陵，其他大家莫不有之，在读者善自体会耳。

（三）向上说及正眼说

王灼《碧鸡漫志》论："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东坡有极高明之襟抱，抒写为

---

① 开福贤禅师法嗣。

② 大沩宥禅师法嗣。

③ 说随波逐浪是阔，乃从广度看；说截断众流是窄，乃从长度看。故是空间义。

④ 《五灯会元》十六。

⑤ 临安玄妙禅师语。

词，不同凡近，如宗门之极诣，故以“向上”比况之。其实不独倚声为然，其诗亦能指“向上”一路。严沧浪《诗辨》亦点出诗宜“向上”。向上一词本为禅宗常用语。《传灯录》七：“宝积禅师上堂示众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挂影。”《五灯会元》十二：“东京净因禅师谓善，华严有千圣不传，只向上一路在。善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汝且向下会取。”又同书十三：“越州干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得，始解归家稳坐，须知更有向上一窍。”又十五：“明州育王常坦禅师：僧问：如何是有中有？师曰：金河峰上。曰：如何是无中无？师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竞发，百鸟啼春，是向上句；诸佛出世，知识兴慈，是向下句……”向上一窍不易做到。“潞府妙胜臻禅师：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一条济水贯新罗。”元楚石法师题画句云：“若论向上宗门事，尽山光水色中。”[1] 禅家句子有向上与向下二种。王灼用向上一词以形容东坡之造诣，盖以其湛于禅理也。东坡《题李之仪诗后》云：“每逢佳处辄参禅。”正是夫子自道。而李之仪句云：“悟笔如悟禅。”[2] 又云：“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3] 其时学人已深知诗禅合一之理，然能打得过者莫如东坡，故山谷称“东坡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胜语”。盖其作品，处处充满智慧。清刘熙载亦谓“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语最中肯。其在庐山《赠东林总长老》[4]、《题西林壁》[5]，已与偈语无别。南迁而后，与缁流往返最密。凡有所作，活泼禅机，跃然纸上。且每自言能下转语，如《咏马祖》“岂堕山鬼计”、“戏留一转语”[6]，下语已高马驹一著。又如：“一言破千偈，况尔初不语。可怜一转语，他日如何举。”[7]《传灯录》：“省念禅师传到处举似人。”坡诗：“他日如何举似人。”彼深懂破偈，举似种种家活法，妙处尤在命意。漫举《贪泉》一诗示例：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为我廉，

---

① “向上”资料，见《禅林类聚》三“桥路”一项，今不备录。

② 《姑溪居士后集》一。

③ 《与李之言书》。

④ 即照觉大师。警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尽人皆知。大鉴禅师居集有“一溪说”，谓溪为众水所归，宣演妙音，全文即申东坡“溪声便是广长舌”之义。

⑤ 即“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诗。

⑥ 《虔州尘外亭》。

⑦ 《和江行见桃花》。

何以此名为？有廉则有贪，有慧则痴。谁为柳宗元？孰是吴隐之？渔父足岂洁？许由耳何淄？然后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毁誉有时尽，不知无尽时。揭来廉泉上，捋须看须眉。好在水中人，到处相娱嬉。

直是说偈，明白晓畅，语语如摩尼珠，横说竖说，无所不宜。岂止下一转语，真是无中生有。孰谓诗不可说理耶？

山谷之于禅，参证特多。范温记其言曰："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①] 又云："句中有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温用其说作《潜溪诗眼》一卷。[②] 法眼为禅家常谈，文益示寂后，谥曰法眼，被称为法眼宗。麻谷问临济："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③] 汝州风穴禅师上座，哮吼一声，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着？觑着即瞎却渠眼。时有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即便戮瞎。"曰："戳瞎后如何？"师曰："捞天摸地。"[④] 宗慧初参云门，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纸撚无油。"[⑤] 僧问江陵重善禅师："如何是正法眼？"师曰："夜观乾象。"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日里看山。"此类不回答之回答，不胜偻指。[⑥] 究竟什么是正法眼，不须说破。如范温说山谷直以"韵"为诗之正法眼，已病在说破了。山谷言能用翻着袜法，似太注重技巧[⑦]，不如东坡有得于大全，任其自然。山谷悟入在诗中之韵，以此为句中之眼，不知司空图已论韵外之致，味在咸酸之外。韵外之韵，比韵又进一境。《百喻经》讽有人因主人益盐，而"便空食盐"，正因黏着于味，而不能外却咸酸之味。尚韵而不以外韵，病亦如是！山谷誉东坡学高而韵胜，正以其有韵而不黏于韵，此其所以高绝，山谷所以叹为不可及。坡、谷优劣，亦可于此见之。

（四）境界说

拈出境界二字以论文学，近人每误认为倡始于王静安之《人间词话》，余

---

① 后此严羽称"学诗者以识为主"，全袭是说。

② 《永乐大典》卷八〇七诗字引之，又见《苕溪渔隐丛话》。

③ 《五灯会元》十一。

④ 《五灯会元》十一。

⑤ 《五灯会元》十五。

⑥ 法眼资料，参《禅林类聚》十"心眼"项。

⑦ 五山诗僧虎关师炼论诗，眼力甚高。山谷翻着袜法，取之王梵志。《虎关诗话》论诸家拟王梵志云："盖梵志者，意到句不到。东坡放而不警矣，悟警而不精矣。只涪翁之论亦佳矣，然无句。"其说可供参考。

二十年前尝撰平议。嗣见观堂已自悔其少作①。其实境界说，唐宋人言之甚多，且与释氏有密切关系。兹略论之。

宋李耆卿《文章精义》云："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因之有空境界、鬼境界、仙境界诸名目。唐僧皎然《诗议》则标出"境象"一义云：

> 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
> 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
> 有闻而不可见，风也；
> 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
> 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
> 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

判境有虚实，而区为景、风、心、色四者，统称曰境象。又论对法有"含境"一项。例句是："悠远长怀，寂寥无声。"又《诗评》有"取境"之说云：

>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禅家造偈，原即取境借镜，宜杼山之有深契也。②

禅家喜用境界一词。例如：

> 金陵天宝和尚："僧问：白云抱幽石时如何？师曰：非公境界。"韶州东平山洪教禅师："僧问：如何是向上关？师竖起拂子。僧曰：学人未晓，乞师再指。师曰：非公境界。曰：和尚岂无方便？师曰：再犯不容。"③
>
> 净因禅师答善华严问向上一路曰："汝且向下会取。"善曰："如何是实所？"师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师曰："任从沧海变，

① 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一九。

② 《吟窗杂录》中王昌龄《诗格》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题白乐天之《文苑诗格》，亦论依带境及抒析入境等法门，知唐代诗论已喜言境，渊源甚早。

③ 《五灯会元》十五。

终不为君通。”[1]

似禅家对境界用法，有界限意味，不可逾越。白云抱幽石，原为大谢诗句，此境非僧所宜，向上一关非俗子可到，故师不指引，则境界与境象义略有别。

五山僧别源禅师《南游集》，其前有玲珑岩主跋云：

> 诗胜境则境归于诗，境胜诗则诗不入境。诗与境合，见诗即见境；境与诗合，见境即见诗。苟不然，则诗、境两失。[2]

已畅论诗与境之分合。

涿州纸衣和尚[3]问临济和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两俱夺，人境俱不夺”四境界？复为之颂。兹举四境中两禅师于前二境之隽句如下：

夺人不夺境	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
	骊珠灿烂，蟾桂影婆娑。[4]
	垂发白如丝。[5]
夺境不夺人	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
	日照寒光淡，山摇翠色新。[6]
	塞外绝烟尘。[7]

完全用比兴方法，作偈正如作诗。王静安言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夺人不夺境即是无我，夺境不夺人岂非有我？如此比拟，未必完全相符。然人我之分及境之予夺，释氏已尽分析之能事，理复圆融。后之说者，难免拾其牙慧矣。

《人间词话》喜举警句以显境。明胡应麟论杜诗之变化云：“变主格，化

---

① 《五灯会元》十二。
② 《五山文学全集》，733 页。
③ 即克符道者。
④ 纸衣颂。
⑤ 济答。
⑥ 纸衣颂。
⑦ 济答。

主境，格易见而境难窥。”因举锦江天地、玉垒浮云等为字中化境，绝壁过云、疏松隔水为句中化境，昆明池水、风急天高为篇中化境。余谓字、句、篇之勉强划分，殊属难言。然化境则神动天随，从心所欲，因外境之物色不同，所构成之境界亦异。诚如黄龙慧南禅师云：“摩尼在掌，随众色以分辉；宝月当空，逐千江而现影。”岂主变化之故常？何有人我之区？以之论诗、论词、论禅偈，其理固如一也。

前人假释典以论文，其说如五色缤纷，兹以篇幅所限，不能多述。若钱谦益之立鼻臭诗香观之说[①]，而东坡已屡言鼻观[②]；方以智论词意必中道皆到[③]，而东坡亦先有中边皆甜之论[④]。意看似创而实因。难怪明人为东坡编《禅喜集》[⑤]，信乎其有得于禅！王安石亦湛于禅学，文集七十八《与蒋颖叔论禅书》可以见之。山谷《跋王荆公禅简》云：“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有足者。”甚致钦佩。今观其《和俞秀老禅思词》（见《词品》二），仍是沾着于禅，不若东坡之翛然不为禅缚。然北宋以来，诸巨公皆躯禅悟，以诗通禅，开出无数法门。为文评者，遂有崭新之说。其源出于释典，有待于抉发者尚多。正如坡公云：“八万四千偈，如何举以人。”兹但示其一隅而已。

以上五次讲论，从名号说到境界，相去九万八千里，拉扯得很远，未敢说在旁通、横通做过一点功夫，只是黏着一边，更谈不到“得其环中”！禅林有偈云：“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可作棒喝。我只希望在文学解悟上，和大家一同找出“向上”一路。

附注

《文镜秘府论》南卷此条，林宏作君曾请高野山大德静慈圆氏代遍查名本，据称皆作“迁传于贾谊”。高野山三宝院传下之古写本亦然。正智院与栂尾年高山寺二本原皆不全，合之成完帙，亦作“迁传于贾谊”。此语殆一时偶尔笔误。

原载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三二册，1980 年

---

① 香观说书徐元欢诗后及后香观说。

② 东坡《和黄鲁直烧香》云：“且令鼻观先参。”又《题杨次公蕙》：“云何起微馥，鼻观已先通。”观鼻端自谓之鼻观，出《楞严经》。钱说似受东坡影响。

③ 《龙眠风雅》引述。

④ 《东坡题跋》。

⑤ 徐长孺纂在《禅林丛书》。

中国文学在目录学上之地位

"目录之学是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 这指出目录学在治学上的功用及其重要性。目录学本身的任务，是讨论典籍分类之专门学问，我们可以从历代典籍类别，看出某一种学问演进的过程。章学诚所谓"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这方面，目录学是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在目录学上表现着什么？从目录书的分类系统，可以看出文学变迁的大势，这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该是一项重要课题。

一、文学范畴在目录分类上之演进（从诗赋略到集部）

中国目录学正式成立，在西汉成帝时候。刘向撰《别录》；向子歆继父业，写成《七略》；班固根据它，作《汉书·艺文志》。他类次群书为六个部门。第一是辑略，即群书的总序。其余六略中，经书称六艺略，子书称诸子略，文学作品称诗赋略。班固《两都赋序》谓成帝时奏御的赋，千有余篇，赋家的梗概，在《艺文志》中可窥见一斑。晋时荀勖作《中经簿》，改变七略之法，分为甲（原为六艺）、乙（诸子、兵书）、丙（史书）、丁四部。丁部所收，为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时候恰值汉代人像画的兴起，在图像上题赞，极为风行，新的作品众多。像曹植的《画谶》，即其一例。汲冢书详细见《晋

①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书·束皙传》。《穆天子传》是其中有名的一种。这可说是地下发见的新资料。把它和诗赋及图谶放在一起，入于丁部，可见汉时诗赋一项，已不能再包括其他种类文学作品了。至东晋初年，李充为元帝编书目，开始将乙、丙二部互调，乙为史而丙为子，惟诗赋仍列丁部。[①] 自宋至隋，除《七志》、《七录》之外，其他目录，都以四部为名，沿用李充的次序。梁元帝时，集诸贤校理秘阁旧书八万卷，已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

> 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菩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

则梁时的四部，已通用“集部”一名。

杨修作《荀爽述赞》云：

> 裁而集之，独说十万余言。（《类聚》四七）

自作之集称“录”，起于曹植之《前录》。《类聚》五五引其序云“册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似即指其作品自行编集者。

先是刘宋间，王俭作《元徽书目》仍用四部体制，其后改撰《七志》，其第三题曰《文翰志》，专收诗赋之类（《隋书·经籍志序》）。及梁阮孝绪撰《七录》，其第四曰《文集录》，亦收诗赋。他的《七录序》云：

> 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犹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

可见阮孝绪的时候，是集名盛行的时代。他所以变翰为集，事实上是适应当时的需要。梁时文词总谓之集，这一有趣的现象，下面将加以说明。

二、别集、总集之滥觞及其种别

别集始于何时？或云肇于东汉。姚振宗《隋志考证》，在《东方朔集》下

---

① 参《文选·王文宪集序》李注引臧荣绪《晋书·李充传》。

注云："自著论设客难以下诸篇，皆刘向所录，见于《别录》。然则《七略》、《别录》载有朔集审矣。……是知别集之体，亦始于向也。"按西汉至东京，乃有专集，实多出后人追录。观汉武命所忠求司马相如的遗书，魏文诏天下上孔北海的文章。他《与吴质书》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复云："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陈寿亦奏上《诸葛武侯集》，这些都是出于后人追辑成书。《文选》任昉作《王文宪集序》末云：

> 是用缀缉遗文，示贻世范，为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录如左。

这是王俭死后，其集由后人编集而成的一篇说明。可见下至刘宋，个人的文集，还是出于后人追录编辑而成书的。

《四库提要》集类小序云："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集》。"其说本诸《南史·张融传》。其传云："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其故，融云：盖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所著录，融除《玉海集》外，尚有"《大泽集》十卷，亡"。可见南齐时，已开始有自名其集的风气了。

《诗经》、《楚辞》为最早的总集，人所共悉。《四库提要》总集类序云："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晋挚虞的著作，原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志》二卷，《论》二卷。见《隋书·经籍志》，《晋书》本传称："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他的《文章流别》一名下面，本有"集"字。总集之以集为名，似乎以他为最先。[①] 至于仿佛《文选》一路录选文章的编著，晋初杜预有《善文》五十卷，见隋志著录。这书名不甚显著，《史记·李斯传》宋裴骃集解云："辩士遗秦将章邯书，在《善文》中也。"《善文》即杜预此书，似唐时尚存，章怀太子《后汉书注》曾加引用（《马皇后传》）。揆以年代，这当是最早的文选（清成瓘《篛园日札》已有此说）。

晋宋以来，盛行分体的选文总集。晋（散骑常侍）王履《书集》，谢灵运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七"集》十卷及《策集》等，谢庄有《碑集》、《赞集》、《诔集》等，惜皆失传。

一人之集有区分部帙和种类的，隋志所见，像：

① 《旧唐书·艺文志》，荀勖有《新撰文章家集》五卷，惜内容未详。

梁武帝有集二十六卷，又有诗赋集二十卷，杂文集九卷；又别集目录二卷。梁元帝有集五十二卷，又有小集十卷。

“别集”一名见此，它的涵盖，应是指集外之文，和《七录》指某人的专集有些不同。

江淹、徐勉各有集十卷；陶宏景有集三十卷，又有内集十五卷。

这如先秦诸子书分为内外篇一样。

王筠每做一官，便编成一集。计有《洗马集》十卷，《中庶子集》十卷，《左佐集》十卷，《临海集》十卷，《中书集》十卷，《尚书集》十一卷。[①] 梁时自编成集的风气，已达到鼎盛期。释氏书亦有法集（如梁宝唱的法集）。难怪阮孝绪说“顷世文词，总谓之集”了。

梁世集部的盛行，可见当日文学发展，已到了极高峰；另一方面，亦可看出中国文学成熟之早。

三、集部名称之更张与文学领域之开拓

自汉至梁，集部名称的演变，我们试加以举出，再看后代目录家采用和沿袭的情形：

（一）诗赋略　见于汉志。清孙星衍《祠堂书目》分书为十类，第十曰“词赋”。以词赋代集类，不称诗赋，只此一例。

（二）文翰志　晋李充始作《翰林论》，王俭《七志》乃立文翰志以代诗赋。翰即翰藻[②]，萧统《文选序》：“义归乎翰藻。”这都是用“翰”来代表文学作品。翰亦笔也。蔡邕《笔赋》：“性其翰之所生。”

（三）文集录　阮孝绪《七录》所立，与经典录、记传录（史）、子兵录、术技录五者为内篇；仙道录、佛法录二者则为外篇。

（四）集部　颜之推称为集部。“唐武德初，魏徵收东都图书，时以王湾

---

① 见《南史》王昙首附传云：“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

② 潘岳《射雉赋》云：“敷藻翰之陪鳃。”李善注：“藻翰，翰有华藻也。”

等治集。”（《马怀素传》）《隋书·经籍志》简称为“集”。毋煚《古今书录》（即旧唐志）丁部称曰“集录”，宋李淑《邯郸图书志》称“集志”，清《四库全书》仍称“集部”。

其他有称为“文类”的。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分十二类，第十二为文类，以“文”代“集”。郑寅《郑氏书目》共分七录，其六曰“文录”。这一名称，很少被人采用。

集部中还有一些细目需要讨论，在目录书所见有可注意之要点，析言如次：

（一）自《七录》开始有“文集录”之名，又分为三类，曰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集部内涵因而确立。后人陈陈相因。都把楚辞单独列为一项，惟《文献通考·经籍考》，改楚辞类为诗赋类，回复汉志的旧称。

（二）《新唐书·艺文志》有文史类，宋《崇文总目》亦有文史类，《宋史》、《明史》艺文志皆仍之。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即被列入文史类。陈氏《直斋书录解题》亦有文史类，晁氏《读书志》则改名为“文说类”。故四库始别立为“诗文评类”。

（三）尤袤《遂初堂书目》始于集部立乐曲类，《书录解题》作“歌词类”，分为乐府、词、曲三项。《文献通考》则称歌词类，将乐曲独立起来。

（四）小说自《七略》以来，列入诸子略十家之一，历代因之，隶属子部，孙星衍《祠堂书目》十二类，列小说于最末，为第十二，把它独立起来，甚有见地。

（五）明徐𤊹《红雨楼书目》子部汇书类下列传奇类。集部则分“集类”、“总集”、“总诗”，又有“词调类”与“集类”并列。传奇入子部，是把它和小说同样看待的。

集之一名，所有文学作品，很难完全包括。清代四库，仍《七录》旧贯，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词曲、诗文评五类。其实《楚辞》应入总集，而别集、总集仍在集的大共名之下；词曲类之分立，《遂初堂书目》之立乐曲，已启其端；诗文评即《唐书》以来所谓文史类的另一名目。至于小说一类，循向来旧辙，入于子部，仍是未能摆脱旧分类法的羁绊。

四、余论

汉代以诗赋领头。其时还是以某种流行的文体，作为文学的代表。

六朝以来，才有概括性的名称。“文翰”一名之外，亦盛称为“文章”，这似乎和宋时文学独立价值的提高，很有密切关系。宋文帝时，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分立，这是一桩极重要的事情。至于文章一名施用以总称文学作品，隋志晋荀勖的“新录文章家集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列史部书目类）已开其端。挚虞因之作《文章流别》及《文章志》四卷。是时其他著作，如：

宋明帝《江左文章志》

沈约《宋世文章志》

顾恺之《晋文章纪》

丘渊之《文章录》（《世说》刘孝标注引）

傅亮《续文章志》

都是以“文章”为书名，可说是早期的断代或地域性的文学史，可惜各书都没有流传下来。这时文和笔的观念，已有明显的分界，纯文学的地位，至此已经奠定。梁世集类的盛行，这一风气的成长，和文章独立价值的提高，似乎不能说是没有关联的。

集部确立以后，自梁至清，一成不变。别集的观念，过于侧重个人，所谓某人的集，即是某人作品的纂录，这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以某一领导人或某一学派的代表为主而称为某子，本质上实无二致。所以六朝的“集”，可以说是先秦的“子”的变相。同时，这种以作家为主，不以文体为主，每一作家往往兼擅各体，每一集中，各体都有之。这与其说是某一个人的别集，毋宁说是某一个人的总集。上举两端，前者可谓个人主义，算是“集不异子”；后者可谓兼通主义，等于“别不离总”。这样看来，“别”仍是“总”，虽则某些作家的成就，有的在诗，有的在文，但精力却不能集中在某一项。由于集的观念，太侧重个人的地位和各体的兼通，对于文体的发展，似乎反成为一种阻力。中国文学的早熟，在某些地方，反变为停滞，集部的重视，对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恐怕是其中一重要原因，故为指出，附带在这儿加以讨论。

原载《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会刊》

汉字与诗学

一、从 Ezra Pound 说起

Ezra Pound 在他的名著 *ABC of Reading*，收入 Ernest Fenollosa 所作 The Chinese Writer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一篇，他截取其大意，写成 The Chinese Ideogram。他只从字形着眼，认为：

> The Egyptian finally still used abbreviated picture to represent sounds, but the Chinese still use abbreviated pictures as pictures, that is to say, Chinese ideogram does not try to be the picture of a sound, or to be a written sign recalling a sound, but it is still the picture of a things of a thing in a given position or relation, or of a combination of things. It means that thing or action or situation or quality germane to the several things that it pictures.

因此他指出古代中国人以图形来制字，是根据一般人所知的事物来造字的。他强调 Fenollosa 之说，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语言是 right way，had to stay poetic。可见汉字的结构和诗学关系之巨。可惜 Pound 对于汉字未有深入的研究。汉字不仅重形，同样亦重声。汉字是由音符和形符共同组成，而以形声字占绝大多数。一般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这只是从形体结构这一角度

来看问题，其实汉字很早已脱离表意阶段。殷代的甲骨卜辞差不多大部分是借音字和形声字，仅有表音的作用，已离开了形构的示意作用。

所以汉字是以音符为主，形符为辅。在铜器时代，一个字有许多异形。尽管形符可以变动不居，而音符所代表的声音则比较固定。因此，不能完全从字形方面着眼来谈汉字。这一点 Pound 是不了解的。

二、最古的记号与汉字

关于汉字产生的年代，目前已有最新的考古学资料，可以证明。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陶符，经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 4800—前 4200 年。有人认为它只是孤立的符号，不可能是文字；实则其中符号有的出现于他处。像 T 字，亦见山西夏县的陶器，南至广东清远和香港的陶文，亦有相同者，至于 X 字是表示数目的五，几乎各地陶文很普遍地流行。这说明它和后来的文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又陕西临潼姜寨，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4000 年左右，陶器上刻画符号有（像羊头带角形）诸形。甘肃洮河唐汪川的彩陶豆上绘有，像二人并跪形，显然是殷文字“比”或“从”的前身。又山东大汶口晚期陶器，年代为公元前 4300—前 1900 年，其上刻有符号表示太阳上升，出于地面（有人认为是“旦”字），这很像 Sumarian 表示太阳（sămăs）的（utu）和埃及象形文表示 horizon 的，其文字结构是由二个以上的单文组成。这些很早的零星陶器上的记号，可以了解中国文字的诞生，应推前至公元前 4000 年。[①] 这和近东对于文字前身，由于近年专家探讨的结果，知道由 token 系统的⊕（计算“羊”的记号）发展而为文字，可以推前五千年，都是人们对世界文字起源问题的新知识。

三、最早用韵的叙事诗

《诗经》的雅颂，无法确定其年代。铜器铭辞，在西周时已通行用韵。大丰簋是周武王时器，许多地方用韵。较长的铭辞，为近年陕西出土的史墙盘，周共王时器（公元前 922—前 898 年），可以作一篇周颂来读。全铭大约六十四句，共二百八十字，多用四字句式。通篇除最后一段之外，都有押韵。《诗

---

① 关于中国远古陶文的说明，另有专篇讨论，故不注明资料来源。

经·周颂》最长的仅有《载芟》一章，共二十一句，此已倍之；《大雅·皇矣》八章，章十二句，共九十六句，与此盘铭相当。我们可以断言西周中叶以后，这样长篇用韵的叙事诗，已经形成，是没有疑问的。史墙盘中大量使用复词，更具备诗颂的形式。兹录数句如下以示例：

曰古文王，初戾各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翩圉（威德刚武曰圉）武王，聿征四方。

盘铭中所见复词已有下列各类：

（一）同义平行。如：楚荆。

（二）反义相义。如：上下。

（三）名词上加形容词。如：上帝、懿德。

（四）联绵形容字。如：舒迟。

这些即后来所谓"骈字"。可见复词的发展，在西周为发轫期。汉语由单字走向复词是必然的道路，一直至今尚在继续发展；而诗的构成，骈字正是最重要的骨干。

四、单音字与复词

汉语是单音语，文字又是单音字，这是汉字的特性。由于基本上一字一音，在音节结合容易取得齐整与和谐。但汉字与汉语是游离的：第一，字和词不能完全相应，单音的字只是词组成的一部分；第二，汉字本身不能够正确表示语言，许多口语没有相应的字，已造出来的字，又有古今字及地域性的不同。所以形成语言与文字不一致的游离现象。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现以北宋人编的《广韵》作一粗略统计。《广韵》共 26194 字，同音字得 3802 字，实占 14.5％。同音字虽有如是之多，但在实用上无大关系。韵书的编辑，给我们把同音字按收音的韵部摆列在一起，只可备查，实际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许多字只是异体或已死的文字，成为历史陈迹而已。

汉字的音符部分在开始可能和语言有些关系。某一字可以使用某音符来注音（形声），或者借用某字来代表它的声音（假音），到了成为文字之后，与原有的语言，已完全脱离。现在的文字学者在研究形声字及假借字的音符部分，所以作种种揣测——原因是文字与语言已发生很大的距离，不得不作

猜谜式的考证。

单音字是不够区别事物，且易引起混淆，于是有复词的产生，以补其不足。复词是由两个单音字所组成，最主要是增文以足义。由于单音字所代表的意义有其极限，在扩张意义或转移意义及加强意义时，得增加另一个字在原来某一字之上，构成一新的复词。今以诗学上两个常用术语为例子：

风

风气　风教　风化　风俗　风物

风流　风力　风格　风骨　风范……

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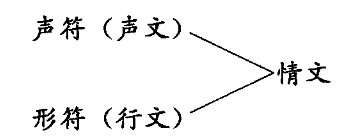
兴会　兴致　兴象　兴趣……

上一字的“风”、“兴”，好像是语干，在下面另加一字，所组成的是复词。虽由上字孳生，但它的意义，已大有不同。这些词儿有它的发展经历。某一词的出现，亦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形成的理由，还可作断代的研究呢！

五、形声字之发展及其美学作用

殷周以来，形声字大量产生，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一大主流。形声字每每附加形符来区别。金文的复杂形体表示其时喜欢一而再地增益的附加的形符。秦人统一文字，加以简化。形声字大体上保存一形一声，形声字中形符最重要的区别作用，是一望而可认识这个字所代表的事物是属于什么事类。譬如见山旁即知为山，水旁即知为水，非常简单。不像埃及古文，义符之外复加声符，形上加形，声上加声，凌乱复杂，最后归于放弃。

形声字本身，具有行文和声文两者的联结。不管形声字的结构，是左形右声，抑是上形下声，或内形外声，形符与声符成为对称美。形主视觉，声主听觉，同时产生不同的美感。形与音引起情感上的反应，连带生出情文。



一个形声字，分开来说，形符与声符所引起的反应，各有不同的联想，对于构成诗的语言，是非常有力而方便的。诗赋上有“联边”的现象，即是形符部分相同得太多，重叠繁冗而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相反的，有的却把这种联边作为特殊的技巧。例如谢灵运的名句：

蘋萍泛沈深，

菰蒲冒清浅。

芰荷迭映蔚，

蒲稗相因依。

蘋、萍、菰、蒲四个字都有形符的艹，泛、沈、深、清、浅五个字都有形符的水，二句之中出现这样“联边”的技巧。这二句是互为对偶的。还有声律的美。蘋、萍同为 P’ 母，清、浅同为 Ch’ 母，是为双声；菰、蒲皆收 u，同属虞韵，沈、深同收 m，同属侵韵，这是叠韵。

第二联亦有同样的情形。这两联每句都有二个复词（联绵字），只用一个动词来联系（泛、冒）。四个复词相对构成一联，是非常工整的形文，再加上双声叠韵的声文，只有汉文字才有这样的在文字形态上构成的美感。

六、造字法则与“类”的观念

汉代人所提出的造字法则有所谓的“六书”，非常重视“类”的观念。六书之中有三者的定义与“类”的观念发生密切关系。

（1）象形：“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许慎《说文序》，下同。）

（2）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㧑”。

（3）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所谓“依类”、“比类”、“建类”均是以类为标准。类的观念在古代哲学中可以找到许多根据。《易·系辞传》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①] 墨子说：“摹略万物……以类取，以类予。”可见向来对“类”的重视。这里所谓类，和亚

① 我在湖南看到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帛书，汉文帝时物，其中即有《系辞传》。

里士多德讲范畴的 genus 虽未必尽同，但是对事物的认识务使各从其类，把这一通则用到造字上面，要使它各从其类。比方凡山水一类的字，都以山及水统一起来，作为形符，再以另一字记音，作为声符。以形符定其义界，以声符示其语音，这样有规律地把宇宙的事物归入于某一物类。《说文》所载的形声字，大都说是“从某，某声”。从某，即指出属于某一物类。我们原来不懂得的字，但看它所从之形符（即偏旁），便已知它是何种物类，可说已识得一半了。如看松、柏二字的木旁，即知它是树木。其他可类推。这样一来，在造字者很是容易，认字者更无困难。这是形声字的优点。

中国自秦统一文字，把篆、隶的字形整齐划一，字画安排得很匀称，尽量减少以前文字的图画性部分，和复杂多变的结构，加以简化，把文字规范化了。近年以来，晋、楚、中山及秦本国的文字资料出土很多。经过仔细比较，对秦人为何删剟反区混乱的异体字，如何完成简化文字的工作，大体可以明白。试举一例：

（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秦小篆）（马王堆帛书）

删去繁复，只存一形（口）一声（五）。由偏旁而建立部首，文字各从其类，汉字构造的法则，亦可有条不紊地加以归纳起来，给予分类，并编成字书了。

七、省略习惯、叠字作法

许多人谈汉诗，认为省略（Ellipse）是汉诗的特征。在诗的语言里，主词的人名及表示位置的介词（proposition）往往省略。其实在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已大量使用省略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同时同事的占卜文字体会出来，在不同的甲骨上面细心比较便可了然。譬如 A 片上记着主词（有卜者名）及日期，B 片 C 片上可以省去。有时同一版上同事的占卜在上文很具体地记录，到了下面，便省略去了。介词的省略，更随便可以看到。例如“用一牛于兄丁”，可以作“用一牛兄丁”；甚至连动词亦省去，只作“兄丁一牛”。铜器上亦普遍采用“略辞”。从同一地区出土的铜器群，经过比勘之后，可确定是略辞。例如（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

	射作尊	（甗）
	射作父乙	（爵）
	作父乙	（觚）
	射	（尊）

在不同器上所铸的文字，有的省去作器的人名，有的省去先祖名及器名。这种用极少数文字简括地来表达的特殊手法，渊源甚早。再举《左传》一例：

>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左隐元年传）

这处第一句言七月而葬，为天子之礼；以下诸侯、大夫、士月数递减。诸侯以下，皆省去“而葬”一语，而文义自明。

可见省略的习惯，不限于诗，这是汉语的一般惯例。诗的语言，因为字数的限制，省略更进一步罢了。

同一字的重叠使用，可以助长文章的气势。特别是有关键性的字眼（key word），不止一次地反复运用。如《左传》楚子问鼎，用德字作枢纽，凡六用。吕相绝秦，“我是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几乎达四十次①。摘一段如下：

>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剪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这篇中，“我”字兼有主词（I）、受词（me），作为 possessive case（my）用特别多，可以见到汉文法于不同格之情形下在字形上不必有什么变化，只从上下文气就可以看出来。吕相绝秦一节，宋元文家都视为“作文法度”的规范（《隐居通议》卷十八，《丛书集成》本）。

诗的叠字用得最多的。试举梁湘东王（萧绎）的《春日》一首为例：

> 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

① 请参看《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206 页《吕相绝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悉春自结，春结讵（那也）能伸。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以惜春时。

诗中“春”字，一连用二十三次。一句五个字，有时出现了二次。而且有对仗。像“日日”与“处处”对。又作连环性的安排，技巧崭新。同时有鲍泉者和他比诗，即叠用“新”字至三十次。举六句于此：

新莺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上二诗载于明人编的《诗纪》（卷八〇，卷一〇二），大概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作法即从此脱胎而出。中唐无名诗人，流落在吐蕃，有《白云歌》一篇七古，词采甚佳。有句云：

不知白云何所以，年年岁岁从山起。云收未必归石中，石暗翻埋在云里。世人迁变比白云，白云无心但氤氲。……

诗见伯希和编卷号二五五五。这篇作法是反复用“白云”二字作为 key word。原卷藏在巴黎，附为介绍。

叠字叠词在诗法是一种技巧。汉诗因为字句齐整，一字一音，每一句的字数亦一致。重叠用字更有它的独特之美妙。

八、对偶与声调

汉文学在语文结构文最特出的地方无如对偶与声调二者。对偶问题，六朝时刘勰已有《丽辞》篇加以讨论。他指出“对”有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项，而以正对为劣——因为不免有重意合掌的毛病。

对偶（couple）与平行（parallel）不同。对偶要避免字面的重复。汉文的对偶还要调协平仄，更为其他国家所无。

由“句”的对偶发展为“篇”的对偶，在汉文学史上有四种特别出于对偶的文体：

（一）殷代龟甲上对贞式的卜辞。

（二）六朝以来四、六字句式的骈文。

（三）唐代的律诗：八句中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成为一对。

（四）明以后士人应试的八比文（由八段字句相等、上下对比的散文所组成的说理文）。

诗中的对句是特别讲究的，唐人写了不少书来讨论对偶的构成和它的避忌。诗与律赋成为唐代考试的主要科目，韵书与类书的编集便应运而兴。唐玄宗命徐坚编纂的《初学记》，其书在每一项之下，以“叙事”、“事对”为主，然后选录一些诗赋等。此后如李瀚著《蒙求》，亦以对偶为文，作为小学的教材。到清代康熙六十年，御纂的《分类字锦》，共六十四卷，为成语、对偶集大成之作。

骈文在唐、宋仍旧非常盛行，成为朝廷的制诰与士大夫表启的应用文体。每一篇文里面，必须有一些警句可以摘诵。对外国的制诰——如对安南王日煚（即颎）的文字亦用骈体。当时称精通这种文字曰“敏博之学”（刘壎《隐居通议》卷二十一）。即游戏文章的攻击乡试弊端之《非程文》，亦用骈俪，一时传诵（《辍耕录》卷二十八）。

应用文用骈体是十分美化的文字。至于诗中的对偶，其重要更不待言。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举出二十九种对偶。基本上不外相反、相生两大系：前者二句包含的事物完全对立化，不必有何种关系，即刘勰所谓“反对”；后者上下句可能在意思上有某些因果关系，有时被称为流水对。长篇的长体称曰“排律”，又是一格。

对偶在旧文学中所占地位极其重要。练习作对是童而习之，必经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随手写诗。

汉字的韵律是声、韵、声调三位一体。每个字都具备这三个要素。由于一字一音，汉诗的构成，字句终是很有规律。由字数多少组成的诗，为体不一。三字为句的三字诗，习见于镜铭。四字为句的四言诗，形制同于颂及碑铭。及五言、七言兴起，字数既齐整，对偶又工丽，为使字与字之间，异音能相随（和），同声可相应（韵），这样来构成诗的旋律，必在平仄上取得调协。于是严平、上、去、入四声的辨别，斟酌于清浊轻重之间。自齐、梁至于晚唐，讨论四声、声病说的著作，车载斗量。汉诗中声文的重要性，表现于新体式的词、曲，更为严格，每一曲调有它的限定字数与平仄规定。清初诗人著《声调谱》，更从句的韵律，进而讲“篇”的韵律；由近体而及于古

体。声调在汉语诗律上的格式，已有许多专著谈及，不再多赘。

九、汉字由实用变为艺术及诗之简化

还有一层，汉字字形有多次的演变：

大篆——小篆——隶——行——草

主要是笔画由直线变为曲线，圆笔变为方笔，形体由凝固变为飞动，方法由迟慢变为迅速。每一时代的字体有它的特别的美感。书法的发达，五花八门，使文字一转而为美术，由日用之工具，一变而为个性精神表现的媒介。

律诗中工整的丽句，是诗的警策动人的部分，有如人首的一副眼睛。诗句典型即在于此。唐五代的时候有许多"诗句图"的著述。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是"摘句"工作的起始。[①] 以后选诗编成"句图"的大有其人。在名家的诗集中，往往摘取对句若干联，以为代表作。南宋陆游的七律特工，陈应行的《续句图》中摘录至七十七联之多。

宋代以来，楹联盛行。楹联即是把对句写出来，可以悬挂在厅堂。它是诗和书法的结合，成为一种艺术品。所写的句子，可以说是简化的诗，是诗的缩影。书写楹联的风俗，至今尚然。这是诗的社会化、普遍化的一种表现，是中国文学之一特色。

十、余论

西方凡韵文都可称为诗，Poetic 应该包括所有的韵文。汉诗则不然。由于诗的形式有一定的体制，韵文大别有赋、诗、词、曲四大类。诗的固定体制又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尤其律诗和绝句有规定的字数和平仄格式。作诗者用上列形式写诗，已可免却形式上的负担，实际已减去部分的精力。新诗是自由诗，未有固定的形式，作者同时要顾及形式与内容，在创造过程，比较吃力。新诗至今所以还未臻成熟，作者兼要经营句型，是一重要原因。

语言学在西方，目前几乎居于其他学术的领导地位。汉语与文字由于是

① 张为书，参看罗根泽《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50页。

处于游离状态之下，语言的重要性反不如文学。中国靠文字来统一，尽管方言繁多，而文字却是共同而一致的。这显示中国文化是以文字为领导。中国是以文字→文学为文化主力，和西方之以语言＝文字→文学情形很不一样。这说明纯用语言学方法来处理分析中国文学，恐有扞格之处；尤其是诗学，困难更多。至若轻易借用西方理论来衡量汉诗，有时不免有削足就履的毛病了。

原载法京 Écritures，法文本

孔门修辞学

在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应明白两点意义：

首先，我国古人极端重视修辞，但所指的修辞，是指“言”与“行”、“文”与“德”的一致性，和西方所说的“修辞学”（Rhetoric）是不相同的。所谓修辞学原是包括“言”、“文”两方面，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说明了“言”、“文”二者的关联性。故孔门四科，言语是极重要的一科。修辞学在西洋是指讲话的技术，希腊语的 Oratory 本来是指话术（拉丁文是 Oratoria），后来才演变到作文章方面，专指文术，即指文辞的修饰和表现的种种技巧和形式。我国之有修辞学，乃是极近的事情。而且最初是洋化的，唐钺的《修辞格》，只是依纳氏的英文法格式如法炮制，只是从造语的形式和组织风格立论罢了。其实我国真正讲修辞的要算刘勰的《文心雕龙》，在《神思》篇以下便很详细地讲文术了。

日本人有许多修辞学的书，亦称“美辞学”，如高田早苗氏、岛村泷太郎的著作，都称做《美辞学》。这“美辞”二字是根据曹植《辩道论》“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一语而来，是侧重于积极修辞部分。但秦汉儒家所说的修辞，是指文德而不是指文术的，我现在所要讲的是孔门的修辞，是和现代所说的修辞学绝不相同的。

其次，孔门的修辞学和纵横家的修辞亦截然异趣。古代大行人小行人，即外交官无不注意言语应对。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时代需要，对于辞令很为重视。诵诗三百亦为辞令之故，一言可以兴邦，可以丧邦，在聘问交际上是

不能不对言语加以特别训练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是其中之一。这种言语科的发展，有义理和权谋的两个分歧。前者是儒家言行相顾；后者是纵横家，专以巧辞炫人，充满揣摩利害的机诈，不出于诚心，不本于道义，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现在所讲的孔门的修辞学是以经传为主，《国策》、《韩非》、《鬼谷》一类是在摒弃之列。

一、修辞立诚是合内外之道

修辞二字见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辞是属于外表的事情，能修辞是能有美的辞令，但必要出于“诚”。诚是内在的，必须内在充实，才能言之有物。美的辞令必须建筑在诚之上，修辞属于“美”，“诚”包括了“真”和“善”，有“真”和“善”才有“美”之可言，有真和善然后可以立诚。

说“诚”字最明白透切的莫如《中庸》，我们可以拿《易经》和《中庸》互相印证，诚字可以概括“真”、“善”。《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由这些话看来，“诚”本身就有真和善。“诚”在己是诚意，把诚推而及于事物上面，彻头彻尾都是诚的表现。《中庸》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物也[①]。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自己心中具备“诚”是仁，由此而推及一切事物是“知”。修辞是知，立诚是仁。从修辞以立诚，正是合内外之道了。

可是有些人只是能修辞而没有诚的，即《论语》所指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美的辞令必要内在诚笃始有价值。所谓“有德者必有言”，就是说立诚能兼修辞，做到了内外一致，仁知相兼的地步。反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是谓修辞而不立诚，徒有诸外而无其内，有“知”而没有“仁”的。至诚的人，从大的方面可以尽物性，与天地参，这是致广大；小之则可以致曲，曲而有诚，则明且着，这是能尽精微的。由此可见修辞必要与立诚合一，必要做到内外一致，言行相符，然后才可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

① 即格物，即随处体认天理。天理是诚，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对于修辞立诚的道理，发挥得清楚的，还有《礼记·表记》。[①]《表记》说："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从这段话里可见服、容、辞、德、行是一贯的，更可以看出修辞与德行的相倚性。《表记》又引孔子的话说："情欲信，辞欲巧。"情欲信就是立诚，辞欲巧就是修辞，这正与《文言》的说法相同。又引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辞有枝叶，则言行未必一致，所以"辞"比"行"是次要的。必先要诚，其辞才有价值。《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亦是这个意思。

二、由辞以观人

辞包括言语与文章，是人的思想反映于外面的东西。即所谓有诸内然后形诸外。故《易》云："圣人之情见乎辞。"扬雄云："言为心声。"我们可以从某种言辞去了解一个人的为人，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与性格好坏。这便是知人。知人是我国古代专门的学问，是为政的要务。《书·皋陶谟》上说："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以知人的问题在古代有专书讨论。《大戴礼》有《文王官人》篇，称文王官人的方法是观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文亦见《逸周书》）。《易·系辞传》也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是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几句话是一切理论文最精密的批评，而又赅括而深入人心的。以后孟子论知言，似即从此脱胎出来。什么叫做知言？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说话，看出其人的心理，可以判断其人的好歹。

上面已经就理论方面说过了，现在举些实际的例子。关于知人知言的实例，在《左传》和《国语》中可以找到不少的好资料。《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告其子顷公，论晋孙谈之子周（即晋悼公名）说："其行也文，将得晋国。"他把"文"字来概括周的人格，特别说明"文"的道德综合性。他说："其行也文。能文，则是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复国。夫敬，文之恭；忠，文

① 郑注说：君子之德见于仪表者也。

之实；孚，文之信；仁，文之爱；义，文之制；智，文之舆；勇，文之帅；教，文之施；孝，文之本；惠，文之慈；让，文之材。”他看到晋悼公具备这十一种德性，拿一“文”字来概括他。所以“文”字可说是一个典型的道德综合体，实在具有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后来晋悼公果然是复国了，证明单襄很有知人之明，一点没有看错！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对齐景公论“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差异。文云：“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即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惟据与我‘和’乎？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善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一段极精警的话言提出可与否相合叫做“和”，这说明要从矛盾中，求得统一。《易经·睽卦》象说：“君子以同而异。”王注云：“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异”、“同”不在事理上的区分，而是说与其一味苟同，不如从异去求同，庶几能集思广益。《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亦指出所见能有不同的，才是君子；否则唯唯诺诺，一味苟同，不外小人而已。晏子似即发挥这个意义，他所说的“可”、“否”、“和”，有如现在辩论术中的“正”、“反”、“合”，与辩证法的原理非常相合，完全是一种语言辩证的逻辑，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修辞学与语意学

最后我再想指出孔门修辞学，与现在的语意学，意味颇相类似。语意学最终目的是研究语言怎样运用到适当，不像修辞学只注意言辞的美化。儒家讲修辞立诚，所以居业，如是方能尽言语之用，与语意学的主旨颇为接近。

从上面所说，可以知道儒家的修辞学，内之在于立诚，外之在于知人知言，不是徒然讲“辞形”、“辞式”，而是讲文德的，所以和西洋的修辞学截然不同。孔门的修辞学，与其说是讲修辞，毋宁说是讲语意。至于说“辞达而已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言不序”（《艮卦》），“不辞费”

（《曲礼》）等等，这才与现代人所说的消极修辞，求其“意义明确”（达），伦次通顺（序），辞句平匀（不费），有美感能动人（远鄙倍）有点相似，但都不是孔门所谓修辞的目的和最终意义的。

不过孔门的修辞，和新近的语意学也有不同的地方。语意学是分析言语如何适当地运用和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思想，和语言的类别和功用，还只是从语言现象和使用方面着眼，至于语言使用的出发点与内在的正确性——内在的“真”、“善”要素，却还没有详细指示，是有“末”而无“本”的。儒家的知人知言是中国的语意学，但折衷于道义，以“立诚”为本，是“有本之学”，所以不是单纯的语意学，而是混合了道德哲学。

有些人以为中国人缺乏对于语言的思考，那是不对的。儒家谈修辞是建筑在道德基础上的语意学，这是值得现代语意学者探索和参考的。把它楬櫫出来，希望能引起世界语意学者的注意。今天只是发表些个人意见，对不对还请各位赐教。（林均田笔记）

原载《人生杂志》1957年9月份

释主客

——论文学与兵家言

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孙膑兵法》有《客主人分》一篇云："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众，主人之分少。客负（倍）主人半，然可敌也。……客者，后定者也，主人按地抚势以胥。"（图见《考古》，1974（6）；文见《文物》，1975（1））兵家区别主客之分，主少而客众，以少敌众，要在把握道机。故孙膑曰："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敌人众，能使之分离而不相救也。"以寡敌众，在妙用之法而已。按《老子》书云："不敢为主而为客。"伪《李陵答苏武书》亦言："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自悬绝。"皆以"客主"名词用于兵法者，必以孙膑书说之，其义乃明。

古之能文者，善擒纵捭阖之术，优为之赋出于纵横家，尤为的证。《文心雕龙·诠赋》云："遂客主以引首，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汉书·艺文志》有主客赋。赋之为体，肇基于此，惜其文不可睹。然以意揣之，必立主客之分而为对问之体，以曼衍其辞。战国时人著书，惯用对话，近出马王堆佚书，若《伊力》、《九主》、《十大经》，无不如此，自是一时风气使然。至于"客主"之名，原出兵家，继乃演而为赋体。向非孙膑兵书，则此理殆不可晓。此出土文书，所以有裨于考证也。

兵家主要观念，后世施之文学，莫切要于气与势二者。李德裕《穷愁志·文章论》谓"气不可以不贯……势不可以不息"是也。《孙膑兵法》有《延气》篇，谓："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徒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竟

（境）近敌，务在疠（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泟（延）气。”以气驭军旅，所以激之，利之，厉之，断（正）之，延之。是气者，兵之帅也。后世曹丕论文“以气为主”，舒缓者为齐气，奔猛者为逸气，蔚彼风力，以立骨鲠。此则言其气质，文之体貌见焉。至于散体之篇，必全以气领挈之，于以驰骤、顿挫，无不中节。姚鼐所谓为文者八，其精者曰神、理、气、味。韩愈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以水喻气，以浮物比言，则气所以载言者也。余谓如是之气，乃为文之帅，正如其为兵之帅，学为文者，又可不激厉磨砻养根而俟实乎哉！

势，孙膑有《势备》之章，论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而云：“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刘公幹始于文中论势，谓：“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文心雕龙》有《定势》篇，以为：“势者，乘利而为制，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亦以弓弩为喻。又云：“圆者知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是而已。”复云：“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兼解俱通。”“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则以势合正反，理兼刚柔，不以偏胜论势，其义得于兵家者尤深。孙膑书言奇正（所谓“刑（形）以应刑（形），正也；元刑（形）而裚（制）刑（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尤不可不察也。

包世臣《文谱》云：“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也。”又陈行文之法有集散，“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而“集有集势、集事之异，散有纵散、横散之殊”（《艺舟双楫》）。辨析弥精，文章钤键，于是乎在，盖深有体于纵横家言，而其术正与兵家互为表里者也。

论战国文学

战国（公元前 403—前 221）是诸侯力征的时代，“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每个国家都各自寻求它的发展的道路。因之，“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文学方面，亦各有独特和卓越的表现，像诸子的散文和楚土的韵文，都开放着灿烂的奇葩。章学诚云：“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之体备。”（《诗教上》）可见战国时代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本篇探索范围，一般文献以外，考古学的新资料，亦附带一并讨论，用以开拓文学的领域，并补苴向来文学史家所未注意的部分。

一、战国文学的地域性

一般文学史家谈及先秦文学时，都很喜欢划分为南北文学，以《诗经》和楚辞作为代表，这是非常肤泛的。《吕览·音初》篇已分别东、西、南、北四方的音，各有它的来源。到了战国时候，由于把春秋散漫而割裂的局面，抟聚为几个大国，处于中原的三晋算是三位一体，名为七国，其实不外五个重要单位，即秦、晋、齐、楚、燕。这里分为几个单位，加以叙述：

（一）周

周地的歌诗在《艺文志》诗赋略中所录的，有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

五篇，周歌诗二篇，总共一百七十篇，有声曲折的共八十二篇。周地到了战国，成为商业的重镇，像吕不韦以阳翟大贾往来贩卖于邯郸。我们看六朝的《吴歌》、《西曲》，即流行于江南及荆州商业区域的估客，沉溺于声色玩好，饮宴取乐作品。周地歌诗的发达，当然和商业城市的发展，有密切关系。[①] 至于声曲折就占了八十二篇，又可推知当时已如何注重音乐歌唱的部分，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二）燕、秦

在北方，北音的起源甚早。《吕览·音初》篇："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于飞，实始作为北音。"可以追溯到商颂的"天命玄鸟"及邶风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汉志》诗赋略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其后魏文帝有《燕歌行》。庾信云："燕歌远别，悲不自胜。"由于荆轲有"易水寒"之句，后来王褒因之，作《燕歌》描写塞北苦寒，梁元帝及诸文士和之，竟为凄切。燕、赵之音，向来是以悲歌慷慨闻名的。[②]

秦居关中，席岐周的旧疆，充分接受周文化。文字是继承西周的系统，所以猎碣（石鼓）上的繁体，即沿袭史籀的遗制。石鼓文是十首一组的联章诗，车攻马同语句，分明是三百篇的摹仿者。《史记》说："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又说："时有史敦，为秦国史官。"（《封禅书》）遂有《秦纪》一书[③]，司马迁采入于六国表。晋侍中彭权尝见过其书（《御览》六八〇引挚虞《决疑要录》)。《吕览·音初》篇说："殷整甲徙宅西河，始作西音，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整甲是卜辞中的戋甲，为西音的创始音，而秦风即西音之步武者。《秦风·黄鸟》篇哀子车氏三子殉葬，成为后来汉、魏诗的主题（像曹植的《三良》)。秦风十篇中，《车邻》是美秦仲，《驷铁》四篇为襄公作（依据《诗序》)，可是没有穆公时的诗。崤之败，穆公悔过，作《秦誓》(见《左传·僖三十三年》及《书序》)，后来列于《尚书》。至惠文王，

---

① 以后代情形比况之，如《扬州书舫录》所载，鼓子依曲的唱奏，都在商业性都市集中流行。《西曲》、《吴歌》之起于荆、扬，理有同然，可以推想周地歌诗发达的原因。

② 《水经·易水注》有荆轲馆。又引阚骃称："荆轲歌，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

③ 参金德建《秦纪考证》。

又有《诅楚文》[1]，告于大神巫咸，以咒楚王熊相（槐）之背盟。宋章樵收入《古文苑》，其行文则仿佛春秋晋国的《吕相绝秦》，十分动人。姚宽《西溪丛语》上记《诅楚文》，又论秦誓文有三本。《诅楚文》中的嗣王，向来认为是惠文王。唐兰以为惠文即位时不称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10。[2]

秦统一天下后的诗赋，可考的大约有下列各篇：

（1）博士仙真人诗——“秦始皇三十六年，令博士撰。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纪》）疑是《远游》一类之神仙家言，或出于燕齐方士之手。

（2）长城民歌——杨泉《物理论》：“始皇起骊山之众，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勿举，女生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水经·河水注》引）语亦见建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这可说是很早的五言诗。

（3）黄公作歌诗——汉志名家：“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4）秦时杂赋九篇——《文心·诠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从秦国文章著述上来说，《吕览》（《吕氏春秋》）一书应该为代表统一前秦的文学作品的总汇。其书写成于秦（始皇）八年涒滩之岁。[3] 此书之作，乃不韦使其宾客，人著所闻，辑集而成。似其宾客借此书以收揽众誉，收买天下之人心，俨然以一家春秋，托为新王之法。在他眼中分明没有始皇，而不韦与秦廷之间，诸多矛盾，于此可见。

（三）楚

楚国地区有它独特的语言。扬雄《方言》中所列举的楚郢、南楚、江湘之间的特殊事物名称的方语，像“侘傺”、“贪惏”等联绵字，是用地方音表达的语汇。有人从楚辞中辑出屈、宋方言[4]，同时楚人歌唱，又有它的独特作风，谓之“楚声”。[5]“楚声”到了汉初仍然流行于淮河流域等地带。

在屈子前二百年，楚康王母弟鄂君子晳泛舟，越人拥楫而歌，越译而楚

① 米芾《群玉堂法帖》作“咀楚”。

② 见唐兰《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一，1958）。

③ 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先秦诸子系年》），又刘坦《中国岁星纪年》。

④ 见李翘《屈宋方言考》。

⑤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楚声考》，及铃木修次《楚风の系谱》、《汉魏诗の研究》。

说之。楚译是："今夕何夕兮……"，而原文则是"滥兮抃草滥……"。原文用古越方言，依音读录出，有如西汉四字句的《白狼歌》[1]，可惜原文无从复原，亦无法加以句读，不知是否一字一音，抑一字多音，未由拟测。可是楚译词句，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句法，与《九歌》之"沅有茝兮澧有兰"相同，汉武《秋风辞》的"兰有秀兮菊有芳"亦本之。有人说楚译文词见于《说苑·善说》篇中庄辛的谈话。[2] 庄辛事，《楚策》谓其说楚襄王，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上蔡、陈之地。则辛乃顷襄王时人，在屈原之后。如果说这些楚译的越人歌出于庄辛，很可能译出写下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早，而实在反受屈原赋的影响呢！

此外尚有几首用楚音而较古的歌，词句古简，其中都有"兮"字，这些应该是骚辞的先导[3]：

（1）楚狂接舆歌——见《论语·微子》篇及《庄子·人间世》。

（2）汉上孺子歌——见《孟子·离娄》。

（3）徐人歌——见《新序·节士》："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4）吴伍胥芦之漪歌——"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又渔父歌："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将奈何！"此歌见《吴越春秋》，不见于《史记·伍子胥传》。

这些歌辞分明是"楚声"，和汉初"虞兮"、"三侯"之章有类似之处。试看吴歌的特点，到东汉时梁鸿适越作《五噫之歌》，仍保持着重用语助，慨叹咏言的调儿。这首歌写成的年代，无法断定，但分明是属于"楚声"系统。吴越地区后来都并入楚的疆土之内，所以吴、越古歌亦是"楚声"形成重要成分。吴、越及接舆、沧浪四歌皆用"兮"字，并是"楚声"。《吕览·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是"兮"字用法，通

① 白狼王所作的《远夷乐德歌》，汉人译义之外，又用汉字记出原来夷音。丁文江谓白狼语是爨文。据方国瑜考证，白狼歌八十二字与麽些音十九相同，不同的只八九字而已，其中有一些是借用汉字的。

② 庄辛一说，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四。

③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举出左氏内外传所载当世的讴谣，和《国语》晋惠公改葬其世子，国人之诵有"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句，先于屈子二百余年。又《史记》载优孟歌孙叔敖事用韵方法，亦先于屈子，为南土之旧音。

行于南音系统。[①]

楚地人文蔚盛。以著作论，老子《道德经》保存许多古代的格言。庄子、荀子都是楚人，一以寓言、卮言构成他的洮洋恣肆的文体，一以缜密的说理文胜，特别发展赋体，皆是千古妙绝的文字。（《荀子·不苟》篇引“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其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则袭用《楚辞·渔父》，此荀卿之赋出自《楚辞》之证。）另一系统为天学的阐发及怀疑精神的发扬。唐昧以降，而畸人黄缭对惠施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庄子·天下》篇）。到了屈原遂有《天问》文体的创作。在铜器铭文像《鄂君启节》为绝佳的交通地理纪事文[②]，缯书以四字为句，构成韵语，这二篇都是楚辞以外可以讽诵的突出楚国文章。

（四）齐

齐国在威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其时以稷下为中心。[③]（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新序》云：“驺忌即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稷下之徒咸作书刺世（刘向《荀子目录》）。《韩非·外储》：“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指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稷下先生自淳于髡、田骈、荀况、邹衍等为诸子的巨擘，故稷下的学风，实为先秦学术人物的渊薮。（稷下见《水经·淄水注》引《郑志》张逸问赞作棘下。）齐一地在先秦文学上的重要性，尤其在散文著作方面，成就及影响更大。《管子》一书，为齐地文学著作的总汇。《晏子春秋》中有歌：“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景公为长庲章）其他歌诗断句如：

田成子　《莱芑歌》（见《史记·田完世家》）

冯　谖　《弹铗歌》

齐　人　《松柏歌》（俱见《刘策》）

---

① 近出马王堆三号墓《老子》汉初写本，所有兮字均写作呵，可证孔广森诗声类“猗”、“兮”音义相同，猗古读阿之说，而兮亦音呵。

② 《鄂君启节》四件，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水陆路程的地理，和楚辞“上洞庭而下江”完全一致。此《鄂君启节》文和鄂君子皙时楚译的《越人歌》，都是楚区域内地方文学极重要的资料。

③ 钱穆《稷下通考》（《先秦诸子系年》）。

刘声舒缓，和燕、秦慷慨的高腔，在声曲折上表现亦有悬殊。[①]

(五) 赵

法家兴于中原，商鞅出于卫，邓析、申不害产于郑，吴起、李悝、尸佼起自魏，韩非，韩诸公子，慎到、荀卿产于赵，李斯籍楚（上蔡），皆中土之人也。法家传播所及的区域，诸子游仕之地，以秦为主，而韩、魏次之。申不害相韩，商鞅先仕魏，后相秦。法家深抑文学，故中州文风，不及齐楚，文章亦朴质无华。

三晋在战国时代，诗歌寥寥可数。赵有《琴歌》（辞云："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赢。"见《赵世家》及《列女传》），又有《号笑之谣》（《赵世家》）；魏有《文侯之诵》（《吕览·期贤》篇）、《邺氏之歌》（《汉书·沟洫志》引。《咏史起事》云："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得水兮灌邺芳。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余则无闻。[②]《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春秋之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路，楚第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谷。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刘氏指出齐、楚二地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可知齐楚二国，当日除政治有其特殊政绩外，于文学亦有较深厚的文化凭藉，故成就特高。

二、取自民间的新体制

新的文体起于民间，到了文人手里，加以取材而变化之，踵事增华，便成为新的制作。在战国时出现新体制，举其可研究者，有下列各种：

(一) 成相

"相"本是乐器的拊，用以节乐。《礼记·乐记》云："治乱以相；讯疾以

① 从讲唱的腔调的辨别而论，楚有楚声，秦有秦声。秦声见李斯《谏逐客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秦人以缶为伴奏主要乐器，而歌呜呜。而齐声则舒缓，一般常举齐风"遭我于狃之间兮"句为例。如以清代的《子弟书》唱法为比喻，《子弟书》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东调沉雄壮阔，慷慨激昂。古代齐之声缓，和燕秦的高腔，想是这样的情况。

② 先秦各地韵文，详王鸣盛《蛾术编》七五，说集记诸国之风。游国恩《先秦文学》中春秋战国时之杂歌诗，不具举。

雅。”郑注：“相即拊也。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糠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齐人或谓糠为相。”刘熙《释名》：“搏，拊也。以韦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亦见《尚书·益稷》郑注）《周礼》大师职大祭祀：“帅瞽登歌，合奏击拊。”则在庙堂上奏乐时，亦击拊（相）以合歌声之节奏。雅亦是乐器。郑注：“状如漆筒，中有椎。”是用椎击筒发出声音，用以节舞，即是所谓舂椟。

古代歌与舞往往联合举行，以相来调节歌，以雅来调节舞。原来单纯唱歌，一面击着糠鼓来伴奏就叫做“相”。到了后来，凡利用一定节奏来调节歌声缓急的，都可叫做“相”。

《礼记·檀弓》：“邻有丧，舂不相。”郑注：相谓以音声相劝。朱熹云：“相者，助也。成相，助力歌也。”（《楚辞后语》，又方以智《通雅》卷三）史所谓五羖大夫死而舂不相杵是已。《淮南子》：“举大木者呼邪许。”刘昼《新论》：“牵石拖舟，必歌嘘吁。”故“相”亦为劝力呻吟的送杵声。成字从丁为声，成相即打相（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引欧阳修《论打字》）。所谓“请成相”，亦犹“请奏相”，有如打大鼓时的开场白，“请打打鼓，来唱一曲”一样。成相辞，该是后世弹辞及鼓儿词，以及唱道情一类之祖（卢文弨即认相为弹词所自出）。[①]

《汉书·艺文志》著录《成相杂辞》十二篇，在汉人离赋之末，惜已失传。今可见的，只有荀子的《成相》篇，和《逸周书》周祝解体裁相似。秦简《为上吏之道》有韵文八首。如云“审民能，以任吏。非以官禄使助治。不任其人，及官之暋岂可悔”，即用成相句式押韵，以助记忆。所谓成相杂辞，殆此之类。《成相》篇的内容，有点像后代的劝世文。《成相》篇很少人仿其文体，摹仿它类似史诗的有元人的作品，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二）招魂

“招魂”原是民间的一种习俗，东南亚及蒙古民族都盛行之。六朝人对招魂的看法是这样的：陈沈炯《归魂赋序》云：“古语称收魂升极，《周易》有归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归，其日已久。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全陈文》十四）人的灵魂通过巫师可以呼唤和收摄。收魂的仪式至今许多地方流行着，由道士主持。明邝露《赤雅》有“收魂”一条，记

---

① 关于《成相》的考证，可参考朱熹《楚辞后语》、俞樾《诸子平议》十五、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胡玉缙《许廎学林》（《成相释义》）、方孝岳《屈原和稷下学派》（《关于屈原天问》）、赵仲邑《成相辞与击壤歌》（《国文月刊》四十七），及 N. G. D. Malmqvist 的《荀子“成相”释》等篇。

巫者瑶朊持篮以收魂。从沈炯文看来，此俗由来甚早。

刘勰又有另一说法云："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证以《招魂》中有"工祝招君"，及"巫阳焉乃下招曰"等语，可见古代招魂的手续，必有"祝辞"。《庄子·天运》篇亦云："巫咸祒[①]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天下载之，此谓上皇。'"（此祒字借为招）巫阳、巫咸都有招和祒的事[②]，《招魂》一类的文字，原应是巫者的祝辞。屈、宋依仿之，把原有招魂所用的祝辞，加以增饰而别铸伟篇，遂有《招魂》、《大招》一类的佳构。

蜀东风俗，以病者为山作祟，必延巫驱厉鬼以招魂。招魂有小招大招之分，小招俗谓之送星宿，有迎鬼、安魂、送鬼三步。安魂用熏笼，并取玄色线绳系于病者之身。送鬼则用五色线、五色布，送时呼病者名氏，招其魂来归。说者取此习俗以解释楚辞《招魂》"篝缕绵络，永啸呼些"二句。蜀东招魂，群巫皆有一套泛用巫辞，如云："妇人之鬼，奶子丁当；产后之鬼，血泪淋当；病夫之鬼，咳咳嗽嗽；叫化之鬼，棍棍棒棒；灾兵之鬼，刀刀枪枪。"又鲁东招魂："荡荡游魂，何处留存？或在庙宇，或在山林；天神地神，门神灶君，招魂还家，复起精神。"其文词皆铿锵动人，可知楚辞《招魂》之辞，可能原为战国楚地流传招魂的巫辞，经宋玉辈润色成篇。[③]

我到过苏门答腊的 Battals 山，据说其土人招魂的词句是这样的："魂啊！回来吧！"这和楚辞的"魂兮归来，返故居些"恰好一样。[④] 古礼，死时招魂之辞曰"复"。《礼记·曲礼》："复曰天子复矣。"郑注："始死时呼魄辞也。"《檀弓》："复，尽爱之道也。"郑注："复谓招魂。"又《礼运》："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复"即是"归来"之意。"复"为古礼，自天子诸侯以下至民间皆行之。《丧服小记》："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复"的制度，详见《丧大记》："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朱子以为中原对死人招魂，荆楚施于生人。今广东东莞县风俗，凡儿童因受惊成疾，可请老妪以剪刀及尺掷地膜拜，招回惊散的魂魄。可见这种

① 马叙伦《庄子义证》：祒借为招。引《说文》：招，手呼也。

② 参 E. Erkes：*Das Zurüchrufen der Seels*，Leipzig，1944，Mircer Eliade：*Sympolismes et techniques Chamaniques en Chine*（Le Chamanisme，p. 349）。蒙古招魂习惯，详 C. R. Bawden 著 *Calling the Soul*：*A Mongolian Litany*（B. S. O. A. S. Vol. XXV. 1962）。

③ 张怀瑾《〈招魂〉篝缕绵络风俗证》（《国文月刊》六五期）。

④ 文崇一《楚文化研究》，征引民族学的材料，缅甸、猡猡等的招魂习惯，兹不备述。

风俗流行地区的广泛。

《招魂》和《大招》二篇所用的语助词，一个用“些”，一个用“只”；“些”字后来尚流行着。宋柳拱辰《永州风土记》云：“竟船举棹，则有些声。”可以见之。

《楚辞》中的《招魂》、《大招》，作者为谁，所招究为何人的魂，说者纷纭，今且不论。但这二篇必是根据楚俗民间巫者招魂手续所用的祝辞，在词藻上，加以组缅夸饰，是可断言的。作者不论是屈抑是宋，他们是取资民间作品加以改编，踵事增华，作成新制。

《大招》只向四方招魂，《招魂》则四方之外，兼及上天下地；“幽都”一段，对地狱有具体的描写。长沙马王堆轪侯墓所出铭旌的缯书，帷幕上挂着谷璧玉璜，正是《招魂》篇“挂曲琼些，结琦璜些”的写照。是图之出土，对于楚俗招魂制度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①]

（三）挽歌

唐李匡义《资暇集》：“昔谓挽歌始自田横门人，非也。《左传·哀十一年》鲁哀公会吴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也。’如是则已有久矣。”《史记·周勃世家》记他“为人吹箫给丧事”。《索隐》谓：“《左传》‘虞殡’若今挽歌类，歌者或有箫管也。”《御览》五五二引《庄子》佚文云：“绋讴所生，必于斥若。”司马彪注：“绋，引柩索也；讴，挽歌也。”是挽歌出于绋讴。《庄子·大宗师》记子桑户死，或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这当是挽歌之一例[②]，本是挽柩者所唱的（崔豹《古今注》）。东汉顺帝时，大将军燕客，酒阑，为《薤露》之歌（《通鉴》，1689 页），挽歌十九之“人生如朝露”，当即此类。

可见挽歌在先秦已有之，后来的相和曲才演变成《薤露》、《蒿里》一类。故郑樵《通志·乐略》称《薤露》歌亦曰天地丧歌，亦曰挽柩歌。到了汉以后，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继以挽歌（应劭《风俗通》）。六朝时，挽歌成为娱宾的节目；文人亦学作挽歌，魏缪袭、晋陶潜所作，均为人所传诵。

上举即是文学作品吸收民间文学形式，加以改进的成相、招魂二个显著

---

① 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

② 一海知义《挽歌考》（京都《中国文学报》），邢庆兰《挽歌的故事》（《国文月刊》六一期）。

例子，一起于齐，一生于楚。至于《九歌》之制，乃因南郢沅湘之旧曲。王逸称屈原："窜伏其域，怀忧苦毒，出见俗人祭祀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刘禹锡亦谓："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刘梦得文集》九）彼之《竹枝》，亦取自建平民间之作，是说众所熟知，东坡、子由皆有《竹枝歌并序》。

三、韵文中诗、骚与赋、颂的相互关系

班固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诗的讽喻作用，后来转移到"赋"上面去。"赋"初时只是诗的作法，"赋诗"之外，又有所谓"赋辞"。《说苑》卷六记舟之侨事云：

> 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进曰："君子为赋，小子请陈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

这是陈辞称为"赋"的例子。

楚人把辞赋的境域大加开拓，其实是继承诗教而发皇光大。试看楚辞中的句子，每每称引及"诗"，举例如下：

> "展诗兮会舞。"（《九歌·东君》）洪注云："展诗犹陈诗。"
>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大招》）王逸云："诗赋指雅乐。"

在屈宋的作品，有时亦暗中引用《诗经》。《哀郢》云"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即本《诗·豳风·九罭》"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九辩》云"窃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飧"，即取自魏风《伐檀》。可见屈赋的作者，怎样熟读诗，如何吸收《诗经》句子作为词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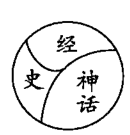
刘勰《论赋》篇举"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长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此明指骚即是赋。赋自诗出，后来遂成分歧异派。

---

① 参刘永济《屈赋通笺》附录。

赋之成立，"以荀卿为正体"（王闿运《王志》）。荀卿《赋篇》，乃咏物之作，其内容计：礼、知、云、蚕、箴五者，句法大体为四字，杂以占曰、王曰等之疑问叠句。或为君臣问答（如《礼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有如《卜居》句式。赋末间有小歌曰，则如《九章》，可见体式本于楚辞。而末系以佹诗，谓之佹者，《庄子·齐物论》云："是其言民，其名为吊诡。"（可相当法语之 bizarre）佹与恑同，《说文》："恑，变也。"佹诗犹言变诗，取义于"反辞"，乃论其反面，以"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皇，比干见刳，孔子拘匡"。仍是《九章·涉江》的遗意，而下开贾谊《吊屈原文》。其言"皓天不复，忧心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亦即天道周星，物极必反之义。佹诗为赋之末章，仍旧称之曰诗，足见赋正是诗之流亚。荀卿赋首列礼、知，其辞为"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和"百姓待之而后宁，天下待之而后平"，还是本于讽喻[①]，但已给以篇题，故不是诗而是赋了。刘勰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诠赋》）其说良然。

骚以讽为主，刘勰云："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文心·明诗》）郝懿行云："汉志以骚为赋，此篇以骚为诗。盖《离骚》含诗人之性情，具赋家之体貌也。"王逸亦说："屈原被谮，忧幽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楚辞章句序》）都指出骚和诗内在关系。然骚以夸饰为其写作手段，即向来被讥为诡异、谲怪的部分，这是以神话为基础的。汉六朝以来，人们很喜欢讨论《离骚》和经典违合的问题。其实骚不但有些地方"依经立义"，还有很多是根据历史资料，所以严格来说，骚内容分成的组成，应如下图：



刘勰论诸子文学曾指出有纯粹及踳驳二种。他所说的踳驳者，即是神怪之类、怪谲之谈，而班固讥屈赋"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刘勰为调停之说，亦称屈赋中之"托云龙、说迂怪"，其诡异之辞，谲怪之事，异乎经典。彼所目为夸诞，亦即神话部分。在旧观念中，以经术作为文学衡量的尺度，

① 参 H. Wilhelm：The Scholar's Frustration：Notes on a Type of Fu（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学人之挫折，每以诗、赋言志，申其愤懑之情。

凡神话皆以夸诞目之。不知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而能够铸造伟词的，无如神话；《离骚》所以能为一时郁起的奇文，全靠它和神话结合起来，才有这种成就。孟坚、彦和的说法，在今日看来是很不公允的。

后来把骚作为楚辞的大共名，连《招魂》亦被称作《离骚》。（《水经·鲍丘水注》引《离骚》峨峨之咏，即出《招魂》“层冰峨峨”之语。）夸饰部分的发展，遂为骚赋中“丽”的主要条件。后来曹丕干脆地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扬雄区别丽则为诗，丽淫为赋，“淫”便是夸饰达到极点的表现。

陆机《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谓托体于物而贵清明，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说本王志《论诗文体式》）。王氏谓：“赋者诗之一体，即今之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自悟，故以谕谏。”按荀子之《赋篇》，正是谜语，由隐而之显，乃赋的特色。

颂是诗之一体，而刘向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艺文志》作“不歌而诵”。屈赋中有颂，所谓“三闾《橘颂》，情采芳芬，比类寓意，覃及细物”（《颂赞》篇）。有的赋像颂（王褒的《洞箫赋》，亦称《洞箫颂》），有的颂似赋（刘勰云：“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故言：“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那些不太华侈的赋，如荀卿的赋，竟反而近于颂了。

后来，颂成为独立的文体。诗、骚、赋三者，本来是应该分开的。汉人在目录书归入诗赋略，以骚包入赋中，但刘勰欲分撰《明诗》、《辨骚》、《诠赋》各篇加以厘别，具体而微，他的见解，是很正确的。

四、散文中诸子书相当于后代的“集”

汉后若干新文体的兴起，据说都从战国诸子的作品中分化而出。章学诚《诗教上》云：“《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从章氏说，可见文体源流的大概。诸子的书，以一人一派的著述集为一子，和后代集部的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某子即某家某派的文集，这时虽然文集的名称未立，而文集的性质已具备了。章学诚谓“辞章实备于战国”，后来只是“承其流而变其体制”而已。又谓“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如“春秋之时，管子尝有其书”，其后“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缉，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因

为“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诗教上》）。照这样说来，诸子之书，大抵是某一学派的学者所辑述，亦可说是这一派作者文辞的总集，不必是某一人所著的（参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①

梁时，阮孝绪在《七录》中开始称四部的集类著作为“文集录”，其时始有集部之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把个人文章纂在一起，称之曰集，汉末记载已见之，杨修《荀爽述赞》云：“载而集之，独说十万余言。”（《艺文类聚》四七）曹丕《与吴质书》说：“顷撰其遗文（指徐、陈、应、刘），都为一集。”而曹植序亦云：“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类聚》五五引）可见“集”的名称，起源甚早。

战国至秦，逐渐趋于统一，思想界与著述的路向，亦从“小”综合而趋于“大”综合。其实一部子书，即是每一系思想圈子的小综合，它即是某一派的杂家。《老子》书是古格言的集录（如其中有古黄帝之言）。《庄子》是古代重言、卮言、寓言的结合和批判，其中有齐谐，有杨朱，有田骈等家说。这是一派系初步的结集。至于《吕览》又是一个更高的综合，网罗弥广，各派兼收并蓄，成为大杂烩式的总集，所以被称为杂家，这是第二步的结集。其实说某人的集，即是某人作品的纂录，这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以某一领导人，或某一派的代表为主而称为某子，本质上没有二致，所以六朝以来的集，可说是先秦的“子”的变相。

散文中诸子文的成就是多姿多彩的。《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逮及七国力　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尸佼兼总于杂述，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又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覈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纬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汎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又《才略》篇云：“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上面三段，对“诸子文学”算是作一个概括的论述。

诸子的文章，大抵有两大系统：

---

① 罗根泽文，见《诸子考索》，又《古史辨》第四册。

（一）尚质者以道术取胜，如墨家的质朴，法家的密察，儒家的清显。

（二）尚采者以骋辞振奇，以纵横家的陈辞夸诞，道家的卮言曼衍。
但他们的作品，也有共同地方：（1）比喻方面，表现文章的形象性；（2）辨证方面，表现文章的逻辑性。这二项都有超越前人的成果，而为后代开无限法门的。

诸子的散文，在五光十色的思想奇葩的种子孕育之下，形成一璀璨的文圃。口语的多量吸收，修辞术的充分运用，透辟的说理分析力，广泛而有机地采用设喻，使这些散文奠定了日后的基础，对唐宋的散文家沾溉无穷。

战国以来，文体在语法上之演变与运用，对于散文之形成有极重要的帮助，略揭数事：

（一）主词的重复使用，与叠句之构成：

杨树达曾比较叔夷钟喜用复词，与《吕相绝秦》相同（见《积微居金文说》）。今以《诅楚文》与《吕相绝秦》比较，注重其用主词的“我”。《诅楚文》：

> 昔我先君我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缪力同心，两邦以壹，绊以䜌㰩，袗以斋盟。欲刬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取俉边城新郢及邧长敎，俉不敢曰可。（容庚《古石刻零拾》）

《吕相绝秦》：

> 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昏姻。
>
> 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前文反复用“我”字，故词气纵横，读起来十分动听。

（二）叠字形容词及骈词四字格：

如《孟子》书中之绰绰然、巍巍然、嘐嘐、踽踽、凉凉；《庄子》之栩栩然、蘧蘧然、恢恢乎；《荀子》之“快快而亡”、“察察而残”（《荣辱》篇）等即是。有时加指示词于前，如《齐物论》“之翏翏”、“之调调”、“之刁刁”（参徐德庵《庄子内篇连语文示例》[1]）。有时还用联绵骈字四字格的，如《庄

---

① 徐文见《国文月刊》六七期。

子》的"尘垢粃糠"、"恢恑谲怪"、"惴慄恂惧"，《荀子》的"勃乱提僈"、"怠慢僄弃"、"愚款端悫"、"庸众驽散"一类的句子，这对文字的铺张和夸饰方面，以助长文章的气势，很是重要的。

（三）复合"谓义动词"之多量使用：

如《荀子·不苟》篇"此之谓也"，《致士》篇"夫是之谓"。此类复用"谓义动词"，用以申说解述，对于论说文很有裨益。法家文章精悍廉劲，像《韩非·说难》一文，以"说之难"为主题，而重复为说，计两用"凡说之难"句，一用"凡说之务"句，以为冒起，而连用三句"非……之难"以承接之。下文分析为言，则连用"如此者身危"、"则身危"等句，反复致意，迭用助词之"者"、"则"以贯串之，而于顿笔，言"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此说之成也"，皆用"谓义动词"收束，委曲周至，所以为千古至文。

前人论战国文章的作法，如说《庄子》用跳过法，《离骚》用回抱法，《国策》用独辟法（见刘熙载《文概》），可见各自有他的手法，所以有独特的成就。会心在人，上举只是略示其例罢了。

五、金、石刻辞二者的消长

《墨子·天志》："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又见《明鬼》篇）《诅楚文》云："著人石章。"盘盂的性质，必有点像彝器款识的缀录。盘盂在汉志"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王应麟引《七略》云："孔甲者，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史记·田蚡传》："蚡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由此知当时已有彝铭的撰集一类的著述。战国以来，石刻文学逐渐盛行，金刻反而衰微了。

石刻的发展，与秦地文化似乎很有密切的关系。《管子》称："封于泰山七十有二家。"其铭刻今不可见。降而下之，商时有磬上刻"永启"、"永余"、"夭余"等铭字，这是刻于乐器上的。现在所知战国刻石，以秦地区最为盛行。计有石鼓及《诅楚文》和秦始皇时的峄山、泰山、琅玡、芝罘、碣石等刻石。《秦本纪》记纣时，秦之先世蜚廉为坛霍太山，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索隐》：处父，蜚廉别号），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而秦蜀守李冰立碑有"深淘滩，浅包隁"句（张澍《蜀典》引金石文），秦昭襄王与巴刻石为盟（《华阳国志》一），可惜这些石刻已是失传，但由于秦地石刻的丰

富，可见刻石的风气是秦人加以发展的。

秦始皇在泰山、琅玡颂功德的刻石，有三句一韵的，又有二句一韵的，为后世碑铭之祖（秦刻石用韵见《蛾术编》五七）。刘勰称："秦皇铭岱，文有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文心雕龙·封禅》篇）可见刻石文学，是秦文化中一种重要表现，有它的很长远之渊源的。

一方面石刻的发展，相反地便是金刻的衰落及铭辞之型式化与套语化。若干政制上习用的文词，像"显扬式"的铭和"教条式"的箴、"告诫式"的盟，都是充满"套语"，已毫无文学的意味。

铜器到了战国时期，表现下列等现象：（1）兵器的高度发展；（2）花纹之简单化；（3）以刻画代替"缀范法"。处处表现着典礼上铜器制作的没落，故铭辞亦沦于次要的地位。兹以秦器为例而讨论之。铸于秦景公时（春秋后期公元前576年）的秦公簋，是每字用一范，用以铸款，再合多范而成文，很像后来的活字。[①] 这种缀范法，盛行于春秋时，可是战国以来的秦器都是刻铭；其他国家的器物，有的用玺印来印铭，其法不见于秦国。[②] 孝公以后，见于容量器及兵器的文字，表现得非常程式化。由于锲刻之故，书法变为纤细刚劲，笔画略呈简化。这种秦式文字，开小篆的先河，成为官书的楷则，大抵有若干特征：其一，铭文附记地名（如镦铭记"雍"，升铭记"重泉"之类）；其二，记明督造者的官衔。试举出一些秦器物铭文如下：

公元前346　商鞅镦	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陮（雝）[illegible]。（《吉图》下五十；《衡斋》下三）
前344　商鞅升	十八年齐[illegible]（逹）卿夫二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小校》一一，一九；《周存》六，一二四；《两录》二九一，二九二）。此似秦孝公十八年会诸侯于逢泽时器。
前352—前338　商鞅戟	同大良造鞅之造戟。（《三代》二〇，二一

① 详罗振玉《松翁近稿》，33页。

② 详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1957（8））。

		上下；《贞松》一二，六）大字，分两面镌，体近小篆。
前334—前321	樛斿戈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栎阳工上造[illegible]吾。（《双吉图》下三一；《三代》二〇、二六下）
前325—前312	张仪戈	十三年相邦义（仪）之造。咸阳工帀田工大人耆工赀（颓?）（《录遗》五八四；1962（2）《文物》有陈邦怀释）。
前289	上郡武库戈	十八年，漆工里纵口隶臣[illegible]，工正，上郡武库。（出土于易县，铭见李学勤《战国题铭》。）
前286	魏冉戈	廿一年，相邦冉之造。雝工帀[illegible]（葉）。（《贞松吉金图》下三二；《三代》二〇、二三）
前243或244	上郡守趞戈	廿五年上郡守□（ ）造，高奴工帀窞，工鬼薪戠（正）。 上郡武库，冶都。（《金文丛考》，418页。）
前243	相邦吕戈	四年，相邦吕〔工〕寺工龙承（丞）。（1957年7月，出土长沙左家塘；1959（9）《文物》张中一文。）
前342	吕不韦戈	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蕺，工寅，诏吏属邦。（《善斋古兵》上三五；周存；小校十，五九；《六书疏证》二九，49页。）
前236—前210	丞相触戈	□□年（秦昭十五年、六），丞相触造，咸□□（阳）帀葉工（面）；武（背）。（《贞续》下二二；参1964（2）《文物》陈邦怀说。《史记·穰侯传》有“寿烛”。）

商鞅有关的器物，有孝公十六年大良造鞅之镦（《双剑图录下》五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于重泉铸造之升（《国学季刊》五卷四期1页）及造戟（三代二〇、二一，一）。自是以后，各国似乎推行这种制度，“物勒工名”，成为一时风气。秦器冶铸兵器的地方，以上郡为最重要，所以可见到的

秦器，以上郡守戈为最夥。有名的秦昭王时铸的铭文如下："卌年上郡守趞，图币（师）耤丞秦隶臣庚。"这便是一个例子。

秦国在政治上于战国末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奠定大一统的局面。它的文学活动，应该特别受到重视；所以这里把它作为金石消长形态下的重要角色。秦文尚质，既并天下，而改命曰制。《文心·奏启》篇云："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逕。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秦的文学，在程式文及石刻文上，都带点法家的气味。像泰山刻石，论者谓其"一变为朴浑，知体要也"。盖乃以实用为鹄的，但这一类勒铭，却开了后来文体上的新局。

六、游说文学的兴起及小说的滥觞

先谈游说文学的技巧。纵横家所用的惯技，有下列各种：

（一）隐语

战国时的君主，若齐宣王、楚庄王都好隐语。在当时隐语的使用，成为一种风气。

刘勰《谐隐》篇："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新序·杂事》："齐宣王发隐书读之。"《文心》又云："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汉世辑录的隐书，今已无传，但《左》、《国》、《韩非》、《吕览》、《新序》、《列女传》、《说苑》所录，像秦客为廋辞于朝（《晋语》五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成公贾对楚王以有鸟不言为谏（《吕览·重言》），即淳于髡之说大鸟（《史记·滑稽列传》），靖郭君客之言海大鱼（《齐策》），都是很有名的隐语。桂馥《札朴》训隐为占。隐语在外交上的运用，施之讽谏，成为滑稽家的拿手好戏。它的流衍变为谜语，时和小说合流。怪不得刘勰谓："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文心·谐隐》）后世东方朔、管辂射覆之辞，亦由此出。同时，隐语在战国时有它的实用意义，作为说客及权谋家一种交际手腕。[①]

① 参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

隐语和西方的 Riddle 颇相似，很值得搜集，而作比较研究。Riddle 在近东和西欧起源甚早，《吠陀》及《可兰经》中均有之，埃及的 Sphinx Riddle 为最有名。Archer Taylor 在 *The Literary Riddle before 1600*（1948，California）书第二章，列举世界古代文学性的 Riddle 甚备，可惜未接触到中国的资料。

（二）“主客”

主客，本为兵家言，见《孙子·九地》篇。临沂新出《孙膑兵书》残简篇题有《主客人分》。《文心·杂文》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主。”又《诠赋》篇：“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汉志有《主客赋》篇，此后发展成为赋在开端的惯例，而且形成杂文一类中对问的新文体。自宋玉设问以后，如东方朔、班固之流，皆沿袭之。汉赋如《两都》、《两京》，皆以主客开端，都是受到主客方法的影响。

（三）问难

孔门四科，言语列为第三，儒家以此设教。邓析的无厚转辞，“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向语）。言术有八依、三避。《鬼谷子》有《抵戏》篇（《汉书·杜周传》颜注）。《韩非·说难》指出十二种谈说不同的对象。说客对于“对话”技巧的讲求，这是极进步的“修辞术”。希腊人注重雄辩，到 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才写 *Rhetorike* 三卷，成为这门学问的结晶品。春秋战国这类材料，如有人整比成书，亦可建立一东方辩辞学的独立体系（像卢弼著有《古词令学》）。

其次谈小说的产生问题。

战国以来，小说的兴起原因有如下列：（1）说客喜欢用寓言之故事体。（2）若干民间故事可用为谈助的资料。（3）长篇故事的诞生，像缠绵悱恻，如盛姬之死，见于《穆天子传》；博物广识，像伊尹辨味，事存《吕览》。这些最为脍炙人口。兹将若干先秦小说资料，考述如次[①]：

百家

汉志诸子略收有“百家”一三九篇。《说苑·叙录》云：“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别集以为百家。”则此书似曾经刘向整理，略如《说苑》的体制。古书所记如：“甘茂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史记·甘茂传》）“应

①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侯言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史记·范蔡传》）这书谅为纵横家所必读，故主父偃学"纵横长短之术"，兼及"百家言"（《史记·主父偃传》）。百家言的佚文，像《风俗通》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类，"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云云（见沈钦韩《汉书疏证》）。司马迁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正以其为小说家言也。[①]

伊尹

汉志《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说家。《吕览·本味》篇记："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之中，令烰人养之，是为伊尹，尹说汤以主味。"《说文》引之称曰"伊尹"；《本味》篇即出小说家之《伊尹》（王应麟说，见《汉艺文志考证》）。

青史子

《大戴礼·保传》篇、《风俗通·祀典》均引《青史子》书说。汉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梁时仅存一卷。刘勰《文心》云："青史曲缀于街谈。"（《诸子》篇）街谈巷语的缀录，这说明《青史子》正是民间故事的渊薮。

宋子

汉志《宋子》十八篇，列在小说家。《庄子·天下》篇称其："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荀子·正论》谓："宋子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是其书当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顾颉刚曾举出《吕览》中的"窃铁"、"攫金"诸故事，谓即出自《宋子》，其书能近取譬，有如佛徒之《百喻经》。[②]

汲冢书

《璅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史通·六家》："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为夏殷春秋。"隋志著录四卷，似其书唐代尚存。

穆天子传

《晋书·束皙传》："言周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此本曾经晋人整理，有荀勖和束皙二种本子。今传荀本六卷，其第六卷即《束皙传》杂书十九篇中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③]

其他诸子书与小说多有关系，如《晏子春秋》，其中故事即是小说的选集。《韩非子》中的《说林》及《内外储》，（伪）《列子》的《说符》，多记民间故事，可说是汉魏杂事小说的滥觞。隋志著录《宋玉子》一卷，楚大夫宋

---

① 金德建《百家书的性质》。

② 顾颉刚论《宋钘宜入小说家》，见《史林杂识初编》，33页。

③ 参朱希祖《汲冢书考》。

玉撰，与《燕丹子》并列于小说家，则宋玉亦擅长小说，不仅为赋家的巨擘而已。[①]

---

① “小说”一名见《庄子·外物》篇。他述任公钓东海一事，复加以按语云：“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又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这里任公钓一故事，正可视作当日“小说”的模型。小说是“谈说”之小者。《释名·释言语》：“说，述也；宣述人意也。”庄子所指那些辁才讽说之徒，便是“饰小说以干县令”的人。周制县比郡为大。（《左·昭二十九年》）蔡墨言刘累迁于鲁县。楚庄王灭陈为县。《穀梁·隐五年》：“寰内诸侯。”注：“寰，古县字。”县是极大的行政单位，所以“干县令”即干诸侯。《庄子》所言的小说，分明是指说客干时君所用的一套手法。班《志》云：“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忘。”取收小说十五家，一三八〇篇。其中方士虞初周说即占九三三篇。百家有一三九卷。青史氏五七篇，为最多之者。《荀子·正名》篇云：“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小家珍说当然指那些有乘大道的游说人物，有如宋钘一类即是。从任公子钓一事观之，这样的小说是说客的储宝。诸子书中像《韩非》有《说林》上下（即预备作内外储说的资料），《淮南子》有《说山》、《说林》，《列子》有《说符》，所用的“说”字，应该和《庄子》所言的小说，意义相同。《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之事。最长‘小说人’，尽‘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破。”

陆机《文赋》云：“说炜晔而谲诳。”李善云：“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而谲诳。”谲诳可看作寓言，炜晔可看作卮言；则《庄子》之书，实亦“说”之一种形态。谲诳即神话（Myth）部分；炜晔是极尽夸饰之能事，非 grand style 不足以当之。《庄子》之书，可算是“说”之巨观。至于小说，则取材于其小焉者。桓谭《新论》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小说”和“小语”、“短书”是同样性质的。后代以小说为书名甚多，如《殷芸小说》，有余嘉锡辑本。《史通·杂说》称：“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其书实因梁武的《通史》而作，其资料即《通史》之外乘。凡不经之碎事，另行辑录之。小说之所以为小，于此可见。汉志小说十五家有《伊尹》二十七篇，而道家别有《伊尹》五十篇。余嘉锡认为必出于小说家，非道家之伊尹书。按余说非是。新出马王堆《老子》甲本后佚书，附有伊尹论九主一段，且言：“伊尹布图（即九主图）陈笮，以明法君、法臣。”与《殷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论九主说同。由于是书附于《老子》之后，可见当是汉志著录于道家之伊尹书，不必视为出于小说家。小说与非小说之分，在汉代目录学家心目中，自有他的界限。

至于小说家的功用，原有它的讽劝意义。《隋书·经籍志》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竟把它和周官诵训及训方氏相比况，且引《左传》“士传言，庶人谤”来加以说明，余嘉锡曾有阐述。但看《国策·齐策》记邹忌因徐公之美一事说齐王，而齐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者受下赏”。这一故事可以看出：(1) 利用小说作讽刺的成功；(2) 先秦时代拥有“士传言，庶人谤”的事实。小说的实际功用，在说客口中如果运用技巧非常高明，当然收效甚宏。小说是“讽说之徒”所必备的武器，讽刺（irony）是他的主要技巧。irony 有时是用反语（a speaking by contraries）来引人入胜（irony 源出希腊语之“我问”）。《老子》所谓“正言若反”，是说话一种特别技巧。西方近代小说愈来愈趋向于 ironic mode，充满嘲弄（mock）的意味。这种精神在中国先秦已十分发达，尤其是游说之士及滑稽家者流，例如淳于髡“一鸣惊人”的隐语，《吕览·重言》篇作成公贾谏楚庄王，“谈言微中，可以解纷”，大概春秋以来已流行着的。“小说”是以街谈巷语来帮助说明大道理，它的功用是承接这一种教训精神而来的。可惜这些资料在中国只散见于诸子书中，没有人正式把它汇集起来，像印度的《五卷书》（*Pan catantra*）一样，整理成为专书。近人颇讨论到中国短篇小说的起源问题。《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共千三百八十篇，而纵横家只收十二家百七篇，可见小说数量之富。虽然许多被班《志》加上不好评语，如“其语浅薄”、“荒诞依托”等等，但小说家的东西，可能是（纵横家）说客的粮食，亦可能是史料的剩余（如《周考》七十六篇是“考周事也”）。小说的内涵也包括了神话、传说、史事、寓言，尤其小说在《干县令》时每还用 ironic 的技巧，来说服人。它表现的方式花样，和今天所谓小说的体裁虽不相同，可是本质上是没有二致的。

七、战国时“文学”观念的演变

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上斗争的剧烈，各国君主，网罗人才，有时招集宾客著书，对于文学的提倡，不遗余力。齐稷下而外，燕昭王筑台于碣石宫，赵有丛台、野台（武灵王十七年），楚前期有章华台，后期有兰台，许多文学作品，由是产生。西汉以来，淮南王、梁孝王都是继承这一老办法，把文学家集中在一起，观摩砥砺，因之作者辈出。汉赋的蓬勃，正和此有密切的关系。

可是，战国有些国家，在法家思想控制下，其施政策略，对于“文学”之事，则深恶痛绝。自秦孝公时商鞅变法以后，整个社会风气有重大的改变，由于法家思想的抬头，文学地位遂骤为之降低。三晋地区对于文学的鄙弃，在商鞅、韩非书中，可以见之。黄河流域的文学领导地位，反为江、汉、沅、湘流域的楚人取而代之，非偶然也。齐鲁一带则尚为文学昌盛的地方。《史记·儒林传序》云：“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法家反文学的理论，像《韩非·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取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太史公正引用此语）在“法”的推行下，“文学”必遭受禁止的，因为它是“法”的障碍物。《五蠹》又云：“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照这样说来，文学对个人有益，但对国家则极为有害。韩非反对私学，反对无功之爵（应即孟子所谓“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为天爵”），在《六反》篇中说：“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又说：“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切劳，此公利也。”他特别反对那些“学道立方”的文学之士，学道则自己有突出的主张，立方则自己有独立的行动，文学是私便，而非公利，他站在公的立场来反对文学之私见、私说，所以谓之“乱法”。《秦策》上说：“文士并饰，诸侯乱惑。……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法家反对文学，是从施政公利上来做出发点。这样只有跟随着政治走的文学，只是政治的应声虫。至是，文学的地位，已被贬抑到了极点。

相反的，儒家、墨家皆倡言文学。《论语·先进》所记孔门四科，第四即

是"文学子游、子夏"。汉《武斑碑》云："数游夏之文学。"唐人《正义》说指"文章博学"，邢昺疏引范宁云："善先王典文。"儒家所谓"文学"，是包括前代典章礼文而言的。[①]《荀子・非相》篇描写各人的怪相之后，接着说："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学耶?"同篇又云："有圣人之辩者……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又云："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杨倞注："文谓辩说之词。"这里的"文"，是指"辩说"。又《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学，犹玉之于琢磨也"，则以为文学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工具。

墨子亦提出"文学"一词。《墨子・非命》中云："凡出言谈，由（犹）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按即法仪）；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均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这里的"文学"，是指"立言"的文辞。

文学都为儒与墨所注重，故汉时任为"文学"的儒官，他们论学的宗旨，往往兼及儒墨，《盐铁论・相刺》篇云："今文学言治则尧舜，道行则称孔墨。"是指明证。

文学一名，从春秋战国至汉，其含义实在经过广狭多次的变更，略加说明如次：

（一）文指"文化"（Culture）的总体，这是"文"的宇宙义。

《国语・周语下》："单襄公有疾，召（其子）顷公而告之曰：……其行也文，能文则天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之象也。"按此义出自《尧典》"钦明文思"，注："经天纬地谓之文。"（《白虎通・三教》篇）周教尚文和夏教尚忠、殷教尚敬不同，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可说是极高度的人文观点。

（二）文学指辩说、文辞（Literary work）。

如上引墨子、荀子等家说。

---

① 陈槃曰："案孔子之所谓'文学'，窃以为当以全部经艺为主体；而典章之类，则是其次。'文学'简称则曰'文'。《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正义》：'（马融）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不误也。齐鲁间之所谓'文学'亦然。故《史记・儒林传上》言：'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继即云：'故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汉书・地理志下》齐地条亦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齐鲁之文学既无异于孔子之所谓文学，则与战国时期燕赵楚国所提倡所影响而产生之纯文学，似不可以相提并论（若稷下学士'谈天'、'雕龙'之辈，则又当别论）。"

（三）文学指学术（Scholarship）。

《史记·儒林传序》云："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以文学礼义为官。……自此以来……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武举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即是此类。

（四）文学为官名（Official name），指方士或儒生。

秦人薄"文"，此为商鞅以来之传统观念，自无足怪。惟秦时有狱吏典文学者，如《史记·蒙恬传》："恬尝书狱典文学。"《索隐》："谓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典文学。"中井积德曰："谓作狱辞文书。"秦世教育以吏为师，此"文学"二字见于秦人史传，文学且配合法律，亦一有趣之事。

《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谏，以求奇药。"秦所坑之儒生、方术士，亦称文学诸生。汉代学官及师儒都称曰文学（见刘宝楠《愈愚录》卷五汉学官条，又卷六汉学师条）。武威汉简："诸文学弟子出穀。"（《河平（公元前25年）月忌简》四）汉地方郡国"文学"之官，始于景帝末年（见《汉书·文翁传》），如匡衡为平原文学。及曹丕为五官将，亦置文学之官。汉以后，文学往往偏指"经学"（Classics）及礼乐，见崔瑗《南阳文学颂》。以后才指纯文学（belles-letters）。文学一名，秦汉前后之演变如此。战国时代，诸子书中所谓文学，大抵是指辩说及文辞而言，含义不如前后之为广义的和偏称的一样。

引用书目

杨　宽：战国史。

陈梦家：六国纪年。

吕思勉：先秦史。

朱希祖：汲冢书考。

徐　复：秦会要（订补）。

蒙文通：古史甄微。

金德建：秦纪考证。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7、8、9三期）。

王国维：两周金文韵读。

郭沫若：两周金文韵读补遗。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唐　兰：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一）。
刘知幾：史通。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下；又文集篇。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又秦献记。
游国恩：先秦文学。
闻一多：诗与歌。
朱自清：中国歌谣。
龙宇纯：先秦散文中的韵文（《崇基学报》二、三卷）。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宋钘宜入小说家。
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
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
中岛千秋：赋之成立と展开。
铃木修次：汉魏诗の研究。
星川清孝：楚辞の研究。
Burton Watso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1962, New York.
E. Erkes, *Das Zurüchrufen der Seels*, Leipzig, 1944.
N. G. D. Malmqvist, *A Note on the Cheng-shiang in the Shyum Tzyy*（《荀子"成相释"》）.

原载于《史语所集刊》第四八本第一册，1977 年

“秦世不文”辨

《文心雕龙·通变》篇云：

黄虞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

衡论皇古至于魏晋，文章风格之嬗变，而嬴秦不与焉。又《诠赋》篇云：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或问：秦世果无文乎？余答之曰：非也！秦起戎狄，周之东迁，席据其地，即周之旧疆。秦文公猎于汧、渭之会，尝言：“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及卜居之，曰吉，即营邑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秦即收周余民，自承袭周之文化。此一事也。尚论秦世文章学术，不能仅于始皇统一期间着眼，必远溯其先世。《书》有《秦誓》（穆公败于崤，归而作此），《诗》有《秦风》[①]。此又一事也。

秦世人才辈出，皆由他国客卿延揽而得。李斯《谏逐客书》云：“西取由余于戎，东取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吸收他国人才，为秦一贯之政策，故其人非秦籍而肯效力于秦，秦萃天下之豪俊而得尽其用，以此富强。汉志

① 子车氏之殉穆公，《黄鸟》之作，见《左》文六年传。

有《由余》之篇（兵家类作繇叙二篇），又有《由余阵图》（见李筌《太白阴经》）。《三辅黄图》："戎使由余适秦，穆公示以宫观。由余曰：使鬼神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人矣。"其名言犹流传于汉代。戎人归心，乐为秦用。此又一事也。

秦一统以后，惟一大著作为《吕氏春秋》。其书实成于始皇八年。《自序》篇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而不书始皇年号。其《谨听》篇云："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又《功名》篇："欲为天子，民之所贵，不可不察。故当今之世，有仁人不可不此务，有贤者不可不此务。"是主民为贵之说，以讽始皇。故高似孙《子略》称"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畯豪；始皇甚恶书，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成一家之言。……此所以讥始皇"也。明方孝孺亦谓"其书诋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故《吕览》乃秦之谤书，亦秦之奇书，始皇之前学术之总汇。刘彦和赏其"鉴远而体周"（《诸子》篇），不可不察焉。此又一事也。

余论秦文多因袭姬周，可揭二事为证：

（一）秦公簋之取雅颂。铭云："鼏宅禹赉，十又二分，在帝之坏。"《诗·大雅》："维禹之绩。"《商颂》："设都于禹之迹。"石鼓文，时贤多以为秦之猎碣，而文辞则类《诗》之《车攻》。人所共悉，故不深论。

（二）《诅楚文》之取《吕相绝秦》。试比较其文如下：

《诅楚文》：

>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缪力同心，两邦以壹，以鼾散，绊以斋盟。
>
> 欲刬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取倍边城新郢，及邘长敉，倍不敢曰可。

《吕相绝秦》：

> 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昏姻。
>
> 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入我河县，焚我箕部，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文中反复用"我"字，故词气纵横，读起来十分动人。

凡此皆秦文之可讽诵者，俱与经传相表里。是秦文因于周之明证也。

秦燔烧书，然烧之不尽。故张苍为秦御史，掌柱下方书（见《张苍传》）。沛公至咸阳，萧何先入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①]，今秦时著述可考见者有：

秦策五卷　见《国策》。

秦纪　　　《始皇本纪》、《六国表》引。

秦法　　　《汉书·刑法志》："萧何扣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秦仪　　　《叔孙通传》："定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故汉武帝以前一切制度皆仍秦旧。此又汉文化之因于秦者也。

若秦博士之著作见《汉书·艺文志》者，儒家有《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名家有《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俱详章炳麟《秦献记》。

秦人薄"文"尚武，此为商君以来之政策，自无足怪，惟秦世有狱史而典文学者。《史记·蒙恬传》："恬尝书狱典文学。"《索隐》："谓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典文学。"中井积德："谓作狱辞文书。"秦人以吏为师。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议："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此处文学为官名，但以狱吏主之，此与《汉书·西城传》"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注谓"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也"涵盖不同。狱吏所典之文学向不易晓，自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其文书有秦法律及论史道佚籍，与治狱事例等等，知蒙恬所典者，殆此类耳。

秦人重质，然其文辞亦有可观者：

（一）史传有纪：

《文心·史传》篇："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弘称也。"

秦史书曰《秦纪》。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臣请史官非《秦纪》皆杂烧之。"金德建有《秦纪考证》，爬梳甚备。云梦睡虎地秦简有《事纪》五十三条，起昭王元年，迄今（始皇）卅年，多质略，不纪月日。《秦纪》形貌，可窥其概。《史记》本纪体例称纪，实昉于秦。以前称"书"及"春秋"，如汲冢周书、楚书，墨子所见百国春秋之类是（此条可参潘重规《史记通论》）。

① 见《萧相国世家》。《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图籍。"

（二）书奏定体：

《文心·奏启》篇："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迳。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①]

又《议对》篇："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按见《史记·商鞅传》）。又《章表》篇："奏初定制，改书曰奏。"《御览》五九四引《汉书杂事》："秦初之制，改书为奏。"又《诏策》篇："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天下，命有四品。……远诏近命，习秦制也。"[②]

此汉代程式文，多源于秦，秦文辞质而意迳，亦重"法"不重文之例；"政无膏润"，故辞亦少丽彩。"风"、"骨"都乏，质文递变。故汉兴，一反秦之塗辙，遂发展为辞赋之途，亦矫枉而过正也。

以上论无韵之笔。

至于有韵之文，秦人亦非全无措意者：

（三）杂赋开汉之先：

《文心·诠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志秦时杂赋九篇，惜不可考，否则可明荀卿《赋篇》与西汉初时赋体演变之迹。然荀赋大致以四言为句，且多杂长叠句[③]，《云赋》连用若干"与"字句，《箴赋》亦然，盖与《卜居》同句法。

荀赋以礼、知、云、蚕、箴为题，想杂赋或类此。

（四）诗词杂录：

《文心·明诗》篇："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始皇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乃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此乐府之先河也。秦已设

---

① 按凌义渠《湘烟录》引蔡质《汉仪》："李斯治骊山陵上书。"

② 按《文选·吴都赋》刘渊林注引《秦零陵令上始皇帝书》，《汉志》纵横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严可均云即此。

③ 如《知赋》："此夫安宽平而危险隘耶？修洁之为亲而杂污之为狄者耶？其深藏而外胜敌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为动静待之而后适者耶？"

乐府官署，临潼始皇陵出土器物有“乐府”二字铭文可证。

《汉书·艺文志》：《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云在“秦时歌谣”中。汉志左冯翊京兆尹俱有秦歌诗。

《异苑》：“秦世有谣云：‘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前至沙丘当灭亡。’”（云刊在孔子圹壁）

杨泉《物理论》载始皇筑长城，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①] 使杨氏此说可信，则五言诗已昉于秦世矣。

又《风俗通》逸文有百里奚妇琴诗，真伪难悉考。

惟秦人抒情诗，若《蒹葭》、《黄鸟》，皆极动人。《文心·哀吊》篇云：“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又《秦誓》中语，若“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亦情往意深，孰谓秦人之不文乎？

小学字书及瓦当多用韵，《仓颉》篇、《爰历》篇即其例：许慎《说文序》引“幼子承诏”，《尔雅》郭注引“考妣延年”，《颜氏家训·书证》篇引“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此乃汉人语，非出秦人。敦煌简及居延简俱有《仓颉》残文，并四字句，有韵。[②]

秦瓦当文咸阳故城所出者有“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其字体为李斯所定之小篆，乃统一后之文字。

秦简《为吏之道》中有韵文八首，句式略近《成相》篇。例如：“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之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③]

《日书》中有马禖祝辞，文亦为韵语，典丽可诵。见拙著《日书研究》，不录。

秦刻石铭辞亦有三字对句者。如蜀守李冰立之《湔溯隔（堰）碑》云：“深陶潬（滩），浅包隔（堰）。”（见张澍《蜀典》引《金石文》）

以上论有韵之文。

秦代文学材料，非常匮乏。章太炎撰《秦政记》、《秦献记》，举出秦博士与学者八人。先是严可均撰《全秦文》一卷，录十六人。除始皇二世诏制外，

---

① 《水经注》引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有此句，字略小异。

② 参劳榦《居延简汉简考释》。

③ 《秦简研究》，344 页。

以王绾、李斯、周青臣、淳于越、赵高为重要。亦有不可信者，如据《墨池编》收李斯之用笔法是。本文所论，可补其缺。至于新资料之可称述者，如：

新郪虎符

文共四行，内有："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会王府，乃敢行之；燔队史虽毋会符，行殹（也）。"

1976年余在巴黎拍卖场曾见原物一件。

秦武王二年（墨书）除道木牍①

秦家书②

南郡守腾文书③

皆重要之作。其他零星不复及。

秦代散文，向来以奇横称。兹摘录文评家要语，以供观摩：

《文心雕龙·论说》篇："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组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又《才略》篇："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

秦文虽传诵者寡，而雄奇掣胜，孝公之求贤令，昭王之约楚怀，始皇时之议帝号、废封建诸令，皆峻险爽利，有西戎剽悍之气，民族性使之然也。尤以喜叠三字句（如《秦誓》"嗟我士，听无哗"之类），或疏落跌宕，整而不齐。以此而孕育奇气。李斯更奇而丽。《文心·事类》谓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句，是其例也④。

若夫勒铭更为后人所击节。《文心·颂赞》篇："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又《铭箴》篇："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正。"又《封禅》篇："秦皇铭岱，文有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按秦之先代泐石，飞廉有石椁之锡，秦昭有华山之刻，《文心》俱已征引，由来已久。下至峄山，遂成卓绝之作。而琅玡刻石，亦复囊括并吞之气，振荡于字里行间。国势之雄，有助于文势，理固然也。《骈体文钞》评语云："秦相他文无不诶

---

① 《文物》，1982（1）。

② 黄盛璋有文研究。

③ 见余另文讨论。

④ 李斯偶句："建翠凤之旗，拊灵鲜之鼓。"《上林》仿之，云："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

丽，颂德立石，一变为朴浑，知体要也。其词其气，便欲破除诗书，自作古始。”骏灵之气，俯视百代。自来于此，久有定论。此又谈秦文者，所不可不知也。

从对立角度谈六朝文学发展的路向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后三国的鼎立，到南北朝的对峙，又是一个对立的年代。除了是政治的对立，还有思想的对立和文字的对立。思想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庙堂和山林的对立；换言之，在野的想出来做官，做官的却想退隐。文字的对立，即是胡与汉的对立。这样的对立，贯串了整个时代；而文学的发展，便在这对立情况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发展，是“集部”的形成和推进。集是收集的意思，除了汇集个人的作品，还把别人的作品收集累积。过去是没有这样的“集”的名目，汉人是把思想性、政治性或各种的文章组织成集，是属于“子部”的。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集就不同了，这种收集的功夫，我们把它叫做 collective work。除了个人自己收集以外，还有奉诏采集，例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据《宋书·裴松之传》记载，是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作注。裴松之于是“奉旨寻详，务在周悉”，“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了。这个时代，王家和私家都纷纷从事辑集的工作，集的发展就成为南北朝文学的特征。

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此的多姿多彩，文字上胡汉的对立亦是一个重大关键。所谓“胡”，在汉代是指匈奴，魏晋以后，已不止是匈奴了。这时代的胡语，印欧语系，连带伊朗语系也包括在内了。从敦煌经卷中的佛教经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胡语究竟是什么样的了。在胡、汉对立中，历史上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就是汉灵帝时，中国开始盛行胡化。《后汉

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而这个所谓胡者，事实也不单是指印度的。在语言文字的胡汉对立当中，首先面对的是翻译的问题。关于内典的翻译，梁朝僧祐[1]《出三藏记集》，辑释道安《大品般若经序》，文中提到“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就是讨论佛经的翻译问题。在胡汉的翻译中，胡人曾有很大的推动力；其中最有成就的，我认为不是鸠摩罗什，而是更早期的支谦和康僧会二人。支谦是月支人，其父于汉灵帝时归化中国。他“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2]。在孙权黄武元年（公元222）开始翻译佛经，至孙亮建兴中（公元252—253）共译了四十九部之多，他的译文非常优美。至于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十余岁出家”[3]。他在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来到建业，并开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译的《六度集经》，文字好得很。康僧会是以文言来翻译的，文字水平极高，其风格又与支谦不同。我认为做翻译人，应该先通一种文字，再通别种，这样的翻译才好。我们看钱锺书的翻译文字非常好，我就说是他的中文好，中文比英文好，所以他翻译法文、德文都是那么好。因此，翻译之功，支谦、康僧会二人当在鸠摩罗什之上。有了翻译以后，对文学视野的拓展，起了很大的推动力。

在胡汉对立的问题上，骈文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骈文的前身，就是骈字。清雍正时编了一部《骈字类篇》，他在序文解释骈字的意思，“比事属辞，盖骈文义也”。六朝时代，骈字的发展特别多，像《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骈字，在《文学》篇举一个例子说：“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牋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蕴。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其中“睽离”、“沦蕴”都是骈字。有人统计《世说新语》里头的骈字有一千五百四十一个，还不包括常用名词；《楞严经》里的骈字有四千二百个。到了谢灵运时代，他的诗文真是骈字满眼了。我觉得骈字的发展，是骈文发展的基础；而佛经的翻译，给我们有很大的推动。很多的佛经的序文，差不多有百分之六七十，是用骈文写成的。这可反映骈文与佛教关系的密切了。这也是我在胡汉对立问题上的一点看法。

在“集”的方面，除了为个人著作、他人著作，以至某种文体编集外，更有“别传”和“方志”的收集。魏晋以来写别传的风气很流行。虽然别传

---

①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老师。
② 《出三藏记集·支谦传》。
③ 《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

带有小说的色彩，但又可在正史传记外提供另外的资料；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重要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就把当时的别传收集起来。根据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刘孝标的注中收录别传一百六十八家，数量是惊人的，所以他的注特别出名，就是因为他保存了这么多的原始资料。这方法当然是学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了。至于方志的收集，则有《水经注》。今天研究《水经注》的都不在地理方面，因为那些地理也不一定准确。郦道元是北方人，并未到过南方，所以广东、云南的水道，都有错误之处。然而，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北史·郦范传》)。故《水经注》征引的方志很多，给后人提供不少宝贵的文献资料。例如今天发现的南越王墓并不是尉佗的墓，而是他的孙子赵昧的墓，据《水经注》所引裴渊《广州记》谓“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及王氏《交广春秋》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茔可谓奢大”。从这些方志的叙述中，可知尉佗墓之大。《水经注》在这些小地方也讲得非常清楚，文字亦优美。《水经注》的宝贵，就是郦道元收集方志的结果。

此外，类书的编集也对六朝文学起了推动的作用。魏晋以来，竞用故事，而典故不全放在脑袋里头，要靠翻书的。类书始于曹丕《皇览》，据《隋书·经籍志》，《皇览》有一百二十卷，现已散佚。后人辑有《冢墓记》及其他片段共二十余条资料；在我看来，他不甚像后来的类书。当时负责编撰的有韦诞、刘劭、桓范、繆袭和王象等五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秘书监王象。六朝时代，从类书的编撰也可以反映出南北的对立。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学问很好，亦雅好文学，但心胸却不广。他的弟弟萧秀也“精意学术，搜集经纪”[①]。曾招刘孝标编一部类书《类苑》，共一百二十卷。刘孝标曾在梁武帝的图书馆看过书，后来因策锦被疏用典故事开罪了梁武帝，武帝没给他任何升迁的机会。梁武帝因这部《类苑》，诏徐勉举学士人华林，花了八年的时间，编了七百卷的《华林遍略》，目的就是要超过他的弟弟，不让萧秀占先。

这是南朝的事。后来《华林遍略》传到北朝去，传到北方的扬州，贾人以为奇货。当时高洋领中术监，集书手多，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需也。”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后来祖珽听从阳休之计策，把《华林遍略》改造，补充一些材料，特别是补人《十六国春秋》——这书萧方等于二十二岁时写成的，后来散佚了很是可惜！祖珽的辑补成为《玄洲苑御览》，后来改名

① 《梁书·安成康王秀传》。

为《圣寿堂御览》，后又更名为《修文殿御览》，因为齐大同有七个修文殿之故。《御览》的名称就由此而来，后来北宋的《太平御览》便是仿此。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一写本，伯希和列目P·二五二六号，存有鸟部鹤类四十六条、鸿类十八条、黄鹄类十五条、雉类四条，合共八十三条资料。罗振玉肯定就是《修文殿御览》，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中；而吾乡潮阳郑氏刻《龙溪精舍丛书》，据罗氏影本刻入，亦依题为《修文殿御览》。但是，洪业却加反对。[1] 认为《修文殿御览》主要是征引《十六国春秋》，而残卷第七十七条不引《十六国春秋》而引《赵书》，内有小注，断定残卷并非《修文殿御览》，而是《华林遍略》。现在暂且不管残卷究属何书，类书的编撰，正好反映了梁氏兄弟间的对抗，南北的对立。编辑类书工作的竞争，这说明类书在撰文运用事类的重要性，也对六朝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我们读颜之推《观我生赋》，其中他自己的注语有说他负责编撰《修文殿御览》的。据《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曰："之推撰《观我生赋》，自注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说到颜之推，大家都熟知他的《颜氏家训》，原来他也编类书，编文集的。有趣的是，南朝有昭明太子编《文选》，北朝也继挚虞《文章流别》，来一个《续文章流别》。从文集的编撰，也反映到南北对立的层面上来。

说到编集之事，六朝时除了各种文化都有集外，连声音也有集。最早是吕静《韵集》，他是《字林》作者吕忱的弟弟。可惜此书已佚。据《魏书·江式传》："吕忱弟静，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龣、徵、羽各为一篇。"吕静用音来编集，开后世韵书的先河。

集的作用，是把资料集中在一起，以供学习研究。这时期的作者，一方面做文章，一方面亦做文章的收集和研究。我说文学应包括两部分，文是文篇，学是学术。编集就是文与学两方面的结合，以学术来促进文学。因此，把文章收集，加以整理研究，是有助文体推波助澜的功用。《文心雕龙》一书就是个好例子，上半部讲文体，当时每种文体都有集，赋有赋集，诗有诗集，而《文章流别》其书还存在于世，所以刘勰分析文章文体时很是方便，因有很多已集中起来的材料可供使用。甚至当时仍流传某类的文集，集内序文的

---

① 见《所谓修文殿御览者》，《燕京学报》十二期。

文学理论，都可以给他应用。可惜这些集差不多统统散佚了，我们今天也无从核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文心雕龙》中的文体理论部分是大量利用了六朝以来各类总集的材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一类别总集的编撰，对文学理论发展具大有帮助的地方。

《文心雕龙》下半部的很多文学观念，内容太多，不一赘述。不过，说到文学概念，有一种应该提出。我觉得《世说新语·文学》篇很重要，虽然篇幅很小，但提出很多重要的文学概念。姚鼐所说的“神、理、气、味”，《文学》篇几乎都有提到。其中最多的是“理”字，有胜理、名理、精理、义理、本理、唱理、性理，又有理源、理窟等不下七八处之多。言“神”，则有阮籍《劝进文》，“时人以为神笔”。言“气”，则有王逸少“本自有一往隽气”，张凭“贫其才气”，“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至于“味”，则谓：“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谈《逍遥游》却有“钻味”、“寻味”。由此可见，单从《文学》篇已可得到如此重要的文学概念。当时那些论“文学”者，一半是和尚，一半是玄学家。因此，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以为只是说“玄”而不谈“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了。

一直以来，大家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大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这正好说明佛教入中国以来，对思想界、文学界产生的影响力。南北朝朝代，南北对立、胡汗对立，种种的对立冲击，把文学变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了。但总的来说，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格是“清远敻绝”的，齐梁以后，就变为“繁缛典丽”了。虽然大家都不甚注意“清远敻绝”，只有章太炎提出魏晋玄远的说法。文章之所以“清远”，原因是用以谈“玄”。《世说新语·文学》篇就提到“荀粲谈尚玄远”，又谓“支（道林）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由于人于玄中，就不觉风致清远。魏晋以来，无论是辩论的文章，论才性的文章，大抵形成“清远”的风格，开后来散文一路。魏晋时代的文章，最好是以郭象《庄子注》为代表，郭《注》的文章好极了，是可以背诵的，允为“清远”的文风的典型。齐梁以后则是骈文了，大家都

熟知的，我也不必讲了。

我今天从对立的角度来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其中很多论点和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由于文献不足之缘故。我感到最可惜的是中国人历代战争打仗事情太多，文献材料不能保留下来，归于澌灭。现在我们讲的东西很多，却苦于没有材料。举例来说，梁朝时代，刘宋几个君主都有文集，到了隋朝就很多都没有了。在《隋书·经籍志》里集部所录的书，今天几乎全都散佚了。我们是世界上最能毁坏自己文献的民族，别的国家是没有这样自我抛弃的。就连阿剌伯人都不会这样，我们在外国可随处见到阿剌伯人的写本，可远追溯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时代；中国人却什么书都没有了，现在就只靠敦煌出土的一些零星的资料，非常可惜，也是我们最大的不幸。我们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必须从其他地方，辛苦地把资料钩索出来重新整理，才可以弄清问题。但是，还有一点要提出来的，是佛经并无太大的损失，历代的佛经大致能够保留下来；虽然佛经并不是太多人有兴趣去看，但是在佛经中寻找新的研究材料，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多注意和努力。

“言路”与“戏路”

今天中文大学主办的闽方言国际讨论会开始举行，大家要我作主题讲演，实在愧不敢当。因为我却未对闽南方言作过深入研究，也够不上是个语言学家。尽管我是语言学会的会员，但是，对于闽南方言与潮语的关系问题，我年青时确曾注意过。回顾我二十多岁主编《潮州志》时，在分卷中就曾特辟一《方言志》，当时几个人共同研究，负责起草。可惜后来时局变迁，该《方言志》未能面世，而书稿也大半遗佚，但给后来闽南方言及潮语的研究者，留下了遗憾。虽然，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并非我所专长，但治学之道，在于兼收并蓄。我做学问是什么书都看，因此，自彼时开始，有关闽南方言及潮语方面的书，我也有所浏览，故也不无领会。

众所周知，一种方言的构成，必有其来龙去脉。现在大家在研究方言时，都很注意一般的语言现象，侧重于字的形、音、义以及词汇和语法的研究。我则因较喜欢历史，因此时常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探视语言问题，希望借此了解其演变和形成的过程。潮语在一般方言的划分上，属于闽南语系，而潮语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仅就某些方面表达一点个人的见解，同时提出一些问题，以就正于各位专家。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言路”与“戏路”》，似乎有点奇怪吧。“言路”通常解为“发言的途径”，“阻塞言路”即是不准别人发表意见。我此处借用“言路”一词，却是譬喻“语言的道路”（The Road of Language），除说明某种方言的演变轨迹外，同时也希望今后学界能“广开言路”，为语言学开多一

点新的路向。今天“言路”之突然与“戏路”有所牵连，正是我个人朝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戏路”一词早就有的，大家都能明白，一般解为某演员个人演戏的风格。但俗话所说的“戏路随商路”，却是指戏剧的潮流随商业发展的路向而转变，这是经济影响文化的一种表现。而我今天所指的“言路与戏路”，则是从方言与地方戏二者的相互影响，来说明方言与戏文之间的连带关系。这一课题所包含的内容十分深广，值得大家去研究。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主要是利用古版剧本的戏文，去说明方言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我认为这是研究语言学十分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剧本本身就为语言提供了特定历史背景，对了解语言的来龙去脉，可说助益无穷。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以潮州戏剧方面现存的历史文物而论，就包括有明代的戏文写本、刻本，还有其他年代的很多手抄本，尤其纸影戏在这方面所存的资料更多。我儿时在家乡潮州，就亲眼见到“林万利”店子刊印出售潮州戏册，本子种类和数目多极了，那时极便宜，很不起眼，一块钱已买许多本，现在却变成十分珍贵的文物，人们亦改变其观感，可谓刮目相待了。

现在我要举的例子，是用潮州话说的。其一是“十八棚头做到透”，意思是什么行当都做遍了，一如我做学问，样样都搞。其实，“十八棚头做到透”这句话，穷其究竟，却是源自温州，存在于南戏里面，在闽南戏本中也屡见不鲜。我曾两赴温州，对温州的南戏甚感兴趣，而且找到许多资料。其实，温州的南戏与闽南戏关系甚为密切，可谓系出同源。现在，“十八棚头”这句话仍流行于温州，而且南戏真的有十八棚头，就是在温州流传的最重要的十八出戏。而福建的梨园戏与温州的南戏有十分密切的连带关系。大家知道，福建的梨园戏分为“上路”与“下南”二大流派。“上路”则为老戏，“下南”即是南戏。“上路”的“路”属于行政区域，宋代开始有此建制，元代沿袭，特别将其定为行政单位，如“两浙路”、“福建路”等等，所以习惯上称浙江为“上路”，故闽南的梨园戏“上路”，即是标准的温州南戏。去年龙彼得（P. Vander Loon）发表的著作《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其中内容甚佳，印刷也很精美，里面有明版的《刻增补万家锦队满天春》一种，内收十八“队”，其实就是“棚头”，十八队就是十八棚头。因此，“十八棚头”的说法是从温州经闽南传到潮州的，这是戏剧对方言有所影响的显例之一。

我再用潮州话举一例子，“加啰”以及“加哩啰”、“加哩嗹啰”，三个方言词的意思者“差得远”，只是每加一语助词，则在于加强其语气。

我打电话问我们研究所的蔡俊明先生，他的潮汕方言辞大作里面是否有

收此组词汇。他说有“加啰”、“加哩啰”，未收“加哩嗹啰”。而蔡先生的书“加”则作“胶”字，二字潮州读音相同，究竟如何写法，这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最近我才悟到，似乎仍应以“加”为是。因为“加”即是增加，而“加啰”、“加哩啰”和“加哩嗹啰”的意思则是差得远，意思恰好相反，是反其意而用之，以强调某人或事物“很差劲”、“差得远”。“加”是动词，“啰”、“哩啰”和“哩嗹啰”都是语助词，助词的每一递增在于加强说话的语气。许多人都知道，明戏中的神咒在众人合唱也有“啰哩嗹”的，我曾著文述及，但其时没悟到这与潮州话有关系，所以今天提出来补充这一点。

关于“哩啰嗹”在戏文上应用，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请大家讨论。龙彼得在他的书中谈到闽南戏有出叫《戏上戏刘奎》的，这是十八出戏中之一，戏中有三次用到“嗹哩啰”，如：“我今惜尔如惜金……莫待山头路尾石步沾我身，嗹哩啰，嗹嗹嗹（此句三用）。”“嗹哩啰”或“啰哩嗹”的这些词汇可追溯至甚远，我曾加以研究，并有专文论及，最早可见于晚唐禅宗和尚使用过，在《五灯会元》里面有很多材料，我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这问题，大家可能有看到。但那时我没有注意到将其与潮州话联系起来看问题，也未注意到温州南戏中的类似材料。其实宋代温州人已甚多使用此一方言语。我试举一些例子——

其一，南宋叶适《水心文集》卷八里面有：“听唱三更啰哩论，白旁单桨水心枯”——其中“啰哩论”三字，见张炎《词源》里面所附的讴歌，当时唱者在唱词末尾每加上“哩啰唛论”，此处则为“啰哩论”三字。南宋宁波人史浩之《粉蝶儿》则有：“解教人啰哩哩啰”。显然，叶适和史浩都是浙江人，属于浙江“上路”南戏同一系统的。

另外，最近出版的《（温州）南戏探讨集》第六、七集中有温州的《叮叮当》，里面有“山脚门外罗里、罗罗里”。这说明温州很早就有这种方言词语，后来运用到南戏里面，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于1975年在潮州市出土明宣德六年的《刘希必金钗记》写本，这是目前全中国可见的最早的戏文写本，比上海发现的《白兔记》戏文写本还早。而《刘希必金钗记》恰好就是温州南戏，这是很多人参定的，因属戏剧专门研究的范畴，这里仅引用其资料，不再赘述了。

《刘希必金钗记》写本中多次出现“哩啰嗹”，如第四十出《雁儿舞》中有一段齐声——

“哩嗹啰嗹！哩嗹唻啰哩！嗹哩嗹啰哩嗹！啰啰哩嗹啰哩嗹！”

这只是其中一段。我引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唐代牛僧儒的《玄怪录》有一首酒令，内有“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来”，就与上引《刘希必金钗记》中的《雁儿舞》中的齐声唱词谐音有类似之处。《玄怪录》原是志异小说，描写蚯蚓或妖精变人的故事。其中有四个主角人物：来君绰、罗巡、罗逖和李万进，上面的小令，就是以四人之姓嵌入的。有人因此而遽以断定这是“啰哩嗹”的来源。这种看法，我绝不敢苟同，因为“啰哩嗹”这种助语词在禅宗语录中早就广泛应用，而中国人历来喜欢玩文字游戏，因此开玩笑式地以四人之姓嵌入小令中，以谐音聊博一粲，纯属文字游戏。所以，说其套用则可，若认为那是“啰哩嗹”的来源，则是本末倒置。

如前所说，《玄怪录》中的小令和《刘希必金钗记》中的《雁儿舞》是属同一类型的。《雁儿舞》中的“齐声”相当于后来之合唱，过去闽南戏未正式开场前往往先有“啰哩嗹”一类的合唱，这是一种神咒。神咒有次序规律，字数也很讲究。类似的神咒在潮汕民间至今仍然都存在。揭阳一带的巫卜神棍在为人辟邪禳灾时，往往以纸钱拊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加嗹啰，加嗹啰，从这畔加啰到那畔，保佑×××，一年四季无奔波。加啰加四遍，辟使邪煞归上天。”——“加嗹啰”事实上就是一种神咒，至今潮汕民间尚有可考。这显然与戏文中的咒语应用到民间有极大的关系，这是“戏路”对“言路”发生影响的又一例证。

以“戏路”而论，《刘希必金钗记》是南戏，后来传到潮州来。我在潮州市博物馆中见到出土的明宣德年间的《刘希必金钗记》写本，保存完好，十分漂亮。我曾建议汕头大学专门为这个珍贵的写本开一个研讨会，主要探讨戏剧与戏文、有关戏文与方言的关系以及其他问题。这个现时最早的出土戏剧写本将会吸引很多人参加会议。

南戏的“戏路”传播途径，是从温州经福建至潮州，然后到南洋群岛和越南各地。前几天我刚在河内参加远东学院九十周年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曾欣赏越南戏，音乐很像潮州音乐。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法国时，于汪德迈（L. Vandermeersch）的家里见到一本《安南佛典》，内中《上士语录》王如法谠云：“等闲戏弄没弦琴，社舞村歌且啰哩，哩啰啰，啰哩哩，不属宫商角羽徵。”——这是极为罕见的一本清代安南抄本，显然是南戏传入越南的例证之一。潮州揭阳话现在还有一句“闲啰哩嗹”，表示清闲自在，可以作为《安南佛典》中王如法谠的注脚。

清初闽南戏颇为流行，因此到处犹闻“哩啰嗹”之声。曹雪芹的先祖曹

寅曾将其讥笑为蛇语。为什么？因为“闽”字在字形上表示“门内有虫”，从蛇，因此闽话也变成“蛇语”，不单有点鄙屑之意，而且也在卖弄博学。曹寅还有诗述及“摘耳犹闻啰哩嗹”（曹寅《楝亭诗钞·听闽乐》），颇有些嘲讽之意，但也反映出其时坊间闽南戏风行之盛。所以，不仅当年江南犹闻“哩啰嗹”，而且“哩啰嗹”也一路随着潮剧传入越南，此也足证“言路”跟随“戏路”广为传播，很值得大家注意。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提议大家不妨从戏文中的资料，去发掘其与方言的关系，或可从语言学的研究中辟一蹊径。但因语言学非我专长，刚才讲了许多“哩啰嗹”的话题，真是啰里啰嗦，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

郭伟川据录音整理

从云梦《腾文书》谈秦代散文

关于最近在湖北云梦出土的一些简书，今年我在法国巴黎已看过这些材料，在《大公报》的《图书》第二十八期亦曾有刊载，我感到非常有兴趣。我愿意对这些材料提出我的看法。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我们知道，秦代的文献资料向来是非常缺乏，在文学史上是一片空白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秦代的文学材料，有清朝严可均编的《全秦文》。他用个"全"字，是指所有的秦代材料，可是他所收集的只有十六人，仅有一卷，且多数材料都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这十六个人的文章，里头还有些是不可靠的。像李斯名下有一篇《用笔法》。大家知道李斯是一个写篆书的名家，篆书是经他整理的。他协助秦始皇作过"书同文"的工作，可是这篇《用笔法》采自一本宋人所著的，叫做《墨池篇》。此为晚出的资料，我想这是不可靠的。[1]

秦代的文学材料极少，今天我们有新材料出现于云梦。这一大批出土竹简，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二个坟墓中的第十一号墓的木棺里发现的，竹简的数量竟有一千多条。在《文物》1976年第五号载有简单的报告。在这些新材料中，有一种是秦始皇二十年南郡太守名字叫"腾"的文书，另一种是《大事记》，又有法律文书，还有一些是治狱案件的。而我今

① 《用笔法》一文，见宋朱长文治平间作之《墨池篇》。余绍宋曰："不类秦文，唐以前书未见征引，其伪无疑。冯武《书法正传》亦谓未必是李斯之言。"（《书画书录解题》卷九）

天特别要讲的是关于前面所举的第一、第二两种资料。今年《大公报·图书》的第二十八期已经把这两种的原文加以发表，很值得提出来再作研究。

《腾文书》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笔调很像韩非子的句法，行文很精彩，念起来有铿锵的节奏，是水准非常高的一篇散文。这居然出于一个南郡太守的手笔。那个太守腾，并没有著明他的姓，他究竟是谁呢？在《史记》里有两篇关于秦代的材料：一篇是《秦本纪》，一篇是《秦始皇本纪》。而后一篇出现“腾”的名字：

(1)《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

(2) 又：“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这两条中，“腾”字都没有写姓，和云梦秦简相同。第一条的“假”，意思是代理，指南阳代理太守的名字叫“腾”的。另一条说内史腾攻韩。内史是个官名。知道翌年腾已被调作内史，他被派去攻韩，把那个韩王名叫安的俘虏了。后来把韩那个地方平定，以其地为颍川郡。我们知道秦有三十六郡，这三十六郡的设置是慢慢一年一年地设立的。得了某些地方，就逐渐设置。而南郡和颍川郡都属于三十六郡之列。腾这个人对秦有很大的贡献。最要紧是攻打韩国，俘虏韩王。这篇文书写于始皇二十年，那时他做南郡太守。他和十六年的南阳假守腾，我认为是同一个人，要不然没有那么巧合的。这名字叫腾的，在始皇十六年做代理南阳太守，后来被调到内史去，直至二十年的时候，再外放出来作南郡的太守，于是年发表这篇文告。我们知道南郡这个地方，很早就置郡的。《秦始皇本纪》开头就有一段记着：始皇父亲庄襄王死后，“当此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这时秦始皇刚刚登位不久，已经有南郡了。《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据此南郡该在昭襄王廿九年白起拔郢那时候就设置了。南郡地方在战国的末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秦人先打败楚国，掘他的老巢，以建立南郡。始皇把其他的国慢慢打败，最后只剩下楚国。所以这个南郡到后来还很重要。一直到始皇二十年，南郡还是有问题。《腾文书》正可证明这一桩事实。腾有很大的功勋——平定韩国。后来又叫做南郡太守。从这篇文告，可以见他在贯彻执行法家的路线。而对秦在未统一六国的前夕，强调明法、急法的逼切措施。

《腾文书》是警告当时南郡那个地区的官吏应该守法，特别强调法、律、令的重要性。又特别提到令、丞都不应该违背法、律、令。令是县的首长，丞是他的帮手。一个太守之下还有县，有道。（《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地理志》，南郡所辖有“夷道”。）那时候一定有些不守法律的，所以太守腾才公布这个文告。这篇文告完全站在法家立场说话，和韩非子的文章十分接近。秦是以法律为第一位。我记得章太炎有一篇文章叫做《秦政记》，他里头特别讲到秦法律严厉的情形。他举出秦昭王有病，百姓置牛为王祈祷。昭王认为这是非令而擅祷。虽爱寡人，仍是违背于法的。太炎说：“使君主和人民没有感情，彼此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块然”，好像一块石头一样。大家都生活于法律里，老百姓跟国君一样地共同遵守法律，没有情感可言。我们今天念这篇腾的文书，也有这种感觉，完全是以法律为第一位。文章写得非常好，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至于《大事记》，记载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为止，亦是云梦出土之文献简书。这个材料是按照年份记录下去，是一个不很完备的记录——因为它里头有些只有年，没有事情记载。像秦昭王元年就是空白，有好几年上面亦没有记事情。但仍然是按照年次安排，到秦始皇三十年为止。这材料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出土的先秦有纪年的史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发现。第一次的发现，是在晋朝武帝时河南汲县魏王的坟墓出现的一些竹简文书。后来的《竹书纪年》便从这个地方来的。晋初几个大学者像荀勖、和峤等人都有参与整理。《穆天子传》这本小说，也就是在同时出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不是原本，是经过明朝人整理的。你们念历史都知道，有所谓今本的《竹书纪年》和古本的《竹书纪年》。原来的《竹书纪年》已经失掉，清代许多学人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各方面的类书、历史书找到一点一滴的资料，然后凑合起来。像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是比较有分量的著作。这个云梦竹简所记，从秦昭襄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的大事，写在竹简上面，一条只能写几个字。这篇大事记只有五十三根。虽是不多，但材料很宝贵。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发现有年份的先秦纪年史料。这一材料在《文物》今年的第五期已正式发表了。我认为这桩材料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这材料是简单的，只是记某某年打什么地方。多数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记录，大多数不写月日。我没有太仔细地统计，大概只有十几条有写，其他则没有写明月日的。关于不写月日的问题，我们知道太史公的《史记》

有部分利用古籍的《秦纪》，是他写秦本纪的主要根据。[1]《秦纪》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可惜已失传了。他在《史记·六国表序》就提到这句话："独有《秦纪》，又不载月日，其文略不具。……"云梦《大事记》的竹简，我不敢说就是《秦纪》，但是起码他的写法就同《秦纪》有类似的地方，多数不载月日。可见当时写历史的人并不是有意思写历史的，却喜欢用日记方式去将事情记载。这正是所谓"断烂朝报"。当时《竹书纪年》也有这个情况。我们开始念《竹书纪年》时，会觉得记载那么简单，真是惜墨如金，不敢多写几个字。今天我们看到这批云梦竹简材料，便可参合《秦纪》，得到合理解答。

（二）在云梦这篇秦简里头，屡次见一个"今"字，好像他叫秦始皇做"今"。里面出现"今"字有两次，一次是今多少年。像"今元年"，有一条是："今廿八年，今过安陆。"安陆是湖北一个县名。这两个"今"字，就是指秦始皇。他没有称"今上"，就只"今"字。这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当晋初《竹书纪年》出土的时候，荀勖做过整理的工作。荀勖有一篇《穆天子传序》，经过多年的传写，里面有二处提到"今王"，都被误作"令王"。另外，他说当时在魏墓出土的竹书，引"和峤云：纪年起黄帝，终于魏之今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亦有一个"今"字。这是对的。荀勖的《穆天子传序》，后来因不同的本子，即误"今王"作"令王"，宋人又把"令王"读成"灵王"[2]，于是有些研究《穆天子传》的，像近人写《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的，就说这个应该是"令"字。[3] 但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从云梦竹简上的"今"字，可以看到这"令"字分明是错误的，这是可以确定的。

（三）要讲的是牵连到腾的问题。秦简《大事记》有一条说到昌平君，在"秦始皇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同书又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我们知道内史腾在秦始皇十七年已把韩王安俘虏了。据秦简，韩王就在二十一年死去，昌平君即被外调居于韩地。昌平君本是楚国的公子，他很早就在秦的宫廷任职。《始皇本纪》云："（九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嫪）毐，战咸阳。"《索隐》云："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我们知道秦有乱，昌平君以相国身份参加平定嫪毐的。他是楚国的公子，却去帮助秦。在历史没有谈到昌平君住在韩的地方，亦没有记载他徙居郢的时间。这二条可补《史记》之不足。到秦始皇

① 参看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六三，《秦纪考证》。

② 宋高似孙《史略》。

③ 朱希祖《汲冢书考》，附《魏哀王魏令王考》。

二十三年，楚国又有暴动。这时项燕便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昌平君原是楚国公子，这时徙居在郢，所以楚国人仍然希望他能起来与秦斗争。在这时他就被拥戴起而抗秦。至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也自杀了。在廿五年以后，秦人才正式平定六国。这是《史记·始皇纪》的讲法，清朝学人像梁玉绳的《志疑》，却有许多修正的意见。秦简有这二条，说昌平君在韩王死后到韩的地方去住，后又徙郢，就可知道当时六国虽然逐个被秦人击破，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潜伏着的，所以屡次必须派朝廷的大员去镇压。南郡虽是很早经秦廷置郡，但周遭楚人的势力仍然很活跃。我们看秦简《大事记》分明写着："始皇十九年，南郡备警。"试想在秦始皇二十年的时候，楚的地区还有很多问题，腾被派来南郡做太守，便发表这个文告，表面在叫人家奉公守法，要遵守法律令，但骨子里一定有一个历史背景，目的在对付楚的反动力量。到了秦王二十三年的时候，楚有一次暴动，他们却利用昌平君来图谋复国。南郡原是楚的旧地。在秦始皇二十年到二十三年这个期间，一定是有很多问题的。在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其赦令中说道："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苏林注："青阳是长沙县。"这说明荆楚的复国分子，中间曾袭击南郡。所以秦简说"南郡备警"，事正吻合。我们可想而知，楚国最后被秦始皇平定，但是楚人始终不甘心。后来项羽继续出来反抗到底。六国的潜势力，在秦大统一后仍是很强大。《腾文书》提及"乡俗、淫佚之民不止，即是废王之明法"。所谓乡俗，即指六国的人民仍保留他们的旧习惯，很是明显。

我今天就以这两件材料加以解释。这是一种比较个人的看法，所以提出来商榷。

我们从这件地下文献看来，南郡太守腾责所属令、丞，遵守法律。其实"令"的职位，在秦的时代地位并不太低的，他常常可以向中央提出不同的意见。试举一个比较偏僻而在文献上不太被人注意的材料来谈谈。在《汉书·艺文志》子部的纵横家部分，著录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斯"。这篇文章在汉成帝时尚保留在中秘（国家图书馆）。这是给始皇时代的丞相李斯辩论的。零陵令的名字叫信，没有记著姓。这是秦的习惯。秦简上的南郡守腾也没有著姓。这篇文章全文已佚，今天只有一条材料保存在《文选·吴都赋》的刘逵注中。文云："秦零陵令上书曰：'荆轲挟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长剑自拔。'"这句话就是讲荆轲刺秦王的时候。这位陛下当然是指秦始皇。"扶揄"是什么东西呢？当是一把剑的名字。荆轲刺秦王，秦王把这把剑

拔起来，这剑有个名字叫“扶揄”。左思的《吴都赋》上说：“扶揄屡镂。”西晋时刘逵见到秦零陵令上书，故引证它来解释扶揄这两个字。扶揄，据所知，有许多不同的写法。它是一把剑名，并没有问题的。屡镂乃是吴王夫差送给伍子胥自杀的剑，这是谁都知道的。扶揄的不同写法在宋本《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兵部七五剑下引《广雅》，这个剑名引作“蔡偷屡镂”（中华本，1580页）。可是清朝王念孙作《广雅疏证》，他在这一条居然作“蔡伦”，不作“蔡偷”。很奇怪，王念孙没有下注语，他避开不谈。但是我们知道蔡伦是造纸的人，哪里有一把剑名叫蔡伦呢？但据此王念孙用的《广雅》本子有作蔡伦。我们可以推定，本应是“蔡偷”，“蔡伦”是写错的。剑名应该叫“扶揄”，是秦始皇拿来对付荆轲的剑。而我无意中发现这一条，可以补订《广雅疏证》。荆轲刺秦王事在始皇二十年，《腾文书》发表在始皇二十年四月，正是同一年的事。

零陵在秦时尚是一个县，其时零陵可能属于长沙郡，到汉武帝元鼎六年才置零陵郡。秦零陵令写文章上书给李斯辩论，想必在始皇二十年荆轲事件之后。他们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文章失掉，无法知道。现在残文中只剩一把剑名。《汉书·艺文志》说此文目的是难李斯，可惜不知所难为何事。我们回头看在《腾文告》的竹简里头有一段说道：

> 凡良吏，明法律令。……又能自正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
>
> 恶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吏（事）……緰隋（偷惰）疾事，易口舌……毋公端（正；按此避秦政讳）之心，而有冒柢（抵）之治，是以善○（斥）事，喜争书。争书因恙（佯）瞋目扼○（腕）以视（示）力，訏詢疾言以视（示）治，○○丑（醜）言麃斫以视（示）强，而上犹知之○（也）。故如此者，不可不为罚。

上面这一段文章是非常好的。以零陵令的地位而可以上书给丞相李斯辩论，可见秦时低下的官吏尚容许和上级辩难。我们知道韩非子的书中有讲“难”的四篇，有关辩论技术的掌故。在春秋时代，辩士一方面是纵横家，一方面亦是法家。法家参用纵横家之术，纵横家一定要辩论的。《韩非子》的“难”篇，文章非常好，所以念《韩非子》的人不念“难”篇是不会写辩论文的。可是韩非子本人是反对政治上的辩难。他在《问辩》篇说：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韩非极力反对辩，因为辩是有妨碍于法令的推行。《腾文书》指出良吏和恶吏的区别，在于良吏不与人辩，而恶吏则独冒犯上，善斥事而喜争书。他所谓“争书”，即韩非所谓辞争之论。他所谓“坑阆强肮以示强”即韩非所指犯上的抗行。腾的主法律令而非辩，与韩非的意见一致，同是反对文学的。虽然腾在文告尽力强调应该守法、去辩，而零陵令仍是胆敢上书和丞相非难，他的文章尚为后代人所珍视。在法家盛行的时代，那么威严的丞相，也有人可以上书和他辩难，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此外另有一篇亦是非常偏僻的文章。它的篇名保留在《史记》的注解里。这是一个辩士遗秦将章邯书。而这封信现在也看不到了，只是在《李斯列传》裴骃《集解》提到这篇文章的名字。复有一句亦有“今王”二字。文云：“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这个今王当然是指胡亥。这篇文原载在杜预的《善文》中。《善文》是杜预编的一本总集，《隋书·经籍志》里有著录，共有五十卷。《善文》一定是非常好的文章。而杜预编的《善文》在昭明《文选》之前，可算是最早的总集。严可均辑此文，标题曰《辨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题目则是他安上的。韩非与南郡守腾都是反对争，反对辩，可是秦世仍纵横的余波，辩士之端，是难以消除的。法令虽然滋彰，而辩仍不止，故文学虽为法家的眼中钉，却照旧为人所喜欢。所以刘勰云：“秦世不文，乃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篇）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的文学材料虽然非常少，但是还有很多可以讲，可惜只是太零碎罢了。平时我们念秦代的文章，只有李斯那一篇《谏逐客书》，家弦户诵，那是因为《文选》收入的缘故。这篇文章在一般古文家心目中的评价是很高的。现在我们再看南郡守腾这篇文章，我觉得也可以选来念，亦是代表法家的大手笔，足以和韩非媲美的。

谈到古文，从前唐宋八大家就有好几个人是学《韩非子》的。算起来，

起码会有一半。例如唐的韩、柳，宋的苏老泉、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所以，《韩非子》的文章，桐城派最后有一位大师，专讲义法的吴汝纶的儿子吴北江，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桐城古文义法的选本，只选两个人的文章：第一个是韩非子，第二个就是太史公。如果念了这两个人的文章，包你会写古文。该书开头就选《韩非子》的“难”篇给人诵读。所以从文学上观察韩非文章对后来的散文的影响非常大。八家的文章以至桐城派，假定要为辩论文，一定是不能离开韩非的。今天看了腾这篇文章，便想到这个问题。而腾这篇文章亦是相当优美，很值得指出来作为范文。关于他的历史背景，我亦顺便讲这么一点，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我今天提出这个不成熟的看法，以后这个材料正式公布了，那么我们再作深入的研究。希望各位指教。

王小娥笔记

附记一　南郡守腾文书影本及摹本

据1976年《考古》第五期图版三1至8，又该期307页摹本，该文书已正式发表，原貌历历可睹。凡十四简，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从“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起，讫“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止，共八简，三百二十七字。“邮行”以下留有许多空隙。第二部分于“凡良吏明法律令”起，讫“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共六简，应是第一部分的附件，故放置一起。或拟定第二篇名曰《课吏》，似未甚安——因为没有根据。第一部分文书末言“别书江陵而以邮行”，《汉书·地理志》南郡首县为江陵，原是楚的郢都。秦的南郡，江陵当亦属首邑。故文告在此处分发。

附记二　腾文书所见之秦代联绵语

“诬讥”

或改读为“啴谐”，于字形难通。按《字汇补》：诬，诬字。讥或讼之省体。此二字也许可读作“诬讼”。

“麃斫”

秦简隶体如此。或以《方言》郭璞注扬越古语训无知之“却斫”释之，然“却”字与“麃”字形相去极远，按《说文》斤部：“斫，击也。”麃当读

爊。《广雅・释诂》四："爊，煴也。"《说文》金部作鏕，读若奥（小徐本）；字亦作鏖。《汉书・霍去病传》："鏖皋兰下。"注谓："苦击而多杀也。"故麃斫犹言鏖斫。二字重言，俱训"击"。所云："诬（诬）讼（讼）醜言麃（鏖）斫以视（示）险"，鏖斫有如今人谓双方互相攻击也。险字简文甚显晰，或读为俭，非也。《荀子・不苟》篇："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此即险之义，不必改读为"俭"。

"坑阆强肮"

《说文》阜部："坑，阆也。"二字分言，秦简坑与阆合为联绵字。《字林》："阆，高貌。"扬雄《甘泉赋》："閌阆阆其寥廓兮。"李善注引《说文》作"门高大之貌"。肮字，《说文》所无，而亢或体作颃。扬雄《解嘲》："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汉书》作亢，《文选》作颃。段注云"颉亢谓邹衍之强项傲物"。肮与亢、颃当是一字，故强肮即强亢，犹言强项也。《后汉书・杨震传》，灵帝称震玄孙杨奇云："卿强项。"又《酷吏列传》汉光武谓董宣为"强项令"。章怀注："强项言不低屈也。"朱骏声云："项，读如亢也，是犹直项"（《通训定声》项字注）。项可读亢，故如秦简之"强肮"，即汉人语之"强项"。此四字为新出资料，可补《说文》注之不及。

《后汉书》论赞之价值

范蔚宗左迁宣城太守，乃删众家《后汉书》，以成一家之言，时年二十七耳。嗣以彭城王义康事牵连弃市，仅四十八岁，其《后汉书》仍未完编。盖前后耗廿年工夫于此，体大思精，故自视甚高。于《杂传论》则自诩为“不减《过秦》”，于“赞”则自夸为“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1]。可见其致力之深。蔚宗又云：

> 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

又言：

>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彼谓意以达旨，是为文心；文以摛词，是为文藻。抽芬芳，犹言形文也；振金石，犹言声文也。其言形、藻、义、韵四端，是文之外相；事、情、旨、意，则文之内蕴。而彼所重者仍是在内之精意杰思耳，故又自言“吾《杂传

① 见《狱中与甥舅书》。

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云云，足窥其用心所在。乃后世读其文者，特赏其辞藻，徒以文士目之。甚矣，知音之难也！

范氏家学渊源殊远。父秦（伯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其于高风既为著论，又复有赞。蔚宗述之云：

> 先大夫宣侯（即秦）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范书《逸民·高凤传》）

蔚宗《后汉书·逸民传论》，辞意脱胎于此。如云：

> 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笔势奔放，叠用六个“或”字，跌宕有逸气。句法虽变，而文章大概取自其父，至为显然。范泰别有《高凤赞》，其警句如：

> 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冲情英亮。……肆志莫羁。（见《艺文类聚》三十六引）

此类笔致，亦蔚宗所师法者。传之系赞，嵇康已开其先。若《圣贤高士传赞》，是其著者。孙绰亦有《至人高士赞》，俱在范泰之前。论后有赞之例，后人病其重床叠屋，今观范泰之于《高凤传》，已是如此作法。

二

蔚宗《后汉书》乃删定前贤之作，即传赞亦多取之前人。若《黄宪传论》引其曾祖穆侯（范汪）之语，谓宪能隤然处顺，《皇甫嵩传论》之称引华峤，

誉嵩之不伐，收名敛策，《班彪传赞》之改用谢俨“裁成帝坟”之句[①]，俱其明征。

范书似颇得力于袁宏。宏《后汉纪序》自述其作史之方，谓：“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又云：“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故其书力主左氏，称：“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所以为之“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袁书精彩处，在即事评论。袁宏曰以下，精义甚富。遗事之外，必陈义教。此即蔚宗之所谓“旨”也。袁氏步武荀悦，所诣在乎义旨，史事抑其次焉。蔚宗提出意与文两端，较袁氏为兼重文藻，虽复抽芬芳而振金石，要毋使以文掩意，以意害文，双轨并进，庶乎文质彬彬。是说也，昭明太子纂集《文选》实本之。《文选》不录经史之文，而独辟“史论”、“史述赞”二项，以采班（固）、范（晔）、干（宝）、沈（约）之篇。其序云：

> 至于纪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此一破例之举，盖以史书中之论赞，“事”与“义”皆有足取也。范氏《狱中书》称“事尽于形”，“义牵其旨”，萧序亦揭事与义二端。范自言其赞为文之“杰思”，萧序则云出于“沉思”，其说濡染于蔚宗，较然可见。向来论萧选者，恒以沉思翰藻二句，为全书选文之标准，不悟句中“若其”之“其”字，实单指史书而言。偏称、全称，可不甄辨乎？

二

唯蔚宗耻作文士。观其《文苑传赞》云：

>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① 《宋书》云：“谢俨作此赞，裁成典坟，以示范晔，晔改为帝坟。”

亦主诗人丽则之旨，以淫滥辞费为戒。《后汉书集解校补》称："《文苑传》甄录所及，皆有关系文字。《章华》一赋，亦谓终之以正。仅乃存之，非是必不著。"颇能抉发范氏之旨。《史通·序例》云："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是范书《文苑传》原有序论，今本无之，殆缺佚耶？

由是观之，范书《文苑》甄录之文，以"旨义"为依归，其论赞亦有微意寓于其间。举例论之：《左雄周与黄琼琬传论》述贡士选举制度，乃综论东京之人才。《蔡邕传论》谓："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之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文章极美，笔端有情。《孔融传论》称其："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令人读之，声泪俱下。《儒林传论》陈当时学弊，"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足为今日之戒。《诸夷传论》为蔚宗最得意之作。《狱中书》云："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夫子自道，谅非溢美！《南匈奴传论》辞句锤炼，仿《燕然山铭》。《西域传论》言释氏"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颇中彼土夸诞之病。蔚宗之父泰有《佛赞》，言："舍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灵觉，因心则崇。"（《弘明集》十六）直能明心见性。蔚宗之于释氏，亦家学也。

唐宋以降，于蔚宗之文轻肆讥弹。容斋谓其序论了无可取（《随笔》十五），直斋则讥其赘；翟公巽谓其冗陋，至欲别作《东汉通史》；宋神宗恶范氏之名，欲改修其书。此皆未明范氏立言之要，但以文士目之。清代学者于范氏认识较深，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陈兰甫《申范》，皆辩明范氏行迹。李越缦《读书记》评述范书序论，列举其佳篇，说俱允当。

三

范书在南北朝时，流行已甚广，《北史·帝纪五》：魏孝静帝将禅位于齐，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按此出《汉献帝赞》，时帝年仅二十八岁，而随口背出，

至可惊异。[1] 知范赞在当时之脍炙人口，即北方胡主，亦能暗诵。[2] 若昭明《文选》之选录《光武纪赞》，更不待论矣。考《魏书》十五《刘芳传》，芳撰有《后汉书音》一卷，《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之。芳以其父刘义宣之难，自南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其《后汉书音》，据余嘉锡《东观汉记辨证》，即考范书之音。北魏之流传范书，与刘芳或不无关系也，章怀太子以后，为范书撰音义者，梁有韦阐[3]，陈有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有萧该（《范汉音》），足见范书在南北朝时传诵之广。

《隋志》正史类著录，范晔《后汉书》外，又有《后汉书赞论》四卷。两《唐志》俱有《后汉书论赞》。据此隋唐时曾将论赞抽出，与本书别行。然蔚宗《狱中书》称"作论后未果"，似"论"之一部分未曾完篇。今观范书篇末或系论或否，可验吾说。而赞则各篇皆有之。彼固曾云："赞是吾文之杰思。"是其精力所萃者也。因斯以言，赞为完篇，而论则属草未竣。是以论与赞别出单行，恐是后人为之，亦犹挚虞以《汉书述》别行之例（详《匡谬正俗》）。宋窦俨（一作严）撰《东汉文类》三十卷，类次《后汉书》中，文字附以范晔序论（见《玉海》五十四），亦别为选出者也。

四

刘子玄《史通》特立《论赞》一篇，以为史家体贵简要，讥范书之论，华多于实，而嗣论以赞，为黜弥甚，深加诋毁。赵宋学者，多拾其唾馀。然刘说实未允，兹评量之如次。刘云：

>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为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黜尔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

① 魏收之书，《孝静纪》亡，后人补以《北史》。

② 此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不载。

③ 《后汉书音》二卷，见《隋志》及《韦献传》。姚振宗谓为范书作。

按《文心雕龙·颂赞》云："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由是观之，迁、固皆在书末，范氏散入各篇之后者，当是原未成书，不及为自叙之故。然子玄之说，有误解者数端：

（一）班述与范赞，不宜视为一体。何以言之？班述乃因己书综其大意。述者，谦词（颜师古已发之）。班述每篇之末，必书"述某篇第几"，乃统筹全书而作。扬雄《法言序》亦言撰某篇，易其动词曰"撰"。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咸曰"述某篇第几"，即祖班书之例。若范赞则因人月旦，或合数人，同条共贯，施以褒贬，而不列篇第，此与班述迥异其趣。考班书传后，往往有"赞曰"，则略等蔚宗之论，何得云范氏改彼述，而呼之曰赞耶？此一事也。

（二）范书论赞附于各篇，未必是误本。唐世范赞别行。《隋志》著录范书九十七卷，又有赞论四卷。衡之《新唐志》范书九十二卷，又论赞五卷（一作四卷），则九十七卷之数，仍赅有论赞在于其中，与今本无异，安得遽目之为误本乎？此二事也。

（三）释典偈言，非尽在篇终。所为偈（Ca-tha）者，"音为伽陀，此方当颂，抑或言摄"。梵书长行（散体）与重颂并行。惯例四句为一伽陀，亦即一契。一段之中，每杂偈言，与赞悉居篇末殊科。以之取譬，似有未当。此三事也。褚渊《荐臧荣绪启》称"其撰《晋史》十卷，赞论虽无逸者，亦足弥纶一代"（《南齐书·臧传》），则步武蔚宗者，大有其人，岂萧、李而已也。

颜师古云："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后人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颜监持此以驳挚虞，复著其说于《匡谬正俗》。按此说实本诸《文心雕龙》，颜氏引之而误记刘勰为刘轨思。考《陶渊明集》中有《读史述》九章，亦赞之体。盖自挚虞别出"汉书述"为一类，晋人沿之，于文体中，立"述"一名。《文选》第四十九卷，"史论"类，收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此即班书原有之赞，列之史论者——因班书之赞，实即论也。但《文选》第五十卷又特立"史述赞"一类，收班固《汉书》述赞三篇及范蔚宗《光武纪赞》。按班书《叙传》统云"其叙曰"，并无"赞"字。挚虞称之曰述，尚有根据。遽呼为"赞"，恐属无稽。其以范赞与班述，目为同类，难怪招来刘子玄之讥。此乃后贤论赞之误解，与蔚宗本人实不相涉也。

五

知范书之论，即班书之赞矣。而又益以四字句之赞者，考荀悦《汉纪》于重要史事下辄加评论，题“荀悦曰”三字。[①] 袁宏《后汉纪》因之。以荀于每帝纪之末，系以“赞曰”，作为总结。袁书删去“赞曰”一项，此其异于荀者也。范书有论复有赞，近于荀氏，而易赞体为韵语之赞，则沿刘向《列女传》赞之例。其父范泰之于高风，有论有赞，早具此体。

魏晋以来，赞体盛行，其最特异者，无如常璩之书。其书卷第十题曰“先贤士女总赞”，而于自序则称曰“总赞论”。其法先述“赞”二句或数句不等，下即叙其生平，并略加评论。此则先赞后论，而论又兼为传体者也。又常书卷十分上、中、下，其前有引，而未有“撰曰”以总论之，分记述某地人士及列士，则犹《汉书》之“述”。[②] 盖此一时期，赞体颇为复杂。宋谢庄有《赞集》一书之辑，惜已无传。[③] 荀悦之书，几见论曰，又系以赞。常璩之书，赞论兼备。此乃一时之风气，蔚宗不免受其濡染。子玄之讥讪，其亦可以已乎？

予因蔚宗书而重有感焉。近世史学发达，资料之出现，方法之讲求，固已迈越前古，然仅着意于史迹。辨伪则厘析其史料之真假先后，考证则务为饾饤苛碎，于袁氏、范氏所谓义教与意旨者，概摒而不问。问或论之，而莫关名教，绝无情采，既乏“沉思”，又寡“翰藻”，是乌足以尽史之用乎？范氏论赞，义者多病其稠叠，不知论之为务，关乎史识；赞之为事，系乎文才。不史不文，有何足观？余论蔚宗论赞竟，不标亦为之怅怏踌躇也。

1965 年 3 月于香港大学

原载《中国学志》第二本

① 今所见明刊本如此。《史通·论赞》篇言“荀悦曰论”，不云自显姓名，岂旧本《汉纪》略同范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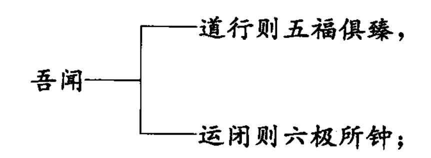
② 按《说文》：“撰，专教也。”楚辞《大招》：“听歌撰只。”注：“无不具也。”知撰有“具”之义。

③ 高似孙《史略》曾列举书名有赞者，可参看。

连珠与逻辑

——文学史上中西接触误解之一例

连珠是文体的一种，刘勰列于杂文类。其文体制，辞句要对比，而隽永含蓄，上下对句，互相引申，不是指说事情（not a statement），而是借喻以达旨（used as a simile or metaphor）。[①] 试举一二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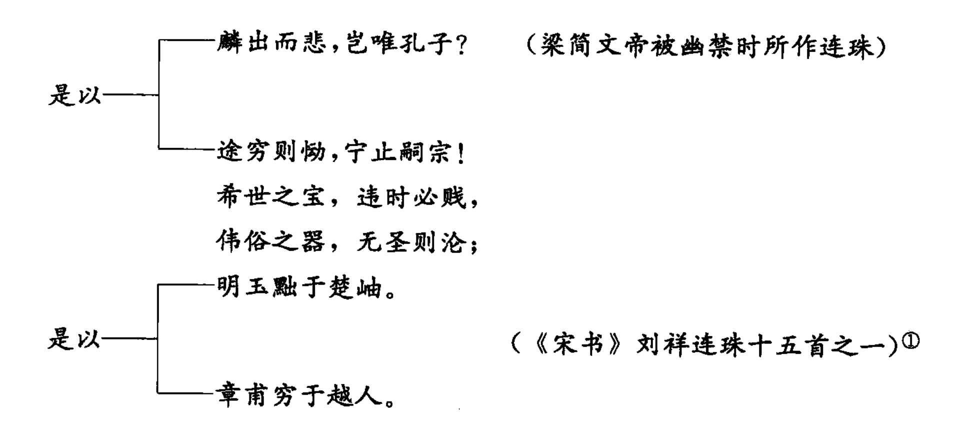


① 傅玄《叙连珠》云："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竖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刘勰云："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夫文小易周，事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依是以言，"连珠"文体不能单指其中一个事项，而是联合若干事项合成一篇，才能做到"磊磊自转"，"历历如贯珠"，方符合累珠相连就串的名义；否则一个事项只可看做一颗明珠，而不能说是成串的连珠。这是《文选》所标揭的传统杂文的连珠。又诗中尚有一体称曰连珠体者，如明代画家唐寅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试举一首为例：

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花美似人临月镜，月明如水照花香。

扶筇月下寻花步，携酒花前带月尝。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将花月作寻常。（《唐伯虎集》卷二）

这是将花与月二字，在每句中连环复出。尽管花样不同，而不离此二字。这是另一种文字游戏的"连珠体"。



它是很特殊的表现方式：（1）上下二联必是偶句，上联可以相反或者相成。（2）中间必用“是以”（therefore）一语词来衔接下面的偶句。（3）上下联意思必有相互关系。往往是由一般（同然）推到特殊（独然），从虚理推出事例。当然，“连珠”亦是采用推理的形式来表达的，但它没有“中词”来作媒介，中间用“是以”仅是一个 conjunction，所以严格言之，它应该只有二段论法，没有三段。

逻辑的 syllogism，因为由大、小前提（major premises，minor premises）得到结论，重要是作为媒介的中词（middle term），故日人译称为“三段论法”（严复译称大前提为例词，小前提为案词，结论为判词）。可是，严复深讥日译三段论法的不妥，他在翻译 John Stuart Mill 的 *A System of Logic* 导论时，却把 syllogism 译作“连珠”。他在《穆勒名学部首》上说道：“连珠者，持论证理最要之器也。”② 用典雅的汉土为旧有名词来翻译，是“格义”的老套，是可以的，但必须准确。以连珠译 syllogism，很有问题，故引起人们的非难。1909 年，章士钊撰文曰《论翻译名义》，加以指摘，讥其出于附

---

① 上举二则，采自宋本《太平御览》卷五九〇文部六的连珠类，2658 页。

② J. S. 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 *Inductive* 书中的 Introduction 第三节“By some，indeed，these previous topics were professedly introduced only on account of their connexion with reasoning and as a preparation for the doctrine & rules of the Syllogism”。严译在《穆勒名学部首》第三节“论名学乃求诚之学术”译出上段文，提及“作者之意，亦以连珠法例而后为之”。这是他把 syllogism 译作连珠的一例。

会[①]。1919年，即五四运动之年，章士钊讲授逻辑于北京大学（他原是1907年在苏格兰大学学过逻辑的）。在五四前后，国内学者接受西方思想，从事中外逻辑的比较工作尚有多人。章氏在《甲寅杂志》中发表不少论文，可以反映当时人物对西方思维术了解的一般情况。章氏又提出《墨子·大取》篇中“三物必具”一语，与逻辑三段合符。以是他说一段论法，亦可称为“三物语经”（说见他后来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另著成的《逻辑指要》专书，151页）。按“三物”一词与亚氏所论 three figures 颇相应。惟《墨子》三物的内容，没有亚氏《前分析篇》那样具体，亦不宜轻易比附。

其实 Syllogism 一名，在明末崇祯四年（公元1631）由耶稣会士葡萄牙的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之中，音译为“细录世斯模”（即拉丁文的 Syllogisme）。有自注云：“推论一规式也。”把它意译作“推论”是不错的。《名理探》译自16世纪葡萄牙 Coimbra 耶稣会士学院的逻辑讲义。该院在 Pyrenee 半岛，当时有逻辑名师 Fonseca，傅汎际即是他的学生。李之藻通过傅氏之助，从拉丁文本译出是很可靠的。[②]

“推”字在《墨子·小取》篇已出现。“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也。”“不取”是指媒介的中词。

不取＝媒词

所取＝其他二词

《墨子》所言的“推”，含义与三段论法很接近。故以“推理”译 Syllogisme，比较“连珠”为合适。杂文类连珠的写作，是以比兴暗示为其手段，

① 章士钊《论翻译名义》此文首先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为《国风报》而作。后收入《逻辑指要》，作为附录（425—443页）。文中举翻译不可犯之弊有四：一、斗字；二、附会；三、选字不正；四、制名不简洁。他反对严复译 syllogism 一名为连珠，列于第二项的附会类。《指要》一书抗战时重庆的时代精神社印行。

② Syllogism 一字原出希腊文，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前分析篇》（*Analytica Priors*）全书即专论 Syllogism 的构造、模，作极详细分析。西方学人研讨至繁。康德（Kant）著文论四式之虚幻精巧（1762），仍是同一律与矛盾律的道理。他如 Jonathan Lear：*Aristotle and Logical Theory*，Cambridge U. 1980 开端便论 Syllogistic consequence，是其一例。今不详述。李之藻译傅汎际《名理探》云：“至论要界，则去‘细录世斯模’。缘推论极切之规式，在拉细录世斯模故也。”（商务印世界名著本，29页）这个音译是用拉丁文的。《名理探》书中商讨亚氏设推论之规模甚详，宜取与亚氏原著互勘。亚氏《范畴篇》近年已有人新译。至于《前分析篇》涉及的问题，有韦卓民著《亚里斯多德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他仍旧沿用“三段论式”一词。

与逻辑之讲究推论方式，毫不相干。用连珠一名来译 Syllogism，完全出乎格义的旧套，拟于不伦，欲求典雅而反失真，章氏纠正之，是也。

自从中西思想接触以来，外来名词许多径从日本吸取，国人无条件接受而不加以仔细探讨。至今“三段论法”一名，人人皆知，明末及清季的译名反无人知道。究竟何者为恰当，还须好好切磋。今试举“连珠”一例，以见五四运动前后，学人对逻辑了解和商讨的情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之作，或者有一点的参考价值呢。

六朝文论摭佚

彦和以前，有关文学批评之专著，实繁有徒。惜乎多已沦佚，内容未由考覈。其脍炙人口，至今尚有零玑碎璧，可供玩味者，若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既见引于《文心·序志》篇，世已耳熟能详；然论述者犹多挂漏。他若公幹、吉甫之辈，已无可征。刘桢论势，只《风骨》、《定势》两篇，各引一条。吉甫为应贞字，璩之子也。《晋书》本传称其文集行于世。《隋志》，梁有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亡。彦和所称吉甫文评，疑指《百一诗》注也。此外见于各史传志，文论之佚籍，尚有多种。兹为专文考证，藉见六朝诗文评之概况，且为读《文心》与《诗品》者之一助焉。

《文检》六卷

此书见《宋书》九八《氐胡传》。（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沮渠茂虔上表，献河西人所著书一十九种一百五十四卷，中有《文检》六卷（罗根泽以为茂虔撰，大误），在阚骃《十三州志》之下，《敦煌实录》之上，撰人未详。《隋志》子部儒家类，魏朗著《魏子》下小注云："梁有《文检》六卷，似后汉末人作，亡。"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均入子部儒家类，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则入集部总集类。此书内容未详，从书名推测，可能即论文专著。梁有此书，乃宋元嘉间由河西传入者。

傅祗《文章驳论》

见《晋书》本传，云：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斠注卷四七）。祗即魏太常傅嘏之子，晋怀帝时司徒。此疑为晋人之论文著作，未见流传。祗文见《全晋书》卷五十二，辑存三则。

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

见《隋志》史部。《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五卷"。此书有叙，疑亦辨章文学源流之作。

郭象《碑论》十二篇

《晋书》本传云："常闲居以文论自娱。""永嘉末卒，著《碑论》十二篇。"此书文廷式、丁国钧《四家补晋书艺文志》，入总集类，未知是否论"碑"之作，如桓范之论铭诔者然。殊难确定，姑著以待考。

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二卷

《晋书》本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虞为皇甫士安门人。士安序左思《三都赋》，谓赋"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故文必极美"，"辞必尽丽"。挚虞论赋则谓"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大抵以太甚为病，主折衷之见，实开彦和之先路。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其抄袭。即若《颂赞》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别》，《哀吊篇》亦有取乎挚君。"诚然。

颜延之《庭诰》云："挚虞文论，足称优洽。"萧子显称"仲治之区判文体"（《南齐书·文学传论》），钟嵘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而《文心·序志》篇则云："《流别》精而少功。"（此据《梁书》，本书则字作"巧"）钟 、刘犹许其为"精"、"详"之制，则此书之价值可知。

又《文心·颂赞》篇云："挚虞品藻，颇为精覈。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复言："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此皆对挚虞提出商榷之点。关于汉书赞称"述"一事，颜师古《匡谬正俗》云：

挚虞撰《流别集》，全取孟坚书序为一卷，谓“汉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著评论之外，别为一首，华文丽句，标举得失，谓之为“赞”，自以取则班马，不其惑欤！刘轨思（按此颜监误记）《文心雕龙》虽略晓其志，而言之未尽。（秦选之《匡谬正俗校注》卷五）

按《汉书·叙传》师古注亦楬櫫此说，略谓：

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之叙目耳。……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挚虞尚有此惑，其余曷足怪乎？

亦以挚虞之说为非。王先谦曰：“《文选》目录于此书纪传赞称‘史述赞’，李善注引皆作‘汉书述’。”盖并沿《文章流别》之说。

流别者，《说文》：“𠂢，水之衺流别也。”挚虞以“流别”名其书，凡六十卷，分体编录，着眼于文体流变之义。又著有《论》二卷及《文章志》四卷，见《隋志》史部。则其书盖包括文选、文评、文史三大纲，历代选家未有如此详备者，故《隋志·总集序》亟道之。以其“采摘孔翠，芟剪繁芜。……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不特昭明《文选》取材于兹，而《文心》上半部，何曾不资为挹注？后之继躅者，若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孔宁《续文章流别》三卷，俱见《隋志》，惜已亡佚。而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亦言北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三十余人。之推且掌《续文章流别》之制。是北朝步武仲洽，纂辑续编，则此书影响之巨可知矣。

李充《翰林论》三卷

《隋志》：“《翰林论》二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其卷帙如是之多，疑本亦选录文章，如仲洽之体。充事迹见《晋书·文苑传》。充博通群书，东晋初为著作郎，撰《元帝书目》（见《七略序》及《隋志》）。史称其“删除烦重”，“甚有条贯”。（骆鸿凯《文选学》次李充在挚虞之前，非也。按虞于永嘉五年洛中大饥五月饿死。事详《御览》三十五引王隐《晋书》。）《文心·序志》篇云：“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案本传充

字弘度，宏范乃李轨字，当作“弘度”为是。充此书宋时尚存，《玉海》六二引《中兴书目》云：“《翰林论》三卷，凡二十八篇，论为文体要。”（参新印《宋史·艺文志》附编《中兴馆阁书目》534页文史类）原书虽不可睹，按其篇数，已逾《文心》之半，谅为彦和所取材无疑。

然《文心》云：“《翰林》浅而寡要。”钟嵘《诗品》亦云：“李充《翰林》，疏而不切。”又卷中论郭璞诗云：“翰林以为诗首。”晋室南渡，景纯盖与弘度同时，故推为诗坛之首，度其书中必多评诗，故《史通·论赞》篇评沈隐侯《宋书·谢灵运传论》，以为“此文正可为《翰林》之补亡”也。日僧《文镜秘府论》称此书“褒贬古今，斟酌利病”。据本传充作“诗、赋、表、颂、杂文二百四十首”，惟《学箴》一篇附传中，得以流传。《翰林论》，严可均从他书辑得八条（《全晋书》五三），骆鸿凯又增一二。据其师说，谓“充所选之文，以沉思翰藻为主，故极推潘、陆，而立名曰‘翰林’，可为《文选》之先河”（《文选学》）。而细审原文，如云“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云“驳不以华藻为先”，则明不以辞采为重。其言“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则似有微辞。又于表及盟檄两言“德音”，则其持论，亦以文德为先矣。其《学箴》所言，欲“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义不违本，言不流放”，故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废。”“刑作由于德衰，三辟兴乎叔世。既敦既诱，乃矫乃厉。郭亦既备，矫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扬成音。群能骋技，罪巧竭心。野无陆马，山无散林。风罔不动，化罕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而归之“室有善言”，“复体克已”。可见充之用心在乎返文为质，去华就实，矫奇为正。骆氏之论，翩其反矣。其书竟已不传，未由与《文心》勘校，是可惜也。（《文心·定势》篇责“新学之锐，则逐奇失正”，与李充见解正相同。）

顾恺之《晋文章记》

《补晋书艺文志》并著录。此书体裁未详。顾虎头虽以画名，然博学有才气。事在《晋书·文苑传》。《世说·言语》篇：“恺之还至荆州，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美。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寥寥数言，可以入画。此书记晋世文章，庸或杂以评骘之语，惜不可见。

《隋志》有张隐《文士传》五十卷，即钟嵘《诗品》所谓“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者也（参《补晋书艺文志》）。此类乃文人记传之书。自挚虞为《文章志》以后，继之者又有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

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俱见《隋志》史部。《南齐书·文学传》，丘灵鞠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大兴（晋元帝），讫恭帝。此类与顾恺之所著，性质应相同，《文心·时序》、《才略》等篇之所取材也。

张防《四代文章记》一卷

《隋志》总集类梁有《四代文章记》一卷，吴郡功曹张防撰，亡。按防始末未详。

张眎《摘句》

《南齐书·文学传论》："张眎摘句褒贬。"张眎未详，疑似后世之摘句图（唐张为有《诗人主客图》。《四库提要》诗文评类《文选句图》下云："摘句为图，始于张为。"按观张眎摘句，则此事南朝已盛行矣。）

颜延之《庭诰》

钟嵘《诗品序》："颜延论文，精而难晓。"《南齐书·文学传论》："颜延图写情兴。"当并指《庭诰》一书。原帙已亡，严可均辑存之。《庭诰》之文学见解，颇与刘勰有关。说见拙作《〈文心雕龙〉探原》。

王微《鸿宝》

《诗品序》："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隋志》子部有《鸿宝》十卷，不著撰人。《梁书·张缵传》称其著《鸿宝》百卷。此殆类书之属，当是偶与王微所著同名。王微《鸿宝》，向来鲜见征引，惟《文镜秘府论》引北齐李槩《音均决疑序》有云："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王微之制《鸿宝》，咏歌少验，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律吕相合。"似其书颇涉音声，故李槩及之。有关《鸿宝》之记载，只此而已。微字景玄，有集十卷，见《隋志》。梁又有录一卷。其文论今不可考，然其《与从弟僧绰书》有云：

> 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

按《史记·邹阳传赞》云："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

王微之说盖本此。《宋书》本传称“微既为始兴王浚府吏，浚数相存慰。微奉答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微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此书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久已为人传诵。微为文主抑扬多悲，似与陆机“言寡情而鲜爱，辞漂浮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一说，亦有相关之处。其文词之怨思抑扬，若《书告弟僧谦灵》一篇，读之尤令人扼腕。复体羸，多病服药，以是不得永年（微元嘉二十年卒，年二十九）。富于感伤，自促其寿。史称“微为文古”，今观所存各篇皆散行，与“宋初讹”之文体，迥不相类，盖循晋氏上追西汉，故难怪当时目为“古”也。微负重名。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书李孝伯与镇军长史张畅语，孝伯访问微及谢庄。其名声远布如此（《南史·谢庄传》）。微善书画，人品极高，又有《叙画》一篇，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六（严氏《全宋文》卷十九失载），清夐绝尘，岂钟仲伟所能望其项背？景玄之文学，世无表彰之者，而其《鸿宝》，钟氏讥为密而无裁，惜已无传。惟其《报何偃书》略云：“每见世人文赋书论，无所是非。不解处，即日借问。此其本心也。”足见其率真，不稍苟且。斯即指瑕之务。然后知颜之推云“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亦风气使然。景玄之言，亦一证矣。

陆厥《文纬》

《诗品》卷下评陆厥云：“观厥《文纬》，且识文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罗根泽云：“似陆厥作有《文纬》一书。”厥与沈约讨论音理，援引“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及陆士衡《文赋》五色相宣之语，以难隐侯，谓其不得自诩为“灵均以来，此秘未睹”。说具《南齐书》五十二本传。厥与沈约书，论一人之思，迟速天悬（袁守定《佔毕丛谈》曾举之），即《文心·神思》篇“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一说所出也。

张率《文衡》十五卷

率字士简，张充从弟。齐、梁间，天才洋溢之文士也。《南史》三一本传云：“（年）十二能属文。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尽读其书。建武三年，除太子舍人。同郡陆倕、陆厥幼相友狎，尝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遇任昉在焉。约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识之。由是与昉友。

梁天监中为司徒谢朏掾。……又侍宴赋诗，武帝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暂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奏诗往反六首。……自少属文，《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文者，并补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于世。”此书《隋志》未收。考率当日以“赋”闻名于世，今所存者，仅《绣赋》及《河南国献舞马赋》二篇（见《全梁文》五四）。彼与刘苞、陆倕并以文藻见知于梁（详《梁书·文学传·刘苞传》）。所作《文衡》五十卷在《文集》以外，当是论文之作。以其文学声誉之隆，刘彦和自非其抗手，无怪《梁书》称其作《文心》“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张亦时流之一，且有《文衡》之作。《文心》出自缁流之手，陆倕、张率之辈，必不重视，可不待言。故彦和不得不负书以干沈约于车前也。

明克让《文类》四卷

《北史》八十三《文苑传》：克谦字弘道，鬲人。……祖僧绍。年十四，为湘东王法曹参军。仕梁，位中书侍郎。梁灭，归长安，为麟趾殿学士。隋受禅，位率更令。所著有《文类》四卷。按此书不知作于何时，内容为文选抑文评，亦不可知，姑系于此。

徐纥《文笔驳论》十卷

《北史》九二《恩幸传》：“纥字武伯，乐安博昌人，颇以文词见称。……曾说灵太后以铁券间尔朱荣，后与太山太守羊侃共奔梁。有《文笔驳论》十卷，多有遗落，或存于世焉。”此书《隋志》未收，作于何时不可考。其内容系讨论文笔问题，抑为一总集，亦不可知。

《文章义府》三十卷

《隋志》子部，梁有《文章义府》三卷，不著撰人，疑是类书。《日本见在书目》又有《文府杂体》八卷、《文府启法》二卷、《文府四声》五卷，俱无撰人。

杜正藏《文轨》二十卷

《北史》卷二六《杜铨传》云：

> （杜）正藏为文迅速，有如宿构。曾令数人并执纸，各题一文。正藏

> 口授俱成，皆有文理，为当时所异。又为《文轨》二十卷，论为文体则，甚有条贯。后生宝而行之，多资以解褐，大行于世，谓之“杜家新书”云。

正藏此书，盖亦论文之作。《隋志》未收。然在当日风行一时，至有“杜家新书”之目。《隋书》卷七十六《杜正玄传》：“正藏……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按日本正仓院御物存有《杜家立成》，说者谓即《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之简称，乃杜氏兄弟正玄、正藏、正伦一家文集之略抄、书简之模范文集。（参考福井康顺《论百行章についての诸问题》，《东方宗教》十三、十四合期；又《正仓院御物杜家立成について》，《东洋思想史研究》，272—285 页。）“正藏字为善，开皇十六年举秀才。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本传）《唐书·艺文志》正伦有《百行章》一卷，敦煌所出有残帙（伯目三三〇六即其一），唐末五代边陲尚流行之。而正藏之《文轨》，则湮没莫传，未由取与《文心》比观，至为憾事。人且不能举其名。书之显晦，各有其时，岂非命耶？

5 月 10 日于香港

后记

明钞本《太平广记》卷十三郭璞条引《神仙传》：“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即引《翰林论》中论郭璞语。此条为诸辑本所未及。所谓“明道”，似《翰林论》中之篇名（说见近刊《文史》第一期补白，程弘《翰林论作者质疑》）。若然，则《文心》开宗明义为《原道》篇，《翰林论》中又有《明道》篇，亦复相似。

原载《大陆杂志》第二五卷第三期，1962 年

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

关于山水文学的起源，大家常常会受到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话的影响，好像刘宋时庄老的玄言诗真的就告退了，到谢灵运的时代山水诗才正式兴旺、抬头的。我认为这句话并非全面对的，因为谢灵运诗中，不少都含有“庄老”的典故，有四分之一几乎是说理的。玄言诗在谢诗中并没有被抛弃。这恐怕是每个读谢灵运诗的人都有的感觉。至于说“山水方滋”，情况就复杂些。有人以为刘宋时才有山水诗，这是个很大的误解。

我们可以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来说。在思想方面，庄子已经有对自然深入的理解。譬如：《庄子》一书中举出很多山，有藐姑射之山、具茨之山、畏垒之山等。具茨之山是实有其地的，就在河南密县。庄子对山的理解是同“游”的观念有关的。大家别忘记，庄子喜欢讲“天放”、“天游”。比如在《知北游》里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他在上句说圣人不伤物的道理，就是讲人与物互不相伤害。“物”指一切客观对象。我们对这些客观事物不伤害，它们也不伤害我们。这便是人与自然的调协和谐问题。在《外物》篇中也说：“心与物游，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这句话主要是讲游，人对自然主要是用“游”的态度。如果把“六窍”开凿了，“混沌”就死了，因为把整个自然破坏了，人开了七窍，人的知识多了，麻烦也多了。对自然越加以利用，就越违反自然，这就损害了自然，也就是损害了自己。这就是人与自然要调谐的道理。这种态度在《庄子》里还可以找到一些的。庄子对山水的了解对以后山水诗是有很大影响的。玄言诗

中往往就有山水诗的成分，它也不能全部是说理的。全部说理的诗在中国人中是不能接受的。玄言诗中有山水的字眼，山水诗中也有玄言的字句。庄子从思想上看是同山水有联系的。中外不少人把庄子作为山水文学的来源，我觉得是对的。

儒家方面也有讲山水的，大家都会引孔夫子的两句话，但常常忘记董仲舒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山川颂》。他不是讲自然的，有另外的讲法。他说山似仁人志士，水亦似有德者，把山川与人联系起来。他也是歌颂山川的，但是为了歌颂人，不是把人回归自然去，而是把自然拉向人这方面。这是站在儒家立场讲话的。

从文学本身来讲，山水文学有写得好的。《楚辞》中就有很多代表作，比如《山鬼》篇，就是非常重要的山水文学作品，比如《招隐士》，也是篇非常好的山水文学佳作。

从艺术方面讲，山水诗同山水画是同时发展的。有人以为讲山水画仅是艺术史的范围，和文学史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大家别忘记顾恺之在《世说新语》中讲"云蒸霞蔚"一类的话，完全是讲山水的。他还有一篇《云台山记》，很长的一篇东西。讲艺术史的人常常把这篇文章拿来注解。讲文学史的人却绝口不提，这是疏忽。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一点，搞文学资料也不要陷入过于偏浅的毛病。写文学史的人往往拿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往往拿二三首诗来代表一个人，往往拿几句话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风格。这种以偏赅全的方法是非常容易导人以错误的认识的。一个时代有许多了不起的作家，有很多好的诗。也有极好的句子，不要拿一两个人来代表一切。这种抹杀主义是要不得的，使许多人受到文学史家所贻误。所以我说，真正的文学史，我们今天应该重写的。

关于对谢灵运评价的问题。现在有人说要给谢灵运翻案，其实不必，因为他的事实俱在。谢灵运不单是诗人，还是位了不起的学人。所以我们对他的评价不应该仅从几首诗上来讲。他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是占有相当高地位的，不在文学史之下。我认为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重要性。

试举一个例子：谢灵运是一位翻译家，他是当时翻译佛教作品的重要人物。我记得颜鲁公有篇记，讲到他翻译佛经的事。[1] 抚州宝应寺里有翻经台，

---

① 详见拙作《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7 年第一期（总第四十一期），后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之拙书《悉昙学绪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

就是因谢康乐而得名的。谢灵运懂梵文的，他写过《十四音训》。这部书虽已失传，但还有些断简残篇保存在日人安然所著的《悉昙藏》中。所谓“十四音”其实就是指梵文字母。这里面还提到“驴唇书”，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按佛教传说讲，创造文字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梵，一个是佉卢。佉卢就是创造“驴唇书”的人。这两种都属印度古文字，然后才是仓颉。据安然《悉昙藏》卷一载谢灵运的话说：“胡书者，梵书，道俗共用之也，而本由佛道，故经云：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也，外道因此以通文字，胡字谓之佉楼书。佉偻书者，是佉楼仙人抄梵文以备要用，譬如此仓、雅、说、林，随用广狭也。”[①] 佉楼书又作佉卢书、佉留书，梵文作 kharostha，俗体作 kharottha。其字形多以不整齐的曲线延长而成，仿佛驴唇上下的掀动，故俗称“驴唇书”。谢灵运的这一段话，至今还是很重要的材料。这说明他多么博学多闻。这件事情是我们应当表扬的。这些材料也应该补在他的文集里面的。

谢灵运也主持过图书馆的事情。刘宋开始时他做过秘书监。他主持过重要的有关目录的工作，可惜这些书都不存在了。还有他对佛学的贡献，像著作《辨宗论》等等，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学人，因为他有很大的学问。他有著作，而陶渊明只有几首诗。他的著作可以代表他对佛教的了解。他的诗的基础是他的学问，学与诗结合，所以才有这样崇高的成就，这是不能抹杀的。这样说来，谢灵运的地位不仅仅能与陶渊明并列，而且是可能凌驾陶之上的。我们何必把他贬低。假若一本文学史只把谢灵运列为一小节，反而证明对他的不了解，是很不公允的。几十年来国外对谢灵运的研究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国内文学界能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加以选择，把国外的研究与国内研究做些比较，推进谢灵运的研究。我这一临时即兴的讲话毫无准备，粗枝大叶。错误之处，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正。1991 年 11 月 21 日于雁荡宾馆。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旅游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温州年会
暨谢灵运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隗芾先生整理。

① 见拙著《选堂集林》下册，1442 页。

关于《世说新语》二三问题

王煜兄出示新著《世说新语马瑟氏（Richard B. Mather）英译本正误》一文[①]，其中涉及拙见论兰阇、楡臘二事。又提出王沦可能是《老子例略》的著者，更为发人所未发。读后略有一些进一步的看法，试拈出来，共作研究。

一、兰阇

《世说·政事》说："王导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从前我颇信从王应麟《困学纪闻》二《杂识》之说，兰阇出于阿兰若(araṇya)，意指无诤、闲闲，自未必是。记得陈寅恪氏对兰阇尝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讲授时的意见，见于其门人刘盼遂所记录的，认为兰阇是梵语的rañj[②]，意思是喜悦；可是他在自己所著的《东晋南朝之吴语》，却只说道："寅恪疑兰阇与庾信之小字'兰成'同是一语。"[③] 可能他认为 rañj 一说未安，所以别以"兰成"解之。按庾信《哀江南赋》言："兰成射策之年。"唐张说的《庾信宅诗》："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陆龟蒙《小名录》只说兰成为庾信小字。兰成和兰阇，看不出有什么关系。马瑟氏译兰阇为 rañjanī，最少应受到寅老的启示。

---

①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卷第三期，77 页。

② 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国的梵文化研究》，334 页。

③ 《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146 页。

近年友人吴其昱博士，特别写一篇作窄而深的研究，来讨论兰阇这个小问题，因为用法文撰述，而且发表在献给小说史大家 J. PrŮšeK 教授颂寿专刊，1967 年巴黎出版，在香港很不容易见到。他送给我一份抽印本，现试略为介绍。他列出许多汉语“兰”和“阇”二字和梵文对译的例证，因而断言：

(1) 兰 Lan（汉语）=Lan，rān raṇ rañ（梵语）

(2) 阇 tcho（汉语）≠ch，=ja′jā（梵语）

并解释“弹指”（梵语 acchaṭā choṭikā）的意义。最有趣是举出在《大般若波罗蜜经》的梵本有一句：

Valgurmanojño rañjanīyaḥ śabdo niścarati（ed. vaidya，Darbhanga，1960，p. 240 1，16—17).

鸠摩罗什中文译这一段作“风吹铃声，其音和雅，甚可爱乐”。这里 rañjanīyah（即英文 delightful）作为形容词用。他即本陈寅恪的前说，推证兰阇应以 rañja 为恰当，和马瑟的意见暗合。当然，这比较王应麟的说法更为可取。可是阇字的对音不一定是 ja，像阿阇梨梵文原作 ācāryn，可见 ca 亦可译“阇”，不必一定以 ja 对“阇”。

王导不可能深懂胡语，他在胡人面前胡诌一二句胡言，正如香港人说话，每每杂入一两个英语词儿一样。王导在晋渡江以后，以丞相身份，有时周旋于胡僧之间。胡僧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都是他的好友。慧皎《高僧传》说帛氏于“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导尝诣密（密多罗即指帛氏），密解带偃伏，悟言神解”。“王公尝谓密曰：外国有君，一人而已。”（卷一，《大正藏》五〇，327 页）康僧渊则因鼻高眼深，王导每调（戏）之，他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同上卷四，347 页）。康僧渊原是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他还可以操汉语；帛尸梨密多罗（Srimitra 意思是吉友）氏亦为西域（龟兹）人，时人呼为高座，他则向来不作汉语（《世说新语·言语》又刘注引“高座别传”）。王导时常接触这一些胡僧，学会说一二句胡语，这是很自然的事。西域的胡语，非常复杂，和梵语是很有距离的。R. L. Turner 编有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o-*

Aryan Languages 一字典，1963 年我在印度 Poona，只见一些零册，现在全书已出版了。吴先生未检查过这本书。此书搜集印度雅利安语系的词汇非常完备。书中告诉我们：梵语语根［$\sqrt{ra\tilde{n}j}$］本义是染色（dye）。大战书（MBH）作 rañjita，巴利语亦然。喜悦（takes pleasure）见于大战书作 rajyatē，巴利语为 rañjati（finds delight in），俗语（PK）则为 raṁjaē，raṁjēi（makes happy），它的语根应是［$\sqrt{raj}$］（见该字典 10584—10589 诸条）。陈寅老不再采用［$\sqrt{ranj}$］，可能他知道喜悦应作［$\sqrt{raj}$］。王导所说胡语的兰阇，如果解作高兴，亦可能是印度俗语（Prakrit）的 raṁjēi，不一定是梵语的 rañjanī 呢。

二、楡臘

《世说·排调》记殷融（洪远）答孙绰（兴公）诗有“聊复放一曲”句，刘惔（真长）笑他语拙，问他：“君欲云那放？”殷说：“楡臘亦放，何必其铨铃耶?”《刘惔传》见于《晋书》卷七十五，在晋简文帝时，和王濛并称为“谈客”。他问殷融诗句中的放一曲，所放（仿）的是什么。殷的答语中，“铨铃”和“楡臘”对举，我的意思“铨铃”指雅音，“楡臘”可能指俗唱甚至夷音，所以假定“楡臘”是梵唱的“洒臘”，马氏认为汉人不会那么早便晓得“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所言“洒臘”的唱法。马氏似乎太拘泥这一书出现的时代（金刚智 Vajarbodhi 作此书确在 773 年）。应知“洒臘”（Sk. ṣāḍava）是古典梵乐七调之第五，金刚顶书中同时亦提及“中夜以第五音韵赞之”。第五音韵即是梵语的 pañcama，汉译称为“般涉”。梵呗在华的流行很早，三国吴时已盛行了。

梵呗的起源，传说出于曹植，虽未为人所信，但“般涉”一名在华则出现甚早，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收经呗导师集共二十一首，第一种便是“帝释（天）乐人般遮琴歌呗（第一)”，注云出《中本起》，以下才列举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支谦制连句梵呗记、康僧会传泥洹呗记等等（《大正藏》五五，92 页)。《开元释教录》云：“（僧会）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云：“（支谦）又依《无量寿》《中本起经》制赞善萨连句梵呗三契。”可见三国吴时梵呗的热闹情形。般遮琴歌呗出自《中本起经》，必与支谦等人有关系，可以推知以第五音韵（即般遮）唱赞，吴时已有之。今以

“般遮”一名出现之早为例，“洒臘”为古典梵音调，当为僧人所熟悉。东晋时精擅梵唱的经师甚多，具载两《高僧传》，不必深论。（关于洒臘与梵呗问题，可参《法宝义林》Ⅰ及Ⅱ，97页，Bombai“梵呗”条，与拙作《敦煌曲》中文部分导论，20页。）

殷融和孙绰、刘惔都是谈玄的名士，生当东晋梵呗流行之日。孙绰《天台山赋》屡屡引据释典，刘氏借取梵呗的音调来取笑，正是极其自然之事。如果把檢臘说成“草率”与“铊铃”对比起来，似不太相配；而且同“放一曲”的“放”字搭不上关系，放应读作仿。当时佛偈初入，仿作梵偈的风气颇盛，所以有陈思王感梵声制呗的传说。

支谦又译过 Avadāna śatara，为《撰集百缘经》（译本见《大正藏》四，本缘部。梵文是 Vaidya 所订，Darbhanga 版，1958。法文有 Léon Feer 译本，巴黎，1891）。在《报应受供养品》第二云：“闻其北方有乾闼婆，善巧弹琴。……弹一弦琴，能令出于七种音声，声有二十一解。”（《大正藏》四，211页）这句话不止见过一次。是经提到七声和二十一解，“解”的梵文是 mūrchanā，意思是“伸长”，由两固以七声为起音而构成的音群（梵语 grāma）有十四个，系音阶之一种发音法，很像中国的“调”。印度的八声 sa、ri、ga、ma、pa、ḍha、ni，和中国七声的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甚相似。《百缘经》里的七种音声，应该是这七声，三国吴时支谦译出的书，已提及七声，是时印度七声的观念，一定通过僧徒传入我国。《隋书·音乐志》记郑译说，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从突厥传入琵琶七调。其第五曰沙臘，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第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参看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向达亦著《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他未见到七调碑，故所论较略。）我在上面考出支谦所造的梵呗三契，应包括般遮琴歌呗。（汤用彤在《汉魏两晋佛教史》，133—134页亦有这样的说法。）般遮即是般赡（《隋志》及《通典》）亦作般涉（《唐会要》），相当于羽声，在印度七调中属于第六，沙臘是徵声，属印度七调之第五，既有第六羽声的“般遮”，安得无第五徵声的“沙臘”？所以我认为沙臘与般遮应该同时存在。所以沙臘和般遮 一样，在苏祇婆以前实早已传入。南印度 Pudukkōṭṭai 州在1904年发现的七调碑，其中亦有 ṣādava（沙臘）Pañcama（般赡）二调，各个调既明示着七声，还加上 a、Ka 两个声，共得九声。这个七调碑，历经印度、法、日诸学者详细的考证。中国方面，近时吴南薰的《律学会通》尤重新从音律上作详细考察，指出七调碑的作者，意要改进印度古律，才加 a 于 ga，添 Ka 于 na 之前，

合七声为九声。再由 a 与 Ka 的作用，可知作者的转调法，与中国声律序旋法相似。想 a、Ka 未添入以前，印度或有简律，尚无纯律，只是旋声，不是旋律。又推定碑文七调，是仿照中国俗乐，以商调为重。他很反对林谦三氏只依简律七声，可合七调之三，便断言隋唐燕乐属于印度系统一说，认为很不妥当（该书 457 页）。这个问题，牵涉非常复杂，现在不欲深论。但我们可认识支谦时代，梵乐的七声七调已传入中国，故支谦译《瑞应本起经》，已晓得用羽调的盘赡调来制短偈，佐以管弦，以妙造梵呗新声。

既有羽调的般遮，自然可有徵调的沙臘或洒臘。沙臘的汉译异名颇多，宋陈旸《乐书》卷一五九作婆臘，婆字必是“娑”的误写。沙臘是七调碑的 sādava 之对译，中亚语音，d→ 一之例常见，故可以“臘”（la）对译 da（va）。伯希和诸家考证，对于这一点都没有异说。

今从《世说》，知东晋时亦作橀臘。橀字《广韵》在二十八盍，音吐盍切，同榻。但以翕声的字却有不同的读法。《老子》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句，马王堆甲本翕作拾，乙本作擒，可见擒可读如拾（是执切）。古字从木从才每每不分，橀臘宜音擒臘或拾臘，拾与 sā 对译，没有什么不可。

金刚智在念诵经中谓赞咏法如下：

晨朝——以洒臘（ṣādava）
午时——以中音（madhyama）
昏黄——以破音（伯希和疑是角调的沙识 ṣadja）
中夜——以第五音韵（panc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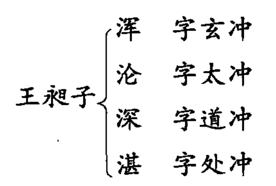
吴南薰说道晨朝用徵声，中午用商声，中夜用羽声，与周初的旋声法不约而同。他的意见，是欲把“中音”说成商声，详见该书。

马瑟氏怀疑密宗的赞咏法，见于金刚智之书，不应东晋时已有之，不知支谦已译出《合微密持》、《陀邻尼》、《总持》三本，正使用八字真言了。支谦在吴时制赞菩萨连句的梵呗三契（《祐录》十三）。东晋时，周颉遇害后，高座（帛尸梨密多罗）省其遗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陵云，次诵咒数千言。他擅持咒术，又译出孔雀明王诸神咒（《高僧传》）。可见密宗持咒，不始于唐，而胡呗在吊唁死者，亦可作赞咏转诵。高座长于音声，他的弟子有觅历者传其梵呗，故《祐录》十二，收有觅历高声梵记，并注云：“呗出须赖经。”当日制作梵呗是采取某佛经中的故事，编成短偈。后汉昙果和康孟详已

先译《中本起经》，支谦又自己译出《瑞应本起经》，故作梵呗三契。高座则取须赖经（Surataparipṛcchā）以制呗。至于金刚智所述晨、午、昏、中夜赞诵法，其实只是转调。在不同时间，换调唱咏，晨朝用徵调，中夜则换用羽调，方法甚为简单，我想不必要到唐代方才有这样的办法。

三、老子例略与王沦

《排调》刘注引《王氏家谱》曰："王沦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徙浑弟也。……贵庄之学，用心淡如也。为《老子例略》、《周纪》。……历大将军参军，二十五卒。"王昶为征南大将军，拒毋丘俭、文钦有功，迁司空，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传见《魏志》卷二十七。据昶戒子书，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魏志》本传）。加上王氏谱所记，仲子王沦字太冲。又昶传裴注引《晋书》及《晋阳秋》，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则王昶实有四子，都是以冲为字，表之如下：



王煜说王昶有三个儿子，实在应有四子，尚有王深一人，为王君所漏举。

王沦因为只有二十五岁，早卒，但知他曾在王昶的征南大将军府作过参军。又《晋书》卷九十六王浑妻钟氏传，提及浑中（仲）弟沦（中华本，2510页）。其他无可考。

《道藏》鼓字号为失名所著《老子微旨例略》一书，严灵峰据何劭之王弼传云："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定为弼作。按传云"为之指略"，但谓为其"要旨大略"，可见这里"指略"二字并不是书名。他另外著有一书名曰《道略论》。

《经典释文》叙录称王弼又作《老子指略》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著录《老子略论》一卷，"魏王弼撰，凡十八章"。《隋书·经籍志》梁有《老子杂论》一卷，何（晏）、王（弼）等注之。姚振宗谓即王氏著之《指略》。可能即何劭传所言的《道略论》，因为只有一卷而已。《文心雕龙·论

说》："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王氏"两例"当即《周易略例》与《道略论》。《宋史·艺文志》有王弼《道德略归》一卷，此外又有《老子指例略》一卷，注云：不知作者。《道德略归》当是何劭传的《道略论》，《云笈七籤》卷一总叙道德引有引《老君指归略例》一段，其前引《老君指归》，据《七籤》卷三十二杂修摄引严君平《老君指归》，则此《老君指归略例》即为严书而作者。此书可能即《宋志》王弼之《道德略归》。至不知作者的《老子指例略》，《宋志》显然分为两书，可能是《道藏》的《老子微旨例略》，只省却一个"微"字，其余名称悉同，亦无作者姓名，完全符合。

王沦所著的《老子例略》和《唐志》、《宋志》的《老子指例略》一名比较，只是减去一个"指"字，其余完全相同。所以《道藏》中这书的著作人或者属于天才而短命的王沦，而不一定是王弼，较为适当。因为王弼的《老子略论》，根据赵希弁所说，凡十八章，与《道藏》本失名的《微旨例略》全不分章，不尽相同。

刘煦《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道家类收老子六十一家，有《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别有《老子指例略》二卷，无撰人名，卷四十七集部收《王弼集》五卷，《旧唐志》所录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乃依据开元九年元行冲奏上的《群书四部录》，当时确有其书，最可征信（《新唐书·艺文志》钞撮酌采自旧书，不似旧书的可据）。《宋史·艺文志》则以《崇文秘书总目》，合宋宁宗时续书目、删复存目。是唐、宋所收的《老子指例略》，都没有撰人名氏，和《道藏》本一样，可见唐开元时，这本书已不知作者为谁。故以存疑为妥。

《世说新语》一书，其中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甚多。由于杨勇采用我的不成熟的见解一二条，收入他的《校笺》里面，竟引起马瑟教授的注意，和王煜的指出。现在把上列三点，加以讨论，也许有一些趣味，希望方家指正。

《文心雕龙》探原

刘子玄云："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词，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史通·自叙》）是《文心》之作，所以弥纶群言，定其大体。因穷源之鉴，得驭万之术。"厚集肇虑，朗成圆种。"[1] 夫其融洽莹练，颇异曩篇之泛议；微密精远，实同佛家之造论。故能衣被词人，绵历千祀，迄于今兹，犹未沫也。

往读《梁书·文学传》，谓"彦和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居处，积十余年"。其撰《文心》，据《时序》篇有"皇齐驭宝"语，盖成书于齐和帝中兴二年三月以前。时仍寄迹桑门，身名未显。[2] 窃怪彦和于定林寺校理内典经藏，乃以余暑，成此伟构，其果何所凭藉耶？其《序志》篇云：

>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文质论》），陆机《文赋》，仲洽（挚虞）《流别》，宏范（按应作宏度，李充字）《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又君山（桓谭）、公幹（刘桢）之徒，吉甫（应贞）、士龙（陆云）之辈，汎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① 此借崔光《十地经论序》语。

② 参刘毓盘《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

于魏晋以降诸家文论，鲜所许可。所举之书，《流别》、《翰林》，仅存碎璧；公幹、吉甫，并归澌灭。自余诸作，大都铨序一文，而非笼圈条贯，初成专著，如此五十篇者。其得子玄之服膺，非无故矣。

《序志》又云：

> 及共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此自道其损益同异之故。黄氏《札记》因谓"《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其因袭，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为贵也。"或曰：子之言良然！更为吾子证之。不观夫《宗经》篇乎？自"易惟谈天"至"表里之异体者也"二百字，并本王仲宣《荆州文学志》，不以为嫌。此非彦和抄袭旧文之明证乎？

余应之曰：是不然。此范注引象山陈汉章之说也。彼且引章宝斋《说林》所云，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不病重见。今按仲宣《荆州文学纪官志》，宋绍兴本《艺文类聚》三十八，及宋本《御览》六〇七并引之，俱无此段，惟严铁桥《全后汉文》所录有之，实为误抄。考《御览》卷六〇八（学部二叙经典）末段引《文心雕龙》曰"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讫"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明系彦和之语。文章风格，与仲宣亦不相类。陈氏误据严辑，未检类书，此应为之刊正，庶免辗转传讹，以厚诬古人也。[①]

一、《文心雕龙》文体分类之依据

《文心》之为书，原分上下篇。《序志》言"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盖自《书记》而上为上篇，所以"论文叙笔"，区别文体，诠释名义，辨章源流。彦和以前论文体者，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已极赅洽；此学者之所习知者也。[②] 然有一事为历来所忽略者，即分体之总集，至于宋、齐，各体皆备，彦和席其成规，但加品骘而已，毋庸搴择而归

① 范氏《文心雕龙注》卷十序篇注二二亦云："《宗经》篇取王仲宣成文。"观此，可知其不然矣。此严可均之误，王利器亦曾加辨明。见《文心雕龙新书》，6 页，《宗经》篇注一三。

② 汪辟疆与黄轩祖论《文选》分类书。见《制言》第十八期。

纳之也。盖自汉、魏以来，制作日繁，有就某一文体为之汇集者。以予所知，似以应璩之《书林》为最早。《隋志》《书林》十卷。又曰：梁有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魏志·高堂隆附传》裴注云："潜字彦皇。见应璩《书林》。"姚振宗据此著录于《三国艺文志》，谓"《书林》为应璩所集"。审矣。《文心·书记》篇称"休琏（璩字）好事，留意词翰"，盖其编集书翰之文，观摩即夥，自制亦佳[①]，宜其多见采于萧选也。

下逮晋、宋，文体既多，众制蜂起，于是各从其类，因体以为集。其事极盛于刘宋之世。兹就《隋书·经籍志》所录，略依《文心》论次各体，条记其总集如次：

诗 《隋志》：谢灵运撰《诗集》五十卷。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

又《诗集》百卷，并例录二卷。颜竣（延年子）撰，亡。

按：《明诗》篇论及诗体之内容，若古诗，晋世篇制，应璩《百一》，景纯仙篇，五言流调，与夫杂言、回文之体，在当日并有专集。

《隋志》：梁有《古诗集》九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亡。梁有《二晋杂诗》二十卷，亡。又有《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亡。梁有《杂言诗钞》五卷，谢朏撰，亡。梁又有《古游仙诗》一卷，亡。又有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亡。

梁又有《回文（诗）集》十集，谢灵运撰，亡。梁又有《回文诗》八卷（不著撰人），亡。梁又有《织锦回文诗》一卷，宝氏妻苏氏作，亡。以上俱梁有而隋亡者，在彦和时应尚存，足供其渔猎之资。而颜竣《诗集》之"例录"，尤堪供采摭之用。

乐府 《乐府篇》云："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即说明将乐府与诗分开之缘由。今观《隋志》，乐府自为专集，与诗厘然有别。其所著录者，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馀》十卷，《古歌余抄》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俱无撰人。

其梁有而隋亡之乐府歌辞又若干种，不备记。

赋 《隋志》：《赋集》九十二卷，谢灵运撰。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喻惠侯（刘义宗）撰。又有《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亡。其他赋集

---

① 《全三国文》所收应璩文，皆是书翰，凡三十余篇。

赋注尚有多种。

颂赞 《隋志》：梁有《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亡。《赞集》五卷，谢庄撰。

铭箴 《隋志》有《古今箴铭集》十四卷，张湛撰。《录》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亡。梁有《杂戒箴》二十四卷，亡。梁又有《铭集》十一卷，不著撰人，亡。梁又有《箴器杂铭》五卷，释僧祐撰，亡。案所谓"《录》一卷"当是序录，即说明文体源流之导言也。

诔碑 《隋志》：梁又有《诗集》十五卷，谢庄撰，亡。《碑集》二十九卷，《杂碑集》二十九卷。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梁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亡。《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亡。

哀吊 《隋志》：梁有《吊文集》六卷，《录》一卷，《吊文》二卷，亡。梁又有《杂祭文》六卷，释僧祐撰，亡。

杂文 《隋志》有《梁代杂文》三卷，不著撰人。

按：《文心·杂文》篇区杂文为三类，即对文、设论与七及连珠三种。凡兹三者，梁时俱有专集。两《唐志》有《谢灵运设论集》五卷。《隋志》有《设论集》二卷，刘楷撰。梁有《设论集》三卷，东晋人撰，亡。梁有《客难集》二十卷，亡。

《隋志》：《七集》十卷，谢灵运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亡。

《隋志》：梁有《谢灵运连珠》五卷，亡。梁有《设论连珠》十卷，无撰人。

可知此三种，梁时各有专集。或以设论与连珠，合为一书。至梁代，杂文一书，内容虽不可知，然以《文心》推证之，当是包括此三体。

谐隐 《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六卷。至宋初，袁淑辑《诽谐文》十五卷。见两《唐志》(《隋志》作十卷)。宋沈宗之又有《诽谐》文一卷(梁有隋亡)。此文体遂成一格。

(以上文)

诸子 庾仲容有《子抄》三十卷。

论说 《隋志》有《论集》七十三卷，《杂论》十卷，不著撰人。两《唐志》有殷仲堪《杂论》九十五卷(子部杂家有殷仲堪《论集》八十六卷)。则纂集论说之文为专集者，似始于殷氏。

诏策 《隋志》：梁有《杂诏》多种，及《后魏诏集》等。殷仲堪有《集

策》一卷。《唐志》有《谢灵运策集》六卷。

檄移　《隋志》：梁有《杂檄文》十七卷。

封禅　《隋志》：梁有《杂封禅文》八卷，亡。

书　《隋志》有晋散骑常侍王履《书集》八十八卷，及《书林》十卷，不著撰人。

（以上笔）

此类分体之总集，以宋初为最盛，谢灵运、谢庄致力尤勤，盖一时之风使然。至各体纂集之兴，各有所始：颂肇于王僧绰，箴铭始于张湛，论说则起于殷仲堪焉。僧祐对于碑文、杂祭文，并为专集。彦和寄食于僧祐，熏染所自，于文体辨析，易奏肤功。其时各体文既均有专集行世，疑有序引，可供采撷。如颜竣之书，且有例录，则论列亦非难事。是彦和此书上半部之侈陈文体，自非空说依傍，出自抒轴。其分类之法，乃依循前规，排比成编。加之仲洽《流别》，李充《翰林》，并有成书，矩矱具在，自易措手。昭明《文选》成书更在彦和之后，其分析文体，姚姬传深病其碎杂，不知乃远承往辙，与彦和取径正有同然。倘病其列体繁碎，而谓分体为彼辈草创之业，则迥非事实。此读《文心》与《文选》者，应先明辨之一事也。[①]

二、刘勰文学见解之渊源

裴子野《雕虫论》云：

> 宋明帝博好文章……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以上序）……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无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全梁文》五十三）

---

① Prof. J. R. Hightower 于 The Wen Hsuan and Genre Theory（《文选与文体论》）谓："Its contents are diversified enough to suggest theat Hsiao Tung was trying to provide specimens of all the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perhaps even to arrange them in some kind of significant order."（*HJAS* VI. 20，1957）案《文心》区分文体，系因乃当日分体总集之成例，昭明又在其后，更不待论矣。

《宋书·明帝（刘彧）纪》云：

（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

宋世文章之盛，良由在上鼓吹之功。流风所被，弃经学而尚文藻。益以文、笔观念之区别日严，遂有萧统“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之说，以重定文学之义界。若裴子野持论，无非欲其可被于弦歌，而止乎礼义。质言之，在阻止文学，使勿脱于经学之藩篱，俾文质相依为用。此乃自汉以来传统之文学观，非子野一人之私言也。[①] 彦和《文心》，力主宗经，与子野持论宗旨相符。不特说明各种文体皆导源于五经，且极于经书中探索“文”之意义，以立其建言之根据。考经传所见“文”之主要观念，大抵如下：

一曰文与质：

《礼》云：“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

《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应玚著《文质论》（其文多有用韵），以为“二政代序，有文有质”，而归结于“言辨国典，辞定皇居，然后知质者不足，而文者有余”。虽为论典制而非专言文事，然其说可与魏文“文章经国之大业”相表里，而所重则在“文”也。若彦和之论，则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序志》篇），而“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音》篇）。“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章表》篇）是则舒文载实之说，所重乃在乎“质”矣。故彦和责应氏之论为“华而疏略”（《序志》），职是故也。又谓“文附质”而“质待文”，“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情采》篇）。文质相倚之义，至是已无遗蕴矣。

二曰文与武：

---

① 扬雄云：“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此《征圣》、《宗经》之旨。谭献《复堂文录》甲叙亦论“摛文之士，必本经术”。

《诗》云："允文允武。"

《礼》云："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

《左传》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文武本自异途，彦和则合一之。既主华实相胜，且力倡文武兼资。故识"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而言"文武之术，左右唯宜"。郤縠、孙武，可为楷式。是以"摛文必在纬军国"（具见《程器》）。此虽本《周书·梓材》之说，贵器用而兼文采，实亦取乎《诗》"允文允武"之意，与晋宋文人见解迥殊，要亦依经以立论者也。

最广义之"文"，兼指天文与人文。《易》称天文、地文及鸟兽之文，又曰"文明"。

《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又："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

又："文明以止，人文也。"

《左传·昭二十八年》："经纬天地曰文。"

应玚论文，溯源于剖判，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故曰："日月运其光，列宿曜于文，百谷丽于土，芳华茂于春。是以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穷神知化，万物是经。"《文心》首《原道》篇，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日月山川，皆道之文；旁及万品，动植草木，无非文者。要以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彪炳辞义。鼓天下者，存乎辞。人文与天文，经纬为一。故曰："文明以健，珪璋乃骋。"（《风骨》篇）此义也，近参应氏，而远追羲文。究其原，实出于《易》也。若夫人文之盛，莫切于礼乐，故经每称"礼乐之文"。

《礼》　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礼自外作，故文。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

《论语》 文之以礼乐。

古以礼法为文章（见《左传》“考文章”杜注：“礼、法也”）。彦和因谓：“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则以文章之大用，即经典之辞训。而文之精义，尤在乎社会作用。故于《征圣》篇列举“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三义。修、齐、治、平之务，无非“文章”。孔子赞尧曰“焕乎其有文章”，褒周则曰“郁郁乎文”，此皆“文”之广义。故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非“言辞”始谓之“文”，凡“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者（《论语》邢疏），皆文章也。《荡之什》诗序云：“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亦以“文章”指法度也。（谥法以文为号者尤多，兹不具论）。

经书中以容貌为形文：《礼》：“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

节奏为声文：《礼》：“故形与声，声成文，谓之音。”

称情制礼，亦谓之文：《礼》：“称情而立文，咽以饰群。”

彦和《情采》篇，因区形文、声文、情文三者，亦取资于《礼》而加以变通者。由此知彦和之所谓文，乃继承孔子广义之“文”之观念，加以发扬；尤重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之地位与作用。此与齐、梁以沉思翰藻始得为“文”之狭义文学观念，大异其趣。故其立论，不得不溯源于经典，而大倡“征圣”与“宗经”也。

惟此一说，乃汉以来之传统文学观。刘向《说苑》有《修文》篇，又有《反质》篇，盖主文质合一。

《修文》篇：“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故圣王修体文，设庠序。……”

又：“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

《反质》篇：“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又：“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长。”

此先乎应场、彦和而倡合文质之论者也。

汉人对“文学”二字之解释，多折衷于礼乐、礼法。崔瑗《南阳文学颂》云：

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后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声，采言于圣以成谋。以和邦国，以谐万民。

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

于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

徐幹《中论·艺纪》篇，则主德艺合一。

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

又："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善，然后体全。"

又："礼乐之本也者，其德者乎？《诗》云：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此礼乐之所贵也。

又："艺者，心之所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

此与应玚同时，而主合文质，兼德艺之说者也。

降及晋世，挚虞之总论文章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李充《翰林论》：

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又："盟檄发于圣旅，相如谕蜀父老，可谓德音矣。"

挚虞之释文章，何异于仲宣？李充之主德者，正同符于伟长。今观彦和之论文，盖承此一传统之文学观念而来。不独主"合文质"、"同德艺"，且"兼文武"，可谓为综合之广义文学观。徐幹、挚虞但主德文同一，而彦和且欲统一文武。如是之综合文学论，直以"文学"为"文化"。在当日文、笔严分畛域

之狭义文学家观之，则不免离题过远。其说之不为时流所重，固矣。

三、刘勰思想与宗炳、颜延之之关系

彦和论文，主神理说。《原道》篇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云："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特著《神思》一篇，以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而神妙无方，惟"至精而能阐其妙，至变而能通其数"。渊微所至，则轮扁亦不能言者矣。按神理之论，自与佛氏之说有关，惟自晋宋以来，论艺术者，恒本神思之旨，发为玄远之论。宗炳之《序山水》，谓"乐趣融其神思"；王微之《叙画》，亦以明神之降，即画之情。此固庄生之玄言，移以论画评文，于理原无二致也。

宗炳《画山水序》云：

>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昧象。……夫圣人以神发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征于言象之外者，可以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成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全宋文》二十）

此篇高妙绝伦，实晋、宋间之名篇，岂彦和《神思》篇所可望其项背？

王微有《叙画》一篇：

>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历代名画记》六）

颇疑彦和"神思"之说，与宗炳辈不无相关之处。彦和之书，世多诵习，而宗炳罕有问津，故表出之。至宗炳《明佛论》，亦彦和《灭惑论》之先河

也。《明佛论》言练神处尤夥，如云：

《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礼乐之良敬，诗书之温洁，今于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列照，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于为始形，而略于为神哉？……而学者惟守救粗之阙文，以书礼为限断。闻穷神积劫之远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呜呼！有似行于层云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盖谓"至无"为道，阴阳两浑，故曰一阴一阳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于阴阳之表，非二仪所究，故曰阴阳不测耳。君平之说一生二谓神明，是也。

夫至治则天，大辟滔天，其要心神之为也。尧无理不照，无欲不尽，其神精也；桀无恶不肆，其神悖也。……

夫圣神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者，由心与物绝，唯神而已。故虚明之本，终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与物交，不一于神，虽以颜子之微，而必乾乾钻仰，好仁乐山，庶乎屡空。皆心用乃识，必用用妙接，识识妙续，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烂耳。今以悟息心，心用止而情识歇，则神明全矣。

所论极精。今不殚繁引，要以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挚。此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亦以神思为结虑之司契，职是故耳。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因谓："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开于知人心，宁知佛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及之，况精神我也。得焉则清升无穷，失矣则永坠无极。可不临深而求，履薄而虑乎？"其所追求者，不止畅其神明而已，乃在乎"精神我"之不灭。[①] 此已非文学艺术

① 宗炳云"精神我也"，《弘明集》"我也"作"作哉"。"精神我"之义已近婆罗门之 Atman。在古 Sata pn tha Brahmana 中言，The Soul as at man 能行正道（dhārma）者可得 Ksatrasya Ksatram（the strength of Strengths），如是可入极乐世界（参 S. Vidyabhusana，*History of Indian Logic*，p. 3），此即宗炳所蕲求者。此"精神我"乃灵魂不灭。It is eternal and everlasting and ys not killed though the body is killed. The wise man who knows the soul as bodiless within the body as unchanging among changing things，故得则清升，失则永坠。

之范畴，而为宗教之境域。顾其文学艺术之“神理”，亦由此出。若干文艺思想，必循宗教思想以抉发之，否则探骊得珠，殊非易事。斯亦其一例也。

宋初以来，神不灭之说，方兴未艾。若（丹阳尹）郑鲜之，亦有《神不灭论》，主神为生本，其源至妙。与宗炳所论，殊途同归，皆导彦和《灭惑论》之先路。其文皆载于《弘明集》，亦彦和所诵习者。其时文豪若颜延之，亦信奉佛法。考其文艺理论，与彦和实亦沆瀣一气。间曾论之，彦和之文艺思想，颇受颜延之之影响。延之理论，见于《庭诰》。惜今存者，非其全帙。然尝鼎一脔，犹可睹其梗概。兹举要如次：

（一）“言道”、“论心”为论事之本

《庭诰》云：“达见同善，通辨异科。一曰言道，二曰论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于天；论心者，议之于天；校理者，取之于物。从而别之，繇塗参陈，要而会之，终致可一。”（《弘明集》十三）此造论之一般法则。文之道，何能异是？故彦和《文心》，首揭《原道》。乃曰：“文之为德也，大矣；可与天地并生。”又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即言道者本之于天之义。其书名曰《文心》，亦所心论心而议之于人，此岂非循延之之轨辙乎？

（二）“形”、“神”之辨及治心为先

《庭诰》云：“为道者，盖流出于仙法，故以臻形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况神道不形，固众之所假，未能体神而不疑。神无者以为灵性密微，可以积理知；洪变欻恍，可以大顺待。照若镜天，肃若窥渊，能以理顺为人者，可与言有神矣。”（《弘明集》十三）此以形、神区别道与释，与彦和《灭惑论》正有同符。《灭惑论》云：“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织无穷，再抚六合之外。”即因颜说而引申者也。循是而衍绎之，故彦和论文，首重“神理”。又专立《神思》一篇，冠于笔术之首，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以为心思出于神，神即作文之基本动力。此与治心为先，亦同一原理。

（三）文笔之辨以“史传”入笔

颜氏“精于论文”（《诗品》），其论文、笔之语，不见于现存之《庭诰》，

惟《文心·总术》篇云：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之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略窥梗概。测其意，似颜氏区为言、笔、文三等，而以史传归入“笔”之范围。笔亦“言”之有文者也。彦和以史传、诸子纳入笔中，未始非基于颜氏之说。《总术》篇对颜氏多加非难，论者以为未当。[①] 考其重视诸子，子受葛洪之影响；其采及史传，则又根据延之传记属于笔之说。彰彰明甚。

（四）观书贵体要

《庭诰》云：“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宣旨。”《文心·征圣》篇：“《易》称辨物正言，《书》云辞尚体要。……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皆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对于观要与正言、微辞相关之义，显受《庭诰》之启发，而加以推阐者。

（五）彦和诗说多同颜延之

《庭诰》引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按《明诗》篇：“成帝品录……词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即缘本是说。

又《庭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御览》五八六）而《明诗》篇云“四言……则雅润为本，五言……则清丽居宗……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等语，亦略本此而加变通。

他若“隐秀”二字，出颜延之《颜府君家传铭》“青州隐秀，爰如贞居”句。凡此均足证彦和文论与颜延之关系之深。此非臆测之说，故举出之以质诸高明。[②]

四、《文心》各论之取材述略

《文心》各篇之取材非一，兹略证如下。其中多为前已言之者，不复举

---

① 见逯钦立《说文笔》，《史语所集刊》十六本，203—204页。

② 高桥和已有《述颜延之之文学》，见《桥本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108页。然于颜氏文学思想涉论至略。

出，以省繁冗。

原道 法《淮南子》首《原道训》。

征圣 体要、微辞、正言诸义，俱本颜延之《庭诰》。说见前。

宗经 桓谭《新论》有《正经》篇（第九）。如言“古袟《礼记》、古《论语》、古《孝经》，乃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即以经为文辞之源。

明诗 《庭诰》“五言流靡，四言侧密，陈思兼之”，即彦和所本。

诠赋 桓谭《新论》有《道赋》篇（第十二），《全汉文》辑存四条。如云“子云言能读千赋则善赋”，彦和引用之。皇甫谧《三都赋序》举相如、扬、班、张、马、王六家为赋之魁杰，彦和则益前此之荀、宋、枚、贾四家，进王褒而退季长，盖合皇甫谧、挚虞之说折衷之。《文章流别》论赋极详。“四过”之说，较《文心》为精。

颂赞 大致采挚虞。

铭箴 蔡邕有《铭论》（《全后汉文》七四），崔瑗有《叙箴》（《全后汉文》四五）。

哀吊 间亦取挚虞。

杂文 取傅玄《七谟序》、《连珠序》。

谐隐 《汉书·艺文志》有《谜书》十六篇。

诸子 用葛洪《尚博》篇说。

诏策 参蔡邕《独断》。

神思 “神思”二字及其义，取自宗炳。

通变 论变以陆机《文赋》为精，此参其说。

定势 论“势”肇于刘桢。《陆厥传》：“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

情采 “情文”二字，出陆云与兄札“此是情文”语。

隐秀 二字见颜延之《颜府君家传铭》。

丽辞 梁世朱澹远有《语对》十卷，《语丽》十卷。见《隋志》（又见《金楼子·聚书》篇）。

附会 刘逵《三者赋序》：“传辞会义。”（《晋书·文苑·左思传》）附会即傅会。

指瑕 《颜氏家训·文章》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是指瑕之作，亦江南之习尚也。

知音 贵远贱近一段，本《抱朴子·广譬》篇。又六观之术，按刘劭《人物志》有《八观》篇，此参其说。

程器 因魏文（《典论》）韦诞（《魏志·王粲传》引鱼豢《魏略》）之说，及宋袁淑《吊古文》（见《全宋文》四三）论古今文士之疵病。

兹略揭所知如上，其他未遑一一细考，容诸异日，再详论之。

五、刘勰与沈约

《梁书·文学传》云：

>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约。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知音之难，千古共叹。而酸咸异嗜，贵远贱近，文人相轻，自昔而然。故彦和于书末，特著《知音》篇，论次其事。沈约之于彦和，自是知音，然彦和此书，有意求合于沈约，实非一处。尝试论之。约于永明中，盛倡四声，陆厥、钟嵘，皆加非难，彦和独辟《声律》专篇以论之。所云“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岂非休文“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乎？勰以宗旨相同，故获沈约之赏识[①]，此一事也。颜之推《家训》引沈隐侯云：“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而《文心·练字》篇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用字尚易之说，与休文正合。此二事也。连珠之兴，傅玄以为“兴于汉章之世”（《连珠序》），沈约则云：“窃闻连珠之作，始于子云。”（《注制旨连珠表》）而《文心·杂文》篇，乃曰“扬雄覃思文阔……肇为连珠”，即取休文之说。此三事也。是其持论与沈约颇多符契，见重于彼，良非偶然。黄山谷《与王观复书》云：

> 南阳[②]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飞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

① 此点纪昀《沈氏四声考》已论之。

② 谓刘勰籍贯南阳，实误，曾慥《类说》又误称“东平刘勰”，详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

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意自然出群拔萃。（《豫章黄先生文集》十九）

所举二句，见《神思》篇。山谷以为出于沈、谢辈，而彦和本之立论。谢不知何人，沈自指休文。然未闻休文有此说，未审山谷何所本耳。

《文心·镕裁》篇论，草创鸿笔，宜先标三准，即：（1）设情以位体；（2）酌事以取类；（3）撮辞以举要。[①] 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言建安之文云："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彦和此论相较，"情"即"设情"，"纬文"即"撮辞"，而"质"则"酌事"也。情、事、辞三者之分目，自是进一步。此彦和演衍之说，故各立专篇。其论设情则著《情采》，论酌事则撰《事类》，论撮辞则有《总术》等篇。其说似不无得自休文之启发，宜乎彦和书成，必欲取定于休文也。

六、《文心》一书对南北朝文学界之影响

叶廷珪《海缘碎事》谓"勰撰《文心雕龙》……沈约大赏之，陈于几案，于是竞相传焉。"末句虽出自意加，亦近情理。故《文心》一书，在当日朝野颇有影响。兹举三事论之。

（一）梁元帝萧绎

元帝在藩邸时，自号金楼子。其书《立言》篇下"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一段，论陈思王《武帝诔》、《明帝颂》用事之讹，即袭取《文心·指瑕》之文。[②] 又元帝之《内典碑铭集林序》及《立言》篇下主为文须华实兼资，似取《文心》之说。

（二）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

① 参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载《文学研究》第二期，1957。

② 龙溪精舍本《金楼子》，卷四、九、十七。此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附录四已举出。

代。……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

颜黄门所举陈思、潘岳用事不伦二端，乃本《文心·指瑕》篇，称引之以诫后昆。足见《指瑕》篇在当日之脍炙人口。与《家训·文章》篇，取诸彦和者，为说非一。如：(1)论文章各体原出五经之同于《宗经》篇；(2)论文人无行之同于《程器》篇；(3)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之同于《体性》、《附会》[①]；(4)论诗文之逸气之同于《定势》篇。[②] 并见之推得力于《文心》者多。之推始服官于梁，为员外郎，元帝承圣初，与王褒等同校秘阁史部之书。[③] 未奔齐以前，彦和之书，固曾经眼，自无疑者。

(三) 萧子显

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言："属文之道，事出于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又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盖因袭彦和《神思》篇"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及《通变》篇"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等。子显为子范第八弟，永元末，为给事中。其《南齐书》盖成于梁世，于《文心》一书，谅已寓目，故暗用其说而不自觉也。

以上皆梁时学人援用《文心》之明证。至于陆德明之袭用《体性》篇语，孔颖达《尚书正义》、李善《文选注》、刘知幾《史通》袭取尤多[④]，更在其后，兹不具论。

七、结论

自刘师培以《中古文学史》执教北大，提倡俪文，多缀录《文心》语，以资评骘。其后黄季刚撰《文心札记》，其门人秉其余绪，撰为《讲疏》。至

---

① 《文心·附会》篇："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又《体性》篇："辞为肤根，志实骨髓。"颜黄门语盖仿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第四篇第三章已举出。

② 颜氏《文章》篇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一众，当以衔勒制之。"盖本《定势》篇"不必壮言慷慨，乃称曰势"，必须"执正以驭奇"之说。

③ 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及周法高《颜之推年谱》。

④ 俱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附录四。

于近世，《文心》遂为显学，影响及于域外，其书且有英译①。西方学者以为治中国文学，非问途此书，无以获从入之门。惟《文心》一书，梁时已不甚为时流所称；即唐宋之世，亦复如是。究其原因，盖南北文论之作，非复一家。若张士简《文衡》，视彦和书虽未知孰为优劣，然正可相颉颃。而杜正藏之《文轨》，号曰《新书》，久沾溉于场屋②，且仲洽《流别》，宏度《翰林》，其书具存，足供玩索。而彦和于齐、梁之际，混迹缁流，亦非真能文章负时誉者也。日僧空海撰《文镜秘府论》，即效彦和之所为。然于彦和之文，犹病"其连章结句，时多涩阻"，而叹"所谓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者也"(《四声论》篇)。彦和《文心》，唐宋名家，实罕推重。文宗如韩柳，诗祖如李杜，未闻致力于《文心》，而后下笔。东坡于萧选，固多诟病，其于《文心》，自所未暇。黄山谷、晁公武对彦和犹多贬辞。③ 盖彦和之文，未臻于高妙。清史念祖谓其"文亦称赡雅，而征引既繁，或支或割，辞排气壅，如肥人艰步，极力腾踔，终不越江左蹊径"，极中其病。彦和于诗尤疏，汪师韩至谓其"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所斥为不知理义之归也"。史称彦和为文，长于佛理，今读其《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亦复平滞鲜气，风力都乏，诚不免"肥人艰步"之诮；以视王巾《头陀寺碑》，如矮人观场，望尘莫及矣。于兹可见彦和文章，实居第二流以下，在当时只见重于寺僧而已。其于文学，乃欲敷任论心，品藻胜流，其不易为刘孝绰、张率、陆倕辈之重视可知。盖"非知之难，而能之难"，彦和所以未获时流所称，倘以是欤？虽然，《流别》、《翰林》之书，今已散亡，惟此五十篇，巍然灵光，扬権六代之文，舍此罔由津逮。于是人矜为瑰宝，家奉作准绳。此书遂与萧选同为文苑之邓林，如泰华之并峙矣。

原载《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

---

① Vincent Yu-chung Sirh,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 by Lu Hsie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② 详拙作《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

③ 山谷书牍与王立之，谓《文心》所论未极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讥彦和之"疏略"。

《文心雕龙·原道篇》疏[1]

文之为德也，大矣![2]与天地并生者，何哉[3]？夫玄黄色杂[4]，方圆体分。[5]日月叠璧[6]，以垂丽天之象[7]；山川焕绮[8]，以铺黄地之形[9]；此盖道之文也。[10]仰观吐曜[11]，俯察含章[12]，高卑定位，故两仪即生矣[13]；惟人参之，性灵所钟[14]，是谓三才。[15]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16]心生而言立[17]，言立而文明[18]，自然之道也。[19]傍及万品[20]，动植皆文。[21]龙凤以藻绘呈瑞[22]，虎豹以炳蔚凝姿。[23]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24]，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25]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26]；泉石激韵，和若球锽。[27]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28]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29]

人文之元[30]，肇自太极[31]；幽赞神明[32]，易象惟先。[33]庖牺画其始[34]，仲尼翼其终。[35]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36]言之文也[37]，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38]，洛书韫乎九畴[39]，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40]，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41]自鸟迹代绳[42]，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43]，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44]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45]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46]；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47]夏后氏兴，业峻鸿绩[48]，九序惟歌[49]，勋德弥缛。[50]逮及商、周，文胜其质。[51]雅、颂所被，英华日新。[52]文王患忧[53]，繇辞炳曜。[54]符采复隐[55]，精义坚深。[56]重以公旦多材[57]，振其徽烈[58]，制诗缉颂。[59]斧藻[60]群言。[61]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62]镕钧六经[63]，必金声而玉振。[64]雕琢情性[65]，组织辞令[66]，木铎起而千里[67]应，席

珍流而万世响。[68]写天地之辉光[69]，晓生民[70]之耳目矣。[71]

爰自风姓[72]，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73]，莫不原道心以敷章[74]，研神理而设教[75]，取象乎河洛[76]，问数乎蓍龟[77]，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78]；然后能经纬区宇[79]，弥纶彝宪[80]，发挥事业[81]，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82]，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83]《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84]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85]：道心惟微[86]，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87]龙图献体，龟书呈貌。[88]天文斯观[89]，民胥以傚。[90]

注释

[1] 以"原道"发端者，纪昀评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晋宋以来，治学宗旨，在于体道通玄。彦和薰沐玄风，自莫能外；又精释典，务达心源。故其论曰："至道宗极，理归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灭惑论》此犹许氏《说文》以一部为首，所谓"惟初太始，首立于一"。其何以异？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万物由之以通"（《法言》李轨注），包裹天地，纲纪万物，学者贵能执道之要柄，以游于无劳之地，故《淮南鸿烈》，首《原道》之训，扬雄《法言》，揭《问道》之旨。彦和论文，探源于道，即有取乎此也。范注云："彦和所称之道，指圣贤之大道而言。"引《周礼》"儒以道得民"为说，昧其本根，义未周浃。治学贵有宗要，因明立量，首重宗体。刘氏运佛老之知量，接尧舜之心传，推原道枢，以立文学之本体，自为当时"穷宗极"、"探心源"之学术风气下之产物也。治本书者，应先明此第一谛。

[2] 此首揭文之德性。《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句法略同。《正义》曰："此一节明鬼神之道，无形而能显著诚信。"以"道"训"德"。德，《说文》云："升也。"字在彳部。亦借为"悳"。《说文》心部："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贾子《道德说》："所得以生谓之德，内得于己之谓也。"又《道术》曰："施行得理谓之德，外得于人之谓也。"训诂书若《释名》、《广雅》均以"得"训"德"。《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者也。"《论语》："道之以德。"皇疏引郭象说："德者，得其性者也。"是"德"犹"性"矣。《说文粹言疏证》："德兼内外，即宋儒体用之谓。"彦和所谓文之为德，盖兼文之体用言之。

文德一词，始见《易·小畜☰》，大象："君子以懿文德。"《诗·江汉》

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左·襄二十七年传》："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伪《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孔传即引《论语》为说。文德盖即《易·大有》彖辞所谓："其德则健而文明者也"。《舜典·洛诰》言"文祖"，孔传训为"文德之祖"。《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称："文人，文德之人。"此经传所见"文德"二字之义，"盖指文教德化而言也"。汉人于文德，或析言之，《法言·君子》篇："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李注："弸，满也；彪，文也。积行内满，文辞外发。"此分文与德为内外，王充本是说，加以敷陈，其《书解》篇云："《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又《佚文》篇亦言："文德之操为文。""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以为有充实之德，然后有光辉之文，否则空书而已。斯又《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一义之引申也。北齐杨遵彦本之著《文德论》（章学诚《文史义》亦有《文德》篇，主临文必敬，论古必恕，为文德之要，此又别一义也），今佚不传。凡此之言文德，谓著为丽辞者，须有德操，使外形与内诚，两相符会，合道德文意而一之。若彦和所论之文德，则兼贯天人，盖以道术言，而非以德艺言，更为弘通也已。

[3]《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彦和于此，推其说以论"文"。陆机《文赋》："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谓文意与天地并生而同流，盖自天地剖判以来，宇宙间事事物物，秩然粲然，无非文章也。

[4]《易·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文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与黄相次也。"《系辞传》："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正义》："言万物递相错杂，若玄黄相间，故谓之文也。"按物本亦指文采。《周语》云："服物采章"。《左·隐五年传》："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其下文言"昭文章"。服虔注谓为"辨旗物之用"。《左·桓二年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以文、物与度、数、声、明相次，故云："文物以纪之。"章氏《文始》："文者，错画杂文，对转队，与'勿'相转，'物'本毛物，'物'亦交之对转孳乳也。"按《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又："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其三游，杂

帛，幅半异。”而物者，《诗·小雅》：“三十维物。”《传》云：“异毛色三十也。”物亦训色。《周礼·犬人》：“用牷物。”郑司农注：“色也。”又《杂人》：“辨其物。”郑注：“毛色也。”物本指杂色牛（参徐灏《段注笺》，王国维《释物》），引申为毛色物色。是故杂文曰文，杂帛曰勿，杂色曰物，三义相承，所谓“物相杂曰文”者，可了然矣。言玄黄色杂，色杂，即指文章物采也。

[5]《大戴礼·天圆》篇：“天道四圆，地道四方。”《周礼·考工记·辀人》：“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地。”

[6]《汉书·律历志》：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绵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孟康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经典释文》《书·顾命》“重光”下引马融云：“日月星也。太极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故曰重光。”叠璧与合璧义同。马云“太极上元”者，《律历志》云“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于太极上元”是矣。李铣《三统术注》：“上元之首，夜半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历千五百三十九年，而又夜半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谓之统。”按三统为一元，一统为一五三九岁，一元则四六一七岁也。

[7]《易·离》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王弼注：“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

《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天垂象，见吉凶。”韩康伯注：“‘象’况日月辰星。”

[8]《说文》：“绮，文缯也。其文攲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任大椿云：“《西都赋》：‘提封五万，疆埸绮兮。沟胜刻缕，原隰龙鳞。’又云：‘缴道骑错。’然则古之绮骑文，多为交错之状矣。”焕者，《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集解》：“焕，明也。”《释名》：“纨，焕也；细泽有光，焕焕然也。”

[9]铺字古与“敷”通。《小尔雅·广诂》：“铺、敷，布也。”《诗·常武》：“铺敦淮濆。”《释文》引《韩诗》作“敷敦”。《左·襄十二年传》引《诗》“敷时绎思”作“铺时绎思”。此云铺地之文，犹《禹贡》之言敷土，《山海经》作“布土”也。《文选·西都赋》：“桑麻铺菜。”李善注引《尔雅》曰：“铺，布也。”按《尔雅》无此训，应是出《小尔雅》。（铺，普胡切。俗作鯆，非。）《易·系辞》：“在地成形。”王弼注：“‘形’况山川草木也。”又《易·系》：“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正义》曰：“天有悬象而成文

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诗·信南山》：“我疆我理。”《毛传》：“理，分地理也。”《正义》曰：“分别地所宜之理。”《大戴礼·少闲》：“庶人仰视天文，俯视地理。”《文子·上德》篇：“天道为文，地理为理。”《论衡·佚文》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意林》引，又《御览》三六引）又《书解》篇云：“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瑞应符命，莫非文者。”《吴都赋》：“夫上图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

[10]《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韩非子·解老》云：“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庄子·大宗师》及《淮南子·原道训》均有相同之语，盖道无乎不在，“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雨露所濡”。道无所不被，故“文”亦无所不有。道与天地准，文亦如之。《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依是而言，所谓“道之文”，即天地之文，亦即自然之文也。

[11]《释名·释天》：“曜，燿也，光明照耀也。”毕沅曰：“《说文》无‘曜’字，《玉篇》始有之。”魏明帝《山阳公赠册文》：“乾精承祚，坤露吐曜。”案《诗》“日月有曜”，曜指日而言。

[12]《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小象传：“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坤·文言》：“含万物而化光。”《诗·小雅》：“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章”字义同。

[13]《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正义》：“天以刚阳而尊，地以柔阴而卑。”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正义》：“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

[14]《荀子·王制》：“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杨注：“参，与之相参，共成化育也。”《礼记·礼运》：“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疏》：“圣人参拟于天地，则法于天地也。”又《孔子闲居》：“三王之德，参于天地。”郑注：“参天地者，其德与天地为三也。”《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法言·五百》：“圣人有以拟天地而

参诸身乎?”李轨注：“禀天地精灵，合德齐明，是以首拟天，腹拟也，四支合四时，五藏合五行，动如风雷，言成文章也。”按“参”有参拟之义，谓对法天地而身与之为三也。

[15]《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石经初刻本作“才”。三才，天地人也。

[16]《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义》：“‘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肃云：‘人于天地之间，如五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脏之最圣者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犹首也。万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气，明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首也。”按《易·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正义》：“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观此复象，乃见天地之心。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托天地以示法尔。”此据王注参以老氏之训说之。其言“天地之心本静寂”，与《礼运》言“人为天地之心”，二义不同，至张横渠会通之，而谓“为天地立心”，则更进一步矣。

[17]立言与立德、立功为三不朽之一。王充以“立言”为重。《论衡·书解》篇云：“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止也，读为弭）文，子贡讥之。”又：“或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以谓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于）暇日哉!’”又云：“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依是以言，则视立言如立德、立功矣。为天地立心，而后发而为文，故心为立言之枢管。《淮南子·原道训》：“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脏之王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必不胜其任矣。”观此，心之重要可知矣。

[18]《易·乾·文言》：“天下文明。”《正义》：“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舜典》：“濬哲文明。”“文明”二字经典习见，此句“文明”与“言立”对举，则明为动词，应作“著明”、“昭明”解。

[19] 心主于内，言发于外，此纯出乎自然。《淮南子·原道训》："体道者逸而不穷……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又云："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是故"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神思》篇）。所谓"独照之匠"，要能循于自然，无务苦虑，不假外饰。此自然之道，实道家之精义。刘永济云："初段明文心原道，盖出自然。首标文德侔天地之义，是文之原夫道也。次论人心参两仪之理，是文之原夫道也。末推阐心之物，声采并茂，莫非自然，以见文心原道，亦自然之符也。"

[20] 杨云："傍，张松孙本作'旁'。按旁字是。《说文》：'旁，溥也。'又：'傍，近也。'近谊于此不惬，当原是旁字。《史记·五帝本纪》：'旁罗日月星辰。'《汉书·郊祀志上》：'旁及四夷。'张衡《东京赋》：'旁震八鄙。'足为推证。旁及万品者，犹言溥及万品耳。"按《史记》"旁罗"，《正义》云："犹星遍布也。"

[21]《论衡·书解》篇："龙麟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蛇；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潟土；人无文，则为仆（朴）人，土山无麋鹿，潟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

[22]《书·益稷》："藻火粉米。"《淮南子·俶真训》："镂之以奇骩，杂之以青黄鲜，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华藻，华文也。""刻尊彝为蟠龙伏虎之状，故曰'曲成文章'。"此仿龙凤而为藻绘，然龙凤本身自有其藻绘也。杨云："《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韩诗外传》八：'夫凤，五彩备明。'"

[23]《易·革》卦象辞："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法言·吾子》两"变"字作"别"，《京氏易》作"辨"，辨而辫也。《说文》："辫，驳文也。"《苍颉》篇："斑，文貌也。"字亦作"斑"。《上林赋》："被斑文。"李善注："斑文，虎豹之皮也。"而"炳"者，《说文》云："明也。""蔚"者，虞氏云："蔚，蔇也。"《说文》蔇训草多貌。毛西河《仲氏易》引王湘卿云："虎文疏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

[24] 杨云："《书》伪《汤诰》：'贲若草木。'伪《孔传》：'贲，饰也。……焕然咸饰，若草木同华。'此盖舍人语意所本。"

[25]《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宓答书有云：'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

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孙蜀丞谓彦和语意本此。按秦宓此书，盖袭取《论衡·书解》篇语句。《论语·颜渊》：“棘子城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终为子贡所屈。仲任举此以议徒质不文之误，（秦）子敕亦仍其说。

纪评云：“刘氏标自然为宗，所以针砭齐梁之文藻，日竞雕华。”按自然之义，实魏晋以来谈玄者之恒言。考钟记室《诗品》亦揭“自然”之说，如云：“感物咏志，莫非自然。”“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即其显例。玄学既以自然为根本义，一以贯之，于诗文之指归，当亦复尔也。

[26] 李详云：“宋玉《高唐赋》：‘织条悲鸣，声似竽籁。’”杨氏云：“宋本《御览》卷五八一引作‘讽如竽琴’，日本喜多村直宽仿宋本《御览》作‘调如竽琴’，鲍崇城刻本《御览》作‘调如竹琴’。按诸本《御览》皆误，当作‘调如竽瑟’为是。古籍中无‘竽’、‘琴’连文者。《礼记·乐记》：‘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管子·霸形》篇：‘陈歌舞竽瑟之乐。’《墨子·三辩》篇：‘息于竽瑟之乐。’《庄子·胠箧》篇：‘铄绝竽瑟。’并其证也。宋本《御览》‘调’作‘讽’，乃形近之误。”

[27] 宋本《说文》玉部：“球，玉声也。璆，球或作翏。”《集韵》十八尤引亦作“玉声也，一曰美玉”。大徐本作“玉磬也”。《系传》无“磬”字。《史记·孔子世家》：“瑶佩玉声璆然。”钱坫《说文讲诠》引《史记》此文，云作“玉声”为是。《书·益稷》：“夏击鸣球。”郑注：“鸣球，即玉磬也。”又鍠，《说文》金部云：“钟声也。《诗》曰：‘钟鼓鍠’。”从皇字多主声，玉部：“瑝，玉声也。”《说文》引《诗》见《周颂·执竞》，今《诗》字作“喤喤”。《毛传》云：“和也。”《汉书·礼乐志》颜注：“鍠鍠，和也。”按球为玉声，鍠为钟声，锦鍠训和，故曰：“和若球鍠。”

[28] 此两句一指形文，一指声文。《易·系辞》：“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韩康伯注：“成形曰器。”“章”字本指乐章（《说文》：乐竟为一章，从章十，十，数之终也），借以为彰。《诗·棫朴》：“追琢其章。”《郑笺》：“追琢玉使成文章。”重言则曰“章章”。《广雅·释训》：“章章，采也。”《荀子·法行》：“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集解》：“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故以形言，文彩形质著见即谓之“章”。再以色言。《荀子·富国》：“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杨倞注：“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29] 言无知觉之物，犹且声采并茂，何况有血气之伦，焉可无文耶？

[30]《易·贲》卦象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二字见此。李翱《杂说》云："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绝也；日月晕蚀，星辰错行，是天之文乖盭，无久覆乎上；天文裂绝，无久载乎下；人文纰缪，无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此通论天文地文人文之条秩，有不能错缪逾越者。《尔雅·释诂》云："元，始也。"《九家易注》："元，气之始也。"

[31]《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韩康伯注："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晋书·纪瞻传》："顾荣言太极者，盖谓混沌时矇昧未分。"《周易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曰'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庄子·大宗师》言道之为物："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狶韦得之，以挈天地，伏戏得之，以袭气母。……"天地剖判，固原乎太极，即人文之始，亦复有同然也。

[32]《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韩康伯注："幽，深也。赞，明也。蓍受命如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顾广圻曰："旧本作谠是也。《易》释文云：幽谠本或作谠。孔龢碑：'幽谠神明。'白石神君碑：'幽谠天地。'汉人正用'谠'字。"孙诒让《札迻》："彦和用经语，多从别本，如幽谠神明，本《易》释文或本。"

[33]《易·系辞》："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左传》："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

[34]《易·系辞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之情。"《正义》"论周易之三名"条云："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35]《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易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汉书·艺文志》："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又《扬雄传》："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在地之藏，定万物之基。”《论衡·谢短》篇：“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

[36]《易正义》：“《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左·昭廿八年传》：“经纬天地曰文。”《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孔晁注：“成其道也。”《书·尧典》：“钦明文思。”《释文》引马融云：“经纬天地谓之文。”他卦无文言，止乾坤有之，故曰：“独制文言。”乾坤即天地，则《文言》者，乃经纬天地之言也。

[37]阮文《文言说》云：“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为文，文即象其形也。”按《左传》论子产“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言之文也，乌可忽哉！

[38]说见《正纬》篇注。

[39]杨氏校云：“畴，《龙溪精舍丛书》本作‘章’，按《洪范》‘九畴’，《汉书·五行志》作‘九章’，是‘畴’、‘章’二字，古固通用。”范注引《汉书·五行志》为说。按陈槃云：“洛书与河图，并为八卦所本，《易·系辞》之言甚明，即《易乾凿度》、《礼含文嘉》等，亦至今尚保存此说；但对于洛书，西京末年复有相反之一说法。《汉书·五行志序》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据志序，此刘歆说也，按《洛书》如已有此六十五字，是之谓章明较著矣，桓谭《新论·启寤》何致云：‘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而不可知。’此说与桓谭之言已相距甚远，与《易·系辞》即《乾凿度》等谶纬义亦不合，非旧也。”（《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

[40]杨校云：“实，《御览》五八五引作‘宝’。按实、宝二字形近易讹。（本书《诸子》篇‘怀宝挺秀’，活字本、汪本等误作‘怀实’）此当作‘实’，

始能与‘华’字相俪。‘华’‘实’对举，本书恒见。”黄注：“王子年《拾遗记》：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宋书·符瑞志序》：“握河（纪）括地（象）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纪评云：“玉版丹文绿字，散见纬书，黄注所云《拾遗记》、《宋书》皆非根柢。”按《大戴礼记·保傅》：“书之玉版，藏之金柜。”《汉书·晁错传》：“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孙谷《古微书》及《纬攟》诸辑本有河图玉版，《经义考》毖纬有孔子玉版，此纬书以玉版为名者，谓其文字书于玉版之上也。《山海经·中山经》“玄扈之水”郭注引河图云：“（苍颉）临于玄扈洛汭，灵龟负书，丹甲青文。”《淮南子·俶真训》：“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御览》八一引《中候考河命》：“黄龙负卷舒图，赤文绿错。”注：“错，分也；文而以绿色分其间。”即所谓丹文绿牒也。此类记载，不殚缕举。古时文字每书于玉，近岁地下发现，若《邺中片羽三集》有朱书“鼋于丁”残玉，殷墟出土有“小戠出”玉牌符等，即所谓玉版。至于金镂，当指铜器镂文，《淮南子·俶真训》言牺尊“镂之以歃劂”、“华藻镈鲜”者（古以金饰物谓之镈）是也。范晔《后汉书·方术传序》：“神经怪牒，玉策金绳。”神仙家书亦有此类玉版绿牒之称，特昭其贵重耳。

[41]《诗·召南·采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毛传》：“尸，主。”彦和借用之。神理说为刘氏基本理论。《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又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楬櫫“神”为作文之原动力，严沧浪论诗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亦即此义。

[42] 按《练字》篇：“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序》：“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作书契。”《论衡·感类》篇：“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吕氏春秋·君守》篇高诱注：“苍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按“分理”，段玉裁注：“犹文理。”康韦续纂五十六种书，黄帝时史苍颉写鸟迹为文作篆书，即由高说推演者。

[43]《左传·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左史倚相“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疏》引贾逵注：“三坟，三王之书。”又引马融注：“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谓即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乃用贾说。而伪孔安国《尚书序》因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三坟内容，向不能悉。后世

有伪《古三坟书》，分为山坟、气坟、形坟三部；山坟为天皇伏羲氏之《连山易》，气坟为人皇神农氏之《归藏易》，形坟为地皇轩辕氏之《乾坤易》。山坟中杂有《河图代姓纪》，记有巢氏及其子燧人氏，又言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姓风。气坟中有《人皇神农氏政典》。所谓炎皞，炎指炎帝神农氏，皞指太皞宓牺氏。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即据郑玄说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而纬书言三皇则有异说，《礼纬含文嘉》以为虙戏燧人神农，《春秋纬·运斗枢》、《元命苞》则以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号篇》则以三皇为伏羲、神农、燧人。按古又有二皇之号，《淮南子·原道训》："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高诱注："二皇，伏羲、神农也。"《潜夫论·五德志》："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三皇之说最为纷糅，彦和所举之炎皞，乃指神农、伏羲二皇耳。其言"炎皞遗事，纪在三坟"，似曾见《三坟书》，惟今存伪《古三坟书》乃宋元丰间毛渐得于唐州比阳民家，始为表彰，叶梦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皆辨其伪，郑樵独谓其辞质而野，恐非后人之能为；至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吴莱（《三坟辨》)、明胡应麟（《四部正讹》）均斥之，其谬妄自不待论。惟揆彦和所言，齐梁间容有其书，殆与毛渐所谓唐（昭宗）天复中自青城山石匣所得者不同。

[44] 梁庾肩吾《书品论》："柑恭声彩遒越。""声采"二字同此。

[45] 黄校始盛，冯本作为。杨云："《御览》五八五引亦作为。《征圣》篇：'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辞义与此同。"《论语·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何晏《集解》："焕，明也。其立文垂制义著名。"按《论语》"焕乎"一章但叹美尧，彦和兼以指舜。

[46]《书·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超哉，百工熙哉。"《孔传》："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广。"

[47]《尚书》有《益稷》篇。《孔疏》："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称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

敷奏，《书·舜典》："敷奏以言。"《孔传》："敷陈，奏进也。"《正义》曰："敷者，布散之言，与陈设义同，故为陈也。奏是进上之语，故为进也。"《诗·长发》："敷奏其勇。"《汉书·宣帝纪》作"傅奏其言"，师古曰："傅读

曰敷”。

[48]《尚书大传·虞夏传》:“歌大化大训六府九原而夏道兴。”郑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困学纪闻》二黄侣云:“业绩同训功,峻鸿皆训大,此句位字殊违常轨。”按此殆“吉日辰良”(《楚辞·九歌》)之句法。

[49]《御览》五八五引“惟”作“咏”。杨云:“舍人是语本书伪《大禹谟》,当以作‘惟’为是。其作‘咏’者,盖涉上‘吟咏’句而误。《明诗》篇:‘大禹成功,九序惟歌。’是其证。”按《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欢。……劝以《九歌》,俾勿坏。”又《左·文七年传》:“晋郤缺言于赵子曰……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火、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周礼·大司乐》:“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庙中奏之。”注郑司农引《春秋》此传说之。疏引贾服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也。”以三事为天地人之德。《左传》昭二十年及二十五年皆言《九歌》事。

[50]《九歌》即歌九功之德。勋德即功德。《大禹谟》:“其克有勋。”《说文》力部:“勋,能成王功也。”《尔雅·释诂》:“勋,功也。”《论衡·书解》篇:“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彦和语略本此。

[51]杨云:“《礼记·表记》:‘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舍人遣词本此。”

[52]英华,本指玉言。《说文》“瓔”下云:“玉英华相如瑟弦。”《系传》:“英,光中之实也;华,光之浮华也。”

[53]宋《御览》五八五引作忧患。《易·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云:“易之兴也,其当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正义序》:“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

[54]《左传·闵二年》:“成季之繇。”《易·释文》引服虔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杜注:“繇,卦兆之占辞。”《晋语》韦注:“由也,吉凶所由而出也。”以由训繇,说异。

[55]李详云:“左思《蜀都赋》:‘符采彪炳。’刘逵注:‘符采,玉之横文也。’”按原赋云:“符采彪炳,晖丽灼烁。”盖言玉之光彩。《文选》魏文帝

《与钟大理书》李善注引王逸《正部论》曰："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郭璞引此作王子灵《符应》。符亦作"孚"。《说文》"璠"字下引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王应麟谓此文见《齐论语·问玉》篇）《系传》云："奂文也；瑟言瑟瑟然，文细也。理谓文理也。孚音符，谓之光采也，今亦言符采也。"《礼记·聘义》孔子答子贡问玉曰："孚尹旁达，信也。"马注："玉之为物，孚尹于中，而达于外，所以为信。"亦见《家语》第三十六《问玉》篇，注云："孚尹，玉貌。"然《礼》郑注谓孚尹读为浮筠，谓："玉采色也。采色旁达，不有隐翳，似信也。孚或作'姇'。"《孔疏》："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孚"、"姇"皆与"符"通，谓光彩现于外。《众经音义》十三引《纂文》："孚瑜，言美色也。"孚瑜亦犹符采也。易义精微，如玉之孚尹于中，故云"符采复隐"。

[56]《易·系辞》："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正义》："言圣人用精神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动，乃能致其所用。"

[57]《尚书·金滕》："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

[58]李云：应璩《与王将军书》："雀鼠虽微，犹知徽烈。"按徽，美也。《诗·角弓》："君子有徽猷。"《毛传》："徽，美也。"

[59]李详云："纪云：'剬即专字'。《说文》训为齐，言切割而使之齐（颐按：大徐本《说文》：剬，断齐也，旨兖切。《校录》云：《韵会》引作'专，齐也'，盖因毛氏《韵会》增改。《玉篇》：齐也。则训齐乃《玉篇》，非《说文》，与《诗》义无涉。古帖'制'字多书为'剬'，此'剬'字疑为'制'之讹。《史记·五帝本纪》：依鬼神而剬义。注：'剬'有'制'义，是三字相乱已久，不必定用本训也）。"详案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制"字作"剬"，缘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据此，"剬"即"制"字，既不可依《说文》训"专"为"齐"，亦不必辨"剬"相似之讹也。"

王利器云："制"原作"剬"，今据《御览》改。"制"、"剬"隶书形近而讹。《宗经》篇："据事剬范。"唐写本"剬"作"制"。《史记·五帝本纪》："依鬼神以制义。"《正义》："'剬'古'制'字。此'制'认为'剬'之证。"钱大昕《三史拾遗》谓："制，篆作𠜭，隶变作剬，字又讹作制；唐人不明小学，误以剬为制之古字。"梁玉绳《志疑》亦用此说。今按钱说未尽确，《法言·渊骞》篇："鲁仲连傷而不制，蔺相如制而不傷。"两制字，桂馥《说文义

证》引俱作“剬”。《字通》以“剬”与“制”通。两字向来每混用。《说文》“制”字云：裁也，从刀从未。𠛐古文制。《玉篇》作㓡，娄机《汉隶字原》、《成汤灵台碑》已作“制”，而《礼器碑》作“制”，形与“剬”近。北魏《寇凭墓志》以“剬”为“制”，又魏《唐耀墓志》以“製”为“制”，则不自唐始也。“制”与“製”盖古今字。制诗，言製作诗篇也。

范注：据《毛诗·豳风·七月序》，《七月》周公所作；据《尚书·金滕》、《鸱鸮》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上》，《时迈》周公所作；故彦和云“剬诗缉颂”也。杨（明照）云：“按《国语·周语中》：‘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吕氏春秋·古乐》篇：‘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文德。’《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是《小雅·常棣》、《大雅·文王》、《周颂·清庙》，并周公所作。故舍人云尔。又郑玄《诗谱序》：‘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

[60] 黄注：“《法言·学行》：‘吾未见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按李注：“斧藻犹刻桷丹楹之饰。”《尔雅·释器》：“斧谓之黼”，孙炎云：“黼文如斧形，盖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书·益稷》：“藻火粉米。楶。”《礼记·玉藻》郑注：“杂采曰藻。”则斧藻乃指文饰之事。

[61]《书·秦誓》：“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后汉书·蔡邕传》：“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陆机《文赋》：“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

[62]《宋书·符瑞志》：“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

[63] 黄注：“（《汉书》）《董仲舒传》：‘（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师古曰：‘钧，造瓦之法，其中旋转者。镕，谓铸器之模范也’。”按《文选》注引苍颉云：“镕，炭炉所以行消铁也。”

[64]《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之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赵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已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者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始条理者，金从革，可始之使条理。终条理者，玉终其声而不细也。合三德而不挠也。”

[65] 王云：传校元本、两京本、谭（献）校本“情性”作“性情”，《御

览》引亦作"性情"。今按《淮南子·精神训》："衰世凑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高注："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与世人交接也。"彦和盖借用《淮南子》语，《精神训》先"性"后"情"，则作"性情"者是。李详引史公《报任安书》"雕琢曼辞"以说之，未当。《周礼·考工记·梓人》："以为雕琢。"《荀子·王制》："使雕琢文采。"《诗·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传》："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释文》："追，郑云：亦治玉也。"雕亦作琱 。《说文》玉部："琱，治玉也。"又："琢，治玉也。"二字同训。

[66]《礼记·冠义》："顺辞令。"《大戴礼·朝事》："喻言语，计辞令。"《左传·襄三十一年》："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新书·道术》："辞令就得谓之雅。"《史记·屈原传》："娴于辞令。"《文选·报任安书》："不辱辞令。"李善注："辞谓言辞，令谓教命。"

[67]《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集解》："孔曰：木铎，施政教时所振也。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按《书·胤征》："遒人以木铎巡于路。"《孔传》："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礼记·明堂位》："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礼》有金铎木铎，武事振金铎，文事则振木铎。

起，《御览》五八五引作启，各本亦作启。王云："梅（庆生）改，黄本、张松孙本俱从之。"杨云："启、起音近易讹。《左·僖二十五年传》：'晋于是始启南阳。'注疏本亦误'启'作'起'。"

[68]《礼记·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郑注："为孔子布席于堂与之坐也。"孔疏："席犹铺陈也。珍谓美善之道，言儒能铺陈上古尧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

[69]孙云："《御览》辉光作光辉。"按《易·大畜·彖》曰："辉光日新其德。"字亦作辉。《正义》云："能辉耀光荣。"《汉书·李寻传》："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魏志》引《管辂别传》："辂曰，不同之名，朝旦为辉，日中为光。"《王莽传》上有前辉光谢嚣，莽分左冯翊曰前辉光。自来沿用《易》语者皆曰辉光，不曰光辉，则以作"辉光"为是。

[70]《孟子·公孙丑》："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诗·大雅》："厥初生民。"《郑笺》："本后稷之初生，故谓之生民。"

[71]《书·益稷》："臣作朕股肱耳目。"《周语下》："夫耳目，心之枢机也。"《管子·心术》："耳目者，视听之官也。"

［72］王云："《御览》爰上有故字。"风姓指伏羲氏。《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三祀。"《礼记·月令》："其帝太皞。"《释文》："皞亦作昊。"杜注："太皞，伏羲。"《正义》引《帝王世纪》："太皞帝庖牺氏，风姓也。"郑玄注《通卦验》："燧皇谓遂人，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此本纬书说。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因谓："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风姓参秦嘉谟辑《世本·氏姓》篇。

［73］王云："玄圣，梅云：一作元圣。"案作"玄圣"是。《庄子·天道》篇："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此彦和所本。《文选》班固《典引》："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李善注："玄圣，孔子也。"《后汉书·班固传》载其文。李贤注云："玄圣为孔子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徵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按纪昀云"玄圣当指伏羲诸圣，若指孔子，于下句为复"，则与旧说不合。

以素王为孔子，已见《淮南子·主术训》："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或谓自纬书出，始有孔子自号素王之说，非也。黄注引《拾遗记》，殊疏。素王一名，见于《史记·殷本纪》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云："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广雅·释诂》："素，空也。"王先慎谓："素王，空王，指在下者言。"按以孔子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王者之道，故为素王也。

［74］王云："各本作裁文章，黄本从《御览》引改。"按敷，陈也，《后汉书·章帝纪》："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敷章与敷奏，文例相同，下句"设教"正成对文。

［75］《易·观䷓》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正义》："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在下自然观化服从。"神道，彦和变其言曰"神理"者，因上文言"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使上下文义相贯。神理者，曹植《武帝诔》："聪竟神理。"谢灵运《应诏诗》："道以神理超。"又《述祖德诗》："龛暴资神理。"

［76］《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77］《左传》："韩简曰：龟，象也；筮，数也。"《易·系辞》："探赜索

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又云：“极数知来谓之占。”

[78]《易·贲☶☲》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日月星辰为天文也。”又引干宝曰：“四时之变，县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孔疏》谓，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昭明太子《文选序》亦引贲卦此语以赞美文之时义。

[79]《左传·昭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正义》曰：“言礼于天地，犹织之有经纬，得经纬相错乃成文。”又二十八年：“经纬天地曰文。”《史记·始皇本纪》：“经纬天下。”班固《西都赋》：“经纬乎阴阳。”区宇，《文选·西都赋》：“区宇若兹。”又《东京赋》：“区宇乂宁。”薛综注：“天地之内称寓。”又五臣刘良注：“区宇，天地也。”

[80]《易·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孔疏》：“弥谓弥缝补合，纶谓经纶牵引。”《书·同命》：“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孔传》：“叹而敕之，使敬用所言，当长辅汝君于常法。”彝宪即常法。

[81]黄校云：“辉疑作挥。”杨云：“黄校是也。《御览》五八五引正作挥。《程器》篇：‘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尤为明证。《事类》篇：‘表里发挥。’汪本、余本等作发挥。是挥与辉易淆之证。”按《易·乾·文言》：“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孔疏》：“发谓发越也，挥谓挥散也。言六爻发越挥散，旁通万物之情也。”《易·系辞》：“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又《坤·文言》：“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发挥事业，由内美表现为外美，“至美”之形成，亦人文之义也。

[82]刘永济《释义》：“（此）明道与文相关之理，中含二义：一、道沿圣以垂文，二、圣因文以明道。盖自然妙道，非圣不彰；圣哲鸿文，非道不立，此舍人以《原道》冠冕全书之故也。”按文以载道，彦和已畅其说，此段特引申《易》义，以道与天地准，文亦有同然。《易》有圣人之道者四，以言者莫尚于辞，辞义彪炳，则道自明耳。

[83]《易·系辞》：“百姓日用而不知。”《左传·襄二十九年》：“用而不匮。”《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仁义在躬，用之不匮。”《诗·既醉》：“孝子不匮。”《毛传》：“匮，竭也。”

[84]此《系辞》下语。王注：“辞，爻辞也。爻以鼓动，效天下之动

也。”《正义》：“鼓谓发扬天下之动，动有得失，存乎爻卦之辞，谓观辞以知得失也。”按此句所谓辞，乃所谓“系辞焉以尽其言”之辞，本专指《易》卦爻辞，彦和谓辞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则推扩其义而言之耳。

[85] 范注：“本书《颂赞》篇云：‘赞者，明也，助也。……’《易·说》卦传云：‘幽赞于神明而生蓍。’韩康伯注‘赞，明也’。此彦和说所本。《说文》无‘讚’字，自以作赞为是。”按《史通·论赞》篇：“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略谓：“赞语与偈言相似，彦和既事佛，《文心》又复有赞，可谓受佛教之影响，所以‘总历本意’也。”

[86] 范注：“《荀子·解蔽》篇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枚赜采入伪《大禹谟》改两‘之’字为‘惟’字，彦和盖用其语。”

[87] 上文云：“繇辞炳曜。”《诏策》篇：“符命炳燿。”《说文》：“燿，照也。”

[88]《宋书·符瑞志》：“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89] 按用《贲》卦彖辞。

[90] 各本皆作傚，一本作“俲”。《诗·小雅·角弓》：“尔之教矣，民胥傚矣。”彦和用其语。《郑笺》：“天下之人皆学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附录 敦煌唐写文心雕龙影本跋及后记

跋

唐末人草书《文心雕龙》残本，现藏大英博物院。原列斯坦因目五四七八，Giles 新编列号七二八三。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著录（283 页）。

原本蝴蝶装小册。中外人士，据以撰校记者，颇不乏人。有：

铃木虎雄校记 见《内藤博士还历论丛》 1926

赵万里校记 见《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一期 1926

向来谓此册起《征圣》篇，讫《杂文》篇。《原道》篇存赞文末十三字，《谐隐》篇止有篇题，余皆亡佚（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附录六）。今勘以此显微影本，《征圣》篇仅至“或隐义以藏用”句之“义”字，下阙；《宗

经》篇则自“岁历绵暖”起，以上并缺。然审各家校语，《征圣》篇下半每引唐写本，岂此显微影本，由第一页至第二页中间摄影时有夺漏耶？

唐写本之可贵，以《原道》至《辨骚》诸篇而论，颇多胜义。如《征圣》之“先王声教”（同于《练字》篇），“辩立有断辞之美”，《宗经》之“采掇片言”（“片”字本误作“生”），《正纬》之“戏其浮假”（本作“深瑕”），《辨骚》之“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 （原误“宪”为“慢”，误“杂”为“雅”），“苑其鸿裁”（原作“菀”），皆较旧本为优。

《文心》宋本，今不可见。《故宫周刊》第五十六期有宋版文心雕龙影片（第一版），不悉何本。明刊入校者，杨明照《校注》与王利器《新书》序录，仅引嘉靖庚子（1540）新安汪一元刊本而止。然前乎此者有弘治甲子（1504）冯允中吴中刊本，友人神田喜一郎博士藏有其书，其《鬯盦藏书绝句》谓“至珍冯本同球璧，除却唐钞孰等科”者也（此本卷末有“吴人杨凤缮写”一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误以为元版），允为唐钞以后最重要之本子。因论唐钞，故并记之。

饶宗颐识

后记

1962年，余以敦煌唐写本残卷付诸影刊，盖取自东洋文库所摄之显微胶卷。文中曾指出《征圣》篇由第一页至第二页中间摄影时有夺漏。越二载，余以访敦煌资料莅英伦，亲检原物核对。未遑著笔，而日本户田浩晓先生关心于此，特著文讨论（见户田氏著《校勘资料上とのこ文心雕龙敦煌本》，《立正大学教养部纪要》第二号），证实为1935年文库人员在英摄影时漏影之疏失。1979年潘重规先生从英伦取得原册照片，重印于所著《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之中。由是唐写此册乃有完整之印本。惟潘君称有人“致疑别有敦煌异本”，则殊易引起误会——因《文心》敦煌草书写本仅有Stein五四七八此册而已，实别无他卷也。顷见林其琰、陈凤金二君所撰，《关于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一文（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一九三期），复提及此事。林君据潘书为说，未睹拙文。然拙作实为唐本首次影印公之于世之本，于《文心》唐本流传研究虽不敢居为首功，然亦不容抹杀，滋生误解。闻王元化教授复取英伦是本加以汇校重印，嘉惠来学，后来居上，谨拭目以俟之。

《文心雕龙·声律篇》书后

刘彦和撰《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世、正当沈约四声说盛行之际。其时有两派主张，反对四声者，南方以钟嵘为代表；彦和则为沈约之支持者，书中既揭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形文情文之外，厥为声文（《情采篇》）。复标六观，其一曰"观宫商"（《知音篇》）。又云："讽诵则绩在宫商"（《练字篇》）。特著声律专篇，推阐其理。（《序志》云"阅声字"，即指《声律》及《练字》两篇。）处处见其对声律之重视，以声文为辞章"神理之数"三大因素之一，音以律文不可失序。宜其书之见重于沈约也。辨宫商、审音律为彦和文学见解骨干之一，本文将专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载有向长清《谈声律篇与齐梁时代的声律论》一文，重要论点指王融是声律论创始人，《文心·声律篇》论双声叠韵正阐释沈约之意，称道彦和对于声律说，有推进之功。惜语焉不详。

四声说之兴，《南齐书·陆厥传》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此以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隋陆善经《四声指归》亦言"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文镜秘府论》天卷）皎然《诗式·明四声》云："近自周颙，刘绘流出。……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空海《论文病》云："颙、约已降……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一四卷）当日一般认为四声之论，创自周颙，而制谱以言声病，则肇自沈约，咸无异论。沈谱久亡，幸《文镜秘府论》之《调四声谱》尚存其梗概。其说要点如下：

（一）以四声分配四方：东平、南上、西去、北入；

（二）凡四字一组，或六字总归一人（一作组）；

（三）四声纽字，配以双声、叠韵；

（四）凡四声竖读为纽，横读为韵。

此谱亦载于日僧安然之《悉昙藏》卷二，其说悉同。《日本见在书目》有《四声谱》一卷，宋本《玉篇》卷末载神珙之《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其序称："昔梁沈约创立纽字之图。"其纽字图即六字总归一人之图。沈氏以入声为纽，以绾领其余三声谓之纽字，其法即强调反音之法，《调四声谱》末云"若解此法，即解反音法，反音法有二种，一纽声反音，二双声反音"是也。简言之，重点在于反音，即由拼音法来辨别四声。反音始于服虔。景审为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音反，多以傍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按东汉时反音开始产生，正在梵学传入之后，景审用"傍纽"一词论之，极可注意。

余谓沈谱之反音，乃从悉昙悟得。唐封演《闻见记》"声韵"条："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可见王融乃周颙、沈约之追随者，而以纽切字，实倡自周颙，颙好为体语，体语者，即梵语子音之体文。章太炎《音理论》云："慧琳《一切经音义》称梵文阿等十二字为声势，迦等三十五字为体文，声势者韵，体文者纽也。"按字母分别子音与母音，各地语言称谓不同。有称之为日文与月文者，如波斯、阿剌伯语系有（1）solar letters，（2）lunar letters 是也。有称之曰体文与魂文者，南印度淡美尔文之分为（1）body letters（meyy-eluttus）即指子音，可译为体文。（2）soul letters（uyir-eluttus）即指母音，可译为魂文。是其例也。梵文子音称为体文，正可以 body letter 解之。体文取义殆取诸南印度字母。周颙既善体语（文），是深明梵音纽字，故能以切字为纽，以论四声。为沈约之前导。约进而造《四声谱》，取以制韵，字其从远，示人以利病，遂成独得之秘。

悉昙为印度学童学习字母拼音之法门，梵书东传，随之入华。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中有《悉昙藏》二卷（《大正》五五，18 页）有注言："先在安公注经录，或是晚集所得。"是晋时道安已传其书，非自唐始也。慧远传其学，著疏云："初十二字是生字章，末后四字是呼字音，呼有单复各有长短。"是为北地之音。具见日僧安然所记。安然又引宋国谢灵运之说特多。《慧叡传》："元嘉中，陈郡谢灵运语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

同，著《十四音训》，叙列梵汉，昭然可了。”（《高僧传》七）相传“十四音总是悉昙章法”。康乐亦研习梵言，且有著述，为《大涅槃经·文字品》解说：梁武帝萧衍亦著有《涅槃疏》，论十四音皆是半字（《悉昙藏》，430 页）。此则与周颙、沈约同时。唐人所传僧徒歌颂之《悉昙章》为聊章体式，敦煌写卷保存资料甚多，全名曰《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前有僧定惠序云：

> 夫《悉昙章》者，四生六道，殊胜语言。唐国中岳释沙门定惠法师翻注，并合秦音鸠摩罗什《通韵》，鲁流卢楼为首。（北京鸟字六四）

序中提及鸠摩罗什《通韵》。法京所藏此类《悉昙章》之册与卷即有四件之多（详拙作《敦煌曲》，146 页）。《悉昙章》之特色在每章末句必用“鲁流卢楼”四音合以切字为纽之三个同韵字，作为句中的助声。兹声二例如下：

> 颇罗堕！第一舍缘清净座，万事不起真无我。……鲁留卢楼颇罗堕。
> 质领盛！第二住心常看净，亦见亦闻无视听。……鲁留卢楼只领盛。
> 复浪养！第三著心须屏傥，扫却垢秽除灾障。……鲁留卢楼复浪养。

鲁留卢楼是梵语ṛ ṝ ḷ ḹ四字母，在此用作帮声。两“颇罗坠”与“复浪养”等都如沈氏《调四声谱》中之配为双声叠韵之四声纽字，大概为反音法之同韵字，借用之以作助声，以增声曲折之美，毫无取意，只是帮腔而已。

与沈氏约略同时之刘縚（字言明，作《续汉志》之刘昭子）亦有说，云：

> 四声之中，入声最少，余声有两，总归一人。如“征、整、政、隻；遮、者、柘、隻是也”。（《文镜秘府论》一四卷峰腰下）

此亦《四声谱》中四声纽字之法。此类例字“征、整、政、隻”亦见于后来悉昙家之书。如《孔弄图记》一系日本岩崎文库本题《五音声论》书中之反音，即为征、整、正、隻（参小西甚一著《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第三章，220、227 页）。具见沈氏声谱与悉昙家言有血脉相承之关系。

一

定惠提及之什公《通韵》，在敦煌写卷中有一残卷题曰“鸠摩罗什通韵”。原物在伦敦，列斯坦因第一三四四号，内有二段文字，刘铭恕曾摘录之，颇有钞失。曩年在英伦，试作研究，妄有著论。兹节录其文大要如次：

> ……十四音者，七字声短，七字声长。短音吸气而不高，长者平呼而不远。三身摄六贯，鲁留（ṛ、ḷ）而成班。……罗文上下，一不生音。逆顺傍横，无一字而不著，中边左右，（取）正交加。大秦小秦，胡梵汉而超闻。双声牒韵，巧妙多端。牒即无一字而不重，双则无一声（字）而不韵。
>
> 又复《悉昙章》，初二字与一切音声作本。……若长声作头，还呼长声，若短声作头，还呼短声，闻声相呼，自然而合。……就中总有四百二十字。竖则双声，横则叠韵。
>
> 双声无一韵而不双，牒韵无一字而不韵。初则以头就尾，后则以尾就头。或时头尾俱头，或尾头俱尾。顺罗文从上角落，逆罗文从下末邪（斜）。……起首中殃（央），胡音汉音，取舍任意。……傍纽正纽，往返铿锵。横超竖超，或逆或顺，半阴半阳，乍合乍离，兼胡兼汉，咽喉牙齿。咀嚼舌愕（颚），唇端呼吸，半字满字，乃是如来金口所宣；宫商角徵，并皆罗什八处轮转。了了分明，古今不失。

按文中云“并皆罗什八处轮转”句，与“乃是如来金口所宣”恰成对文。说明此一“罗文”式拼音字表正是出自什公。此自后代悉昙家所制，而托诸罗什所作，仍题曰“鸠摩罗什通韵”。日本高野山三宝阮藏有僧行原翻刻本《涅槃经文字品悉昙罗文》，其序文即录是篇，末亦题“罗什法师初译”。罗振玉与大正六年以此与行原之《音注梵字次第记》合刊，而目为什公原本。日僧安然之《悉昙藏》，在解释十四音之后，全录此文，盖自来悉昙家视为瑰宝，故多所摭录，今得敦煌本，证其出自什公，良可征信。

牒韵即叠韵，广韵牒字在入声三十帖，徒协切，同音之字凡三十，叠即其一，故知牒韵即叠韵。所谓“罗文”，神珙图中有罗文反样，其解说云：“神珙以二个十六字名罗文反，此则相对十六字，纵、横、角可读之，故云罗

文也。”凡纵、横、角俱可读谓之罗文。《通韵》对于双声叠韵言之再三，屡云“竖则双声，横则叠韵”，今观沈氏《四声谱》云：“凡四声，竖读为纽，横读为韵。”《通韵》言傍纽正纽，《文镜秘府论》列沈谱亦论列傍纽，所举：

绮琴
钦伎

诸例，释云：竖读二字互相反也；傍读：绮、钦，琴、伎两双声；结角读之钦、琴，绮、伎为二叠韵。以引崔氏（融）说傍纽：

精酉
×
酒盈

之例，精与盈双声，酒与酉叠韵，是则交错为音，亦如罗文之式样，纵、横、角，均可读之。

《通韵》言“初则以头就尾，后则以尾就头”，而沈氏声病有平头上尾之名目，以头尾为名，殆亦与此有关。

《文心·声律篇》云：“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什公《通韵》云：“双声无一韵而不双，牒韵无一字而不韵。”用意虽异，《通韵》指出在罗文上声韵之形成，彦和则着眼在双叠在诗律上之运用，然双声叠韵之使用，与悉昙家解说梵语之拼音现象，固息息相关。自悉昙之学兴，而后审音始奏肤功。《通韵》云：“咽喉牙齿，咀嚼舌颚，唇端呼吸。”梵言之五毗声，发音部位及清浊送气之辨，可以立致。故《文心·声律篇》云：“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若乎长音短音半字满字，僧祐论之尤审，以为：“胡音为语，单复无恒。寻《大涅槃经》，列字五十，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语裁音，宛转相资。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异。又梵言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其傍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出三藏记集·胡汉

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辨章半、满，沟通华、梵，所以解释《涅槃经·文字品》，悉昙章译者之区别半字满字，得此可以了然，以汉字取譬，义更易晓。（参玄应《一切经音义》二《涅槃经》第八卷《文字品》条论满字与半字。）

半字：（如）月、日。

满字：言十者＝诸

故《文心·练字篇》之言联边，即以“半字同文”为说。安然论悉昙十二例，第一例即为半、满二字离合例，云《涅槃经》初教半字，又引宋谢灵运：“犹如震旦‘诸’字，若直‘言’字，名为半字，若加者（字），名满字。”乃知僧祐之说，取自康乐。梁武《涅槃疏》论（梵音）“十四音皆是半字，经中取十字，不取四字，以非常所用”（《悉昙藏》五引）。彦和之用半字一词，其名虽同乎刘向，而义则有取于《涅槃》矣。（刘向《别录》：《战国策》书录有“本字多误脱为半字”句。）

原梵语结构，与华究大相径庭，梵立字母，其元音共十四，其有长音短音之分者，如下列诸名：

a ā i ī u ū ṛ ṝ ḷ ḹ

所以施于连声，尽文字分合离析之妙，则非吾华之所有，又华以一字自具一音，梵则有二合三合等。

什公《通韵》之文，安然载之《悉昙藏》而多方证释，陈义纷披，今不具论，而揭其论梵音声母一段如次：

悉昙藏又分梵音声母二系：

(1) 张口遍满声

喉间	腭下	舌头	齿根	唇中
h（贺）	ś（娑）	ṣ（洒）	s（舍）	v（嚩）
喉腭间	腭舌间	舌齿间	齿唇间	
ks（乞乂）	l（攞）	n（罗）	y（野）	

按以上即超声

(2) 开口各处声

喉间	腭下	舌头	齿根	唇中
ṅ（仰）	ñ（孃）	ṇ（曩）	n（那）	m（莽）
ġ（伽）	dż（酇）	ḍ′（荼）	d′（驮）	ḃ（婆）
g（诚）	dz（慈）	ḍ（拏）	d（娜）	b（麽）
k̇（佉）	tṡ（车）	ṭ（他）	t′（他）	ṗ（颇）
k（迦）	tṡ（左）	ṭ（吒）	ṫ（多）	p（跛）

按以上即毗声

上五五字，横行各二为正纽也，横行共五为傍纽也。横行二组总归：

第五竖行相呼为通韵也。竖行交呼为落韵也。

又傍九字诃等五字自当五五之处，义等四字自当五五之间，野和义、诃各呼通（韵）落（韵），罗（椤）及舍、洒、娑各呼竖行为傍纽也，无正纽也。

毗声五处之声、超声五处中间四处之声都九处声矣。(《大正藏》册八五，378 页)

上录梵音原为悉昙字体，兹悉改为现行梵文，俾便参考。通韵云“横超竖超”，超指超声，为梵言五五毗声以外之声母，谓之后九超声，观于上表，自可明了，然非汉语之所有，非娴习梵音者，难以晓谕。

《悉昙藏》又云：

言十四音者，直、拗八韵；毗声五五，超声九，一合十四也。

然言直韵、拗韵者：阿（a）、阿引（ā）、伊（i）、伊引（ī）、（i）坞（u）、乌引（ū）、翳（e）、爱（ai）以六直响。其所合字随皆直呼，如呼迦（kā）及矩等也。曷哩（ṛ）、曷梨引（ṝ）、哩梨引（ḷ）、污（o）、奥引（au）、暗（ṁ）、恶（ḥ）此八拗声，其所合字随皆拗呼。

又以直、拗八韵，两两各呼，是正纽也。阿等十六，一一对呼，是傍纽也。

阿等十二相加迦（ka）等三十四字，（于十六章一）横呼，其于单合，是通韵也，其于合字是落韵也。

凡以母音之阿等与子音之迦（k）相合，即k+a，子、母合音，自然成韵，汉语中此种现象最易理解，而二合三合则汉语所无，落韵之事，汉语所不见。故什公只言《通韵》，其理由在此。通过华梵双方语音之接触，产生新的反音方法，正纽、傍纽通韵，本为梵音现象，亦得移用于汉语音律，周颙之以体文合四声，可谓华梵比较语音学孕育之奇葩。梵语拼音现象之了解，对于“韵”之认识，视前进步，故悉昙家曰：“当字直呼曰声，并字助声曰韵。”（《悉昙藏》，379页）韵必并字者，二个字音相和合乃可构成韵，此什公《通韵》所以大有造于四声说也。唐武周时武元之《韵铨》之说韵例云：“一则四声有定位，平上去入是也，二则正纽以相证，人忍仞日是也，三则傍通以取韵，春真人伦是也。”通韵、落韵之区分，正自悉昙引申而出。悉昙输入以后，韵书之作，风起云涌，此如近代西洋语音学之刺激，遂有新的语言学，理无二致。

古代固有之纳音术，五音之家，以姓氏配五音，据法京《切韵》卷，仙、肴、盐、灰诸字韵字，宫商角徵俱备，可证其时五声，不以四声分，亦不以声母分，不以韵之洪细分。倘以守温《辨宫商徵羽角例》论之，“欲知宫，舌居中，至欲知角，舌缩却”，似注重发音部位。五音之家辨五音五姓之古法尚待研究。（法京敦煌卷伯希和二六三二背记五姓之宫商，“张、王等为商，武庾为羽，似同韵相求：其以柳超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等”。见《远东学院学报》一三五册，1984 Carole Morgan 论五音文。）惟自悉昙学东来，审音者对发音部位之认识逐渐清晰，促进等韵学之产生。梵语发音五毗声之排列，发音部位是由内而外：

喉——腭——龂（舌）——齿——唇

《悉昙次第记》云：“称呼梵字亦有五音伦次喉龂齿唇吻等声，皆从深而浅”（《悉昙藏》引392页），又《悉昙字纪》亦云：“声之所发，则牙齿舌喉唇等合于宫商，其文五个。”此悉昙家以毗声之五声配合吾国旧有宫商之五声。

汉人以五音律吕配五方，《淮南子·天文训》以上之书，五声之配五方合

以五行为宫中土、角东木、徵南火、商西金、羽北水。沈约《四声谱》之分配则异是：

东方平	南方上	西方去	北方入

安然引《四声谱》开端即云："四声，昉四方也。"刘善经引李槩《音韵决疑序》："平上去入，出行间里。……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按羽字用作动词，训舒也，《广韵》在上声九麌，王矩切。（五音之羽在去声十遇，王遇切。）善经对李氏此说配以五音，证之《周礼》，极为推重。槩字季节，曾为副使聘于江南（详《北史·李灵传》），其五音与四声相配说，自刘善经以后，唐徐景安《乐书》、元兢辈皆依据之，寖成定说。兹据音律高低表之如次：

48	54	64	72	81	《月令》郑注
羽	徵	角	商	宫	
去	上	入	平	平	李槩、徐景安、元兢说《四声谱》
西	南	北	东	东	

观上表宫音为最低，羽为最高。《文心·声律篇》云："夫徵羽响高，宫商声下。"（原作"商徵响高，宫羽声下"，非。兹据黄侃说改。）是也。沈约于《谢灵运传论》云："故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低即是宫，昂即是羽，宫声下而羽响高，低、昂亦可相当于平与去。唐以来如《元和四声谱》一以四声配四方，正沿用沈氏之说。

《四声谱》有四字一纽与六字总归一纽两式。下式以入声字居于中央，故又名"总归一入"。何以如此重视入声用作纽字，向来未见有人说明，空海大师亦不甚了了。窃疑吴音系统之入声，以喉塞声（-ʔ）收尾为主。在梵音中，《涅槃经·文字品》十四音最后二个为庵（ṁ）与恶（ḥ），庵为鼻化元音，恶为元音收尾时声带不振动，庵（ṁ）可以加上各个元音，成为 aṁ、āṁ、iṁ、īṁ、uṁ、ūṁ，记上"。"号（anusvāra），恶（ḥ）亦如是，所谓"涅槃点"也。疑周颙沈约辈以四声调音，特别取入声之（-ʔ）为纽者，似摹仿涅槃点之ḥ，可以配元音之 a i u 等。建康（南京）在南朝时其入声调值想当如现代方音以喉塞音（-ʔ）为收尾。《四声谱》所举入声例字：镬、薄、郭、霍等，

可以想其仿佛。“总归一入”之事，料其初必观摩于梵音涅槃点之ḥ（ḥ在梵语称为 visarjanīya，严格言之，尚有ẖ（jihuamūlīya）ẖ（upadhmārūga），合为三种 voiceless spirants），而制定以入声为纽字，此一推测，可备参考，从悉昙音理可联想到种种法门，后来之等韵学，亦由悉昙孳乳而出，四声说不过其开端而已。

二

《文心·声律篇》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响有双叠，即《通韵》之双声叠韵，上文论之已详。飞沉解者甚多，大抵飞指上升，沉谓低下。有人以为：“齐梁之际，吴地读音，飞者扬上，当是上声，沉者抑下，当是去声；不言平上去入，而言飞沉者，乃举飞沉以概四声，如称春秋以概四时也。”（詹锳说）按上声一向称其“厉而举”（《元和新声韵谱》）。举指高调，厉谓重读强音。全浊字重于全清浊字，上声全清字又重于平去入之全清字。以飞指上，以沉指去，一扬一抑，以概括四声，亦有可能。齐梁文人习惯以声区别为二分法：此言飞沉，沈约则称为浮（声）切（响），而轻重、清浊等等名目更为习见。《文镜秘府论》“调声”云：“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至如有轻重者，有轻中重、重中轻。”则已杂入唐代之等韵家言矣。沈约作《谢灵运传论》云：“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蔡宽夫诗话》引此，解云：“四声中又别其清浊以为双声，一韵以为叠韵，盖以轻重为清浊耳。”所谓轻重，在悉昙家言之尤繁，轻重与清浊似不能混为一谈。《涅槃文字品》于梵文 ka 下注：“稍轻呼之”，kha 下云：“重声呼之”。ga 下云：言“轻呼”，gha 下则云：“稍重呼之”。是凡送气即重，反之则轻。于此可悟上引《四声谱》言“傍读轻气为双声”，其例句云：

绮钦、琴伎两双声，

钦琴、绮伎二叠韵，

上谐，则气类均调；下正，则宫商韵切。

文中言及转气及气类，在梵音名词轻呼曰小气（alpaprāṇa），重呼曰大气（mahā-prāṇa）。现代语言学术语谓为不送气及送气。悉昙毗声在梁武《涅槃疏》中亦时注小重声及重声。

轻呼	不送气	如 k、g	小气
重呼	送气	如 kh、gh	大气

以此重轻区别气之大小，在辨别梵音声母始专用之，后乃推而指调声之法。印度《波你尼经》中已辨别轻音（laghu）、重音（guru），而谓短音是轻音，乃指韵律之事。

至于清浊，本为乐律用语，悉昙家亦用以指收音之韵。安然《悉昙藏》二引《四声谱》云："四声昉四方也"，下讫"一切反音唯有此法也"，文皆见于《文镜秘府论》。下又接言：

又云：韵有二种：清浊各别为通韵，清浊相和为落韵。

此处"又云"二字，可能即指《四声谱》原文。其下引武氏《韵诠》"商略，清浊例"云：

先代作文之士，以清韵不足，则通浊韵以裁之；浊韵之不足，则兼取叶韵以会之；叶韵之不足，则仍取并韵以成之。

观安然在下文所举"口声"四十项，两两相对，其中有叶（韵）并（韵）、通（韵）落（韵）、清浊、轻重等等之区别。此处清浊不指声，而用以指韵。《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云：

用字有数般：有轻有重，有重中轻，有轻中重，有虽重浊可用者，有轻清不可用者，事须细律之，若用重字，即以轻字拂之，便快也。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助。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轻，则脱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则文意暗浊。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

所言仍是沈约"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之旨。轻是清而重是浊，亦可联结为言，"高台多悲风"五字皆平声并轻，是轻重亦指平仄而言，亦可兼指声与韵，总之，皆音律之事也。能轻重相间，则文章音声可以调协。沈约所致力

者，主要目的即在此事，意在勿使同声调之字在一句之中连续出现太多，以妨碍音节之美，所谓“宫羽相变”、“低昂舛节”与“轻重相间”，用词不同，而取义则一也。

沈云：“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南史·陆厥传》作“两句之内，角徵不同”）

刘云：“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

以上二说，宗旨正同，务使抑扬、轻重，力避重复，严其声律，如是方形成永明新变之体。

而彦和更指出：

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

因诗律之定韵，正如拼音之通韵。“清浊音有别则为通韵。”故必轻清、重浊之音别异，乃为通韵，相反则为落韵矣。故彦和云：

异音相从谓之和。

又曰：

和体抑扬。

如是即为“和韵”。凡飞沉、双叠之间，必须隔字而异其声，杂句而殊其韵，异音相从，斯成声文之美。反之同音相从，则为声病矣。《文镜》引刘善经述李槩语云：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位）群音，无所不尽。（李氏《音谱诀疑》序）

此段各本文字多讹，须加校正。亦者，与也。《史记·相如传赞》："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汉书》"与"作"亦"。故"亦之和同"，宜读作"与之和同"，序言沈约取以和声，即《虞书》"律和声"之意。李槩云"与之和同"，本《周礼》言"六律六同"。彦和云"和韵"，沈约云"和声"，义实无异，彦和以为诗之风力，实极于和韵之美。对和韵十分重视。

从什公《通韵》，竖行相呼，元音同协则韵以形成，故彦和云"同声相应谓之韵"。此则仍是本释昙家之《通韵》来说韵所以构成之理，至于标出"异音相从谓之和"，则大为沈氏四声说张目，予《四声谱》以理论上之支持，此其书所以见赏于隐侯也。

彦和又云："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此切字当读如"下正则宫商韵切"之切，义为切合。彼又云："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指出楚辞尚多讹韵，此讹韵即不"切"之韵，则犹悉昙家之言"落韵"矣。《声律篇》末段，实本"落韵"之义加以发挥者。其引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复引《文赋》"故取足而不易"句，公然讥陆机承楚辞之讹韵，有失于黄钟之正响，具见其对于切韵之重视。故云："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必也免于声病，持论与沈约无异。梁时论文章音韵之书，大为流行，如《隋志》，梁有王该撰《文章音韵》二卷。自一时之风气使然，无足怪者。

三

陈寅恪先生著《四声三问》，认为四声之兴，所以肇于南齐永明之世，创于周颙、沈约者，盖由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约在竟陵八友之列。于是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交互影响，遂创声调新说。窃尝核诸史实，陈说多难符合，请试论之：

（一）"竟陵王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寺）普知、新安（寺）道兴、多宝（寺）慧忍、天保（寺）超胜及释僧辩等，集第作声，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此事见《高僧传》卷十三《僧辩传》。按《南齐书》四十《竟陵王传》："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事系于永明五年，当以《僧辩传》为确。时与会者释道兴著有《竟陵文宣王第集转经纪》一篇，著录于《出三藏记集》《经呗导师集》之第十九，下署新安寺释道兴，当即《僧辩传》

所记之道兴，寅老文作道新，误。此篇乃七年二月转经事之特写，惜后世无传。当日子良集诸僧于鸡笼山邸第所造者实是转经之事，诸文士未闻参预。谓周、沈辈加入此一新声工作，史无明文，此其一。

（二）竟陵所造经呗新声，具见僧传记载。计僧辩有《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僧辩为安乐寺僧。《释慧忍传》云："初受业于安乐辩公，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为长妙，于是令慧……四十余人，皆就忍学。"（《高僧传》）慧忍即慧辩之门人，二人者皆建康人也，其成就特高。此即文宣所制之经呗新声。何以谓之新声？因支谦、康僧会均先造呗，并著录于僧祐之《经呗导师集》。此种转读实为经师唱导，事属僧乐之声曲折，与永明体之诗律，不应混为一谈。此其二。

（三）周颙卒年史传不载。寅老谓据传文推之，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之前。日人著《沈约年谱》，则谓颙于永明六年冬卒。二说均无实据。案《出三藏记集》十一录周颙作《抄成实论序》，其前为僧祐新撰《略成实论记》，谓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请定林僧柔、谢寺慧次法师等于普弘寺迭讲。仍请祐等续讲《十诵律》，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论师抄比《成实》，略为九卷。八月正月二十三日解座，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据此，颙于永明八年尚存。颙与定林寺论师僧柔及律师僧祐均有交往。《梁书·处士传》："何胤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周颙深器异之。"知定林寺必为颙常到之地，颙所狎近之僧人如剡之昙斐（《高僧传》八，《大正藏》，382页），著有《合微密持经记》，见于《出三藏记集》七（《大正》，51页），其人必精通经咒陷罗尼可知。史称"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颙实邃于义解，寅老目颙之"辩"为转读之事，殊非。元嘉以来读经道人名有专录（见《经呗导师集》第十八），故《高僧传》于经师、导师别为论次，颙固非此道中人也。此其三。

故知《三问》文中所陈，与史实多未吻合。周颙著有《四声切韵》，书已不传。以"切韵"一名推之，孙愐《唐韵》序云："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欲使文章严则，韵调精明于古人。"似即指颙之书，其性质正如《通韵》之例，为切韵反音之事，用宫商以四声定韵。观《南史·陆厥传》所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徵不同"，明为讲求诗律之事，沈约已言四声总归一人，其上下三声之平上去，且有阴声阳声之辨（魏建功《十韵汇编序》），足见其时审音专家，对平上去入分别已严，何须借

重印度远古围陀之三声，始能订其调值而制出平上去三声之名乎？永明四声之成就，在于韵律之通重逻，使文章丽则，而非四声名称之创立。李概固已明言“平上去人，出行闾里”，知民间已习知，如家常便饭也，故不得如寅老说：“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又制新呗之僧辩、慧忍皆建康人，实非胡僧，料其不懂《梨俱吠陀》。此 udātta（高调）三者为 veelic aceent 实则原有四调，音律相当复杂，今不欲论（参 Arthur A. Macdonell：*A Vedic Grammar for Students*，附录三）。况《梨俱吠陀》为婆罗门圣书，于佛门为外道，诵《吠陀》者于僧律为禁条，建康僧人未必敢假外道声明，以制经呗新声，此在事理上有不可通者。

虽然，僧徒转经，亦致辨于声文。慧皎《高僧传·经师篇》论云：“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惟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惟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人。”声之与文，二者相倚为用。顾转读所重在声，“诸天赞呗，皆以韵人弦管，此音乐之事也；以言夫诗篇，则以文为主，以声为辅，其声文之妙，在于‘观宫商’；转经唱咏之宫商，与诗律调协之宫商，事虽殊途，理自相通。”永明新变之体，以四声人韵，傍纽旁纽之音理，启发于悉昙，反音和韵之方法，取资于《通韵》，此梵音有助于诗律者也。声文之理，乐与诗正相涉而不可分，故慧皎述转读之声，有“平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数”。可谓极歌唱之形容者矣。彦和之论声律，则云：“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辞转于吻，玲玲如敲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亦以转唱譬况文事。南齐转经有平、侧不同之调。法邻之“平谪牒（叠）句，殊有宫商”，智欣“则善用侧调 ”，具见慧皎所记（《高僧传》，《大正》本，414 页）。转调之有平侧亦如诗之声文；知平、侧之讲求，由来远矣。彦和寄居上定林寺，朝钟暮鼓，与转经师接触频繁，故于声律之事，独有所悟，能获旁通之妙，非偶然也。

《文心·声律篇》，清纪昀评称其文“即沈休文与陆厥书而畅之”者也。厥与约书言：“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即彦和《神思篇》“迟速异分”之义。彦和附和沈说，言之再四，于《章句篇》论转韵，于《声律篇》言和韵。如云：

风力穷于和韵。

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

属笔易巧，选和为难。

《文镜秘府论》地卷八阶有和诗阶一目："彼此宫商，故称相和。"引王斌云：

> 无山可以减水，有日必应生月。夫酬采答诗，言法（往）语复，但令切著，施教无兼（嫌）。

《日本见在书目》称斌著《五格四声》一卷，五格者，当指五音之宫商。孙愐《唐韵序后论》曰："或人不遣文性，须格于五音为足。"五格即格于五音之意，"或人"殆指王斌也。斌拘泥声病，故孙愐讥之。刘善经亦笑其"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剽拆推研，忽不能别"。王斌事迹详《南史·陆厥附传》。尝与僧正慧超争席。慧超见《续高僧传》卷六，其人向来不甚了了，且有误其为北魏时人，谓其书为北朝人之著作者矣（潘重规《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四期）。检怀信著《释门自镜录》上《梁伪沙门智稜传》后附记王斌云：

> 王斌者，亦少为沙门，言辞清辩，兼好文义。……常忤僧众，遂反缁向道，以藻思清新，乃处黄巾之望。邵陵王雅相赏接，号为三教学士。所著《道家灵宝大旨》，总称四玄、八景、三洞、九玄等数百卷，多引佛经。又改六通为六洞……亦有大梵观音三宝、六情、四等、六度、三业、三灾、九十六种、三会、六斋等语。又撰《五格八（□）》。并为论难之法。（《大正》册五一，810页）

斌由法门转为道士，著书满家。邵陵王礼接之。王即萧纶，武帝第六子，天监十三年封邵陵王（《梁书·高祖三王传》）。是王斌实为梁人，与北朝无涉。时有三教学士之号，盖沙门又能兼通儒、道者，其援释入道，长于法数。怀信所记，向来未见人称引，足以解惑。

《文心》一书，最先加以援引而评骘之者，目前资料以隋之刘善经为首见。《文镜秘府论》天卷引其《四声论》（即《指归》）云：

> 经（善经）案陆士衡《文赋》云……文体周流，备于兹赋矣。……至于四声条贯，无闻焉尔。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挚虞之《文章志》，区别优劣，编辑胜辞，亦才人之苑

囿。……

又吴人刘勰著《雕龙》篇云："音有飞沉，响有双叠。……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此论理到优华，控引弘博，计其幽趣，无以间然。但恨连章结句，时多涩阻。所谓能言之，未必能行者也。

刘氏褒其论音之善，而贬其缀辞之累。善经之书，引述彦和语止此一段，不及其他。是时李充、挚虞诸书流行于世，《文心》虽侈论文体，不免雷同蹈袭，诚难见长。善经于李充尤称赏，许为"作者师表"，惜其书不传。《文选集注》六十二公孙罗《音决》引檀氏《晋阳秋》论文章言："玄胜之谈……至江左李充尤盛。"充著书甚富，《晋书》李传云二百四十首，《隋志》有集二十二卷。此《翰林论》所以为善经所推许也，其书先行于世，《文心》上半部视之不免减色矣，《续僧传·彦悰传》云：

（北周时）预通道观学士，时年二十有一。……（及）年二十有五。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禅，改号开皇，即位讲筵，四时相续。……又与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一代文宗，著内典《文会集》，又为诸沙门撰《唱导法》，皆改旧体。……（《大正》册五〇，436 页）

彦悰聪明早慧，善经辈曾与合编释氏《文会集》，时推为一代文宗。其月旦彦和文章，病在"涩阻"，仍是依据声律观点。所谓涩阻者，据安然《悉昙藏》云："角者连徵而滑，连羽而涩，连商而远。"（381 页）以角音连羽音，其病为涩，是其调协宫商五音，尚未尽得当。吾人读其《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长文，虽为大手笔，而音节未能发越，平钝板滞，以较王屮之碑，诚不可以道里计。文家眼中，自非佳品。善经所议则从声律角度论之，故惜其能知而不能行。其实倡声病说之沈隐侯，何曾不然？门人黄耀枢曾统计沈约诗，所犯八病皆备。约《答陆厥书》固自言："韵与不韵，彼有精髓，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办此。"早有自知之明矣。

关于四声主事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南齐书·沈约传》："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高祖雅不好焉。"陈寅恪先生以为由于好尚之特异，简文帝亦诋永明新体。余考梁武亦究心梵言，有所论述。安然屡引其《涅槃疏》。如鲁流卢楼四音，梁武曾禅之，言边海昆仑未体此旨，亦习外道之气，又其曰字作蕀力基梨（详安然《悉昙藏》卷二，《续

大正》册八四，378、410 页）。彼尤善于钟律，著有《钟律纬》，说见《隋书·音乐志》。沈约双声叠韵之说，取自《悉昙章》，自梁武观之，事同儿戏，其不加重视，良有由焉。

《文心》成书于齐末东昏季年，时江淹实为秘书监兼卫尉，及义师至新林，淹微服来奔。中兴元年为吏部尚书，二年，转相国右长史（《梁书》淹本传）考《张稷传》云："义师至，兼卫尉江淹出奔。稷兼卫尉。"稷即代江淹职，其人盖使直阁张齐害东昏于含德殿者，故梁武对稷颇有憾焉（见《沈约传》）。向使江淹不出奔，东昏仍未见害。又据《沈约传》：东昏永元二年，约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及建康平，引为骠骑司马。梁台建，初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高祖受禅，为尚书仆射。可见沈约乃继江淹为吏部尚书，在中兴二年。《梁书·武纪》："（中兴）二年正月戊戌，拜帝大司马，置左右长史。"江淹转相国右长史，必在此时。自是以后，府僚遂有劝进之请，府僚即沈约辈。《约传》言："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和帝禅位于梁武，约必为策划之人。《南齐书·和帝纪》："（中兴）二年夏四月辛酉禅诏至，丁卯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戊辰薨年十五。"和帝宝融之死，史不书其缘由。而入梦于沈约，欲断其舌，必有不可告人之事。约自以劝进入梁，遂跻高位，其在南齐之末，地位实远不及江淹。上文所以覼缕陈述此事者，彦和《文心》成书既在齐末，何以不上干江淹求其月旦，而必取定于沈约者，良以论声律为沈说之发挥光大者，料可获其赏誉，固一基本原因。而《梁书》勰传云："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所云"贵盛"，必指梁武受禅之后，未必在其继江淹为吏部尚书之时，此三二月间，梁台僚属，方忙于筹备劝进之事，约之地位尚未显赫犹非贵盛之时也。

四

《文心》成书年代为齐为梁，作者思想为儒为释，诸家讨论仍呶呶不休，窃有所见欲以质诸同好，愿略陈之。

《时序篇》云"皇齐驭宝……今圣历方兴"，显指和帝（刘毓崧说）。《梁书·武帝纪》："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时东昏仍临朝也。《南齐书·本纪东昏侯》：（是年）"三月丁未，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癸丑，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十二月

丙寅，王珍国、张稷率兵入殿，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直后张齐斩首送梁王”。又《和帝纪》：“中兴元年十二月丙寅，建康平。”按和帝宝融中兴元年三月至十二月，建康仍为东昏侯治下，刘勰居钟山上定林寺，宜尊东昏年号正朔当为永元三年。翌岁四月，齐祚即移于梁，为梁武天监元年。永元距梁武称帝，只有四个月，《文心》如成书于齐末是时，其流布恐必待入梁之后。《御览》卷六〇一文部著书上引《梁书·勰传》“初，勰撰《文心雕龙》”句，“初”字作“自齐入梁”。说者咸以为非。然据《御览》引书目，梁氏史书有刘璠、何玄之、段家诸《梁典》，无姚察之《梁书》，安知非出自刘、何等家记载。“自齐入梁”一语，揆以情理，自属可信，故《隋志》以下均题“梁刘勰著”。一人之书写成，仍须随时修订，李善《文选注》于显庆三年九月表上，然其后累有增改。彦和此书体大思精，必入梁始行流布。观萧子显撰《南齐书·文学传论》：“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洽）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际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不及彦和此书，其不列为齐人著述，可概见矣。

《梁书》本传言“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其居定林寺在于何时，向无确说。据慧皎记超辩以永明十年（公元492）终于定林上寺，僧祐为造碑、东莞刘勰制文（《高僧传》十三），以此可断必在永明十年以前（但不能说彼于永明十年入定林寺）。僧祐好文事，纂有《铭箴集》、《吊文集》，《隋志》著录之。彦和作《箴铭》（第十一）、《哀吊》（第十三）两篇，必取资于是。其掇拾辞章，掎摭利病，谅亦得僧祐之助，非特内典而已。是时去《文心》成书尚有十载，故本传“积十余年”之说，绰有根据。宜其浸淫内典，博涉儒书，故能奋笔摛藻，为和尚撰碑。僧柔与僧祐“少长山栖，同止岁久”，延兴元年（公元494）卒，祐为立碑，亦刘勰制文（《高僧传》八）。《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法集杂记铭目录序第十》著录彦和所作文共三篇，其一即僧柔碑铭。自永明十年至《文心》成书之岁，彦和依止僧祐居定林寺，绝无疑问，故《文心》一书可确定作于定林寺。其时屡为名僧撰碑，自非深通释典，无由着笔。至于文章早熟，在南朝文士实为惯例，陆厥卒于永元元年，年二十八，其与沈约扬搉宫商律吕之名作，载《南齐书》中，时只一廿许岁之少年耳。彦和早岁家庭教育情况不可考，然能著文撰碑则早在永明十年，文学修养之早熟自不待论。惟《文心》成书后此者十年，因《文心》一书性质为涵濡儒书，弥纶群言之作，故不必牵涉内典，然无意中仍用“般若绝境”、“半字同文”诸句，盖其“长于佛理”，在《文心》撰写期间已是如此。

近人有谓"《文心》先成于齐世","《文心》书成之后，彦和沉浸佛典，导致其思想作激烈之转变"，必欲将《文心》成书移前，彦和依僧祐定林在后，自是始浸润于佛学，使其前后判若两人（潘重规说）。以为不同之宗教思想不可并存于一人，其实不然。前述王斌之由释入道，在思想上三教会通及其离合，在六朝至隋，实已司空见惯，不必诧异也。

《文心》之作，其组织之严密，造论之自成体系，非仅娴习儒书专治辞章者所能办到。书中屡屡用"事数"之法以统摄文理，如论"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草创鸿笔，则先标三准，阅文情则事悬六观，总文貌则数穷八体"，虽儒书亦有此例，顾不若释氏法数（numerical dharmas）之具逻辑性。彦和"长于佛理"，故运用以论文。《世说新语·文学》记"殷中军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五根之类（刘孝标注）。《文心》之六观、三准等等，即仿此也。其言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形文之五色，声文之五音，情文之五性，神理之数也。案神理实具二义，一为自然（宇宙）义，庄生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者，《文心·原道篇》之"研神理而设教"，正佛之"神教"即此类；一为精神义，《文心》下半首论神思，《易》言精义入神、《法言》问神，以至《世说》之称"神笔"（《文学》记阮籍《劝进文》）皆此类。有时融会二义，神理之数是也。自魏以来，以神理入文辞者多兼二义立训，陈思诔父曰："人事既关，聪镜神理。"非通天人而何？康乐述祖德云："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非局于人事可知。至于"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亦人、天对比。故言神理必溯及宇宙义，不能以人灭天。僧祐论文字发生，即云"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亦复人天凑泊。彦和论文，往往如是。"自然之文也，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文生于自然，内情性而外形声，五色、五音、五性，其数均五，以"事数"论，得称为神理之数。此义向未有人发挥，故为剖析于此。彦和明为长于佛理之人，《文心》写成于僧寺，谓其书毫不牵涉佛理，亦甚难言。学者不死看，便能释然矣。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三辑

《文心雕龙》与《阿毗昙心》

陆机《文赋》开端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亦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显然是取自士衡之语以命名。刘氏此书，隋、唐人或省称曰《文心》（卢照邻），或称《雕龙》（刘善经），下文简称作《文心》。范文澜在《序志篇》注二引惠远《杂阿毗昙心序》，而加以说明云：

> 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鰓理明晰若此。

是说不断为人所引证，至今尚然。《阿毗昙心》一书，汉译计有多种：

（一）题《尊者法胜造》，晋太元元年，僧伽提婆（Samghadeva）共慧远于庐山译者，共四卷。[①]

（二）题曰《阿毗昙心论经》，又题《法胜论》，大德优波扇多（Upásānta）释，高齐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Narendreyaśas）译，增一"经"字。[②]

（三）题《杂阿毗昙心论》，尊者法救（Dharmatāta）造，宋天竺三藏僧

---

① 《大正藏》列一五五〇，册二八。

② 《大正藏》一五五一号。

伽跋摩（Samghavarman）等译。[1]

以上第（一）、（三）两种之译出，皆在僧祐、刘勰之前。《出三藏记集》序类卷十所收关于《阿毗昙心》之序文多篇，慧远法师《杂阿毗昙心序》亦在其中，彦和必读过是文，自无疑问。

慧远与提婆合译之《阿毗昙心论》共有十品。表列如次：

Hrdya-śāstra（心论）

1. 界品（Dhātu Varga）	2. 行品（Samskāra）
3. 业品（Karma）	4. 使品（Amisaya）
5. 贤圣品（Cārya）	6. 智品（Jnāna）
7. 定品（Samādhi）	8. 契经品（Sūtra）
9. 杂品（Samyukta）	10. 问论（Kathā）

（据印度 L. Armelin 女士法文译本《阿毗昙心论》序言所附表）

《阿毗昙心论》首品为 dhātu，义为要素；终品为 kathā，义为问答。全书十品之结构，具见上二表，与《文心》布局方式全不相干，问论在最末，安得谓"《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可谓拟于不伦。

又慧远序云："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有人认为"《文心》每篇之后又复有赞，和内典之偈性质相同"。按慧远所谓二百五十偈，乃指全书自界品第一至问论第十所作偈之总数（如界品十七偈、行品二十偈、业品三十三偈是）。是偈有二句、四句、三句，句式不等。此类偈语与散行之文相厕。《史通·论赞》篇云："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其实佛经之偈言，并不系于完篇之后。郭珪（瑜）在《修多罗法门》中论偈云：

> 夫偈有二种：一者通偈；一者别偈。胡人数字之法，每以八字为句，四句为一偈，则一偈卅二字也。[2]

偈之性质，于此略可明了。《文心》每篇之末，复有赞曰。说者谓可能受到内

① 《大正藏》一五五二号。

② 敦煌卷斯坦因一三四四号（二）。

典之启发，实则全无关涉。以佛典偈言非列于篇末，与赞之必在篇终，绝不相同。

上举两事，皆与内典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可以不论，只有《文心》一名与《阿毗昙心》之用心字作为书名，用意相同，值得作比较研究。

阿毗昙，秦言无比法，于其下加一心字。此书梵名应为：

Abhi-	dharma-	hrdya	śāstra
（无比）	（法）	（心）	（论）

心有“要解”之意。彦和论文之书，亦以“心”命名。《序志篇》列举涓子《琴心》、王孙《巧心》二书作为例证，而云：“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其赞曰：“文以载心，余心有寄。”于《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文以载心”，犹之“文以载道”矣。故心即道要。《文心》之为书，首《原道》第一，次《征圣》第二，又次《宗经》第三。表面观之，自属儒家思想，然佛家立场亦有同然，释氏于现量、比量之外，极重“圣言量”，故主“征圣”。在《阿毗昙心论》中，其第五为贤圣品，第八为契经品，义与征圣、宗经原自不殊。刘书举涓子《琴心》一书，环渊其人，《七略》：蜎子名渊，亦作涓子。《御览》卷九三六引《列仙传》：“涓子，齐人也。……著《天地人经》四十八篇。后钓于河泽。”又六七〇引《集仙录》：“涓子，齐人也。饵术。著《三才经》。……又著《琴书》二篇，甚有条理。”涓子之《琴书》，即《琴心》也。惜其书不传。彦和仅提到仙家著书之《琴心》，而不及释典。然《阿毗昙心论》为彼所夙习，则无疑者（说见下）。

彦和全书中正面使用佛家术语，只有“半字”及“般若”二词。《论说篇》云：“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此指出造论不可偏解，宜诣乎正理。偏即释氏所云“落于一边”。惟求诸般若绝境，斯能统摄有无。龙树《中论·观望槃品》云：“分别非有无，如是名涅槃。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故。”不锐于偏解，则非有非无，斯得乎中道而诣于正理矣。正理之“正”与“偏”对立。佛家最重正觉，主八正道。道者，梵言 mārga。八正道之细目为正见（samyag-drstih，只举一名为例）、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彦和之文学主张，处处以“正”为依归。其言曰“正义以绳理”（《哀吊篇》），曰“析理居正”（《史传篇》），曰“终之以居正”（《杂文篇》），曰“意

归义正”（《谐讔篇》），曰“君子宜正其文”（《乐府篇》），又言“执正以驭奇”（《定势篇》），“理正而后摛藻”（《精采篇》），“以审正得序”（《史传篇》），“故似开学养正”（《宗经篇》）。他如“正采”、“正音”、“正声、正辞”等等。正之观念在《文心》书中实居领导地位。此与梁时“文章且须放荡”之风气，大相径庭。以正道运用之于文学，与其谓有合于儒家，不如说是亦得到佛家“正道”之启示。

彦和论文之基本态度，是以“兼”为主。故事必兼文武，辞必合文质，贵器用而兼文采（《程器篇》）。“兼解以俱通”（《定势篇》），则不滞于偏解。观其情采并重，故其书名于文心之下再益“雕龙”二字。自东汉以来，“雕龙”一词已成为文藻之代语。彦和为文，雕缛成体，故不采散文，而以俪语为造述表达之方，亦萧选“义归乎翰藻”之宗旨，正符合其一贯主张，质文兼重之缘故。刘知幾为之扬扢，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后来祖述，识昧圆通……故刘勰《文心》生焉。”特称许其深具圆通之识。盖能参大圆镜智，以之论文，故无所偏倚。即以诗而论，诗家大都以振奇为胜，而刘氏乃以“通圆”为贵。诗而通圆，则不易有惊人之语矣。此一圆照之态度，与其看作儒家，毋宁说是于释氏为近，更合情实。

彦和思想方法，和释氏似结有不解缘。自范文澜以来，几乎众口一声，谓其严密之方法，是受到佛经之影响；我则谓其书体例实与释氏无关，惟居正之态度，完全符合释氏正道之宗旨，持以论文，固与当日“文章且须放荡”之风尚乖违，在在见其坚定之立场，足为一时之针砭。

彦和长于佛理，在永明十年，已能得到僧祐之尊重，为超辩撰碑。继之，在延兴元年，僧柔殂化，彼又为制文。具见此时内学之修养已相当深厚。有人欲从其撰写《灭惑论》年代之先后，作为其思想前后分期之划分，事实上不能否认在《文心》写成之前，彼早已是一位精通佛家学术之作者。

彦和所依止之僧祐，为律宗巨匠。僧祐师法献。献为南齐僧统，宋元徽三年西游至于阗，获佛牙，常置在定林上寺。萧子良为撰《佛牙讃》。见《出三藏记集》十二著录。

《阿毗昙心》一书原为法胜（Dharmaśri）。其人实出印度“萨婆多部”（Sarvāstivādin）。僧祐于《出三藏记集》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列举传灯人物，达磨尸梨帝罗汉居第三十三。自注：“译曰法胜。”达磨尸梨，梵言即Dharmaśri也。同书卷四“萨婆多部十诵律”条云：“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而说诸法一切有相。”又《萨婆多部记目录》序云“法僧不坠，其唯律

乎！……旧记所载五十三人。……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云云。书中所列历代律师，献律师在第十九，称律师传在第二十。称即智称，亦上定林寺僧；献即祐之师法献也。

僧祐——慧地（刘勰）
法胜……法献——智称
十九代　二十代　（皆上定林寺僧）

阿毗昙训无比法，犹言最上法，佛家三宝之外最重要之另一宝。北朝所译本于《阿毗昙心论》亦称为经。北魏昌黎王冯熙为孝文帝及其女文明太后写《一切经》，今存者有《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残卷，敦煌石室所出（见斯坦因目九九。参拙作《选堂集林·史林》上册）。冯熙题记称：“《杂阿毗昙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说。……瞻四有之舌见，通三界之差别，以识同至味，名曰毗昙。”又赞曰：“丽丽毗昙，厥名无比。……盛尊延剖，声类斯视。理无不彰，根无不利。卷云斯苞，见云亦谛。帝修后玩，是聪是备。”所称盛尊、法盛，即是法胜。六朝初期，《阿毗昙心》之学盛行，地无论南北，人皆重视诵习，影响至大。冯熙且书之为帝与后启发之资，彦和从律宗大师僧祐学，寄居上定林寺，又参加事理《出三藏记集》工作，对于此萨婆多部巨匠法胜名著《阿毗昙心论》一书，当甚熟悉。其撰《文心》此书，亦以“心”作为书名，虽与《阿毗昙心》之名偶合，未必无“窃比”之意。为最上法之要解，号之曰心；为文之要解，自亦可号之曰心。此《文心》与《阿毗昙心》，有其可相通之处。试为抉发，倘能稍得彦和当日著书之用心，则吾文之作为不虚矣。

《文心雕龙》与佛教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六朝文学批评的权威论著。在该书里面没有许多提到佛教的字眼，只在《论说》篇云："动极神源，其般若之妙境乎?"言及"般若"二字。现在拿它来和佛教并论，岂不是来得太奇特吗？也许有人要向我提出这些疑问。但是，我们要知道谈论某些问题，切不可单从外表去观察，而应该从内在关系上着眼。因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个佛教徒，他有十年以上的佛学修养，所以当他写这部专门讨论文章的皇皇大著时，很可能运用他那经过佛学洗礼过的头脑——佛学逻辑，来支配及组织他的文学材料；换句话说，是通过佛学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文学见解。譬诸读自然科学的人，转变另一研究对象去谈文学写作时，他的头脑自会与一般纯粹由文学出身的人有些不同。如果从这些点去看刘勰的论著，那么，我们便可看出他那严密和精细的分析，是取资于佛氏的科条，来建立他的文章轨则，在思想方法的运用上是受过佛教影响的。

六朝时候，正是中国和印度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大际会，他这部名著正是在两种文化交流下关于修辞学及文学批评方面的伟大成就。日本学者中村元在他的《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一书中却说："古代印度，曾树立极精致的方法组织，并发达了语言学。但在中国，关于文法学及文章学（Sytax），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典籍。在与印度文化交涉时代，中国学僧，虽知道印度文法学，

但终未有受其影响。以树立中国语文法学。”[①]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提出若干理由来解释：（一）中国语文与梵语的构造完全不同。梵语文法的精神是将语尾的变化来表现词性，但汉语是把声调高低来表现词性的差异。这习惯的运用，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因此无取材于梵语文法之必要。（二）中国文字构造，半形半声，多为合体字，具有它那特有的美。用在文章上的造句法时，即是俪词。到了六朝，便发展成为骈文，文学技巧已达到了顶点，更非梵语所可比拟。[②] 在讲解佛经时，更把梵文用骈四俪六的文字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将梵语迁就华言，可说是梵文华化；并不像现代的翻译，是中文西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关于华、梵文字的本质上的差异。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有一篇[③]说得极详细，可以参考。华、梵语文接触，因两方文字本质过于悬殊，故在文法上无甚影响，但声音方面，由于梵音转读方法的输入，使汉诗对声律讲求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但声律为音乐性，文字为图画性，各自发展，不必同符。刘氏在《练字》篇上说：“讽诵则续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颇能道出二者的界限。

音律以外，文章论修辞亦与印度思想不无关系。刘氏此书，即可代表这一方面的成就。这点似为中村氏所见不到的。

一

欲论《文心雕龙》一书与佛家的关系，应先明了刘氏本人与佛教因缘的历史和他对于佛教的著述。

刘勰事迹见《梁书·文学传》。他是东莞莒人，世居京口，生于宋明帝泰始初。传云：“勰早孤，笃志。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④] 定林寺经藏（寺在南京钟山，经藏为临川王所造）目录，现尚存，书名曰《出三藏记集》，凡分十五卷。题僧祐名，可能出勰之手。其中不少论文，可视为刘氏所作，或至少可代表他的意见，不妨取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杂录》收有刘勰撰的文章共三篇：《钟山定林上寺碑

---

① 见徐佛观译本，86 页。

② 《文心·丽辞》篇云：“造化赋形，肢体必双。”他认为偶词俪句是出于自然的。

③ 《胡汉译经音义同界记》。

④ 《高僧传》云：“祐于齐武帝永明中，奉敕入吴宣讲，治定林、建初诸寺。”

铭》一卷，《建初寺初创碑铭》一卷，《僧柔法师碑铭》一卷。别有《剡石城山佛像铭》。僧祐死于梁天监十七年，他的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亦由勰所撰制。《梁书》称刘氏“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石僧志，必请勰制文”。《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古的佛教目录。其书《集录上》说：“发源有日，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梵文证经四百有十九部，华戎傳译八十有五人。”我们从《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可以看出他对于内典有极广博的涉览和湛深的研讨。尚有僧祐的《高僧传》，有人还说是勰的手笔。[①]

至于他在佛学理论上的著本，只见于收在僧祐编的《弘明集》卷八中《灭惑论》一篇，是反对“三破论”而作，目的在比较释道二家的优劣，对于道教的神仙家、五斗米道等深加攻击。他对佛教的见解，此文可窥见一斑。有些地方可与《雕龙》中论学的原理互相参照。

二

曹学佺云：“《雕龙》上廿五篇铨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而古今短长，时错综焉。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上引曹序）刘氏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可称为“神理说”。第一篇《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专立《神思》一题，冠于笔术二十五篇之首。其要语如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以为心思出于神，强调“神”是作文的基本动力。这和他主张佛法练神之义正可互相发明。他在《灭惑论》中说：“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理；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于无穷，教以胜慧……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标神与形二事来分别佛、道两家的优劣，是当日佛教徒所常言的。《世说新语·文学》：“佛经以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其说正和刘说相同。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云：“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质明则神朗。”“建同德以接化，设贤教以悟神。”（序文见祐录）。支序通篇论“神”处甚多。间参道家

① 见曹学佺《文心雕龙序》，载拙藏明本钟惺评《文心雕龙》卷首。此《序》亦见吴兴闵氏刻梅庆生音注《雕龙》本。

言[1]东汉桓谭《新论》中始著《形神》之篇。他的设喻，以烛为形，火为神，尤具妙理。[2] 刘说远源实出于此。关于神的本体，在佛学输入以后，这是一极重要的玄学论题，参加讨论的人很多。[3] 那些站在佛教立场来讨论“神”的问题，东晋以来，如庾阐有《神不更受形论》，竺僧敷有《神无形论》。并揭出“神”重要性，认为形托神以为用，神是形的主宰。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有云：“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4] 又作《佛影铭》云：“体神入化，落影离形。”至陶渊明因作《形影神诗》三首，则归之于自然。[5]《广弘明集》道安《二教论诘验形神》云：“《易》曰：几者，动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而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练神。练神者，闭情开照，期神旷劫。幽灵不亡，积习成圣。”具见“神”的重要性。刘宋时学者文人，无不喜欢讨论神的问题。像颜延之的《庭诰》、宗炳的《明佛论》，都是很好的例子。沈约亦有《形神论》之作。

刘氏生于齐梁之世，颇受诸家论神说影响。他的文学上神理说有两要点：

（一）神为文本。《易》辞上屡屡说及“神”字。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精义入神。”此固玄言，可与佛理相通。《雕龙》在《征圣》篇赞云：“妙极生智，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妙极”即“妙万物为言”，“精理”即“精义入神”，都是指“神”而言。为文应该存神，和佛法应该练神同一道理。有神才能尽文章之妙。

（二）神与形别。神和形原有内外之分。根据这原理来论文章，亦有神形内外之异。精理无状可见，是神；秀气有态可观，是形。《文心雕龙》书中如《比兴》篇谓“兴取于义，而比取于象”。《隐秀》篇分隐为复意而秀为美辞，亦一内一外，很有条贯。这可说是以“形”、“神”二元论为出发点，而运用这原则讨论文学。

《世说·文学》：“阮籍劝进，时人以为神笔。”用“神”字来形容作文，其由来已久。至刘氏乃立《神思》专论。此后，如杜甫云：“下笔如有神”，

---

① 论神为一切之本，远源于道家。如《庄子》、司马谈《六家》、《淮南子·精神训》、嵇康《养生论》。

② 不具引。

③ 详《弘明集》及《梁书·范缜传》。

④ 见僧祐《弘明集》。

⑤ 其序云：“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文章有神交有道"。司空图亦云："诗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与李生书》）严羽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沧浪诗话》）无非皆受刘氏神思说之影响。神理说是他论文主要的哲学根据，究其本源，正和佛氏之说息息相通的。

三

还有若干地方可以看出它和释氏思想有连带关系：

（一）征圣的态度。《文心》第二篇是《征圣》，认为"征圣立言，则文其庶"。接着是《宗经》，以圣人的话必有绝对权威。印度逻辑上的正量，本义是 Proof，梵文 Pramana（the means of right knowledge），认 veda 圣典为不可侵犯（参看 Satis Chandia Vidyabhusana：*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p*. 107），亦是这个道理。印度正理派经典（Nyaya-sutra）所立四量，其一为 aptopadesa，汉译为圣言量，指可信的证典（reliable assertion）。刘氏征圣的态度和佛家思想似乎不无关系。

（二）《文心》的命名。《序志》篇云："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文学上取"心"为名，本有"赋心"一词（《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云："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张芝论书法，著《笔心论》五篇，亦是以"心"命名。但用"心"来作书名，即是佛门的惯例。像慧远请译《阿毗昙心》。[①] 吉迦夜译《方便心论》[②]，即其例证。[③] 吴康僧云《法镜经序》云："夫心者，众法之原，灭否之根……称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镜。"心可照见一切[④]，取名《文心》殆用此义。他说："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神思》篇赞）他在《灭惑论》一文中亦主张"弃迹求心"，因为心是一切的主宰，文章何独不然？故在《原道》篇又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汉代扬雄虽有"言，心声也"之论，但没有他说得这样透彻。可见他是取佛教唯心论

---

① 阿毗昙，即无比法，梵文 abhidharma，指论部。曾太元间僧伽提婆在庐山徇远公所请，译成四卷。慧远有《阿毗昙心序》云其管统众经，领其会宗，故作者以"心"为名焉。

② 《出三藏记集》收二卷。延兴二年，释昙曜译，刘孝标笔受。《大正藏经》中第三十二册中止有吉译《方便心论》卷。

③ 又有尊法胜的《阿毗昙心》，本二百五十偈，尊者达摩多罗增三百五十偈为十一品，号曰《杂心》。见《出三藏记集·后出杂心序》。

④ 佛家言心，分"心"cita、"心所"ciasika 二者。心即心之主体，心所即心之种种作用。

以立说。这即是本书命名《文心》的理由。

（三）全书的体例。《雕龙》一书，编制严密，条理严析。有人说他是采取释书的方式为之，自《书记》篇以上（论文体），即所谓界品[①]；《神思》篇以上（论文术），即所谓问论。[②] 至于每篇文章末尾有赞，此种格式，佛教文章多见之[③]，如王僧孺的《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三经序赞》即其一例（文收入《出三藏记集》，和佛经论末附偈语相似）。刘知幾《史通·论赞》篇云“篇终有赞，如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是也。

（四）带数法的运用。以数统摄各种事理，在梵语合成语的“六合释”中，名叫“带数释”（Dvigu），这亦是佛家习惯。[④] 刘氏在《文心》中，如《知音》篇，标揭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是归纳为若干事类后，用数来统理它，很像佛家术语的“三观”、“三量”等等。他如《宗经》篇体有六义，《镕裁》篇论作文三准。这些界分，都用带数法来统摄它。[⑤] 中国古代学者，亦常用这种方法，但没有佛门那样用得区分明细。晋、宋以来，处理佛经界品，便是常用这种“带数法”的。

四

《文心雕龙》下半多论修辞术。按修辞术在古印度三十二年明中占一重要的地位。[⑥] 刘氏未必懂梵文，然当时与诸大德往来，耳濡目染，或曾从笔受[⑦]亦未可知。观《出三藏记集》中《梵汉译经同异记》[⑧]，比较两国文字同异甚精，谓梵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梵音则制文有半字、满字之分，及《灭惑论》之数提梵言，知刘氏于梵文必略识其大概。

《文心雕龙·练字》篇云“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并举出“避诡异”、

---

① 界品“明诸法体，以界标名”，见《俱舍论》，即今言门类。

② 像《阿毗昙心序》云“始自界品，迄于问论”，凡若干偈，正是佛书编制的佳例。

③ 即序赞、论赞之类。

④ 好像“三界”是由 tri＋lokam 二字合成。

⑤ 如《尚书大传》孔子言“六誓可观义，五诰可观仁，甫刑可观诫，洪范可观度，禹贡可观事，皋陶可观治，尧典可观美”，他便以数统之，说道“书标七观”。

⑥ 梵语为 ralankaa，亦名《庄严论》。

⑦ 如刘孝标之从昙曜受《方便心论》。

⑧ 此文疑出刘氏手。

"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四事。"联边"指"半文同文"，自是指赋之堆砌而言；"调单复"指字形肥瘠而言。所谓"半字"、"单复"诸命名，正可与《梵汉译记》一文相参。不过梵以音而汉以形，处理的对象虽殊，方法正可相通的。

《文心雕龙》中《比兴》篇论"兴"与"比"之异，殊有特见；而对于比的类别，分析尤详。谓比有"喻声"、"方貌"、"拟心"、"譬事"各种。按佛经书最善于譬喻（Avadana）。如《杂譬经》、《法句譬喻经》、《百句譬喻经》等等，例不胜举。康法邃撰《譬喻经序》："《譬喻经》者，皆是如来随时方便四说之辞，敷演弘才识诱之要，牵物引类，转相证据。"即此之意。《涅槃经》说喻，有顺喻、逆喻、现喻、非喻、先喻、后喻、先后喻、遍喻，分析精密。料刘氏必有参酌于是。

又《章句》篇："宅情曰章，信言曰句。""裁衣匠笔，篇大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汉代治经已用此法。而印度尤重章句（Pada），所谓"众字和合成语，众语和合成句"。失名《法句经序》："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钩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足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分章断句，便事烦相从。"盖此法梵、汉并用，足见其间会通之处。

五

《文心·声律》篇专论文章音乐性。言音的性质，则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黄侃言飞谓平清，沉谓仄浊。[1] 至于双叠，殆谓取四声字以配双声、叠韵[2]。又言"双声隔字而每舛"，似近于八病中的傍纽病。又言"叠韵难[3]句而必睽"，似近于八病中的小韵病。这些即是齐梁以来流行的四声说。此说起于周颙的《体语》。切字有纽，乃摹仿梵音为之（体文即梵音字母"迦"等辅音）。其后沈约因创纽字之图。[4] 这种以一字纽四声方法的发明，与

① 《文心雕龙札记》。

② 详《文镜秘府论》天卷所载《四声谱》。

③ 《文镜论》引作"离"者是。

④ 见《玉篇》卷末附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

梵语有关，世所共悉，兹不详论。[①]

刘氏《声律》篇又云："是以声画妍媸，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这里讲究音律的运用。他提出"和"与"韵"二者的差别：韵是押韵，只是每句收声的相同，故有一定；和是调声，在使音节的和谐，故多变化。因此说"同声相应"是"韵"，"异声相从"是"和"；"选和至难"，而"作韵甚易"。考慧皎《高僧传》中《经师》篇一文比较汉、梵歌赞的不同，有云："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国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如把这段话与刘氏相印证，可见所谓"和体抑扬"，似是运用梵赞转声的方法来论汉土诗歌的音律。我们看《出三藏记集》中所收的佛典，有《梵呗序》一卷及《转读法并释滞》一卷，可见刘氏于转读的注意。梵人长于音[②]，自昔即有考究音声的专门学术。[③] 如诵梨俱吠陀经典，便有五种诵法与十一种诵法。后魏吉迦夜术译的《方便心论》，记音声外道有六十三学四句之义[④]，非常繁杂。诵法，梵语Patha，汉语译成呗匿，唱时声音悠扬曲折以取态。《高僧传》经师一门所记擅长转读的名德，如晋之帛法桥，宋之道慧等，皆当时名手。《经师》篇总论言："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正可三百余声。"可谓极一时之盛。[⑤]

至于转读之法，我们看慧皎所描写，有的"声彻里评，远近惊嗟"，有的"升座一转，梵响干云"，有的"四飞欲转，返折还弄"，似乎是用高音调还带着多少连缠绕的繁腔，这是"唱经"。尚有一种是"吟调"，敦煌所出《维摩诘经》讲唱文卷，于长偈短偈并标注曰"吟"。吟是讽咏[⑥]，或者是用低音调而声较小的讽诵。《文心》所称"吟咏滋味，流于字句"，似即"吟"之类。印度古代音乐吠陀有三声（avara，即 accent）：一为高声调（udalta）；一为非高声调（anudatta），即发声高锐的扬音与低调的抑音；一为混合声调（avarita），乃调和上列二者的混合音。此三声乃就声乐高低而言，陈寅恪《四声三

① 参见 R. H. Van Gulik Siddam。
② 郑樵《六书略》语。
③ 即所谓声明 ahabdavidya。
④ 《大正藏》二三册，23 页。
⑤ 《梵呗源流》，参看 S. levi 及 P. Demiéville 之《法宝义林》，93 页。
⑥ 《一切经音义》七三。

问》以比附平上去三种声调，实在极有问题。余曾与印度友 V. V. Paranipe 先生讨论。据称，这三声原为朗诵吠陀圣典时所用，吠陀时代以后，不复施行，渐已失传。至南齐之世，去吠陀时代悬隔遥远，其时僧徒，当不能懂这三声。他认为陈先生之说，时代上不相衔接，不易成立。今按佛所用的语言是方言，不可能用婆罗门诵经时的唱呗，故梵僧来华不传授梵呗是当然的事。汉土的转读佛经，乃自己创制的新声。[①] 所以这三种吠陀的 svara，和平、上、去三个声调，根本上谈不到有什么关系。刘氏所谓“声有飞沉”，或指讽诵音声的上下。故云：“沉则乡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远。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辘轳喻声韵的圆转时，鳞比喻声律的靡密。可见不仅指声调的平仄而言，还兼指歌唱的抑扬而言。他这种理论，可能是由吟佛经体会出来的——因为汉诗当时在受转读佛经影响之后，曾经产生一种新的讽诵法。[②]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易。”刘氏声律之说，似即本此发挥，而归纳成“异声相从谓之和”一个总法则。因为不同字音，连结一起，读起来不能调和，便是“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阐扬沈约声病之旨，但“振其大纲”而已。至云“织意曲变，非可缕言”，则似于八病苛碎之说，有不甚同意者。由慧皎之说，东土重在结韵，而印度长于和声。刘氏将“韵”与“和”提出并论，可说是得其会通而能识大体。这却是沈约等所不能的。

六

考刘氏自从僧祐研讨内典，至编到《出三藏记集》，费时十年。至齐明帝建武间，诸功已毕，乃作《文心雕龙》（时约三十余岁），而成书于齐和帝之时。[③] 那时已经还俗，并将出仕，故书中极少引佛家语。但他的文学理论之安排，却建筑于佛学根基之上，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虽皈依于佛，但他却

① 详黄锡凌《梵呗》，17 页。

② 相传曹植登鱼山，于岩谷间，闻诵经声，因效之而制声。其事见刘敬叔《异苑》、《高僧传·经师》篇、《法华文句经》引《宣验记》。又《法苑珠林》四九《呗赞》篇更演其说，谓：曹植读佛经，遂制转七声升降曲折之响。及感鱼山之唱，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此焉。以梵呗托始于陈思，所言虽不可信，但佛经诵读影响汉时诵法，此正一旁证。〔参看 K. P. K. Whitaker：Tsaur Jyr（曹植）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annbay（梵呗）into China，*BSOAS*，1957。〕

③ 说本刘毓崧《通谊堂集》。

处处会通华、梵。他以为“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个无二”[1]。因此主张中国的“道”和印度的菩提，是一而非二。如说：“万象既生，假名遂名。梵言菩提，汉语曰道。”又云：“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2] 这是他的儒释会通论。所以《文心雕龙》一书，即以“原道”发端。虽然远法淮南，旁参许慎[3]，可是直探心源，折衷于一，正是他为学的根本态度。

我们用高瞻远瞩的眼光去看学术史，凡二种不同文化经过接触交流浸灌之后，便可收融会贯通之效。刘氏的《文心雕龙》，正是一绝好例子。他所以能写出这一空前的巨著，造成他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的地位，并不是单靠着他的文学修养，而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润启发，倒是一个顶重要的内在因素。故特为揭出，或者可作为当前中西学术交流际会的一种参考。

原载《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

① 《灭惑论》。

② 同前注。

③ 以“一”为首。

《文心雕龙字义通释》序

刘彦和基本观点，主正、主圆、主和、主兼，可谓折衷主义之调和派。[①] 以其精湛内典，持论辄以“正道”为依归，余曩者尝畅论之。[②] 其“三准”言：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六观”言：先位体，而继之以置辞，终之以宫商，正犹谢赫论画六法之“经营位置”、“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形”。至于崇尚风骨，同乎《诗品》之风力，亦如画中之有气韵、骨法。齐梁之际，谈艺者每假释氏之事数[③]，以立方便之门，风会所趋，有同然也。

彦和论“文”之内涵，盖有取极广义之杂文学，合经、史、子、纬书以至章奏、书记，尽纳诸文学之领域，与当时之严文、笔之辨，与非“沉思翰藻”不得与于文之行列等主张，旨趣迥殊。凡文章诸不同体式，彦和已囊括而有之，欲“兼解而俱通”，自非易事，既乏宾主之畛分，但作同等之综合，依违于情采、事义之间。揆以挚虞论赋，即有四过之议[④]，而《文心》于诸文体，未能轩轾高下，铨别品题，使成有机之系列，如是所谓“方”者，不啻为一大杂烩。以此之故，与文家之见，不免步骤分途，可能被认为未惬于辨章流别之方，其说历来不为文家所重视，非无故也。卢照邻至谓“近日刘勰

① 参王连熙论《刘勰文学理论的折衷倾向》（《荟萃》，194 页）。周振甫《刘勰以“和”论文的辩证法》（《同雕集》，52 页）。王更生《刘勰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际》（同上，242 页）。

② 详拙作《文心与阿毗昙心》（《梵学集》，179 页）。

③ 拙作《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结尾（《梵学集》，119 页）。

④ 挚虞《文章流别论》：“赋以情义为主，事类为佐”（见《御览》五八七文部）

《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招来空论无用之讥。虽唐初其书屡为学人所援引[①]，而文家则罕所齿及，若黄（鲁直）、晁（公武）则力致贬辞，诋其疏略。[②] 宋时《文章流别》、《翰林论》诸书尚存，优劣易见，宜矣。元世始有刊本，明人复古，乃稍事评点校理。今时风气侧重文学理论，学者摭西以就东，新说飙起，肩随者众，遂乃蔚为大观。书之显晦有时，系乎运会，而审美角度之差异有以致之。

彦和既弥纶众家，自铸伟词，前后各篇，其重要关系词（Keyword）往往反复使用，参互证释，意蕴以究宣。其书索引既有多家，为人省却无限日力。惟同一词每有歧兼，不可一概而论，比而观之，疏通条析，尚有待乎贤者。余在上庠以《文心》设教，近二十年，居恒思效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之例，敷陈其大要，奈兴趣多方，未遑从事。门人吴纬君乃穷数年之力，理董综缉，以成是篇。君昔曾从伍叔傥教授问业，熟讽舍人原书，于兹，比类合谊，自成条贯，足为辅车，诚有助于读者。近世古典文学各体已乏作手，而文论纷呶，以无写作经验之人，懵然著论，有时不免扣槃扪烛之苦。此幽忧子所以有“化鲁为鱼”之叹，可不引以为戒？君疏通碍滞，参酌中外，分理别囿，导人以正，故于其梓行也，喜而为之序。

丙子中秋后三日，饶宗颐

① 参冈村繁《文心雕龙在唐初钞本文选某氏注残篇中的投影》（《荟萃》，98页）。

② 拙作《文心雕龙探原》结论注二一。

读《头陀寺碑》

梁武帝嗜内典，为《净业赋》，不食鱼肉。其《断酒肉文》云："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诸儿皆礼事佛，昭明且以维摩为小字。复于二谛法身，剖析曲尽，虽弘宣内业未逮厥考，而清净实出于胸怀（张溥《昭明集题辞》）。所撰《文选》一书，收录有关释氏者二篇。孙绰《天台山赋》之外，尝数王巾是碑，盖六朝人公认之佳构所喜诵读者也。近贤或罕涉猎，且有误为王俭所作者。余在上庠为诸生授《文选》，讲习之余，颇有轸发，因缀录为是篇。

一、作者

此碑作者，向来有王巾、王中、王屮三说。依余所考，作"中"与"屮"者实俱误。

（一）徐锴《说文系传》中部下云：刘有辅国录事参军王中，字简棲，作武昌《头陀寺碑》。王应麟《困学纪闻》从之，《文选理学权舆》采是说。

（二）何义门首谓当作王屮（左），姚范《援鹑堂笔记》采是说。梁玉绳《瞥纪》引吴白华说："《诗·简兮》'左手执籥'，其名与字或取此。"是说程瑶田驳之。见胡绍瑛《文选笺证》（卷三十二）。

（三）钟嵘《诗品》：刘记室王巾。陈衍注云："音戛。"无据。车柱环《诗品校证》从何义门说，非是。

按《艺文类聚》七十六寺碑类“齐王巾《头陀寺碑》”，只揽开首数句，说作王巾。李善注引《姓氏英贤录》云：

王巾字简栖，琅邪临沂人也。有学业。为《头陀寺碑》，文词巧丽，为世所重。直家郢州从事，征南记室。天监四年卒。碑在郢州。题云：“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巾制。”

其碑分明作王巾。《英贤录》即《隋志》著录之贾执《姓氏英贤谱》一百卷。贾氏世传谱学，见《南齐书·贾渊传》。《唐书·世系表》称（贾）希镜孙执，但《柳冲传》则作希镜子执。《刘孝仪集》有《弹贾执文》。执盖与王巾同时，所记必无误。

又胡绍英引《神仙寺碑序》亦作王中。《吟窗杂录》引《诗品》：“王巾二卞诗并爱清新。”（《全梁文》引作屮，《山堂考索》引作王申，均讹。）《隋书·经籍志》王巾著述有二：一在史部，为《法师传》十卷；一在集部，云：“梁有《王巾集》十一卷，亡。”《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摭门“王巾撰《法师传》十卷”，同。慧皎《高僧传》，王曼硕《与皎法师书》云：“唯释法进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该综，可擅一家。然进、巾名博而未广，体立而未就。”慧皎《僧传序》称：“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均作王巾。故知屮、中皆是巾之误。

二、古写本及碑刻

日本正仓院藏东大寺献物帐，天平胜宝八岁纳物，内有《头陀寺碑》并《杜家立成》一卷、《乐毅论》一卷。右二卷中太上天皇之皇太后御书。此碑唐代已传入扶桑，且为皇太后所御书。

是碑屡有翻刻。《江陵寺馀》云：“头陀寺在东九十里，地名赤岸。宋大明五年置。有王中古碑，剥落无字。龟趺仅存半面，半为斧镰摩砺痕也。”《元和郡县图志》：“头陀寺鄂州江夏县东南二里。唐开元六年重刻《头陀寺碑》。五代韩熙载又重立头陀碑，书其碑阴云。”

赵松雪于元大德四年六月九日书《头陀寺碑》，末记“书与密印寺力法师”，署名“子昂”。董其昌题称：“生平见赵书皆不及此卷，有右军之灵和，迴出怀仁《圣教序》远矣。”又有张凤翼、陈继儒、王稚登、李日华、杨文骢诸题记，见《辛丑销夏记》。具见此篇为人所雒诵，屡为大书家传写不替，非偶然也。

《洛阳伽蓝记》书后

《隋唐·经籍志》地理类，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五卷，又刘璆撰《京师寺塔记》十卷，《录》一卷，又释昙宗《京师寺塔记》二卷。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收梁尚书兵部郎中刘璆奉敕撰《京师寺塔记》，及元魏邺都期城郡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五卷。南北朝间，铺扬佛宇者，惟此二书。刘璆书久佚，遂使"南朝四百八十寺"无从稽考。洛地则自孝文迁都，刹庙甲天下，迄永熙之乱，城郭丘墟，事佛弥虔，而倾弥亟。

《法苑珠林·感应缘部》每引杨书，如崇直佳境僧慧嶷见阎罗，注云事出《洛阳伽蓝寺记》（卷一百十一《利害篇》），虎贲洛子渊事，云出《洛阳寺记录》（卷百一三《酒肉篇》），崔涵复活事，云见《洛阳寺记》（卷百一六《送终篇》）。亦有原出杨书，如尔朱兆杀寇宜仁事，而云出《冤魂志》，则颜之推所著也。衒之虽不佞佛，然于感应事迹喜为著记，以示惩戒世人，盖有微意存焉。其作史也，义例甚严，假为隐士赵逸（按魏另有赵逸，天水人，能文。见《魏书》卷五十二。《龙华寺上台》引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衒之确见过赵逸其人）之言，以讥史官之失。"生愚死智"，谀碑者宁毋阙德乎！"生为盗跖，死等夷、齐。秉笔妄言，华辞损实。"观尔朱文略遗魏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故收论尔朱荣，以比韦彭伊霍（《北齐书》四十八《尔朱文畅传》），可补衒之针砭之由，非无故而然也。

杨书多所采摭，如宋云惠生，西行求法，自云："惠生行纪，事多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并载之，以备缺文。"此则移录自他书，非出自

撰。其中宋云对乌场国主，具说周孔庄武之德。其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园。"则昭然《春秋》内诸夏之旨也。

杨书不无微言大义，叙事之外，屡有"衒之曰"，以示劝诫，即尤《左传》之"君子曰"也。魏澹撰史，于此窃有慕焉（《北史》澹传）。衒之亦仿依之，自为论断（如于尔朱兆事云："《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书中颇讥豪侈。如正始寺下敬义里责"惟（张）伦最为豪侈，逾于邦君"（又引天水姜质亭《山赋》为证）。故释道宣称其"见寺宇壮丽，捐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伽蓝记》，言不恤众庶"（《广弘明集》六），比于夏桀之失德。其旨可深长思矣。其后上书论释教之虚诞，徒为逃役仆隶离苦就乐之渊薮。道宣谓所奏同于刘昼，厕于谤佛之次，侪诸滞惑之间。在护法立场，不得不尔。然寺院之滥，贻害滋深，衒之闳识孤怀，百代之下博得读者之同情也。

又书法独贬阉官，凡巨室出身为阉人者，必书曰阉官某某，如云："阉官司空刘腾宅"（建中寺）、"阉瀛州刺史李仁寿"（名尼寺条）、"阉官王桃汤"（宣忠寺）。其时纪寺亦阉官所立，秽乱尤甚。萧忻之言，可为累欷。其辞曰："高轩升斗，尽是阉官之嫠妇；胡子鸣珂，莫不黄门之养息。"呜呼，可以风矣！

杨氏以中州为正统，北方词笔，如邢、温文采，多所称述。于齐必曰伪齐，而于南人投奔者记载特详。王肃好茗，故有水厄之讥。其右北而贬南，于此三致意焉。阳嘉桥柱，论刘澄辈之穿凿，以其"生于江表，征役暂过，多非亲览，误我后学，日月已甚"。言下于南士不无藐视之心云。

此书衒之实有自注。自顾广圻发其例（《思适斋集》卷十四），近贤颇留心析出注文，致力于此者多家。余嘉锡列出书中叙事，谓其广众异闻，用资谈助（《四库提要辨证》八）。《续高僧传》一《魏菩提流支传》附记期城郡守杨衒之，并节录其《伽蓝记序》，末有云："名僧异端，纷纶间起。今采摘祥异者，具以注之。"今本自序无此数句。从"具以注之"语观之，书中子注之多，可以概见矣。

宋学的渊源

——后周复古与宋初学术

当前新儒学的讨论成为热潮，国际学术界对于宋学特别重视，因此对于宋学如何形成应有重新认识之必要。法国 L. Vandermeersch 教授曾问我宋代儒学是怎样产生的，这一讲演即对他的发问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记得陈寅老在审查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三报告书中曾约略提出一点意见，他认为智圆提倡《中庸》，自号“中庸子”，均在司马光写《中庸广义》之前，似应为宋代“新儒学”的先觉。冯先生亦采用其说。宋代已有所谓“新儒学”，是寅老首先提出来的。他把宋代新儒学的先觉人物的美誉颁给智圆，然而智圆是否真的能担当得起呢？这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仔细考察历史，宋代初年以“中庸子”为号的实际上最早是陈充。《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三：

> 陈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唐牛僧孺著《善恶无馀论》，言尧舜之善、伯鲧之恶，俱不能庆殃及其子。充因作论以反之，文多不载。……自号中庸子。上颇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词职。临终自为墓志，有集二十卷。

牛文见《全唐文》卷六八二，充文反不传。《全宋文》卷一〇一据《藤县志》录陈充《子思赞》，有句云：“忧道失传，乃作《中庸》。力扶坠绪，述圣有

功。”足见其榻橥《中庸》年代在智圆之前。（智圆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陈充则卒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十。充于太宗雍熙中登进士，乃智圆的前辈。）宋初儒者邢昺于景德间曾指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而言（《宋史·儒林·邢昺传》），所以不能说重视《中庸》是出于释氏的提倡。

一、贬佛与崇儒

唐代三教平行，彼此之间并无轩轾，在朝廷上可以一起讲论。五代之季，周世宗最重要的措施是贬佛。

显德二年（公元959）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又禁私度僧，禁僧俗舍身，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账，是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六九四，废者三〇三三六〇（《通鉴》，9257页），是时统计僧数四二四四四，尼数一八七五六。世宗对佛寺予以种种限制，命民间铜器可销佛像为之，给释教以极大的打击。

周世宗是一位极端破除偶像的人物，他曾对群臣说道：“勿以毁佛为疑。”他说：“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唐代三教平行之局面遂被打破。他好像很信任王朴的规划，遂大举制礼作乐，有几件大事值得一述：

显德三年八月，端明殿学士王朴、司天临王处纳撰《显德钦天历》。

显德四年正月庚午，诏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国子博士聂崇义讨论制度，为之图。(9564页)

同年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考证钟律，作《大周正乐》。(9571页)

显德五年十一月，敕窦俨编集《通礼》、《正乐》二书。

显德六年正月，王朴疏称“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礼乐。以臣尝学律吕，宣示古今乐录，命臣讨论”。

广顺三年六月丁巳，《九经全书》刻版完成，共二百七十七卷，历时二十八载。

由上述诸事，可见世宗提倡儒学、注重礼乐的热忱，可惜他短祚，还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发生了陈桥兵变。紧接着太祖御宇，这些工作成果就都转为宋人所有，成为宋代的业绩。上述这些人物如聂崇义、窦俨等，都变为宋的臣子了。

二、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九经刻版的完成

先是田敏于周广顺元年以尚书左丞之身份出使契丹（9457 页）。《通鉴·后周纪二》云：

>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

胡注云：

> 雕印九经，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长兴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

按《通鉴》云：

> 长兴三年（公元 932）春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敕定九经，雕印卖之。(9065 页)

由是可知，田敏负责此事历时凡二十八载。

自五代至宋初，九经有雕版刊行，并以九经施教、考试。乾德中，孙奭、孔维即以九经及第。

三、宋初之礼学

北宋礼学盛行，承后周未竟之业。《宋史·礼志》云：“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书重集《三礼图》。”《宋史·儒林》：“崇义于显德间，论禘祫之礼。宋初，张昭奏与聂氏讨论祭玉尺寸，引及隋牛弘之《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开皇中奉敕撰。”崇义此书盖显德四年正月庚午奉诏撰集。今新定《三礼图》前有序，末云：“其新图凡二十卷，附于《古今通礼》

之中。是书纂述之初，诏（窦）俨总领其事。”俨即于周时撰《大周通礼》者。

宋初礼学著作可记者有下列诸书：

《通礼义纂》一百卷

见《太平御览引用书目》，即此。

《开宝通礼》二百卷

建隆三年表上，有窦俨序，即依《大周通礼》增修。

以后陈祥作《礼书》，集其大成，书今尚存。

四、宋学渊源之地域性——蜀学与南唐学术

五代之际，西蜀与南唐有一段时间略可休养生息，文风亦盛，人才辈出。宋有天下，众之所归——蜀士与唐儒相继仕为宋臣，如张镒、张洎及徐铉，其尤著者。

窦俨校正《三礼图序》称：“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据李至《三礼图记》，此六本者乃“张镒、洎诸家所撰，凡六本”。

张洎博览群书，长于考据，《宋史》记其读“亢龙有悔”，征引碑记传赞，以作证验，读之正如清人臧镛之著述，开汉碑征经之先例。

来自蜀者如句中正（益州人），孟昶时馆其相毋昭裔，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中正精字学，太平兴国二年，被诏详定《玉篇》、《广韵》，四年副张洎使高丽，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文苑》卷三）。蜀人林罕注《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故知宋学中实包含有蜀学与南唐之学。

五、宋学中的汉学

初期之宋学不是全讲义理，反而注重文字、声韵、校勘之学，与清代乾嘉学风很是接近，而这方面的著作，在北宋的学术界却大放异彩。举例言之，太宗雍熙三年，徐铉奉敕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同校正《说文解字》，吴淑云：“取《说文》有字义者千八百余条，撰《说文五义》三卷。”徐锴有《说文系传》、《说文解字韵谱》，铉为序（见《徐铉传》）。其后神宗与太原王子韶

（圣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宋史》卷三二九《王子韶传》），可见北宋君主对《说文》之留心与提倡，影响所及，邻邦高丽亦有《说文正字》的刊行。该书有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年号，即肃宗六年，相当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 1101）。

以韵书论，宋重修《广韵》，凡二九一九四言，一九一六九二字（景德四年十一月敕）。景祐中，复诏为《集韵》，《太平御览引书》有《集韵》，似其书先成。

治平四年，司马光上《类篇》，其序云："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类篇》即"以《说文》为本"，编制全仿许书。

六、四书学的发轫

最近学人每说唐代《五经正义》没有完成任务，宋儒用四书代替五经（任继愈说）。四书是否果真能够代替五经？是很有兴趣的问题。由于周之贬佛，佛门大德亦有不少攻习儒书，且有著作，像僧赞宁（《宋高僧传》作者）便有《论语陈说》一书（《经义考》五二），后来若智圆有《中庸子传》（《闲居篇》）、释嵩著《中庸解》（《镡津集》四），冯著《中国哲学史》已经提及，认为是四书学的先导。我个人则以为《学》、《庸》二书的独立研究，似乎由司马光开始倡导，光著《大学》及《中庸广义》二书，朱彝尊云："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自温公始。"（《经义考》一五六，参拙作《固庵文录》156 页）我觉得北宋人似乎对《小戴记》特别发生兴趣，可以宋庠一故事证之。庠的母亲钟氏梦一道士授以一书，并说以遗尔子。这本书便是《小戴记》，道士即是许真君（或即许逊）（见《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其实把《礼记》里面的某一篇取出来单行的，始作俑者是宋太宗，他曾令以《儒行》篇刻于版，即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张洎得之上表称谢，此事见《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

七、余论　官学与私学之分合

宋太宗对经学的提倡，详见《李至传》。太宗本人是一个大学者，他贯通

三教，著有《朱邸集》、《御集》等。现存日本弘教书院重经刊《大藏经》保存有他的《逍遥咏》十一卷、《缘识》五卷，俱见他的思想之含弘广大、融儒合道；他又有《莲花心轮》回文偈颂，远播及于边郡敦煌（见S·四六四四、P·三一三〇）。自著《注语》，具大悲愿，合归善道。此类长篇巨制，已收入《全宋诗》首册卷二二一三八。又有《佛第赞》一律。他本人虽兼通三教，而朝廷欲仍然是注重儒术的。

谈学术史的人们，每每注意的是某一个重要的人物，而忽略了他周遭的种种关系，重视个人的某种成就，好像朱子在生前被目为伪学，直到理宗以后才给予平反，他的学术逐渐为若干时代的政府所采用，历元、明、清三个朝代而不衰，成为官学，因而才会对后代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周濂溪的学问也是经过朱子的肯定才确定下来，以至位居宋五子的首领地位，事实上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参邓广铭说）。

我们再看宋初儒术的形成。在建隆与太平兴国已成为官学，九经列入考试题目，为士人必修的科目，《礼记》自五代以来，即有“礼记博士”之设，《中庸》、《儒行》在太宗时已出单行本（《大学》篇早已出现于敦煌写经卷中）。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中庸》是出于释氏的提倡。《礼记》列入官学，是北宋尊重礼学的表现。官学的影响自然要比私学更为重大，可见私学如果没有官学的推动，那是很难得到什么巨大的影响力的。

《欧阳文忠文集考异》跋

《欧阳文忠文集考异》五十卷，二十四册，宋欧阳修原著，明曾鲁考异。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所藏者为明洪武丙寅刻本，清吕保中旧藏。此书每卷次行题："临江后学曾鲁得之考异。"宋濂撰《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称："其自著昔有《六一居士正讹》。"（《宋学士全集》十八，又《千顷堂书目》三十二笺注类）明文衡邹缉《书居士外集后》云："（李维武）者尝得故礼部侍郎曾鲁得之所校欧阳公《居士内外集》，知以为奇实而藏之。余曾借得其外集，盖版本大字，上下边幅最高阔。曾公皆手自校雠，中间颇多缺版，又手自补完。曾氏家多古书，所校诸本，有吉本、家本刊诸集，辨其同异。及其改易增损，皆朱书小字于其上下旁边，字极谨细。……是时曾公没已久，其子坐事见籍，官散鬻其书，故维武购得之。……又以外集之文，罕有传者，其所考异，尤为难得，因取而备录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丰县系令蔡玘已为之镂版，而建宁书坊又为之传刻，则此外集亦当与之并行也。"是所谓《居士集正讹》应包括外集，邹缉见其稿本，言之凿凿，故备录之。

卷二十四、三十五、五十卷末，具有"时柔兆摄提格，县人陈斐允章重校"一行。此丙寅乃洪武十九年也。东莞莫氏《五十卷楼书目》（卷十六）有《欧集》残本三十四卷，前题"临川后学曾鲁得之考异，后学李均度校正"两行。前均度序备述书原委，谓"洪武辛亥秋（1371）忝承永丰，首谒学官，得蔡侯行素新刊（欧阳）先生文集"。末题"洪武六年龙集癸丑"，则又在陈

斐此本之前矣。《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亦藏是集，则题“临川曾鲁得之考异，古舒后学蔡玘行素订定，番阳后学李均度校理，古溧后学俞允中校正”四行，可知邹缉所称蔡玘镂版《居士集》，应先于洪武六年癸丑李均度校刊本，约在洪武四年辛亥略前。

此洪武十九年《欧集考异》，向来著录者有三误：其一误为宋、元刊。钱竹汀据其对“有宋诸帝”不跳行，故以为元刻。乾隆间无锡邹炳泰（晓屏）藏有是书，其《午风堂丛谈》谓：“《居士集》五十卷，即欧公自定本。《考异》亦精核。此本尚是元刻。”邹氏此书后归海源阁，杨氏绍和《楹书隅录》著录，重定为明洪武本是也。嘉业堂本书影亦误题作元刻。若江标《宋元本行格表》下，据《留真谱》收曾鲁此书，款式相同，行二十一字，而题作宋本，更谬。其一误与蔡玘本相混。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四），已知此本刊于柔兆摄提格，即洪武十九年刻本。惟因邹缉语遂懵然谓《居士集》五十卷，洪武丙寅永丰县令蔡玘依吉学所藏曾氏手定本，始为之镂版，遂称此本盖刻之者蔡玘，校之者陈斐，因题此本为“洪武丙寅蔡玘刻本”。不知蔡玘知永丰在洪武辛亥以前，不能下至丙寅也。又一误为明正统刊。王重民《北平图书馆善本题识稿》九一二，题此书为正统间刻本，所据理由为《永丰县志·选举表》。陈斐，北坊人，永乐间诸贡，名次在永乐二十一年举人周宁之后。以为陈斐当洪武丙寅，年应尚幼，故移迟六十年，而定斐此本为正统间重刻。按杨绍和、张菊生、赵万里皆定此本为洪武刊。今考之诸刻工人名，皆当元末明初。张菊生谓与元刊辽、金二史刻工相同，恐其年寿不能下至正统丙寅，故以洪武为合。方志贡生例于举人之后，尤不宜据周宁之名以定陈斐之次也。王氏又据《永丰县志·名宦传》，蔡玘，安庆人，吴二年乙巳知永丰。乙巳为元至正二十五年，因谓此书初刻犹在元季。今按乙巳下至洪武辛亥，不过十年，邹缉谓“洪武初永丰县令蔡玘镂版”，则玘宰永丰尚及洪武初年，李均度序谓洪武（四年）辛亥得蔡侯行素新刊《欧阳先生文集》，可为证明。是谓此书初刻犹在元季，亦非，当以邹缉说为是。总之，是集洪武间刊刻不止一次。最初为蔡玘刊，在四年辛亥略前；次为六年癸丑李均度序刊；又次为十九年丙寅陈斐刊，即此本也。

原载《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

唐宋八家朱熹占一席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的欣赏，各人有不同的口味，遴选标准，自来没有绝对的尺度，人各执其一是。能够平情立论，不要意气用事，一秉于正，更是不容易做到的。唐宋两代，作者翁郁如林，而选文者，仅取八家，其不合理，不待评量便知其非为笃论。

《四库提要》称：“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茅）坤前，然后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卷三八，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六四卷）当时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攘为己作。”但坤书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人，实未讳所自来。其书总序云：“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余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盭已。”《四库提要》谓：“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其所评语，疏舛尤不可枚举。”又谓：“刊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此书盛行闾里，影响及于扶桑，观《内阁文库书目》，所列明、清及日本刊刻《唐宋八家文钞》版本之繁杂，可知其流传之广。

八家之选，向来为人所诟病。程廷祚以为欧苏以下，力量不足，则有腔调蹊径，一学而能，面目令人可憎，尤不足法（程绵庄《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李安溪以为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袁枚谓：“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又

言："学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顷刻万语，而斯又滥焉。"（《书茅氏八家文选》）他若恽子居论："侯方域文之失在锐，其疾征于三苏氏，汪尧峰文之失在弱，其疾征于欧阳文忠。"而刘开则云：

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刘孟涂集·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袁之轻南丰，刘之抑颍滨，均有其理，而子由厕于八家，未免惭色。愚意八家而苏氏一家居其三，斯诚逾分，不若去子由，而别取他家。朱右开其端而未详其故，荆川意主论文，偏于阖顺逆笔法，若茅坤所标榜者，在"不戾于道"，则宜第朱子为首选，以朱代之，庶几可塞悠悠之口乎！

所谓洒落，只是开窍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耶！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可自见。（《文采》卷三一）

《通书》跋语甚精，然愚意犹恐其太侈，更能饮退以就质约为佳。

又云：

大率议论要得气象宽宏，而其中自精密透漏不得处，方有余味。……又所谓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自谓此言颇有含蓄，不审高明以为如何？（同上）

朱子颇憎三苏，病其新巧，《与张敬夫书》谈范醇夫一生"将圣贤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过，不曾仔细玩味"。又称：

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

醇夫不以苏学为非是，但是追求文字功夫，在波澜技巧上翻筋斗，此但可语以科场文术，技之浅者，殊非文章之极挚。朱子所以看不起苏氏文意，道理正在于此，以为对苏学习染过深，足以“坏了心路”。

宋孝宗淳熙丁酉，周必大推荐秘书郎吕祖谦编选《圣宋文海》，后命名曰《文监》，张南轩以其书与朱晦翁，以为编次《文监》，无补治道，何益于后学。但朱子晚年尝语学者，以为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入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则取《五凤楼赋》之类，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宋文监》(吕)乔年序)从此地方可看朱子选文，着重“大文字”——有关政体之大者，吕祖谦之见解，与彼大抵相同。

文有刚柔之分，与作者之气质相关。朱子主中庸，其《答吕伯恭书》云：

> 大抵伯恭天资温厚，故其论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质失之暴悍，故凡所论皆有奋发直前之气。窃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发，足以自挠而伤物，尤为可恶。

被自剖个性与祖谦之不同，各有所偏，均非中道，故其论屈原之行径，过乎中庸，亦从此一角度出发。朱子论文薄巧思，再三致意。《答吕伯恭书》云：

> 向见所与诸生论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矣，恐后生传习益以浇漓，重为心术之害，愿亟思所以反之，则学者之幸也。

吾人读《东来博议》，每叹其遣词命意之新，朱子则深患其有害于心术，盖与苏氏之文同病。朱子论“文理密察”四字云：

> 盖密乃细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谓毫厘之间——有分别耳。……大抵圣贤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达，故能春生秋杀，过化存神，而莫知为之者，学者须识得此气象而求之，庶无差失。

从精微处下手，由高明处显示，密即尽精微，察即极高明，如是方有正大光明之气象，此文章之崇高境界，赖文理之“密察”有以表现之。读朱子文章宜在此方面着眼。

文有纪述之文，有考订之文，有阐义说理之文。说理之文逻辑性最强者，

以朱子为最。《四书集注》，朱子用力特深，覃思最久，自言“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语类》，卷十九）。是书以洗练之文字，述渊深之哲理，多次改订更定。今《大学·诚意章》，为其未易箦前一夕所改。其闻道夕死之精神，最为后人师法。他著如《诗集传》，原本为《诗集解》、《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朱说，为其传序，《诗集解》于乾道九年二次修订本，于淳熙二年寄吕祖谦者。今朱氏《诗集传》则为淳熙四年三次修订本的序（参看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341 页）。一文之成，千锤百炼，几经更定，自古作家，罕有如此认真者！故说理之文当以朱子为典范，以之列入八家，谁曰不宜！

《元典章》与白话文

在历代文物数理化展览中，提供稀有国宝的复制品，上起殷周，下迄明清，门类丰富。虽然去真迹一等，但使那些未尝接触到原物的人们，可以获睹各珍品的本来面目。海外不乏好古敏求之士，当然感到极浓厚的兴趣。有关铜器、书、画等部门，老早经过许多专家作了详细的介绍，不必多谈。古籍方面，似乎比较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台北藏书的丰富，据说不下于一百万册；善本书便占将近二十万之数。① 这次展览品中，有“故宫博物院”影印的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十六册，四函。月前我为着要探讨原始白话文的问题，托人查询本港各大学及大会堂图书馆，都没有这部影元本，十分感到失望。现在借这个机缘，从这部书谈谈一些白话文的渊源问题，也许对中国语文形成过程的了解上，有点滴的帮助。

《元典章》是一部元朝公文书的总结汇，分正集六十卷，新集不分卷。正集共二一五五条，包括诏令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文书。施行的时间正集在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 1303），新集在顺帝至正二年（公元 1342）。以前这书传本甚稀。② 其中保存许多蒙古的方言俗语，故四库摈而不录。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间，沈家本为覆刻，可惜其中不少谬误。史学家新会陈垣尝取元本覆校沈刻，凡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③ 他的校勘功夫，

① 刘家璧编《中国图书史资料集》，381 页，见《台湾藏书的鸟瞰》。

② 参仓田淳之助《元典章之流传》（《东方学报》，no. 24，京都，1955）。

③ 见陈著《元典章校补·自序》。

大家公认为盛业。日本学人对这部书亦很感兴趣。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便成立有“元典章研究班”。差不多经过十四年的时间，不断地作了五百次的会读，泐成校定本。已有《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的出版[①]，由岩村忍、田中谦二两位校定。1965 年我在日本即蒙田中教授诒以一册。《元典章》的本子，尚有英国剑桥大学 Thomas Wade 旧藏的抄本。此外要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元刻为唯一孤本。它的价值可想而知。

《元典章》的公文，是吏版文体[②]，是研究公文程式演变史最好而可靠的资料。[③] 其中有许多文件，还是从蒙古语直接翻译过来，可以看出初期白话文所受到蒙古语法影响的情形，和当日许多特别语词使用的习惯，在语序上、语汇上和现行一般白话文有很大距离，非常有趣。试举例说明如次：

> 人每的驱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女孩儿与了有。男儿死了呵，媳妇、孩儿做百姓的体例有。道有。（《元典章·户部》“良不得嫁娶驱奴”）
>
> 哈儿弓箭每根底，交与探马赤每呵，不中。汉儿、蛮子官每，休交管者。弓根底，恐怕坏了么道呵，蒙古军每根底与者。（《元典章·兵部》）

这样的白话文，初次读来，真是不知所云。即通用当时一些口语，再加上蒙古文特有的语法[④]，如果没有解说，很容易误会为不通的句子。“驱”是驱奴。“每”字有时用为代表多数的“们”字。《通俗编》云：“北宋时先借懑字用之，南宋别借为们，元时又借为每。”元曲《错之身戏文》开场时云：“贤每雅静看敷演。”“贤每”即是“贤们”。现在通用“们”字，在元代“每”字很普遍使用。上文所谓人每、驱每、弓箭每、蛮子官每、蒙古军每都宜读为“们”字。

“根底”一词，有如现代语云“方面”，原有“边”的意思。柳永的《瓜茉莉》词云：“料我儿只在枕头根底，等人来，睡来梦里。”（《全宋词》，54

---

① 此书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印行。

② 吉川幸次郎《元典章に见太汉文吏牍の文体》（《东方学报》，no. 24），从文学观点讨论元典章的文章。

③ 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讨论《元典章》中所见之公文习用术语。像咨、阅、呈、申等用法，钦此、敬此，施于上对下；准此，施于平行；得此，用于下行。

④ 参田中氏《元典章における蒙文直译の文章》。

页）“枕头根底”犹言“枕头边”。宋词元曲中，“根底”二字常见。《元典章》言某“每根底”，以今语易之，犹言“在某某们方面”。

《元典章》中喜欢用“有”、“有来”二语置于句尾。“有”指现在式，“有来”指过去式。元代用白话翻译经典文言，即用“有”字于字末，有如“也”的意思。元代《孝经直解》翻译《孝经》“夫孝，德之本也”句，白话文作“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这里“有”及“有来”即蒙古语“aju'ue”直译。[①]

“呵”即“啊”，用于假定、既定的语气。有时连续叠用若干个“呵”字。《元典章》中如：

> 今后，但是田禾里交头口（指家畜）入去，交吃了啊，桑果树木斫伐了呵，咽咬了呵，斫折了呵。城子里，连鲁花赤，总督每，就便提调者，依在先圣旨体例，里交陪了，要罪过才。（户部“禁斫伐桑果树”）

这里“呵”字都是用于“条件句”的。探马赤军在《元史·兵志上》说：“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探马赤军是包括蒙古以外的部族，像色目人、汉人共同组成的部队，而以蒙古人为主体。《水浒传》里探马即骑乘的先锋，故探马赤即是打先锋的军队。赤是蒙文“ci”的译音，意义是“者”。[②]

还有“么道”一词，有时作“这么道”，作为指示词，和疑问口气的“么”意义不同。《和尚语录》中“这么道”又作“与么道”。《五灯会元》十一潭州神鼎禅师：“古人与么道，神鼎则不然。”“么道”或作“折么道”。“折”和“这”、“者”意义一样，在《元典章》里，每每用于引句之后。《元秘史》有时直用蒙文“这”的原语“ge'en”的汉音直译作“客延”。

元代的白话文，保存在碑刻上资料甚多，已有人汇集成书。[③] 碑上的白话文杂用汉蒙语汇，亦是非常有趣的。像1235年《重阳万寿宫圣旨碑》有一段说：

① 蒙文语法参 Nicholas Poppe：*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② 杨志玖《元代的探马赤军》（《中华文史论丛》六）。

③ 参方履笺《金石萃编补正》，卷四；冯承钧《元代白话碑》；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上书日本人矢义高书评。

道人每内中不吃酒肉无妻男，不是那般底人。吃酒吃肉，有妻男呵。仙孔八合识，你不拣择出来那甚么，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

这处的“仙孔八合识”，仙孔即仙人。“仙”是汉语借字，“孔”为蒙语“人”的音译。丘处机即被为腾吃利蒙古孔，汉语谓为天人也。八合识是蒙语，从畏吾儿来的借字，“bagsi”义为师傅。[1] 满文之巴克什亦即“baksi”。杨方兴在《大聪六年疏译音》作“榜什”。

《元典章》中的白话文是非常别扭的。由于从蒙古语直译过来，和汉人的语法、语序十分违背，还添上了一些蒙语汉译的语汇。这正是元代初期白话文的真面目。如今保存在官方的文书里面的，对于语言学、文法学和古白话文的研究极有价值。古代白话文的俗语方言，见于元剧中甚夥。张相撰《诗词曲语词汇释》，对于特殊语词的考释花了很大工夫，可惜未及充分引用《元典章》的材料，作为说明的帮助。

大凡语文流变的过程，都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产生一种杂种的混成语。像印度佛教徒使用的白话，把梵文原有的语法完全走样了，于是形成所谓Buddhist Hybrid Sanskrit，文法非常特殊。所以耶鲁大学的Franklin Edgerton教授为它写成一部文法和辞典。元代的白话文情形正复相似。日本学人已作了一些片段的研究，这些问题犹有待于深入探讨，然后对早期的白话文有正确的认识。处处都是学问，因为复印元本《元典章》的陈列，使我联想到这一个问题。拉杂写来，以供留心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人们作为参考。

① 参札奇斯钦《蒙文黄金史译注》，213页。

《虬髯客传》考

旧小说《虬髯客传》，家弦户诵。自宋元以降，说部之书，采录颇繁。举其要者：

（1）前蜀杜光庭纂《神仙感遇传》。[①] 在卷四，题《虬髯客》，称“虬髯”曰“道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有天一阁钞本此书，皮身丝栏二册。

（2）宋子昉著《太平广记》。[②] 题作《虬髯客》。末注：“出《虬髯传》。”无撰人姓名。

（3）陶宗仪辑《说郛》。[③] 题唐张说撰《虬髯客传》。

（4）正德间顾元庆辑《顾氏文房小说》。题前蜀杜光庭撰《虬髯客传》。民国十四年涵芬楼影印嘉靖夷白齐本。

（5）明关名辑《五朝小说》。[④] 题张说撰。

（6）清马俊良辑《龙威秘书》。[⑤] 题张说撰。

他如《唐人说荟》、《说海》，以至近人所编之《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等，无不收载。

簿录家著录者，《宋史·艺文志》（卷五小说类）有杜光庭《虬髯客传》

---

① 《正统道藏》，第三二八册，洞玄部，记传类。

② 在卷百九十三中。

③ 卷第一一二。

④ 在《唐人百家小说》传奇家中。

⑤ 在第四集，第三册。

一卷。《正统文渊阁书目》[1] 内有《虬髯客传》一部一册，阙。钱曾《读书敏求记》有《虬须客传》一卷，引《述古堂书目》注“宋本”。是此书宋时有单刊者。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有《虬须客传》，一卷，题杜光庭撰，盖据《宋史》。按此传因载入杜氏纂之《神仙万不得已遇传》中，后人以此题杜氏名，而《说郛》则题张说撰，明人说部因之，故其作者名氏，向来有张、杜两说。又宋人所见则题作《虬须客传》，与明人之作“虬髯”者异。自明来，此事演为戏曲，故特脍炙人口。鲁迅《稗边小缀》于此传曾作考证，而所论至略。因参稽史传及说部书，撰为此篇，并以就正于世之治小说史者。

一、《虬髯客传》与《黄须传》

最早言及此传者为晚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下），云：

> 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颇行于世。乃云隋末丧乱，李靖与张虬须同诣太原寻天子气。及谒见太宗，知是真主。

宋人说部曾言《黄须传》，与《虬须传》所记颇相类。高平范公称《过庭录》云：

> 旧家多藏异书，兵燹之后，无复片纸。尚记有《黄须传》云：李靖微时甚穷，寓于北郡一富家。一日，靖鬻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饭罢，濯足于门，见一黄须老翁坐于侧，且熟视，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顷于身皮箧中，取一人头切食，甚闲暇，靖异之，乃亲就问焉。翁曰：“今天下乱，汝当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则汝当为王，汝可从我寻之。”靖随翁数程，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奕，翁惊曰：“盖此人当之，汝善佐其事。”遂别饯，留达久之，语靖云：“此去四十五年，东夷中有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乱，贞观中，东夷果奏有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异哉异哉！

公称为仲淹之元孙，纯仁之曾孙，此书多述祖德，乃绍兴丁卯、戊辰间

---

[1] 卷八荒字号，第一厨书目。

闻之其父，故名曰“过庭”。书今有《说郛》卷十四本、《稗海》本。《四库提要》[1] 著录谓：“《黄须传》即李靖虬髯客事，而称为已佚之异书，则偶误记耳。”按二书所言，虽为一事，而传闻异辞，情节小异。虬传观奕事在太原，《黄须传》则云在汴州。[2] 虬传多志年月，与史籍牴牾殊多，而所述视《黄须传》为详，似虬传即据《黄须传》加以增饰者。俞樾《茶香室丛钞》曾引《黄须传》谓：“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黄须翁矣。”不知《提要》已先言之也[3]。

杜氏《神仙感遇传》起句作：“虬须客道兄者，不知名氏。”其文较《唐人百家小说》本为简健，末无“卫公兵法半乃虬髯所传”句。

二、《虬髯客传》证史

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九有《虬髯传》二则云：

> 李靖在隋，尝言高祖终不为人臣。故高祖入京师，收靖，欲杀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盖讳之也。虬髯传言，靖得虬髯资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诗言：“虬髯似太宗。”小说亦辨人主太宗虬须，须可以挂角弓，是虬须乃太宗矣。而谓虬须授靖以资，使佐太宗。可见其为戏语也！

程氏所见，当即今所传之《虬髯传》。“髯”字作“髯”，与《宋史·艺文志》合，而力辨其为戏语。

考唐人说，谓能识秦王为真王，其事亦见杜甫诗。其《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有句云：

> 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观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去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

① 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

② 传言自北郡至汴州仅数程，“汴州”二字恐有误。

③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三引俞说，误作《过庭诗》。“诗”字当为“录”之误。

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

所述故事与《虬髯传》颇相似。惟杜公此诗乃指王珪。按之史传，珪与太宗非素交，且太宗时宰相别无姓王者。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王珪李靖”条）已辨杜公之误。又言：

有杜光庭《虬须客传》云：隋炀帝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谒，窃其一妓。道遇异人，与俱至太原，因刘文静以见州将之子，言其真英主，倾家资与靖，使助创业之举，即太宗也。按史载唐公击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子之事。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1]

洪氏所见，当是杜氏《神仙感遇传》中之文，亦言其不足据。《小说考证》引花朝生《笔记》云：

此传与唐史不合。史称大业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义兵，而炀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时文皇甫六龄，安得谓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为十二年事，则杨素之亡已久。且卫公尝上高祖急变，岂能识太宗尘埃中耶？其为子虚乌有，无可疑者，传奇之舛缪，又不待论矣。

亦证其与史书乖违。按《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大业元年，由尚书左仆射迁尚书令，寻拜太子太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卒官。”素盖于是年六月拜司徒，七月而卒。考大业元年，隋司空为观王雄，自开皇九年七月拜，至于大业（详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知素始终未官“司空”，此《虬髯传》之传误也。

虬传言：“贞观十年，公（指靖）以左仆射平章事。”（杜氏《神仙感遇传》无此语。）考《新唐书·太宗纪》，贞观四年八月甲寅，李靖为尚书右仆射。《唐书》卷九十三靖本传，亦作“右仆射”。此作“左”误。靖传云：

仕隋为殿内直长。吏部尚书牛弘见之曰：“王佐才也。”左仆射杨素

---

① 《四部丛刊续编》影宋刊本。

拊其床，谓曰："卿终当坐此。"

靖与杨素之关系，有此段事实。惟时已入仕，而虬传谓以布衣上谒，事亦未合。而靖之军事天才，自少时已露头角，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深叹服，是靖亦非贫士者也。靖传云：

大业末，累除马邑丞。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杀壮士乎！"高祖壮其言，太宗又固请，遂舍之。①

柳芳《唐历》亦有相同记载。《通鉴考异》（八）引靖行状②云：

昔日在隋朝，曾经忤旨。驻兹城陷，高祖追责旧言。公慷慨直论，特蒙宥释。

则靖在隋时，与高祖有隙，赖秦王（即太宗）为之缓颊。虬传谓其与刘文静助李氏匡天下，了不足信。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于靖此事，绝未之及。程大昌谓为文人滑稽，其出于附会甚明。清王昙《题安吉金钟山李王庙诗》并书夫人寝碑，亦辨小说《虬髯客传》之诬。

三、"虬髯"应作"虬须"

"虬须"二字见《三国志·魏志·崔琰传》："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年瞋。"《南部新书》癸集："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③ 杜甫《八哀诗·汝阳郡王琎》："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④ 王应奎《柳南随笔》云："《虬须客传》，'须'字今本误刻为'髯'。杨彦渊《笔录》：口上曰髭，颐下曰须，上边发曰鬓，在耳颊旁曰髯。髯之不能混须也明矣。"今按杜氏《神仙感遇

① 《旧唐书》十七，本传；《新唐书》十八，略。
② 伪托魏徵撰。
③ 亦见《酉阳杂俎》。
④ 据《古逸丛书·草堂诗笺》卷二十四。

传》、《宋史·艺文志》及《容斋随笔》并作《虬须客传》，《考古编》作《虬须传》，而《过庭录》之《黄须传》亦不作髯，则作“须”为是。

四、扶馀国事之无稽

《神仙感遇传》云：“贞观中，东南夷奏有海贼，以艘船千艘，兵十余万人于扶馀国。”虬传则云：“贞观十年，适南蛮人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馀国，杀其主自立。”按新、旧《唐书》无扶馀国，有扶馀城，失名《朝鲜志》上云：

> 扶馀县本百济，圣王自熊川来都，号南扶馀。义慈王时，新罗金口信与唐苏定方攻灭之。唐师既去，新罗尽得其地。[①]

按扶馀本指百济。《唐书·东夷传》：“武德四年，（百济）王扶馀璋，始遣使献果下马，自是数朝贡。后五年，献明光铠，且讼高丽梗贡道。太宗贞观初，诏使者平其怨，又与新罗世仇，数相侵。十五年，璋死，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至苏定方伐义慈，乃在高宗显庆五年[②]，是贞观十年间，扶馀璋为王，未闻有杀其主自立事。又考高丽亦为扶馀别种，贞观十六年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建武。[③]《唐书·东夷·高丽传》：“（盖苏文）杀建武，残其尸，投诸沟，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④] 虬传所云杀主事，或盖苏文事之讹传，惟年次既不合，亦非自立，可见其事之无稽。《小说考证》三引《小浮梅闲话》言：“薛仁贵乾封初，进攻扶馀城，拔之。使诚有虬髯事，亦不久残破。”钱静方《小说丛考》云：“故问虬髯公事之有无，初以唐扶馀国之有无为断。”按此自小说家靖言，不足信也。

---

① 《艺海珠尘》本。

② 参《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

③ 《通鉴》卷一九六《唐纪》一二。

④ “莫离支”亦作“莫何逻绪支”。详日本末松保和著《新罗建国考》。

五、李卫公兵法

虬传末言："或曰卫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传。"《神仙感遇传》无此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唐李靖对太宗问兵事，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①] 今按李靖与其舅韩擒虎论兵，事见本传。又文王尝命靖教侯君集兵法。后世兵书多托于李靖。《唐书·艺文志》兵书类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宋史·艺文志》兵家有李靖《韬钤秘术》一卷，又《统要》三卷[②]。又李靖《兵钤新书》一卷[③]，又《卫国公手记》一卷。《宋志》、《崇文目》均有。唐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拱之《兵要望江南》一卷，或题李靖撰，乃出伪托（参《四库提要》）。旧传《李卫公问对》，词旨浅陋，宋人以列七经，亦假托者。[④] 传谓兵法为虬髯所传，更出于傅会耳。

虬传言："起陆之渐，际会如期。"此段文字，《神仙感遇传》原无之。"起陆"句，本《阴符经》"天发杀机，龙蛇起陆"语。知今传小说《虬髯传》文，后人已多所增益，远非原本。考《崇文总目》有《阴符机》一卷，题唐李靖撰，以为阴符者，应机制之书，破演其说为《阴符机》，宋时有此书。清歙县汪宗沂曾合唐杜佑《通典》、杜牧《孙子注》、《太平御览》、《武经总要》、明唐顺之《武编》诸书所引《卫公兵法》逸文，辑为三卷。又为《旧唐书李靖传考证》，附考其求兵事实，有《渐西村舍丛刊》本。[⑤]

六、戏曲中之虬髯与红拂

明人戏曲，多演虬髯为本事，最有名者，有张凤翼之《红拂记》、凌濛初之《虬髯翁剧》，继之者有张太和及冯梦龙之作。兹分述于下：

（一）《红拂记》：明江苏长洲张凤翼伯起撰。所作戏文七种，合刻为《阳春》六集。有明朱墨刊本，又有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本、刘世珩编《暖红室汇刻传奇》本，最为流行。

① 李卫公《问对》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附会之。

② 《崇文总目》，《韬钤秘录》作《庄廷范模》。

③ 不知作者。

④ 见陈振孙《书录解题》、胡应麟《四部正讹》。

⑤ 《丛书集成》本。

《红拂记》略依《虬髯客传》，又牵合唐孟棨《本事诗》所记乐昌公主、徐德言破镜故事而成。为凤翼在新婚伴房中所作（尤侗说），剧中以李靖为主人公。

（二）《北红拂》及《虬髯翁》：明乌程凌濛初玄房撰。濛初号即空观主人。所著有二种：一为《远山堂剧品》者，录之《识英雄红拂女择配》一剧。现有上海影印明末精刻本。首有“即空观主人凌波戏题”，《红拂杂剧小引》。版心标称《北红拂》。另一种题《虬髯翁》，“正本扶馀国”。《今乐考证》著录，有沈泰（林宗）编刊《盛明杂剧》本（第二十二卷）。剧分四出，以虬髯翁为主体，不加入乐昌公主事，亦无红拂私奔事，与张记取材结构不同。濛初之作，尤侗称“为北剧。笔墨排奡，颇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为三记，有叠床架屋之病”。

（三）《红拂记》：明钱塘张太和屏山撰。见《曲名》、《曲海目》及王国维《曲录》。

梁廷枏《曲话》：“《红拂记》已经三演，在近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简而不舒；今屏山不袭二家之格，能兼诸剧之长。”祁彪佳《远山堂曲名》云：“吕鬱蓝（天成）谓其通篇不脱俗气，当亦不能为屏山讳。”

（四）《安文夫》：明吴县冯梦龙子犹撰。合张凤翼《红拂记》及凌濛初《虬髯翁》与刘晋充某曲加以改作。有明墨憨斋定本、乾隆重刊《新曲十种》本。

（五）《风云乐》：清许善长撰。

李靖与红拂本无其事，自传盛行民间，后人竟于醴陵伪造红拂墓。《嘉庆一统志》长沙府有：“李卫公祠，在醴陵县西二里西山靖兴寺内。唐李靖驻兵西山，后人即其地为祠以祀。”则墓当由此讹传，自不足信。

七、《虬髯客传》之用意及作者

《神仙感遇传》末云：“乃知真人之兴乃天受也；岂平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乱者哉?”今本《虬髯传》则作：“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按真人即传中常言之真主，犹光武之“白水真人”也。此篇论天子受命，绝非人力，故以窥窃神器为大戒。东汉初，班彪因光武之兴，曾著《王命论》，即发此义，其言曰：

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

可与此传互相证发。老子《道德经》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此传主旨，即本斯义。《容斋随笔》、《宋史·艺文志》题此传杜光庭撰。鲁迅谓殆光庭尚仕唐时所为。[①] 刘开荣以为光庭当僖宗避黄巢入蜀，召充麟德殿文章应制时作。[②] 考《神仙感遇传》此"虬须客事"，系于"明皇十仙"下"东明油客"上。《感遇传》出于纂集，其传中文字多怪力乱神之语，当为唐末流传小说。光庭采入其书，意者有人观唐末天下纷扰，群雄割据，藩镇跋扈，故本《黄须传》故事发为是篇，言神器大可觊觎之意。特文中与隋唐史事乖违至多，光庭文学之士，通达古今，谅不谬悠至此也。唐代举子，每以小说之文投献于主司，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即其著例。[③] 故所作大抵驳杂无实，不足为病。此《虬须传》可能出于唐世举子所拟撰，其后光庭采入其所纂《神仙感遇传》中，宋人因题为光庭作耳。其题此篇为张说撰，更不足信。此类小说为古文体，殆成于贞元、元和之间。[④] 此稍具文体演进常识者，自能明之，毋庸喋也。

又按《虬须客传》除《道藏》一系外，尚有《豪异秘纂》以为张说作。明钞《说郛》卷二十二《豪异秘纂》（又名《博记杂编》）内收"《扶馀国主事》，唐张说著"是也。《宋史·艺文志》收《豪异秘录》一卷，即此书。

原载《大陆杂志》第十八卷第一期

①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② 《唐代小说研究》。

③ 见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④ 参看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及《元白诗笺证稿》。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序

神话是诗。西方的诗，导源于神话。中国（汉族）无史诗，神话亦不发达，《山海经》罗列众山之神，大抵皆人兽共体，见于楚帛书五月之皋月，其神像作三首牛蹄[①]，知战国时此类图像久已流行。西汉纬书大量出现，所记古代圣王，多作人兽合体之形状，其中或有外来影响。[②] 以此之故，纬书亦成神话之渊薮。

俄罗斯李福清教授攻治神话小说有年，造诣甚深，所论伏羲女娲画像描绘演变之过程，参证缜密，用力周至，脍炙人口[③]。其在华从事研究，涉猎蒙、回各地民间说书，于蒙古“本子曲”（即用蒙语讲唱的中国章回小说）致力尤深，细处且及关公所骑之赤兔马，进而留心关公之民间传说。顷者，成《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一书，共分六章，并附论关公画像，来书索序于余。余曩者曾著文标揭“关学”一名，自以历年游览，舟车所至，尝徜徉于洛之关林、晋之盐池、荆州之玉泉山，访其遗迹，海疆南澳关庙，其碑称汉寿亭侯，其时尚未晋封帝号也。凡此诸地，其中或为先生屐齿之所未及，略有可互补之处。先生虚怀下问，询及刍荛，殆以此乎？

余与先生初识，论交于布拉格，迨先生莅港，尝因践余之约，致罹车祸，幸上天呵护，不久康复，壮健逾前。喜其论著陆续在华刊布，沾溉无

① 见拙著《画预：国画史论集》，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3年，47页。

② 季羡林先生说。

③ 见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穷。余独赏其《神话论》一文，评骘中外诸家之得失，极中肯綮，读者受益滋多，倘能再作补充，详加注说，勒成专书，更有造于神话之学，先生岂有意乎！

丙子重阳后十日


ISBN 978-7-300-10904-6
9 787300 109046 >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 · 365